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1—19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16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六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1—19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978-7-80199-607-7

I. 共… II. 中… III. ①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1931—1937 ②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1931—1937 IV. K260.6 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9882 号

书 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6)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1—1937)

编 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 姚建萍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40mm×203mm 1/32

字 数: 603千字

印 张: 25.25

印 数: 1—11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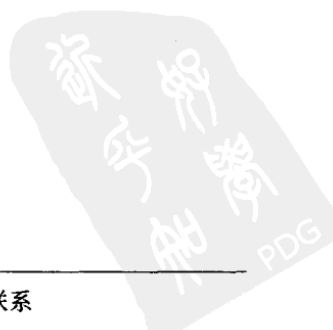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199-607-7

定 价: 298.00元 (共五卷)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刘宋斌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2005年11月
于京郊自得园

编者说明

本书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16卷。本卷汇集了除本丛书第13、14、15卷所收档案外的有关共产国际与一二八抗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与中国革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与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区域建设、共产国际与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共产国际与苏区反“围剿”斗争等六个专题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散见于其他中文图书报刊之中,包括以前已由外文译成中文的文献资料*。

本卷所收的文件主要是1932年至1937年之间的文献和档案,包括:一、共产国际发表的有关声明和通过的纲领;二、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和电报;三、共产国际执委全会讨论中国革命的会议讲话和发言记录;四、共产国际领导人发表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五、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六、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及其领导人的报告;七、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执委指示精神所制定和发布的指示。

本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刘宋斌同志负责选编。

* 译者稿酬按有关规定支付,请与本卷编者联系。

目 录

一、共产国际与一二八抗战

共产国际对于上海事变的指示(1932年2月)	3
共产国际执委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号召 (1932年5月1日)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 (1932年1月27日)	8
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1932年2月2日)	10
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1932年2月15日)	12
请看!!! 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得到胜利? (1932年2月26日)	23
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及其结果(1932年2月12日)	26
上海事变的教训与中国共产党(1932年10月)	米 夫 33

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论中国(1932年9月)	43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 (1932年9月2日晨)	王 明 50
在讨论库西宁和台尔曼的报告时的发言 (摘录)(1932年9月5日)	(日本)阿 木 80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上的发言(1932年9月12日)	王 明 94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上的发言(1932年9月13日)·····	洛甫	120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 全会决议的决定(1932年12月31日)·····		123

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与中国革命

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和共产党的任务 (摘录)(1933年11月28日)·····	库西宁	127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论中国(1933年12月)·····		130
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 (1933年11月30日)·····	王明	134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第九次会议上的 发言(摘录)(1933年12月2日)·····	皮亚特尼茨基	190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 (摘录)(1933年12月2日)·····	(日本)冈野	193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上的发言(1933年12月9日)·····	米夫	197
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运动底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底工作 (1933年12月6日)·····	康生	207
中央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定 (1934年4月12日)·····		225

四、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区域建设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摘录)(1933年3月)·····		231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1932年1月9日)·····		233
广州公社五周年(1932年12月)·····	米夫	244
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1933年4月)·····	米夫	251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

- (1933年6月20日) 265
- 中国当前的政局(1933年6月) 米 夫 341
- 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1933年) 王 明 349
- 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国共产党五中全会通过)
(1934年1月18日) 372
-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1934年4月) 米 夫 392
- 为争取殖民地革命中的领导权而斗争
(1934年10月) 米 夫 413
- 中国争取建立苏维埃的经验(1935年2月) 米 夫 431
- 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在反帝反国民党反法西斯主义统一
战线中的作用(1935年8月11日) 王 荣 444
- 七年来的中国苏维埃(1935年8月) 周和生 452
- 方志敏——中国人民的英雄
(1935年9月12日) Ar·哈马丹 472
- 司令员朱德(1935年12月6日) Ar·哈马丹 476
- 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
(1935年12月13日) Ar·哈马丹 482

五、共产国际与下层统一战线策略

上海中央局转发共产国际、少共国际关于反帝统一

- 战线的指示(1933年6月15日) 491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建立反对法西斯蒂的统一
战线告各国工人(1933年6月20日) 495
- 为建立统一战线而斗争
(1934年11月7日) 季米特洛夫 499
-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

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 (1933年1月17日)	506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 (1933年1月26日)	508
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 ——重申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3年4月15日)	526
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1934年2月22日)	53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 告民众书(1934年4月10日)	546
六、共产国际与苏区反“围剿”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摘录) (1933年3月)	555
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1934年2月5日)	王 明 557
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	王 明 564
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	李 德 603
敌人的山地战术	李 德 607
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	李 德 621
反对曲解我们的战术	李 德 627
再论战术原则	李 德 632
短促突击的战例	李 德 636
论防空几个新的问题	李 德 644
某独立师袭击敌人未成堡垒的经过	李 德 654
争夺四川的斗争(1934年11月14日)	656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	

(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660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	678
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1935年7月3日)	阿·哈马丹 685
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	691
论中国红军(1935年8月)	李 光 732
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	
(1935年10月10日)	陈 云 749
中国红军的作战活动(1936年1月13日)	781
中国红军的顺利推进(1936年1月18日)	783
对战略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李 德 785

一、共产国际与一二八抗战



共产国际对于上海事变^①的指示

(1932年2月)

估计到士兵群众不再服从投降的军官及一切民族情绪之高涨,必须用一切力量打入军队,在那里发展最大的工作,特别应该在集中的与日本帝国主义争斗的军队中去争取士兵群众,将他引导士兵与群众联合一致反对日本的侵略。必须在群众面前加紧揭破为中国民族的耻辱的南京广东政府的投降破产,与全国在我们已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革命军事委员会是革命争斗与政权的机关,他依据在工人兵士学生城市贫民群众的斗争之上。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应该成为上层的组织,保证在它里面工人骨干之决定的作用及在党的领导之下。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领导保卫中国反抗侵略者发展在民众与士兵之中广大的鼓动,刊物,宣言。在可能的地方,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用一切力量来最高限度武装工人,组织义勇军在我们的领导之下,与派坚强的工人队伍到军队去争取军队。如果总罢工能够用来反对侵略者,那就可以组织总罢工包括在租界上的工厂在内。在农村中间——特别在战事的区域之中发展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创造农民义勇军。在鼓动中广大地宣传苏区与红军。在各大工业城市中创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他取得了士兵与工人群众真实的影响之后,

① 上海事变指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的进攻,即“一二八”事变。——原编者

采取组织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来保卫中国的路线。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起来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

(二月十一日到)

共产党从满洲事变一开始之后,就应该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并且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进行这一战争。现在还是要如此号召,并且尽量想法武装民众,动员劳苦群众去抵抗日本。党不但不拥护,而且却正相反,最无情的揭破国民党与广东南京政府以及一切卖国的军官。这些东西解除工人,革命学生反日的义勇军,压迫反日运动给日帝国主义当清道夫。

提出反对蔡廷楷(错)这些“抗日军官”的个人的口号,现在是不适当的。但必须利用蔡廷楷(错)与这些军官的一切反对民众的具体行动,与他们出卖的企图,去争取群众。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英勇的 19 军士兵万岁!”

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必须着重地说,国民党不去动员军队去同日本战争,却派遣军队去进攻已经脱离帝国主义羁绊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利用红军的名义告诉民众,尤其是 19 路军的士兵,假使没有国民党的军队进攻着苏区,红军早已同 19 路军的士兵在一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上海的进攻,并在满洲与日军进行战争了。着重的指点出,红军最坚决的反对日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一直到中国的完全解放。

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

(2 月 29 日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共产国际执委为反对帝国主义 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号召

——摘自 1932 年 5 月 1 日共产国际执委
1932 年五一节宣言：“告各国工人，告全体被
压迫者和被剥削者书”——

……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事实。日本帝国主义，是亚洲的宪兵，它与欧洲宪兵法帝国主义极端紧密地勾结起来，得着帝国主义列强底默认，已经用武力强占了东三省和上海。许多城市乡村都被炸毁，杀死的饿死的工人农民、妇女儿童尸骨成堆，这就是反对中国工农的帝国主义战争底第一个总结。武力瓜分中国，使太平洋两大帝国主义强国——日美——底对抗形势更加紧张，刻不容缓地直接提出要用新的更可怕的世界大战来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反对中国的战争，就是进攻苏联战争底序幕。

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并且还想来侵犯他们所妒恨的那既没有危机也没有失业现象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欧美的资本家们，拿火车与轮船装载军械、炸药和毒气，送往日本，这不仅为的和中国作战，而且为的反对苏联。

……男工们，女工们！全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们！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宣布战争，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之进攻中国，已经成为事实。谁能使这个战争不变为世界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呢？是不是国际联盟呢？难道不是国际联盟赞美日本帝国主义抢劫中国么，难道不是自从开始存在时就援助一切最大帝

国主义强国反对软弱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盟、赞美日本底行动么？难道不是国际联盟底筹备会议和裁军会议屡次否决了苏联底总裁军提案么？是不是第二国际呢？难道不是第二国际在1914年叛卖了你们么？难道不是第二国际在1914到1918年大战时宣称这是最后一次战争么？不就是它的各支部经常在国会里面赞成军费案吗？不就是它援助了进攻摩洛哥、叙利亚、安南吗？不就是它的协助下由飞机炸毁了印度整批的乡村吗？不就是第二国际卑鄙地造谣中伤，说什么赤色帝国主义而来准备了对苏联的战争吗？不就是这第二国际在战争已开始时还在宣称“不会再有战争”吗？

男工们，女工们！职员们，贫苦农民们！在这个历史关头，当苏联社会主义胜利已成事实的时候，当帝国主义对华战争已成事实的时候，当武装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准备正在完结的时候，当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时候，当推翻资本主义的胜利斗争底前途日益接近的时候，——在这个关头，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却与资产阶级一块来准备战争，想把你们变为炮灰，以便再来一次拯救资本主义。

在中国，腐化的国民党的狗党们，实行疯狂的残杀恐怖。国民党的刽子手，与帝国主义强盗勾结起来，实行向中国苏维埃区域作第四次的进攻，而每一次进攻，都被光荣的红军打退了。

拒绝向日本运输任何军械或军需，以反对日本抢劫中国的战争！用反战的群众发动来反对帝国主义底新的屠杀战争准备吧，来反对武装干涉苏联战争底准备吧！

工人，农民和兵士们！

大家都在五一节这一天来表示你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决心吧！

反对资本家的进攻！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保护全体劳动者底祖国苏联！

争取无产阶级专政！
争取世界革命底胜利！

（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武装 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

(1932年1月27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日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占领了热河,现在又想占领上海了。国民党除了不抵抗与投降之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吓之下,现在更将采取积极步骤来对付全中国的反日民众了。国民党政府对于日帝国主义所提出的解散一切民众反日的团体与镇压民众反日运动的要求,实际上已表示了完全的接受。全上海以至全中国的民众,将在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合作之下,遭到空前的屠杀!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只有一致团结起来,我们才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联合进攻。我们必须毫不迟疑的实行罢工罢课罢操罢岗,必须每一个人迅速的自动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察队,举行兵士与民众的大联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对日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我们才能给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保卫中国不再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蹂躏!

全中国的民众们!形势是十二分的紧迫!必须加速度的活动起来,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必须更积极的拥护全中国唯一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民众的苏维埃政府,更大规模的投入全中国唯一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工农红军。必须在反对帝国主义与

反国民党的苏维埃旗帜之下武装保卫中国革命，直到我们最后的一滴血！

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

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共同压迫革命运动！

兵士与民众联合起来，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

武装保护一切民众的革命团体与革命领袖！

武装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

到红军中去，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

以革命的民族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武装保卫民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武装保卫中国革命，直到最后的一滴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32年1月27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

(1932年2月2日)

一、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 罢工,罢课,罢操,罢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 反对上海设立中立区! 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境! 自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无条件没收一切帝国主义的银行,工厂,矿山,交通工具与商业机关! 否认一切外债与赔款!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

二、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 反对国民党与资产阶级出卖上海! 反对国民党压迫革命运动与屠杀劳苦群众! 反对投降帝国主义与压迫劳苦群众的一切反革命派别! 反对国民党同帝国主义所订立的一切谈判密约!

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 建立工农兵以及劳苦群众的代表会议(苏维埃)! 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创造与加入红军,武装保卫中国,武装保卫上海劳苦群众及革命运动! 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 拥护中国工农红军!

四、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及国民党! 关厂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月饷,米贴,花红,年饷,一律照发! 拍卖日货,没收投机商人的财产救济罢工工人,失业工人,城市贫民与难民! 将一切公共房屋给工人难民居住! 将所有武装武装工人! 一律增加工资! 确立八小时工作制与社会保险! 青工六小时! 女工产前

产后休息两月！同工同资！

五、革命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革命的士兵，巡捕，警察倒转枪来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瞄准！革命的士兵们，杀掉你们不抵抗的长官，同武装民众团结一致，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革命的士兵们，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

六、农民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武装农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平均分配！近郊农民武装起来，进行游击战争！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七、总同盟罢工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压迫一切革命运动！反对工部局的戒严条例，反对按户搜查！罢工，武装，言论，集会，结社完全自由！启封工会及一切革命组织！释放被捕工友与一切政治犯！

八、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武装拥护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日本无产阶级与中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拥护中国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

中 央

1932年2月2日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

(1932年2月15日)

各地党部：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满洲之后，北则向哈尔滨与中东路发展，西则向内蒙外蒙发展，进攻苏联，并完成满蒙的占领计划。南则调动它的海陆空军向中国沿海各口岸进攻，实行镇压全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着的反日运动，占领新的区域与取得新的特权，并以此来恐吓国民党政府无条件的接受日本所提出的一切条件。上海的占领完全是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计划的有机的部分。所以虽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对于日本在上海所提出的四大要求(即赔偿日本损失与取缔全国反日团体与反日运动的要求)完全接受，而且日本领事已经表示“满意”，但是就在那一天的晚上(28日晚)，日军即开始了对上海的武装行动，轰炸与残杀上海的劳苦群众。

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行动，自然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也日益紧张，尤其是日美之间。日帝国主义海陆空军的调动，不能不使帝国主义列强大大的把它们军舰集中到上海。尤其是美国，自28日之后，美军舰应调而集中到上海的已有19艘之多。这种动员的主要目的，当然同样的是在镇压中国革命运动，尤其是进攻苏区与红军，与瓜分中国。然而同时也正是为了瓜分中国而发生帝国主义战争的积极准备。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军事行动，却遇到了19路军士兵的英勇的抵抗。全中国民众反日的斗争，也更因反日战争的发生而更形高涨。但是在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却继续的主张不抵抗，把

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同时准备在任何条件之下，向日帝国主义投降，以避免战事的扩大。为得要表示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坚决，蒋介石更遣派警卫军第3师到上海监视19路军，准备解除19路军士兵的武装，以停止反日战争，表示他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

至于其他国民党的派别，以及许多失意军人与无聊政客，则正在利用19路军士兵英勇的反日战争与全中国民众反日斗争的高涨，大放“抗日救国”的空炮，积极表示自己爱国的活动与对于19路军的赞助，以欺骗19路军的士兵与反日民众，造成革命士兵与革命民众对于他们的幻想，把他们奉为民族革命的英雄，以此来维持整个国民党的统治，同时以此来扩张他们的地盘与他们的势力，进行反革命内部的斗争。陈济棠，孙科，张发奎，李宗仁，冯玉祥，陈铭枢等的“抗日活动”，完全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在革命士兵与革命民众的背后，这些反革命派别，正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表协商着如何出卖上海与中国，如何把上海划分为中立区，使19路军士兵退到“安全地带”以外，或者像蔡廷锴（锴）等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以取得“抗日”的报酬。同时，他们同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一样，对于民众的反日运动则利用军事时期的戒严条例，任意压迫。他们解散反日的革命团体，禁止群众武装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他们逮捕与屠杀革命领袖。他们在援助19路军的空洞口号之下，调动着他们的军队，不是为了参加反日的战争，而是为了进攻苏区与红军。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蒋介石之在鄂豫皖和陈济棠之在闽赣边对于苏区与红军的军事布置了。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与屠杀民众的刽子手！

一切在野的派别，如像社会民主派，社会与教育派，国难救济会派，以及托陈取消派，也正在这一反日战争中，积极进行欺骗的宣传，使革命民众幻想国民党还能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要全中国的民众不去积极起来反对造成全中国民族奇耻大辱的国民党统

治,而起来拥护国民党去“抗日救国”。他们更主张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组织“民众抗日救国政府”或“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实行“官民合作”与“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以取得自己的地位。同时利用种种诡计阴谋造谣诬蔑的方法,并借用帝国主义巡捕房与国民党军警的势力反对与压迫革命运动与革命组织。

但是,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与一切革命民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进攻,给了最有力量的回答。他们罢工罢课罢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与国民党的投降。士兵群众更是奋不顾身,拼着性命,在血战中抵抗着日军的进攻。成千成万的工农学生群众,开始自动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加入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阵线。全国反日运动,正因为日帝国主义的侵掠与国民党的投降,而更其高涨了。尤其是苏维埃与红军的新的的发展,更给了全中国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群众以更大的兴奋,使广大的民众相信,只有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之下,才能使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得到最后的胜利。国民党统治是正在加速度的崩溃着,做着临死前的最后的挣扎!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之下,我们的党必须最坚决的反对对于任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幻想,以为它们可以帮助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冲突,不是为了要帮助或反对中国,而是为了瓜分中国的不均。必须经常揭破一切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的阴谋,压迫与屠杀中国民众的事实。对于国民党任何派别,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也绝对不应有丝毫的幻想,以为它们还能拿着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民族的革命战争,毫不容情的揭破这些嘴上喊着“抗日救国”的军阀们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压迫民众运动的一切阴谋与事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与一切国民党的派别,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在反帝与反国民党的旗帜之

下，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这仍旧是我们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然而把上海目前所进行着的反日战争（同样关于满洲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战争），看做简单的帝国主义与军阀间的反革命战争，也是完全不正确的。不论这一战争的领导者是如何混蛋与反革命的军阀，然而这一战争的主要动力不是这些军阀，而是士兵群众与反日民众，这一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侵掠，而是为了反对侵掠。所以这一战争虽不过还限制在上海等处，然而它很明显的带有民族革命战争的意义。因此，我们党的任务，不是抵制这一战争，而是积极的加入这一战争，夺取这一战争的领导，在战争中加紧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宣传鼓动，大规模的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来推翻国民党，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以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

中央检查各地党部的工作，觉得我们的同志对于目前形势还没有这种明确的了解，或者甚至完全不了解。所以在各地的反日工作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两个不能容许的极端。或者是完全的关门主义，不参加任何反日运动；或者是所谓完全的“公开主义”，变为国民党的俘虏。譬如陕西省委，过去对于反日运动完全消极，后来改正了这种错误，即转到了另一极端，使我们的反日运动变成了和平的公开运动。再譬如四川省委，当广大群众起来反日时，我们主张“反帝不反日”，但后来自知错误，即另趋极端，组织“援马委员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的保护，并且在刊物上表示愿意同国民党合作。其他如满洲省委与广东省委等在反日斗争中，对于我们党的阶级路线，表示出许多动摇。对于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与动摇，我们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打击。只有在反对这种国民党的尾巴主义与“左”的关门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上，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工作，顺利的向前发展！

上海事变后，中央已有一紧急通知（1月27日发）告诉各地党

部以目前所应该进行的一些具体工作。然而中央认为在目前这种复杂的形势之下,有几个中心任务必须在这里特别指出的。

第一,必须号召与组织反日的群众大会,或群众团体的反日代表大会,通过反日的纲领,公开成立民众反日会与民众反日联合会,公开领导目前开展着的反日斗争。这里所说的公开,不是去向国民党立案,而是经过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力量去自动的公开。这种反日会的委员,决不是立三时代的行动委员会,完全由党所指定的几个同志去包办,而是由广大的反日民众选举出来的,他们不完全是自己的同志,而且要尽量吸收非同志的群众代表参加工作。在已经成立反日会的地方,必须集中力量建立下层的群众基础,利用反日会的公开组织,到工厂,学校,农村,兵营中去建立反日会的分会。尤其要把反日会的领导集中到工人反日会的手里,必须经过党团去领导反日会。

必须再三说明,反日会的公开,决不是把我们的纲领变成灰色,而是依靠群众的斗争力量以争取公开。最主要的口号应该是“罢工罢课罢操罢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出境”,“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反对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口号必须简单明了,必须喊出反日民众的要求,为反日民众所接受,并且依据反日斗争的发展,转变与提高我们的口号。

要把目前一切反帝的斗争,拿到反日会手里。经过这一公开的组织来集中反日的领导,使这一反日会的权力,逐渐扩大。坚决打击把反日会的工作停顿在和平发展中,以为反日会不必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错误倾向。应该明显的认识反日会是群众斗争的领导机关。尤其在战区内,反日会必须领导广大民众的日常斗争。对于罢工工人,失业工人,以及难民贫民等在战争时期生活问题与安全问题等的解决,应该是反日会最中心工作之一。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发动与领导群众抢米分粮,占领公共房屋,包围市商

会市政府等要饭吃，要房子住的斗争！只有这样，反日会才能在群众中间提高它的威信与权力！

第二，党除了利用公开路线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宣传队扩大反日宣传，以及扩大反日组织，号召与组织飞行集会与示威游行等主要工作之外，必须立刻进行义勇军的组织，来武装工人农民与革命的学生群众。要把义勇军的组织形式，来扩大我们党的群众基础，来武装民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在没有反日会的地区，党可以单独公开组织义勇军，设立义勇军委员会与义勇军办事处。在与日军直接作战的区域内，这种组织是号召群众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的最好的方式。加强义勇军工人阶级的核心，在工人反日会下成立模范的工人义勇军，绝对保证我们党在义勇军中的领导。

我们坚决的反对在有些省委内对于义勇军所有的不正确的观念，以为义勇军只能帮助国民党军队作战，把义勇军任意的送到前线上当炮灰，结果我们的义勇军领导机关变成了国民党招兵买马的地方。同时把义勇军同民族革命战争完全分开，以为义勇军就是在作战的区域，也不必到战线上去的观念，也是不正确的。只有把义勇军当做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工农自己的武装组织，才是正确的了解了义勇军。因为是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武装队，所以它不拒绝而且积极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是工农自己的武装组织，所以它不受国民党的军官所节制。它是民众反日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宣传者，组织者与保护者。它参加反日战争，是为了要同革命兵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投降帝国主义的一切国民党军阀。

要坚决反对各省委对于义勇军工作的忽视，把义勇军工作限制于形式上的登记，把义勇军同群众斗争完全分开，与在和平状态中去发展义勇军的观念，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党须用最大的力量加强对于义勇军的领导，不然“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海陆空军出境”的口号，会变成嘴上的空喊。义勇军必须要有政治上

军事上的训练,要利用他们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与保护民众运动。义勇军必须到前线上同士兵在一起,团结与争取革命的士兵到革命的民众方面来。必须利用义勇军,组织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发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消灭敌人的便衣队,来武装他们自己。此外,在农民中必须成立农民的义勇军,把他们放在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之下。

第三,必须最坚决的执行抵制日货的工作,把抵制日货的领导权拿到我们自己的手里。各地党部,对于这一工作,过去是完全表示消极。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国民党与资产阶级的抗日会,还能继续存在,利用他们的抗日会去欺骗民众,并且利用这一组织,使反日运动真正失去领导。关于这一工作,中央有不少指示给各地党部,然而一直到现在,在许多同志中还表示怀疑与犹豫。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现象。

我们的反日会必须立刻起来领导抵制日货与没收日货的工作。为了要达到这一目的,反日会必须动员工人学生群众组织大规模的检查日货队,调查日货队,立刻开始工作。把没收来的日货,拿来救济罢工工人,失业工人,难民与城市贫民。“拍卖没收日货救济罢工工人与失业工人等”这一口号,过去虽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拥护,然而我们始终没有认真的去做,这对于我们,实是很大的损失!

在战争区域内,抵制日货的工作必须着重在检查将粮食,日用物件以及一切货物高价卖给日军的奸商。公开号召群众组织通缉奸商私贩货物给日军的队伍,用各种各样的武器,武装这些队伍,尤其要这一工作集中在工人阶级的手里。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奸商的财产,来救济罢工工人,失业工人与贫民。同时必须设立民众法庭,公开审判“汉奸”。纠察队更必须注意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不觉悟的工人,要善意的劝告他们,勿为日帝国主义所利用。

第四,争取反日士兵的工作(尤其是 19 路军的士兵),现在比

无论什么时候都重要。必须大规模的公开(同时也可经过反日会)组织慰劳队,看护队,运输队,交通队等到前线去同作战的士兵接近。必须派遣有组织的坚强的工人队伍(可利用工人十人团等名义)到军队中去,实行补充。自动的成群结队的到前线上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参加作战。动员妇女到伤兵中去做慰劳与看护的工作。总之,必须利用一切方法到士兵中去,同士兵接近,宣传与组织士兵。在士兵中必须成立兵士反日会或士兵委员会,加入民众反日的团体,逐渐把对于士兵的领导权拿到我们的手里。

在反日军队中组织兵士反日会或兵士委员会,是党在士兵工作中的中心任务。这种委员会,在经济上直接接收一切民众的慰劳物品,自己管理伙食与军饷,与一切士兵的日常生活。在政治军事上,一切长官的命令,必须经过兵士委员会的许可,方能执行。它号召士兵群众,反对投降,妥协与退却的军官,它可以在广大士兵群众拥护之下,逮捕,审判与枪决这类“卖国贼”。应该最坚决的反对那些把兵士工作当做同军官周旋的同志(如像在 19 路军工作的一些同志),反对对于任何“抗日军官”的幻想。

绝对不要放弃在日本士兵中的工作。打击那些以为在战争期间没有法子进行这一工作的机会主义观点。提出“日本的兵士弟兄们同中国的劳苦民众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第五,在我们已有军事力量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这种革命军事委员会,是领导革命斗争与政权的机关,它依靠在斗争的工人,近郊农民,兵士,学生与城市贫民的身上,可由党,团,工会,反日会,义勇军指挥部与兵士委员会(或反日会)组织起来,但必须保证在它里面工人骨干之决定的作用与党的绝对领导。它应该领导保卫中国反抗侵掠者的斗争,在民众与士兵中发展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用它的名义发表宣言,传单与各种刊物,号召革命民众与士兵起来,反对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并且在可能的地方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与“卖

国贼”。

如若在各大工业城市中建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取得了对于士兵与工人群众的真实影响之后,我们就应该采取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来保卫中国的路线。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依靠它的武装力量与千百万群众的拥护,直接做打倒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并且宣布国民党政权之推翻,与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直接受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领导。

要坚决的反对那些以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当做能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可以生存的观念。要坚决反对那些在目前空谈武装暴动,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放弃目前的中心工作的清淡倾向与机会主义的消极!但同时要十百倍的加紧武装暴动的宣传。

第六,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必须十百倍的加紧宣传苏维埃与红军。在我们的宣传品上与口头的宣传鼓动上,必须在千百万工农民众的前面指出,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没收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大资本家所有的一切银行,工厂,企业,交通工具与一切他们的财产,把它们一起拿来充当民族革命战争的军费。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没收地主,大商人以及富农的一切粮食,拿来充当民族革命战争的军饷。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把全中国所有的武装拿来武装全中国的工农群众,创造出广大的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与千百万的赤卫队与游击队,来举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在苏维埃政权下面,全中国将变成民族革命战争的战斗的国家,也只有在它下面,我们才能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实现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广泛的散布用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名义所发表的各种宣言与传单,经常地把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与实际斗争,提在广大反帝民众的前面,把反帝的苏维埃政府同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

益的国民党政府最分明的对立起来。最普遍的告诉全中国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正在中国内地同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作战着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同时是反帝国主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目前反帝国主义最强有力的与伟大的先锋力量。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与一切国民党的派别，这样一致的把苏维埃与红军看做它们在中国统治的最大危险，这样一致的向着苏维埃与红军进攻！

中央不能不严重指出，在目前这样紧张的形势之下，我们工作的速度如若与目前革命发展的速度比较起来，是非常落后了。不少我们的同志，还是熟睡在长期的秘密工作的床铺上，没有清醒过来，看一看他们所处的环境，振作精神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去深入群众与领导群众。不少我们的同志还是在他们那一个狭隘的秘密工作的圈套内，利用那些陈旧的工作方法“努力”着，而不知道去利用与创造一切新的工作方式，去适应新的革命环境。在新的环境之下，这种“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实在是破产的了。

中央认为各地党部接到中央这一指示之后，必须最严格的具体的检查在最近时期内他们自己的工作，要张大眼睛看一下自从满洲事变发生到现在的五个月内，党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得到了什么具体的成绩，这些，同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比较起来，是否满意。要发展最严厉的自我批评，指出过去工作中不可容许的错误，对于目前反帝形势估计的不足，与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必须用最大的力量，转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到新的轨道上，来适应目前新的环境！

中央责成各地党部，把中央这一指示信拿到各级党部，尤其是支部中去讨论，去教育支部同志，启发支部同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各级党部应该根据中央这一指示信，依照各地的具体情形，定出具体的工作计划，并且要自下而上，实行个人负责制，来保证工作计划的实现。要给那些定出空洞计划，而不去实现的同志，给以

最严厉的组织上的制裁。要把那些对于中央的指示,消极怠工,不愿意想出种种具体办法,转变工作方式以适应目前新的革命形势的“老布尔什维克”,送到历史的革命博物馆中去!

最后,在群众工作的开展中,必须大规模的吸收工人,贫农,兵士与革命的知识分子入党,发展党的组织。不论我们的群众工作发展到哪里,我们必须创造与巩固我们党在那里的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到处建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铁的领导,保障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 央

1932年2月15日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请看!!!

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得到胜利?^①

(1932年2月26日)

这次反日战争胜利的原因,不是蒋光鼐,蔡廷楷(锺)等一些国民党军阀的领导,而是革命士兵的英勇斗争与革命民众的热烈拥护。国民党军阀们的领导作战,不是为了要使这一战争得到澈底的胜利,而是为了要在“抗日”的招牌之下,利用兵士与民众的反日斗争,欺骗革命的士兵与革命的民众,造成马占山那样的“民族英雄”的美名,来侵吞民众的捐款,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使革命战争失去领导而失败。这也就是目前反日战争中最大的危险!

领导目前反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阀,不但不敢侵犯帝国主义的任何特权,而且十二万分的尊重这些特权。他们丝毫不想把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至少是日本的海陆空军驱逐出境,他们丝毫也不想乘胜追击日本的军队到租界上,根本消灭日军在陆地上的根据(地)。他们等待日本军队一师团一师团的送来,枪炮飞机一船一船的装来,让败阵的日本军队整理,补充,安排阵线,再向我们进攻。这不但不是要使战争胜利,而是在牺牲 19 路军士兵,使战争遭到失败!

领导目前反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阀,不但不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大规模的武装工人与劳苦民众,把兵士与民众打成一片,而且

① 1941年12月出版的《六大以来》收入本文时,编者加了《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的标题,并注明“此文件未见得全文,只有后一部分”。这次全文刊印,保留了原标题。

处处压迫民众运动,封闭民众的反日团体,解散工人与学生的义勇军,禁止士兵与民众发生任何密切的关系。他们惧怕民众,仇视民众,反对民众参加民族的革命战争。然而没有千百万民众的参加,这一战争是必然要失败的!

领导目前反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阀,不但不设法改良作战士兵的生活与待遇,把民众的捐款与慰劳品分散给作战士兵与后方的伤兵,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而且直到现在还是克饷不发,侵吞人民的捐款与慰劳品,限制他们言论行动的自由;而使他们觉得他们拼着性命同日本帝国主义者肉搏,只是为了他们长官们的利益,只是为了维持他们往日牛马般的生活,与长官们套在他们身上的旧的锁链。不澈底了解为了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战争的士兵,决不能使他们的英勇长久地继续下去,使战争得到新的胜利!

最后,领导目前反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阀,现在正在血战着的革命士兵与革命民众背后同各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进行着投机的买卖。他们在帝国主义指示之下,早已准备退却,早已答应出卖上海,把上海成为中立区,由列强共管。只是因为惧怕士兵与民众的反对,所以他们还勉强支持着。但是,为得要保存他们自己的实力,去镇压民众的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他们现在是准备着失败。他们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军队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给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让士兵失败之后自动退却。在这些帝国主义便衣队的国民党军阀之下,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完全是幻想。

因此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澈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在民众自己的手里。

因此,我们主张:

(一)19路军士兵立刻不顾一切长官的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坚决反对“退却”“停战”,把上海交给任何帝国主义;

(二)民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压迫,自动启封一切革命团

体,大批的武装工人与一切劳苦群众,组织民众的义勇军与游击队,保护自己的革命组织,并参加前线作战;

(三)革命的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直接接收与分配民众的捐款与慰劳品,监视与逮捕一切不抵抗的长官,并且加入民众的革命组织;

(四)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的革命战争;

(五)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银行,工厂,商店与交通工具,拿来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用途。并且以同样的办法对付帮助日帝国主义的其他帝国主义!

(六)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腾出一切公共房屋给失业工人与灾民居住;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筑交给工人与灾民的组织;它从大资本家大商人大批的征发粮食与衣被,分配给失业工人与灾民;它更没收一切帝国主义走狗与投机资本家的财产;它立刻宣布八小时工作制与社会保险,改良失业工人的生活;它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七)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它把政权交给民众自己的政府。

我们以为只有这些具体办法的实现,我们才能把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拿在我们的手里,而不为国民党的军阀所出卖。也只有这样,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得到澈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32年2月26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及其结果^①

(1932年2月12日)

进攻上海,炮轰南京、吴淞和闸北等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日本人想用武力把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压下去。

在爆发满洲事变之前抵制日货运动虽然时有起伏,但从未中断。不过,这一运动真正广泛开展起来,还是去年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之后的事。

但是应当指出,国民党从一开始就反对实行抵制。南京当局曾数十次发布命令,禁止实行。它们担心运动将超越经济范围,摆脱商会的控制,发展为既反对各国帝国主义者又反对他们的仆从——国民党分子的群众运动,这种担心是不无根据的。

上海的帝国主义报刊要求“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抵制,“不许采取过激行为”。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南京政府在这方面也是唯命是听的。在租界,学生进行宣传,举行集会和发表讲演遭到租界警察的驱赶,在中国人辖区则被国民党警察们驱散。宣传抵制的书刊和宣传画被撕毁。抵制团体的工作人员和纠察队员遭到国民党警察和各国列强当局的逮捕和殴打。

但是抵制运动依然深深地扎下了根。运动遍及了幅员辽阔的中国的整个国土,使那些在中国市场上活动的日本公司及在华的日本工厂的所有商业和工业活动被打乱或陷入瘫痪。群众性的抵

^① 本文系《真理报》记者 Вн·ЖеВ1932年1月写于上海的有关中国国内抵制日货运动的报道。——编者注

制给予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打击，看来比南京的外交活动和国民党军队给予日本的各次“打击”都要沉重得多。

下面我们仅举几例来说明抵制产生的某些结果。但要预先声明，这些材料是以报刊的报道为根据统计的，所以这不是完整的数据。此外，抵制的效果在商业和工业的许多部门都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

※ ※ ※

抵制首先打击了以中国为主要市场的日本纺织工业，日本纺织品输入中国，是日本一笔极大的收入项目。现在所有进口贸易都停滞了。

去年9月从日本输入中国的纺织品总值为462.6万元。10月降为155.5万元。12月输入即告中断。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去年日本输往上海的纺织品数量下降的幅度：

7月	650756担
8月	908128担
9月	680629担
10月	229091担
11月	13130担

（一担约等于二十四码^①）

上海是一个最大的转运点，日本纺织品都由此转发中国各地。1930年仅纺织品一项，转运总值即达5.33024亿日元。1931年，由于三个半月的抵制，转运的纺织品价值仅为1.1743亿日元。

上海的日商纺织厂试图向海南诸岛输出纺织品，但遭到了挫折，因为在当地多数的华人居民都抵制日货。向满洲输出纺织品同样未获成功，因为在满洲和青岛的日本工厂主对此种倾销大为

^① 1码=0.91440米。——原作者注

不满并要求政府帮助他们反对……上海的日本厂主的行为!

尽管如此,上海输往满洲的纺织品和棉纱仍大幅度增加。这从下表即可看出由上海输入满洲的纺织品和棉纱情况:

1930年9月	1002包
1930年10月	679包
1930年11月	272包
1931年9月	1232包
1931年10月	1959包
1931年11月	4660包

在东京和大阪和纺织工厂主都在对东京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上海的工厂主也在逼迫它。

可是目前还有约20万包日本公司所属上海工厂生产的棉织品放着卖不出去。

而抵制还不仅仅在纺织品方面。

在向中国出口化工产品的国家中,日本也占据首位。

1927年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化学产品总输入量的85.9%。1928年——91.2%;1929年——90.2%。1931年尚无准确数字。但初步统计说明,输入量削减了三分之一。在这方面主要是德国占了优势。它在1931年大大增加了对中国的化工产品输入量。

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实行了抵制,中国才成立了几家化工企业。

在抵制的压力下(瑞典火柴的倾向只是部分原因),属于日本在沪公司的一家最大的火柴厂宣告破产。10月份一个月内,日本火柴输入量就减少了10280箱。

在香港、槟榔屿、菲律宾、南海诸岛等地即在太平洋地区华人居民占多数的所有地方,日本火柴的销售量都大幅度下降。这就迫使日本火柴工业将生产的火柴大量投入自己的市场(投入台湾

的火柴增加了九倍，输入朝鲜的火柴增加了二倍），^①并且到处降价，以展开疯狂的竞争，但是生产依然不断下降。

1918年日本输入中国（上海除外）150万吨煤。上海每年需消费370万吨煤，其中44%是由日本公司（用满洲和中国其他煤矿生产的煤）供应的。9月份因估计可能发生抵制活动，从日本运出了200万吨煤炭。10月份起，上海的所有中国工业停止使用日本煤，因此，仅两家日本公司就有60艘运煤船泊在港口无法卸货。10月份运入上海的日本煤仅5万吨。

日本报刊指出，日本煤炭工业在一年期间损失了2600万日元。

与此同时可以看到对国产煤的需求不断增长，中国煤矿的采煤量也随之增加，并从国外（南海诸岛、苏门答腊、爪哇等）运来煤炭。

无论是中国内河的，还是中国各海港之间或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轮船航线都受到了巨大损失。日本轮船公司不愿把“活动场所”让给竞争对手（英、美和中国公司），便保持着原有航次，但大多数轮船都是空船往返。

根据日本船长和海员协会提供的情况，现在闲泊无事可做的日本商船总吨位数达70万吨，在太平洋其他地区为17万吨，另有总排水量为12万吨、原先航行于印度、南海诸岛及日本之间的船只也闲着无事。

“大连汽船公司”21艘轮船（总吨位为7万吨）都停在港内，“日本汽船公司”有17艘轮船闲着。

根据上述协会的材料，“日本汽船公司”、“大阪商船公司”和“日本邮船公司”三家日本公司1931年9月20日到12月4日的

① 当时台湾和朝鲜虽均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占领，但《真理报》将两地列入日本本国市场范围是严重不妥的。——编者注

亏损即达到 1802 万日元。

“大连汽船公司”和“三井物产公司”在同一时期内亏损总数达 3780 万日元。

在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的仓库中存放着价值达 1.5 亿日元的 80 万吨日货,这些货都是从日本运来,由于遭到抵制而找不到销路。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存在日本仓库,尚无法运往中国的数万吨,也许是几十万吨的货物。

单单上海一地的中国商人手头积存,无法销售的日货价值即达 8500 万上海元,因为货物已被抗日团体查封,这些团体不顾南京的命令,严格监视,不让出售日货。中国商人对已经定购的价值达 7500 万上海元的日本货还没有接收。

27 万余桶沙糖积压在上海仓库中,找不到买主。

海产品(鱼、海参、蟹、海生植物等)的输入减少了 1000 万上海元,估计有 450 万上海元的货物烂在仓库中。

日本每月输往中国的针价值达 60 万美元。9 月份输入总值下降为 40 万美元。10 月份只有 2 万美元的,而 11 月份完全停止了输入。

木材、橡胶、纸张、电料、大米、小麦的输入完全停止。上海仓库中积压的日本纸张价值 250 万美元。日商指望(而且不无根据),国民党的报刊和国民党的出版机构会要这些纸张的。

上海 150 家中小型日本工业企业中有 90% 已停产。现在一些大厂家也陆续倒闭。天津和汉口的日本工业企业情况也大致如此。汉口最大的一家日本纺织厂“达安”厂已经关闭。

在长江上游(成都、重庆、万县等城市),大多数日商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商业企业,回老家去,因为中国居民不仅不买他们的东西,而且连食品也不再向他们出售。湖北和湖南两省及九江、芜湖、大冶、安庆和南京等市的所有日商都已停业。

到 11 月份前为止,中国各城市(上海除外)停业的日商总数达

800家。12月汕头、广州、福州、温州、苏州及一系列较小城市的日商也歇了业。

整个日中贸易一落千丈，其情况可见下表官方统计数字：

地 区	1930年		1931年		缩减百分比	
	输出	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出	输入
	(万日元)					
满 洲	12200	16700	9400	12100	22	27
华 北	7900	5200	4900	4800	-37	-7
华 中	14700	6500	8200	5000	-44	-23
华 南	5700	—	3700	—	-35	—
共 计	40500	28400	26200	21900	-35	23

就单项商品统计，日中贸易缩减情况如下：

输 入 中 国

	1930年	1931年
棉布	11435.3万日元	5506.4万日元
砂糖	2527.2万日元	1237.5万日元
纸张	2325.8万日元	1503.9万日元
海水产品	1299.2万日元	506.1万日元
煤	1640.2万日元	874.8万日元
机器	1056万日元	837.4万日元
铁	757.3万日元	460.9万日元
棉纱	567.9万日元	92.3万日元
纺织品	538.9万日元	290.1万日元
陶制器皿	306.4万日元	111.9万日元

从 中 国 输 出

运出	1930 年	1931 年
大豆	价值为 4799.7 万日元	2653.5 万日元
豆类	6515.4 万日元	3757.2 万日元
煤	2661 万日元	1593.6 万日元
皮棉	2198.5 万日元	1164.1 万日元
糠	1089.3 万日元	607.2 万日元
矿石	845 万日元	367.2 万日元
生铁	741 万日元	516.2 万日元

无论在中国内地和满洲,还是在太平洋流域各国,抵制运动使日本资本主义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见所引表列数字)。抵制活动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规模和力量当然不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而是因为几百万中国群众不顾国民党的禁令,不顾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开展了抵制活动。

抵制对日本资产阶级的打击之所以特别沉重,还在于其他列强,首先是德国、英国和美国都想利用这次抵制把日本从它在中国,特别是在长江流域、华南和华中一些省份夺得的阵地上排挤出去。日本则企图以逐步对这些国家关闭满洲市场进行报复。

这样一来,抵制正导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互相竞争和对市场的争夺加剧,促进日本工业界从事冒险,以便在中国建立起和平的秩序并“停止抵制活动”。

对中国的武装进犯使日本资本主义陷入困境。目前它企图用烧杀手段为自己的产品打开通往中国的道路。但是闸北的废墟未必会“促进”日中贸易。

(严邦晞译,马宝华校)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上海事变的教训与中国共产党

(1932年10月)

米 夫

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及其邻近地区发动军事进攻，是武装占领满洲，瓜分中国，使中国完全处于殖民奴役地位的整个政策的继续。具有重大意义的上海事件的爆发，是日本帝国主义挑起这一新的强盗战争行动的结果。国际帝国主义的矛盾，首先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也大大加剧。另一方面，在强大的反帝斗争高潮中爆发了英勇的上海保卫战，它严重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近期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的目的究竟何在？无疑，日本统治集团为了实现“大日本”计划和建立“大东亚帝国”的计划，竭力要在占领满洲之后进取华中。因此，他们必然垂涎上海地区——半殖民地中国的这块最鲜美的肥肉。日本帝国主义打算在闸北和吴淞的废墟上建立大片日本租界。这将会巩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地位，日本的地主资本家就可进而牢牢控制这个国家的经济最发达和最重要的地区。在军事战略方面，在闸北和吴淞建立日本租界，将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取得优势打通道路，从而超过与它角逐的其他帝国主义列强。

控制上海对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非常重要，还因为可以将华中各省的军阀集团和地主资产阶级政府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在进攻上海的同时，力图给这里的抗日运动以毁灭性打击，力图把它镇压下去，因为无产阶级最集中的上海是革命斗争

强大的策源地,是这个运动的中心。其次,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把军事行动引向上海地区来转移人们对满洲的注意,从而赢得时间来巩固他们在满洲的占领制度。同时,他们打算用新的占领行动和新的胜利煽起日本国内的沙文主义狂热,扼杀和镇压正在兴起的日本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反战运动。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做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苏联和“围剿”中国苏维埃的必要前提步骤。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的主要动机。

日本军人集团预料在上海不会发生多么严重的军事冲突。日本侵略者认为国民党头目们一贯投降国际帝国主义,只要玩弄一下军事游戏就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算盘打对了没有?日本帝国主义是否实现了与进攻上海有关的种种计划?计划远未实现。这已是上海事件最为重大的结果之一。

日本帝国主义者原打算通过在上海的军事行动来加强自己在国际帝国主义角逐中的地位。但实际上,上海战役结果使日本国际地位大为削弱。日本的这一行动把整个太平洋问题连同瓜分中国的问题一起极其尖锐地提到了日程上,更进一步促使正在追求帝国主义目标的美国起来反对日本,从而有利于英帝国主义的政策。刚好这个时候美国外交人士,尤其是史汀生致参议员波拉的著名信件,明确表态不承认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任何占领权。继而,决定全部美国舰队部署在太平洋沿岸,采取了导致日本黄金外流和进一步扰乱日本财政和整个经济生活的一系列措施。英国,过去出于反苏动机和报复美国,实际上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满洲。而现在,为维护其基本的远东政策,终究不能坐视日本染指华中,因为英国资本最主要的投资与这一地区密切相关。英国出面在日中之间斡旋,并急切利用当前的局势,再次申明自己对中国这块肥肉的要求,抑制一下日本的贪欲,而日本的欲望是同英帝国主义者的意愿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一切也在已签订的上海协议中

得到了反映。日本帝国主义者未能保住已占领了的上海地区。他们不得不暂时放弃在这个全国最重要的繁华中心城市建立租界的想法。他们不得不俯就上海中立计划,以支持英帝国主义者由来已久和坚持不已的图谋。

日本帝国主义者原以为,对上海的快速袭击可使他们对满洲的占领合法化并为武装入侵苏联和中国苏区扫清道路。事实上,英勇的上海保卫战迫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推迟了他们的侵略计划。上海的中国工人、士兵和学生的抵抗把日军阻挡在上海地区两个多月。他们的抵抗促进了反帝斗争的强大高涨。这种抵抗所表现出来的争取解放的斗争热忱鼓舞了满洲的劳动群众。成为满洲开展大规模游击运动的先声。日本帝国主义者“安抚”满洲未能得逞。相反,由于上海事件,日本占领军在满洲的处境极端困难。上海保卫战使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武力威风扫地。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非但没有停息,反而更加扩大了规模和影响。日军内部人心动荡。日本政界不断分化改组,统治者阵营中内讧不已。这就是进攻上海后可带来的实际而又远不能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感到快慰的难忘后果。

诚然,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叛卖行为,中国的工人和士兵未能守住上海。经过两个月的战斗,胜和只给日本帝国主义者带来了些许欢欣,但由于上述后果,又使他们十分沮丧。中国工人和士兵奋不顾身的顽强战斗虽未取得胜利,但却打乱了日本侵略者的近期计划。

但是,上海事件的意义不仅于此。在这次事件过程中,国民党的威信和影响受到了空前的沉重打击。由于日本的侵略,这就向广大群众空前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行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统治集团随之进一步分裂。在这之前,国民党政府就已把国家弄到极端贫困和经济崩溃的地步,把千百万工农群众置于空前悲惨的破产境地和骇人听闻的饥饿之中。而

现在,当国家面临着直接威胁的严重关头,国民党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暴露出它的无能和不愿捍卫民族独立。它真不愧是“国耻政府”和“汉奸政府”。

我们并不想因此而忽视国民党头目们借以掩盖其卖国投降所采取的某些策略。这里必须注意两个情况。第一,美国敌视日本,美国资本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去抵抗日本的侵略;第二,必须考虑到中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压抑大规模的解放运动,避免斗争激化,尤其是避免与日本开战,中国资产阶级中有相当多的人倾向美国,并不支持和利用抵制日货运动。这两种情况使得国民党在策略上留有余地,对于国民党来说,抗日运动的规模越大,革命性越强,就越需要施展策略。一方面是受美国驱使,另一方面是力图遏止抗日运动、特别是要稳住所属部队的军心,国民党企图把自己装扮成维护中国和主持上海保卫战的角色。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企图不无成功之处,在某些地区,国民党和国家改良主义的政客们借助于貌似反对派的蛊惑宣传控制了抗日运动,特别是控制了城市小资产阶级。但此时国民党头目们的所做所为都是为了输掉这场同日本人的战争,拱手交出上海。他们没有阻挡不断调来的日本援兵和在浏河登陆的陆战队,同时又不考虑增援正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数不多的部队。国民党军事当局不是把有生力量和军事装备集中在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地区,而是继续在中苏边界地区集结兵力。他们甚至根本不考虑如何利用有利的战局和在战斗中多次出现的全歼日军的良好时机。更有甚者,国民党军事当局仍继续镇压抗日群众运动,解除工人和学生义勇军的武装,并且一直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幕后谈判,以至于又从背后开枪相威胁,逼迫保卫上海的士兵和工人撤退。

国民党军事当局终于使上海地区的部队俯首听命。因而控制了保卫上海的领导权。但千百万群众对于卖国政府的行径是记忆犹新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迅速转向革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开始

更快地摆脱国民党的影响而投身于反帝革命运动。强大的反帝斗争高潮能否进一步发展是与能否吸收广大劳动群众参加这个运动,能否消除国家改良主义的幻想和国民党的影响直接有关的。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是反帝斗争的主要动力。中国工人阶级以声势浩大的反帝行动来回击日本占领满洲。沈阳工人和鞍山矿工举行了总罢工,9月26日,10月10日和12月12日上海几千名工人示威游行,中国无产阶级还进行了一系列其他活动。这一切使中国无产阶级成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反帝斗争核心。在中国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直接影响下,学生运动和城市贫民运动蓬勃兴起,并走上革命道路,鼓舞了19路军将士们的战斗意志。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事变期间开展了紧张的工作,提出了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其它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完整和统一,要赢得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后一胜利就必须推翻国民党等口号,来动员人民群众。共产党用口头和报刊宣传形式号召劳动群众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斗争,组织反帝大罢工,领导抵制日货运动,建立义勇军,使抗日同盟具有群众性,组织群众的街头示威游行,成功地领导学生运动,与士兵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并不断影响他们。在苏区,共产党把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口号下,因而保证红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这些胜利的意义特别重大。

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把国统区的反帝运动全面领导起来,也没能取得上海保卫战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由于本身的许多弱点,没能解决其主要任务,即领导国统区中各城市的工人运动、反帝群众斗争和动员农民群众的工作并同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劳动人民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日本入侵和上海发生战争之际,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各大工业中心的工作,较之以往更令人痛感薄弱。只是因为有一些无产阶级的坚强骨干和有组织的广大工人群众,才保证群众性反帝运动的胜利开展。但是一方面,由于国民党血腥的

白色恐怖,另一方面,由于李立三的和和其他错误的观点过去在党内广为流传,共产党在决战的关键时刻缺少同上海广大工人群众必要的联系渠道。过去轻视工会工作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充分显示出来了。只有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运动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反帝运动的领导权,才能把城市贫民和士兵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把一切反帝力量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才能推翻国民党军事当局,由共产党掌握上海保卫战的领导权。因为没有通过工会与广大工人群众取得充分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就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中国当前的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最短时间内克服上述缺点。党在政治上的影响不断增长,还必须相应地在组织上加以巩固。共产党应当充分利用极其有利的客观条件。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当时对中国的革命危机作出估计,指出“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为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地区组织了苏维埃和红军,因而使中国处于殖民地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首位。”^①这次会议已经过去一年了。在这期间中国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变,这一事变使中国革命危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红军取得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的高涨,使中国出现了革命形势,这个形势向共产党提出了重要任务。

共产党应当在民族革命战争和推翻国民党的口号下进一步动员起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党应当不断地、系统地用具体事实去揭露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尤其应当注意揭露那些貌似反对派的国家改良主义政客们的伎俩。只有彻底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开展有条不紊的工作把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争取到自己一边,共产党才能在国统区发展广泛的群众性反帝组织,工会组织和农民的组织,并领导他们进行斗争。共产党应当坚决果断地改进工作组织,使之适应业已发展起来的群众性的斗争。共产党应当真正实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143页。——原编者注

现关于工会运动特别是加强对企业的工作问题、关于将红色工会变成真正的群众性团体的问题、关于组织和领导罢工斗争,争取国民党黄色工会中的工人等问题的决议。

此外,中国目前的局势还要求共产党尽最大努力做好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工作,把士兵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共产党应大力加强对失业工人和饥民的工作,把他们争取吃饭、穿衣、住房的斗争同开展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共产党应当比过去更加注意加强对学生运动和城市贫民运动的领导。在国统区,尤其是在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作斗争的地区,首先是满洲,共产党应当全力以赴发展反帝群众运动,确保党对这一运动的领导。

在国统区进行这些工作时,应当同广泛宣传苏区取得的成就结合起来,应当同进一步发展、巩固和联合各个苏区,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的队伍并在党内进行毫不妥协的两条战线斗争结合起来。

所有这些任务能否完成,是中国革命取得进一步胜利的关键。

译自《中国问题》,1932年
第10期,第3—8页。
彭宏伟译 郑禄校

(录自《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 全会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论中国

(1932年9月)

一、资本主义稳定底完结和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资本主义底相对稳定已经完结了。但是，在最重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没有直接的革命形势。目前这个时机，正是过渡到各阶级间和各国间巨大冲突底新周期去的过渡关头，正是过渡到革命与战争底新周期去的过渡关头。

(摘自《关于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的提纲》)

国际关系中的相对稳定时期已经完结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法国完全和公开帮助之下，以及在英国暗中帮助之下，已经实行武力侵犯中国，这个武力侵犯，是帝国主义新战争底开端。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底结果，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已经更加剧烈起来，这个剧烈斗争底表现，就是帝国主义制度底一切矛盾，都更加紧张。帝国主义营垒内的主要矛盾(英美矛盾)日益加强，美日冲突愈趋紧张，在凡尔赛制度底周围，德法斗争异常尖锐，波德关于但泽问题，关于东普鲁士问题的斗争非常加紧，意法帝国主义的斗争日形剧烈，因这一切事实而发生帝国主义列强力量底重新配合，——所有这些，将引起新军事冲突底爆发。国际联盟对于日本进攻中国所采取的态度，又一次地显然证明了：国际联盟是英法帝国主义用来进行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工具。美国之所以反对日本占领东三省，是为要达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公平地”在远东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日内瓦会议、洛桑会议、鄂大瓦会议，并不能消灭帝国主义者中间

的矛盾。

……

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帮助之下,已经把东三省变成进攻苏联的根据地。

(摘自《关于远东战争和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的任务问题决议案》)

日本占领东三省和进攻上海,已经把美日英以前关于规定在华势力范围的协定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与法国勾结和得到英国实际帮助之下,把东三省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把武装瓜分中国和武装干涉苏联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面。国际联盟根据法英底意旨,拥护日本帝国主义。美国抱着自己在远东的帝国主义目的,公开拿拼命扩充军备来威胁对方。太平洋矛盾底总和,便是新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底主要来源。

(摘自《关于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的提纲》)

二、革命高潮底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底当前任务

自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以来,革命高潮底增长,特别表现在以下各国:

在中国,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日益高涨,苏维埃运动,日益扩大,英勇工农红军,获得伟大成绩。

……………

……在中国,已经有革命形势,而在很大一部分领土内,苏维埃革命已经获得胜利。

(摘自《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的提纲》)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热烈欢迎日本共产党为反对日

本地主资产阶级所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热烈欢迎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而进行的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今后也一定应该竭力保证无产阶级在白区民众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执行下述各项任务：更加扩大和加深苏维埃运动，巩固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将苏维埃运动与白区群众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广泛地和一贯地在群众反帝斗争中，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群众，口号就是：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以便争得中国底独立、统一和完整。

（摘自《关于远东战争和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的任务问题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有以下的特殊任务：

（一）在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底独立和统一；（二）发展和统一苏维埃区域，巩固红军；（三）进行斗争来推翻国民党政权；（四）坚决地实行把赤色工会变为群众组织和夺取国民党工会里的工人群众；（五）扩展游击运动，在东三省提出以下的口号：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捐税和政府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者走狗底财产，组织选举的人民政权；（六）普遍宣传苏维埃区域底成绩和中国工农与苏联工农亲密联合的口号。

（摘自《关于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的提纲》）

三、中国无产阶级底经济斗争

在无产阶级经济斗争方面，革命高潮增长底表现就是：群众的罢工运动发展起来（西班牙、中国、波兰、捷克斯拉夫、日本、法国、

比利时、保加利亚、英国、印度、美国等等),经济危机发展得最迟的国家内,无产阶级底**新队伍**也加入经济斗争(在比利时,有波里那时矿工罢工;在荷兰,有特维特纺织工人罢工;在瑞典,有阿大连制纸工人罢工;在瑞士,有苏黎支电气工人罢工),不大的经济运动**迅速地**变为广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布力克士、波里那时等等地方),在罢工斗争和失业工人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和革命职工运动**底比重**增加,新的工人积极分子发现出来,他们违抗和违反改良派职工官僚底意旨,英勇地作反对资本家进攻的斗争……

革命高潮底增长,改良派工会危机底成熟,以及日益逼近的伟大革命战斗,正在造成一切前提,以便认真地改善赤色工会底群众工作,以便巩固它们在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经济斗争中的作用。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指出,虽然赤色工会已经获得许多重大的成绩(在捷克斯拉夫、波兰、西班牙、日本),可是大多数赤色工会,还是没有善于利用群众因为反对资本家的进攻而表现出来的愤怒底增长和阶级斗争底加剧,来领导罢工斗争和失业工人运动……

在中国,虽然革命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可是赤色工会底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组织者和领导者作用,却曾经减弱过,只是在最近时期内,才重新提高起来……

自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以来,有些大罢工运动底经验(如在布力克士、在波里那时,如瓦萨电车工人罢工,上海电话工人罢工,东京地道电车工人罢工,特维特纺织工人罢工等等)表示出:共产党和革命工会,在领导无产阶级底经济斗争方面,已经获得成绩,而这些成绩之所以获得,是因为党和革命工会在一切斗争阶段上,都**一贯地**采用了下层统一战线底策略,及时提出了为群众所感觉迫切的、**为群众所了解**的要求和口号,在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基础上组织了他们,吸收了一切斗争工人参加领导罢工,坚决地揭露了改良派职工官僚底手腕,揭露了一部分人对他们所采取的轻信的和调和态度。

在具有群众法西斯蒂工会或类似的反动群众团体的国家内(意大利、中国),特别是在法西斯蒂工会占垄断地位的地方,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地和有组织地在它们内部工作,利用一切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机会,去吸收这些团体底会员群众参加阶级斗争,[去]在群众面前破坏这些团体底威信,巩固革命职工运动在群众里的势力。

(摘自《关于经济罢工和失业工人斗争教训的决议案》)

四、中国与共产国际底各分部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承认,各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准备武装干涉这件事当中,的确是已经获得许多很好的成绩,可是,全会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没有善于用革命行动,来妨碍向中国运输军队和向日本运输军火;没有善于唤起军事企业和运输业中的广大工人群众起来斗争;群众运动扩展得迟慢,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同志对于远东战争抱着机会主义的忽略观点,同时也是因为有同志对于战争问题抱着“左”倾定命主义的轻浮态度。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指出:各国共产党,没有善于解决以下的迫切任务:在企业内、铁路上、商埠中、轮船上建立依靠着群众的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的监督委员会以及秘密的行动委员会;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基础上,来动员那些加入改良派工会和其他工人群众组织中的广大工人群众,以便阻碍向中国运输军队和向日本运输军火;在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扩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的鼓动。对于那种轻视日本反对中国的战争的机会主义轻视态度,对于那种轻视帝国主义战争与武装干涉危险的机会主义观点,对于那种不了解现时暗中爬

进新世界大战形势底一切特点的机会主义态度,对于那种离开列宁主义关于战争学说的个别和平主义倾向,对于那种消极对待战争问题的机会主义消极态度,对于那种认为革命自然会从战争里面自动发生出来的定命论的机会主义心理,都未给以充分的布尔塞维主义的回击。

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它们用各不相同的方法来帮助帝国主义者准备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及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底共同任务,有下述各项:

……积极回答反苏联运动底一切表现,加紧在广大群众中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底成绩,动员劳动群众反对白俄党人,普遍宣传苏联底和平政策,动员群众积极保护苏联、中国和中国苏维埃革命。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认为,各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领导工农以及全体劳动者底斗争,来保护中国和中国革命,来保护各国工人底祖国——苏联,去反对日益逼近的武装干涉,保护资本主义各国底劳动者不致受到帝国主义新战争底危害。

(摘自《关于远东战争和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的任务问题决议案》)

五、中国与第二国际底各政党

第二国际及其各政党底领袖们,在远东战争时期内,随着本国资产阶级底要求而再三改变自己的策略。在日本反对中国战争开始时,他们号召工人拥护国际联盟,而说国际联盟和凯洛格公约是和平底武器。当时,他们拥护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底政策,只批评别国帝国主义政府,宣布日本之侵犯中国,只是无关于欧美工人阶级利益的远方的殖民地的战争,劝导工人们向国际联盟及本国政府请愿,说这就是反对战争的斗争方法。他们或者完全不提到武装

干涉苏联的危险，或者直接欺骗群众，说苏联并没有什么被他人武装干涉的危险。而同时第二国际底各政党，还努力加强反苏联的造谣中伤运动，企图削弱苏联和平政策对于劳动群众的影响，拼命帮助各帝国主义政府掩饰得不很高明的侵略政策，以及反对苏联所提出的完全裁军的提案。改良派工会对反对军事生产和反对给日本运输军火的斗争，曾实行怠工，反而说战争会消灭失业现象。与第二国际及黄色工会国际有联系的日本社会民主党，完全拥护了日本资产阶级底强盗战争，而认为这个战争是进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日本社会民主党底这种立场，便可以明白证明：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在发生新帝国主义战争时，将会采取如何的立场。

以后，在群众压力之下，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苏黎支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在表面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主张保护苏联，而由主张武装干涉和拥护对苏联作反革命发动的立场，转变到表面上中立和口头上保护苏联的立场。可是在事实上，第二国际底各政党，仍旧继续着反苏联的造谣中伤运动，援助俄国孟塞维克武装干涉者，对工人反对军事生产和反对给日本运输军火的一切具体的行动，都实行怠工，继续散布和平主义的幻想，希图使群众离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实际斗争，抵制在亚姆斯坦举行的反战代表大会，参加准备和组织帝国主义战争与武装干涉，而在每一个国家内拥护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

（节录《关于远东战争和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的任务问题决议案》）

根据 1944 年 7 月出版的《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论中国》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 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

(1932年9月2日晨)

王 明

正如从我们关于国际形势的总提纲中[所知道的]一样,我们从库西宁同志的报告中清楚地知道,目前我们正经历着一个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刻,一个向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转变的时刻。当前,包括中国革命问题在内的整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革命运动的问题,应该在我们的全会面前更加认真和更加尖锐地提出来。对于我们来说毫无疑问的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在革命与战争的第二阶段将发挥和已经在发挥比革命与战争的第一阶段更加巨大的作用。譬如让我们看一看中国革命的例子。如果说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正在向革命与战争的第二阶段转变,那我们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已经在进行革命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斗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左右。苏维埃革命已经在相当大的中国领土上取得了胜利。中国是个在广大范围内与苏联直接接壤的国家。中国是一切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的半殖民地国家和太平洋问题的核心。中国是其革命运动在整个殖民地世界居首位的国家。因此,中国**目前已经成为革命与战争链条上的主要环节之一并非偶然**。

当前,中国革命的世界性历史意义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已经十分清楚了。如果没有苏维埃革命在大部分中国领土上的胜利,如

果没有满洲群众的抗日游击战争，如果没有上海的抗日的武装抗战，那么以日本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大概在今年春天就早已从东方开始反苏战争了。

因此，中国革命的问题特别在当前对于我们，对于整个共产国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在这次全会上对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作出某些基本总结，说明其成绩与缺点、成功与错误，正确规定它在目前的任务和说明其最近的前途——这不仅对于我们党，而且对于整个共产国际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从第十一次全会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五个月。这一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在中国发生了满洲事变和上海抗战。帝国主义战争在那里已经持续了一年左右，帝国主义者正在那里加紧准备反苏战争和帝国主义大屠杀；但是关于这一点，根据议事日程中专门提出关于反对战争和武装干涉的斗争问题的第三项，我们将要特别谈到。因此，我现在不打算谈这一点。首先我想提出关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经验教训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国内部也进行着以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其它类似走狗的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为一方，和以苏维埃形式下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为另一方的两种体制之间的斗争。这一时期在这两种体制之间的斗争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都记得，在第十一次全会期间，国民党开始组织了对我们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因此召开了所谓的民族立宪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决议、劳动法和关于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独立自主宣言，等等。蒋介石杀气腾腾地表示，如果他在三个月内不能消灭中国的赤色危险，那么他就自杀。而事实上结果究竟如何呢？

一、国民党的进一步崩溃和苏维埃与红军的巨大胜利

这一时期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

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完全破产,而不是经济建设。在中国的十个主要省份里,由于水灾,有 8000 万劳动者挨饿。我们看到的不是中国独立于帝国主义,而是以日本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进一步进攻和侵略已经达到了公开武装瓜分中国的地步。我们看到的是南京、广州和满洲的军阀与官僚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公开投降与叛变,从而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和其它军阀的卖国辱国政府的真面目。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和贫困化,而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状况的改善。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苏维埃革命在中国六分之一国土上的巨大胜利,而不是中国赤色危险的被消灭。

我们的红军在第十一次全会期间总共大约只有十个军,这些军的战斗力不足,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许多弱点。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首先,在数量方面我们已经拥有编制在 5 个军团里的 26 个军。此外,我们还有 15 个独立营的地方卫戍部队和群众性的军事组织(赤卫军、青年近卫军和游击队,等等)。我们现在还有装备精良的国家政治保安局部队。(掌声)在李立三路线期间,所有这些武装组织,或者是被消灭了,或者是还没有组建。

在质量方面,我们比去年有了很大的改善。例如,大约在一年半以前,我们红军的指挥人员当中还有异己分子,而工人占的比例很小;现在的情况大大改善了:在我们红军的主力第一和第三军中,无产阶级的比例达到了 30%。红军基本上是由那些真正从土地革命中受益的农民组成的。

红军中的政治教育工作也得到了改善。例如,政工人员在最近一年半中基本上是由工人、雇农和贫民组成的。这些工人是由上海、香港等地委派,以及从各地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提拔上来的。在我们的所有苏区都建立了军政学校。例如,仅仅在一个中央苏区,中央军事学校在今年就培养出了 1000 名红军的军事指挥人员。

这一时期，我们在领土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第一，我们的根据地扩大了几倍（从60—70个县扩大到了180—190个县）。第二，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城市都统统掌握在白军手里，而现在，我们的红军虽然还未占领中国一些最重要的城市，但是，它在江西、福建和河南等省已经占领了许多比较重要的城市。第三，我们的苏区以前被分割为小块，而现在我们的主要苏区连成了两大片：1. 赣南和闽西与粤北和湘鄂赣边区合并为中央苏区；2. 湘鄂西区现在和鄂豫皖区合并。

除了这两个大苏区外，我们还有八个单独的、比较小的苏区。

在军事技术方面，我们红军仍然比国民党军队弱，但除了空军部队和重炮即炮兵部队外，我们红军都达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水平。

我们在第十一次全会期间还没有中央苏维埃政府。当时，我们只有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机关。去年年底，我们中央苏区在庆祝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的时候，召开了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形成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政府的机构如下：政府由人民委员会领导，下设内务、外交、农业、劳动、工商、教育、财政、军事、工农检察院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等10个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10个委员会的83名委员中，大部分都是工人和农民。从党籍来看，大部分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他人是具有革命威信的工人和农民。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是毛泽东同志。

此外，在中央苏维埃政府形成之后，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机关有些地方实行了重新选举，有些地方实行了改组。选举是按照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规定的原则进行的。工人在选举中享有一定的特权。例如从200—500—1000名农民中可以选举一名苏维埃代表，而工人从20、50或者100名工人中就可以选举一名代表。这明显地说明了工人阶级在苏维埃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我们苏维埃全体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在这一时期大大地提高了。例如,我们湘鄂西区的省政府领导了建设防洪大坝的巨大工程。我们鄂豫皖区的省政府很好地进行了春播、夏收和秋播等一系列运动。通过这些运动,它在解决这个区的粮食问题上取得了许多成绩,那里建立了许多合作组织,召开了各合作组织全体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及召开了初级小学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等等。目前,在我们的所有苏区实行着布尔什维克动员群众的方法,例如革命竞赛和革命突击运动。另外,还建立了青年监督队,等等。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我们的苏维埃政权真正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和一切劳动群众的政权。

在我们的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中国两种体制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化了。让我们举几个明显的例子,说明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和国民党统治之间的主要区别在哪里。第一个例子:国民党在水灾期间非但不去援助挨饿的工农,反而用机枪扫射他们,并建起专用木棚,监禁挨饿的农民,让他们在那里饿死。

而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的苏维埃政府千方百计地努力向苏区内的饥民提供大米、谷物和衣服,此外,它还用武力帮助了苏区以外挨饿的农民,使他们能够在武汉等一些大城市从富人那里得到大米和衣服。

第二个例子:众所周知,国民党在上海抗战期间背叛了上海抗战。国民党在南京、上海、广州和北平等地因学生和工人参加反帝游行和罢工而对他们进行了枪杀。

而我们的苏维埃政府在这一时期做了什么呢?

苏维埃政府发表了向19路军士兵、上海工人和全中国人民的特别呼吁书,呼吁书中说中华苏维埃政府为了中国的解放,为了恢复其独立和保卫其完整,准备全力进行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们的斗争。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它在

道义和物质上开展了一个广泛的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和对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 19 路军士兵的运动。仅我们一个中央苏区就为日本企业中的罢工工人建筑食堂，给上海寄去了一万元。

在我们中国的苏区，帝国主义者的财产被没收了。帝国主义者的一切特权都被取消了。而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帝国主义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真正主人。

第三个例子：国民党逮捕了和正在逮捕一切外国的革命者（印度人、印度支那人、朝鲜人和菲律宾人，等等），并把他们交给帝国主义者处死。而我们苏维埃政府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基础上公开为保护和挽救全世界革命者的生命而斗争。例如，它在两个月之前发表了告南京政府书（并且向全世界进行了广播），通知它说苏维埃政府准备释放被它逮捕的帝国主义走狗，例如外国传教士，以换取国民党释放鲁埃格（音译——译者）及其妻子。

第四个例子：一个半月以前，国民党逮捕了在上海参加江苏全省反帝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93 人），并仅仅因为他们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而通过军事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判。而在几天以前的 1932 年 8 月 27 日，我们苏维埃政府专门拍了电报，向阿姆斯特丹反战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革命敬礼，并且公开声明，说它准备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保卫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据地苏联而全力进行斗争。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在我们苏维埃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之间有着多么深刻和根本的区别。这些事实说明，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使中国的劳动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摆脱中国的资本家与地主的压迫。这些事实说明“只有苏维埃能够把中国从最终的贫困化和崩溃中拯救出来”（斯大林）。

此外，我们最近在组织苏区的工农群众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

绩。例如在李立三路线时期的苏区,或者根本不存在群众组织,或者是它们被消灭了。赤色工会组织仅仅存在于个别的地区。贫民团体未曾建立,反帝同盟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等群众组织根本不存在。

最近,我们在苏区建立了群众性的工会。我们建立了自主的雇农协会。我们建立了贫民团体。我们还建立了群众性的反帝组织、苏联之友协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等等。例如在一个比较小的赣东北苏区,反帝同盟的人数在今年年初就已经达到了16万人。目前,反帝同盟在我们苏区已经变成了广泛的群众组织。在湘鄂西区的每个村庄里都建立了苏联之友协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

在青年和妇女组织方面也是如此。共青团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青年近卫军和少先队组织目前都已经成了广泛的群众组织。劳动妇女在苏区具有平等的权利,从中世纪的奴役下获得了自己的解放。妇女和青年在反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了自己特殊的英雄主义。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第十一次全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去年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任务的决议,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决议和指示基本上得到了执行。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在中国苏区的任务的决议中说,中共的任务是在牢牢掌握根据地和进一步扩大它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工农红军、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巩固苏维埃政权、组织工农群众和把农民的土地运动提高到反帝革命的水平。我们党在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列宁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在实践上向全世界指出和证明了一条真理,即苏维埃制度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完全可行,从而用亲身的实际经验证明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并以实际经验丰富了这一理论。

但我们是怎样取得这些成绩的呢？这些成绩是我们同我们的阶级敌人在苏区和白区进行激烈的、阶级间的浴血奋战的结果。众所周知，国民党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对我们苏区进行了四次“围剿”。第三次大“围剿”的失败完全证明了国民党在同红军的斗争中无能为力。在这方面，占领满洲意味着帝国主义者被迫从暗中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形式转向了公开进行武装干涉的形式。日本战略恰恰在于通过满洲和上海，与英国、美国和法国帝国主义一起破坏华中和华南的苏维埃革命。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企图未能得逞。中国工农以英勇的上海抗战、满洲的群众游击战争和苏维埃运动及共产党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回击了日本强盗。（掌声）

国民党在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组织了第四次“围剿”，派了大约 65 个师反对我们的红军。这次“围剿”恰恰是在日本和国民党于上海签订所谓和约的时候发生的。和约中有一项谈到日本将其军队主力从上海调往满洲，以便最终战胜满洲的游击运动和加紧其进攻苏联的军事准备工作，而国民党动员其所有的军队，以便组织对我们红军、苏维埃和华中及华南广大群众的反帝运动进行第四次“围剿”。

但是其结果又如何呢？结果恰恰和国民党与帝国主义所希望的相反。在上海抗战以后，满洲的游击运动开始吸引广大的群众参加，而国民党在苏区第四次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国民党目前正在组织对我们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据外国和中国报纸的报道，国民党为此动员了大约 90 个师的兵力。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帝国主义者为了同红军的斗争，最近向国民党运送了若干船武器。此外，不久前在庐山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所有著名活动家，如汪精卫、蒋介石，等等，而且还有其它反革命政党的领袖，例如类似一种中国法西斯党的中国青年党的领袖。参加会议的还有以政治和军事顾问为代表

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所有与会者一致通过了新的“围剿”红军的所谓曾国藩计划,即大约一百年前,清朝为镇压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而通过的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为了把共产党员斩尽杀绝,除了正规军和政府在各地的部队外,应该建立以劣绅和土豪为首的地方“剿共”义勇队。第二,在这一计划的基础上,国民党可以在反对红军的斗争中公开请求帝国主义者的军事援助。一百年前,英国将领戈登同法国军阀一起,公开用武力帮助曾国藩战胜了太平天国革命。于是,中国的统治阶级把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将领形容为中国人民的救星,形容为中国文化的救星,等等。国民党目前恰恰也在企图进行一个争取曾国藩计划的运动,用以证明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同样都是必要的。不准备好“思想基础”和所谓的社会舆论,帝国主义者在目前的国际和中国国内环境下就难于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现在,我们的苏维埃和红军正是在为了战胜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而斗争。武汉现在事实上已被我们的红军三面包围。红军驻扎在离武汉大约40—60公里的地方。不久前参加过上海抗战,现在驻扎在离武汉市不远的武汉——长沙铁路上的国民党第88师不仅拒绝反对红军,甚而公开转向了红军方面。(掌声)

此外,国民党的第30和31师也转向了我们方面。国民党第13军最近同我们红军达成了妥协,并拒绝反对红军。

近年来,军阀的雇佣军往往是整师、整旅,甚至是整军地转向红军和满洲的抗日游击队方面。

这些事实明显地证明,由于国内反帝和土地革命的不断发展,开始了一个军阀制度迅速腐败堕落和雇佣军士兵革命化的过程。这是反革命受到削弱和革命得到加强的主要事实之一。这种情况使我们党有义务更大地加强其争取士兵群众转向革命方面的工作。中国革命目前正在逐渐接近帝国主义者必然公开对它采取武

装干涉的关头。不久前，在汉口的英国商会代表公开表示，汉口实际上已变为共产主义浪潮已经向它接近的岛屿，而如果南京政府无力对付红军，那么“我们驻在长江地区的海军应该迅速采取行动，以便防止红军进攻武汉的危险”。

目前，仅仅在武汉一地就集结了大约 35 艘外国军舰。川军在湖北——四川前线失败后，英帝国主义组织和武装了藏军对四川省的进攻，以便利用它进行反对红军的斗争。与此同时，英帝国主义为自己提出了两位一体的任务：它企图组织西藏人直接进攻红军，同时训练他们反对苏联。法帝国主义一面加强其在云南和广西省的军队，一面正在同英国人在四川和甘肃省共同建设军事基地，以反对我们的红军和反对苏联。美帝国主义一面全力帮助国民党反对红军，一面千方百计企图挑起苏联和日本之间的战争。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中国革命目前一方面正在迅速发展，正在取得巨大的胜利，而另一方面，它也正在经历着一个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直接威胁着它的关头。我们希望我们的兄弟党，首先是英、美、法、日的兄弟党加强其保卫中国革命的工作，尤其是它在帝国主义的陆军和海军中的工作。这需要我们的兄弟党不仅在口头上，而且立刻在行动上同帝国主义者及其对中国革命与苏联的武装干涉进行斗争。

我们战胜了自己苏区内部的敌人。最近，在苏区内部揭露了各种反革命组织，例如国民党改组派、社会民主党、陈独秀托派组织、AB 团和性问题研究会。（笑声）它们这样起名，是想利用合法性。如果说社会民主党和其它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还多多少少说些漂亮的“革命”词句，那么在我们苏区它们甚至连这些“革命”词句也抛开了。它们在那里直接按照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指示与计划行事。

它们的主要口号是什么呢？它们的主要口号是劳、资合作，地主与佃农合作；第二国际万岁，打倒第三国际。后来，它们又提出

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万岁的口号。

这一口号是它们利用反革命的国际经验在我们苏区想出来的。它们是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直接帮助下行事的。这些组织采取了极为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反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直至进行反革命的武装暴动。这类暴动曾经在四军的活动区域以及中央苏区等地发生过。它们还采取了各种形式的破坏行动。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在东江地区有一些医生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他们曾经屡次制订了破坏计划。起初,他们想一下子毒死我们的所有领导同志,但未得逞。后来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方法。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干的,但是,我们这个区的几乎所有领导同志统统生了病。

但是,尽管这些反革命组织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在一些地区的行动时有得逞,但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迅速地消灭了它们。

我们谈的是我们的对敌胜利。而我们是如何取得这些胜利的呢?我们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巩固的工农联盟和千百万劳动群众在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自觉性、主动创造性和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基础上取得这些胜利的。

为什么我们能够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和保证这一联盟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呢?为什么苏维埃和红军能够得到最广大劳动群众的同情、支持和帮助呢?

这是因为我们贯彻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首先是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我们举例来谈一谈苏区的土地问题。众所周知,我们党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性质是“左”和右的一系列错误。“左”的错误是过早地采取了禁止买卖土地、按照苏联的模式组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与不顾广大农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到处强制重新划分土地,等等。右的错误是在许多地区没收地主土地的工作搞得不彻底。富农和地主的残余势力对没收地主、高利贷者和其他大土地

所有者的全部土地的工作进行了阻挠。分配土地往往是按照生产资料多少的原则进行的。因此，富农时常有可能享受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

在我们党的四中全会以后，苏区在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的问题上开始了根本的转变。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没收地主、高利贷者、教会和其他大土地所有者的全部土地的工作。我们同样也在没收富农的土地。但是，如果富农不参加反革命行动，不反对苏维埃政权，如果富农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不利用雇佣劳动，那么富农可以获得一部分较坏的土地，作为没收其土地之后的劳动分地。

这是根据中国富农的特点而来的，因为他们多半是采取半封建的剥削方式，因而明显地具有地主的性质。

我们就是利用这种方法，正在正确地进行没收土地的工作。

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我们实行了一方面考虑每个单个的农民家庭中劳动力的数量，另一方面考虑其人口数量的原则。此外，土地分配不是简单地按照面积，而是要考虑到土地的质量及其产量。重新平均分配全部土地的办法只有在该地区的农民基本群众自己同意和要求这样做的情况下才实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这一办法，并坚决帮助贯彻它，但也明确指出它的缺点，即这一办法虽然能够帮助我们最终消灭农村的封建残余，但是它却不能最终解决关于消灭农民贫困化和经济破产的问题，而且土地所有权的彻底消灭只有在全部土地实行国有化的时候才有可能，其实现的条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农民和劳动群众彻底摆脱贫困化与经济破产只有在农民和劳动者基本群众在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的领导下，并同它一起按照苏联的榜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才能实现。

这样，我们才得以贯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的土地革命不应该是富农的，而应该是贫农和中农的革命的指示。

此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正确地解决了关于劳动的问

题。以前,在苏区有些地方根本不存在赤色工会,有些地方的赤色工会力量很薄弱,甚至有时还发生某些苏维埃机关宣传显然是反无产阶级理论的情况,说什么如果我们需要解决关于工农业商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问题,那么就需要降低工人的工资,以便降低产品的成本。有时还有这种情况:某一苏维埃机关提出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口号,等等。党的四中全会以后,我们苏区在建立群众性的阶级工会的问题上开始发生了转变。虽然赤色工会在很多苏区还不够巩固和工作得不够好,特别是由于群众工作做得不够而受到损害,但是,赤色工会当前在我们苏区毕竟已经成为群众性的组织。我现在举一个小区、赣东北苏区的例子。那里的工会会员在今年年初共计大约 1.7 万人,并有 400 名代表参加了鄂豫皖区第一届雇农代表大会。工资普遍提高了,在我们的主要苏区已经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一些苏区已经开始实行工人监督生产。这是一件非常复杂和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刚刚开始实行之,因此我们的兄弟党应该帮助我们,以便我们能够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专门保护儿童和妇女劳动的问题,我们苏区目前正在实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指示。总而言之,工人已经成了苏区的主人,赤色工会已经成为最重要与最基本的群众组织之一和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可靠支柱。我们正在开始正确地实行经济政策。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以前也犯过许多错误。在李立三路线期间,“左”的错误尤其危险。当时,许多苏区实行了统统没收一切工、商企业的政策。农民经常在彼此之间分配工业品及所有商品,从而使一切工、商企业倒闭。

这样,我们就在对我们的苏区的经济封锁中客观上帮助了我们的敌人。我们也有过公开的、右的错误,即当我们红军占领某一城市的时候,没有对有产阶级实行一定的税收制度,以便改善红军的物质状况。共产国际帮助我们党正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条正确道路是:一方面,我们目前应当实行自由贸易的方针,准许私人

向工、商企业投资,等等。而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按照需要、根据必要和居民劳动群众与工农群众的要求而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充分保障我们苏区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例如大米、谷物和盐,等等。如果需要,那么我们应该调节和限制它们的出口,调整其价格,等等。这样,我们才能一方面充分供给我们苏区以工业品、食品及其它,而另一方面进行坚决斗争,反对投机倒把、破坏行为和来自国民党与帝国主义者的经济封锁。在开始实行这一新经济政策以后,我们许多苏区的物质状况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例如当我们的红军占领了樟州、南浔、大余、璜川等地以后,商业企业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并继续营业。我们仅向有产阶级征收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并废除了国民党统治下存在的税收。我们在许多苏区开始实行了新的税收制度、关税,等等。我们还在许多苏区建立了工农银行。这些银行发行的纸币不仅流通于我们苏区,而且也常常在白区流通,因为后者在同我们苏区进行贸易、卖出工业品和买进原料方面得到好处。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许多苏区目前的经济状况改善了,甚至我们的敌人和美国传教士也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公开表示,我们苏区的经济状况比国民党统治区要好得多。例如,1升大米在我们苏区的价钱是20元,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却是170元,即大米在我们这里比国民党统治区便宜7—8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苏区的经济状况问题已经解决。解决我们苏区的经济状况的问题是同我们革命的进一步胜利密切联系着的。但是,这些事实毕竟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应该懂得,我们红军是在非常艰苦的经济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在我们红二军所在的湘鄂西区,去年和今年都发生了水灾。

现在,那里的情况是红军战士每日吃两餐:一餐米饭、一餐粥,而其他居民和政府及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等每日只吃一餐粥。众所周知,那里正在不断进行着战争。我们的红军和劳动者就是在这

种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着反对国民党进攻的斗争。这种环境不仅在这个区如此,在其它区里,当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和直接进行掠夺的时候,也非常经常地缺乏食品。

由于我们正确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和劳动问题,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方针,因而在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事业中取得了这些成绩,并取得了红军的这些胜利。但所有这些胜利都是同我们党的巩固分不开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没有同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我们党和苏维埃革命就会由于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而断送。如果没有同反革命、罗章龙路线和托洛茨基陈独秀分子的直接代理人的斗争,我们党和苏维埃革命就会由于公开投降国民党、帝国主义和取消派而断送。

我们党执行了共产国际 1930 年在其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明确作出的指示,即两条战线的斗争应当成为党的领导全部活动的基础。最近,我们党不仅战胜了李立三路线和反革命的罗章龙路线,而且还在两条战线上同虽然还未定形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在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党同工会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稍后一点谈到。在中央的领导下,党同苏维埃运动中形形色色的右的和“左”的倾向进行了斗争;党根据斯大林同志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的精神,同托洛茨基反革命匪帮等进行了斗争。此外,我们党还同一切企图破坏布尔什维克的铁的纪律和党内统一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正是在进行思想斗争的同时,通过实行布尔什维克的铁的纪律,迫使李立三路线的领袖们投降了党和共产国际。而且,我们借助于布尔什维克的铁的纪律,驱逐了那些不愿改正自己的错误和变为反革命奸细的主要的分裂派领袖;我们从而巩固了我们党的队伍。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我们党巩固和发展的基础。战胜机会主义倾向和共产党内的分裂分子是战胜反革命的首要前提。

我已经谈到了我们的胜利和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在我们苏区一切都令人满意,已经没有错误,没有困难了。绝对不是这样。众所周知,虽然苏维埃政权在我们苏区取得了胜利,但是敌人还从四面包围着我们。不仅国民党,而且还有帝国主义仍在竭尽一切可能,以便从我们手里把胜利果实夺过去。我们的困难还是巨大的,而且越往前,困难越多。反对我们的不仅有国民党,而且还有帝国主义,它是中国革命主要的、强大的和最凶恶的敌人。为了使中国革命能够战胜自己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我们需要越来越大的努力,需要付出比以前更加大得多的精力。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革命还仅仅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目前的阶段是在准备先决条件,以使这一阶段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完成这一巨大任务,需要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付出更大的精力。为此,各兄弟党的直接和切实有效的帮助对于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中国不仪彻底战胜国民党,而且彻底战胜帝国主义。

二、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现在我想谈一谈罢工运动的几个问题和失业现象。我不准备举很多证明中国经济危机的数字。据资产阶级报纸的最低估算,全国的稻米产量 1931 年减少了 25%,小麦减少了 15%,棉花减少了 20%,大豆(在满洲)减少了 20%,绿茶减少了 30%,等等。而且,中国经济危机的特点是:虽然中国的所有农作物收成不好,但是例如棉花 1931 年按白银计算却跌价 10%,生丝跌价 15%,等等。如果注意到作为中国货币流通基础的白银的贬值,那么中国农产品实际上跌价的幅度就更大。这种情形在通过不等价交换加紧剥削中国农民的同时,使帝国主义者从中国榨取原料的事情有了保证。

对中国原料跌价起了巨大作用的是 1931 年在为争夺中国市

场而斗争的基础上大大增加了向中国进口的农产品。例如进口的美国和印度棉花增加了30%，进口的美国烟草原料也增加了30%，等等。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榨取原料的政策导致了主要食品不足的更加严重。例如1930—1931年，大米和面粉的价格比1929年上涨了1—2倍。仅仅由于从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进口了相应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才稍有下降。

关于1931—1932年水灾的后果没有必要多说，仅仅指出遭受水灾的主要是经济上较为重要的华中各省就够了。根据中华全国救灾委员会的最后结算，有4.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被水淹没，其中60%是庄稼地，全部被毁。受灾人数起码达到8000万人。水坝和道路的损坏不算在内，损失共达20亿银元。城市里到处挤满了灾民，形成了潜在的劳动大军。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下降得更加厉害了。例如1931年，上海丝纺工业的中国资本家重新开办了他们关闭的纺丝厂，以降低原工资20%的条件招收工人。成年工人每天收入二角五分至五角；童工劳动每日的收入只有几分钱。同一年，沈阳的日本资本家招收从灾区逃到沈阳的农民，强迫他们做工而不给任何工资，只给很少的一份糙米。此外，还存在着包工制度这种剥削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形式。由于日本战争，中国工人进一步削减了工资，例如京沈铁路削减了工资20%，津浦铁路削减了工资30%。

在直接降低工资的同时，工人阶级还受到大规模失业的重压。还在1931年就大约有占总数一半的雇佣工人（不包括农业工人）由于工厂倒闭和大规模削减工人而失去了工资。1931—1932年，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中的失业人员总数不少于500万人。失业大军的增加一方面是由于从国外回来的华工（1931年仅回到广州的就有50多万人），另一方面是由于日本的武装干涉造成企业的破坏和倒闭。仅在上海一地就有24万名产业工人和1.7万名工

场手工业工人失去了工作。铁路运输业实行了大规模的解雇。在日本轮船上工作的中国海员被换成了日本人。中国的失业者得不到任何补助。绝大部分工人被解雇时不发给退职金。比较广泛地采用了利用失业者进行所谓公共建设事业。去年秋天,失业者和灾民在安徽省以自己的劳动修复了被破坏的大运河。目前,正在修复沿长江各城市的大坝和整顿因水灾而遭受严重损失的汉口。这些工人的劳动所得只有微薄的工资和吃不饱的一份口粮。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危机期间的处境。

中国的战争连绵不断:帝国主义战争、军阀战争,此外还有革命的内战。在所有的城市经常宣布戒严。国民党企图利用日本占领满洲的事实来加强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国民党专门发表了许多关于在“民族灾难”期间工人应该停止一切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并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外来敌人的法令和指示。这时候的任何罢工都是特别非法的,而罢工参加者必定会被枪毙和受到监禁。

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喧嚷什么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考虑,罢工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工人们不顾客观困难而举行罢工,则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取得胜利。

而事实上结果如何呢?

工人的罢工运动在这种环境下大大地向前发展了。1931年的罢工参加人数是73万人,而1932年仅前四个月的罢工参加人数已经超过了43万人,超过了1929年全年的水平(38.7万人)。

中国无产阶级对于来自资本的进攻实行了反攻。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支付工资欠款、规定休息日、支付新年奖金和节日支付双倍工资。反对解雇和失业的斗争正在发展。工人提出了支付退职金的要求。1931年11月至12月曾经发生了若干起反对包工头的罢工。

1931—1932年的绝大部分冲突与罢工是在经济要求的基

础上发生的,但是,在当前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制度环境下的任何罢工,甚至是纯经济性质的罢工都是违反国民党的法律和帝国主义秩序的,因而从一开始就变成直接的政治行动。因此,中国当前罢工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是所有的罢工迅速转变为政治罢工。

1931年

占冲突总数的百分比

经济斗争	78.4
政治斗争	21.6

1932年

占冲突总数的百分比

经济斗争	71.8
(其中转变为政治斗争的)	(15.2)
政治斗争	28.2

在斗争形式方面可以看到下述情形:

1931年

占冲突参加者总数的百分比

罢工	54.3
消极怠工	14.7
请愿、谈判、仲裁	22.3
与警察的冲突,包围 办公室、工厂,捕获 管理人员	8.7

1932年

(第一季度)

占罢工参加者总数的百分比

罢工	63.4
消极怠工	23.8

请愿、谈判、仲裁	……	9.8
包围工厂、办公室， 捕获管理人员	……	1.5
游行	……	1.5

由于国内革命高潮的增长、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成就和反帝运动的发展，1931年下半年和1932年的斗争开始转向更高的形式，罢工的比重增加。

我们这里发生了上海的日本企业中的工人总罢工、太原和福州市的工人和学生的总罢工、总罢课，作为对日本和国民党的抗议，另外还发生了上海和无锡纺丝厂6.5万名女工的罢工。许多罢工发展成了游行、群众集会和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警察及宪兵的流血冲突，而且有时发展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行动，例如上海抗战，等等。上海的日本企业中的工人总罢工持续了四个半月以上。

关于罢工斗争的结果，可以由下表说明。

斗争结果
(占冲突总数的百分比)

时间	胜利	失败和大批解雇工人	未查明
1931年	30	38	32
1932年1—4月	52	15	33

总之，1932年上半年发生的一半以上罢工是以工人胜利而告结束的。这与1931年相比是个巨大的进步，从而粉碎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罗章龙路线追随者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在危机环境中不可能罢工和罢工不可能胜利的“理论”。这种理论有利于资产阶级和麻痹工人阶级的斗争积极性。

然而，赤色工会的工作毕竟还远远落后于客观发展着的工人运动。下表说明了革命领导下的罢工包括的范围比。

		占冲突总数的百分比	
		1931年	1932年1—4月
		(据中国问题 研究所材料)	(据赤色职工国际 中华全国支部材料)
赤色工会	……	15.9	19.1
黄色工会	……	4.0	13.7
自发行动	……	15.0	26.0
未查明	……	65.1	41.2
		100.0	100.0

可见,第一,赤色工会的领导作用在1932年上半年比1931年虽然有所加强,但是在整个罢工斗争中仍然非常薄弱,只包括19%的罢工;第二,占主要地位的是自发性罢工,这说明赤色工会和群众联系不紧,组织和领导罢工斗争不力;第三,黄色工会在1932年上半年罢工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比1931年有所加强。这说明,一方面,革命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正在普遍发展,这促使资本家通过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和扩大黄色工会的工作正在加强其瓦解、甚至消灭工人斗争的工作;另一方面,主要说明赤色工会的力量还很薄弱,还不能保证对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进行革命领导。

在殖民地国家中国不存在广大的工人贵族阶层。因此,传播改良主义的基础比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要弱得多。然而,如果像瞿秋白、邓中夏和李立三同志那样,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改良主义的基础,那就错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些同志藐视和低估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事实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反对民族改良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黄色工会的斗争对于共产党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印度的革命工人运动发展的同时,民族改良主义、特别是所谓“左翼”民族改良主义者的影响也增长了。

应当同那种认为无法在黄色工会中工作的观点进行坚决的斗

争。上海电话工人最近的一次罢工证明了这一说法的错误性。在这次罢工中，共产党员们对于国民党及托洛茨基陈独秀主义分子关于罢工者无法取得胜利和必须消灭罢工的宣传进行了我们的关于在扩大罢工方面进行积极工作和必须坚决进行斗争并直到取得胜利的反宣传。共产党员们自下而上地实行了正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工人的最迫切需要的局部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一争取群众、争取罢工运动领导权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总之，工人们通过罢工委员会站到了赤色工会方面。这证明，如果我们正确地实行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如果我们在每一具体事例中坚决揭露黄色工会的阴险作用和改良主义策略的话，就可能胜利地进行争取工人群众的工作。

失业工人中的工作是革命工运中最薄弱的方面之一。虽然在上海、香港、天津和其它一些城市中建立了失业工人委员会，虽然共产党员在失业工人中进行了一些工作，但这一工作仍远远落后于客观可能性和运动的要求。广泛的失业大军仍然没有组织起来。失业工人的斗争在大多数场合下是自发进行的，没有赤色工会和我们党的领导。在这方面，赤色工会和中共在革命工运中的落后性表现得最为明显。

不错，赤色工会落后于革命斗争客观发展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客观上的困难，例如统治阶级最残酷的恐怖手段，但主要是由于我们工作中主观上的缺点。尽管条件有利，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妨碍我们去克服客观上的困难和发展赤色工会。

主观方面的原因是老机会主义倾向的流毒在新形势下的再现。在很多情况下，对群众在争夺领导权和制定策略口号与要求方面缺乏解释工作，以便使工人自己确信党和赤色工会的口号是正确的，这往往导致了企图指挥群众和“左倾”命令。赤色工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工团主义的倾向，和党闹对立；而另一方面，党及其组织经常低估和藐视在工会中的工作。表现为不愿在黄色

工会中进行工作的宗派主义和投降黄色工会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对待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态度仍然没有肃清。李立三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这些严重的反列宁主义观点的表现。党的四中全会战胜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思潮,改组了一切工会中的共产党团(中华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联合会和上海工会联合会,等等)。这就为工会工作中的转变创造了前提,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由于工运中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力,以及干部的严重不足,使工会中隐藏了一些机会主义分子。这使工运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在满洲事变以后蠢蠢欲动起来。他们以刘祥(音译——译者)同志为首提出了一整套机会主义的纲领。党对这些分子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同时开展了自我批评,以揭发和纠正革命工运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党再一次改组了共产党团。在这一斗争中,全党和全体工会积极分子坚决地支持了中央,并在工会的一些环节中顺利地战胜了机会主义的领导。巩固这一胜利导致了工会运动的重大进展。最近数月来,赤色工会无论是在群众中扩大其影响方面,还是在巩固其组织及在罢工运动中的领导权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的赤色工会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缺点和错误,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1. 在企业中的工作非常薄弱,因此,赤色工会和企业、特别是和一些大企业之间的联系不紧。赤色工会还未能能在罢工运动中显示出自己的领导和指导力量。大部分行动和罢工是自发进行的。

2. 在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内部的工作极为不够;在群众性的黄色工会内部还未建立革命的工会反对派。

3. 赤色工会还不善于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建立工会的工厂委员会和组织革命的全权代表机构的事业中成绩还很不显著。

4. 在妇女和少年中间的工作极为不够。没有建立青年工人

小组、青年工人代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

5. 工会内部的生活不健全；工会会员的流动性大。

6. 在工会运动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中存在着李立三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流毒，这曾经不止一次地反映在工作中。

所有这一切，以及客观发展条件使我们有义务无条件地实现赤色职工国际中央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所指出的任务：

1. 大力开展、组织和领导经济斗争，恢复、建设和使赤色工会变为群众性的组织。

2. 最大限度地扩大和领导反帝运动。应该打碎国民党制度的枷锁。

3. 为争取中国无产阶级的主要阶层、瓦解黄色工会和争取它们队伍中的工人群众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4. 扩大与巩固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支柱中国苏区的工会。

中国有数千万挨饿的农民。我们党在组织农民群众造反的事业中取得了某些成绩；例如在江苏省，我们在挨饿的农民进行斗争的基础上组建了红军第 26 军团；在安徽省的一些地方，我们在抗税和反对警察制度的斗争中把农民组织了起来；有些地方，事情发展到了暴动的程度，例如在蚌埠和芜湖郊区等地。我们在山西和甘肃组织了农民游击队。我们在满洲的农民群众中间进行了一些工作。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工作同客观可能性和革命的客观要求相比较，那么我们应该公开承认，我们还远远落后于农民运动的规模。农民运动正在新的地区和省份里发展，目前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抢米运动”在两年以前被蒋介石誉为“秩序与繁荣”省的浙江和江苏省蓬勃开展的时期。国民党的所有报纸都充满了关于挨饿的农民进行“抢米运动”和关于局势严重性的令人不安的报道。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农民运动由于缺乏我们的领导，往往是任其自由发展的。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富农和地主把农民运动的领导权

抓到自己手里,使之不致走上革命的轨道。

在蒋介石最近反对我们红军的斗争计划中,其中一方面就是企图利用挨饿的农民在其反对我们红军的斗争中充当炮灰。这一情况使我们党有更大的义务特别注意争取全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还在去年就不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中国苏区的工作任务,而且提出了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任务,同时指出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是两位一体的任务。

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还在共产国际主席团决议中就已经指出过的党的弱点,其表现是中共至今还没有使自己的群众工作适合因革命斗争的普及与发展而提出的要求。它在组织上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的工作极为不力。党还没有能够与广大的群众建立实际联系、夺取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权、建立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和领导全中国的农民运动。这就是尽管国内存在革命危机,而党没有在白区掀起一个保卫苏区和反对国民党大“围剿”的强大运动的主要原因。直到现在,党还没有克服这些缺点。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去年关于中共在中国白区争夺工农群众斗争领导权的事业中的任务的决议基本上没有得到执行。

三、反帝高潮和关于民族革命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

现在,我简单地谈一谈反帝斗争。根据议事日程的第三项,我们将要特别谈到这一问题,而现在我只想提出一些不仅对我们党,而且对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所有支部都大有教益的策略问题。例如关于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我不准备谈我们党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我只想说,在满洲事变以后,而且特别是在今年的上海事变期间形成了真正特别有利的客观环境,投入斗争的千百万群众中不仅有工人和农民,而且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学生和城市贫民,等等。我们应该说,满洲和上海事变引

起的反帝运动就其规模和发展程度来说都超过了 1925—1927 年的反帝高潮。参加这一斗争的不仅有以前参加过革命运动的、例如华南和华中各省的群众，甚至连以前不曾发生过人民革命运动的、例如满洲等地的群众也参加了。这些群众当中有各方面的人士。

有一些以前参加过 1925—1927 年革命运动、并且从这些年的革命中吸取了经验教训的阶层。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以前不曾参加过革命运动、未经过 1925—1927 年革命锻炼的阶层。因此，一部分先进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非常容易地接受了我们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的斗争结合起来的口号。但另一方面，其它一些政治上觉悟不够高的阶层接受我们的口号就并非那么容易，特别是一些反对国民党、反对民族改良主义者和民族叛徒的口号。因此，我们党应该实行一条建立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全国反帝战线的路线。我们确实看到了列宁 1905^① 年在其《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中曾经描写过的情况。他说：

“现在，在事变的影响下，不用我们发动，到处都有成百上千的小组出现，它们都没有任何固定的纲领和目的。必须使社会民主党人负起责任来尽可能与更多的小组建立和加强直接的联系，必须使社会民主党人给这些小组以帮助，用他们积累的经验 and 知识去启发它们，用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去鼓舞它们。除了自觉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以外，让所有这样的小组或者直接加入党，或者作为靠近党的组织。在后一种情况下，既不能要求它们接受我们的纲领，也不能要求它们一定要和我们发生组织关系；只要它们怀有革命的情感，只要它们愿意帮助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那末，它们看到社会民主党人的积极活动，在事变进程的压力下，这

① 原文误为 1906 年，应为 1905 年。——译者

些靠近党的小组会渐渐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的民主主义的助手,然后就会成为它的有坚定信念的成员。”^①

当时,在中国出现了许许多多像反帝同盟、抗日协会和义勇队等群众组织。这时,我们党如果能够很好地实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本来会掌握广大群众斗争的领导权。而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没有做到这一点,这首先是因为它没有能够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上海的罢工委员会、抗日协会和义勇队等一些工人阶级组织没有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群众斗争的无产阶级骨干。因此,我们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真正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由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一些民族改良主义团体、国民党“左翼”改组派和中国青年党能够把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甚至是一部分无产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个不大的知识分子团体变成了较为群众性的政党、即所谓中国青年党。这个党采取民族主义的欺骗宣传,争取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并开始发展成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而这个党以前公开提出的口号却只有两个。第一个口号是反对外来的敌人,即反对苏联,第二个口号是反对人民内部的敌人,即反对共产党员。最近,它提出了对日宣战、反对国民党独裁和争取所有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党与团体参加国民党政府等口号。正因为如此,它在运动中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在印度比在中国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必须进行反对民族改良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团体的斗争。因此,在谈到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民族主义的提纲中,应该指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首先是在中国、印度等国家中反对民族改良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综上所述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政局的发展超出了第十一次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的革命危机表现为在一个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国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2版,第7卷,第150页。

土上组织苏维埃和红军的评价。中国革命危机的深化与扩大不仅表现在苏维埃和红军及其巨大胜利的进一步巩固与扩大,而且也表现在广大的反帝运动已经发展到直接武装抵抗帝国主义的巨大高潮,表现在千百万饥饿的群众为争取大米、住房和衣服,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而进行的斗争中,表现在主要工、商业中心的工人越来越具有反攻和进攻性质的斗争中,表现在工人阶级内部革命情绪的增长、他们摆脱国民党的影响、小资产阶级大部分阶层的迅速革命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化和国民党与军阀统治的加速崩溃。

从所有这些事实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发展开始倾向于中国苏区和白区的革命运动融为一体。正如提纲中所正确指出的,国内存在着革命的形势,而在大部分国土上是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与此同时,革命运动在领土方面和农民群众与大城市的工人行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虽然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期间的情况比较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但基本上还没有被克服,而且仍然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主要弱点之一。因此,我们的总纲领正确地规定了我们当前的以下一些基本任务:

“1. 在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独立和统一的口号下动员群众。

2. 发展和统一苏区、巩固红军。

3. 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

4. 坚决采取使赤色工会变为群众性组织和争取那些加入国民党工会的工人的方针。

5. 开展游击运动,在满洲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抗税和抵制政府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者走狗的财产和建立选举产生的人民政权等口号。

6. 广泛宣传苏区的成就和中、苏工农结成兄弟联盟的口号。”

显然,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这些任务的完成不仅意味着民族革

命任务,而且意味着其国际主义任务的完成,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结束,而且意味着它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期的胜利开端。

为了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是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都应该给中共以应有的帮助。

最后,我简单地谈一谈印度。

近年来,在印度开展了农民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农民运动往往是同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土著资产阶级及地主的斗争同时发展的。工人罢工具有巨大的规模。正如在我们党中央、英国共产党中央和德国共产党中央致印度共产党员的信中所正确指出的,印度革命的重要意义不次于中国革命。

印度的反帝和土地革命能够给英帝国主义带来致命的打击和加速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彻底灭亡,从而保证世界革命的胜利。当然,印度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中国的条件;首先是那里至今还没有一个群众性的全印共产党。印度党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群众的。党还犯有许多错误,存在着派别主义、地方主义和行会习气,等等。至今在印度革命中还没有一个能够在其周围组织全印度规模的工农运动的革命核心。因此,正如第十一次全会决议中所正确指出的,在印度首先应当建立一个真正群众性的全印共产党。这在我们的提纲和我们的信中也已经有所正确规定,即当前,在印度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全印共产党。而且,尽管我们的印度党力量还很薄弱,我们还是在它面前提出了巨大的任务:组织政治罢工和领导农民运动,等等。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全会上更加注意印度革命问题、中国革命问题和其它殖民地国家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德国革命应该和能够就西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那么我们中国革命也应该和能够就东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说出自己的决定性的话。但是,为了使西方和东方的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

联合起来,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党,特别是当前在反对反苏武装干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瓜分中国、反对重新划分世界、反对德国、波兰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反动派、为了从危机中寻得真正的革命出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一致斗争中,应该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并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

我们相信,在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列宁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

(原载《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速记记录)》第1卷,第144—157页。任震寰译,王继飞校)

(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二八—一九四三),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在讨论库西宁和台尔曼的 报告时的发言

(摘录)

(1932年9月5日)

(日本)阿 木

.....

我要简略地谈一下日本目前局势的两个问题。第一,对华战争以及反苏战争的危机。荒木陆军大臣不久前宣称,在二三年内,日本必将出现“非常紧张的局势”。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在日本的大陆政策中,应当有更远大的目标。我们占领满蒙终究还是一个次要的任务。因为日本在大陆上的发展,不仅是拯救日本的需要,而且也是拯救东方各国和全世界的需要(当然是为了摆脱布尔什维主义——荒木)。我们现在需要表现出非常的决心。”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反苏战争。整编新军、编组部队,所有战争准备的最终目的是针对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以便在最短期内给它以打击。

我现在谈一下第二个问题:关于革命高潮问题。我不想详细谈论日本发生的事情。我只援引一下被指派调查大学生思想状况和研究大学生左倾原因的文部省工作组的报告。工作组对“社会情况”作了如下的估计:1. 资本家和工人的生活水平非常悬殊,农村极端贫困;2. 劳动与租赁纠纷日益尖锐;3. 中产阶级在经济上日趋衰落;4. 大学生毕业后难以就业;5. 政界腐朽;6. 各政党都

有不满情绪；7. 人民不了解立宪自治的问题；8. 出现日用必需品涨价的趋势；9. 群众企图以群众联合行动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10. 不了解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

报告在第二部分谈到科学界的思想倾向时指出：1. 酷爱无产阶级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把下面三点删节了）；5. 对日本国家体制缺乏理论研究；6. 我国文化研究工作不普及。也许有人认为，共产党员何必要谈论这个呢，要知道，这是在该大臣亲自主持下拟出的报告。这是今年年初的情况，而现在，国内的局势紧张得多了。

一年半以前，在第十一次全会期间，日本共产党还是一个很小的集团，尽管后来许许多多共产党员被捕，但是反而大大发展和壮大了党组织。各地的城乡劳动者，对恐怖手段和反动势力日益转入反攻。日本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反对战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唯有日本共产党这个政党，领导着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优秀儿女，去反对进行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共产党还在日本帝国主义备战时期，就已开始反对掠夺性的战争了。1931年7月6日，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写道：民政党的若槻内阁撤换了满铁总裁和朝鲜总督。这将是修改我国满蒙政策的一个转变。日本帝国主义不论同谁作战，它的战略任务首先是占领满蒙。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公开声明这一点，而且实际上现在已经加紧准备武装侵犯这些地区。日本无产阶级正在为反对战争而斗争。它的口号是：“不要为战争出一文钱，不要运去一个士兵。”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挑起朝鲜人在万宝山大肆杀害华人，党乃向群众发出呼吁书，其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竭力加强在满洲和朝鲜的军警制度，以便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并使满蒙完全殖民地化。”日本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和中国劳动者的反革命的武装干涉。”

9月19日,当日本军队包围了沈阳时,日本共产党散发了大量传单,其中写道:“工人、农民和士兵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正在占领沈阳。日本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已走上占领满蒙的第一步……占领满洲!占领革命的中国!占领苏联!——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远东反动势力的武装先锋)的战争叫嚣。”

“亲爱的同志们,受尽剥削的工友们!你们已被资产阶级和地主剥夺了劳动和面包、土地和自由。为他们、为他们的利益打仗,会使你们更加痛苦,会使你们遭受彻底的毁灭。你们要为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祖国而斗争!你们要抗拒寄生虫和杀人犯的祖国的一切军事行动!在军火企业和运输业中做工的工人们!你们不要往前线运送一个士兵、一支枪!你们要停止枪支弹药的生产!日本全国的工人、农民和失业者!你们要组织罢工和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来反对战争,来争取你们的要求!前线的士兵们!你们要尽快地组织同中国士兵的停战联欢!向中国无产者勇敢地伸出手吧!所有兵营中的士兵们!你们要作出决议,谁都不到前线去,你们大家都要反对那种实际上是保卫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祖国的口号!工人、农民和士兵同志们!你们要同中国工农缔结同盟,要奋起为革命的团结而斗争!你们要要求立即从沈阳和一切被占领的地方撤出军队,立即从中国和满洲撤回日本的陆军和海军!你们不要运送一个士兵!你们要抗拒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军事行动!你们要帮助红军!保卫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的日本!拥护苏维埃的日本!”

在这个呼吁书中,充分地反映出我党反对战争的基本路线。

现在我来列举一下共产党反战行动的一些主要情况。

9月17日,我们刚一得知要占领沈阳的消息,就在短期间内召开了反战代表会议。10月4日,组织了群众性的反战活动。我们反对战争,同时也反对第二国际日本分部的领袖宇民。

10月7日是共产党一位领导人逝世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举

行了反战游行示威，有 500 多名工人参加；还有 1500 人参加了群众大会。

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在日本是以反战示威活动和群众集会来庆祝的。400 名铁路员工、印刷工人和失业者举行了游行示威，而在东京车站前，有 500 名工人和革命大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在一些职业介绍所里，举行了群众集会和示威活动。在东京大学附近，有 1000 多名革命大学生组织了游行示威。在大阪和横滨，也出现了这样的示威活动。在那里，我们在“反对日本对华武装干涉！”“保卫苏联！”的口号下，举行了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5 月 1 日以前，我们举行了多次示威活动。这一年的五一游行示威，也是在这样的口号下举行的，全日本约有一万名革命工人和农民参加。8 月 1 日的示威活动是绝无仅有的。许多企业里举行了反战性质的罢工，以示抗议和示威，例如，战争初期石川飞机制作所中的罢工，以及 9 月 16 日冶金、机器制造、电机和其他企业中的示威和罢工。

我们在军队中也做了一些工作。我不想过多地谈这个问题，因为关于反战斗争问题，将有一个专门的报告。我只简略地提一下党的基本任务：

一、反对反苏战争的准备工作。要千方百计地揭露已经实行的战争措施，反对向苏联边境调运军队和制造社会舆论。

二、揭露对华战争业已结束这种社会法西斯的欺骗。必须反对目前仍在持续的战争。日本无产阶级对满洲游击运动的支持，在目前是特别重要的。

三、对士兵进行工作，并把这一工作与农村和企业中的工作结合起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必须同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一切表现，以及资产阶级及其仆从（法西斯分子、工人阶级中间的社会法西斯分子）所进行的沙文主义宣传，进行斗争。

五、总结反战斗中已取得的经验。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反战斗争与争取日常要求的斗争的巧妙配合(东京地下铁道、鸟羽铁路的斗争,等等)。

六、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各企业中。

七、同社会民主主义情绪的各种表现(如群众性组织中的经济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因为这种情绪会降低工人阶级的战斗力。

现在我来谈谈土地问题。在日本,由于存在着寄生的地主土地占有制,土地问题乃是将来工农革命的主要问题之一。以下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一些资料。

如果说,在1917年只有85起农民纠纷,那么,经过十年,即1927年,纠纷的次数增加到2052起;而在1931年,上升到2689起。从战争爆发时起,在农村里发生了些什么事?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十分确凿的材料。1930年9月,在一个农村里发生了61起纠纷,而1931年9月为42起——减少了。然而,1930年10月已为141起,而1931年10月为251起;1930年12月为186起,而1931年12月为309起——增加了50%以上。可是今年1月以后的情况如何呢?地主和小佃农之间的斗争空前加剧了。

下面是向你们提供的极为贫乏的农业省的材料。1月至6月纠纷的次数,从1931年1523起增加到今年的1621起,即增加了98起,直接参加斗争的佃农人数,从8835人增加到26969人,也就是说,增加了两倍多。这些数字能说明什么呢?它们说明,虽然爆发了战争,反动势力加强了,但劳动农民仍然广泛而坚决地开展同地主和警察的斗争。

我只举出两件农民反对警察和地主的斗争事例。1931年9月19日,500名农民在栃木县攻打了警察局,以便解救被捕的青年同志。10月3日,350名农民在新潟县攻打了一个警察分局,同警察发生了一场真正的大血战。攻打的原因是地主把一个有革命情绪的贫农手中的土地收回了。为了解救被捕者,或是为了反对

把农民手中的土地收回，全村都出动了。

革命的行动也对那些联合在改良主义组织中的农民起了感化作用。今年春天，贫农们在栃木县打死了几个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保护地主利益，反对起来斗争的农民，并且侮辱了农民。

法西斯分子利用蛊惑人心的“农村自治”口号，竭力使农民与地主联合起来，并唆使他们去反对工人。

社会法西斯分子，这些资产阶级的土地改良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掩饰寄生的地主土地占有制的问题，竭力以地主微小的让步来阻止农民的斗争，同时极力设法使斗争通过警察仲裁转化为和平谈判。

目前，在国内正在进行所谓请愿运动。有几万农民参加了这个运动。诚然，这个运动还是由地主和富农领导的。但是农民群众对这个请愿运动的或多或少的反映，也可表明农民的不满情绪，任何触及他们利益的微小问题，也会引起他们的激动。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为了自己阴险的、反动的目的，在竭力利用这个运动。他们编好所提要求的清单，带着清单去找农民，要农民签字，于是事情也就完结了。这就表现出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不让农民搞群众性活动的意图，从而也就赞助了议会制和君主制的幻想。

最近农民纠纷的特点是，农民反对地主因小佃农未缴纳应缴的地租而强制收回土地的做法，从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因此，农民的斗争直接围绕着寄生的地主土地占有制问题，而日益激烈起来。

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农民齐心协力地对地主和警察展开了行动，因为每一次发生纠纷，警察都介入了。最近，农民对警察分局和地主庄园极为突出的反攻行动，乃是土地革命的先声。

最近，农民运动蔓延到农村的广大阶层（中农、渔民，等等），使他们通过所谓请愿运动和其他途径卷入到斗争中来。

农民运动也逐渐地在军队里得到了响应。

虽然政府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尤其是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千方百计地在进行阻挠,但农民运动还是在向土地革命发展。然而,如果我们不开展相应的揭露运动,那么,社会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极其有害的影响,就会暂时阻碍或延缓这一过程的速度。我们在农民斗争中的任务是支持一切反地主和反政府的群众运动,协助从农民自身中选出农民斗争委员会,等等。目前,我们必须指导农民运动,使他们除了采取同地主和政府谈判这种斗争方式外,还能采取更加群众性的斗争方式。为此,我们也必须利用请愿运动,以便号召农民从和平的请愿运动转向革命斗争,即普遍拒交捐税、地租和欠款。我们应当设法建立由农民委员会领导的自卫队,以便对警察、地主和高利贷者进行有组织的反击,因为这些人要收回土地和没收农民的财产。必须组织群众性的农民运动,以便能够有组织地对抗地主和警察。如果这个运动具有群众性,那它将是土地革命的开端。把农民斗争同军队中的工作结合起来,也是很重要的。

党在农村的工作中无疑地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例如,在一个改良主义的农会里,70%的会员站到革命反对派的行列里。党在这个农会里实行正确的策略,并利用合法的条件来争取这个农会的其余成员。党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动员农民去进行反对战争、争取土地、反对苛捐杂税和债务的斗争。通过这个工作,党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引导农民沿着土地革命的道路前进。

现在,我来谈谈军队里的骚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谈。根据现有的资料,在满洲发生过11起士兵的暴动(鼓掌)。而上海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都很清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上海的消息比满洲的消息多一些。3月13日,在日本本土,一个团队的500名士兵哗变了,痛殴了军官。数日之后,司令部不得不遣散3000多名士兵(鼓掌)。我们在前线士兵中间有许多通信员。一

部分下级军官也参加了革命骚动。12月间,士官学校的一些学生因为进行共产主义活动而被逮捕,但这并没有压制住学生的活动。本年年初又发生了逮捕士官生的事件。毫无疑问,由于加强了党的工作,士兵中间的骚动加剧了。而且,由于国内局势普遍紧张、农民左倾、工人开展革命活动,士兵的骚动也就更为加剧了。军队中的工作条件,还在不断扩展。党应当加强自己的这一工作。

对华进行战争的日本政府和军阀,试图把这场战争扩大起来,而且主要是准备反苏战争。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这场战争将是一场“后方的战争”,因而在军队里进行工作并不太重要。必须在企业里和军队中进行工作,尤其是目前。当然,必须把这两个部门的工作协调起来。

现在我来谈谈罢工运动问题。

1929年,在日本发生罢工576起,1930年,发生806起,而1931年,已经将近1000起。由此可见,三年里,罢工的次数增加了50%。这就表明,工人阶级越来越积极地为争取自己的日常要求而斗争。下面是罢工的一些实例。

1930年8月,多贺化学工厂爆发了罢工。12月16日,由于反对解雇400名工人,又举行了罢工。12月17日、18日和19日三天,还举行了示威活动。12月22日,130名学生组织了游行示威。12月23日发生了与警察的冲突,妇女和儿童也参加了这次冲突;两名工人被打死,230人被逮捕,33人以组织暴动罪交由法庭审判。

10月28日在片中举行了罢工。12月12日爆发了第二次罢工,以反对解雇工人和减少工作时间。12月17日发生了与警察的冲突。虽然警察装备精良,但许多警察遭到了殴打。除工人以外,该地区的居民500人也参加了示威活动,有350人被捕。1月23日举行了有130人参加的团结罢工。1月24日罢工停止了,因为罢工被改良主义者出卖了,但是28日白天,又举行了游行示威。

9月14日,为了抗议企业停业,《东京赛璐珞》工厂举行了罢工。工人们会同居民以及其他工厂的罢工工人,一起行动起来。工人们占领了工厂,驱散了警察。11月4日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保卫苏联举行了群众大会。11月7日举行了工厂的游行示威,11月28日罢工以部分失败而告终。

务田的罢工开始于9月28日。工人们举行了示威活动,因而遭到普遍的逮捕。10月8日又举行了反战游行示威。

至于地下铁道的罢工,那它对于日本的罢工运动来说,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就地铁罢工发生的时间来看(在战争期间),就罢工的准备和采取的方式来看,以及就罢工的领导来看,它好像是一个宣告反战的小规模战斗。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罢工。

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罢工例子。在东京52家电影院里,4月间举行了职员罢工。职员有力地 and 警察展开了搏斗。警察遭到了反击。我们领导了一些这类的罢工。

由于要维护被动员入伍人员的利益,在其他几十个企业里举行了罢工(例如东京一鸟羽地下铁道,等等)。这里提出了发给被动员入伍的工人全部工资,以及从前线返回后重返工作岗位的要求。

由此可见,工人、特别是先进的工人,不顾反动势力的迫害,不顾沙文主义的蛊惑,表明决不能像世界大战时期那样再受欺骗了。在这些罢工中,工人们显示出空前的团结。在许多情况下都选出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表现了巨大的主动精神。在日本,没有固定的罢工基金。为了继续罢工,工人们得自己筹集经费。应当明确指出,这些政治罢工乃是反对战争的直接行动。

为什么能吸引许多工人参加政治罢工?为什么这种罢工不止一次地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在这种罢工中善于把被动员上前线的人的要求同工人的要求结合起来。罢工往往是由选出的委员会来领导,没有改良主义领袖参加,也不管他们的愿望如

何。差不多所有的罢工积极分子都被吸引来参与某个斗争领域的工作。

我们应当充分地、从这些结合着工人经济要求的政治罢工中吸取经验，因为反对战争、反对饥饿、反对资产阶级地主君主制的群众性政治罢工问题，目前已列入日程。

党和革命工会对工人的影响日益增长。最近在日本发生的罢工和骚动，表明工人已大为左转。在最近期间发生的罢工事件中，多半都涉及政治因素，例如罢工者直接占领企业，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举行政治示威，等等。

虽然工人运动有所高涨，党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还是要说，目前的罢工运动显然落后于国内的政治事件。

在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方面，罢工运动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罢工运动方面，党所面临的任务是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并使它与反饥饿、反恐怖、反战争的政治活动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的同志们应当领会列宁所说的话：

“工人阶级在政治罢工中表现出自己是全体人民中的一个先进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所起的作用，不单纯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个阶级的作用，而是领导阶级的作用，即领导者、先进者、领袖的作用……另一方面，若不提出经济要求，不直接地立即改善劳苦大众的状况，那他们就永远不会同意考虑国家的普遍‘进步’。群众卷入到运动中去，坚决果断地参加运动，高度地评价运动，发挥英雄主义、自我牺牲、坚定不移和忠于伟大事业的精神，就是为了要改善工作者的经济状况……”

若是工人们不了解这种“错综”情况的全部特殊性、全部意义、全部必要性、全部原则上的重要性，那就会产生无法挽救的错误。

我来谈谈失业工人运动的问题。我想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失业工人是怎样反对政府、反对市政厅、反对资本家的。

1月15日在大阪市的一个职业介绍所里，3000名失业工人获

得了临时性的社会工作,但在他们看到对他们散发的传单以后,乃宣布举行半天罢工。除其他要求外,他们还提出这样一项要求:“把拨给战争的款项分配给失业工人。”3月20日在东京,由于要驱逐一个穷人,上千个失业者和当地居民起来反对,因而制止了这一行动。6月5日,600名失业工人向市政厅提出了按期供应失业工人大米的要求。在东京郊区,失业工人举行了两次要求配给大米的游行示威。6月7日,在该市召开了群众大会。8月2日,在东京农业省大厦前,工人家属举行了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廉价出售大米。

我们也看到一些饥饿农民开展了争取配给大米的活动。去年年初,全日本约有3000名失业工人组织起来了。目前,仅在东京一地,参加失业工人组织的,就有11737名失业工人。

我顺便提一下党所领导的所谓大米运动。在日本,三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失业者,而且工人的工资相当于殖民地的水平,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群众死于饥饿,城市贫民日趋贫困,因此,这个运动具有全国的政治性质,它的矛头是指向资产阶级地主政府的。

党在这一运动中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即采取了向资本家、地主和政府的大米仓库,向市政厅和农业省等处大规模进军的方针。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犯过错误,就是除了正确的口号外,我们提出过反农民的口号:“出售大米八分钱一升。”

我们总的口号是:“政府免费配给大米。”随着必要的条件的成熟,我们把运动提升到更高的阶段——“强行占领资本家、地主和政府的仓库。”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毫无疑问,在工人中间,对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要求日益增长。“劳动俱乐部”(各种色彩的右翼工会官僚的统一战线)的成立,在工人中间激起了不满的情绪。社会法西斯统一党的成立,在社会民主派的工人中间更加增强了这一不满的情绪。

在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面，党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成立了由选举产生的罢工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加强了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影响，等等。但是，若是与改良主义的和无组织的工农的不满程度相比，这些成就还是微不足道的。

许多工人反对“劳动俱乐部”，反对新的社会民主党，反对自己的右翼改良主义领袖，他们仍然处于“左翼”领袖的影响之下。要知道，如果能够巧妙地运用策略，并根据具体纲领共同组织大规模的行动的话，如果能够发挥主动精神的话，我们过去和现在也许能够争取到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农民。在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右翼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人，何况其中有许多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如军火企业工人和海运工人。

第十一次全会以来，我们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党确实为争取群众的日常要求进行了斗争。2月间，我们进行了改选运动。在改选运动中，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例如，其中一个候选人是由32个工厂提出的。当时，党正在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并且已经强固到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的程度。虽然我们的候选人遭到逮捕，虽然社会民主派、法西斯势力和我们作对，但我们党还是获得了大约1.5万张选票。

整个说来，我们党在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中，能够领导群众的革命行动。在一个半月期间，我们党的机关报《赤旗报》的发行量，从3000份增加到将近1万份。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些支部。尽管遭到查封，这个小报从未停止发行。党员们出席各种群众大会。这说明党员的觉悟提高了。例如一个纺织女工出席了改良主义者的大会，她在会上谈了反战问题，谈了反对领袖的背叛行为。她因此而被逮捕，并被送交法庭审判。但是，党员们不顾镇压，继续进行斗争。

革命工会同样也发展起来。在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革命工会拥有5000名会员，到红色工会国际第八次会议召

开时,已拥有 1.5 万多名会员,即增加了两倍多(鼓掌),而现在还要多。

革命的反对派争取到农民组织中的大部分人,这个组织约有 3.5 万名会员,反对派争取到其全体会员的 70%。党在革命的文化团体中,也加强了自己的影响。

根据法务省的材料,最近三年里,日本法庭因参与共产党活动罪而判处 3204 人以不同期限的徒刑。尽管如此,共产党仍然在不断壮大。

这当然不是说,党内没有任何弱点。党内是有缺点的。最近期间,流露出一些社会民主派的倾向,这表现在反战斗争中的太平观念上,说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这种社会民主派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已渗入到我们的群众性组织中。

党的第二个弱点显然是工会中的工作不力。工会中的党团,有时还对抗党。这种显然不健康的现象,说明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工作者缺乏布尔什维克主义纪律。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在进行反战斗争的条件下,在进行群众性活动的情况下,党应当更加坚定地提出加强自己在工会中的影响问题。在党的机关里,至今还没有采用说服的方法,有时仍然采用命令的办法。我们面临的还有这样一项任务:加强工厂的支部,特别是要加强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因为在非法活动、战争和反动统治的情况下,建立坚强、积极的党的领导机构,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要着重指出,对于我们党来说,必须广泛地讨论共产国际西欧局今年 5 月公布的有关日本问题的提纲,以便按照这个提纲的精神来改造党的工作和组织。

我再说一遍,党不顾一切困难,为反对政府、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而斗争;尽管恐怖严酷,党还是有所成就。但是与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些任务相比,成就还是很不够的。最近,党将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性的革命任务。既然荒木将军说,在二三年内,日本必将

出现“非常紧张的局势”，那我们就要以胜利者的姿态来摆脱这个局势。

（摘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发言

(1932年9月12日)

王 明

奥卡诺同志在其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关于远东的战争和武装干涉的问题,并拟定了我们党当前的总任务。我只好主要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它一些兄弟党的反战工作做一分析。

在远东,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和反苏武装干涉危险的加强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来说并不是偶然的,或者说并不是意外的事情。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同帝国主义战争危险作斗争的措施的提纲中明确地指出了在东方爆发帝国主义战争和准备武装干涉苏联的必然性。

我们党从去年9月18日日本占领满洲时起对这一事变的估量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认为这一事变,总之,是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直接继续,是田中首相在关于满洲及蒙古政策的所谓1927年6月25日“奏折”中提出的大日本帝国计划实施的开始。

第二,这一事变并不像日本和中国的政客们所说的,仅仅是中、日之间由于“误会”而发生的日、中冲突。相反,这一事变是个国际事件,是国际帝国主义通过它从危机中寻求资本主义出路的途径;这一事变是东方战争的开始和反苏武装干涉日益增长的危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的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先头部队的

角色。

第三，这一事变不仅局限于日本入侵满洲，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这一战略计划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满洲和上海过渡到反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战争，过渡到武装干涉苏联和为争夺在太平洋上的霸权同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

第四，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加剧和经济危机的加深与扩大并不像第二国际和我们中国的机会主义分子所说，是在减少反苏武装干涉的危险。相反，恰恰是目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加剧使反苏战争的危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逼近和加强了。

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每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总是用眼睛盯住苏联：能不能以牺牲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为代价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某个矛盾，或资本主义所有的一切矛盾呢？因为苏联是革命的大本营，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它妨碍进行新战争，妨碍重新瓜分世界，妨碍统治广大的苏联市场，而这种市场，特别现在，因经济危机的缘故，对于资本家是非常必要的。”^①因此，关于远东的战争和武装干涉的问题是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无论是国联、非战公约、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和平主义空谈，还是中日之间的直接谈判丝毫都不能减少已经在远东开始了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国联、第二国际和美帝国主义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和反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和挑拨者。团结在自己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周围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只有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加强其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及反对战争危险与武装干涉的斗争，才能从危机中获得革命出路，即在全世界，或者至少在一些关键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与半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9版，第499页。

殖民地国家中取得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从而消除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危险。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国际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面临着非常重大而复杂的任务。

国际无产阶级的这些任务已经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同战争危险作斗争的措施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了。主要任务是为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本国政府而斗争,为了苏联的胜利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也已经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明确规定了。由于当时日本对山东的武装干涉,共产国际的提纲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员应该给自己提出进行斗争来反对日本武装干涉的问题,应该把民族革命抗日战争的斗争和为推翻蒋介石与国民党资产阶级及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

远东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我们的各支部在这一期间究竟做了什么,中国共产党又做了什么呢?同志们都知道,上海的工人和19路军的士兵今年年初在上海展开了反对日本入侵的民族革命抗战。上海的这一抗战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以前所有事变的基础上酝酿而成的。

一、从满洲事变到上海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千百万群众反帝运动的高涨。在满洲被占领期间,虽然以张学良为首的军阀根据和南京政府的协议公开地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但满洲的工人群众进行了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9月18日,当占领满洲开始的时候,沈阳兵工厂的工人宣布了罢工。在他们之后,苦力也宣布了罢工。全体罢工工人积极地参加了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巷战。此外,在满洲被占领之后,在上海、武汉、南京和北平等中国所有最大的城市中都举行了群众罢工和群众示威游行。这些罢工和示威游行不仅发生在那些以前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的地区,例如在上

海等地，而且还发生在那些 1927 年革命之后长时期没有革命群众运动的地区，例如在广州、武汉和北平等地。

这一运动的主要特点不仅是它的群众性，而且这一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群众一开始就提出了武装斗争、反对日本占领满洲和为统一中国而斗争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从满洲事变一开始就提出了下列口号：“武装的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保卫中国的独立，为了国家的解放和统一而斗争”，“武装人民，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党向广大群众指出，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胜利进行这一战争的必要条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始终不渝领导反帝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政府，而中国红军是反帝战争的先锋队。

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的主要政党南京国民党赞成张学良的最可耻的投降立场，公然提出了“不抵抗”和“安内”的纲领，并同时企图使群众从反对日本占领军的革命斗争转向等待“人道的”国联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当广大群众开始积极参加抗日运动的时候，南京国民党提出了“人民应当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和“抵制日货”两个口号，企图限制和缩小运动，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以便在适当的时机扑灭运动。1931 年 9 月 26 日，在上海这个中国城市的南部举行了由国民党召集的五千人的集会，其目的是在群众中制造关于国民党“革命”的幻想。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集会变成了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的示威游示，通过了关于保卫苏维埃、红军和苏联的若干决议和口号。于是，国民党不得不摘下假面具，被迫露出真面目，不再玩弄“对日宣战”口号的把戏，开始对所有反帝群众组织实行疯狂的恐怖手段，直至禁止抵制日货运动。但与此同时，国民党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口号：“中国的一切社会力量联合起来，把国家从民族灾难中拯救出来”和“必须准备抵抗外来的敌人，但首先应当消除赤色危

险。”与此同时，国民党加强了其关于“国联和美国支援中国”的鼓动和宣传。

国民党粤系和所谓“改组派”及其它军阀派系(例如吴佩孚、段祺瑞等派系)的立场基本上与南京派系的立场没有任何区别。由于它们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常常是一派表明自己对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的“反对派立场”，而另一派则主张“同日本直接谈判”，即承认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占领和要求。

陈独秀托派集团曾扮演过和正在扮演着国民党及帝国主义者的直接代理人的角色。中国托派的著名领袖之一彭述之在自己的机关刊物《火星》第四期上曾写道：“当前抗日运动危机的主要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式的领导，因此，反对这一领导的斗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难道这不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叫喊的所谓现在中国的主要危险是赤化，而不是日本和其它任何强国，因此应当首先消灭“共匪”这一观点的重复吗？在大规模的抗日群众运动中，陈独秀托派分子再一次地暴露了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

在迅速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运动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这一运动的阶级分化过程很快表现了出来。经过了1925—1927年大革命锻炼和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的群众很快和很容易就接受了我们的革命口号和我们的策略，并且不仅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斗争，而且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国民党的斗争。这些群众中的最先进阶层工人和革命青年很快就在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中华苏维埃政府、保卫红军和苏联的口号下行动起来。

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帝集会、游行和罢工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9月26日，在上海举行了7万人的大规模集会和游行；10月10日，举行了有8万多工人和学生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集会。10月4日，举行了数千名学生的游行，警察在游行期间挨了痛打，警察局大楼遭到了破坏。10月初，

5000 名学生捣毁了北站，痛打了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和市政府成员，迫使站长提供给他们一列火车到南京去组织游行。从 9 月 18 日到 10 月 10 日一段时间里，成千上万名工人和学生曾经三次包围了位于戈登路（在英租界内）的警察局所在地，要求释放被捕的斗争者，而且每次都取得了胜利。在上海，每天都有反帝集会。墙上到处都张贴着号召进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支持苏联、支持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标语与传单。12 月 28 日，在南京聚集了 10 万多名从上海、北平、济南、青岛和武汉等地前来游行的学生。在这些学生中，为首的是北平小组的学生，他们是南京一切游行的先锋队。这些学生同工人和贫民一起烧毁了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社大楼，捣毁了南京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的大楼，解除了南京卫戍区和警察局的武装。蒋介石动员了 4 万名士兵，夜里用机枪和大炮包围了学生宿舍，并要求他们立即撤出南京。学生们表现出了崇高的英雄主义；他们用桌椅板凳、刀子和从卫戍区士兵那里缴来的不多的枪支武装起来，顽强地回击了蒋介石。巷战持续了一整夜，结果 60—80 人被打死和 183 人被捕，其中多人受伤。这样，蒋介石才得以从城市中清除了游行的学生。这次战斗是由我们年轻的共青团员、21 岁的杨同志领导的，他在战斗中被打死了。

回到上海以后，学生们在每一条街的墙上都张贴了大字报，向上海的工人和劳动者通告南京血腥镇压的情况，痛斥帝国主义的工具和人民的死敌国民党，而且号召工人罢工，并和学生一起组织示威游行，反对南京的刽子手和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英雄。工人们以群众集会、罢工和游行回答了学生们的这一号召。工人和学生们推选了自己的代表，到南京要求国民党交还死者的尸体。其中许多尸体已经被抛进了河里，但在群众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向代表们交出了 16 具尸体，其中就有他们的英雄领袖杨同志的尸体。死者的尸体被运到了上海。工人、贫民和学生中间爆发了巨

大的怒潮。1932年1月17日,在上海,工人和学生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游行者们抬着杨同志的尸体。游行是沿着英国和法国租界的所有主要街道进行的。尽管英国、美国、日本和法国警察多次企图驱散游行队伍和实行逮捕,但游行者们进行坚决反击,每次都从警察手里把被捕者夺了回来。印度警察出现的时候,群众唱起了《国际歌》;游行者们高呼:“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中印劳动者联盟万岁!”“打倒英帝国主义!”印度人立即后退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高喊:“中国人——英雄!”“我们不动你们!”来到上海的中国地段,人群包围了市政府,逮捕了市长和其他官员,当即组织了对于市政府和警察局等部门的国民党负责人这些人民的叛徒和刽子手的革命人民法庭,最后痛打了他们,并烧毁了市政府和国民党市党部的大楼。

为什么共产党胜利地组织了所有这些罢工、集会和游行呢?我们在这一时期为准备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具体做了些什么呢?

布尔什维克党不能只局限于制定正确的策略和正确的口号。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共产党在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的基础上首先开展了发动群众的大量宣传鼓动工作。除了出版专门的反帝报纸以外,党出版了(从满洲被占领时起)一份甚至文化程度很低的群众也能看懂、因而在劳动居民中间得到广泛普及的带插图的杂志。党在自己的鼓动和宣传中非常注意揭露在小资产阶级中间特别流行的、似乎某一国民党将领有能力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幻想。党不断地揭露了国民党的类似口号,如“在反对外来敌人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内部和平是同外部敌人斗争的条件”,等等。另外还专门挑选出了经常性的鼓动小组和在街道、学校、工厂与兵营等处散发传单等的小组,等等。

这一积极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争取群众倒向共产党方面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此外,共产党在工人、学生、贫民和士兵中间进行了广泛的组

织工作。例如，在我们的领导下，上海成立了“人民抗日协会”，在其中登记注册的有 45—50 个组织的 2 万名会员，而且，它同时既是上海各工人、学生和士兵组织合法的，也是半合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的组织中心。在上海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中，我们的影响占有绝对优势。我们在很多工厂中建立了义勇队和“抗日协会”的分会；在 19 路军的士兵中间，我们建立了党支部和抗日同盟，等等。

这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是结合合法与非法手段进行的。不利用合法与半合法的条件就不可能进行这一广泛的群众工作。

我们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弱点是在工人和士兵群众中组织工作做得不够。

全国进行着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以人民的武装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中国去”成了广大群众的口号。

这一切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影响的巨大增长和国民党的日益崩溃。

他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当群众中那些没有经过 1925—1927 年大革命锻炼和初次参加群众反帝运动的阶层政治上不够觉悟和成熟的时候，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别是其“改组派”和其它假反对派、首先是所谓中国青年党的欺骗宣传的影响。这个党善于通过抗日和反对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很大一部分学生和小资产阶级施加影响。一部分群众还存着这样的幻想，认为蒋介石和汪精卫既然是中国人，那么所有的中国人共同斗争反对外来的敌人不是更好吗？等等。

但是，这一现象不应当只用客观原因来解释。还必须注意到我们的缺点。如果我们能够自下而上地、很好地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那么，这些阶层的群众——至少也是其大部——是会被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的。但是，我们当时忘记了“我们在这一工作中的

任何延缓,都会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因为新的水流急于寻找出路,如果它们找不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河床,就必然会冲入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河床。”^①列宁写于1905年的这些话能够说明我们在争取劳动群众新阶层的斗争中的弱点。

二、上海抗战

在日本军队占领满洲和在华北顺利推进之后,希望实现其“大日本帝国”计划的日本帝国主义决定继续进攻上海。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候的战略目标是:1. 在上海夺取巩固的军事阵地——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其对满洲和华北的占领,另一方面是为了顺利准备继续进攻华中和华南,以便消灭那里的红军和苏维埃政权;2. 在中国和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上海取得辉煌的军事胜利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外敌人面前炫耀其军事实力的实际证明;3. 在上海的巨大胜利是在其本国提高沙文主义情绪的巨大推动力,这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反苏冒险和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激战;4. 在中国,首先是在反帝运动的中心和先锋队——上海把日益发展的抗日运动镇压下去。

在上海抗战以前,抗日群众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以其无产阶级中心上海为首的全国。群众已经准备好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

1932年1月8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有沪西区日本纺织厂的4—5万名男女工人参加的总罢工。19路军的士兵,特别是它的炮兵部队,还在十月份就违抗国民党和自己长官的命令,不止一次地积极参加了人民的抗日运动;曾经多次发生了士兵和闸北区的工人与贫民一起手持武器反对禁止张挂和散发反帝传单及小册子的警察的事件。在国民党认为是最可靠的南京军队中,所

① 列宁:《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列宁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149页。

谓宪兵学校的 700 名学员上街参加了游行，并在兵营中组织了集会，会上通过了关于支持中国共产党、红军和苏联的决议。

我们党坚决采取组织民族革命武装抗战的方针，在下列一些口号的基础上开展了自己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 “工人、士兵、劳动者和革命的学生们，武装起来保卫上海！”

2. “所有的工人和学生实行政治总罢工、总罢课，反对日本占领上海！”

3. “工人和市民们！组织义勇队，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自己从龙华兵工厂和军需库夺取武器！”

4. “工人和市民们，组织抗日联盟，没收一切日货，以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罢工工人，工人和革命士兵用武力没收一切日方企业！”

5. “革命的士兵万岁！打倒民族的耻辱国民党！革命的士兵们，建立士兵委员会，拒不服从国民党和你们的长官关于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命令！和人民结盟！同工人和市民们一起武装保卫上海！”

党在中央领导下采取了在结合反帝口号与日常迫切的经济要求和先在某些企业，而且首先是在日本企业中开展罢工的基础上组织政治总罢工的方针。党计划组织以工人为核心和以共产党员为首的群众武装义勇队。

党还制订了把抗日的武装抗战和在一切有革命武装力量的地方的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结合起来的计划。党考虑到，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些城市中建立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革命委员会，那么在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地点必定会成立临时革命人民政府，它会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推翻国民党，并且会承担起组织和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

上海抗战的实际进程完全证明了我们的政治方针和策略口号是正确的。

据2月8日《大公报》的消息,1月28日午间1点,日本军队开始了向上海北部中国地段进攻,而闸北的工人——电力和电话公司的工人、铁路工人和丝厂女工——立即武装抵抗了日本军队。19路军士兵违抗蒋介石关于立即撤出闸北的命令,在工人之后也参加了战斗。以商会为代表的上海资产阶级派了自己的代表向蔡廷锴建议立即制止同日军的战斗,并通过外交途径平息冲突。蔡廷锴表示完全同意,声明他将立刻命令自己的士兵停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蔡廷锴马上同日本领事馆和日军司令部开始了关于暂时停战的谈判。

但是,19路军士兵、工人、贫民和革命的学生不顾国民党、军事长官和资产阶级的愿望,继续积极开展其革命抗战,而且很快就在前线与后方使广大群众以义勇队、敢死队、侦察队、运输队、通信队和“红十字会”等形式开始参加到军事行动中来。在第一个星期里,日军接连遭到失败。如果他们的后方没有公共租界地,如果没有国民党将领的干涉,那么他们会被中国军队击退到黄浦江里去。

日本陆、海、空三军和武装的中国工人及士兵之间的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占有全部军事优势:日本士兵超过6万,而中国战士的数量不如他们多。至于武器装备,则日军有200多门重炮,中国军队只有150门;日军有150架飞机,而中国军队只有50架。日本军队在公共租界地有其巩固的后方;在他们的后方不仅有日本的后备军,而且有英国、美国、法国和其它强盗的武装力量。日本军队用不着担心中国军队进攻日军在租界地的阵地。

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军队不能进入租界地,不能轰炸日军的基地和后方;在这同时,19路军不得不时刻注意自己的后方,因为蒋介石派了三个旅到上海解除19路军的武装。但是,中国军队在这种力量对比下还是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一个多月。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是中国人民

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更不用说日军在战斗中屡次遭到过局部的重大失败。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反帝群众运动的支持，19路军连几天也支持不住。

类似蒋介石、汪精卫和蔡廷锴这些国民党叛徒，在他们出卖上海抗战之后无耻地宣扬他们是上海抗战的领导和组织者。遗憾的是在一些共产党员中也存在着这样的看法，认为“上海抗战是国民党政策的继续”，因此，这些同志就认为上海抗战的性质是反动的，并从而企图指责我们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它采取了积极参加上海抗战的策略，并给自己提出了争取19路军士兵和武装的群众组织服从自己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任务。

究竟谁是上海抗战的组织者呢？

这不是蒋介石集团，因为他命令士兵们不要抵抗，并且后来用大炮和机枪迫使19路军士兵从闸北前线撤退。

这不是“改组派”，因为汪精卫向日本记者表示：“现在中国人民的主要危险不是日本，而是赤匪；国民党遵照孙中山的遗嘱，永远保持中日之间的友谊。”

这不是叶甫根尼·陈和国民党的粤系，因为粤系在满洲事变以前就派陈到日本去，目的就是要在日中之间实行亲善的政策。关于占领满洲的问题，日本人事先就和粤系达成了协议。因此，在满洲事变以后，中国人民群众为国民党的叛变行为愤怒地指责孙科、胡汉民、叶甫根尼·陈、陈济棠和粤系其他头子同意了日本军队对满洲的入侵。工人和学生们在广州痛打了叶甫根尼·陈，同时，南京的工人和学生们在南京痛打了王正廷。

蒋光鼐和蔡廷锴将军或者军阀投机分子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上海抗战的组织者吗？不是。他们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是在士兵和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参战的，而且一直在寻找暂时停战或投降的机会。

究竟谁是上海抗战的真正组织者呢？上海抗战主要是在全中国广大群众反帝高潮的背景下进行的，并且是中国人民多年来的民族解放斗争政策的必然继续。它的特点主要是自发性。上海抗战的真正组织者是积极参加了这次战争的上海工人。《大公报》说：“工人们在租界地和中国地段的罢工引起了极大的民族热情。所有这些工人不顾一切地帮助 19 路军——他们完成后方的工作，坚决回击日本浪人。”其次还说：“上海工人组织起上海工人罢工委员会，宣布了罢工。”日本报纸报道说，妇女们积极地参加了战斗（闸北区有很多丝厂，在这一区里有 6 万名女工）。一份群众的抗日报纸登载了其记者和 19 路军一名士兵的谈话，其中谈到：“该区的穷人没有撤离，他们帮助士兵们搬运东西、做饭。群众和军队在一起。富人还在 25 日就跑了……只有我们和穷人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除工人外，学生义勇队也积极地参加了战斗。在日军的后方吴淞口附近，开展了农民游击战。

我们党在上海抗战期间究竟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呢？

1. 在动员工人参加抗战方面，我们做了以下工作：在所有的日本企业中组织总罢工——共有 6 万左右工人参加；组织工人义勇队，其中被派往前线的有 500 人左右；为罢工工人开办公共食堂，并分给他们大米；建立由 38 个企业的代表选举产生的、80 人的上海罢工总委员会以及建立上海各区的罢工委员会；召开各企业的工人代表大会；开展为 19 路军士兵募捐、募粮、募集蔬菜、被子、药品和其它物品的运动；组织邮电、交通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支援前线；在企业中组织“红军之友会”等等。

2. 党在士兵当中的工作方面做了以下工作：建立有 150—200 人参加的士兵委员会；派遣男女工人和男女学生宣传队上前线与士兵谈话并帮助他们；在前线和后方组织“抗日协会”的士兵分会；派遣学生团到前线与后方帮助办墙报和读报等等；派遣各群众组织（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抗日联盟、工会和学生会，等等）的代表

携带慰劳品、现款、旗帜、革命传单和小册子等等奔赴前线；通过士兵委员会组织群众性的士兵集会和游行等等。

3. 党在学生当中的工作方面做了以下工作：组织各种学生团开展前线和后方的工作；组织义勇队（共有 300 人被派往前线）；组织学生团，并派遣他们到上海附近的农村，吸引农民参加反帝斗争。

最后，党在组织贫民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我们党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的：到处宣布戒严，始终充满了白色恐怖。19 路军在苏州河岸上的一个连最后一个交出了自己的阵地；它顽强抵抗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连里有一个以共产党员宋小宝为首的工人小组，他以自己的英雄主义不止一次地及时防止了撤退。直到宋小宝同志被与日本兵站在一起的国民党军官击毙以后，这个连才交出了阵地和撤退。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是如何协助上海抗战的呢？在所有的苏区召开了抗议日本占领上海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及支持上海工人和 19 路军士兵的集会。为了援助上海的罢工工人和战斗中的士兵，到处都进行了募捐运动；仅一个中央苏区为罢工工人开办食堂就给上海寄去了 1 万元。

中央苏维埃政府在其发表的宣言中公开声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坚决抗议日本占领上海和满洲。苏维埃政府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进行武装斗争的英勇的上海工人和 19 路军士兵致以热烈的敬礼。苏维埃政府准备动员它指挥的 40 万红军和武装赤卫队、青年近卫军及游击队参加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如果不是国民党把我们四面围住，那么我们的红军会早已挺进上海，援助我们英勇的兄弟们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上海工人在上海抗战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并充分发扬了自己的无产阶级英雄主义。

上海罢工总委员会发表了带有如下要求的宣言：

1. 武装人民，把日本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军队从中国赶出去！
2. 武装人民，推翻出卖中国民族利益和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组织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人民政府。
3. 取消限制工人自由的一切法令，要求劳动保护，要求结社、集会、出版、罢工的充分自由和释放一切被捕者，恢复一切被禁工会的活动。

上海罢工的抗日和反帝政治要求是和上海工人最重要的一些经济要求相联系着的。罢工总委员会提出了全体罢工者的下列共同的经济要求：

1. 在数额相当于四天工资的月奖中不准有任何扣除。在重新录用时，支付每个男女工人一笔特别款项。
2. 支付罢工期间的全部工资。星期日和节日上班付双倍工资。
3. 给那些每月工资二十元以下的工人提高工资六元，其他人提高四元。
4. 不准以任何理由解雇工人，并重新录用所有被解雇的工人。
5. 女工例假期间休息三天，产前、产后各休假四星期，其工资照付。
6. 实行成年工人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和童工五小时工作制。
7. 从工厂中撤出部队和解除工厂职员的武装。

下面我们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它们明显地证明了上海工人在抗战期间的英雄主义。

1. 吴淞兵工厂的工人为 19 路军士兵生产的炮弹、子弹和其它装备比平常增加了一部。他们领导农民，并积极参与了武装保卫吴淞口的战斗，日军因而遭到了很大的伤亡，整整两星期未能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只是在中国军队实行全部撤退和保卫它的全部

士兵和工人在肉体上被消灭之后，日本人才占领了吴淞口。

2. 有个姓胡的工人是个司机，他开始拒绝工作，后来由于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迫，他才同意，就是他把军用卡车直接开进了长江，而没有把它开往前线，就这样，他把满载手榴弹、炸弹、炮弹和六个日本兵的卡车弄沉了，自己也牺牲了。外国报纸和所有的中国报纸不得不称这个工人为民族英雄。

3. 电话工人们甚至在冒着被判处死刑的威胁下，不仅公开拒绝为日本人同前线建立电话联系而工作，而且在日本人的前线和后方英勇地破坏了许多军用电话线。

4. 5万名纺织工人不仅举行了反对占领的抗议罢工，而且其中一部分人还在前线组织了武装义勇队，同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同时，在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国民党和上海的中国资产阶级无耻地投降帝国主义之后，罢工的纺织工人不顾日本、英国和中国警察不断的武装暴力和极度的饥饿，在上海抗战之后三个月内继续自己的罢工，而且尽管有巨大的失业，却没有发生一起破坏罢工的事件。这一英雄主义的范例再一次向所有人证明了只有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民族解放的唯一领袖，中国的反帝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

尽管工人和士兵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上海抗战还是遭到了失败。这一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 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的公开投降。他们派军队解除了19路军士兵和工人的武装；虽然其中的一部分被派来的士兵违抗了蒋介石的命令，倒向了19路军士兵方面并和日本人进行了搏斗，但其他部分仍然是19路军后方的直接威胁。蔡廷锴和其他一些反动将领正是在这些蒋介石部队的帮助下轰炸了后方，并强迫自己的部队撤退。另一方面，他们千方百计反对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他们在浦东、吴淞、杨树浦和闸北解除了工人义勇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毙了他们的积极分子及士兵委员会的领袖们，等

等。革命的工人和士兵本来应当要求撤换 19 路军的指挥人员,而代之以选举产生的革命的士兵委员会和政委。

2. 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虽然帝国主义者之间,首先是美国、日本和英国之间的矛盾由于日本进攻上海而尖锐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帝国主义者面对武装的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还是明白了这样的事实,即上海抗战对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来说起着革命化的作用。因此,英国、法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千方百计企图靠牺牲 19 路军和上海工人为代价,来达到最快地扑灭上海抗战的目的。帝国主义者们在进行所谓“暂时停战协商”的同时,用自己的军队支持日本来威胁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军队不撤退的话。在上海抗战期间,英国、法国、美国、而且还有中国的警察和宪兵以武力为中国劳动居民援助自己在前线的兄弟设置了重重障碍。

3. 士兵委员会不够强大,还不足以从反动的长官手里夺取军事领导权。

4. 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相比,“抗日协会”过于软弱,因此没有建立一切革命力量——工人、士兵、贫民和学生——的统一的政治和组织核心。

5. 上海最广大的工人和贫民群众及郊区的农民没有被动员和吸收参加前线与后方的抗战。

6. 其它城市和乡村、首先是邻近地区的工人、农民、士兵、贫民和学生没有给上海抗战以应有的援助。

7. 最后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工作中的错误和弱点。虽然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地方的党、共青团和工会组织在实际执行这一路线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极大的错误,并暴露出了许多弱点。其中最主要的一些错误和弱点是:

(1)在反帝斗争中不善于自下而上地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在这方面犯了右的错误,其表现是把党中央关于“工人、士兵、农民

和贫民及革命学生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变成了“工人、农民、士兵、商人和学生联盟”的口号，表现在企图和国民党“改组派”与某些党组织中的托洛茨基主义取消派结成上层集团。同时也有“左”的错误，其表现在于对最广大的群众运动所采取的宗派主义态度，缺乏无产阶级民主和罢工委员会及其它群众组织中的发号施令与委派干部的作法。

(2)不善于把群众的经济要求同政治口号结合起来，不善于把企业中的斗争同街道上与前线的斗争结合起来，不善于结合各阶层的不同斗争方法与形式和在共同的斗争中将他们团结起来。

(3)不善于用群众了解的具体事实及时揭露国民党和其他敌人的欺骗宣传与各种手腕，使我们的要求及斗争方法同这些手腕形成鲜明对照。

(4)缺乏在我们领导下的广泛的工人组织。特别是简直是犯罪，是在当时的中华全国劳联共产党团领导下的上海工会工作人员犯下了一系列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些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就否认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可能性，并全盘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在这种政治方针的基础上公然阴谋抵制总罢工的口号。当党中央谴责了他们之后，这些机会主义者在“同时举行上海总罢工”的口号掩饰下拒绝在某些企业中组织局部罢工，而当罢工以后在许多企业、特别是日本企业中罢工终于开始的时候，他们则暗中破坏这些罢工，而且不采取任何步骤进行总罢工。在上海，他们甚至未曾把这一问题提交工会组织讨论，并且反对中央关于总罢工的口号。他们非但不武装工人，反而建议工人义勇队到国民党机关登记，并向他们交出武器。当女工们已经推选自己的代表准备参加罢工委员会工作的时候，这些机会主义者不是去动员占纺织和其它轻工业部门工人90%的妇女和青年参加，而是宣称没有妇女的合适工作。罢工委员会没有同青年组织建立任何联系。当工人们建议在企业中与“抗日协会”同时

建立工会和罢工委员会的时候,这些工会的机会主义者反对这样做,并且建议工人只建立“抗日协会”的组织。

正因此如此,虽然千百万群众的反帝运动出现了巨大高潮,虽然上海工人和 19 路军士兵表现出了绝无仅有的英雄主义和热情,虽然我们党在上海和中国的其它地方做了非常大量的准备工作,虽然我们党最积极地参加了上海抗战,但我们终归未能夺取上海抗战的领导权,而国民党却通过其将领把抗战的军事领导权掌握到了自己的手里。我们未能向上海抗战输送大量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劳动者共同的领导组织(革命委员会)。

但与此同时,我们完全可以有权断言,如果没有我们领导和参加上海及全中国的革命斗争,没有我们在 19 路军士兵中间的工作,没有我们组织上海的日本企业中的工人总罢工,没有我们党在民族革命战争问题上的正确的政治方针,没有在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贯彻这一方针的实际工作,最后,没有我们英勇的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胜利斗争的革命化的巨大影响,就不会有上海的武装抗战。

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的叛变而造成的上海抗战的失败丝毫也不说明它有利于这样的机会主义观点,即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总之注定要失败,因此,党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路线似乎是错误的观点。相反,上海的斗争十分明确地证明了,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取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上海的斗争特别明显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是绝对正确的,根据这一方针,推翻国民党政权是胜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和前提,而且只有苏维埃政府及其红军才是能够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国民党和其他军阀与官僚的枷锁、并获得国家独立和统一的唯一力量。

上海事变完全证明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是正确的,即只有苏

维埃才能把中国从贫困与崩溃中最终拯救出来。

上海抗战的失败无疑是中国反帝斗争局部和暂时的失利。但绝对不容许否定上海抗战的世界性历史意义和藐视其丰富的策略上的经验教训。劳动群众在持续 40 多天的时间里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了顽强抵抗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意义，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上海抗战向全世界表明，帝国主义可以不受制裁地掠夺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证明斯大林同志的预测是正确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说明外国帝国主义者们的鬼蜮伎俩是注定要失败的。

2. 上海抗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计划，使它未能占领上海，被迫撤军回国。上海抗战不仅未能炫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实力，反而在全世界面前破坏了日本的军威。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及其红军的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取代了直接进攻中国苏区的准备工作。取代镇压满洲抗日运动和加紧准备反苏军事冒险的是在满洲开展了一个广泛的群众抗日游击战争，这给日本准备和进行反苏武装干涉制造了一系列新的麻烦。上海抗战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而且也有力地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军事和武装干涉计划。

3. 上海抗战直接提高了中国红军的战斗威望。不久前在和中国红军的战斗中还遭到重大失败的 19 路军，现在在上海工人、城市贫民和革命学生的支持下，已经可以同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持久战，并屡次迫使日军撤退，关于这一点，全体中国人民都是见证人。在这之后，人人都明白了，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未必能战胜共产党领导的、由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组成的、得到几千万乃至数亿中国劳动者支持和全世界一切国家与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同情和援助的中国红军。

4. 上海抗战增强和巩固了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被

压迫民族对于其伟大的革命解放斗争取得胜利结局的希望。它再一次证明了列宁的遗训是正确的,他还在1919年就十分明确地谈到:

“我想,红军所作的一切,它所进行的斗争和它取得胜利的历史,对东部各族人民会有巨大的世界意义。它将向东部各族人民表明:尽管这些民族非常弱小,尽管欧洲压迫者在斗争中运用了最优良的武器和战术,似乎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一旦把千百万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真正唤醒,就会有极大的本领,就能创造奇迹。目前东部各族人民的解放是完全可能实现的,这不仅从国际革命的远景看来是如此,从苏维埃共和国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军事进攻以后在亚洲、西伯利亚直接作战的经验看来也是如此。”^①

上海抗战再一次地推翻了罗莎·卢森保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民族革命战争的理论。它还驳倒了以考茨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关于工人阶级在现在的军事技术条件下进行武装起义不可能胜利和巷战没有希望的理论。上海抗战因而提高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准备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上海抗战在策略上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共产党来说是十分丰富、宝贵和有益的。其中一些主要的经验教训是:

1. 无产阶级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唯一领袖。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先锋队的任务,它必须非常积极地采取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而且该国革命运动的某一历史发展阶段将决定统一战线的阶级内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在1927年初转向了反革命方面;目前,在中国关于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是动员工人、农民、士兵、贫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

^① 列宁1919年11月22日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4卷,第544页。着重号是我加的。——王明

问题。不建立和巩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 为了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和成为运动的骨干，无产阶级应当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群众力量。没有无产阶级的骨干和共产党的领导，胜利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是不可想象的。

3. 在中国，争取敌军和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上海抗战和满洲的士兵群众大规模倒向红军及游击队方面明显地证明了，在一定的条件和我们在敌军士兵中加强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完全有可能把军阀的军队变为同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革命军队。

4. 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资产阶级在民族战争中起着反革命的作用。但是应当注意到，资产阶级在公开实行背叛的同时，还采取了表面上参加反帝斗争的方法，其目的在于选择适当的时机，以便从内部出卖斗争，并且同帝国主义者一起把它镇压下去。闸北的蔡廷锴和满洲的马占山及其他人曾经起到和正在起着的恰恰是这种帝国主义走狗的作用。因此，及时和全面揭露资产阶级的各种叛卖形式是共产党在组织和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事业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5. 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在帝国主义者军队中进行工作具有巨大的意义。倒向革命方面或者是士兵的哗变虽然在开始时其参加者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对支持殖民地革命人民的斗争却起着巨大的作用。由于日共和中共的共同工作，以及由于日本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在满洲和日本的日本军队中发生了多次士兵哗变和部分日本士兵倒向中国人民方面的事件。这一事实对整个共产国际是有教育意义的。

6. 反帝群众革命斗争是我们保卫苏联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等口号的具体实施。中国共产党通过最积极地参加上海抗战和满

洲的游击战争,不仅是在正确地完成着其民族革命的任务,而且也是在正确地完成着其国际主义的任务。

三、关于满洲的抗日游击战争

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所谓“上海停战”的主要后果之一是日本帝国主义从上海召回其部队,将它们调到了满洲,以便彻底镇压那里的抗日游击运动和加紧准备反对苏联的战争,而国民党获得了动员自己所有的军队同中国红军和苏维埃以及反帝群众革命运动进行斗争的机会。

但实际结果如何呢?关于中国红军的胜利,我已经就议事日程的第一项在自己的发言中谈到了。下面我仅就满洲的局势稍微谈一谈。

如果说满洲的游击运动在上海抗战前主要是在某些将领领导下的东北军旧部的支持和没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情况下发展的,那么在上海抗战之后以及在其影响下,广大工农群众已经开始参加到游击战争中来。目前的满洲游击运动的群众性,可以用以下一些虽然还远不充分的事实加以说明。

游击队正在频繁地进攻向长春、沈阳、齐齐哈尔和哈尔滨这样一些重要地点,它们已经两次进入沈阳,解除了那里警察的武装,烧毁了飞机、军火库和发电站。尽管有强大的武装警卫,但日本帝国主义至今未能整顿好南满铁路的交通。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政府地位不稳还可以用这样一些事实来证明,如满洲的军队与警察不断大规模地倒向游击队方面和农民对于日本及满洲政府的抵制,其表现是拒绝播种或收获高粱。满洲现在有一半左右的耕地尚未播种;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缩减了40%至60%。

在目前的国际和中国国内条件下,把满洲的3000万劳动者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满洲的命运取决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劳动人民之间的斗争,而且仅仅取决于这一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为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满洲赶出去,使满洲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而进行毫不妥协和坚持不懈的斗争。

党应当注意到广大劳动群众已经开始参加到游击运动中来这一情况(例如在王德林的队伍中,5.5万名游击队员中的80%是农民、挖煤工人和铁路工人,等等),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现有的游击队和普遍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中夺取领导权。

当前,我们在满洲的主要策略方针是灵活和正确地采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目的在于夺取、巩固与扩大对于统一战线的无产阶级领导和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的军阀、官僚和保皇党,以便在斗争过程中为进一步发展满洲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打下基础和动员满洲的劳动群众参加苏维埃革命。

奥卡诺同志在其报告中十分正确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满洲的任务。对那些能够动员最广大群众坚决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满洲走狗的斗争和能够发展反帝革命及在满洲准备土地革命的口号,我们党应该进行广泛的宣传。当前的类似口号有: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满洲走狗的土地和财产、全面抵制日本和伪满洲国政府、拒绝交纳各种苛捐杂税、组织抗日武装义勇队、组织农民委员会和建立选举产生的人民政府,等等。

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统一而组织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工作在上海抗战以后不仅未从议事日程上取消,而相反正作为一个重大的实际任务不仅摆在满洲,而且摆在全中国面前。

四、关于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反战工作的落后现象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我们的兄弟党,首先是各帝国主义大国中

的兄弟党的反战工作和斗争(日本共产党除外,它不顾极端的白色恐怖,按照布尔什维克方式同中国共产党在满洲和上海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在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中间曾经和正在进行着出色的反战斗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落后于革命斗争的客观可能性和要求。一些共产党在反战工作中曾经取得过一些成绩,关于这些,奥卡诺同志已经指出过,但整个说来,遗憾的是我们各兄弟党反战工作的状况至今还没有超出(或者最多不过是非常少地超出了)《共产国际》杂志1932年2月号上所作的评价:“欧洲共产党当前的反帝斗争仅仅可以归结为通过各种决议,最多不过是举行集会和相对来说人数不算很多的游行。”

我们这些支部在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这一最重要方面如此落后,其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党还年轻和人数不多吗?不,不是。且不说德国共产党,难道日本共产党比法国、英国和美国共产党就较为成熟和人数众多吗?是因为这些国家中的条件太艰苦,恐怖太严酷吗?不,不是因为这个。难道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苏武装干涉的斗争在中国和日本遇到的困难就少些吗?

难道这不是因为在我们的某些支部中,还存在着像在法国共产党内发生过的对于战争危险估计不足的倾向而发生的吗?难道不是因为在一些共产党员中,还缺乏布尔什维克的热情和积极性吗?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武装干涉斗争方面的落后现象只能认为是社会民主党在反战斗争中的传统。因此,迅速克服这方面的重大缺点是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最迫切的任务。当然,我们不仅应当在这方面划清界限,而且应当同安贝尔·德罗同志的观点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认为共产党在最近的危机年代里没有采取任何前进的步骤。然而,事实却说明完全相反。中共、德共、波共、日共和捷共等共产党,在十一次全会以后一段时期的工作总结,实际上完全推翻了对共产国际的这一诽谤。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说过：“第一，……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将从进一步法西斯化中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为此就利用包括社会民主党也在内的一切反动势力。第二，……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和武装干涉中去）寻找出路。最后，……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①

在当前资本主义的稳定时期行将结束的情况下，斯大林同志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为从危机中寻找资本主义或者革命出路而斗争的指示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相信，在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列宁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受剥削的群众将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苏武装干涉、反对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的胜利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原载《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速记记录）》第3卷，第15—26页。任震寰译，王继飞校）

（选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二八——一九四三），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22—223页。但在《斯大林全集》的原文中无“武装干涉”一词。——译者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上的发言

(1932年9月13日)

洛甫

我们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三、五、六和八军全体战士衷心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致以革命敬礼。(掌声)

同志们,中国红军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群众正在开展着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背景下成长和壮大。它在自己的发展初期是一些零星的、分散的、装备很差的游击队。红军在同地主和国民党军阀的武装力量进行的无数次激烈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已经变成一支拥有30多万名战士队伍的威慑力量和以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组织坚强和团结紧密的战斗单位。它占据着拥有不下6000万人口的国土;当前在打退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之后,它大大地扩大了中国苏维埃的根据地。目前,它正竭尽全力为苏维埃革命在数省胜利而斗争,以便在全中国取得胜利。

同志们,为什么在数量和军事方面比国民党军队弱小的中国红军不顾帝国主义列强对国民党的支持,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红军在其共产党的领导下正确地实行了和正在实行着共产国际的路线,粉碎了各种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以及偏离党的路线的倾向——李立三主义、陈独秀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罗章龙路线。正因为如此,它才得以实行自己的革命纲领和政

策，因而赢得了广大劳动群众对自己的支持。同时，为解放工农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使红军战士的自觉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都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所有这些使红军变成了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红军在中国的胜利也就是共产国际路线的胜利。

中国红军的胜利和成为整个革命的东方殖民地的支柱与世界革命在东方的堡垒的中国苏区的扩大与巩固不可能不引起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中国的残酷镇压。帝国主义不仅秘密援助国民党军队武器和军事顾问，而且还公开派自己的陆海军对红军作战，例如法帝国主义通过空中轰炸破坏了龙州的苏维埃，英、日海军人军舰炮击了长沙。红军占领漳州市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厦门附近集结了 30 多艘军舰。目前在长江有 100 多艘军舰，随时准备向红军发起攻击。

日本占领了满洲并进攻上海与西藏人进攻中国西北的边界省份——所有这一切都是实现反苏武装干涉准备工作中三位一体的任务。我们知道，苏联是中国人民在其争取解放的斗争中的唯一朋友。应当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进行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者准备的对苏联的武装干涉。如果帝国主义胆敢进行反苏冒险，我们将与世界无产阶级一同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保卫苏联而同帝国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因此，在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兄弟共产党提出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之中也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保卫中国革命的斗争任务。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阵地正在动摇，这意味着它的整个力量正在削弱。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必将狠狠打击已经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反苏武装干涉。

因此，世界无产阶级和我们的所有兄弟共产党应该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反对反苏武装干涉的斗争同保卫中国革命的任务结合起来。

在满洲事变和上海战争中，革命的日本无产阶级在其光荣的

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而果敢地完成了自己的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日本无产阶级反战斗争的经验表明了应当怎样具体贯彻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的各兄弟共产党真正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它们一定能够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和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反对反苏武装干涉和帝国主义战争!

反对瓜分中国!

保卫中国革命!

苏联和中国苏维埃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盟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全会代表起立,热烈欢呼。)

(原载《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速记记录)》第3卷,第77—78页。任震寰译,王继飞校)

(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二八——一九四三),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 第十二次全会决议的决定

(1932年12月31日)

一、政治局讨论了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决议之后，完全同意十二次全会的一切决议，并要求中国共产党一切组织用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与顽强性，把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起来。

二、政治局委托书记处按照政治局的讨论，起草接受十二次全会决议的决议。该决议应××××××××××××××××××××××。

三、政治局责成中央党报及宣传部，一切党的地方组织，立即的开始在党内及群众中进行广大的解释工作，并依照国际决议案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

中 央

1932年12月31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 全会与中国革命

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和共产党的任务

(摘录)

(1933年11月28日)

库西宁

.....

四、关于革命中国的反帝斗争

日、英、法、美等帝国主义者业已开始重新瓜分中国。这不仅表现在日本继续侵占中国领土上,而且也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英帝国主义者侵占四川部分地区,企图借助广州集团的力量控制华南;英、日帝国主义策划新疆叛乱;法帝国主义准备吞并云南;英、日、美对福建进行帝国主义干涉。

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么沦为永远受帝国主义者奴役的殖民地,要么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中国劳动人民的反帝斗争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1. 满洲、热河、察哈尔和华北的抗日武装游击战争。这个斗争的矛头不仅指向日本侵略者,而且也指向汉奸。

2. 国民党区的反帝斗争。这一斗争不仅针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而且针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国民党,首先是针对叛国与辱国的南京政府。

3. 苏维埃及其工农红军,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

游击战在旧将领领导下失败之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的游击战士(工农兵)和中国共产党日益掌握游击队的领导权。根据

日本人的报道,在满洲有 15 万武装游击战士,其中已有三支力量雄厚的赤色队伍,即中华苏维埃红军的三个军团。在事态急转直下的情况下,这支军队能够而且必定会发展成为一支百万大军。

中华苏维埃及其红军已经打退了敌人五次“围剿”,目前在第六次反“围剿”中又取得了重大胜利。

蒋介石聚集了 40 万人马进攻中央苏区。他从美、英两国得到了飞机、坦克、大炮、装甲车和化学武器,并得到了英、日、美等国海军的支援。他的军队由塞克特率领的德国参谋本部人员指挥。他的警察由聘请来的德国法西斯分子(其中包括格尔热津斯基)管辖。然而,这次大战役开始以后,蒋介石的队伍还是从战场上逃跑了,接连五天都在后撤。

正当蒋介石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时,红军在四川境内消灭了敌人 36 个团,即整整一个集团军(鼓掌)。红军第二与第四方面军会合,占领了万县,截断了长江的交通,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四川有 22 个县归苏维埃政权管辖,在安徽与河南,工农正在重建苏区。

自从我们上次全会以来,仅仅一年的时间,中华苏维埃红军就发展壮大起来:正规部队一年内由 20 万人增至 35 万人,非正规部队由 40 万人增至 60 万人。重新组建了由共产党员组成的三个模范师,由共青团员组成的一个“少共国际师”和两个工人师。

苏维埃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日益强大和巩固。它的巩固是由于党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中国苏维埃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强大因素。

上海保卫战和满洲的游击战起了重大作用,致使日本法西斯军阀至今不敢发动反苏的反革命战争。

假如帝国主义者,首先是日本军阀一定要在远东煽起一场反苏的反革命战火,那么,他们因而要冒这样一个风险:很快就会出现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苏维埃日本、统一和不可分割的苏维

埃中国、苏维埃朝鲜和苏维埃福摩萨。

.....

（摘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论中国

(1933年12月)

一、“在中国——是战争、武装干涉和革命”

共产国际执委最近一次(第十二次)全会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底相对稳定已经完结。自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完结以后,资本主义总危机底发展已使全世界资本主义系统动摇得更加深邃了。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底靠山——苏联——扩展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日益增强自己的力量;而资本主义世界底经济,却正在崩溃下去。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贫穷、破产和饥荒底锁链日益加紧束缚着。资产阶级用法西斯蒂暴力压迫和抢夺劳动阶级的办法,用强盗战争反对别国人民的办法,来疯狂地加强自己的经济剥削方法。可是同时,劳动群众底革命义愤,劳动群众要推翻剥削阶级底不堪忍受的压迫的决心,也日益增长着。

资本主义各国内部阶级矛盾和国际冲突底异常紧张,证明革命危机底客观前提已经成熟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在现时,世界简直已经紧紧逼近到革命与战争底新周期……

资产阶级日益不相信单用加紧剥削本国劳动者的方法可以找到逃出危机的出路,于是帝国主义者就以战争为主要方针。国际状况现在带着新的世界大战前夜底性质。

(一)新的世界大战底火焰,正在太平洋沿岸燃烧起来。日本军阀为地主资产阶级帝制最深刻的内部危机所驱使,继续向中国进行掠夺战争,既已利用国民党底帮助征服华北,又正在准备攻打

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帝国主义正在伸手夺取中国东南各省、西藏和四川，法帝国主义正在伸手夺取云南。日本法西斯蒂军阀是反对中国反帝土地革命的先锋队。美国、日本和英国帝国主义，站在国民党背后，帮助对着中国唯一的人民政权——中国苏维埃举行第六次“围剿”。中国苏维埃革命底胜利，东三省底游击战争，日本革命势力底增长，各殖民地人民底解放运动，这都在帝国主义者后方造成新战线。中国苏维埃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底巨大因素。

必须根据苏联工人和集体庄员在农民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切战线上得到的伟大胜利底实际经验，估计各国底特殊条件，而向每一国底劳动者明白提出一个纲领，使他们看清，苏维埃制度在他们本国将给他们什么好处。在这里，须要特别指出，在苏维埃制度之下，失业现象和朝不保夕的忧惧情形一定会消灭，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险会经常改良，而同时工作时间又减少；乡村劳动者会摆脱一切封建残余和各种束缚；无地和地少的农民一定会得到土地；贫农会得到赞助，农民合作社及集体农庄会得到帮助；青年工人及一切劳动者底文化，将能完全自由发展等等。

苏维埃政权底基础，是工人和半无产者底群众组织，所以它能使过去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群众，真正有普遍地享用民主权利的可能。

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底国家形式。

苏维埃政权，是保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底国家形式（中国及其他各国）。

对劳动者说来，它是民主制，可是对剥削者说来，它却是无情的专政。

（摘自《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底任务决议案》）

二、反对白色恐怖

无产者们！全世界底劳动者们！共产主义者们！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优秀分子底鲜血都正在流着。德国法西斯蒂与国民党刽子手举行竞赛，争着来残杀工人阶级底先进战士，争着来拷打、虐待、强迫和侮辱革命工人。中世纪刑罚底残酷，却远不及民族社会党人和蒋介石底残忍。

据红色救济会底统计，单是最近一年来，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各国受苦刑而死的和被惨杀的革命家，就有 4.6 万人，受伤和残废的有 16 万人，被捕的有 22.8 万人……

在柏林和上海，在东京和东三省，在索菲亚和瓦萨，在南洋群岛和安南，各处的奴隶主和军阀都在残杀革命战士。

蒋介石招聘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将军及社会民主党的警察总监格津斯基之流，成千成万地屠杀中国革命的工农。去年秋，上海工人反战集会者被捕，全体被捕者一律就地枪决。1933 年夏，国民党刽子手拘捕了 150 个参加反法西斯蒂代表大会的人，把他们解到南京残杀了。

在日本，执政的法西斯蒂派，两年以来拘捕了 1.5 万革命的工农和兵士下狱。数十个日本共产党员被杀了。在东三省、高丽、台湾，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而被残杀的有数万人。

在南洋群岛，荷兰奴隶主实行残杀“七省”军舰上武装起义的水兵。

在安南，“民主”的法国用枪炮镇压本地武装起义者。

在印度、亚刺伯及巴勒斯坦，英帝国主义者成千成万地枪杀反抗殖民地压迫制度的劳动者……

到处都来进行群众抗议运动，以反对在德国、中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法西斯蒂恐怖吧！……

起来和凶残的法西斯蒂恐怖作斗争吧！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号召共产国际一切分部，号召全世界工人和劳动者，以极大的牺牲精神来保护苏联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底反革命阴谋，来保护中国革命及其苏维埃政权，使之不受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摘自《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底宣言》）

根据 1944 年 7 月出版的《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论中国》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 中国共产党底任务

(1933年11月30日)^①

王 明

第一章 中国——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底舞台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完全同意全会提纲上和古西宁同志报告中，对于国际形势底估计，就是说：“现在国际形势简直已经逼近到战争与革命底新周期”了。“由于本身最深刻的不可解决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破坏了，与资本主义总危机最密切关连着的世界经济危机，把资本主义社会底一切根本矛盾紧张到了这样的程度，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即是把经济危机变成革命危机”。中国的状况便是对国际形势这种估计底最好的实际证明。

还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时，因为当时全会估计国际状况，是资本主义稳定底终结和转变到战争与革命底第二个周期底过渡。中共代表团那时便指出：“中国已经正在进行革命和战争”，“中国已经是革命与战争底整个连环当中主要的一环”。

^① 原文无时间，此是根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收录的本文加的。

十二次全会以后已经一年了，现在世界既已紧紧迫近到第二个革命与战争底时期，试问中国在这一时期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

(一) 革命更向前发展

革命运动在中国更向前发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一、苏维埃革命更进一步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底强大

第一，它首先表现在苏维埃革命更进一步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强大——大家都知道，当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正组织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去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工农红军；在这次“围剿”当中，国民党动员了86个师以上的军队，组织了许多地主富农的武装队伍（民团，“剿共”义勇队等），直接参加这次“围剿”军事行动的，一共差不多有100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武装队伍。

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在那个时候说，他们这次“围剿”一下子把中国苏维埃运动永远消灭了。右倾机会主义者，临时暗藏在我们党内的反革命罗章龙派底残余，曾大声高叫说：中共和红军绝对不能冲破这次大规模的“围剿”。悲观、恐惧和失望的情绪，使这些机会主义者公开地跑到国民党营垒里头去；此外，甚至于许多中国革命的朋友和有些共产党员们，也不免抱着悲观的态度，他们以为，这次红军和中共恐怕很难胜利吧？然而不管这些分子的狂吠，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会议上，完全有权利高兴地向全世界宣布说：那个在1932年秋天开始底反苏维埃的五次“围剿”^①，在1933年春末夏初时已经完结了。其结果是：国民党军队的大惨败和工农红军的大胜利；这个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得到的。（大鼓掌）

① 本文中的“五次‘围剿’”、“五次战争”即通常所说的第四次“围剿”。

这种胜利产生了一些什么结果呢?

(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更进一步的巩固、扩大和统一

红军在五次战争胜利中,在中国南部、中部和西北部共占领了76个县和3个府(福建的邵武府,四川的绥定府和阆中府)^①。虽然因为军事行动的关系,这些新占领的县城有一部分是时得时失;但是直到现在,差不多有40个以上新占领的县份是保存在红军的手里。红四军^②在五次战争当中,在四川省创造一个很大的并且很坚固的苏维埃区域。中外报纸都说得很对:四川省对于红军行动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就是四川是一个很富的省份,是帝国主义难得达到内部的省份,但是红军很容易防守的省份。四川的新苏维埃区域,也和中央苏维埃区域一样有很好的顺利发展底前途。

赣东北苏区、闽西苏区与江西中央苏区统一起来了,结果使中央苏区的许多领土能够表现这样的巩固:在最近两年战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敌人没有一次能够侵入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主要的根据地里去。

此外,在六次“围剿”战争^③开始时,红军又新占领了15个县和两个比较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城市,这就是福建的延平和四川的万县。

这样一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已经发展到比任何西欧与东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领土都大些。

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占中国内部18省的六分之一的面积。同时,这个领土是包括固定的苏区和游击区域。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就是说固定的苏区和游击区的总面积,已经占中国内部18省的总面积四分之一了,而

① 即今福建省邵武县、四川省达县和阆中县治。

② 红四军,指红四方面军。

③ 本文中的“六次‘围剿’战争”、“六次战争”即通常所说的第五次“围剿”。

固定苏区已占内部 18 省的六分之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的总面积,共计 1348180 平方基罗米突(即 2580835 平方里),其中固定苏区面积共占 681255 平方基罗米突(即 1234950 平方里),如果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固定领土和西欧及东方的资本主义列强的领土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到下列的结果:

比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固定领土**来:

法国领土等于 80.9%

德国领土等于 68.7%

英国领土等于 35.5%

日本领土等于 55.9%

仅仅一个中央苏区就要比荷兰^①加上比利时的领土大两倍。

(乙)红军更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红军在冲破五次“围剿”战争中,打破了国民党 40 个师的军队,其中有 18 个师差不多完全被打溃了。红军俘虏敌人 8 万人,其中有很多师、旅、团长等等(例如只在一个中央苏区,只在 1932 年一年当中,就俘虏敌人的 3 个师长,11 个旅长,18 个团长;从 1933 年 1 月到 4 月俘虏敌人两个师长,两个旅长),夺获敌人 14 万支步枪,1390 架轻重机关枪,20 架军用无线电机,几百架炮,6 架飞机。此外,差不多有 3 万国民党军队的兵士投降到红军方面来。(鼓掌)

因为有这些伟大胜利的关系,红军更加壮大和巩固了。在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时,正式红军有 20 万到 25 万人,非正式的武装队伍(就是有新旧式枪械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有 40 万人以上。现在正式红军已经约有 35 万人,非正式武装已经有 60 万人以上。

在这个时期内,新成立了六个军:在鄂豫皖苏区,在第四军主

^① 1941 年 12 月出版的《六大以来》收录的本文此处为“波兰”。

力退走后,新成立了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在中央苏区新成立了第十一、十五和十九军;在四川苏区新成立了一军。新成立了五个师,其中有三个模范师是在中央苏区的(一个由青年团组织起来的少共国际师,两个由工人和雇农组织的模范师),在这些模范师当中,党员青年团员占红军战斗员的绝大多数。这些模范师是一切红军的铁的骨干和突击队伍。在四川新组织了两个师,一个在川东北,另一个在川西。

在质量方面,红军在这一时期中,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首先就是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骨干加强了。在中央苏区许多基本的红军队伍当中,党员占全体成分的50%到58%,无产阶级的成分,即是工人,手工工人,雇农平均占25%到30%。至于工人模范师中,差不多完全是工人,雇农,手工工人,店员等无产阶级的成分。

(丙)苏维埃建设方面底新成绩

从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1931年11月7号,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到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这一时期,可以算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形成的时期。最近这一年,可以算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向前发展和壮大,并且得到全世界在事实上承认这个国家的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最近一年来,对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基本法律和指令,做了很多具体化、补充和在实际上实现底工作。例如:

(1)在苏维埃行政系统方面——颁布和实行了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命令;颁布和实行了地方苏维埃组织系统条例和工作条例;颁布和实行了各级苏维埃选举和改选底章程和细则等等。

(2)在经济政策方面——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专门关于合作社条例(譬如在中央苏区在这一个时期中就成立了500个以上的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关于国家和私人的借贷条例;关于允许在苏区工商业投资条例;关于徵求专门人才启事;关于工人监督

生产和在苏维埃监督之下允许土地买卖的条例；以及关于禁止不断平分土地的指令（这种不断平分土地，特别是湘鄂西苏区等地方很流行的现象，实际上不断平分土地是振兴农业经济的很严重的障碍）。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极力设法改善苏维埃区域的农、工商业。他们努力领导春耕运动，秋收运动和修堤运动；他们组织犁牛站、农具、种子和肥料等去帮助那些没有耕牛、没有农具、没有肥料和没有谷种的农民；他们在经济工作当中，组织了广大的革命竞赛运动和突击运动；他们领导农民开垦了很多原来的荒山、荒地；他们努力改良苏维埃工农银行的工作；他们实行正确的赋税制度；他们实行了广大的节省运动，以便尽量节省经济来保障红军底给养。

(3)在使苏维埃国家机关改良和节省方面——在这个时期里，开始真正组织和实行工农检查局，轻骑队以及其它考查苏维埃各级机关底群众组织底工作，在很多地方，工农群众已经广大地起来对苏维埃机关实行自我批评，并且得到很大的结果。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已经开始实行预算和决算制度，并且每经一个月或三个月公开向群众公布收入和支出的账目，同时，把苏维埃各级政府底预算和决算来和国民党各级政府的预算和决算做个明白的比较，使群众在事实上亲眼看到：只有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廉洁政府**，这种廉洁政府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时时刻刻所希望出现的。

(4)在发展人民教育方面——虽然苏维埃区现在经济和人才都感觉很大的困难，但在最近一年来，在一切主要的苏区里，都开始了认真地组织人民教育底工作。例如，在中央苏区宁都一县，就组织了 350 个初级列宁小学校，85 个平民夜校，许许多多的识字班，13 个俱乐部；在这一县，仅仅在列宁小学校读书的就有 7560 人以上，这些小学校不仅仅不要钱，而且供给学生教科书和伙食，在这些小学校里，只有富农的子弟才缴学膳费。这样的人民教育

制度,这样广大的教育组织,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现象。根据我们得到的材料,在今年年初,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城内,已经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在第四军的苏区内,已成立了各种苏维埃中学。

(5)在解放妇女方面——中华苏维埃政府不仅坚决地实行婚姻条例(如离婚结婚自由等等),不仅坚决地主张劳动妇女在分配土地当中与男子完全平等,而且坚决主张在每个苏维埃机关或委员会底领导成分当中,至少要有五分之一或五分之二是劳动妇女,同时,在每个苏维埃里设有改善妇女生活委员会。

(6)在群众组织方面——过去这一年,是各种群众组织迅速发展的一年。首先就是赤色工会,——它是党,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底最可靠的支柱。虽然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关于整个苏维埃中国领土内赤色工会会员的统计;但是据我们已有的个别材料,已经可以证明,赤色工会在苏维埃中国领土内是广大的群众组织。例如,只在一个中央苏区,还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赤色工会会员便有18万到22万。现在有十个省总工会。在每个苏维埃区域里,最近一年来都召集过工会代表大会和各种代表会。

赤色工会在苏维埃中国内起很大的和领导的作用。举一个例子看:从今年6月到8月三个月中,由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所发起,组织了红军两个工人师:就是一个农业工人师,一个手工工人和店员工人师。兵工厂工人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总是加倍地工作,在有些地方甚至于一天出产比平时多三倍以上子弹和枪械来供给红军。

贫农团是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反富农和反地主残余当中底群众柱石。他们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组织了。例如,在中央苏区内八县里,贫农团团员便超过14.9万人以上。

国际革命者救济会——根据今年八一在瑞金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底统计,只在中央苏区便有会员60万人。在这个代表大会

上,不仅讨论了救济会在中国的工作和任务,不仅通过了给国际革命救济会总执委主席斯塔数娃同志贺电,并且通过了致在德国法西斯蒂统治下和日本血腥天皇统治下奋斗的战士底慰电。同时并通过了募捐款项去帮助德国和日本的兄弟们底决议案。这件事,只不过是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的劳苦群众,对于德国在以特尔曼为领袖的共产党领导下而英勇斗争的德国无产阶级广大同情的一种具体表示。中国劳苦群众对于德国无产阶级和德国共产党之所以表示这种广大的拥护,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进行了有系统的工作去反对法西斯蒂;拥护德国共产党在希特莱拿到政权以前,拿到政权时和拿到政权以后所采取的正确布尔塞维克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路线,拥护共产国际主席团今年通过的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我们党和中国劳动者对德国党和无产阶级这种热烈同情的表示,就是在事实上坚决打击莱母麦尔和来以曼等对于德国共产党领导底侮蔑。

同样,中国劳动群众对于日本英勇的无产阶级反对日本资产阶级和天皇统治底斗争,表示广大的同情和赞助,绝不是偶然的一回事;而是由于中共进行有系统的工作去动员群众拥护日本革命斗争的结果。同时,日本共产党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行真正地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对中国民众进攻底斗争,在实际上也就更加巩固了中、日劳苦群众互相间革命同情。中、日两国劳苦群众非常迫切地希望,在中、日两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反帝同盟在中央苏区内就有 50 万人以上的会员,苏联之友会在中央苏区和救济会一样,差不多有 60 万会员。

(7)在苏区内部反对反革命底斗争方面——在这个时期,我们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和组织,已经大大地改良和加强了。因此,虽然国民党用尽一切方法,企图在我们的后方组织反革命的暴动,但是在最近一年来,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已经没有发生过像从前那样

的反革命暴动了。(鼓掌)我们底政治保卫局已经能够及时地暴露和破坏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对苏维埃中国的许多反革命阴谋和诡计。

(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成为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底唯一的,可靠的柱石了!

在以前,虽然苏维埃政权在目前这个阶段上,一开始就提出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在中国统治底任务,虽然在我们苏维埃中国内已经消灭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但是,因为苏维埃区域离中心城市较远的缘故,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广大劳苦群众首先容易看到的,就是苏维埃政权是唯一执行土地革命的政权。然而,在最近一年来,因为共产党实行灵巧的和正确的策略,因为共产党极力造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广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因为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能够及时地实行反帝国主义和反国民党底行动,苏维埃政府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底唯一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了。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真正领导和组织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以便取得中国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已经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大家公认的事实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最近一年来,在实际上证明了:虽然直到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没有能在地域上把所有苏维埃区域统一起来;但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切领土内,实行统一的行政制度,统一的经济政策,统一的财政系统,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实行统一的政治上和军事上底领导。这样,中华苏维埃政府就在实际上证明了:它和南京政府及其它军阀、官僚底政府底不同之点,首先就是由于他是工农政府,所以虽然他在地域上还没有能够把各个苏区统一起来;但是,他在实际上是唯一的能够使中国达到革命统一底政府。而国民党南京政府,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中国内所谓“中央”政府;但是,实际上,在南京政府统治的范围内,每个军阀,每个

官僚以至于每个土豪和绅士，都是各自为王，各自为政，都有权力收捐，收税，都各有自己的法律和命令。

从以上这些事情看来，很明显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完全具备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成分，它完全有资格称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国。

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欧洲、美洲或东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法律上和形式上正式地承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然而，外国政府和中国军阀政府，已经不能不在实际上承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家了。这首先就可以从他们的言论机关上看得出来，他们之中，有的承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另一个承认苏维埃政府是中国组织得最好的政府；第三个承认苏维埃中国人民底生活要比国民党中国人民底生活幸福些；第四个说苏维埃政府是唯一能使中国国家统一底政府……举几个例子来看：

在国际联盟底报告当中（李顿报告书）我们看到有下面这段话：

“共产主义在中国不仅成了政治的学说，在中国不仅创造了独立的共产党，并且共产党已经成为南京政府的竞争者了。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创造了自己的特别的法律，自己的军队和政府，并且有自己底领土的势力范围。”

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正式机关报《泰晤士报》上，在今年 11 月 13 号和 14 号两天的报上，登了一篇题目为《中国底共产主义》的论文，这个论文底作者，自己不久以前，曾到过江西和湖南的苏区边境。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了，它统治了，并且现在还统治着许多区域。经常固定的中心区域，是江西的中部和南部，以及福建的西部。但是，湖南，广东和湖北的一部分，也渐渐地归到它的版图里面去了。有许多人这样想，这里所谓共

产主义,只不过是通常对于土匪,不满意的行动和失业现象等的称呼。然而他们错的太远了!根据我们在江西和湖南南部‘剿共’战线上得到的印象,可以供给我们许多材料,使我们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但是更令人不安的结论。中国的象征——散漫消极。但是中国共产党员绝对不是消极散漫的人。赤色区域完全是在首都瑞金底总参谋部——中央政府底严格管理之下。”

美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新共和》周报,在今年9月第27期上登载了一篇题目为《红色中国》的论文,在这个论文里写道:

“苏维埃区域是处在比邻近军阀统治区域兴旺底状况,苏区的**米粮收成要好些,捐税要少些,而沿江沿河的堤坊要高些**……苏维埃政权存在以后,实行了自己的货币制度,并且在人民教育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六年不断战争当中,苏维埃证明了他**是唯一的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北方军阀是日本的奴仆,他们靠日本的津贴过生活;广东派在英国的影响之下;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准备着替任何外国政府效劳,只要人家给他借款和军火。他们服从日本人,但是他们更特别同情美国的资本主义。苏维埃得不到任何的借款,任何的武装,除了它从敌人方面夺来的武装以外。它一天一天地实际证明了,假若江海沿岸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各政府一旦失了西方和日本底帮助,那末,全中国在几个月或几年之内,将要完全成为共产主义的了。”

在日本出版的英文刊物也不得不承认说:

“现在在中国发生的运动,在使中国民族解放事业上所起的作用,将要比从辛亥革命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变所起的作用要大些,很明显的,红军在四川之所以能得到胜利,首先就是由于江西红色势力的响应和牵制国民党军队底结果。如果这一种互相配合和互相呼应的行动,使南京大感不安,那末,

当然它们也使列强感觉不安，因为这一种情形当中**埋伏着真正统一中国底希望**。但是中国统一，对于有些列强完全没有好处和没有利益的。”（见1933年3月11号《日本大事记》）

日本帝国主义的报纸《大阪每日新闻》在今年10月14号登载了一篇自己的九江特约通信，在这通信上面说：

“中国苏维埃区域人民底生活条件，比红色势力没有到那些地方以前要好些。”

中国天津的资产阶级底《益世报》，在它的社论上说：

“……内部的冲突我们始终主张应持‘楚人失之，楚人得之’的见解。俄罗斯的克伦斯基打倒了俄皇，俄国并没有亡国。列宁抢夺了克伦斯基的政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俄国也并没有亡国。国家内政上变了何种局面是次要问题，亡国的惨痛是不能忍受的……”

最后，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实，就是在最近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这一类的现象；即个别的军阀派别，在和红军屡战屡败之后，在兵士群众和一部分下中级军官革命情绪压迫之下，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或者继续和红军战，那么，毫无疑问地他们将要完全塌台；或者把自己枪头掉转过去反对日本及其走狗蒋介石，以便从绝路上另找出路。

苏维埃中国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已经长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人民共和国——这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二、非苏维埃中国群众革命斗争更加扩大和深入

第二，近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底更向前发展——表现在非苏维埃中国群众革命斗争底更加扩大和深入；表现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特别在东三省、热河、北方和福建等处广大群众反日的武装斗争更向前发展；表现在工人群众斗争更进一步的革命化和扩大；表现在农民运动广大发展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及苏维埃政权在农民运动中影响和作用底加强；表现在军阀军队中士兵群众更加瓦解和革

命化；表现在极大部分小资产阶级从反动党派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而日益倾向革命和共产党等等。关于这些问题，康生同志在他的发言当中都要讲到的^①。

从以上所讲的这些东西看来，很明显地，中国在目前这个时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这样唯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正在进行着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底胜利的苏维埃革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成为现在中国一切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中心，而且已经成为决定世界政策底主要因素之一了。

这是最近一年来，国际政策中所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新事件。

(二)战争与武装干涉底扩大和深入

在中国不仅进行着革命，而且同时发生着战争与武装干涉。在近年来，战争与武装干涉也都扩大和深入了。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很久就发生战争了。但是，直到现在，欧洲和美洲许多工人和劳动者，对于中国战争问题，还不十分清楚。中国现在到底发生些什么战争呢？就是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革命战争表现在各种形式上：它的最高形式，就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以工农红军作先锋底武装人民所进行的战争，这个战争同时包含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的性质和反国民党的国内革命战争的性质。而且这两种性质是相互地混合着。它的最初形式和阶段，就是现在东三省、热河等地方真正反日的游击战争，这个战争是广大民众进行的，这个战争是民众决心武装驱逐日本强盗和卖国贼蒋介石、黄郛、溥仪等情绪底具体表现；它的最初形式和阶段，就是反国民党反军阀底民众战争，这种民众战争，有些地方是采取

^① 指康生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上的发言——《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运动底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底工作》。

抗捐军的形式，有些地方是采取反对地主、官僚、警察制度底地方农民暴动的形式，而这些战争向前发展的结果，必然要成为反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在中国的反革命战争，就是帝国主义为瓜分中国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底干涉战争，而且这两种战争在基本上也是相互混合着的。

在最近一年来，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反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战争，都是更加扩大和深入了。

我首先说明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英勇工农红军底干涉战争。我已经说过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苏维埃的五次“围剿”，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在红军冲破五次“围剿”以后，蒋介石、刘湘及其他国民党军阀，在国际帝国主义更多金钱军火帮助之下，又在组织和实行比以前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反苏维埃的“围剿”。为的使这个“围剿”能够得到胜利，美国帝国主义借给南京政府 5000 万美金，即所谓“棉麦借款”，以及 4000 万美金所谓“航空借款”。根据这一批航空借款，美国计划建造 850 架军用飞机给南京政府，而其中 150 架飞机，已经送到中国了。英国帝国主义借给蒋介石 500 万英镑，借给四川军阀刘湘 2000 万英镑。日本强盗一方面和蒋介石签订了所谓“北方休战条约”，以便蒋介石能够公开地把一切军队动员去反对红军和苏维埃；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把南京政府借到的美棉承买去一大部分，然后将军火作为棉价交给蒋介石去反对红军。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面前加紧地示威，表示它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表示它准备着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帮助蒋介石消灭中国赤化的危险，以便把蒋介石从美国资本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而把他变成日本的公开的和忠实的走狗。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波兰和它的国家，不断地有大批的轮船运输机关枪、大炮、坦克、飞机、军装、化学毒品等到中国各地——到上海、南京、

九江、南昌、武汉、广东等处。只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五次“围剿”中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的国民党刽子手，才能够又组织新的大规模的反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在这一次“围剿”当中，蒋介石和其他刽子手们，在福建、江西、浙江、广东、湖南边界上，便动员了44.2万以上的军队去反对中央苏区。13至15个师的军队去反对鄂豫皖苏区。8个师军队去反对湘鄂西苏区，20个师以上的军队去反对四川各苏区。然而事实还不止这样呵！第六次反革命对苏维埃的“围剿”与过去国民党各次反苏维埃“围剿”的主要不同点，就是在于全世界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直接地和公开地参加这次“围剿”底军事行动。150个美国的和加拿大的飞机师，在江西福建战线上往来盘旋。许多美国的和德国的化学技师和军事技术专家，正在替蒋介石服务。过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和另外两个德国将军维撒尔及克雷伯尔，以及70个德国参谋部底军事顾问，不仅仅制定了六次“围剿”的军事计划，而且直接参加国民党军队作战行动。正是这些国际资本雇佣的走狗们，现在正在进行可怕的航空战和化学战去反对自由的苏维埃中国，去屠杀中国人民。过去的柏林社会民主党警察总监——格山斯基和他的助手社会民主党党员魏一士，已经到了南京去帮助国民党改组警察机关，以便保证国民党在反对红军战争中底后方安全，以便加紧逮捕和屠杀成千累万的中国的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民众和青年。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是德国社会法西斯蒂和整个第二国际首领们的真正的血腥面目。此外，美、日、英、法、意各国军舰，正在升着火，脱着炮衣，准备着在任何时候，都能开始实行军事行动去反对中国暴动起来了的工农兵贫民和革命智识界。在万县（是长江沿岸和四川省的重要商埠之一），在英、日、意军舰和红四军以及暴动起来的工农贫民之间，正期待着爆发残酷的战斗。

必须注意到，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不顾他们内部相互间有多少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在财政上和军事准备上一致地帮助蒋介石

石,而且用自己的军力直接地和公开地参加六次“围剿”的军事行动,其原因不仅是由于苏维埃中国及其工农红军在五次战争中,已经表现出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已经表示出反革命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力量能够摧毁中国日益发展的苏维埃革命;其原因不仅是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和胜利,已把苏维埃事业实际上变成了全中国广大民众的事业,他们都力求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进行革命斗争,来取得自己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其原因也不仅是由于苏维埃中国对于安南、印度、日本、高丽、台湾、南洋群岛、古巴、整个东方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极大革命化的影响,他们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榜样,来学习应当怎样进行斗争去反对外国和本国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在国际事变发展的观点看来,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参加第六次“围剿”的军事行动的原因,首先就是由于苏维埃中国是苏联以外的世界上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是把中国民众们从完全贫困和衰败中挽救出来底唯一的柱石和希望。由于苏维埃中国几年长期存在这一事实,就是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者进行革命斗争底强有力的号召,就是坚定他们对自己力量和胜利底信心,同时,也就是明显地表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已深刻腐朽到如何的程度;由于苏维埃中国妨碍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妨碍他们把中国变成军事根据地,妨碍他们准备新的世界大战;妨碍他们统治中国这样广大的市场,而这个广大市场对于国际资本在目前尤其特别需要的,因为国际资本想利用这个市场,来多少地减轻一下在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基础上产生的长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引起的痛苦的和不可救药的病症。摧毁这个太平洋上的革命根据地,是世界帝国主义准备和进行太平洋世界大战,首先就是从东方进攻苏联的干涉战争底必要条件。摧毁苏维埃中国就是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严重的打击。摧毁苏维埃中国就是日本和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人民当亡国奴底必要手段。

现在我讲到帝国主义为瓜分中国底强盗战争。在最近一年来,日本帝国主义除原来占领的东三省外,又用武力占领了热河、察哈尔,并且实际上又取得了整个北中国底完全监督权,同时,在收买内蒙古王公实行所谓“内蒙独立”底阴谋之下,实际上又取得了整个内蒙古的统治。英帝国主义经过西藏的王公喇嘛实行帝国主义战争(根据英国自己报纸的消息也说:西藏军队穿着英国式的军装,用着英国的大炮、机关枪和步枪,在英国的军官指挥之下),这种西藏军早已经占领了整个川边省,并且侵入到四川和云南边境。此外,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地在新疆组织各种各样的暴动和骚乱,其目的是完全瓜分新疆省。法帝国主义也绝不愿在瓜分中国行动中表示落后,它不仅派兵舰占领了南中国海的九个小岛(珊瑚岛),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加紧准备着武装侵入云南和贵州省。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许多原因的关系,在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公开的军事行动,但是他一天一天地把自己的海、陆、空军力在中国增加起来,准备着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和其它帝国主义者争夺全中国。

在最近几个月,日本在北中国和长城一带开始了部分的撤兵行动,这绝不是像日本强盗及其走狗们——日本社会民主党和蒋介石宣传的那样,所谓“中日军事行动中止了”,或“远东战争危险减少了”,恰恰相反,这只是明显地表示日本强盗加紧准备在最近的将来,开始大规模的反苏联的冒险战争罢了。

最后,我讲到关于军阀战争问题。因为军阀们在日益高涨的人民革命面前表示发抖,所以近年来曾暂时地没有爆发过那种大规模的包括全国主要各省的军阀战争。然而,在过去这一时期中,仍然是有五省(山东、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发生过军阀战争;特别是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之间的战争,曾延长七八月之久。受这次战争痛苦的不仅仅有几十万的兵士,而且有千百万的人民。而根据我们得到的一切消息,大概在最近的将来,还要爆发大规模

的军阀战争；参加这个战争的，将是蒋介石的主要力量和其他反蒋军阀的力量。所有这些事实，不仅证明中国军阀制度已经深刻腐朽了，而且证明是在他们的主人之间（美、日、英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日益剧烈化。所有这一切事实，无条件地证明全会提纲上分析的正确：“新的世界大战的火焰正在太平洋沿岸燃烧着”。

从以上所讲的这些事实看来，很明显地在中国同时发生着革命战争，反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战争。从现在国际状况和中国国内状况的观点看来，中国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战争，在现在特别是进步的革命的 and 神圣的；因为这个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达到几万万中国民众底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且是为消灭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和消灭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底大战；由此可见，国际帝国主义为完全把中国民众变成亡国奴所进行的强盗战争和武装干涉战争，在现在条件之下，是加倍地反动的反革命的 and 令人痛恨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底目的，是为的要造成实行全世界帝国主义太平洋大战和从远东实行反苏联战争底必要条件。

（三）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全线总进攻和国民党更进一步的崩溃

在中国最近一年来所发生的事变当中，第三个主要的新事件，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民众全线总进攻和国民党更加分崩离析。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深入的关系；因为全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底矛盾空前紧张的关系；因为帝国主义尽力把危机痛苦结果转嫁在本国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底劳苦群众身上的关系；特别因为中国有革命与战争的形势底关系，国际帝国主义者特别更加紧对中国全线总进攻。武装占领中国领土，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用新的军事借款的方法取得新的政治上和军事上底特权，实行商品廉价倾销（首先是日本的丝，纺

织品;美国和加拿大的麦子,美国的棉花,印度和安南的米等等在中国倾销),中国原料价格空前跌落和银价大跌——这一切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更进一步进攻底全副锁链当中底各个主要连环。

当帝国主义这样加紧进攻关头,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加明显地暴露出国民党政策底**卖国辱国**的性质。为的明显地证明国民党底卖国政策,我们可以举出所谓“怀柔协定”即所谓“中日妥协原则”作个例子,这个协定的内容有下列几点:——

“一、中国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前隶于中华民国之奉、吉、黑、热四省,即为‘满洲国’领土。

二、中、日、满为保证东亚和平,于必要时,日本得派遣舰队停泊中国沿海,日、满陆军得通过或防守中国察、绥两省境内,以防止中、日、满之共同敌人来侵,但必须事先通知中国。

三、为复兴东亚经济于平定之途,中、日、满得互为经济的友好的提携,及内乱戡平的援助,而中国方面,尤须注意国内排货排满之制止。

四、中、日、满正式协定,于中国认为可能时开始协定。中满国界之确定,于中、日、满正式协定之后,始会同确定划定之。中、日、满正式协定成立时,此原则即失效力。

五、休战之协商及缓冲地带之划定,由中日军事当局于此原则成立之翌日实行之”。(见《中国论坛》1933年,“九一八”专号)

这样一个公开的卖国的协定,蒋介石、黄郛、上海总商会、胡适等还厚着脸皮说:中日停战协定只限于停止军事行动,决未牵及政治问题!并且他们还宣传说:北方协定是南京政府底外交成绩之一。无怪乎连《大公报》的社论也不能不对国民党底政策和言论加以下列八字的批评:“好话说完,坏事做尽”!

在最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更进一步的进攻和国民党对帝国主义更进一步的投降底结果,首先就是使已经完全破产的国

民经济和异常穷困的群众生活更加恶劣化。1933年的水灾,包括了全中国(从广东到东三省),产生了1亿灾民;一半以上的产业工人和手工工人处在严重的失业状况之下,而一切在业工人差不多每星期只能做三天或五天的工;民族工业和交通业更进一步的破产和非民族化,农村经济大破产——这一切事实已经足够说明国民党中国经济破产更加深入和扩大的情形了。

国民党统治的六七年来,只是一个南京所谓“中央政府”便发行了16亿元的国内公债(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15年以内也不过发行了5亿到6亿元的国内公债);在今年每省都发行了500万到4000万元的省公债;每月南京政府要开支1600万到3000万元“剿共”军费;南京政府用公开贩卖鸦片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公开增加广大民众几十年来所誓死反对的盐税和米粮税来增加收入;——这一切事实,已经足够证明国民党政府财政破产的情形了。

国民党区域底经济状况,在最近这一时期破产得特别利害底原因,同时也是由于蒋介石和其他刽子手对于中国内部十八省六分之一的面积底领土(就是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底固定领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其实,这种经济封锁,实际上使非苏区的人民比苏区的人民感受到更大的痛苦。因为在苏维埃中国内,人民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还采取许多恢复、振兴和发展农、工、商业底办法,使劳苦群众生活状况得到很多的便利和改良。而在国民党中国里,这样的事是没有的而且也不会有。关于这一点,举一事实,便可以明显地证明了,例如有些军阀已经不得不自己提议取消对苏区底经济封锁了。

正因为中国近来经济和政治状况发生这些变化,所以国民党在最近一年来也就更加表现崩溃和塌台。国民党更加崩溃和塌台,一方面表现在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另一方面表现在那许多被1925—1927年大革命打倒了的军阀政客派别(例如安福系黄郭和

北洋系军阀等),现在又公然出头来与国民党竞争着去替帝国主义效劳和榨取人民血汗了。同时,国民党内部更加分崩离析,更加证明这一点。如果国民党在其有史以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党,那末,现在国民党正式分成三个党了,就是(一)蒋介石党(蓝农社),(二)胡汉民党(即所谓新国民党)以及所谓“农工党”。而在每一个党内,又分成许多小派,在每一个派内又分成许多小组织。在这些党与党,派与派,小组织与小组织之间,现在正在闹着严重的分离和纠纷。在最近的将来,在这些党与党之间和派与派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武装冲突。正因为如此,所以过去这一年,同时也就是一切国民党附属组织和对国民党抱假的反对态度底那些党派崩溃的一年:在邓演达被蒋介石刽子手枪毙以后,所谓第三党或中国社会民主党便烟消云散了;托陈取消派在陈独秀、彭述之等被捕以后,尤其是在他们在法庭上公开揭穿自己反革命真面目以后,也崩溃到不成其为一个派别了;所谓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毫无疑问地也正在塌台(譬如在北平一处,就有1000多个国家主义青年党党员共同发表宣言声明脱党)。反革命的罗章龙派,早已在南京、上海和北方警察侦探机关当中“为三民主义效劳”去了。

此地应当指出一件事,就是近年来在中国反革命营垒当中发生的一件新现象——即是在中国开始发生了一种特殊的所谓“法西斯蒂”运动。这里问题的中心,当然不在于国民党采取法西斯蒂的方法来反对共产党和革命运动,也不在于国民党实行广大的民族的和社会的武断宣传,这一切都不是新的,这一切都是国民党从背叛革命那一天起一直到现在都应用的。而新的是在于:第一,在最近一年来,法西斯主义问题,不仅蒋介石蓝衣社所出版的各种专门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章和杂志上(例如:《社会新闻》、《社会主义》月刊、《汗血》、《剿共》半月刊、《青年》杂志等等)广大地吹嘘;而且差不多在一切法西斯蒂朋友和仇敌的刊物上,都不断地加以讨

论；第二，新的就在于，在最近这一个时期形成了一个新的蒋介石的公开恐怖组织（蓝衣社），而且这个组织自命为国家社会党；而其他的反革命派别（例如胡汉民派等等）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已经挂起“反对法西斯蒂和拥护民主政治”的招牌了；第三，新的就在于，蒋介石等在最近这一时期，已经不是专在所谓孙文主义旗帜之下来笼络旧的军事干部和创造新的军事人才，而是更努力地打出希特勒主义的旗帜来企图笼络自己的干部和在兵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当中散布自己的影响。

中国这种特殊的所谓“法西斯蒂”运动底主要来源，任何人都很明了的。这就是（一）国际的特别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二）各国帝国主义者，都在企图经过自己底走狗来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当中，创造下某种的社会基础，以便更加适于其准备和实行帝国主义战争（由此，国民党和非国民党底各个派别，大家互相谩骂对方是法西斯主义者，而同时他们之中每个派别，都更加明显地公开地采用法西斯蒂的方法和口号，都更加公开明白地出来拥护自己帝国主义后台老板底利益）；（三）革命势力底发展和反革命势力底崩溃。由此可见，中国这个特殊的所谓法西斯运动底目的是非常显然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企图夺取那些非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分。这些分子之中，许多人现在因为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不断对中国进攻，因为自己生活极端痛苦，所以抱一种绝望情绪；因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就企图把他们对国民党底仇恨变成对共产党的不满；把他们对帝国主义底愤恨变成对苏联底仇视。同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尤其想利用这些分子，作为反对苏维埃革命和一切进步运动底工具，以及在反革命营垒内部作相互火并的工具（例如在蒋介石蓝衣社所发表的暗杀的勾命单上，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从共产党领袖、著名作家、有名新闻记者，以至一切反蒋的军阀和政客都在内）。如果我们任何人都不怀疑，无论德国的、无论意大利的，无论其他国家的法西斯蒂，无论社会法西斯

蒂在德国、波兰和其他国家玩弄什么“反对法西斯蒂和拥护德谟克拉西”底把戏,都绝不能挽救正在死亡的德国的、意大利的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底命运;那末,对于任何人都更加相信,无论孙中山主义,无论蒋介石的特殊的所谓“希特莱主义”,无论胡汉民和农工党所玩弄些什么假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把戏,都丝毫不能挽救那已经被整个世界发展史和中国发展史宣布了死刑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资本家在中国统治的命运。虽然如此,绝不能像有些共产党员一样做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以为中国这种特殊的法西斯运动,对于共产党没有任何的意义。中国法西斯主义运动对于革命的危险,不仅在于它能够做到用比较更有组织些底恐怖行动来反对革命运动,而且还在于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民族武断宣传很有夺取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可能。而这种危险目前特别含有实在性,因为我们党在最近一年来,的确有减弱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当中工作的趋势。

尽力地随时随地揭穿蒋介石的各种各样的法西斯蒂的手段和口号,是我们党目前紧急战斗任务之一。

从以上所讲的这一切东西看来,很明显地,在中国同时进行着革命,战争与武装干涉。中国事变底更向前发展,有使世界完全进入到革命与战争底第二个周期底可能。还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的胜利,预制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和帝国主义在远东反苏联大战底爆发;还是帝国主义大战尤其是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在中国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胜利前爆发;——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决定,这个问题要靠斗争力量来决定。但是不管怎样,以中国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的胜利来制止在远东爆发世界大战底危险,是中国共产党最近的目的和最重要的最伟大的任务。全世界和全中国事变的发展,把中国革命底意义提高到为世界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底第一等重要的地位,除苏联以外,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中一个最主要的最有决定意义的成分了。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底唯一领袖

中国事变到底向那个方向发展呢？这首先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底唯一领袖——的政策，策略，工作和斗争如何而决定。

我们完全有权利说：过去这一年是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底一年。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中国内底革命运动，在最近这个时期，所以能得到许多胜利和成绩，就是因为我们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有战斗力强的策略，有毫不疲倦的工作和勇敢牺牲的斗争；就是因为我党中央坚决执行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总路线。

（一）在什么地方具体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呢？

一、“对共产国际总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

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底首先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共中央不怕一切困难，不顾任何复杂，坚决不移地执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开的）所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以求达到预定的目的。什么是我们革命在这个阶段上的总的政治路线呢？我们现在的总的政治路线就是：尽力地和及时地把苏维埃中国和非苏区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无产阶级的统一领导之下联系和配合起来，以便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和一切军阀官僚底统治，并在全中国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底苏维埃政权。

同时，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只是规定了这个正确的总政治路线，而且能根据这个路线，具体地把最合乎中国革命运动每个时期条件底那些政治任务和策略任务提到计划的第一位。从四中全会到九一八东三省事变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未成立以前，我们这个路线曾经具体化为两位一体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创造和巩固真正的铁的红军，成立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另

一方面,在国民党区域广大的开展群众革命斗争——首先就是工人的罢工斗争。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中央[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以后,我们这个总路线就具体化成下列三位一体的口号:(一)以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去反对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二)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顺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底条件;(三)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能够彻底进行和领导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以取得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

根据这些基本口号的观点,我们党提出更加巩固红军,发展苏维埃区域和广泛开展反帝和反国民党的群众革命斗争等任务。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六个任务,事实上不过是上述这些基本口号更加具体化和显明化而已。在执行总路线和这些根本策略口号的过程中,我们党遇到过而且正在遇着许多非常多的巨大困难和复杂问题,特别是在最近两年中,大规模的五次“围剿”和马上随之而来的严重的六次“围剿”,以及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中国所实行的日益公开露骨的武装干涉——这一切已经足够说明我们的困难和复杂性了。

然而,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怕这一切困难和复杂性,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总政治路线——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路线。这一点不仅是革命运动胜利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是使我们党和党的领导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底主要条件。

这一点对于像我们党这样的党更特别重要,因为在四中全会以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发生过这类现象,就是一部分党的领导人物不去执行国际路线,反而曲解,修改以及公然离开国际路线,结果使他们自己堕入到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泥坑中去而莫能自拔(如1927年武汉时期中的陈独秀机会主义,1927年底和1928年初的瞿秋白盲动主义,1930年夏秋之际的李立三路线),同时,使党和革命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害。

现在,根据四中全会后新政治局领导的实际例证,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和每个劳动者一天一天地更加相信了:中共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

二、策略战斗性和灵活性底加强

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第二点的具体表现,就是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只是能够规定和提出这些基本的策略任务和口号,而且会根据这些口号采取和实行那些具体的、灵活的和出奇制胜的策略办法,以便保证我们总路线和基本策略任务底实现。

为的明白地证明一年来我们在这类具体策略办法方面底进步,可以举出下列几个问题作例子:

(甲)在胜利地打败国民党大规模“围剿”,更加巩固和扩大红军以及统一和发展苏维埃领域问题方面——我在开始时已经说过了,我们在苏维埃中国得到了新的大胜利。同时,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些胜利之所以能够得到,都是由于我们党正确领导底结果。现在就要问一问:在过去这一年来,在我们党中央所采取的那些为争取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底策略办法之中,有哪些办法是最主要的和最值得学习的东西呢?在我们看来,有下列三点:

第一点——形成,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国家性——在这个问题当中的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政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革命发展现在阶段上底经济政策,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换句话说:就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和使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底过渡时期底经济政策。但是,因为现时苏维埃中国底领土散漫和经济落后,以及长期不断战争环境底关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实行其经济政策底过程中,不能不遇到许多补充的困难和复杂性。因此,虽然在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底各种根本原则和法令;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党和苏维埃的工

作人员还是弄不清楚。于是,在苏区里,时常在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职工会的工作人员当中,对于经济政策犯着时“左”时右的错误。而正因为如此,党中央在最近这个时期,就特别更加严重地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中央给了全党以清楚明白的理论方针,中央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经济政策底根本思想出发点,应该以下列各点为根据:(一)中国现在阶段革命底性质,即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二)苏维埃共和国底实际情形,即是不断的长期的国内战争,现在领土底经济落后和不统一等情形;(三)革命底前途,即是为将来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而斗争。

除了理论和原则指示之外,中央还对于经济政策实行方面作了许多补充和确定,以便恢复、振兴和发展农、工、商业,并尽量利用当地所有一切可能的富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苏维埃中国经济状况上得到许多好结果。正因为苏维埃中国有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才保证了红军的给养,才改善了工农生活状况,才引起红军战士和广大劳苦群众在反对国民党军队和拥护苏维埃政权斗争中,表现出惊人的英勇,热烈情绪和牺牲精神。正因为有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才保证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战斗联合,只有这个巩固的联合,能保证我们的胜利。正因为有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才明白地在实际上显示出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区域之间底状况根本不同,才引起非苏维埃区域广大劳苦群众——首先就是上海,武汉,香港,广州,厦门,福州,重庆,成都,天津,哈尔滨等大城市的工人群众,对于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热烈深切的同情和赞助,才能动员他们的战斗力量去为拥护中国苏维埃,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围剿”和为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而斗争。

第二点——更加巩固和扩大红军并提高其战斗力——为达到这个目的,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在过去一年中曾采取了下列的办法:坚决实行苏维埃政府颁布的优待红军条例(首先就是动员群众

替红军战斗员及其家属种田收谷，邮政，交通对红军战士一概免费等等）；改良动员群众加入红军和扩大红军的办法；加强红军中工人和雇农的骨干及共产党的领导；由好的共产党员，少共团员，工人，雇农和贫农成分组织红军模范师和模范军；根据新的大规模战争的条件，将红军编制加以适当的改组；巩固和扩大各种军事学校以培养大批新的军事干部（例如，只在中央苏区中央军事学校内，最近一年来便有两期学生毕业，每期约 1500 人）；最后，加紧配合和联系正式红军队伍与其它群众武装队伍（武装的赤色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及没有武装而直接参加前后方战事工作底群众组织（交通队，探报队，看护队，慰劳队，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补衣队等等）之间底行动。在苏维埃中国内，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每个劳动者都坚决地执行自己的战斗任务，连每个妇女和小孩都起战斗作用。妇女在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底斗争中有极大的作用；其作用绝不限于在看护伤病战士和替红军洗衣，补衣等方面帮助，而且是直接参加作战行动。譬如举这样一个活的例子吧：

“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女士在红军离通、南、巴北上时，率农妇赤卫队五百余人，保护负伤官兵三百余人，驻于苦树坝附近。有田颂尧部一团，由小路袭去；张率农妇应战，敌军官长发现红旗，见前面山头有缠红布之农妇，即下令‘八百米达发现敌人，各放’！士兵不发一弹，山谷中口号大震：‘欢迎！革命的士兵兄弟到红军中来’！‘红军是打日本的先锋’！‘……’官长下令‘快放’，‘齐放’，但士兵仍不动。及团长率同马弁（即卫队）到来，以手机关枪督战，不前进者即用机关枪扫射。此时士兵大哗，其中有一下士向团长大声质问：‘老子们打了十几年仗，从未见过保国卫民的军队，放着东洋人帝国主义不打，打自家人，还要同堂客（四川呼女人为堂客）两个打仗！真岂有此理’！官长立即枪毙发言士兵。不料突来一片‘打死反动长官到红军中去’的呼声，一时大乱，团长亦被绑，

营长以上者无一人幸免。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事件,已传遍全川(报纸亦略有登载)。”

(见《中国论坛》1933年第2卷第9期,登载的
1933年5月25日成都蜀笑通讯。)

关于青年和少共作用,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少共),在1932年下半年和蒋介石军队作战当中,有一次在战胜之后检点俘虏时,他发现了其中没有将领和高级军官。他询问俘虏士兵,才知道将领和上级军官在前一天晚上就带着60个卫队逃走了。于是他立即翻身上马,率同骑兵连追踪赶去,经过24小时的奔驰,他终于将逃将赵冠英和其他上级军官及卫队全数活捉回来。因此,现在在红四军有一首军歌中,有这样一句话:“英雄陈昌浩,活捉赵冠英”(鼓掌)。

关于我们党善于组织群众帮助和拥护红军,以及人民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已深恶痛绝这些事情,就连蒋介石也不能不公开承认的。蒋介石与日本《中央公论》杂志记者谈话时曾公开说:

“地方人民,良莠甚难区别。正式赤军外,又有步队,游击队,即所谓农民游击队。此等游击队之编成,系于共产军占领某地后,即由共产军强制(?)被占地域之住民与强健之农人编制为队,应客观事实之需要,群起作游击战争,扰乱讨伐军后方,或袭击讨伐军之输送部队。其它如侦探,谋叛,掩蔽正式赤军之所在,均各尽其能,各致其用。平常时期,彼辈从事耕作,洎至必要时期,即全副武装为共产军队尽力。故无论任何良民,政府军队均不能不严为防范。最近政府军队数师覆灭,师长阵亡达二人者,实皆因此种游击部队,群起与共产军前后呼应,有以使然。再则游击队与良民无所辨别,因之军队出动讨伐,辄不禁起草木皆兵之感。即在未加入共产之良民区域,军队亦觉非杀尽良民,无从安心。杀时苟为游击队,自亦无可訾议。唯区别孰为游击队中人,孰非游击队中人,甚属

困难，有此困难，于是讨伐上遂引起困难之结果。即：（一）粮秣给养杂役之补给，陷入不可能状态；（二）匪区附近一带之良民，深恐讨伐军到达，泾渭不分，玉石俱焚，因之良民区域，渐为赤色浸润……”

蒋介石这个自供当然是不得已的，但是他的这个自供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在他这个短短的自供中，他无形中把他和托洛茨基派对共产党和红军底侮蔑造谣完全打得粉碎了。蒋介石和托洛茨基派不是经常侮骂红军为“杀人放火”的“赤匪”吗？现在，蒋介石在全世界面前不能不公开自供说：在苏区和邻近苏区干见人便杀遇屋即烧底勾当的，只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

第三点——有系统地及时地用联共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来推进中国苏维埃革命——红军冲破五次“围剿”底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苏联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和斯大林同志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结报告底发表。我们党曾广大地在群众中宣传斯大林同志在今年1月联共中监联席会议上底报告，——特别是报告中直接有关于中国问题的部分。例如，当斯大林同志讲到把工业化计划丢在末位底危害时，他直接说：“那时候，我们的情形就会与现在中国的情形多少相像，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于是现在只要不是懒汉，什么人都去欺压它”。我们党应用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这些话和苏联五年计划胜利底事实，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坚决地明确地宣称：只有中国布尔塞维克和在其领导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把中国从没有重工业，没有军事工业，没有国防设备，成为外敌经常军事袭击对象这样的国家，变成有自己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有国防设备和能够抵抗一切外敌侵略底国家。只有中国布尔塞维克和在其领导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把中国从经济上落后，政治上不独立和殖民地地位这样的国家，变成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自主的国家。只有中国布尔塞维克和在其领导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把中国从这样的一

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经常不断而且年甚一年地发生水灾,旱灾,虫灾,饥荒,失业,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屠杀和苦死千百万人民,变成那样的一个国家,在那个国家中,人民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没有饥荒,没有失业,完全消灭了麻醉人民底毒剂——鸦片,全体人民都过幸福的生活,并要建设没有阶级的,完全没有人剥削人,完全没有人压迫人的,光明的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就像现在在苏联在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之下所作的一切那一样。这种宣传和鼓动工作,曾把我们党、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底威信提到空前未有过的原则上的高度,同时就取得了极广大民众对我们的热烈同情和赞助。这件事情又一次地在事实上证明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同志断言底正确:“五年计划底国际革命意义简直是不可限量的”(见其在1933年1月联共中监联席会议上底报告)。

我更用不着说,应用联共的革命竞赛和突击运动等经验,曾经给了我们党在苏区和非苏区底党和群众工作以极多好结果;我也用不着说,在全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召集以后,我们党马上在中央苏区召集了江西八县的第一次贫农团代表大会^①,这一代表大会在深入反地主残余和反富农斗争方面,以及在动员农民加入红军方面,都收到了极大的效果等等(例如,代表大会曾决定在三个月内动员8万人加入红军)。

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在苏维埃中国所作底一切——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所作底一切,已经有伟大的全世界历史意义了。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在实际上证明了列宁和共产国际思想底绝对正确——证明苏维埃政权是世界制度。我们党在实际上证明了,苏维埃政权不仅适合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底需要,而且能适合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底需要。我们党在实际上证明了,

^① 即1933年6月25日至7月1日中央政府在江西省瑞金召开的瑞金、会昌、雩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等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

苏维埃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底唯一国家形式，而且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底工农民主专政底国家形式，同时，它并能保证这个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此外，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用自己的实际经验更加充实了列宁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和创造革命根据地（哪怕最初在很小地域以内）有极大意义和作用底理论方针。我们党在发展苏维埃革命事业中所积蓄的经验，不仅已经成为我们中共的最有价值的收获，不仅已经成为安南、印度、高丽、台湾、古巴、爪哇和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解放斗争底模范，而且已经成为值得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首先就是日本、西班牙等国的共产党员努力学习底教训。

（乙）在揭穿国民党是卖国党和证实苏维埃政府是英勇的武装民族自卫底政府这个问题方面——从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三省以来，以民族武装自卫去抵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底问题，成为了现代中国一切政治问题底核心。谁在这个问题中得到胜利，谁就成为中国的主人翁。但是，关于这一点不仅我们懂得，而且我们的敌人——蒋介石和其国民党也懂得。正因为如此，所以国民党无论怎样再三地不断地作下降日卖国底勾当，但随时随地却用尽一切手腕和武断欺骗与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作绝望的争斗。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是否会揭穿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底各种欺骗手腕和武断宣传，而使群众相信我们党的口号底正确呢？我们可以回答说，在基本上我们是作到了的。

如果想把最近两年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底斗争作一个概括的总结，那么，大概可以分作下列几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东三省事变至1932年初上海战争前夜止。在这个时期中，国民党的主要欺骗口号，一方面是散布南京政府准备对日宣战底空气，使民众幻想和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另一方面是高唱“静候美国主持公道”和“静待国联制裁暴日”。

我们党是怎样揭穿国民党这些骗人把戏呢？为的揭破国民党

这副假面具,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绝不限于提出和宣传我们总的策略口号——“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或者“人民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党在实际上组织了各种各式的群众反日运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扩大组织反日义勇军,由群众向国民党要求立刻发给反日义勇军枪械,立刻出兵收复失地等等。结果,逼得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自己实际行动中把自己的假面具揭穿了(国民党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处枪杀反日工人、学生和市民,公开禁止一切反日运动和公开禁止主张对日宣战等等)。

第二时期——从上海战争至1933年1月日本占领山海关之时止。在这个时期当中,国民党的主要欺骗口号是:“上海战争失败是因为红军捣乱后方”,因此,“抗日剿共必须并重”,但“对外必先对内”。

我们党怎样揭穿国民党这些骗人的把戏呢?为的揭破国民党这副假面具,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作了很多的事情:不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努力帮助参加上海防卫战底工人和19路军兵士;同时,党更积极地参加了英勇上海防卫战底一切政治上和军事上底行动;中央苏维埃政府还在1932年初便公开对日宣战,同时,并发表了动员红军和民众积极准备对日作战底专门训令;党和苏维埃政府组织了广大民众反对上海停战协定和李顿报告书;党制定了对各种形式的反日游击队伍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底策略,并且把这个策略在东三省、热河各地实际应用起来,以便广大开展反日游击战争;特别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就是当日本进攻山海关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发表的告全国人民和军队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上,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表示出他们要武装抗日底诚恳热望和积极准备,他们公开宣言愿在最简单条件之下:(①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②给人民以最低限度的民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等自由;③允许人民自由地扩大组织和

武装反日义勇军)与任何军队订立共同武装抗日底**战斗协定**。结果,使蒋介石和国民党被逼迫得自动地公开地揭破自己的假面具。蒋介石公开对军队和民众下令说:“在共匪未肃清以前,绝对不得言抗日,有敢言抗日者,定严惩不贷”,这样一来,蒋介石和国民党又不能不在广大民众面前暴露出自己降日卖国的鬼脸。

第三时期——从蒋介石公开发表禁谈抗日的禁令之日(今年4月底和5月初)至现在。在这个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公开宣言停止抗日,其借口是说中国太贫太弱,目前没有抗日的可能。我们党怎样揭穿国民党这种骗人鬼话呢?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为的用自己的革命政策来显然对抗蒋介石这种公开降日卖国政策,主要地采取了下列的步骤: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蒋介石发表“禁谈抗日”命令的第二天,马上发表告红军和民众书,号召组织100万红军,以便对日作战;同时,号召一切军队和民众不顾蒋介石的禁令而自动起来与红军一起去武装反抗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党坚决地拥护革命反日民众团体提出来的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底具体纲领,这个纲领之中的要求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但是真正能够组织民众武装抗日。这个纲领是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最广大民众所能够了解和接受的。纲领中心内容是:(一)全体民众总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战争的前方和后方工作;(二)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到前线去对日作战;(三)把国内一切兵工厂、军械局、火药库内的枪炮子弹和从外国购买来的军械拿来使全民总武装;(四)具体解决抗日军费问题底办法——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银行、铁路、航业、矿山、工厂、作坊和商品,停付日债一切本息,没收一切卖国贼财产,征收统一所得累进税,在本国和外国(首先是华侨)当中募捐等等;(五)建立人民武装抗日底总领导机关(如“中华全国人民武装抗日自救会”)等等要求。此外,我们党普遍地在民众间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革命战争底**革命性,进步性,现实性和胜利可能性底理论**,广大地阐明俄国布尔塞维克胜利地打退了

14个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底经验,英勇上海防卫战底经验,东三省反日游击战争底经验,红军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屡次“围剿”底经验等等,以便尽力在实际上证明:在现时国内和国际环境之下,中国武装人民底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不仅有组织和实现的可能,而且其胜利有可能性与现实性。

正因为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了这样长期的、系统的、灵活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斗争,我们才能逐渐地揭破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一切欺骗和把戏,才能使群众在自己的亲身政治经验中来信服我党口号底正确。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一步一步地把我们的口号——“推翻国民党是顺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底条件”,“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彻底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底战士”等——变成广大民众的口号。正因为我们党进行了这种毫不倦怠的艰苦奋斗,来组织反对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所以东三省、热河、福建和全中国民众才越来越多地团结在我们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底周围,把它们认作是唯一能真正领导神圣的反日民族解放战争底政党、政府和军队。

此外,必须指出,除上述这些主要成绩之外,我们党在这个时期,在策略方面,在群众工作方面,还得到有其它的许多的进步——首先就是在组织、准备和实行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中,在企业内建立工人战斗的统一战线底工作中,以及在黄色工会内的工作中底进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康生同志将要讲到的。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进步,所以才能使我们党在赤色工会和在黄色工会方面底工作达到了初步的转变。

三、组织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第三点底具体表现,就是其组织上底更加巩固和增长。党员在最近这一年从30万人增加到41.06万人。而且不仅在苏维埃中国增加了,同样在非苏区有很大的发展。在去年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时,我们在非苏区实际上不过有

3万党员,而且因为严重白色恐怖的关系,差不多其中有一半不能与党经常发生联系。现在非苏区里有统计的已经有6万以上党员了,而且其中有一半以上已能够经常交党费和在党组织内工作了。在党员质量方面,也有相当的改善,工人党员成分以前在全党中平均占15%—20%,现在已占25%—30%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底具体性和生动性,对企业中支部工作底注意力,都比前此改善和加强了。许多地方党部和群众组织底独立工作能力和自动性增长了。党报作用加强了,党报质量相当改善了,在非苏区和苏区底党报份数都增多了。引进了许多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干部政治的和理论的水平以及工作积极性都提高了。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底无情的两条战线上斗争和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底自我批评——这一切就是说明我们党更加巩固和增长底主要事实。最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管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和其各种走狗们,以及党内个别机会主义分子们,对我们党和党的领导——特别是对党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作下如何卑鄙龌龊的造谣、侮蔑、谩骂和阴谋诡计,不管它们如何狂吠中国共产党底分裂和殒落,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这个全会上,完全有权利高兴地向一切兄弟党说:我们党在其布尔塞维克中央领导之下,现在达到了在其13年存在底历史当中空前未有过的统一、团结和一致。(鼓掌)这一点也就是我们党和革命在最近这个时期能得到胜利底根本基础。中国共产党现在是联共以外,在全世界上第二个胜利地领导苏维埃国家和工农红军底共产党了。

这当然绝对不是说,在最近这个期间,在中共内已经没有个别工作人员犯过这样或那样“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错误了。如果像在我们党这样一个大的群众的政党内,在这样非常复杂和困难环境之下工作的党内,没有一些工作人员犯过个别问题的错误,那简直是一件怪事了。我们大家都记得,中共在其中央领导之下,在最近这个时期,经常进行了而且进行着锐利的两条战线上底斗争。

党在中央领导之下,首先坚决反对目前阶段上底主要危险——右倾倾向,这个倾向主要表现在,党内一部分分子对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日渐逼近的帝国主义对苏维埃革命底公开武装干涉,表示悲观、失望和消极的情绪和观点。同时,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同样坚决地反对个别领导同志的“左”倾情绪,例如有个别领导同志还在五次“围剿”时,便把国民党估计成为“死尸”等等。

中央帮助苏区中央局反对一部分工作人员在苏区各种重要问题上底各种不正确倾向:在**职工劳动问题上**,——反对那种表面上“左”的,实际上是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底孟塞维克式了解底倾向,这种倾向具体表现在,把个别工人阶层的局部的和经济的利益与整个工人阶级的根本政治利益对立起来;这种倾向底具体表现,就是有些个别的工作人员,有时不顾苏区军事环境和经济状况,提出一些不仅不能办到而且甚至有害的要求(例如要求雇主不用苏维埃纸币而用现洋发工资等等),这些分子用以掩盖自己错误的是一些“左”的词句,例如什么“在苏区工人斗争的形式应当与国民党区域没有什么分别”等。同时,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底另一种态度,就是有些工作人员在军事环境和经济困难借口之下,完全否认有改善工人群众物质状况可能,并且否认赤色工会应尽保护工人日常切身利益底作用。在**土地农民问题上**——首先反对右倾倾向,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就是不顾基本农民要求和情绪,延缓或阻碍实行平分土地;同时,反对另一种表面上好像“左”的,实际非常有害的倾向,就是有些地方时常不断地(甚至一年三至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经由基本农民群众分配过了底土地。在**军事问题上**——一方面,反对那种对于国民党军事“围剿”抱悲观失望的态度,反对那种经常提议红军采取防卫策略,甚至要求将正式红军分散成为零星的小的游击队伍,以及完全否认巩固根据地底可能和必要等这类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

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避免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之下应战;或者为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重要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

中央同样领导非苏区党部在党和群众工作各方面进行两条战线上底斗争,例如:在工会工作中——反对个别党的和工会的工作人员这样一种不正确的右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以为我们党和赤色工会独立地组织和领导工人罢工是不可能的,以为工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尤其是反日反帝斗争联系是不可能的,或者以为赤色工会底向前发展和变为广大的群众组织是很少希望的;同时,反对“左”的狭隘的关门倾向,其主要表现,就是不了解建立和巩固一切工人在反对资本家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统一战线底必要,不了解加紧在黄色工会中工作和在其内部建立赤色反对派组织底必要,以及机械地把党的基本政治要求与工人部分的经济口号混淆起来。

在反帝的民族革命斗争中——中央在全国——特别是在东三省和北方进行坚决的斗争,首先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观点,这些分子不相信广大民众反对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有实行和胜利底可能。同时,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有害倾向,那些人了解、不愿意和不善于根据各地各个时候底具体条件,来建立和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底一切反帝力量底统一战线。

在农民和士兵群众中底革命工作方面——中央领导地方党部反对以为北方和西北根本没有武装行动,或者没有夺取暴动胜利可能底这种右倾观点,同时,反对有些地方党部把农民或士兵武装行动当作儿戏,没有相当的足够的准备,便实行武装行动等冒险盲动的倾向。

中央领导全党在苏区和非苏区无情地反对那些破坏党的铁的

纪律,破坏秘密工作条例等坏倾向,反对任何人的任何派别倾向底企图。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进行毫不留情的两条战线斗争底基础上,更加巩固和成长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成为真正列宁主义的、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党了。

(二)我们的错误和弱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我们要问,除上述的这些成绩之外,在最近一年来,我们党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错误和弱点,主观力量比较起客观形势来相对落后底现象,是否已经完全克服了呢?

在非苏维埃中国党和群众工作中的错误和弱点是很多的,而且并不是不重要的,它们主要表现在下列各点:

直到现在,还不能保证在广大发展的反帝运动当中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骨干,其原因是由于我们党和工会在许多重要城市和中心地方(武汉、广州、九江等)底工作和组织太薄弱,特别是在国民党和黄色工会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太薄弱;在这样严重的革命和战争的环境当中,许多地方党部在敌人武力当中,还没有经常的和系统的工作,这简直是不可允许的弱点和错误;在广大农民和贫民群众当中,只做了很少的工作;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智识分子的群众斗争,抱着忽视的态度;对于在劳动妇女和青年当中的工作和意义估计得不够;最后,为秘密工作最基本原则而斗争和反奸细斗争都作得不够。

在苏维埃中国,我们在党、苏维埃和群众工作中,也发现了自己的许多弱点和错误,其中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许多党和苏维埃组织对于在中农当中的工作注意得不够,而且有时候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首先就是“左”倾幼稚的态度),党和苏维埃组织相互间,党、苏维埃和群众组织相互间,时常没有足够的正确的关系(或者相互混合,或者互相代替,或者互不相关等

等)；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对于反对反革命组织及其活动底斗争和警惕性有减弱的倾向等等。

虽然党和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把主观力量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及可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主观比客观相对落后的现象，毫无疑问仍然是存在着的。中国现在的客观环境已经是这样：假若我们的党更加紧工作，我们完全有可能把那些誓死不愿当亡国奴，誓死为抗日救国而奋斗的那些忠实的“民族武装自卫者”（或者所谓“爱国志士”）夺取到我们方面来；同时，我们也完全有可能把那些贫民、失业工人和饥寒交迫的劳动者，夺到我们方面来；我们有完全的可能把他们都变成为民族解放，为米粮，为土地，为工作，为房屋而斗争的积极战士，把他们实际上变成为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统治而斗争底英勇战士；同时，就使他们变成为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而战底生力军。而这类忠实的反帝战士，这类无衣、无食、无住的劳苦群众，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和东三省各地，事实上不只是几百万，也不只是几千万。但是，直接在我们党组织和领导之下而进行革命斗争的，还不过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在这种意义之下，我们得到的成绩与客观环境的需要和可能性比较起来，其落后性依然是很大的。为消灭这个落后现象而斗争，是中共最近的战斗任务。

第三章 中国苏维埃革命最近的前途和困难与 中共和兄弟党底任务

（一）中国苏维埃革命最近的前途和困难

现在国际和国内一般状况，毫无疑问地比前此任何时候都更加便利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发展和胜利。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在最近将来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决定意义的胜利，抑制太平洋上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和帝国主义者进攻苏

联战争底爆发；或者是帝国主义大战——首先就是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战争，在中国苏维埃革命还未得到决定意义的胜利之前就爆发起来。关于反苏联战争很快到来的可能，关于这个战争在每分钟都有爆发的可能，在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在中东路上不断的公开的挑衅和阴谋，在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远东边界上实行军事试探的行动，就可以明白看出了。但是，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形之下，我们中国共产党认定我们底主要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得到决定意义的胜利而斗争。或者用莫洛托夫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完全打溃敌人和使红军胜利”。据我们的意见，莫洛托夫同志这句话不仅合乎联共在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时的任务，而且也合乎中国共产党在最近将来的主要任务。

然而不管一般的环境是如何顺利，但是必须严重地估计到这一点，就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在其向前发展和争取决定意义胜利的道路上，将遇到不会比现在小而是更大些和更多些的，国际的和国内的困难和复杂性。不过从这些困难和复杂性的本身性质看来，他们主要的都是我们运动向前发展中的困难和复杂性，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不能克服或不能战胜的。同时，因为世界范围内和中国内部事变向前发展的关系，所有这一切的困难和复杂性，——至少是其中许多的和并非不重要的困难和复杂，完全有可能不仅逐渐地而且是突变地成为容易战胜和克服的东西。

中国革命的根本敌人是一切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困难。虽然中国离欧美帝国主义中心较远，但是，中国在海陆双方和这样一个强盗的、专倚劫掠为生的封建资产阶级君主制度的明治、荒木底日本帝国主义毗连着。这个凶悍的强盗，已经用武力把中国整个活的肌体上割去了东三省，热河和察哈尔，这个暴徒时时都准备着更进一步的向中国人民进攻，这个贪婪无厌的野兽，可以从本国和殖民地在最短时间内，派遣大批的海陆空军到

中国底一切腹地。中国底一切主要经济命脉，都早已掌握在国际帝国主义底手里。中国的主要城市和江海口岸，早已实际上被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了。帝国主义公开地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时期一天一天地快要到来了。

中国苏维埃革命向前胜利底第二个主要困难，就是我们国家底经济上和军事技术上的落后。从这两个主要的困难就产生了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弱点，虽然这种不平衡在最近一年来，已经有逐渐减少的趋向，然而直到现在它仍然是苏维埃革命发展当中底主要弱点之一。

此外，一方面，现在苏维埃领土底经济落后和不统一，以及红军在军事技术方面的缺点；另一方面，我们党在非苏维埃中国，首先是许多大的中心城市和东三省当中，党和群众工作底薄弱，以及我们在敌人基本军队中工作底不够等，就形成了我们的补充的困难。

用一切方法，首先就是加紧动员和组织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区域几千万以至几万万劳苦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底旗帜之下，为有饭吃，为得到土地，为民族独立而进行广大的革命斗争——这就是战胜一切困难和复杂性及夺取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的胜利底最可靠的和最正确的办法。

（二）新任务，新条件之下要用新的方法做工作

为的巩固革命既得胜利和实际上创造争取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的胜利底前提，中央向全党提出下列最近的任务：动员一切力量冲破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第六次“围剿”，更加用一切方法巩固和扩大红军，巩固和扩大苏维埃底国家性，加紧为更加巩固和扩大苏维埃领土而斗争；尽最大可能在国民党中国去发展和领导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当中，要创造无产阶级的骨干，以便保证无产阶级取得和巩固领导权，广大地开展在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工人以及无组织工人中的工作，夺取他们到我们方

面来,以便把赤色工会变成广大群众的组织,加紧组织和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底罢工运动;用一切方法发展反日的群众游击运动(特别在东三省和北方)并夺取这个运动的领导;坚决地作夺取士兵群众底工作,并提高党在国民党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斗争中底作用;最后,更加巩固和发展党,首先就是使党员成分和领导机关成分的工人化,教育和引进成千成万的新干部,在那些原来没有我们党的地方,或者有,但是很薄弱的地方,去建立坚固的和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地方党部,在军事工业和交通工业当中,建立强有力的党的组织,加紧反奸细的无情斗争,加紧为保证秘密工作和铁的纪律底斗争,更加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为理论统一性,组织统一性和团结性,为反对各种各样离开共产国际和党的总路线底机会主义倾向而斗争,特别是为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底右倾倾向而斗争。

有些人猛然看起来,或许会以为这些任务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同志们!这种观点完全是不对的。哪一个要看不出这些任务当中的新东西,他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是他不从实质上,不从真正内容上,而从形式上,从名词上来了解问题。其实,时常同样的名词所说明的任务,应当随具体环境来作不同的了解和实行。举几个例子来看:

第一个例子,关于在苏维埃中国形成、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国家性底任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提出的。但是,如果在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对这个任务底了解和执行,就是成立临时中央革命政府和制定及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各种基本法令和条例;而在中央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新式国家在中国形成后,我们对于这个任务底了解和执行,就是把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法令和条例具体化起来,并且根据新的具体环境将它们加以补充和校正,以便在实际上逐步实行;那么,我们现在能否像前此一样去了解和执行这个任务呢?谁都会回答说:

不能。现在我们对于这一任务底了解和执行，应当比较有更高的程度，应当比较有更具体的形式。例如，更加开展经济上和文化上底建设，更加发展和肯定赋税制度和国家预算决算制度，更加严格注意各级苏维埃底选举、改选和召回代表权底实行，更加改良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局底工作，更多地尊重革命法律等等。

第二个例子，关于开展反帝运动底任务，我们时时都说的。但是能否无论什么时候对这个任务作同样了解和执行呢？譬如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和以后，特别是在现在，一方面，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已经在事实上和言论上完全暴露出卖国贼的真面目；另一方面，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更加紧向中国进攻，以便完全瓜分中国；我们能否说现在反帝任务与前两年所说的反帝任务作同样了解和执行呢？谁都会回答说：不能。因为以前这个问题——“或者中国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出中国，以取得中国的民族解放；或者全中国人民都变成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摆在广大群众底面前，而国民党卖国辱国底真面目，也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暴露得明白和深刻。但是，现在我们对于反帝运动任务底了解，已经是直接组织和实行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了。现在我们完全有可能把中国民族危机底出路问题，不仅公开地和半公开地提到全体人民各阶层中去讨论，提到一切群众组织，一切群众会议和一切群众日常生活中去讨论，而且易于在实际上对群众证明我们的革命口号底正确，并引导他们走上坚决战斗底道路上去。在以前，譬如说在东三省九一八事变以前，能否这样提出和解决问题呢？当然不能。

第三个例子，关于在敌人武装力量中工作底任务，我们时时都说的。但是，在现在政治条件之下，我们党在执行这个任务时，有没有点新的东西呢？我们回答说：有的。新的是什么呢？新的就是：（一）我们现在对于敌人军队提出的任务，已经是夺取敌人军队要比瓦解敌人军队更重要些。因为根据东三省，热河，上海，江西，

福建,四川和其它地方底实际经验,在现在革命力量和影响发展的条件之下,在空前未有的民族反帝高潮之下,只要我们作了相当的工作,有时候甚至于简直不充分的工作,就有很大的可能,把这个军队从帝国主义后备军和中国反革命的武装支柱,变成为反对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以及卖国贼底战斗力量。(二)我们的军事工作,现在当然仍和以前一样,主要的是夺取士兵群众。但是,现在我们同样应当注意在敌人军队的下级以至中级军官成分当中的工作。譬如,在下级军官和各种军事学校的青年学生当中,有许多是真正热诚的所谓“爱国志士”,他们真正愿意为民族解放与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拼命,他们到军事学校或军队中的目的,很多只是为的得到军事智识和武器。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暂时地曾被国民党民族武断欺骗蒙蔽过,但是,他们现在一天一天地感觉到国民党卖国殃民的滔天罪恶,感觉到靠国民党绝对没有希望,因而极力企图在革命和共产党方面去找新出路。

第四个例子,关于在灾民和失业工人中工作底任务,我们以前也说过。但是,在现在条件之下,在我们了解和执行这个任务当中,有没有什么一点新的东西呢?我们回答说:有的。新的是什么东西呢?新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些群众中工作底目的,首先就为的是,一方面应用他们这些最广大的人力后备军来扩充红军和赤色游击队底队伍,以加强反帝国主义和反国民党底武装斗争;另一方面,预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有可能利用这部分力量做后备军去反对革命(例如蒋介石不久以前下命令要在三个月之内招收60万新兵,而他首先就是要在灾民中去招募)。

或者最后一个例子,关于夺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革命方面来底任务,我们也是时常都说过。但是,现在在这个阶层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没有呢?我们党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有没有新的东西呢?是的,有的。一方面,因为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因为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之下,广大群众生活痛苦到极点,而且广

大民众的身家性命都没有丝毫保证；另一方面，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底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因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巨大的胜利，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中，发生了一种显然的变化。就是发生了倾向革命和共产党的“左”倾情绪。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任务，首先就是加紧在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的工作，把他们之中许多人变成为反帝运动的积极战士，应用他们作为宣传鼓动员的力量，并且把他们之中的各种专门人才吸收到我们方面来去帮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工作。

此外，必须严重地指出这一事实，就是我们实际工作落后于客观形势底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在党和群众组织当中，有许多同志对于党的任务底了解和执行，时常是一成不变地，琐碎地，机械地，教条式地；时常是不曾估计具体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不曾在新的条件之下，用新的方法做工作。全党应当在这个问题方面，起一个根本的转变。

（三）红军在反对六次“围剿”中底新胜利和兄弟党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底任务

你们大家大概都还很清楚记得，在不久以前（今年9月6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正主席毛泽东同志，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同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曾经共同发表宣言，告美、英、日、法、德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劳动者，以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仇敌和中国人民底朋友。在这个宣言中，他们号召全世界劳动群众起来帮助反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六次“围剿”。他们在这个宣言上说：

“兄弟们！姊妹们！同志们！朋友们！”

为保卫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成千累万男女老少劳动者不惜用自己的血肉，头颅[颅]，生命等，英勇地打退了那人数比他们多，军器比他们好的国民党的一连五次的“围剿”。现在，这个年轻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却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危险关头了!

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们向你们请求:

帮助我们反对那些要使我们再过黑暗的非人生活,并且要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呵!”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宣言给了很大的响应。

一切中国革命的朋友和仇敌们,每天都盼望知道关于六次战争的消息。大家都想急于知道,在赛克特——过去德国国防总长,现在国际资本走狗(蒋介石)底走狗——直接指挥之下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次与红军作战时到底得到了怎样的结果。

现在在12月初,在六次“围剿”战争的三个月后,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十三次全会上,可以向全世界宣布:

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反苏维埃的六次“围剿”,在基本上已经溃散了!(鼓掌)。

只有在赣北战线上,在红军和蒋介石主力之间,现在仍在进行残酷的战斗。红军在这条战线上,还未得到决定意义的胜利。但在其它一切战线上,在福建,广东,四川战线上,英勇的工农红军,已经取得了反六次“围剿”的决定意义的和完全的胜利。

虽然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我们军事胜利的全部消息,但是,据我们已有的个别材料看来,在各方面的胜利已经是大有可观了。例如:在福建战线上,19路军还在10月初已经被我们打败了。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得到了这样的胜利:19路军的6师有4个师(第79,60,31,32师)被我们打败了。卢兴邦的一师和刘和鼎的一师也受到了严重的失败。19路军有三团人投到红军方面来。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军队的3300名兵士,1个旅长,3个团长,4个营长。在占领延平时,红军得到了12只满载军火,粮食,盐 and 金钱底大轮船(例如,要1万以上的工人才能把其中八只大船上的物品卸下来),红军得到了4600支步枪,50支重机关枪,30架轻机关枪,500

支盒子炮,2000顶钢盔帽,40万发子弹,500个手榴[榴]弹和3架军用无线电机。(鼓掌)差不多闽西,闽北各县都完全苏维埃化了。

在四川战线上我们的胜利也同样的不小:田颂尧的46团军队,差不多完全被红四军打溃了;结果,我们得到6000支步枪,100架机关枪,俘虏了他们的几个上中级军官,他们的兵士,死、伤俘虏等一起损失约1万以上。刘湘和杨森的一部分军队,同样被打败了。赖心辉的第8旅在马边、峨边等川西各县暴动起来了,暴动的士兵和农民游击队已经组织成为四川红军第一独立师了。这样,在川西就创造起来了新的苏维埃区域。广东军队,在赣南战线上,因为他们的后方闹问题,因为他们接连打了好几个败战,现在已经暂时的完全停止了对我们的军事行动。在赣北战线上,红军打败了蒋介石的第96师、第5师、第6师、第79师、第23师等,同时仅仅在打破蒋介石第5和第6两师的胜利当中,红军便得到了7800支步枪,两架军用无线电机。红军曾经好几次地给赛克特和蒋介石的军事计划以严重的打击。现在已经时常使他们在许多地方不能不从进攻的策略变成保守的策略。因为最近福建事变的关系,那个原来已经感觉后方不安的蒋介石军队,更加感觉到楚歌四面了。失败的空气现在充满着蒋家军的后方。

应当特别着重指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中共直接领导之下最近得到的这种胜利,是空前未有过的胜利。从军事的观点看,这个胜利的空前意义是:第一,它是在这样短的期间中得到的;第二,在这个胜利的过程当中,红军不仅占领了而且能把万县和延平这两个大城市和商埠拿在自己的手里;第三,在这次战争中,红军更加表示出它的伟大的威力,以致逼得有些敌人也不能不换副面孔来和红军说话,并暂时地停止了对红军底军事行动;第四,红四军和红二军^①在四川万县附近会合了,这一点是我们很久想做而未

^① 红二军,指红二方面军。

能做到的事情。从政治的观点上看,这个胜利底空前意义是:第一,这个胜利把红军的威信更加提高了,使人们相信它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把苏维埃政府底地位也更加抬高了,使人们更加不能不在事实上承认这个政府。第二,因为这个胜利底结果,在许多民众和军阀军队士兵群众中间,很快地发展着革命化的过程——特别是在苏区邻近各地方。福建的最近事变,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福建独立政府底成立,福建政府发表许多激进的口号,不仅是反蒋反日,不仅是宣布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罢工、示威等自由,不仅宣布召集所谓生产者代表大会,不仅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不仅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而且甚至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布中国完全独立自主,宣布按人口来平均地权,以及将一切森林、水利和矿产等均收归国有。福建政府之所以提出这许多“左”倾动人的口号,不仅是由于19路军上级将领玩弄手腕和左倾词句,不仅是由于其他军阀政客们叫些好听口号以求得保证自己反蒋斗争底胜利,而且是由于广大民众、士兵群众以至一部分下级军官成分的革命情绪对上层压迫所产生的结果——这些士兵和下级军官之中底许多人,曾经和共产党及上海工人一起,在1932年春季参加了英勇的上海抗日民族防卫战,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篇幅上,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可以断言,福建事变绝不会孤立无援的,在福建事变之后,接踵而起的,料还大有人在。福建事变客观上应当引起全国新的更大的更广泛的反蒋反日的群众运动底怒潮。第三,如果以前我们每次的胜利,使反革命派别更加团结和更加一致地去进攻红军,那么,这一次因为反革命在自己经验中感觉到红军是不可能战胜的力量底缘故,我们的胜利却反而临时地加紧了反革命营垒中底分裂、冲突和公开火并,这一点就必然客观上有利于苏维埃革命底向前发展。一方面,根据红军和全国革命运动力量底增长,另一方面根据帝国主义者相互间冲突底极度紧张和因之而起的国民党内部斗争底加剧,我们可以预言,在

不久的将来，中国人民和英勇工农红军一定要共同欢呼庆祝完全冲破六次“围剿”的胜利！反革命营垒内的这种紧张局面，是由于最近日本行动和蒋介石完全公开投到日本帝国主义怀抱中去等事件引起的。据最近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蒋介石和日本又签订了新协约，这个协约主要内容包括下列几点——日本允许蒋介石的条件是：（一）放弃领事裁判权；（二）借款；（三）用日本顾问替代德国顾问；（四）保证蒋介石底军事供给。蒋介石对日本的交换条件是：（一）互免商品入口税——实际上就是免一切日货进口税；（二）承认中国北五省是日本势力范围，日本负责担负这五省的外债，中国只有在日本同意之下，才有权利租给别国新租界；（三）在法律上正式承认“满洲国”。因此，美，日，英之间底冲突特别紧张起来了，日本在占领东三省、热河和察哈尔以后，现在实际上又取得了北方富庶五省底完全监督权；而且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帮助之下，时时有进占全中国底危险。美国一方面尽力企图恢复自己在南京政府中底原有地位，另一方面在南方和北方更加积极活动起来——首先就是在福建和广东，美帝国主义希望经过 19 路军上级将领来加强自己在福建和广东底势力，同时将英日走狗从这些省份中排挤出去；英国则一方面与法国签订了共同瓜分西北和川边及云南等省底协定，另一方面在总的方面赞助日本反对美国底斗争；而同时又进行严重斗争去反对日本在北方和长江流域影响底增长，并且利用自己在华南地位来进行抵制日货底运动。这样一来，就把国民党内部各派别冲突也非常剧烈化起来了。

如果要问：在最近的将来，如果在红军完全冲破六次“围剿”以后，在中国将发生什么情形呢？据我们推测，大概不外下列两种可能的情形：

（一）或者因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因为对于革命运动发展发生极度的恐惧，于是又暂时地把自己相互冲突和缓一下，以便延迟相互之间的公开火并，而得以共同力量去组织新的反苏维埃“围剿”；

并且就是很快地爆发帝国主义者的直接的公开的对苏维埃革命底武装干涉,也并非不可能的——首先就是英,日等帝国主义者在四川,福建和江西等底武装干涉行动;

(二)或者因为帝国主义者暂时还不愿采取那种代价太大的公开武装干涉的办法,因为这些强盗相互之间冲突得厉害,特别是因为国民党在一连六次“围剿”战败后,不能不需要相当时期来重新搜集和准备力量去进行新的反苏维埃战斗——红军或许在许多战线上得到某种形式的暂时的(虽然是为时不久的)军事休息(即是说,敌人停止对红军底军事行动)也并非没有可能的。

但是,应当着重地懂得,帝国主义者很快地组织新的隐蔽形式或公开形式的武装干涉底可能性,目前还是大于其它的可能性。而且,无论在这种情形也好或那种情形也好,在完全冲破六次“围剿”以后,中共为争取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胜利底斗争,为胜利地抵抗帝国主义者公开方式或隐蔽方式的武装干涉底斗争,无论如何不能有丝毫地减轻,而应当是更紧张的和更严重的战斗任务。

我们的兄弟党——首先是日,英,美,法,德各国共产党,在真正拥护和帮助中国革命和中国苏维埃方面,也应当这样地提出和解决问题。

然而,应当用布尔塞维克所特有的爽直性,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说出:虽然在反对六次“围剿”斗争中,在欧洲和美洲兄弟党工作中看到初步的转变,首先就见到在党和群众刊物上对于宣传中国苏维埃革命问题较前加多,对于在群众中宣传鼓动拥护中国苏维埃底工作也较前广泛;虽然我们的日本兄弟党,英勇地,布尔塞维克式地,用尽一切所有的力量,起来反对那血腥的以明治和荒木为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起来拥护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虽然我们的德国兄弟党,能不顾残酷的法西斯蒂白色恐怖,用尽一切力量,起来揭发赛克特和其他德国将军参谋参加国民党反苏维埃“围剿”底兽行,起来暴露社会民主党领袖格尔仁斯基和其助手魏

一斯替蒋介石警察机关服务底罪恶；——然而，直到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我们的兄弟党所作的拥护中国革命和反对远东帝国主义战争底工作，还远远地落后于他们的帝国主义政府在反对苏维埃中国组织和进攻苏联战争及瓜分中国世界大战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

我们兄弟党在这个有严重意义的工作中，表示出这样长期的落后性，其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我们同志对于中国革命底国际意义和作用估计得不够呢？他们或许以为，中国革命是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某种不甚重要的助力，所以不值得对中国革命加以严重的注意。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一个极蠢笨的错误。这种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态度，一般地就是不正确的，非列宁主义的，而对于现时中国革命，尤其是不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现在的革命，绝不是什么某个极小殖民地国家内发生的某一种自发的群众运动，不过因其有反帝性质，所以客观上带有革命性。中国现在革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苏维埃革命，中国现在革命是世界革命整个链环当中最主要的一环。现在中国革命向前胜利底每一个步骤，都是在实际上创造将来更进一步转变到实行胜利地社会主义建设底前提。

或者是因为这样吧，就是我们许多同志对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问题，还保存有那种错误的和不正确的观点，即是那种早已在1926年就被斯大林同志严厉指责过了的观点吧？他们或许还这样了解帝国主义干涉底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从帝国主义国家运送大批军队到中国去，那么，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帝国主义干涉。现在且看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怎样指示的，他说：

“而对于干涉问题时常了解成这样情形，就是要有运送外国军队到中国领土内这件事实；要没有这件事实，那也就没有干涉。同志们，这是最蠢笨的错误。干涉并不限于运送军队，

而运送军队并不能成为干涉底主要特点。在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底现在条件之下,直接运送军队时,可以引起许多的抗议和冲突,所以干涉有更巧妙的和更隐蔽的形式。在现在条件之下,帝国主义所打算的干涉,就是采用组织附属国的国内战争底方法,财政上帮助反革命去反对革命底方法,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他们的中国走狗去反对革命底方法。台尼金和柯尔卡克,犹尖尼奇和乌兰格尔反对俄国革命底斗争,帝国主义者曾极力想把这个斗争解释成绝对是本国内的斗争。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不仅我们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在这些俄国反革命将军底背后,站着有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如果没有这些帝国主义者底帮助,俄国严重的国内战争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现在也应当这样说。吴佩孚和孙传芳,张作霖和张宗昌反对中国革命底斗争,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反革命将军受不到各国帝国主义者的指点,如果帝国主义者不供给他们以金钱,军火,指挥和顾问”(见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底中国问题委员会上底演讲)^①。

斯大林同志关于1926年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底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个指示,对于目前蒋介石和刘湘,陈济棠和张群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红军底斗争,更是加倍地正确。我们大家都相信,而且我们的敌人也公开地说,如果没有日,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者拿金钱、军火、指挥和顾问等底帮助,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早已被强有力的人民苏维埃革命从中国领土上推倒了。而对于干涉问题底这种意见,对于现在中国情形,尤其是绝对不正确,因为不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已实行公开武装干涉,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现在每天每时都大大地在中国领土内增加自

^① 参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23—324页)。

己的海、陆、空军力量。此外，必须估计到一件有极大实际意义底事实，就是中国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因此，即在所谓“平时”，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驻有相当的军力，因此，即在公开武装干涉底第一个时期，当帝国主义者还没有感觉到在华军力不够，当他们的干涉行动还没有受到严重打击以前，他们的确还不需要运送新军队到中国去。

最后，是不是为的这样原因，就是有时我们同志对于本国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底革命斗争，与拥护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底国际主义底斗争之间底相互关系，还了解得不够，以致把它们两者分割或对立起来呢？如果是这样，那就要严重地去研究俄国布尔塞维克在列宁和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在十月革命胜利中底经验。难道不是大家都知道，正因为正确地把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和争取和平底真正国际主义革命斗争，与工农为面包、为土地底革命斗争以及被沙皇和俄国资产阶级压迫下底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三者联贯起来，才使布尔塞维克能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得到胜利吗？因此，必须明白地了解，拥护中国苏维埃底事业就是拥护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为本国苏维埃政权胜利底战斗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完全有权利向各国兄弟党要求执行加入共产国际二十一条章程中底一条，这一条是由列宁直接提议的，这一条上说：

“每个愿意加入共产国际底党，应该誓死帮助每个苏维埃共和国及其反对反革命势力底斗争。共产党应该进行坚决的宣传，使工人拒绝运输送给苏维埃共和国敌人底军用品，在送去镇压工人共和国底军队中，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工作”。^①

^① 参见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2页）。

中国共产党完全有权利向兄弟党要求执行这个起码的和光荣的任务,以使用各国劳动者底兄弟友谊[谊]联合去对抗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革命联合,以便在最近将来能够在实际上实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①在我们兄弟党面前所提出来的那些任务。这个宣言在结尾上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特郑重号召你们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英勇的群众斗争:

反对帝国主义者干涉苏维埃中国!

反对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

反对帝国主义者在屠杀中国人民中准备新的帝国主义大战!

反对美,英,日,法,德等帝国主义者用毒气,飞机,坦克,大炮等屠杀苏维埃中国的劳苦民众!

反对运输一切军火到华!

要求立刻召回美国飞机师,军事技术专门家和德国将军及参谋!

要求立刻撤退美,日,英,法,意等国驻华海陆空军!”

我们应当很快地完成这些任务。

如果当帝国主义干涉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在资本主义各国内,不过才开始形成共产党,那时候共产党还很薄弱,但是,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居然能在自己的队伍中涌现出像我们安得列·马尔其这类的英雄,还居然能在拥护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底斗争中,显示出那种惊人的英勇;那么,在现在条件之下,不仅在日,英,美,法,德,意各国海陆空军中埋伏有成千成万的“安得列·马尔其”,而且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

^① 指 1933 年 9 月 6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

中迅速地增长着共产主义革命和强有力的共产主义部队。我们坚决相信，中共和一切兄弟党——首先就是日，美，英三国兄弟党，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在利用苏联共产党经验帮助之下，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任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英勇的工农红军万岁！

中国胜利的苏维埃革命底领袖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及其突击队——苏联共产党和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底国际革命同情万岁！

(继续很久的鼓掌，欢呼口号，代表们起立唱国际歌)

根据 1934 年 1 月 31 日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五卷第一期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 全会第九次会议上的发言

(摘录)

(1933年12月2日)

皮亚特尼茨基

还可以有充分的事实来说明张学良匪帮侵占中东铁路和日本袭击上海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情况。在侵占中东铁路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谁都知道，为了攻击苏联，不仅中国军阀和国民党，而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国际政党，把帝国主义者唆使中国军阀侵占中东铁路一事作了不真实的描述，说这是一场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战争。站在北洋军阀一边的，实际上还有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等人。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种恶意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宣传、鼓动及其一切实际工作中贯彻了列宁主义路线，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和本国军阀的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者袭击上海期间，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反帝运动，组织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回击，同时没有停止对国民党的斗争。

而中国红军具有哪些光荣、英勇的历史呢？蒋介石在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下叛变了革命。在国民党反革命势力获胜之后，人数不多的武装力量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撤退到山区，开始在自己的周围积聚新的力量，巩固并逐步扩大所占领的地区。

他们能够建立起一支目前成为国际革命重要因素的红军队伍，乃是由于他们通过反帝、反军阀和反地主的斗争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逐步武装起来，以无比英勇的气概击退了国民党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优势兵力。

通过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用事实向中国以及整个殖民地东方的工农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与地主反动势力，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仅巩固了自己在苏区广大群众中的地位，而且对敌人后方也起了瓦解作用。因此，红军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打退了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而且每次战斗都使红军更加壮大、巩固。它现在正英勇地抗击第六次“围剿”（凶暴的帝国主义列强直接参与了这次“围剿”的组织工作），从而将使部队的战斗力进一步加强，使蒋介石用以根绝中国共产主义的庞大战争机器瘫痪。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和革命情势下所取得的成就，应为所有其他共产党所效法，尤其在目前，当我们即将进入革命和战争的新阶段，在战争和革命期间贯彻列宁主义路线成为共产国际每一个支部的中心任务的时候，更是如此。

最后谈谈日本共产党。在日本，整个资产阶级、整个报界和所有党派都在大喊大叫，说什么没有满洲和不向亚洲大陆扩张，日本就活不成了；社会民主党尤其厚颜无耻地侈谈什么日本要发挥开发亚洲的作用；群众日益相信，日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在这个国家里，小小的日本共产党要想提出让它的祖国战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问题，是特别困难的。但是，它做到了这一点。它勇敢、坚决地顶住逆流。它不仅提出了正确的口号，而且把这些口号带到群众中去，在工人、农民中间广为传播，并且奋起反对战争，捍卫中国。

上述实例可以表明，在共产国际这些支部中提出反对战争问题是正确的。我不想以此来说明，各国共产党近来都已正确地、很

好地进行了反战宣传,充分地动员了群众去反对战争,尤其是在阻止往日本运送军火和捍卫中国革命方面做了必须做的一切。只有克服一切弱点,正确地组织群众工作(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谈到),共产国际各支部才能在决定性时刻正确地进行反战斗争,才能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现在,各国的革命工人和资产阶级都懂得,只有共产党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共产党能够组织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所以,资产阶级才把共产党打入地下。

各国共产党都在执行共产国际的统一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所有共产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集中的世界性政党,这是第二国际从来没有做到,今后也做不到的。

各国共产党是团结一致的政党,而不是“派别联盟”。其中既无派别组织,也无派别集团,这和第二国际的情况不同。共产党在反对机会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这两条战线上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斗争。

我们的干部又怎样呢?我们的干部在斗争中勇于自我牺牲。在所谓民主国家里,合法的党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不冒遭逮捕或枪杀的风险进行游行示威或罢工的时代早已过去,因而自我牺牲精神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对于处在非法状态的党来说,更是如此。

在保加利亚、波兰、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里,每一个落入阶级敌人手中的共产党员,都遭到屠杀、拷打和长期痛苦的监禁,但大多数共产党员仍继续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甚至在牢房里也进行斗争。出狱后,大部分人立即重新展开工作。

.....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 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

(摘录)

(1933年12月2日)

(日本)冈野

.....

三、沙文主义和战争

统治阶级维护自己对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影响的主要武器，是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切反动的法西斯爱国组织，也和社会民主党及其工会一样，被充分动员起来进行沙文主义宣传，它们的活动是在军阀领导下进行的。随着战局的发展，沙文主义口号也就相应地有所改变。

例如，1931年9月开始对满洲进行军事干涉时，以军阀为首的日本统治阶级宣布了诸如“满洲乐土”、“军事振兴”、“繁荣来自满洲”和“消灭失业现象”等娓娓动听的口号。

但作战两年以来，统治集团并没有实现这些诺言，辜负了人民群众的期望。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所失大于所得。荒木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今年年初，他在给日本天皇关于战况的奏折中承认：

“满洲事件的经济成果是次要的，民族的统一才是头等重要的。”(《朝日新闻》)

经济危机，首先是农业危机，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对满洲的剥削，不能补偿战争的巨额支出和日本与华中贸易的大

量亏损。战争已经消耗掉国库 5.73 亿日元,而下一财政年度的军事预算将达到 12.3 亿日元。这一预算囊括了国家全部收入,造成了 10 亿日元的巨额赤字。这个赤字由国家经常发放的、总额已接近 90 亿日元的公债来抵补。仅公债利息,每年就达 5 亿多日元。这将导致国家财政的全面崩溃。

在日本,即将爆发一场大规模的财政危机。这次危机可能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彻底的破产。这种局面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更为加剧。不错,军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暂时“活跃”,使军阀和一小撮财阀、工业巨头牟取了暴利,但这个“活跃”丝毫也没有使失业人数减少。它把国家变成了一座庞大的监狱,在那里,囚犯们在宪兵的看守下干活。军事企业的工作时间,一般由 14 小时延长到 16 小时。实际工资平均下降了 20%。

在农村,可以说,农民都快要饿死了。许多农村成批成批地往满洲移民。但因找不到工作和没有合适的栖身之地,这些移民又被打发回去。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群众对战争的幻想开始破灭了。广大居民阶层怨声载道。荒木认定,以前提出的一些乐观的口号现在变成有害的了,于是他重新提出一个中心口号:“准备迎接 1935—1936 年的危机!”这就意味着,在所指出的这个期间,日本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急境地,它不得不对付一切内外敌人。首先,由于华盛顿和伦敦的海洋协定将于 1935 年期满,美国的海军实力必将超过日本海军;第二,由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将不得不交还联盟给予的南部岛屿托管权;第三,苏联即将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第四,中国革命和苏维埃中国必将更为发展;第五,即将爆发一场群众暴动——这是荒木不敢公开说出,而又最害怕的一件事。目前,新口号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可起巨大作用;它通过预报未来灾难的办法,抑制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并借以镇压任何反对政府的活动;它有助于联合一切力量,使之集中于军阀的领导之下。

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宣传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它提出诸如“打倒金融寡头！”“反对在当前议会中充当金融资本走狗的政党！”“打倒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满洲一切财富收归国有！”“把亚洲从白种人手中解放出来！”“消灭赤俄！”等等蛊惑人心的口号。社会法西斯势力及其提出的“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需要满洲！”“为实现亚洲大同盟而斗争！”等等口号，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

反对沙文主义——这是日本共产党进行斗争的中心问题。我们应当天天具体地揭露军阀、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沙文主义宣传，以及有关民族与社会的蛊惑宣传，因为他们掩盖了自己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君主政体的走狗的真面目。我们应当针对他们的宣传，明确提出用革命手段争取摆脱危机的斗争纲领，即提出日本未来的工农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措施纲领，尤其是要指出解放了的东方各国人民的兄弟联盟的前景。

除了广泛开展沙文主义宣传外，日本君主政府还对革命工人运动进行史无前例的镇压。其迫害的残暴程度，超过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一切骇人听闻的手段。根据日本警事厅的资料，1932年一年内就逮捕了7000名共产党人和同情共产党的人。根据资产阶级报刊提供的材料，1933年九个月内，被逮捕的革命工人和农民已有8000人。在1932年，大约50名共产党人死在狱中。两名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一位非常受欢迎的共产党作家小林，在警察分局被折磨致死。

共产党、革命工会、反帝同盟、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和反宗教同盟，在几年前就被迫转入地下。对苏友好协会、左翼农民协会、国际劳动救济委员会、劳动和出版研究所等文化教育团体，于1933年被查封并遭到迫害。22位律师也由于他们为共产党人辩护而遭逮捕。不久前，政府甚至对工人合作社也进行迫害。在东京和大阪，工人医院被关闭，医生和护士们因发起救济饥饿农民的

运动(受国际劳动救济委员会的影响)而于3月间被逮捕。连全劳俱乐部反对派运动那样的“左倾”改良主义工会的群众集会也被驱散了,工会领袖在大阪被捕。凡是有“威胁国家安全”嫌疑的书籍,一律加以追究,并予以焚毁。

这就是日本国内所实行的恐怖手段的例证。现在的日本君主政府正在干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夺权以后干过和正在干的勾当。

警事厅除采取上述镇压措施外,还极力收买和威胁被囚禁的共产党人中的不坚定分子,使之成为叛徒和内奸。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左野,他带头充当卑鄙、无耻的内奸。但是,尽管遭到这种种迫害,尽管原来的“共产党员”叛党变节,我们党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壮大和巩固了。

.....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1933年12月9日)

米 夫

同志们！十年前，列宁在他最后一篇论文《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列宁指出，所谓西方的其他资本主义列强都在啄食德国，不让它抬起头来。接着列宁写道：西方的一些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因此，这些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不完全是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去完成的。同时，列宁着重指出，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即卷入了不能不引起整个资本主义危机发展的漩涡。

从列宁写这篇论文时起，国际形势中出现了不少极其重要的事件，发生了许多变化。对这一切新情况，对这一切变化，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在其一系列演说和讲话中，通过非常透彻的分析和惊人的马列主义预见加以概括和总结。这些发言已成为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全会的有关决议的基础。斯大林同志着重分析了一切极其尖锐的资本主义矛盾：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先进国家金融寡头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在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情况下的劳资矛盾，这种危机破坏了西方国家的一切“社会和

平”局面。

现在,我想专门谈谈东方各国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谈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所肩负的最复杂、最重要的任务。在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不可避免地行将发生一场决定性冲突的情况下,列宁是怎样看待东方各国的作用呢?当时,列宁写道: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同志们!你们看到,列宁对东方在未来两个世界之间的决定性冲突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怎样阐明的。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使这种作用更为增强了。目前,世界资产阶级为维护资本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使得一场新的战争,首先是对苏联的武装干涉迫在眉睫,已提到日程上来。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各国革命的发展显然地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列宁说,为了保证在这次决定性冲突中获胜,东方这一辽阔疆域的居民,与苏联人民一起构成人类大多数,这个大多数需要赶快发展文明。当然,列宁在这里指的是群众的革命热情,是幅员辽阔的东方加入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我想谈谈东方各国当前的情况,那里是如何实现这个革命文明的,东方各国劳动群众的革命跃进是如何产生的。

我要从东方各国工人的罢工运动谈起。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东方各国罢工运动的情况,那么,马上就可以看出,罢工次数和参加罢工的人数增加了,尤其是最近几年。当然,这不等于说,罢工运动的发展完全是直线上升的。在某些国家里,罢工运动在个别时候出现过暂时的低潮,但总的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罢工的人数大幅度增加了。根据现有的罢工统计资料。

我只列举中国、印度、印度支那、日本、朝鲜和土耳其这 6 个东方国家的情况。

年代	罢工人数
1928·····	967,000
1929·····	1,384,000
1930·····	732,000
1931·····	1,037,000
1932·····	1,422,000

你们可以看到,虽然不平衡,但毕竟是曲线上升的,它表明东方各国的罢工斗争显然在向前发展。

下表可以说明这些国家在世界工人阶级的整个斗争中所占的比重。这个表反映了 11 个国家的情况,其中 5 个是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6 个是东方国家——中国、印度、印度支那、朝鲜、土耳其和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在这 11 个国家的罢工总次数中,6 个东方国家所占的比重是:

1920 年·····	4%
1921—1924 年·····	9%
1925—1928 年·····	23.3%
1929—1932 年·····	34%

至于 6 个东方国家参加罢工的人数,在上述 11 个国家罢工总人数中平均每年所占的比重为:

1920 年·····	1%
1921—1924 年·····	11%
1925—1928 年·····	30.5%
1929—1932 年·····	38%

如果不把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的那几年统计在内,那么下表必然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它表明中国、印度和日本的罢工人数,

在 17 个实际代表几乎整个世界的国家的罢工总人数中的百分比。这些国家是英国、德国、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保加利亚、瑞士、匈牙利、丹麦、美国、加拿大、奥地利、新西兰、中国、日本、印度。在这 17 个国家的罢工总人数中,中国、印度和日本所占的比重是:

1930 年.....	25%
1931 年.....	38%
1932 年.....	40%

同志们!你们看到东方各国在罢工运动中所占的比重有了很大的增长。东方罢工人数在总罢工人数中的比重,从 1920 年的 1%,上升到 1932 年的 40%。

同志们!列宁在分析俄国革命年代的罢工运动时写道:

“俄国的罢工极大地超出欧洲先进国家的罢工,这绝不证明俄国工人具有特殊的素质或才干,而不过是由于现代俄国既具备了革命形势,又具备了正在发展的天然革命风潮这样一些特殊条件。”

列宁当时还指出,在欧洲,随着革命的发展,“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必将进一步施展它在革命罢工、示威游行和与雇佣奴隶制的卫道士进行武装斗争的无比巨大的能量。”因此,当我谈到东方的时候,我决不想贬低西方无产阶级所开展的斗争的巨大意义,而只不过是想着重指出东方在目前各国无产阶级所开展的经济与政治总斗争中所占的相当大的比重而已。这些数字可说明东方各国的罢工运动具有特殊的作用,因为它把工人大军吸引到斗争中来。必须指出这一点,并给予应有的评价。人们把东方国家叫做世界的农村,这是对的,但决不能忽视,在这个世界的农村里,有着它自己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决不能低估东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决不能轻视东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在顽强的战斗中捍卫和夺取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些罢工雄辩地证实,东方各国存在

着一个能够领导劳动群众、并引导他们走向胜利的革命阶级。这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

“无论是对下层群众的压迫，无论是上层人物的倾轧，都不能再造成革命的局面，它们只会使国家腐败，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变消极的压迫局面为积极的反抗和起义行动的革命阶级的话。”（列宁语）

我们看到，东方各国的无产阶级总是大规模地投入罢工斗争，这是一所教育工人阶级、启发它的才智、锤炼它的意志、能够把它的队伍组织起来、提高并巩固它对自身力量的信心的学校。而且，正如列宁再三强调的，罢工是无产阶级进行宣传鼓动、把广大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吸引他们参加斗争的最好方法，因为罢工的结果，全国就会骚动起来。我前面引用的统计表，如果把罢工的发展同民族革命解放斗争的总进程加以对照，就更能说明问题了。你们会发现，自1925年起，东方各国参加罢工的人数的百分比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些数字反映出，在东方的革命群众解放斗争中发生了重大的阶级变动。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殖民地世界紧接着也行动起来了。但是，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那时的无产阶级尚未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自1925年起，反帝战士的营垒中才发生重大的变化。

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开始发挥领导作用。在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方面，罢工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因为它把千百万火星撒向四面八方，而四周尽是“易燃物”：极端的愤懑、空前的饥馑、卑鄙的专横、无耻的嘲弄。

通过一些东方国家的实例，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帝国主义导致革命阶级的产生，这个阶级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广泛地采用罢工这个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武器。

例如，我们看到，中国的罢工斗争有了极大的发展。1932年

的罢工人数超过 120 万。此外,罢工斗争的地区逐年扩大,中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表现得无比顽强。这从罢工的持续性和一系列反复进行的战斗中可以看出来。最近几年来,在中国,总罢工的浪潮席卷了某些生产部门(上海的丝织工人、纺织工人,天津和南通的纺织工人,河南的矿工、邮政工人等等)。还必须指出,罢工富有战斗性:罢工期间,工人往往占领了企业,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工人们顽强地抵抗军警的镇压。在许多情况下,工人未经官方批准就着手实现自己的要求。工人的罢工斗争与失业群众的斗争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罢工日益具有政治色彩和反帝特点。共产党不断增强自己的领导作用,开始正确地拟定和提出工人的要求,学会使这些要求具体化,并在罢工之前就展开宣传鼓动,以及组织工人群众讨论这些要求。

同志们!虽然中国的罢工斗争还存在着很大程度的自发性,革命工会运动还有着种种严重的缺点,但仍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假如在工人运动中没有出现罢工斗争的高潮,中国红军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要想在中国实现苏维埃也是不可能的。

在印度,工人运动的沉寂局面即将改变,那里的工人阶级正逐步转入新的攻势。1932 年上半年,罢工人数计 71446 人。1933 年上半年,罢工的人数已达 98551 人。这里没有把同盟歇业和政治罢工计算在内。1933 年 9、10 两月,罢工斗争继续高涨。斗争是在一些拥护革命工会的人日益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向前发展的。他们成功地领导了 21 次罢工(10 次在孟买,4 次在阿默达巴德,2 次在孟加拉、纳奇普拉和阿科拉,等等)。然而,最重要的是,在 1933 年 10 月最后几天,再次掀起了群众性的总罢工浪潮。报章上大量报道了为号召总罢工而举行的许多工人集会和游行示威。在准备总罢工的日子里,在印度,特别是在孟买,庆祝了十月革命 16 周年纪念日。下面就是资产阶级报刊关于这次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的报道:

“最近几个月以来对企业主发动的攻势，成了拉那吉夫为首的一伙工人领袖宣传总罢工的理由……工人们大都手拿红旗，在工厂区的各个中心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参加人数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工人领袖们在集会上号召工人准备举行总罢工。”（1933年11月4日《印度时报》）

1933年11月3日《孟买新闻》报道了工人的万人大会，会上通过了组织工人总罢工的决议。

据1933年11月4日《孟买新闻》报道，在工人青年联盟（革命组织）的领导下，孟买的纺织工人在四个工厂罢工的带动下举行了集会。在大会上发言的人强调指出，只有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把一个个单独进行的罢工发展成为总罢工，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大会以高唱《国际歌》宣告结束。

在印度，工人罢工以及无产阶级普遍举行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可表明那里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成熟。不久前，印度工人阶级汲取了以往战斗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新的、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斗争，从而振奋了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为无产阶级掌握全民运动的领导权铺平了道路。

我所谈的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多多少少也能说明东方其他国家的情况，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是一年比一年高涨，无产阶级越来越坚决地走上争取胜利的斗争道路。

说到这里，我想以中国为例谈谈革命工会运动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许多人在会上已经谈到，我只不过想稍加补充而已。中国革命工会运动成绩显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无可非议的。但是，我想提出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同志应当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和弱点。首先必须指出，过去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充分争取独立领导罢工，这个缺点现在依然存在。这可以从最近两次丝织工人总罢工的实例中看出来。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两次总罢工中，我们没有起任何作用。再就是和各企业的联系不够密切，因

此,纵然总的情况非常有利,斗争的胜利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赤色工会应当变成群众性的组织,应当在生产部门中建立自己的巩固的基础。只有这样,在全民运动中,在日益发展的反帝斗争中,才能拥有可靠的无产阶级骨干。

我们的同志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已有所进展。我们可以指出这方面工作的初步成绩。例如,在下列工会中建立了比较强大的革命工会反对派:1.《时事新报》印刷工人工会;2.《新闻报》印刷工人工会;3.上海邮政工人工会;4.南通电车工人工会;5.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工会;6.沪宁铁路工人工会;7.沪杭铁路工会;8.平绥铁路工会;9.平沈铁路工会;10.北平织毯工人工会;11.北平邮政工人工会;等等。

虽然如此,但我们有些同志仍然轻视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而这些黄色工会至今仍然联合并影响着相当多的工人。例如,根据1933年11月《国际劳工评论》的资料,中国黄色工会计有会员410067人。显然,这种合法的工人组织形式,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我们应当大力加强我们的工作,把加入这种工会的工人争取过来。然而,如果像某些中国同志那样,把一切参加黄色工会的人都看成是反革命,看成是死心塌地的汪记反动分子,那就不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另一方面,应当指出这样一些事实,就是我们的同志过早地破坏了黄色工会。他们刚刚积蓄了一点力量,聚集了一些能起带头作用的人以后,就去殴打和驱逐国民党的工会官僚,而这种工会的大批会员却对此举毫无思想准备,没有站到我们一边,结果,当我们掌握工会的领导权时,会员人数就急剧下降了。平绥铁路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的黄色工会有1万会员,可是在我们的同志夺权以后,会员只剩下900人。

现在,我谈谈中国苏区的工会运动情况。关于我们在中国苏区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和显著成绩,王明和康生在会上已经讲得很充分,我不准备谈了。那里的工人已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劳动条件

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他们建立了工农新国家，这个国家根本不同于中国以往的任何一个国家。在那里，在革命工会运动方面，我们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苏区工会会员的总数超过 32 万。但是，在谈到这些成绩的同时，必须指出还存在着形式主义、命令主义、脱离实际和宗派主义等因素，这一切在某些工会的实际工作中均有所反映。

举几个例子。

例如，在良华陶瓷手工工厂，原来是计件制，后来硬性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而对于工资却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而必然会引起工人的不满。

在永新建立了一些生产合作社，在规定工资数额时，没有把技术熟练程度和工作能力考虑在内。由于采取这种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办法，合作社就开始垮台了。

再者，中华全国总工会曾发出不接纳那些拥有私有生产工具的手工业者入会的指示。举个例子来说，在湖南、江西地区，2.4 万名工人中就有 1.8 万人属于这种农村半无产阶级的手工业者，他们走街串巷兜生意，并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只拥有少量的生产工具（譬如说剪刀或针等等）。对这样一个广大的工人阶层，我们的中国同志却想将其排斥在工会组织之外。

同志们！我们知道不少足以证明苏区开展经济运动时极其踊跃加入工会的事例，但同时，我们往往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实，就是工会不考虑整个经济情况，不考虑红军斗争的需要，不考虑苏区生产高潮的需要，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

在充实中国红军队伍和加强红军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方面，工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知道许多有关工会这方面工作的极其令人兴奋的事实。例如，在某地区，工会动员工人自愿参加红军，原计划动员 1.6 万名工人，而自愿报名参加参加红军者竟达 3.6 万人。但我们还知道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工会不重视这项任务，致使

同样的运动遭到失败。例如,在第26军所在地区(不错,这是一个最落后的地区),我们的组织没能顺利地开展动员3000名工人参军的运动。

现在我谈谈边区的工会工作。我想以位于苏区与白区交界的岷山为例,这是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区。当红军逼近时,1000名岷山煤矿工人举行了罢工,提出了以下要求:1. 偿付拖欠的工资;2. 规定每年有五天公休日,增加新年工资;3. 实行苏维埃劳动法——这点尤其重要。这个例子表明,在国民党统治区和边区工人群众中宣传苏区工人的成就,效果很好。但这远非普遍现象。苏区工会的工作人员应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以便他们在边区工人群众的斗争中能更多地发挥先锋和组织作用,而这个斗争对中国红军今后的发展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运动底 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底工作*

(1933年12月6日)

康 生

同志们!

在我们全会的提纲中,已经很正确的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简直紧紧逼近到战争与革命的新周期,在中国是正处在革命战争与干涉的火焰中。

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战争;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及其内部的分崩离析;苏维埃中国的强大与发展,及工农红军伟大的胜利;所有这些事件,在顾西宁同志的报告与王明同志的发言中,都已详细的指出,我不再重复。我现在要说的是: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在非苏维埃中国里,革命运动的发展,表现在三个主要的事实上,就是:(一)反日反帝运动进一步的高涨;(二)城市工人的群众斗争更加革命化;(三)农民暴动与兵士哗变的发展。

非苏维埃中国的三个革命巨流,与苏维埃中国的革命胜利,互相的配合与发展,造成了中国的革命。

一、反帝群众斗争的发展

由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

* 这是康生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上的讲演。

背叛行为,引起了中国广大的反日反帝运动,使千百万的工农劳动群众起而奋起,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都卷入反日的浪潮中。目前群众的反日反帝的抗议、示威、抵货、罢工、武装游击战争,以及各种形式的斗争普遍在全国各地兴起。最近特别值得我们指出的是下面的几个问题:

第一,东三省和其它被日本帝国主义占据的区域里反日的游击战争日益增大。虽然马占山、苏炳文等军阀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影响下的旧吉林军阀遭到了失败,可是群众的反日游击战争,不仅没有因国民党军阀的投降出卖而消灭,相反的是继续发展到新的阶段里。如果过去满洲的反日战争主要的是马占山、苏炳文等所领导的队伍,而现在主要的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不愿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兵士。虽然正式的军队减少了,而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的武装队伍(现在约有 20 万人左右),是日益加多的普遍在满洲各地,英勇的以武装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如果过去他们还相信马占山、苏炳文等军阀的领导,那么,现在他们认识了那些反革命的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军阀、官僚、地主背叛的面目,认识了只有依靠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团结,并且逐渐的认识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彻底得到胜利。

我们的党在东三省的反帝运动中的影响是日益增长了。许多的反日队伍要求党的领导,党逐渐的深入到义勇军和反日的武装组织里,不久以前,在“满洲国”的军队中组织了 600 余兵士的哗变,夺取了 600 余支枪,参加到反日的游击队里。党在工人中的工作有了进步,最近一年半来我们在某一个大城市里组织了三次工人的反日反“满洲国”的罢工,得到部分的胜利。在农民中建立了农民委员会的组织,经过这些组织发动了反抗“满洲国”的捐税的斗争。在上面这些基础上,使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有的地方的游击队从 500 人发展到几千人的组织,另外的地方从不到 100 人发展到 3000 余人的队伍。

我们的党不仅在满洲进行着反日游击战争，并且在热河事件中动员了党的同志和反帝的群众到前线上去，到兵士中去，到群众中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反动的军队中，义勇军中，铁路工人及劳动群众里，建立了反日的群众团体。并且在内蒙和汉族的民众中，建立了蒙汉民众反日同盟的组织。

当日本帝国主义占据热河时，党在长城附近领导反日会的兵士及群众举行了反抗的斗争，中共河北省委向我们报告这样的事实：

“这几次大的战争，大部分是我们同志领导着，特别是前线的某军队及丁喜春旅的兵士几次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大都是我们130余同志领导着1000余反日会会员英勇的行动”。

虽然国民党积极的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用飞机大炮轰炸和屠杀这些英勇的反日的群众，终于将热河华北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党在国民党无耻的出卖华北时，领导群众进行过广大的反抗运动。在兵士中进行过枪毙不抵抗的官长的斗争，在某地举行过两次3万人的反日大会，逮捕了卖国的国民党员，捣毁了国民党的党部，在铁路工人、电灯工人中瓦解了国民党黄色工会，逮捕了工贼，举行了工人的法庭，审判了出卖工人的黄色工会的领袖，全体工人建立了工人自己的工会。党在这次运动中积极的去武装民众，在铁路工人、电气工人和反帝的民众中建立了反日义勇军的组织，不倦的夺取反动军队中的兵士，在这些工作中，我们建立了在我们领导之下的5000人以上的武装组织，并且有产业工人积极参加，这给了北方反帝运动一个新的基础。

东三省热河及其他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区域内民众反日反帝运动的高涨，武装反日游击战争的扩大和深入，共产党影响的增长，这便更加推进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加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干涉苏联的力量。

第二，上海的反战大会的成功，使中国工农劳动群众反帝反战

反法西斯蒂的浪潮,蔓延到非苏维埃中国的各地。当国际反战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召集反战大会时,有些人以为在上海那样严重的环境中,大会很难成功。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表示出惊人的英勇和灵巧的方法,终于克服了一切的困难,在各地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兵营中动员群众,选举代表来参加会议。我们党积极地参加了这一反帝反战的群众运动,在准备运动的过程中,上海反日的团体发展了1万人的组织。这些组织主要是建立在工厂里。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动员了40余个群众的团体成立反战大会的筹备会。在反战代表团马莱等到上海时,反日群众团体组织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大会,举行了反战示威,在游行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军队警察冲突,上海的工人阶级在警察的武装攻击之下,能够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手中,夺回当时被捕的反帝战士,保持着示威大会的红旗始终没有被敌人夺去。

在许多工厂召集了群众的反战大会,通过了反战的决议,赠送马莱代表团的红旗,选出代表参加反战大会。整个的运动中,全国非苏维埃区域中,有2000余人的代表来参加会议。上海有150余个工厂的工人写信给马莱代表团,表示他们愿意与世界的无产阶级一致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蒂。

虽然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屠杀压迫之下,大会不能公开的举行,但是大会仍然是以秘密的形式完成了,虽然因秘密的环境使2000余代表不能一致到会,但是由2500人推出了70余全权代表,代表上海、天津、北平各处的以及铁路海员各产业的工人,各省的反日团体,各省的革命学生会,各地的著名作家,有名新闻记者,满洲义勇军,19路军兵士与苏维埃中国红军的代表,一致地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进攻苏维埃红军,拥护苏联与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等决议。并且建立了国际反战大会远东反战委员会。这一切事实明白地证明中国劳动群众的反帝斗争突飞猛进的高涨,这一运动使党的影响扩大,使过去与党没有关系的群众与党

发生了联系,使马莱反战代表团的行动与帝国主义的李顿调查团对立起来。把中国民众的反帝斗争的浪潮,更加推进到工厂、农村、兵营、学校的广大群众中去。

第三,福建的工农劳动群众与 19 路军兵士的革命化,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怒潮,使过去进攻红军的将领和国民党政客们,在革命的压力下,不得不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不得不宣布蒋介石和整个的国民党是卖国贼,不能不宣布反日反蒋等左倾纲领去迎合群众的心理。

不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如何想利用这个事变,来达到他自己的帝国主义的目的,不管福建的将领们是不能够彻底的实现他所允许福建民众的权利,但是,毫无疑问的,福建民众和 19 路军兵士的革命化,这个事件将更加推动全国的反帝运动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中。

上面的这些事实,证明了中国反帝运动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领导对这种发展具有决定的作用,是由于党正确的执行武装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路线,灵活的应用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和及时的揭破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等等——的武断宣传所造成的。例如:

在热河事件后,中国共产党用尽一切方法去揭穿国民党说因为中国太贫太弱,所以不能组织武装抗日等降日卖国的理论。因此,在国民党与日本签订了北方协定以后,反日群众组织很快地便能认识国民党卖国降日的真面目,便能自动地提出具体的组织和进行反日民族革命战争底纲领。这个纲领包括的基本要求是:

(一)全体人民总动员——广大地组织人民义勇军,反日游击队,积极地捐款援助满洲、热河等地的反日义勇军和游击队,组织反日战争侦探队,破坏日军工作队、交通队、运输队、救护队、宣传煽动队、抵货队、监督抵制日货纠察队等等,使一切愿意反帝的民

众,都能积极参加行动;(二)海陆空军总动员到前线上对日作战——不许以一兵一弹、不许用一架飞机去屠杀中国本国人民和进行军阀内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以便一方面使红军有可能实行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另一方面可使一切军队停止屠杀本国工、农劳苦民众的行动,而掉转枪头去反对中国人民底死敌——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三)全体人民总武装——把全国各地兵工厂、火药局、军械局内现存的和将来续有的一切枪炮弹药,以及向外国购买的各种飞机、大炮、战船、枪弹等等,都拿来武装全体人民,并使人民受军事训练;(四)立刻采取下列办法募集民族革命战争经费——具体的集资作为民族战争费用的方法:(1)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租界、银行、工厂、铁路、轮船、矿山等等)及商品;(2)停付一切日债本息;(3)没收一切卖国贼底全部财产;(4)实行征收统一的累进税(富户捐与累进所得税);(5)在国内人民,国外华侨及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底外国劳动者中间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等等。同时,他们提议:中国各界人民应该立刻在各地组织人民反日救国会,以便力争这些要求的实现,以便反日的神圣的民族防卫战争能够迅速地进行。这些要求是再简单明白没有了,这些要求对于一切不甘心作亡国奴的中国人,都是乐意接受的。因此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最近福建工农群众及 19 路军兵士的反帝运动,证明这个纲领的确是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

当 1932 年我们党在东三省和其它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区域实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在中央致满洲省委的信中指出以下的具体办法:

一、对于国民党军阀和旧吉林军阀所领导的武装队伍,这些队伍一方面反对日本军队,同时又掠夺居民和进行反动的政策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对于这些军队我们的策略应当是实行广大的下层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与兵士群众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无情地揭穿他们的领导人底不彻底不可靠的性质,揭穿这些领导人对群众反

帝运动和掠夺居民的反动政策。但是，在反对日本军队的军事行动中，可以与这些队伍底领导者订立战斗的协定。

二、对于那些虽然是由中下级军官所领导的，但是除了军阀底兵士之外还有很多的农民、工人和革命的义勇军参加的队伍，这些队伍底领导人在群众底压迫之下，不得不容许群众的反帝运动和准许共产党的分子，在他们的领土内和队伍内活动。对于这些队伍的策略，除了实行民族下层统一战线之外，应当是在一定的具体的反日和反帝国主义的条件下，也容许某种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但是对这些队伍的领导人须保存党的批评的自由，当他们的行动表现不彻底时，投降时，当他们表现企图压迫群众的反帝革命运动时，一定要随时随地批评和揭露他们反革命的面目，组织群众的反抗，并且上层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着建立下层统一战线。

三、对于农民和劳动群众自发的反日队伍，这些组织底斗争形式带着极原始的性质，没有鲜明的政治斗争纲领，并且他们的领导时常落到绅士、土豪分子底手里。在与这些队伍实行统一战线时，我们党提议他们执行彻底反日反帝的纲领，实行正确的斗争方法，同时揭穿他们中间不良的领导者底不彻底和反动行动。

由此可见我们的党能够估计到当时满洲的环境，一方面尽可能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加紧发展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一方面应用所有反日的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哪怕这种力量是不可靠的动摇的暂时的，另一方面我们尽可能地夺取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反日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特别是努力造成以无产阶级为骨干的群众基础。正因为我们能够这样作，所以在马占山、苏炳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满洲的反日游击战争能够继续发展到新的阶段里。

在组织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斗争中及在实行民众统一战线中，除了我们党所获得的这些成绩之外，我们还有许多的缺点。我们在这个运动中，还没有能够把无产阶级的核心巩固起来。此外，

在满洲和其它区域的工作中,我们还有关门主义底表现,这一点严重妨碍反帝革命斗争底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对于反日义勇军的领导是极其不够的。在揭破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常常表现不具体,许多地方夺取小资产阶级的的工作是不充分的,这些缺点,我们党和青年团都在努力的克服。

但是这些缺点,不能掩盖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国主义武装民众进行民族战争的英勇的斗争。顾西宁同志的报告中完全正确的指出了,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是由三个成分组成的:(一)中国的工农红军,他是民族战争最主要的力量;(二)满洲及其他被占领了的区域的反日武装游击队;(三)国民党区域中反帝国主义和反国民党的武装斗争。中国的民众武装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战争,这不仅是为中国民族解放独立而斗争,而且是实际的阻碍日本帝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

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在1932年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口号,他说“这种口号是投机的”,“这种口号只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与苏联间爆发战争时才可提出。”个别的中国同志也认为这个口号是与拥护苏联的任务相冲突的。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是真正武装拥护苏联底有力行动。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及我们党内机会主义的分子这些论调,实际上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实际上是反对中国民众用武装革命来阻碍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实际上就是替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反苏联战争的事业效劳。

不管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和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如何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完全相信: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干涉苏联的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民众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苏联的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并和日本革命工农兵联合起来完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自己的胜利。

二、工人群众革命斗争底发展

非苏维埃区域内革命运动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城市工人的罢工运动的高涨。中国工人罢工运动在1932年末到1933年初表现有暂时减少的现象。但是这种减少却被本年春季夏季罢工运动猛烈的高涨所代替了。比如1932年5、6、7、8的四个月中有11.66万人的罢工，而1933年5、6、7、8月中，却有29.037万人的罢工。可是我们所认为重要的，还不仅是罢工和参加罢工的人数量上的增加。我们特别需要讲一讲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现象，这些新现象证明，正是这种斗争把中国工人阶级推上反帝运动底前线，推上谋中国独立、完整和统一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

首先是罢工运动中表现了工人坚决性，在严重的资本进攻中，爆发着许多的重复的罢工，如上海英美烟厂8000工人两次罢工。20余个丝厂的工人在两个月内爆发两次的同盟罢工等。第二，就是泛流在各地的总罢工的浪潮，最近上海广东福建汕头香港太古轮船公司的海员总罢工，上海丝厂女工的二次的总罢工，从五卅以后没有罢过工的上海电气工人的总罢工。罢工的浪潮不仅是在上海而且普遍到各个城市各个生产部门里。第三，现时的请愿运动是大大地降低，罢工的形式采取了积极战斗的性质，工人以革命暴力的方法来回答资本家国民党的凶恶的恐怖，工人在罢工时大多数的情形并不立刻离开工厂，他们留在工厂内，夺取总务处，俘虏经理，拖着经理以坚决抵抗警察和军队的武装攻击，占据工厂的货物，与军警及工会官僚发生流血的冲突，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密切的联系。第四，革命赤色工会扩展了自己的影响，领导了许多重要的罢工，例如：在一个大城市里我们领导2000人电车工人的罢工与国民党的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领导铁路工人的年关斗争取得胜利，在烟厂7000工人的罢工中三次与帝国主义的警察冲

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面粉厂 3000 工人的罢工占据了工厂,俘虏了经理,两次打败了军警的攻击,以至得到了增加工资;此外,还有印刷工人、纱厂工人的斗争等等。在北方我们领导了 3 万矿山工人的罢工,建立了赤色工会的组织,组织了铁路工人的斗争,发动了电车工人的罢工。所有这些斗争,在这里我们不能一一举出,特别指出的是赤色工会发展了一倍以上的组织,成立了纱厂工会。当纱厂工会代表会开会,80 个工厂代表听了共产党代表的报告,一致举手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组织。这种现象是过去从来没有的。这一方面表现了工人的革命化,同时,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热烈的拥护。

在工人运动的高涨中,国民党黄色工会在工人中的影响日渐减弱。但这不是说国民党黄色工会现在已经没有作用,相反的中国共产党与赤色工会认为,有许多工人还被欺骗在国民党黄色工会的组织里,许多斗争是被国民党黄色工会破坏了的,而在许多地方黄色领袖最近更特别加紧活动,因此夺取国民党黄色工会的群众是我们革命职工运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现在党与赤色工会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和夺取黄色工会中群众的工作,是已经开始并且得到成绩。在十二次全会后,中国党曾经把建立统一战线,进行黄色工会中的革命工作,在党的工厂支部以及赤色工会里,普遍的讨论,并且为了加强这个工作,专门训练了一批新的工人干部。首先在几个最中心最强大的黄色工会中进行工作。当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国民党出卖华北时候,当资本家在纱厂烟厂等产业中减少工作,减低工资时候,我们的赤色中华全国总工会,赤色铁路总工会,海员总工会,上海赤色工会联合会,纱厂工会等团体曾经发表宣言,号召黄色工会内的会员,一切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工人起来共同一致的为反对缩减工作,反对减低工资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为了我们更容易的接近群众,在这个宣言之外,我们动员各工厂的工人,用各厂工人的名义联合共同发表宣言来号召全上海

工人共同一致斗争。这样就使我们比较简单的拿赤色工会的名义更容易接近群众。特别是在某企业的黄色工会内，我们的革命反对派最近更加强大起来，并且把黄色工会的刊物夺在自己的手里，在这个刊物上宣传了统一战线的问题，并且经过革命反对派发起召集革命反对派小组的联席会，在这个代表会上，曾经讨论了统一战线与发展革命反对派的问题。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使我们在过去没有经常进行地夺取黄色工会内的群众的工作开始了转变，比如：

我们在有些最大的黄色工会中建立了强大的革命反对派，并且独立领导的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我们曾经经过烟草工人的赤色工会打进黄色工会所领导的两个烟草工厂的工人群众中去，使这些群众脱离反对罢工的黄色工会首领的影响，而全体来共同参加罢工。

在北方有条铁路上的职工国际的拥护者，完全争取了铁路工人群众，瓦解了黄色工会，群众组织了工人法庭审判了国民党黄色工会的首领并将他们赶走。在这些地方曾建立了新的工会，在这些工会中，马上就有 900 个工人加入了。在另外一条铁路我们的革命职工反对派小组，曾把黄色工会的铁路工人小组长联席会议夺在自己的手里，大多数的工人同意了革命职工反对派的小组所提出的一切要求。这样使我们很快的建立了革命反对派的组织。

虽然我们党在工人运动中，取得进步和成绩，但是必须指出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的任务。党的工人运动，还是落在工人罢工运动发展之后。许多罢工没有得到我们的领导，我们领导日常斗争，在日常斗争的基础上去组织罢工，参加自发罢工，是极端不够，在个别的地方常常是忽视日常斗争。工人的斗争与反帝运动尚不能密切联系。我们的工会组织，还是极端微弱，还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组织。我们在工厂里的工作，是不强大和不巩固。在有的大城市中（如武汉、香港等地），我们还没有将工作强大的建立和恢复，

这特别是在附近苏维埃区域的城市里。夺取国民党工会的工人群众,组织失业工人的工作,只是刚刚开始,有许多工人尚在国民党黄色工会影响欺骗之下,我们的队伍中宗派主义轻视黄色工会中的工作的倾向还没有完全肃清,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还没有充分运用,大多数的失业工人还没有组织,我们的中央曾经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指出这些缺点,并为克服这些缺点而斗争。

在我们大会的提纲和皮亚尼茨基同志的发言中。严重的正确的指出目前新的环境里,要更加十倍努力的加强我们的群众工作,来夺取工人大多数。

继续的巩固扩大我们已取得的成绩,克服我们的缺点,努力去组织、领导、参加日益发展的工人斗争和罢工。坚决的把赤色工会变为广大的群众组织,夺取国民党黄色工会的群众,是中国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三、士兵哗变和农民暴动

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抢掠,军阀封建地主的剥削,及惊人的经济危机和全国的大水灾,使非苏维埃中国的农民群众陷于破产、流离、冻死、饿死的地步,全国一万万的灾民是陷在饥寒交迫的地狱里,这样的结果,就使国民党领土上广大的农民斗争,日加剧烈,在满洲及其他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区域里,爆发几十万农民反抗日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一年来单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22次农民暴动,中国北部的农民运动,从过去自发的、无组织的、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到现在有许多地方已经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展到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共产党在22次的暴动中,在山东日照县曾组织了苏维埃,实行分配地主土地,在陕西建立红军26军,建立了陕西苏维埃区域,使苏维埃的运动深入到北方去,使我们有权力在十三次大会上说,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的南部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而且在中国的北部也树立了苏维埃

的红旗。(鼓掌)同时我们在四川西部在反抗捐税的口号下组织了农民的抗捐军,这些抗捐军在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自然我们在农民运动中——尤其是在北方,因为那里一些干部还幼稚,时常有“左”的脱离群众错误,及将南方苏维埃区域的办法机械的搬到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程度的地方去。或者是犯着右的错误,富农路线的残余,不愿和不敢发动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因此,使我们还不能在每个斗争中都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由于兵士在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剥削之下,经常的受到饥饿、寒冷、欠饷、枪毙等等的痛苦,同时,由于兵士对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发生不满,由于红军苏维埃伟大胜利底影响,引起了反革命军队中广大兵士哗变潮流,这种兵变的潮流直接削弱着国民党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在满洲及华北夺取兵士,瓦解满洲及国民党的军队,曾经得到一些成绩,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同时在四川,我们的四川省委,曾经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里,组织南江县一旅人响应红军的暴动,使四川的红军得到胜利和夺取了城市,并且增加新的主力;此外,又曾经在马边、莪边、峨眉三个县城中组织了一旅人的哗变,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创造了红军独立师。由于我们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使 19 路军的兵士,不愿打红军,而要求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但是这里不能否认我们在兵士工作中,瓦解敌人的军队夺取敌人的武装的工作中,还存在极大的没有系统、没有计划性和经常性等缺点。尤其是当着中国在革命和战争与干涉的环境中,夺取兵士的任务,是更加严重。共产党十分的警惕的知道,不在兵士群众中进行布尔塞维克的坚定的工作,就不能顺利的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一年来,非苏维埃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与苏维埃中国国家政权影响的生长,红军冲破了五次与正在冲破六次的“围剿”,扩大了苏维埃的领土,得到了伟大的胜利,使全中国的民众英勇的与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坚决斗争,并阻碍着日本帝国主义反苏

联的战争。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布尔塞维克化的,真正实行列宁主义共产国际总路线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所造成的。因此最后我们就要说到:

四、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组织上的 巩固与布尔塞维克化的问题

一年来我们的党不仅在政治上得到了很大胜利,而且在组织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巩固,在一年中又增加了 11 万同志。但是如果以为我们的党员的发展只是在苏维埃区域这是不对的,事实上在非苏维埃区域党在数量上质量上也得到了极大的增长。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我们一年来在非苏维埃区域内党员从 3 万人增到 6 万人。单是在上海、江苏、河北、满洲、四川五个地方就增加了 1.12 万同志,1932 年 9 月 18 日日本占领满洲的纪念日中,我们在上海 20 天中发展了 1726 个同志,工人成分是 80%,创造了 94 个支部,内有 72 个是工厂支部。在 1933 年 1 月 28 日上海抗日战争的纪念日中,我们在一月之内在上海发展了 2160 个同志,在重工业中建立了 10 个支部,在市政交通工人中创造了 6 个支部,在纱厂中创造了 15 个支部,在印刷烟厂中,建立了 150 人以上的大支部,在军事工业中建立了基础,在失业工人中创造了 19 个支部。建立 7 个区的党报,和工厂小报 36 处。此外如北平在 1933 年 2 月 7 号到 3 月 18 号发展一倍的党员。

我没时间将所有的例子举出,这里对于我们特别重要的就是在非苏维埃中国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一个工人不要说加入共产党,即使加入赤色工会,红色救济会,都是一样要杀头的。那么在这样严重环境里,我们的组织为什么能够得到极大的发展呢?这主要的是:我们党的中央的领导布尔塞维克化的进步,不是靠空洞的抽象的决议,不是靠笼统的不切实际的领导方式,而是真正实际的具体的活的领导。中央为这个问题曾经动员了中央的同志组

织支部巡视委员会，以实行对支部的帮助和监督。我们能够将支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发展和提高起来，不是依赖上级机关而能够自动的吸收先进工人到党里，“每个同志至少发展一个党员”的口号，不仅实行了，而且常常有一个同志介绍4个，5个，11个，以至22个同志。我们能够把征收党员的运动与群众的斗争联系，比如在九一八征收运动中，曾经发动和组织21次的群众斗争与罢工。我们能够采用联邦共产党布尔塞维克的经验，广泛的利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利用突击队去帮助落后的支部。因此使我们的运动，能够得到完全胜利，使我们在上海的党的工人成分从60%增到86%—90%。从这个运动中完全证实了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进步，与广大的工人群众对于共产党的信仰与拥护。证实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奸细政策，是不能阻碍布尔塞维克党的发展的。

从中国党在非苏维埃区域内的发展，我们得到的教训是：

不管在任何严重的环境里，如果共产党能够不怕一切的困难，将发展党的工作真正的实际的深入工厂支部，那么，他便可以得到很大的成绩。如果是党的领导机关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工厂支部，发动工厂支部同志的积极性，教育工厂支部的同志如何发展党的组织，采取一切的方法去加强工厂支部，使发展党的组织，成为支部经常的主要的任务，那么，党的组织的发展的成绩，会使你预想不到的。或许有的同志以为这又是一个“老生常谈”，可是正因为把发展党的工作视为“老生常谈”，只是在口头上说说，纸上写写的东西，不把它变成实际的工作，所以有些兄弟党尽管写许多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漂亮决议，作许多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而党的组织依然是得不到发展，这样的情形过去中国党也是经历过的。

我们正确采用俄国布尔塞维克经验底结果，我们提高了党员底积极性和自动性，改善和加紧支部中党与群众的工作，加紧他们和非党群众底联系，地方党部工作底积极性和自动性，不仅在布尔

塞维克模范工作的苏区中,而且就在非苏区中也有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满洲的绥宁县中,县委还在得到中央信已前,就能够正确的运用反日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向其他反帝的部队提出具体的要求,如提出:

(一)在兵士和群众中广泛组织反日宣传鼓动队,并在军队中成立政治部;

(二)组织武装队伍消灭一切日本侦探走狗;

(三)允许人民有出版、集会、言论、结社、罢工自由;

(四)不缴地主地租等。

这些具体的条件,结果是达到了成功。另一个例子:一个大城市的党部,在五个月中(自1932年11月至1933年2月)在和国民党、社会民主党及托洛茨基派民族的武断宣传作斗争中,表现了极大的工作能力和手腕灵敏,争取反日运动中党底影响和领导。他得能将自己的影响散布到大多数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印刷品去,及把无数反动组织举行的大会、露天大会和游行示威,变为不仅是反对日本,而且是反对国民党及其走狗的大会、露天大会和游行示威。

这些地方的党,都得到了新的进步,我们更不用讲上海的党部,他们在实际上是表示出更大的积极性、自动性,使党的战斗力是日益加强的。

皮特尼茨基同志昨天说过,分配干部培养干部与反奸细斗争的工作,是我们各国党目前重要的任务之一。他同时又说到过分集中工作方法底害处。我们的党在最近两三年来曾经努力的注意这些问题,提高地方党部的自动性,把干部分配到各地去,采取巡视员的活的领导方式,特别是在最近一年中我们培养新的工农干部得到了收获,上海的区委委员和书记大部分是在业的工人干部,正因为许多工人干部的引进,所以使党对于群众的联系和具体的领导都得到进步。同时,在业干部的运用,经过群众的拥护,使敌

人和奸细不致很容易的破坏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党得到这些进步和成绩是由于不倦的两条战线的斗争，肃清了立三路线，粉碎了右派罗章龙反革命的组织，使党得到了布尔塞维克化，但同时我们组织上的弱点与缺点还是非常严重的。如：

一、党的组织不是平衡的发展，许多大的城市还没有很快的恢复组织，特别是临近苏区的地方，如武汉、南昌、九江、广州等地。

二、因为许多城市没有强大的工作，因此，在有些产业里没有建立起我们的堡垒，虽然无产阶级的成分有了增长，但是还是非常不够的。

三、支部的生活不健全，不巩固，流动的现象现在没有完全消灭的，在工厂中与群众关系还不密切。

四、地方党部的工作，自动性还是极其不够。还没有能普遍的建立活的具体的领导方式。干部的培养是非常不够，还不能适应革命的环境和党的工作。

五、反奸细斗争和注意秘密工作，虽然中央唤起全党的同志来努力，虽然最近工作上得到进步，但大部分的工作还不能深入支部，秘密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

这些缺点，我们党的中央是努力领导全党来克服和纠正的。皮特尼茨基同志再三的指出了在目前战争与革命的环境中，扩大党的组织和巩固党的力量，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在大会我很少听见有些国的同志具体的说明党的发展的情形，如果是没有发展，那末，我们的障碍在哪里？我们应该以自我批评来指出我们的错误。中国党首先提倡接受皮特尼茨基的提议，和各国的兄弟党订立发展组织底竞赛条约，以便在下次大会上检查我们的成绩。（鼓掌）

同志们！一年来我们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是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与进步，可是我们毫不掩饰我们还有许多弱点和缺点，在王

明同志的发言中已经指出我们的成功比起革命的客观要求还是落后的。我们在反帝运动,在夺取工人农民兵士的群众工作中,在组织上的主要的缺点,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因此,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战斗的任务,除了王明同志已经讲的以外,就是为克服这些缺点而斗争,以便使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成功。

同志们!中国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环境里,中国的革命运动胜利的向前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曼努意斯基已经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是决定世界政策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我们就要求各国的兄弟党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批评过去对于拥护苏维埃中国的不充分,同时像克诺林同志所说的那样,把拥护中国苏维埃工作作为检查各国党的工作的主要条件之一。中国党坚决的相信各国的兄弟党能够去执行大会给我们的任务,帮助中国党来完成苏维埃在全中国胜利底任务。

(大家鼓掌,欢呼口号)

(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二八——一九四三)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中央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定

(1934年4月12日)

中共中央讨论了十三次全会的提纲(“法西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①以后,一致地完全同意全会对于国际及中国情势的分析与他所提出的党的任务,并有以下的决定:

(一)责成一切党的组织直至支部为止,仔细的讨论与研究十三次全会的提纲。在讨论时,不仅应该在理论上明确与清晰的解释迫近革命与战争新周期的国际形势及全会后国际工人革命斗争的伟大事变(奥国暴动、巴黎总罢工与示威等等)的意义,并且应该最密切地联系解释到在革命,战争与干涉中的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特别是检查党的决议,首先中央五次全会的决议的执行程度,并定出每一个组织自己的最近时期的行动与工作计划——在白区的党的组织首先是五中全会所指出的工会与群众工作的计划,苏区的党则是:战争动员(包括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健全与加强赤少队等等)与加强苏维埃工作的计划。

(二)由于法西主义在中国的增长及其欺骗群众的武断宣传之加强(“新生活”运动等等),必须加强思想上与行动上反对法西主义的斗争:

甲、在反对法西主义的思想斗争方面,必须

1. 经常的具体的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法西斯蒂的利用

^① 指1933年12月《法西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底任务》(共产国际执委十三次全会关于库西宁同志底报告所通过的提纲),引文出自该提纲,下同。

“民族主义”的武断宣传,而实行卖国辱国与替帝国主义侵略作清道夫的面目,揭破“中国实力不如人”,“以礼义廉耻之提倡为复兴民族之武器”及清洁整齐朴素等原则的“新生活运动”之实际的意义:就是在帝国主义疯狂的侵略面前散布失败主义,企图使广大的群众离开真实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拯救中国的道路,——武装民众民族战争的道路;而培养封建的复古的奴隶道德,替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准备顺从的殖民地奴隶。着重地“在群众面前揭破法西斯蒂,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新制度的支持者,而是资本的奴仆和走狗”,特别是中国法西斯蒂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派别,是帝国主义手中最忠实的工具和奴仆,他已经把而且更加要把中国及中国的劳苦群众引导到饥饿死亡残酷的殖民地被迫剥削的奴隶地位。

2. 必须明确的说明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各派(南京广东北平)政权实质上都已经都是法西斯主义的专政,他们之间冲突只不过是关于法西斯蒂专政的方式与方法的争论与反映各个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国民党整个地在法西斯蒂化,同时在国民党之中又形成公开的法西斯蒂的一派,这派正在争取整个国民党“蜕变”为法西斯党来实行全国的完全的公开的法西斯蒂专政。把法西斯蒂与国民党对立起来,将是极大的错误,虽然国民党内有一些派系(如广东)在口头上反对法西斯蒂,而实际政策上将用与南京一样的法西斯蒂的方针,至于反对国民党的派别(社会民主党、AB团、生产大众党、托洛茨基派等)则在第三条道路的找寻的烟幕之下欺骗群众,替法西斯蒂清除道路。只有工人阶级及在其领导下的农民与一切劳动者的坚决的革命斗争,只有苏维埃的发展与胜利才能推翻崩溃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从沉重的危机中拯救中国。

3. 必须揭露中国法西斯蒂反对苏联的战争挑衅宣传,及欢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舆论制造的每一步骤,指出卖国的法西斯蒂

是强盗战争的欢迎者与反苏联战争中帝国主义的走卒。并在这基础上,加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反苏联战争的革命工作。

乙、在反对法西斯蒂专政与恐怖方面:必须

1. 对于法西斯蒂的每一个恐怖行动(如“群众的逮捕”,工厂学校的“围剿”,捣毁革命的及一般左倾的组织与文化机关,文化统制等等),必须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组织群众的反抗运动,及动员群众组织革命的武装自卫,保护革命的组织,反对白色恐怖,争取一切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这种下层统一战线,必须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一切形式中实现起来,尤其在工厂之中,必须记在[住]工厂是反法西斯蒂斗争的堡垒。

2. 一切法西斯蒂的群众组织及他们所召集群众会议,我们必须打进去,在里面进行革命工作与宣传煽动。这在法西斯蒂目前在许多地方召集新生活运动大会及组织新生活促进会之类的组织时,尤其重要。但是不应该号召群众去参加这种法西斯蒂的大会式团体。在法西斯蒂控制下的各种工人组织中,去进行坚持的革命工作,组织这些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是绝对必须的。

3. 由于法西斯蒂的特别注意士兵团丁警察,及他们正在组织其新的部队与集中大部分军事力量进攻苏区与红军时,十分增长了我们在士兵群众工作的意义,中央责成各级党部及红军中的政治部加强在白军中的积极活动,改善我们在白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坚持地进行瓦解白军的活动。

4. 由于法西斯蒂正在伸其魔手侵入苏区的边境,屠杀革命的群众,进行一切破坏苏区的反革命阴谋与奸细动作,苏区的党及红军中的政治机关,除了加强揭露法西斯蒂的凶残与发动群众的反抗运动外,必须严厉镇压一切法西斯蒂的便衣队、敢死队、暗杀队的活动,以巩固苏区与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

5. 必须将反对法西斯蒂的斗争与反对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联结起来,指出法西斯蒂为着完成清道夫作

用,正在以全力进攻苏区为其中心的任务。中国民众的民族与社会的彻底解放的唯一道路,是苏维埃的道路。必须根据二次苏大会的材料,具体的指示给中国的劳苦群众看:苏维埃政权已经给了劳苦群众些什么,及他将给他们些什么东西,来动员广大的群众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争取苏维埃道路的胜利。

(三)关于党面前其他的政治任务,群众工作,与党本身的巩固方面,中央认为五中全会已明确与详细地指出了。中央要求全党的同志,最坚决地将这些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起来,这就是最忠实地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

中 央

4 月 12 日

根据 1934 年 4 月 21 日出版的苏区中央局《斗争》第五十六期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四、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区域建设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摘录)

(1933年3月)

你们应该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到苏区的经济政策上。要认真研究和拟定相应的指示。请考虑我们的以下初步看法：业已恶化的经济状况迫切要求进一步明确和修订我们的经济政策，以及发展、鼓励生产，活跃市场关系和加快商品流转方面的专门措施。必须避免发生没有正当理由的重新分田现象，在老区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分田之后，土地应永久归农民所有。只没收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富农的生产资料。要给雇农制定临时规定，同时要区别中农和富农的雇工条件。保留以前给富农提供份地的规定，但不能将此理解为禁止富裕农民租用、购买苏维埃控制的土地和雇用劳力。地方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应该认真重视播种和收获问题，有可能的话，也应重视社会工作。请加强预算纪律，厉行节约，尽量防止我们的货币贬值。要鼓励从事手工业生产和经商。这一点应在税务政策上和为手工业企业徒工和工人所制定的临时规定中有所反映。同时不要忘记，社会立法、工会工作等等都应同经济实力和红军斗争的需要相适应。一方面，要开展保护工人利益方面的工会工作，支持和组织工人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绝不禁止罢工，但也不一定要采取罢工形式；另一方面，一切直接关系到生产利益和红军斗争需要的重大纠纷，都要由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属

的劳动机关同发生纠纷企业的企业主和工会代表一起解决。必须避免劳动机关官僚化,这些机关在解决纠纷时,不仅要考虑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要考虑红军和苏区总的形势的需要。必须比以前更加重视合作运动的建设。我们苏区的政策应当表明苏区工农的生活条件与国统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苏区的政策应当为在国统区宣传苏维埃政权思想提供素材,当农民看到苏维埃政权比国民党政权优越时,他们就会拥护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我们苏区的政策在红军经过和未驻守的地区应带有明显的演示性质。请分项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

按档案文件发表

(选自《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 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1932年1月9日)

一、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国民经济的崩溃在全国范围内及一切经济部分[门]内进行着。工业的危机迅速地开展着,丝纱面粉等主要的轻工业部门,都处于恐慌与衰落状况中(上海丝厂开工的仅十分之二,其他各地亦一样,丝厂工人失业者在10万人以上,纱厂方面厚生三新等厂倒闭,日本厂的纱锤织机迅速增加,面粉业开全工者仅五月)。重工业更加非民族化而处于帝国主义的垄断的状况之中。农村经济的崩溃更是急剧而激烈,地主的高利贷者的奴役与剥削,军阀的搜括与不断的内战,帝国主义的掠夺之外,更加上了空前的水灾,几十万的农民群众被大水淹死,几十万栋房屋为洪水所毁灭,几千万的农民在寒冷的冬天,冻饿、死亡。14万万亩以上的土地被水冲荡而失去任何收成。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的奴役与剥削农民造成了空前的水患,但是他们对于这些受灾的饥寒交迫生死不得[的]农民不曾有任何的救济。他们利用赈灾的名义,发了8000万公债,加了几十种捐税,向美国帝国主义借了高利贷式的美麦借款,而一点都没有用到灾民身上,相反的更加用工赈急赈的名义奴役农民,在灾区中更增加了许多新的苛捐杂税。资本家更利用广大的失业失地的劳动后备军,来扣减工厂工人不得一饱的工资,来增加他们的工作时间。地主与高利贷者更利用时机来剥削他们。国民经济的浩劫,使无数

千万的劳苦工农受到骇人听闻的惨痛、贫困、饥饿、瘟疫与死亡。千百万群众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

二、经济危机的深入直到国民经济总崩溃,无数万工农群众的灾难与痛苦,及他们革命斗争的剧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运动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国民党不但不能消灭甚至不能暂时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三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阀受到悲惨的失败,红军击溃了十五师以上的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结果,仅仅在赣南,红军就获得了2万〈支〉以上的步枪,500万发的子弹,150支以上的机关枪,俘虏了2万余人。从第三次“围剿”冲破后,红军更取得了许多新的胜利,闽粤赣苏区,恢复了杭武永苏区,占领了永定、汀州、连城,发展和扩大到宁化、清流。赣东北区不但与闽北崇安、铅山一带苏区联系一起,并且向着浙皖边发展,占领了常山、婺源等县城。鄂豫皖区扑灭了反革命派破坏红军的阴谋,大大地巩固了红军与苏区根据地,并且占领了英山,霍邱[丘]与黄安的县城。湘鄂西区贺龙同志所领导的第3军与9师会合后,更巩固了洪湖根据地,正在与敌人艰苦的战斗中创立襄河北岸的新的根据地。湘鄂赣与湘赣边都一样的扩大原有的根据地向着蒲圻、嘉鱼及上犹,崇义发展着。中央苏区不但恢复了第一次“围剿”前的区域并占领了赣南会昌、寻邬、安远、信丰各县,并且正在围攻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由于孙连仲部26路军的全部投入红军(约2万余人),宁都、广昌都重新入于红军之手,并且占领抚州消息,吉安已如孤城,反动统治在江西所保持只有南浔〈路〉上的八九县。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红军坚强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夺取了敌人的武装,武装了自己,向着红军铁军的道路上前进。红军已经成了伟大的坚固的革命的铁拳。由于苏区内部反革命组织的破获,及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毒害坚决的肃清,没收来的土地的重新分配给苦力雇农和基本的农民群众,苏维埃机关的改造与阶级异己分子的肃清,大大地提高了工农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

性及苏维埃政权在他们中间的威信。全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建立给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运动以总的领导,更能顺利地实行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权。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

三、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伟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日渐崩溃,促使帝国主义从隐藏的武力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火军费与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直接的公开的武力干涉,这便产生了日本的武力占领满洲的事变。同时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企图将满洲变为自己的完全殖民地,变成为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他并且企图经过自己的走狗韩复榘[榘]阎锡山冯玉祥伸手到中国北部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国帝国主义完全同意与援助日本的行动,企图实现反苏联的军事冒险与占领云贵。英帝国主义部分的赞助日本的行动,只要日帝国主义者不侵入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帝国主义者,它的企图是将全中国放置在自己的金元势力之下,在事变开始的最初时期取了等待与观望的态度,实际上同样的帮着日本帝国主义来掠夺中国民众及造成反苏联的场地。事变的开展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与日英帝国主义集团矛盾。目前形势显然是:在反对苏联的战争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国际联盟及美国都一样是掠夺和压迫中国的强盗)。他们在瓜分中国分配中(国)的富源上孕育着开展着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冲突与矛盾。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瓜分中国,直接的公开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的策略之中心。对于中国劳苦群众的掠夺与瓜分中国是在急剧的进行,红军苏维埃的发展将促使帝国主义更公开的用武力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广大武装的冲突的整个历史的

阶段是在前面。因之党的任务是：组织、准备、领导、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护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来争取中国的统一。

四、经济危机的加深，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与瓜分中国的急进，这是决定中国目前情势的三个因子，是生长中国革命危机的三支柱石。经济危机深入到国民[党]经济总崩溃的地步。使得千百万的工农生活极端恶化，失业失地，饥饿寒冻，使得他们的斗争极端紧张，因为他们只能在反抗与死亡中选择自己的出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与红军，成了新的革命高涨的柱石，成了全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和红军的光荣的胜利，给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劳苦群众指出了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道路。满洲的事变警醒了最广大的劳苦群众及城市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的觉醒，激动了他们的仇恨、愤懑与反帝国主义的热忱，国民党统治的必然的投降帝国主义，更促进反帝运动转变成为直接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斗争。

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在高涨着，在工厂中，在矿山中，在铁路上，在轮船上，在苦力与黄包车夫中，罢工斗争不断的爆发着，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接二连三的禁止罢工的命令。罢工斗争大部分是经济的斗争，但是经济口号与政治口号的密切的联系，及罢工的顽强性与坚持性是目下罢工斗争的主要的特点。个别的反帝国主义的罢工，已经不是偶然的现象，已经在个别的城市发展到了总同盟罢工的形势(如太原一天的总罢工)，许多产业部门爆发着酝酿着一业的同盟罢工(如招商船[局]，上海的纱厂、印刷、市政等)。对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资本家与黄色工会的一致的进攻，工人阶级正以自己的英勇的反攻与进攻来回答。在国民党统治总的崩溃的基础上，黄色工会的反革命的面目，反工人阶级的面目亦逐渐被工

人阶级所认识。开展着的反黄色工会的争斗,正在蓬勃起来。黄色工会的新的欺骗,亦层出不穷的积极进行,常常用假的领导来消灭工人争斗,一部分群众还对他们有多少幻想。必须深刻的估到计[计到]罢工争斗极大部分是自发的,党和工会对于罢工争斗的领导,还是非常薄弱。党和工会还缺乏有耐心的艰苦的准备工人阶级的罢工争斗。罢工战术与策略上的许多错误,使得个别的在赤色工会领导下的争斗不曾能够得到胜利的结束。罢工经验的研究是非常的不够,争取黄色工会中会员群众的问题还没有郑重的提出。赤色工会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争斗,还是非常的不充分,它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还是非常薄弱。

反帝争斗吸收了新的千百万的群众参加革命争斗。从和平的请愿转变到剧烈的示威与军警肉搏,捣毁国民党部与政府机关。广大的群众在几月来争斗的经验上认识国民党统治的卑鄙无耻与投降帝国主义,感觉到非推翻国民党统治与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不能够求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要求政权建立民众政权的企图,在广大的群众中成熟着,并有了初步的尝试(如民众法庭等)。但是这个运动主要的还建筑在学生群众身上,工人群众还不能够成为反帝运动的主力,因之运动还缺乏坚持性,顽强性与清晰的口号。党在这方面的工作不能够抓住一切群众争斗的领导,对于一切反革命派的争斗还是不充分,有些党部落在群众的后面,有时有些党部又害怕与学生群众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争斗,有些党部采用了不可允许的关门主义的政策,放弃反帝运动的领导(如陕西),一般的还不能够将反帝运动与工人群众的经济争斗亲密的联系起来。

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广大的农民与灾民争斗日益开展,抗租抗税,抢米分粮,捣毁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及游击战争,是这些争斗的形式,甚至发展到地方暴动占领县城(如长乐)。

士兵的争斗,哗变是同样的发展着,26路军全部(2万余人)

投入红军,各地零碎部队的投入红军与哗变都证明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影响着反革命的军队崩溃与瓦解,同时党在农民群众及士兵群众中的工作,还是非常的缺乏,甚至还剩留着机会主义的消极。

五、红军与苏维埃的胜利的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域中高涨着的工农革命争斗,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冲突与互相的把戏花样,将四年来统治中国,出卖中国,压迫劳苦群众,屠杀劳苦群众的军事独裁者——蒋介石的政府推翻了^①。继起的新政府,国民党各派的联合政府(这里面,蒋介石派依然占有重大的影响),依然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在阶级的实质上,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当然不会有任何的变更。新政府中亲日势力的优势,将使它更迅速地完全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屈膝匍匐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面前。同时这一政府只是不稳固,暂时过渡的政府,各派军阀及其幕后的帝国主义者正在积极的准备着新的军阀战争——这个战争是被全国的反日的怒潮与红军的胜利所阻止着。

在目前形势之下,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广大群众认识了国民党统治的卑鄙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武断宣传与欺骗已经不能使广大的群众相信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都积极起来,改组派的“国民救国会议”,江苏耆老的“国难救济会”,第三党的“和平政府”,托陈取消派的“召集国民会议实现民众政权”所有这些主张,他们一致的作用,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他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向国民党去“官民合作”,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

^① 指蒋介石第二次下野。1931年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决议,准予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海陆空总司令本兼各职。推选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命派。

六、估计着目前的形势，必须指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这个变动是有利于工农的，有利于红军苏维埃的。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为着实现这个总任务，党必须更进一步的巩固工农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及）其临时中央政府，执行正确的以工农革命利益出发的土地、劳动、经济政策，用一切力量开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工农革命争斗，加紧反帝运动的领导，加紧对工人自发的罢工争斗的领导，将工人组织到赤色工会中去，争取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发动领导农民与灾民的争斗，瓦解反动军队与争取士兵群众。

七、在苏区方面：（一）工农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起来，更加互相呼应的行动，依据现在的成功开展着胜利的进攻。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训令^①来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胜利的进行革命的进攻，要求我们要来巩固红军，加紧红军战士的政治训练，改善红军的成分，动员城市的无

^① 指1931年12月4日《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

产阶级到红军中去,提高红军战士的积极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消灭一切反革命派的破坏红军的阴谋。(二)土地问题的正确的解决,在提高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上,在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上有决定的意义。绝对不允许以强力及苏维埃的命令,强迫进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必须用发展农民自己的组织创造力与毅力来进行。保护雇农、贫农的利益,反对富农,估计到中农群众的利益是党在平分土地中领导的原则。不得中农的同意,不能够更动他的土地。党必须坚决地进行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与中农。富农(大多数是封建的剥削者)的土地亦在没收之列,但是在他自己耕作的条件之下,他可分得一部分坏的“劳动份地”。(三)一切经济政策,租税政策上的过早或妨害基本农民群众利益的办法(如鄂豫皖、赣东北的高税率与不坚决执行免除贫农一切捐税,赣东北的组织苏维埃农庄的企图等),应该立即纠正。(四)坚决的改造下层苏维埃机关,坚决进行肃反工作,肃清阶级异己的分子,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进行苏维埃的建设。建设苏维埃机关的一切日常的工作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方法。(五)一切忽视改善工人生活,对于执行劳动保护法的忽视,将给阶级敌人以很大的帮助而妨碍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对于创立苏区中的群众的赤色工会工作之迟缓是一刻也不能忍耐的了,必须立即派选得力的干部来进行组织工人阶级自己的阶级工会的工作。

八、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党的责任是开展一切群众的争斗,领导一切群众的部分的日常的经济的争斗,领导反帝争斗走向总的向国民党统治进攻道路中去,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来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里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争斗。只有工人阶级的罢工争斗能够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与失业工人争斗以坚完[定]的信念,不折不挠性与革命顽强性。

因之，党在工厂中间的工作，在黄色工会会员中间的工作，现在是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急切。小心的准备一切工人阶级部分争斗，领导一切工人自发的争斗，组织与准备工人群众的年关争斗，发展赤色工会，争取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组织工人选举的罢工委员会，并转变为工厂委员会，组织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共同的争斗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吸收失业工人参加，这是目前的主要的任务。自然必须将工人阶级的经济争斗善于引导与联系到反帝的争斗，拥护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争斗。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的工作的中心应该集中到工厂中去，到工会工作上去，到领导罢工争斗上去。

党必须抓紧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的暴行，法国的其他各国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的行动（法国侵入云南，英国的占领西康等）及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如不抵抗，订立中日密约，三井借款等）来开展群众的反帝争斗的新的阶段。各级党部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坚决地勇敢地去实现国际最近对于加紧领导反帝运动的指示。在一切宣传鼓动之中，加紧去揭破一切国民党的出卖民族侮辱民族，加紧去揭破一切反革命派的实际上帮助国民党维持他的反革命的统治。广大的宣传民众革命的民众政权的口号，使广大的群众了解只有苏维埃政权是真正的民众政权。党和苏维埃政权应该号召民众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并再告诉群众，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是求得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更进一步的开展反帝争斗，领导群众的反帝争斗，组织反帝的罢工，到处在工厂中、学校中、兵营中、街道上组织群众的反帝组织，并创立每一个城市的反帝代表会，组织反帝的示威，争取反帝示威的自由。加紧的反对一切在野的派别，在组织上巩固党的政治影响的开展，这是党在反帝运动中的中心任务。

对于一切灾民的抗捐抗税的争斗，士兵的争斗，党应该加以坚

决的领导,一切对于这些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消极应加以最严厉的打击。党应该站在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斗争的领导地位。应该发展这些斗争来破坏国民党政权来拥护和援助红军的行动,组织这些斗争成为响应红军的胜利的进攻的浪潮。

在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准备党的组织与党员去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阶级的决战,是十分重要的。这里必须首先加强党员的政治教育,提拔新的工人干部,考查教育旧的干部,特别应该注意到敌人的破坏党混入党的阴谋,而严密党的组织,同时应该广大的征收工人农民及一部分贫苦的革命学生到党内来,改善一切党的组织的领导的方式,应该把一切问题集中到支部去,改善支部的生活,建立在工厂作坊中的党的堡垒。

为[的]执行党面前的战斗的任务,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无情的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革[主]要的危险,这种倾向在现在表现在对于目前主[革]命危机紧张的估计不足,对于红军行动的消极,悲观,失望的胡说红军涣散,不愿意利用顺利的形势开展进攻的斗争,以昨天的正确的策略,当做永远不变的教条,对于工会工作的消极,忽视工人的经济斗争,认为工人斗争在经济恐慌之下是不可能的,在反帝运动中作国民党各派及其他各派的俘虏等,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左”的倾向危险,由于革命危机迅速成熟,△△△△△设起来^①,和立三路线复活的企图(如主张号召上海的工人放弃在黄[色]工会中艰苦的争取他的会员群众的工作,而〈主〉张小部分工人自动退出黄色工会等)。对于这种倾向的斗争一分钟亦不能放松。应该反对一切口头上承认决议案的正确而实际抵抗或不想一切的方法去执行决议案的两面派的态度,艰苦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发展自我批评的[与]深入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央坚信各级

^① 中央档案油印件此处为“亦逐渐的增长起来”。

党部的同志，必定能够完全实现这个决议，而确立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根据 1932 年 4 月 20 日
出版的《实话》第三期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辑》第 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广州公社五周年

(1932年12月)

米 夫

五年前,1927年12月11日,广州城头飘起了苏维埃的红旗。广州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支持他们的教导团一起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政权。经过起义群众的英勇奋斗,工人武装和革命军队的浴血战斗,广州公社宣告成立。

还在广州起义之前,中国就爆发过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1922年1月规模宏大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有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还有1925年夏80万上海无产阶级参加的大罢工,这次大罢工成为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开端。此外,1925—1926年还爆发了为期半年的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使当时的广州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基地。这里还应当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曾经参加了著名的北伐战争。

在上海,工人曾三次举行武装起义。由于第三次起义(1927年3月)取得了胜利,上海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控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和贸易中心竟长达两周之久。同年8月,武装的劳动群众占领了(当然,时间也不长)江西省的两个主要城市九江和南昌。

在这一系列事件和中国劳动群众的历次革命战斗中,广州公社占有特殊地位。无疑,它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之前,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进行的所有大规模行动和罢工不断把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为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

开辟了道路,为胜利开展中国革命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

但是,只有广州公社才表明无产阶级取得了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最终巩固住在这场革命中担当领袖和组织者的地位。广州公社是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一面崭新的旗帜。苏维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破天荒第一次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广大地区里得以实现,运用于实践并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广州公社是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低落和准备第二次革命这种形势下的后卫战。但这并不会降低它对中国革命运动和整个被奴役的东方所起的作用和意义。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显示出自己高度的阶级觉悟,捍卫革命成果的毅力,继续斗争的决心,那么,这就会更好地证明,中国革命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最深厚的基础的,中国无产阶级是有能力领导这场革命的。

列宁在谈论革命条件时,除讲到客观条件外,还突出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他说:“革命阶级有能力组织足够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去摧毁(或者挫败)旧政府,如果不去‘打倒’旧政府,那它甚至是在危机时代也永远不会‘垮台’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广州起义中相当明显地表现出组织大规模革命行动的能力。

广州公社存在的时间不长,总共 58 个小时。领导犯了严重错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的力量居于全面优势地位,这就注定了广州工人和城市贫民的失败。但是革命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宣告了整个殖民地世界新纪元的开始。

这些法令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无偿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并分给农民,以及废除一切奴役性的债务与租佃契约。

评价广州公社的意义时,不仅要联系过去发生的事件,而且还应看到殖民地东方革命斗争今后的发展。广州公社的口号,工农苏维埃的口号受到几百万劳动群众的拥护,成为争取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完全独立,争取国家革命统一,争取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奴役的战斗旗帜。

在同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付出了巨大惨重的牺牲。但是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广州起义后的五年间,中国苏维埃运动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根本无法战胜这个运动,尽管国际帝国主义给它以种种支持。

美国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也不得不承认,“据悉,目前有 6000 万至 9000 万中国人受着共产主义的影响,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加,现在已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防止共产主义向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进行扩张。”(《亚细亚报》1932 年 12 月)

中国红军正在成长壮大。最近两年来红军粉碎了对苏区的四次“围剿”。红军不仅顶住了敌军优势兵力的进攻,而且在战斗中还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扩大了苏区。

据资产阶级报刊报道,在这几次“围剿”中,国民党政府方面总共投入 80 多个师,将近 100 万人。其结果如何? 政府军 80 个师中有 42 个师被中国红军全歼。在这期间,有 8 个师的士兵打死自己的长官后,向苏维埃投诚。另有几个被击溃的师,经国民党重建后,又再次被红军歼灭。几年来中国红军缴获的战利品,计有步枪数 10 万支,机关枪数千挺,并俘虏数万名敌兵。

当前,国民党在帝国主义的直接物质援助下对中国苏维埃进行第五次“围剿”,投入了 68 万兵力。据此可见中国红军兵力之雄厚以及中国国内战争规模之巨大。现在正如以往几次“围剿”开始时一样,国民党的报刊大吹大擂,说什么政府军“节节胜利”,根除中国苏维埃运动已指日可待。

但是,相信国民党文痞信口雌黄的人,甚至在敌人内部也越来越少了。而呼声越来越大的却是这样的说法:“要用武力把共产党镇压下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用军事手段对付共产党是徒劳无功的”(南京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语),“老百姓大部分都同情共产党

而敌视国民党。”(粤军将领余汉谋^①语)

中国著名教授胡适不久前写道,在中国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能根除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胡适教授用下面的话回答了为什么中国农民支持共产党的问题:“共产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强行平分土地。赣、鄂、皖的地主对此深有所知。共产党队伍一进村,地主马上就跑掉。接着,烧掉全部地契,拔掉所有地界桩子。共产党废除了过去土地所有制的分配原则,重新给农民分田。在共产党地区,农民得到了一定的经济实惠,这完全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②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李顿调查团^③的报告间接地承认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正确性。李顿调查团认为,中国共产党尤其在中国贫苦农民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贫苦农民以及废除农民的债务。

李顿调查团原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有利条件,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南京政府 1932 年夏天对中国红军的“围剿”没有取得什么重大成果。李顿调查团只好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指出,中国有一股能够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挫败其全部计划的势力。

① 余汉谋,粤军首领陈济棠部下,1932年3月蒋介石任命陈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陈派余汉谋负责赣南“清剿”。——原编者

② 胡适这段话未查到出处。——原编者

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强占东北。同年12月国联理事会通过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的决议。翌年1月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英国人李顿任团长,故通称李顿调查团。帝国主义组织调查团本身是对中国的一种侮辱,其真正目的在于怂恿日本进攻苏联,并将东北由日本独占变为由国际帝国主义共管。调查团3月到南京,4月去东北。10月2日发表了荒谬绝伦的报告书,诬蔑中国“并非有组织国家”,袒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倡议国际帝国主义合作来消灭中国革命,提出国际共管东北的办法。报告书发表,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反对。——原编者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中写道：“共产主义在中国已不仅是一种政治学说，中国已不仅成立了独立的共产党，而且共产党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对手，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已有了自己的法律，自己的军队和政府，还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目前只在赣闽两省成立了共产党政府，但地方苏维埃已多达数百个。共产党政府由当地工农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会组成。而实际上政府是受中国共产党代表监督的。”^①

如果说连李顿调查团的报告都承认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完全苏维埃化，承认最近共产党势力控制的地区也已大为扩展，那么，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国苏维埃、工人和工农取得的成就是稳固的、不可动摇的。

有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确信中国苏维埃制度的全部优越性。

在苏区，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工农手中，这个政权的任务是从根本上提高群众的福利。在国统区，劳动人民仍无任何权力，而帝国主义者和卖身投靠他们的军阀则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在苏区，起义的工农群众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的桎梏。在国统区，统治集团则为帝国主义进行侵略、瓜分中国和对国统区进行彻底的殖民奴役扫清道路。

在苏区，已经从根本上废除了地主土地占有制，消灭了千百年的封建高利贷奴役制。农民有了土地，奴役性的债务已经废除，不堪负担的捐税一律取消。工人的劳动条件大为改善，工农的生活

^① 1932年《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译本(读书出版社1932年版,第38—39页、第37页。)这段话的译文为“共产主义在一般国家(苏联除外),……仅为一种政党党员所持之政治主义,或为一种特别党的组织,冀与其它政党竞争政权。但在中国则否,其在中国现已成为国民政府之强敌,有自制之法律及政府,以及自身行动之土地范围。”“迄今在江西、福建曾经组织两个共产省政府。但具体而微之苏维埃制度,则不下数百之多。共产政府以当地农工大会选举之委员会组织之。在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代表之管理。由该党派出曾受训练人员以管理之”。——原编者

有了很大提高。而在国统区，则是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普遍的经济危机，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军阀的苛捐杂税，对工农的骇人听闻的剥削，几千万人的破产、饥馑和死亡。

下面，我把这种情况同中国苏区通过报刊传到我们这里的消息对比一下。消息说，工农群众以巨大的劳动热情克服了水灾，经济封锁和国民党军队的破坏所造成的困难。据西欧报纸报道，“在不让一块土地荒芜的口号下，苏区春播工作进展十分迅速”。这家报纸还报道说，这年秋天，苏区在反击国民党军队偷袭抢粮的斗争中组织了突击队，在“不给敌人一粒粮食”的口号下极其迅速地藏匿了收获的全部稻谷。

中国的劳动群众进一步认识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的统治、与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的反革命政权和整个国民党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又有许多地方成立了苏区。更多的劳动人民投身于革命解放斗争。中国报纸关于鲁南日照县发生暴动的报道就反映出这一点。报纸说，这年秋天，日照县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地主实行抗租，10月中旬，有50个乡同时举行暴动，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实行分田。

华北陕甘边区建立了新的苏区，这也是一个证明。另外，满洲和热河游击运动的蓬勃发展也证明中国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日益壮大。

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级站在这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的前列。在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中，中国的无产阶级把政治口号和日常的经济要求结合起来。在国统区，他们处于秘密的情况下，正力争实现自己的要求。

比如，上海印刷工人争取到八小时工作制。中国无产阶级在罢工斗争中表现得坚韧顽强。4万名矿工在1931年一年之内举行了五次罢工并终于使工作日从十小时缩短为九小时。在反帝运动的高潮中，罢工斗争不断发展，大批工人投身罢工运动。

1931年,在中国有772477人参加了罢工。1932年掀起了新的罢工浪潮。下面的数字可以说明1932年中国罢工运动的情况(按季度算):

月 份	参加人数
1—3月:	333,880人
4—6月:	237,450人
7—9月:	255,300人
前三个季度共计:	826,630人

这些罢工大部分都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因而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中国的无产阶级正是通过这些斗争成了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其他帝国主义剥削者的斗争的核心。城市贫民的运动,学生运动和游击运动正是在中国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直接影响下不断发展并走上革命道路的。

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以实现中国的独立、完整和统一的口号,提出了打倒国民党、争取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并在这些口号下卓有成效地把群众动员起来。

今天,正值广州公社五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中国革命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这些成就必将与日俱增,而整个中国成为一个自由的苏维埃国家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译自1932年12月11、12日《真理报》

彭宏伟译 郑禄校

(录自《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

(1933年4月)

米 夫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形势存在的事实,苏维埃革命在广大的区域上获得了胜利。加紧的帝国主义侵略,更促进中国最深刻的经济危机的发展,这一经济危机,已到了全国的经济浩劫。劳苦群众的状况是极大的恶劣化,一切的矛盾尖锐到最大限度,同时,这种危机,刺激了群众的革命行动,帮助了工农运动,这一运动的范围是在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另一方面,在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营垒中和国民党军阀营垒中的崩溃,是在广大的范围上开展着。国民党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很大的领土中尽了清道夫的责任。

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中国红军重要的胜利,苏维埃运动胜利的发展,反帝斗争的高涨,中国革命形势已经成了一个事实。中国苏维埃的存在经过了一些年,并且继续着胜利的发展,这是值得令人特别注意并无疑的是有伟大历史的意义的一个最显著的事实。不管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的剥削阶级拼命的用尽一切方法和力量来向苏维埃进攻,这些中国人民的敌人不仅没有能镇压苏维埃运动,而且恰恰相反,他们甚至于不能暂时阻止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继续不断的发展。在过去数年中,中国苏维埃能保持他的阵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中国苏维埃并没有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打击下而投降,中国苏维埃已经击溃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镇压了内部的反革命阴谋,苏维埃是正在继续生长。

在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强盗的战争,国民党无耻的出卖中国人民最神圣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假使没有使中国整个形势革命化的基本转变,假使没有工农运动伟大的积极化的事实,假使没有反帝斗争强大的发展,那么,中国苏维埃运动是不能获到这些胜利的。因此让我们来确查一下那些决定过去数月中中国工农阶级的斗争的新因素。

(一)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工人阶级运动

我们可以根据下面的表格来估计过去数年间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罢工运动的发展。

年别	罢工工人数目
1923	35,835
1924	61,860
1925	403,343
	784,820
	(包括因五卅惨案而发生的罢工)
1926	539,585
1927	
1928	400,000
1929	700,000
1930	387,000
	(统计不完全)
1931	772,477
1932	110,170

(其中有 70 万人是关于罢工,示威及其他尖锐的斗争形式,结果占领工厂,在厂中建立防御工事。)

在 1932 年,除上载的罢工人数外,还有 18 次失业工人斗争,参加的人数约 13.3 万人,这些数字表示中国罢工运动明显的发展

和特殊的扩大。参加罢工运动的工人数目是一年比一年多。

仅仅是数字不足以完全说明罢工运动的进展状况。我们同时要估计到在斗争中所获的新的显著的经验,这些事实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站在反帝斗争的前线,起了新的作用,在整个中国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获得了领导的地位。

当我们叙述这些新成绩时,我们必须首先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斗争的特殊坚决性。许多罢工是一次完了又来一次。例如开滦的矿工在 1931 年罢工五次。5 万矿工终于得了胜利。把工作时间每日十时减为每日九小时。1932 年矿工又罢工四次,获得了新的胜利。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在 1931 年罢工三次,在 1932 年罢工二次。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三次。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举出其他的例子,证明中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特殊坚持性。工人们二次或三次再罢工,一直要达到他们的要求。另外一个因素是:在单独的生产部门,经常的爆发同盟罢工。1932 年 2 月 4 万日本纱厂工人参加罢工。同年 7 月,上海纱厂工人同盟罢工。同年 5 月上海邮务工人宣告罢工,6 月电话工人罢工。我们已经举出了一些事实说明中国工人运动新发展的特点,一个工厂跟住一个工厂举行同情的援助的罢工,最终使罢工包括生产所有的一切部门。

另外一个特点是最近工人表现比以前更热烈的战斗精神,工人们在罢工中实行革命的反攻,回答资本家,国民党当局,中外军警等残暴的恐怖。在许多地方工人们不离开工厂,他们留在工厂中,他们占领写字间,监禁管理员,与军警作坚持的斗争保护他们自己。有些地方罢工工人把管理员和经理拉到罢工工人队伍中,使军警因为怕伤害经理及资本家,不敢贸然向罢工工人开枪,罢工工人因此解除军警的武装。

有许多罢工同时引起了国民党工会官僚及中国警察血的冲突,例如 1932 年正月马家沟 1 万矿工解除矿山警卫队的武装,占

领电力厂和办公处,监禁管理人员,强迫警察离开矿厂。1932年冬上海永安厂6000工人罢工,在开会后,立刻去抵御正来的警察队,把警察队击退了,占领工厂,破坏机器的零件,捣毁管理人员的办公处和宿舍,军队出动援助警察,枪杀五个工人,伤数十。在这一罢工中工人杀死了国民党工会代表团的领袖。最近上海电车工人罢工结束了。在罢工中,工人固守工厂、占领写字间,监禁管理人员数日,击退了警察想驱退罢工工人出工厂的一切企图。

罢工运动中一个新的特点,是工人们自己行动而不向人要求。例如1932年上海印刷工人二次罢工结果都失败了,不能获得八小时工作制。于是乎工人们自己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资本家没有法子能破坏工人们有组织的自发的反抗。这种胜利成为永久的胜利。资本家恐吓被捕工人,实行破坏工人政策,也不能击败工人的坚持不屈。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在许多罢工中,罢工工人自己选举他们的群众罢工委员会。有一次选出了一个200人的罢工委员会,又有一次选出了一个150人的罢工委员会。起初看了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团体似乎太麻烦,使罢工的工作更加困难。但是在事实上并不如此。中国共产党员从经验中知道假使没有人数众多的组织包括黄色工会的会员,按照一般的情形,罢工委员会都有被捕的危险。同时假使罢工委员会只包含国民党黄色工会的代表,罢工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这些国民党黄色工会的代表们出卖罢工。在这种新环境中,假使我们选举群众的罢工委员会,那么,警察要逮捕150人,200人,就比逮捕50人,10人更加困难。同时这种办法可以防止黄色工会领袖的活动,因为在多数有革命斗争精神的工人包围之下,这些黄色工会领袖们不能很好的进行他们的出卖阴谋,无论如何这种经验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罢工运动显著的发展,幕后是反帝斗争的高涨。一些罢工有很明显的政治性和反帝性。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而爆发奉

天、抚顺、鞍山同盟罢工,上海战争时一些中国城市中的日本企业爆发了罢工,这种表明中国工人随时准备着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反对帝国主义的羁绊。因为这些罢工,所以在中国日益发展的反帝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是站在斗争的前线,负起了领导的任务。在1931年在所有的斗争中,74%是单纯的经济斗争。在1932年,罢工的基础仍然是以经济要求为主动力,但是一般的我们可以看见斗争中的政治意义,在参加罢工的工人中有35%参加罢工提出有浓厚政治性的要求。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到,最近中国的罢工证明了工人运动在地域上是扩大了,并不是像以前一样,只限于上海一个地方。这个局面是一个很广大的地域,在北方和南方,包括其他中国产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1931年南方和北方参加罢工的人数占18%,1932年则占罢工人数的32%。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的联系。许多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很严重的进行组织失业工人,领导失业工人的斗争。1932年11月上海的6000失业印刷工人获得了失业救济。上海13只船上被开除的海员在原船上恢复了工作。在山东因矿厂关门,有1万矿工罢工,这些罢工工人占领管理局,强迫资本家(虽然是暂时的)开厂继续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上海纱厂的失业工人举行了一次大会,代表20.1万丝厂工人。在无锡1.5万工人失了业,在1932年的春天,这些失业工人占领工厂,反对关闭企业,反对不发救济金。后来获得了相当的胜利,部分的恢复了工作,发了救济金(虽然是很少的)。天津的失业铁路工人屡次占领总车站和办公处为要求失业救济而斗争。

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工人运动这样伟大的发展,是正在进行着,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罢工中的重要和领导作用的日益加强。在以前数年中,大多数的罢工是自发的。在1932年的三分之一的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国民党统

治区域中,赤色工会的工作最近有了积极的转变,上海赤色工会的会员数增加了9倍。在九一八的征求运动中,结果超过原定数目数千人。

1931年9月在上海举行了纱厂工人代表大会,出席工人120人,代表上海32家最大的纱厂,结果成立纱厂总工会,到现在这个纱厂包括了上海纱厂工人的大多数。在组织烟业工会中的革命工人工作中,我们也有了一些进步。赤色工会在城市企业工人中的影响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革命工会已经打进了铁路工人中去,这是数年来的第一次。在上海本埠外,赤色工会的影响与工作也正在扩大。

我们必须承认赤色工会还没有免除工作中大部分的错误和障碍,还不能在发展群众斗争中恢复赤色工会的组织,转变赤色工会的工作,还不能加紧厂内的活动,使赤色工会变成真正的群众工会,还不能在组织罢工运动中取得积极的领导地位,还没有完全肃清对于黄色工会中的工作轻视,征取黄色工会中的工人群众。不过这毫无疑问的,赤色工会目前正在进行克服这些障碍,扩大赤色工会的影响,使赤色工会不致仍然落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后面。因为这些工作的发展,反帝运动得了一个新的刺激,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骨干,保证反帝运动的发展和最后的胜利。

(二)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农民运动

帝国主义残酷的压迫,军阀的抢劫掠夺,地主豪绅的榨取全国经济恐慌的痛苦,这些原因使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农民受饥饿而死亡,这使更多的农民群众起来为他们的生命利益而斗争,这种斗争目前正在发展的新的尖锐的形式,使农民群众的斗争与工农红军的斗争联系起来,即是与中国中部南部各省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为要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这种结论的正确性,我们只要知道下面所述的资产阶级报纸中所摘的事实就够了。1932年夏天,

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发生饥饿灾民的骚动。这种骚动就是在产丝的地域如浙江江苏也发生了。1932年5月皖北宿寿农民暴动。在陕西,河南及其他地方,多数灾民参加工人农民的各种武装暴动。在四川的大竹,邻水1万多农民在1932年末大暴动。1932年12月在上海的近郊1万多农民示威反对因不能偿还债务而被驱逐及没收土地。

在这些地方,以前只有无组织的自发的农民斗争,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现在在这些地方苏维埃运动正在生根。1932年初我们在华北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这部分军队是中国北方第一次的有组织的工农武装队伍。1932年11月在陕甘边出现了红26军,这也是在中国北方。这部红军占领了九县地方,有3大队,27小队。1932年10月20日江苏3000农民暴动,攻打地方当局,释放47名犯人,在县法院中毁灭了一切公文。

10月中旬山东东南部的日照县农民暴动,不肯付租给地主,组织苏维埃,分配土地。从这些事实,我们不难推论到国民党统治区域中最近所爆发的农民斗争的形式。中国北方的农民群众,已经开始了参加苏维埃运动,不过这个运动显著的特点并不仅是这一点,除此之外,我们还看见在中国革命斗争现时阶段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爆发了苗民的暴动。在中国北方,非中国的回民暴动,经过一些年,有时消沉,有时又重新爆发,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们的武装暴动包括数百万群众屡次打败中国的军阀,据最近的消息,回民群众已经占领了重要的城市阿克苏,不过我们要承认在这些斗争中还看不见共产党员的作用。但是在1933年初湖南、广西、贵州边境爆发的少数民族暴动就不相同了,根据路透社的报告这次暴动就是共产党所组织的和领导的,现在有5万战士。

为结束关于中国革命农民群众在发展中的斗争的叙述,我们要提到满洲与察哈尔的游击战争反对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击溃了一些将军们离开了满洲后,仍继续战争的军队。这是马

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丁超等的命运。

不管这些军阀们在反帝运动中临阵退缩,群众自己仍然是继续游击战争,这一游击战争已经扩大到了一个很广的地域,参加这一游击战争的农民有 25 万人。

(三)反帝运动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以来,在中国就发生了一个发展很快的反帝运动和斗争,日本军阀每一个占领中国的土地的行动,就给中国反帝斗争一个新的刺激,使更多的劳苦群众参加这一反帝运动,中国无产阶级发动了英勇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奉天、抚顺、鞍山的同盟罢工,上海及其他产业中心日本企业中的罢工,屡次马路上的示威,无产阶级及其他各种积极的反帝行动和示威,都引起了全国劳苦群众热烈的反应。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在反日干涉的斗争中取得了领导的地位。这影响到学生运动,义勇军游击队,城市贫民运动的发展和革命化。排货运动已经扩大到了全国,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的反帝情绪也加强了。

国民党领袖的各种诡计,企图掩饰他们的背叛行为,维持他们对于群众的影响,他们这种诡计都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毫无疑问的中国的劳苦群众从国民党出卖中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实际行动中得了许多教训。群众正在脱离民族改良主义的幻想与国民党的影响,这些广大的群众团结在共产党“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求中国的完整与统一”这一口号的周围。中国共产党具有更进一步的胜利工作的顺利条件,党用尽了一切力量利用这一形势,来解决党所遇到的复杂问题和负责的任务。党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和组织到最大限度。党组织广大的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党不管国民党的抵抗,从党的秘密地位冲破压迫,进行公开的活动。党发动反帝大同盟及反日会的群众运动,努力想把组织援助义勇军的运动抓到党的手上来。

更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反帝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群众斗争中获得领导权,在这一任务中苏维埃中央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中国民众的宣言是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民党的作用,法英帝国主义者帮助(虽然是消极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以图瓜分中国,奴隶中国。这个宣言严厉的攻击国民党压迫摧残反帝运动,节节放弃阵地,鼓励帝国主义者更进一步的侵略。这个宣言更指出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国民党军队订立作战协定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这三个条件是:(1)停止进攻苏区,(2)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3)武装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

资产阶级的报纸对于这个宣言所采取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正月21日的“平津泰晤士报”中,潘尼尔先生在“事变奇异发展”的标题下写:“目前另外一个重要事件是江西苏维埃政府所发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苏维埃政府宣称只要取消训政时期,允许人民的民主权利,则苏维埃政府立刻可以同国民党共同抗日。假使目前的危机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可以预料南京政府与共产党在这方面根据这个基础成立休战协定。”

丁文江先生《假使我是蒋介石》的标题下说:“应当在抗日期中彼此不相侵犯的条件下,与共产党合作,获得共产党的帮助。”

中国报纸对于这个宣言曾经广泛的讨论过和批评过。虽然是间接的,这也足以表现运动的倾向,代表广大群众的情绪努力民族革命斗争,这是达到中国独立与完整的道路,不过这个宣言的著者并不想从南京得到积极的答复。这个宣言说明中国红军真正的和深沉的愿意参加武装抗日,同时揭破国民党的武断宣传说“国民党因为被红军攻击,所以不能抗日”。

这个宣言的真正意义是实际地建立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个宣言的目的是团结最广大的劳苦群众在“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口号

下,同时这个宣言更证实只有苏维埃能救中国,在苏维埃的领土上已经锻炼,能保护中国的力量。

(四)中国的苏维埃运动

在中国中部南部的省份中,国民党政府军队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的激烈武装斗争经过了四年之久。南京政府得帝国主义的帮助,曾经四次向苏区进攻。结果国民党政府军队都遭惨败。现在正在进行第五次“围剿”。在第四次“围剿”开始时,蒋介石集中了68万军队,压迫红军离开围绕武汉的区域。红四方面军被压迫退出鄂豫皖边区。因此蒋介石宣言在最近的将来完全战胜红军,完全扑灭共产主义。事实上不能说红军打了败仗。固然红四方面军因为要避免与强大敌人的战争,而放弃了原来的根据地,但是这使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冲过陕西的南部进到四川的东北部,占领了一些地方,扩大了影响,这地域比以前湘鄂边区的地域更大。

虽然在行军中,遇到很大的困难,据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载,红四方面军还能击溃24军(两师被击溃,两师人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正在变为这个新区域中团结革命势力的中心点。因此当地的地方武装(约1万人)揭出红旗加入红军,这是不足奇怪的。在过去数年中,四川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一农民运动目前正在与红四方面军携手,进行共同的斗争。我们自然可以预想到有了红四方面军的帮助,四川的斗争以后更能顺利地发展巩固我们在四川的苏维埃根据地。

我们从资产阶级报纸看到在贺龙同志指挥下的第2军团没有受重大的损失,回到了以前放弃的地方。

在中央苏区第1军团与第3军团已经联合了第10军团由东北方面威胁南昌。根据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载,这些红军已经给了一些政府军队严重的打击。1932年11月末,南京政府的23师、

24师、27师被击溃。12月间第5师、14师、90师被消灭。1933年2月在同一地方两师政府军队被击溃。

推论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还没有终止)我们必须指出蒋介石没有理由可以夸口击败中国工农红军。恰恰相反,红军在四川与中央苏区的胜利,新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这证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的武装斗争,证明国民党没有希望能镇压苏维埃运动,消灭工农红军。

让我们看一看红军在战争中所用的战术。这是上次“围剿”中顶有兴趣的特点。在每次与强大的敌人战争中,红军的这些战术都得了胜利。红军必须保护苏维埃的领土,这在中央苏区尤为重要,因为中央苏维埃政府是暂时设中央苏区。在进行这种任务中,红军保持他的流动性,假使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时,红军绝不固守一个地方。红军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战的胜利环境,而敌人则不得不在恶劣的环境下作战,因为其行动的配合、交通、给养等等困难。除此之外,红军还用游击战争与革命农民对政府军队士兵的影响来削弱和动摇敌人。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红军多数的胜利是由于采用了这些战术,这些战术的主要的目的是在保全主力,在迅速的发展中巩固主力,创造新的红军队伍,同时巩固红军政治的与军事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员很清楚在斗争更进一步发展中红军应担负的责任。在这一斗争中,红军将要是全中国革命高潮中一个强有力的杠杆,必须充分的加强红军,保障中国革命更进一步胜利的发展。

为要准备最近将来斗争的条件骚扰敌人兵力,使红军的工作更容易,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任务。在苏维埃下单独区域的存在与创造新苏区根据地这个路线并不能认[为]与联结邻近苏区成为一整块苏区的路线不同。共产党固然要努力占领苏区中反革命武装力量作为巢穴的城市中心,但是共产

党不能忘记他自己的武装力量与敌人的武装力量相比在数量上暂时是不利的。因此把占领有防御工事的大城市的任务留在以后,只实行包围这些中心,动摇和削弱敌人的兵力。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苏区的经济状况。苏区中劳苦群众的经济地位已经有了很显著的改善,消灭了军阀的压迫,帝国主义及地主剥削,消灭了高利贷者等等,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增加了工资,农民获得了地主的土地。这些是事实。但是我们要承认苏区的经济状况整个的说来是相当恶化了,这影响到革命的胜利。

一些时候以前,苏区的经济状况可以用“剪刀”这个字来代表,即是说工业制造品与农产品的价值相差很远。因为农产品很多,所以农产品的价值低落;同时工业制造品缺乏,使工业制造品的价值高出一般的水平线上,比以前增加了两三倍,现在有些缺乏工业制造品,有些地方也感觉农产品的缺乏,这种现象是有许多因素的。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军队长期的继续向苏区进攻,破坏苏区的生产力,减少了播种的土地等等。此外南京政府实行经济封锁。有些地方正受天灾(如水灾)的影响。除此外还有内部反革命剥削分子的怠工破坏。目前因为红军人数的增加,所以供给红军的给养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以前的给养来源(如没收地主豪绅的货物)到现在已经减少了。另外一个障碍是有些苏维埃根据地的动摇,在目前各处战争状况之下,政府不能进行建设工作,不容许地方苏维埃开始常态的经济活动。还有其他的因素,如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交换制度的广泛发展。这些区域经济的发展比较落后(小农家庭,手工业制,及在许多地方是小农制造业)。这一切使供给红军的需要发生困难。末了,以前在经济政策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错误。中国苏维埃实际工作的发展供给了我们这种言论许多例证。这些因素对于目前的经济与物质状况都有不好的影响。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必须负起补救苏区经济政策和

改正以前错误的任务。现在已经实行了一些办法,使生产能健全的发展,使生产品的交易经过市场而发生新的活动。这些办法是:

不迫切需要的地方,共产党提议禁止屡次分配土地。一直到最近有许多地方,在三五个月后,又重新分配土地。这个新的政策应当使土地的分配成为固定的,因此可以使农民能更努力耕种他的土地。

还有,党提议不能无区别的完全没收富农的财产,只能没收参加反苏维埃活动的人们的财产。其他一切忠实分子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换他们的生产品。自然地方苏维埃必须注意富农不能用苛刻的租金出租土地。根据苏维埃的基本法,地主的土地完全没收,至于富农的土地则只部分的没收,留一部分给富农自己。假使富农不是积极的反革命分子应当分土地给他,使他自己耕种。在大多数地方分给富农的土地大多不是最好的土地。因此许多地方同志把这种法律解释为禁止富农购买土地、出租土地和雇用工人。党新的指示指出不应当禁止小康的农民购买和出租土地,及雇用工人。为要发展生产,必须允许出租,与购买土地,雇用工人。自然地方苏维埃要监督这些行动,才不会使以前的封建关系和剥削复活。

为要发展生产和保护雇农的利益,我们应当定出一个新的暂时条例,关于雇用季候工人及规定工资的分级差别(富农雇用工人应多出工资,中农则可以少一点)。党号召地方党部特别注意耕种、收获、公共工作等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考量这些办法,采取实际的办法要减轻农产品缺乏的困难。在他一方面为要使手工业生产品有新的活动,党提议保护这些企业中工人的利益,他们整个的阶级利益,红军的利益和在经济上巩固苏区。必须定出暂时的条例规定雇用学徒,补充劳动法,适应小规范手工业生产的特殊条件。同时关于收税政策必须采取某种办法,来促进地方的生产力。自然这一切办法不应

当违反工人群众运动的发展和保护劳工的原则。党与工会要注意到这点。在经济领域中各方面所采的办法应当同时注意到总的经济状况,帮助红军的利益和作战。发展劳资的斗争到罢工,这不是时时需要的,我们可以找出其他的方式来拥护工人的利益。假使工人的斗争影响到生产和红军的利益时,那么苏维埃的劳工机关与工会及雇主们的代表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同时地方党部与苏维埃机关应当特殊注意更进一步的发展合作社运动,建立严格的预算制度及合理化。为要避免货币的跌价,必须实行一个谨慎的财政政策。

在劳动条件,工农劳苦群众生活中,苏区所实行的整个经济政策应当与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有根本上的不同。必须把两者对照起来,在经济政策中指出不相同之点,特别是红军进到一个新地方而不想永久占领时。应当逐一注意到生产分配和使用过程中的一切社会关系,定出我们的政策,以图改变以前的状况。这个政策对于动员广大的劳苦群众团结在中国工农苏维埃革命旗帜之下的任务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译自《共产国际》俄文版 1933 年 4
月号。译文载《斗争》1933 年第 22
期(8 月 15 日)、第 23 期(8 月 22 日)

(录自《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

(1933年6月20日)^①

报告大纲的程序

一、国民经济的总崩溃与工农生活的恶化

- A. 民族工业的破产
- B. 农村的浩劫
- C. 财政的危机之深入

——殖民地化的过程之深入

二、在战争与革命的火焰上

A.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国民党的投降与民族危机及群众的反帝运动

B. 资本的进攻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及革命职工运动

C. 日新月盛的农民斗争与农民暴动

D. 士兵的革命化

E. 中国境内弱小民族的解放斗争

——苏维埃运动是整个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基础

三、两个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与苏维埃的中国的斗争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

A. 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进攻苏区

B. 苏维埃统治区域的现状

^① 原件无时间，此时间是存档时间。——原编者注

- C. 战争与红军
- D. 苏维埃的建设
- E. 苏区的职工运动
- F. 青年团及其它群众工作

四、党的政治的组织状况

A. 党内的政治生活——反右派及立三路线的成功,布尔什维克一致团结,党的理论水平的提高

- B. 党的组织状况
- C. 青年团及其它群众组织
- D. 党的主要弱点在哪里
- E. 两条战线的斗争

五、总结

第一部分

一、国民经济的崩溃与工农劳苦群众生活的恶化

1. 经济危机的深入,国民经济的崩溃,使工农群众的生活恶化,失业、破产、饥饿、死亡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农业的崩溃和浩劫有以下的显著的事实:

(1)荒地增加到极惊人的程度:

1914年 三五八、二三六、八六七亩

1918年 八四八、九三五、七八四亩(东亚同文《中国年鉴》

调查)

1922年 八九六、二一六、七八四亩(农商部统计)

1929年 内政部荒地调查仅江苏浙江新疆绥远二七八县的荒地为一、一七七、三四〇、〇〇〇亩(与全国耕地相等)

荒地数目决不止此,年来的增加,单是1931年的水灾,受灾田亩已达二五五、〇〇〇、〇〇〇亩(中国银行报告)

(2)生产的极度的缩小:

1931年缺少米七〇、〇〇〇、〇〇〇担，同时外米大批的输入，由

1931年 六四、〇〇〇，〇〇〇两到

1932年增至一一九、〇〇〇、〇〇〇两（米占1932进口品第一位）

(3)茶地桑田的消灭，耕牛与农具的消灭：

福建茶地的收采已经消灭70%

无锡和浙江的桑田砍伐

各地农民以贱价出卖耕牛农具及战争中的毁灭

(4)灾民难民的惊人的数目与农民的死亡和农户的减少

农户五八、五六九、一八一户（1932农商部主计处）而灾民一八、八一三、一一五人（至少数）

死亡，只就1931年水灾，长江沿岸已死35万人

十七年至二十年西北大旱灾，单是陕甘死四百万（《申报年鉴》）

(5)农民的赤贫与食人奴隶贩卖的惨剧的增加：

A. 小部分能够耕田养蚕者，一九三二年是

a. 每十亩田亏本（按上等年成）十四元

b. 每担茧亏本（按上等收成）一〇元

B. 大部分是：a. “弃地迁离”，b. 没有一元钱去买蚕种。

C. 食人奴隶贩卖

这种现象是随着世界的经济恐慌，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国民党血腥的统治，军阀战争爆发，帝国主义与地主豪绅军阀的剥削，田赋的豫征及田租的增长，苛捐杂税的无孔不入日加扩大，其结果愈促进：①整个农村经济的没落，②土地更加速的从农民手中失去（河北涿县十元一亩，而田赋还须农民自纳），③对外贸易的日缩（一九三二年入超五亿多，出口减少百分之四十五点八），④购买力的没落，给工业以严重的打击，⑤城市失业农村破产更加严重，这

样使农民在一九三二年及最近的更激烈的以革命的斗争去解除他自己死亡的道路。

工业的破产与停滞,主要可以看到的是:

(1)轻工业的破产关闭与减弱:

纱厂 A. 关厂——隆茂,同昌、永豫、永安、华丰(上海),申新、泰安(汉口),恒源(天津)等

B. 减工——华商百分之二十三——百分之五〇,日商百分之四〇——百分之五十五

纱号 上海七七家倒闭一七

棉商 六三四中减少三分之一

缫丝——上海九七厂中只开一一厂,无锡四七厂中只开一九厂

山东:丝的生产一九三二年减少百分之八〇

丝厂停厂者百分之九〇——廉价售于日本资本家者损失二千万

丝织厂——上海倒闭百分之五十六(五六七厂中开者只二五〇厂)

杭州百分之八〇以上倒闭(九〇〇厂中开者不到二〇〇)

(2)重工业、交通工业的停滞与非民族化:

上海机器工业——营业减少三分之一

矿业——

煤矿(主计处统计局)

全国主要矿产量

一九三二年四月八八七、四三五吨

又八月七七二、〇四九吨,已减少一一五、三八六吨

开滦区(车站起运)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八九、九四一——九月二六九、〇七二

井 陘

一九三二年五月八三、四四五——九月四七、九〇〇

(余见《统计月报》二一年一一·一二合刊)

盐 业

淮盐生产减少百分之六〇

盐业公司歇业者百分之五〇以上,失业工人一〇〇、〇〇〇人

交通工业

铁 路

全国铁路收入与支出(六单位)

一九三一年十月到一九三二年十月共收入一七〇、四一七、六五六·四一元

一九三一年十月到一九三二年十月共支出一七一、三〇二、七四二·七八元

亏 八八五、六八六·三七元

据铁部统计截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底全国铁路负债为十三万五千余万元(其中十万万余元是外债)

轮 船

招商局的破产与出卖等

在这种情形下,工人受着资本家残酷的进攻,失业,死亡,工资减低,生活恶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在工人的失业,据可以知道的是:

上海——二十四万余人(二一年的产工,见社会局统计)

南京——三〇〇、三〇六(此为全市失业及无业人口数,全市人口五六〇、〇〇〇,失业占百分之五十四)

武汉——十万人(见最近《申报》汉口通讯,实际尚不止此,据十七年汉口市报告即是十万失业工人)

广州——百分之五〇以上(十九年工商的调查,广州共有工人二三九、三六五)

另一材料广州失业工人五三、六五〇人

北平——百分之六十一(全市失业人数十九年调查二三〇、〇〇〇)

长沙——一三五、八〇〇(全市失业人数)

芜湖——二、二三〇(一八,六失业工人)

安庆——六四、五一六(一八,失业工人)

徐州店员——失业一万人

商业的倒闭:——

上海三分之一,天津二、七四〇余家,徐州一、〇〇〇余家,因之失业者达万余人。

战中的损失——单就上海事件言:

工厂被害的损失——九六五家(被毁者三五〇家,但就纺织业说,纱厂炸毁者一,被害者七,棉织厂被毁者一六。)

战事损失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2. 财政危机与国民党财政的破产

3. 帝国主义的经济的侵略与殖民化的深入

经济危机深入,国民经济的崩溃,更遭受着战争与灾祸的打击,日加严重,统治阶级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疯狂的将危机的重担架在工农劳苦群众的身上,国民党是靠着借外债,苛捐杂税公债的剥削,甚至实行鸦片公卖,剥削毒害劳苦群众来维持,但是工农劳苦群众是日加从他们的死亡中找出跳出经济浩劫的革命出路。解决中国的经济崩溃,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国民党陈公博的工业五年计划,不是汪精卫农村复兴,而是中国工农群众自己——苏维埃政权。

第二部分

二、中国现在正处在战争与革命的火焰中

(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使中国民众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

1. 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是企图把满洲变为他垄断的殖民地,变为进一步的进攻中国革命,公开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进行反革命的反苏联战争,以及为争夺太平洋霸权进行帝国主义强盗战争,与进攻本国工农的大本营。

2. 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是得到法英帝国主义的帮助。同时法的侵占云贵,英的侵占西康西藏,美帝国主义进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目的,他们在掠夺中国压迫中国革命是共同的目的,他们在瓜分中国分配中国的利益开展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日美帝国主义。

3. 侵占热河华北,是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为着进一步的进攻中国和实行武装干涉苏联进行抢劫和侵略计划的有机的继续,最近的目的是企图完全实现华北的傀儡国和察哈尔的完全占据,及山东的攫取。

4. 国民党的卖国与进攻苏区——国民党的投降完全将满洲、热河、华北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国在满洲失去八万三千五千方里之土地,三分之一的人民,四分之一的对外贸易,热河五十八万方里,出卖上海及华北造成“开国以来所未有的奇变”(中行报告)。他的卖国政策主要是:

a. 破坏和屠杀抗日的兵士与满洲华北的义勇军。

b. 以残酷的白色恐怖压迫反帝的群众斗争。

c. 集中一切的力量去进攻苏维埃与红军,阻止他们反抗帝国主义,极力的进行反苏联的阴谋。

d. 撤退军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前面驱逐反帝民众作清道夫的作用。

e. 这些政策是依靠着他无耻的欺骗武断的宣传和国联强盗联盟及一切反动派别进行——如公理的裁判,长期抵抗,公放政权,红军的捣乱,中国贫弱,人民对于政府不能一致,苏联承认满洲国等。

5. 热河、华北的侵占后表现出以下的事实：

a. 对于中国革命更进的压迫——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各帝国主义的派兵增舰，张学良及华北军阀公开屠杀抗日的兵士及义勇军。蒋介石大举进攻苏区，各帝国主义更允许积极的帮助。

b. 干涉苏联的形势更加紧迫——中东路问题，国民党的反苏联运动。

c. 帝国主义的内部的冲突的加深——美舰队来华等。

d. 国民党的投降更无耻的暴露统治的崩溃。

e. 反帝运动的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出路。

f. 红军的伟大的胜利，苏维埃区的发展。

推翻国民党统治是顺利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不与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及一切反动派别斗争，不会团结广大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6. 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给予中国劳苦群众的死亡与痛苦灾难是空前的浩劫，满洲的占领，热河、华北的侵占，使工人失业，民众遭受残酷的屠杀，农村炸为焦土，帝国主义的“经济兴隆”而是经济危机的加深，扩大到浩劫灾难的状态（见满洲信），上海的战事使工人的房屋炸成瓦砾，工人的死亡是：工厂区一〇、一—二人，商店一二、七四九之多，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经济日加破产（见《新中华》及中行报告），中国的劳苦群众陷于悲惨死亡的道路，这些条件，决定日本是否能够统治著满洲、华北（见满洲信），同时决定了中国民众的走上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

(二)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群众斗争与党的工作

A. 反帝运动

(1)热河事件以前党在反帝工作中简单的说明：

a. 九一八后党的口号和进行的工作

b. 一二八事件中提了一些什么口号，进行了一些什么工作

c. 上海停战后的工作

- d. 满洲工作过去的错误
- (2)热河事件后反帝运动高涨的形势与国民党镇压反帝运动
 - a. 前线兵士义勇军及民众自动的与日本帝国主义英勇的战争
 - b. 满洲义勇军的重新活动与兵士的哗变
 - c. 工人阶级反帝运动的发展
 - d. 兵士与农民的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的斗争——如剿匪前的兵士要求抗日,农民的暴动与反抗。
 - e. 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的胜利及满洲与华北游击队的活动
 - f. 国民党一方面围剿红军,同时积极的压迫屠杀反日民众与兵士与反革命的欺骗
 - g. 反帝的弱点
- (3)党在热河事件中的工作及反帝运动的状况
 - a. 各地运动的状况的叙述
 - b. 红军的宣言与党的政治影响
 - c. 加强华北的领导
 - d. 满洲工作的相当进步
 - e. 反帝运动的经验与教训

反帝运动

一、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引起了中国劳苦群众强有力的反日斗争,在国民党的区域内卷入了广大的劳苦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很快的革命化,广大的群众脱离国民党的影响,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在有些地方生长成为武装的反帝斗争。

党在这一个时期作了些什么工作:

党在九一八后提出了“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民族革命战争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与领土的完整”、“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

益”等口号去组织动员群众,开始在上海利用各种公开的名义去组织与动员群众,同时根据许多具体事实去揭破国民党出卖满洲的真面目,暴露他们屠杀压迫反日运动的事实,揭破他“镇静”、“逆来顺受”、“信赖国联”等欺骗宣传,在上海及各地作了以下的工作:

1. 九月二十六日夺取了国民党召集的市民大会,在一万余人的大会上为我们所领导的群众将国民党的主席推倒,而我们同志作了主席,公开演讲,群众热烈的接受了党的口号。

2. 党与S发表宣言及各种传单,出版了五六种公开刊物与反帝报纸。

3. 十月十日在上海组织了广大的示威,党派人到各地去指导工作,满洲派了中央代表,各地亦有相当行动。

4. 经过这些工作,上海成立了中学联抗日联合会,北平、山东在学生群众成立同样的组织,并且领导“北大示威团”,上海学生几次到南京示威。

国民党在反帝高潮的前面,一方面利用“镇静忍耐”“信赖国联”等欺骗来缓和民众的反帝斗争,同时用屠杀政策来对付民众运动,但是国民党的卖国的面目是日益揭露,反帝运动很快的从反帝密切的结果着反国民党的斗争,群众到处都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

5. 党在当时指出,中心的任务即是利用公开的路线,集中上海反帝的领导,使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联系起来,于是在上海召集反帝代表大会,到四十余团体,公开成立了“上海民众反日联合会”,建立了公开的反帝报纸,公开登报,号召了十二月十三号的市民大会与游行示威,这大会通过了党的决定。

6. 十二月十七日各地学生集中到南京举行大示威,以我们所领导的北大示威团为领导,捣毁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与中央日报,演成了一二·一七南京流血惨案。

7. 这时的的工作最大的缺点便是没有加紧去组织工人的反帝

斗争,并且是两种的理论:A. 学生是反帝的先锋(如团)B. 借口领导经济斗争,认为无暇注意反帝运动(如工联负责同志,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去组织工人经济斗争)。党纠正这两种倾向,提出加紧反帝运动的无产阶级骨干,加紧去在工人中进行反帝运动,真正去组织工人的斗争与反帝运动密切的联系,并且极力打击取消派工人落后的谬论,经过与这一错误的斗争后,开始在工人中组织反日会义勇军,并且组织了同□的罢工,并且以民众的领导,以罢工工人的骨干,组织了一二·一七的惨案的追悼会于一月一七日举行,到了二万多人,并且由罢工工人抬棺游行,通过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中区及北区。

8. 在这一时期中,党提出了民众政权的口号,为群众热烈的拥护,因为国民党绑架上海学生抗日会的代表,在上海群众包围市政府与国民党军警武装冲突,组织民众法庭,审判国民党市党部破坏反帝运动的主要负责的反革命分子。

二、在一二八事变中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的向上海的反帝运动进攻,指示国民党积极的压迫反日运动,国民党是无条件的接受并且屠杀民众,但是民众的反帝运动却是愈加汹涌的发展,兵士是违反着国民党的卖国的志愿,自动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争,虽然这一时期党是作了相当的工作,但是党的工作无疑的是落后于民众的反帝运动。这时党所作的工作是:

1. 组织了沪西四方纺织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并且党提出了总同盟罢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去组织了四十余工厂的工人加入了工反,组织了神州的罢工。

2. 组织了工人的义勇军,动员工人去参加战争。

3. 民众反日会各处建立组织,组织义勇军援助 19 路军的运动市民大会。

4. 苏维埃的宣言及援助罢工扩大了影响。

但是我们在 19 路军的工作非常薄弱,同时没有广大的动员群

众去参加战争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夺取革命的士兵,只是在退兵的时候作了相当的工作与抵抗及民众大会,民众的义勇军及同志在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之下受到了牺牲。

5. 苏区举行了武装示威,发表了对日宣言。

三、上海战争后的政治形势是:红军的蓬勃发展,满洲义勇军自发的进行大规模的反日战争,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的揭露,各地的反帝运动工人斗争汹涌的发展,于是国民党一方面很快的出卖淞沪,集中力量去围剿红军,在满洲去破坏义勇军的运动,以残酷的白色恐怖来镇压各地的运动。在这种环境中,党在反帝运动的弱点和错误也就更加暴露,党在上述的运动虽然作了一些工作,但是我们检查的看出的弱点在哪里?

1. 对于群众联系的薄弱,我们的运动偏于上层,没有真正深入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因此不能给反帝运动以强有力的骨干,组织反日罢工。

2. 关门狭隘的路线代替真正下层统一战线的运动,因此,我们便不能去结果和争取广大的群众。

3. 一些基本的口号不能具体化,特别是武装民众参加民族革命战争的工作中,没有将义勇军的运动视为全国的运动。

4. 不能充分的削弱国民党与其它反动派别的武断宣传去争取反帝群众。

5. 抵货运动的放弃等。

因此,我们便不能来巩固我们的运动,扩大我们的组织,使日益发展的运动握着在我们的手里,虽然我们曾经指出了纠正过,并且作了一些工作,如

(1)组织了耶松拒修日舰的罢工是得到目的,然而这运动是没有扩大到其它工业中去。

(2)组织了各地反对上海协定与援助义勇军反李顿调查团的运动,而没有得到大的成功,上海及河北组织了北上决死团,而没

有能动员很广大的群众，在关门主义的错误之下没有能组织一个好的行动。

(3)特别是满洲的工作，满洲党对于反帝的工作，是显著了严重的错误，他们空喊苏维埃的满洲，要在五一召集哈埠苏维埃大会，认为广大的义勇军是胡子而置之不理，同时幻想国民党的军阀而采取投降路线，在左倾的空喊总同盟罢工，而完全脱离了群众，没有认识将夺取广大的义勇军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是最紧迫的任务，没有运动下层统一战线去争取广大群众，因此使广大的义勇军的运动的领导操诸反动的军阀地主国民党与反动的派别手里，进行欺骗破坏与投降的企图。而中央没有将这一运动视为全国动员也是错误的。

北方会议后，党指出这些错误，改组了满委，加紧在磐石、海龙、东满去建立工作，同时发动上海、河北动员了干部去加强领导，但是成绩是薄弱的，而且还不是公开的动员去进行的。

因此使国民党军阀地主破坏义军及投降是达到了部分的成功的。

四、热河事件后反帝运动与党的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在国民党的投降、出卖和退让之下，将热河及滦东完全占据，这一暴行把整个太平洋的问题与瓜分中国，更提到了极端危急的程度。

A. 将中国的民族危机提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

B. 帝国主义的矛盾极度的紧张化，美国的亚细亚的舰队来华。

C. 干涉苏联的危险是特别的增加著，中东路的问题的挑衅。

D. 更加揭破了国民党出卖的面目，在中国的统治阶级更进一步的崩溃。

E. 反帝运动的激烈的发展。

F. 红军的伟大的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以三师团一混成旅,以六日的完全占领了热河,这完全是国民党有计划的出卖的“安全退出”,国民党在“彻底抵抗”的口号下,要鸦片将军汤玉麟去抗日,亲身到北平去布置“抗日”的宋子文说过至多是“十日的工夫”,汪精卫亲口说:“……”《申报》的通讯说汤玉麟……

在日本占领了热河,国民党的政策是什么,这里要看他的主人说什么。

“以种鸦片的人而望他会抵抗是不会有的”(三月二十一日《申报》)。

在一个英文报上说:

《大美晚报》三月十五日载《字林西报》的社论云:

“闻蒋介石氏之主张,有首先必须安内而后再图攘外之意,吾人亦以为如若蒋氏企图盲然之反攻,必致损失其固有之名誉。”

“至于中国方面亦应知欲迅速恢复满洲,为事所不许,故应即以外交方式与日本直接交涉,以维持实际上的、名义上的和平状态,中国因内部政治情形困难之故,欲以军力坚决对日抵抗,恐所未能。”

法帝国主义云:“……直接交涉”

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承著帝国主义的意旨,一致的表示投降,不抵抗。

蒋介石——四月十日在南昌对到省各将领表示:

“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使[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

汪精卫——三月二十一日《申报》载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

“要有抵抗的能力,要充实抵抗能力,必须从政治上社会上想种种方法去先充实国民的生产能力,然后再想种种方法使国民的生产能力能应用于武力,中国为什么不能培养人民的生产能力应用于武力呢?全是有了许多恶人从中破坏,中央决不能存一个迁

就的心事来优容这些恶人，至少应该明正其罪与国人共弃之……方才能使人民的生产能力适用于武力。

言战则有亡国之虞，言和则有卖……”

陈公博——三月十七日《申报》载

“东省失土，人人意为难归故主，惟余相信可以收复，惟如何收复，余以为军事则甚难，必须以外交方式，方式维何，余即知亦不便明言，总之，余之想念，在两三个月间收复，必无此迅速，但至本年底必有收复失土之一日也”

吴铁城——在国民如何救中国的讲演中说，三月二十四日各报载：

“我们记得当德国被拿破仑战败以后，有一位爱国的哲学家斐希德 Fichte 对他们的国民演讲说：大家要知道，德国的失败，并非一二人之咎，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过失，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愚昧、昏聩、幼稚、懦弱种种病态所酿成的结果，武力的战争已经过去了，今后的战争，是智识的战争，道德的战争，品性的战争。中国的今天的局势，正同德国一样，而 Fichte 对德国民众的演讲，也等于对我们民众的演讲一样，须知国难之初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两个人之咎，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过失，是全国人民平时愚昧昏聩……的结果，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雪耻图强，本来不可期诸旦夕，必待长期与切实的努力始能见效，希望全国民众遵守这一条救国的铁律”

孙科——

关于国民党的投降，在他们的报纸上说得非常清楚（见四月十六《晨报》）至于其他在野的反动派别的意见是如何呢？

1. 冯玉祥
2. 李烈钧
3. 国家主义派及第三党
4. 陈友仁

国民党在不抵抗与欺骗之下,不仅将热河送与日本,而且将北京在“安全退出”让于帝国主义,观秦皇岛的事实就可以清楚。

“……”

但是他们一方去剿共,一方压迫屠杀反帝运动,尽他清道夫的作用。

同时进行外交的出卖是:

1. 承满;2. 长城为界;3. 长城、黄河间设无军备的安全地带。

但是这种交涉,伍朝枢说:“非直接交涉之不可以,实系直接交涉之不可能”。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统治的崩溃,汪精卫的谈话中可总结他的

“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战不和则两俱可虞,故置身南京政治中心,焦灼如陷火坑”。

反帝运动的形势,在热河事变后表现了新的高涨

一、前线的兵士与民众自动的与日本帝国主义英勇的战争——如丁喜春、孙殿英、宋哲元的队伍中,如热河民众自动的组织义勇军同盟军及各种自卫与抵抗的组织。

二、满洲义勇军的活动及兵士的哗变——如满洲报告。

三、工人反日斗争与罢工的发展,城市的劳苦群众的反帝运动——如上海标轮海员的拒运军火,福州日船华工罢工,汕头码头小工不卸日货,驳船工人引水工人不引工及不驳载乘客,上海码头工人抵货斗争,北宁工人的反帝斗争,上海及各地工人组织反帝组织,募捐运动。

四、兵士反对国民党不抵抗的斗争——如剿共前线的兵士、伤兵及国民党前线撤退的士兵,剿共前线的兵士要求抗日,撤退的兵士激烈的反国民党。

五、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的胜利及满洲及其它游击队的活动。

国民党一方面围剿红军,同时积极的压迫屠杀反日民众与士兵,他们

(1)解除义勇军及抗日兵士的武装——如汤玉麟退出承德时,对于前线及西苑所谓“逃兵”(四月三日《申报》)及唐山东北军(三月十九日《申报》)等

(2)发布禁止罢工的命令,在各城市屠反帝民众及 c. p.

(3)禁止热河民众组织抗日的团体

(4)诬蔑民众为“汉奸”来解散各地团体威吓民众等

六、反日反帝运动的新的高涨是日益发展着,但是运动含着极大的缺点是:

(1)自发的没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与骨干。

(2)许多的领导权还是在国民党及反动派别的手里,有些地方国民党及反动派别的欺骗和幻想还是存在着的。

(3)没有联系组织没有散漫的^①,不能坚决的反抗国民党的屠杀与摧击。

这一方面是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但主要的是 c. p. 在反帝群众工作的薄弱和领导的无能与落后的关系。

党在热河事件中的工作及现在反帝运动的状况

(1)党的宣言与红军的宣言——热河事件的前后党发表了宣言,揭破国民党的出卖,提出了党的主张,同时红军宣言提出,在政治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军队中得到了极大的拥护,剿共军队要求抗日,不愿打红军,使红军得到了极大的胜利,这不仅是在中央区,而且是鄂豫皖、湘鄂西、四川等地,更揭露了国民党不抵抗的面具。

(2)在热河及北平加强党的领导,派干部及领导者代表去领导工作,在战争进行了相当工作,但是领导机关抓不住,如北平报告:

A. 孙殿英、宋哲元部下有百余同志在英勇的领导兵士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宁路工人平绥路工人进行了反帝组织。

B. 在丁喜春旅中有同志三十余人领导着一千余反日会员英

^① 原文如此。——原编者注

勇抵抗,但是因为与领导机关没有了关系,全部的牺牲了。

C. 昌黎朱霁青义勇军中一二支队,我们领导着七〇〇余人,有兵士反日会的组织,省委准备与迁安农民斗争汇合起来。

D. 在蒙古建立同盟军的组织及蒙汉反日会。

“在这几次大的战争,大部分是我们的同志领导着”,但是这工作,指导机关是不能抓住及很好的指导,所以最近有同志直接去领导。

(3)在上海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一般革命的民众拥护党的口号,所以《申报》也不得不天天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问题”,冯玉祥也提出百分之八〇的军队去抗日,来欺骗民众。党在白区提出救国会议,这一工作在上海是收到一些成绩,约有一万人的组织,并且一部分的开始到工人中去,在最近欢迎苏联大使中表现了一些工作,但这个工作不过是开始(见上海报告及斗争)。

(4)满洲工作是有了相当的进步,尤其是接到国际来信之后:

- A. 义勇军的相当进步;
- B. 兵士工作及哗变;
- C. 游击队的活动扩大。

这些工作中包有许多严重的缺点与错误,为明了起见,将各地的状况加以细举:

满 洲

(一)关于义勇军的工作

A. 宁安,穆陵及绥芬河一带的义勇军——关庆禄部队下我们有九个支部及群众团体(反日会)

吴傻子——最近占领东宁与绥芬河的义勇军

最近占领东宁是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进行的

B. 以海龙为中心的自卫军——唐聚五

党建立了支部及反日会的组织,但工作的错误,只抓住了少数分子发动游击战争,现有武装三〇余

C. 富拉尔东北的义勇军

现在在二千余人中已开始了工作

D. 克山与嫩江的义勇军

建立了反日会共二〇余人

E. 甜草岗(松江北)的义勇军

建立了反日会,但没有下层群众的组织

F. 德惠县及东线,石头河子,齐齐哈尔附近等义勇军有个别的关系

——以上是最近省委的报告,东海及辽西不在内

1. 黄绍元同志进到×救国军中去领导军队坚决的进攻,反日战争部分的实现了革命政纲,组织了几个兵士支部,相当的发展了党的组织。

2. 在自卫军方面,党已在几个部队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由兵委直接领导之下有四个支部。

——见绥宁报告

1. 在延吉有一部分军队,内一三〇人,与三道威子一二〇个土匪联合起来,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革命兵士委员会。

2. 在琿春的救国军第五旅,党有影响,作了不少的下层工作,把一些军队分成两连游击队,曾与日本军队作过一六次战争,占领过琿春三小时,但大部的同志仍是集中在司令与王玉振周旋,帮王玉振的忙。

——以上见省委巡视员孙十二月九日的报告

1. 由北平派来的人打入张甲洲的队伍里,现在我们领导下的队伍是第一第二队、少年队、教导队、洋炮队,合计在二三〇余人。

在群众工作上建立了士兵会、反日会、苏维埃之友社。

——见巴彦十一月报告

(二)军队中的工作

1. 反日士兵工作,琿春王玉振部有党团员七四人(中有中国

人六四人),大部分的兵士在党的影响之下。

2. 三道湾主要的土匪部队在党的影响之下。

3. 安国周部工作无发展,三道湾及琿春烟土碣子建立了兵民委员会。

——见东海十一月报告

1. 哈埠满洲国军队中,建立了九个党的支部,共党员七九人(其中五个支部是:二个开到双城,二个开到阿什河,一个开到横道河子),组织了三个反日会,四二人(党员不算),建立了四个兵士兄弟团,计八〇人;在警察中建立了两个反日会,三二人,在海军建立了一个团的支部。

2. 在呼海线剿匪军统制下的大排中建立了一个支部,七人,在宾县大排中建立了反日会,德惠大排中有反日会。

3. 在常沙河的满军中建立了支部六人,团结了较多的群众。

4. 此外有个别的士兵的关系——如哈埠护路军、路警等,安达护路军及宾县保安队等都有关系。

5. 南满伊通有五个人兵士支部。

1. 兵士斗争在双城的满军中——领导了反对恶劣待遇的斗争,现在正在准备进行反对调遣及缴械的斗争。

2. 在吴庆禄投降的队伍中,有过三次大的斗争,两次是党领导的。三次斗争主要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的官长的压迫与出卖,动因是反对恶劣待遇要求关饷与改良火食,反对替日本帝国主义者造铁路,现在正将斗争提高到更高的方式——夺取武装,发动反日战争。

3. 在常河的满洲国军队中,珠河县委建立了党的支部六人,发动了斗争,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革命哗变,在哗变中杀死了反动团长及其家属,杀死了反动的连长及连副,参加者四〇〇余人,共有武装六〇〇之谱,武装完备,现正开始游击,据说队伍有二、〇〇〇余人。

4. 阿城兵支部领导之下,哗变四〇余人,枪支四〇余支,机关枪二架,但因为哗变后与大队日军作战,死伤二〇余人,机关枪失掉,现余武装二〇余支,省委已派人去领队与珠河队伍汇合。

——以上见三月份省委报告

(三)游击队的工作

1. 磐石游击队的工作

2. 巴彦的工农义勇军——现在发展到五〇〇余人,农民成分百分之七〇,统通是新式武装,都有大马,开始在群众中做了分粮的工作,经过分粮之后,群众对这队伍表现得较好,胡子的行动尚未百分之百的肃清,省委可在哈在呼海路征调大批的工人参加进去。

——十一月省委报告

3. 东满在延吉有枪四四,汪清四〇,和龙四七,珲春约一〇〇支以内,各县多是分为数小队,他们帮助并发动农民斗争。

没有健全的领导,夺取武装的工作,延吉最好,珲春方面没有成绩。

4. 东满的赤卫队——延吉一、八〇〇,和龙七〇〇,汪清不详。

——见东满报告

5. 珠河,阿城较大的游击队,见上。

6. 汤原已发动起来约五十余人。

河北及内蒙

河北及内蒙,我们还没有得详细报告,据零星所知道的是:

1. 在热河事件前,蒙古党组织了有五〇〇余骑兵的义勇军,但是领导上非常的错误,中央曾经由上海派干部去,因为路线的不通,没有派进去,现在的情形不详。

2. 最近蒙古报告说有同盟军的组织。

3. 战争时曾在丁喜春部队的地方组织了一、〇〇〇余义勇军

作战,都牺牲了。

4. 昌黎附近的朱霁青一二支队的义勇军,领导成分都是我们的。

1. 丁喜春旅有我们的三〇同志领导一、〇〇〇余反日会会员,与日军作战都大部分牺牲了。

2. 孙殿英、宋哲元部下有一〇〇多同志在领导兵士反抗日军。

唐山矿工义勇军——十余人

邮务东北自救全——可以转变成为反对派的组织

北宁路的斗争

救国会及反日会不详

天津——“反日会虽然成立了三个,但实际工作上还没有开始”,“虽然市委会经常在反帝党团会议讨论反日斗争工作,但是见说不见做,犯了清谈严重错误,反日会没有作起来,没有一部分组织力量非常微小(扶轮与南女中抗日会),扶轮虽捐送到前方去,但没有采取公开的方式”。

蓟县——“反日会的会员约六〇余,反日会的路线与党差不多,有第二党的倾向”。

上 海

救国会议——四月江苏的报告是:

1. 除了总的筹备会以外,成立了三个分会,人数约一万余人。

2. 工人极热烈的拥护,沪东区分会上有工人女工演说反帝及自身的痛苦。

3. 工人及其它反帝代表,在分会中选举了分会的执委,大部分是工人,并且决定了一些具体工作。

4. 工人的成分的加强,工厂里有工厂分会的建立。

5. 已有相当的群众的基础。

6. 群众要求具体的行动,群众表示着很大的积极性。

7. 反动派别积极的活动和破坏。

又：团的报告：

1. 法南有四、〇〇〇余人，以学生为多。

2. 沪西有一、〇〇〇余人，

3. 闸北有一、〇〇〇余人（黄包车夫义勇军及文化组织），另有一、〇〇〇余人的反日会，不完全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团建立了二〇〇余人的童子团。

4. 杨树浦纱厂成立了御侮会。

各工厂的活动

A. 上海五厂的工人，我们领导了反对站台子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当时就开始了群众组织工作，有三个半间的工人加入了工人反日联合会，共七〇〇余群众。

B. 日本各厂和申新等厂组织了一、二〇〇的反帝群众，组织义勇军、反日姊妹团、工人反日联合会。

C. 码头工人有二五〇个不买日货十人团。

D. 各驳船上共约一、〇〇〇人加入不买日货十人团，在七个外洋船上建立了约三〇〇人的不买日货十人团。

E. 在这些地方已着手准备救国会的代表，已选出了四九三个代表。

群众的行动与抵货

1. 码头上群众组织了六个演讲队（七〇余人）演讲与抵货，演讲队与警察冲突，解送捕房，他们仍坚认反日的，结果释放。

2. 抵货队到日轮码头去检查日货与奸商互殴，群众将日货推倒江中，结果奸商及抵货队员被捕，商人罚三〇〇元，检查员判三〇天——缺点：（1）仅在一部分工人中进行了慰问工作，没有鼓动广大群众的反抗运动。

其它各地

反日会的组织大都是有的,但是:

1. 很狭小的团体;
2. 工人成分是很少的,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
3. 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具体工作。

由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到,自十二次会议后:

1. 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红军的宣言及民族革命战争口号的拥护。

2. 党在义勇军及参加战争的工作有以下转变:

A. 在珠河、东满,建立比较大的游击队,改造了磐石的工作

B. 在义勇军的工作中有了某些成绩(如满洲及蒙平等)

C. 开始打入前线作战的兵士工作,并且领导战争,在满洲国军队中组织了一些哗变

3. 在上海建立了反帝组织。

4. 在反帝组织中,工人的成分加强,运动开始到工厂中去。

但是(见下总纲,但须逐条加以详细说明,在说明中可将义勇军的批评加进去)

虽然在十二次会议后,特别是热河事件反帝运动怒潮的澎湃中,党的反帝运动是有了一些进步,但这不能过分来估量,检查工作中,中国党对于十二次全会所提出的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是没有得到彻底的实行。

1. 虽然党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口号,但不能抓住每个时期的环境、具体事件来用具体的口号来动员群众参加战争,组织具体的行动,没有深入群众中。

2. 没有充分利用公开的活动,运用下层统一战线,来动员广大群众,我们现在是还没有打破狭隘的关门主义。

3. 没有在用很大的力量到工厂中去,兵士中义勇军中去建立下层的组织,在这一时对于工人的反日罢工是没有成绩,无产阶级

的骨干不^①

4. 与反动派别的斗争没有积极注意。

5. 各地工作还没普遍的建立,建立工作的地方不能进行日常的(如抵货)系统的工作。

6. 没有深入支部,党团工作没有建立。

7. 两条战线的斗争不深入。

8. 关于满洲及华北的工作是:

第一,在满洲、华北广大的义勇军的队伍里,我们的工作毕竟非常的薄弱,我们所组织的大部是狭小的零星的组织,这主要的是由于党没有把组织义勇军夺取义勇军的领导视为全党的战斗的任务,动员整个的党来进行这工作,由于狭隘的关门主义,不能在党的基本口号之下,抓住每一个事变,具体的考查每一个部队的环境,运用下层统一战线来团结群众。

第二,在我们已经打入的部队中,我们不能彻底的消灭反动的领导,夺取与巩固和扩大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同志常常是“作国民党的俘虏”,投降上层的活动,帮反动长官忙,不敢去揭露反动长官欺骗群众的罪恶,在艰苦的与反动派斗争去夺取群众,或者是采取分裂主义,没有去下层群众中进行坚苦的工作,建立下层群众中我们巩固的组织,从党的政治上去夺取群众。结果是常常是跟着国民党长官而瓦解或者溃散。

满洲的同志说:

“党团曾经派了许多同志到义勇军去工作,汤原、饶河、海龙、宁安、东满各地都有大批的同志在那里工作,但因为和省委的关系不好,没有直接的领导,所以最初是作了国民党的俘虏,以后便跟着国民党而溃散了,如海龙第九路军有我们很大的力量,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时,没有采取群众工作和进攻路线,结果部分溃散了。”

^① 原文如此。——原编者注

第三,在我们独立和组织的义勇军游击队是停留在极端狭小的范围中,组织是极其不巩固的,原因是:(1)脱离着群众的斗争,并且常常是惧怕群众,采取军事投机(如磐石),(2)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富农路线,和“左”的严重的关门主义,阻碍着工作的发展,(3)领导机关许多是地主富农的成分,甚至拒绝党的领导,这些现象造成如满洲的同志所说的过去工作中许多错误与失败,如:

“黑龙江我们的队伍,直接领导的有四五百人及武装,但领导是地主分子,完全采取富农路线,在占领呼海车站后将商会会长放了,会长立刻勾引日兵进攻,受了很大的打击,派去一同志又用了分裂政策,结果带出一百余人,被地主消灭,只剩二人,其余的一概不知下落。”

“在十月间我们的军队由独立领导而投降了胡匪的领导下了,说是胡匪头子常站很听我们的话。”

“在投降胡子的过程中,领导权完全操诸常站之手,分散我们的队伍,并且要去投降日本。”

“十月二十三号解决胡子的心腹武装,将队伍拉出来到桦甸。”(十一月磐石报告)

第四,我们在参加战争中,可以看出:(1)我们在反动军队工作的薄弱和领导的错误;(2)我们不能扩大我们的政治主张,揭破国民党反动领袖的妥协投降,结果常常被反动的官长利用作为他的政治资本;(3)我们在战争中不能打破国民党的出卖和破坏,常常是被国民党以左的口号之下,实现其消灭我们力量的阴谋;(4)我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只是硬干,不知采取游击的战术,如阿城及丁喜春旅的事件。

从这些教训中证明共产党要领导和完成他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就必须改正他的错误,坚决执行十二次全会及对于满洲工作的国际的决议,这首先是要抓住:A. 扩大和加强反帝的游击战争;B. 广大的组织群众的斗争——尤其是工人反日罢工及斗争,

建立群众的组织；C. 真正的进行抵货运动。要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

1. 坚决的广泛的运用下层战线，争取公开路线的活动。
2. 有系统的揭露国民党及反动派别的欺骗。
3. 动员每个支部中去——尤其是工厂支部，将运动深入到群众中。
4. 抓住中心工作，应该将满洲、华北的工作视为整个党的工作，动员全国党来进行。

5. 动员和训练大批的干部到义勇军满洲华北去。

农民运动与兵士工作

1. 农民的生活
2. 农民斗争的形势——见农斗决议及工农通讯社报告
3. 反动派国民党的欺骗与压迫
4. 党的工作

- | | | |
|----|---|---------------------------------|
| 成绩 | { | A. ——见农斗决议。 |
| | | B. ——如高阳、蠡县、日照、博兴。 |
| 缺点 | { | A. 日常斗争领导的不足，因此就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到反日斗争。 |
| | | B. 组织的薄弱，关门主义。 |
| | | C. 无产阶级的领导不够，雇农工会没有大的进步。 |
| | | D. 游击战争的脱离群众。 |
| | | E. 领导上的错误——富农路线，盲动及军事投机。 |

(材料二)

A. 反帝运动：

(1)对于国际指示的执行(如红军的宣言，救国会议，援助东北难民的运动，满洲的指示)及各地反帝运动的状况(上海河北满洲及各地的群众工作，义勇军游击队及兵士的工作，反帝的组织抵货等)。

(2)党在反帝运动的领导与错误。

虽然最近有相当的成绩和转变如：

- a. 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红军宣言得了极大的拥护等。
 - b. 在义勇军游击队及兵士工作中有了某些成绩(如满洲在义勇军、磐石游击队及满洲国军队的哗变,河北及内蒙进行了一些工作等)。
 - c. 上海救国会议的建立组织。
 - d. 在反帝组织中工人成分的增加,运动开始到工厂中去等。
- 但是极大的严重的弱点是存在着,主要的是：

1. 没有彻底的实行下层统一战线,争取公开的路线,去团结和争取广大的群众,狭隘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取得广大的群众。

2. 没有使运动深入群众,尤其是工厂的群众中,使反帝运动与群众斗争联系,因此党不能给反帝运动以必要的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能在下层群众中建立巩固的群众组织。

3. 满洲及华北游击队义勇军中工作的薄弱,对于满洲及华北的工作,还没有动员全国的党来进行。中央对于满洲工作的注意是极不够的。

4. 抵货工作的消极。

5. 对于各种派别的斗争及争取他们所欺骗下的群众,没有很大成绩,没有能够瓦解削弱他们的活动。

6. 没有深入支部,两条战线的斗争不深入。

(3)总结

中国党在反帝工作进行了和领导了英勇的斗争(如十二次全会所指出的),但它还没有能完全实现它必须的任务(在目前运动条件下必须争取的任务)。

B. 职工运动：

在整个的说,中国党的职工运动,从四中全会后是有了转

变,比立三路线时是不同的进步的,但这仍是党的最弱的一环。这一工作,分下面几方面来说:

1. 四中全会后经过了阶段及目前的现状;(1. 四中全会后到全总工联的大破坏(一九三一),2. 九一八到沪西大罢工,3. 全总的改组及英美的斗争(一九三二),4. 全总的大破坏到现在)。

2. 一九三二年到现在,党所领导的几个大的斗争,在斗争中的收获及领导和参加工人的斗争的落后与错误。

3. 失业运动——党在这方面是没有成绩。

4. 黄色工会的活动与党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虽然黄色工会的反动政治面目,是日加揭露,工人反黄色工会的斗争的发展,但黄色工会是很积极活动,对于压迫消灭斗争有很大的作用,这主要党与赤色工会在黄色工会中争取群众的工作很薄弱,虽然在报馆、邮务、北宁路中开始了工作,但这工作只是开始的进行。

5. 建立赤色工会的工作

(1)目前的状况——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是极不能令人满意,虽然在各地工人是建立了许多各种组织(如反帝的组织、兄弟团、姊妹团、互助会、俱乐部、红军之友社、苏联之友社及其他斗争的组织等),但大部是很散漫的,没有能够形成真正赤色工会的组织,目前真正组织在赤色工会的会员,在白区是不到一万人的数目。

但这里得不出党的工会工作连立三路线时也不如,相反的,要看到立三路线的空报告及四中全会后的基础(上海只是二五〇人等等),同时应指出工会组织上的进步是:(一)上海由二五〇人发展到三、〇〇〇人。(二)纱厂工会的成立。(三)在一些大的企业中建立了相当的基础,如报馆、烟厂及纱厂等。

(2)但这决不能拿这些来掩盖工会组织的弱点,不到一万人的赤色工会会员的现象是职工运动极其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们不能组织广大群众到赤色工会,为什么我们的工会不巩固,这主要的是领导斗争的落后,及下层统一战线没有适合的运用,严重的关门

主义、宗派主义、上层的包办、命令阻碍着。

6. 党的领导

在此地总结党在职工运动中的进步和错误,指出这是党的工作最弱的环子。主要的指出:

进步的方面是:

a. 从一九三二年到现在,我们领导和参加的斗争是增着——如上海十二次大罢工,河南兵工厂两次的大罢工,河北唐山矿年关斗争及五月的斗争,井陘矿的罢工等(见另表)。

b. 党在上海的工作,从大部分手工业店员转入到主要的企业里。

c. 外省逐渐的注意职工运动(如四川等地)。

d. 最近胜利的斗争的成立。

e. 恢复了六大会后及立三路线时所失掉的阵地(如内外棉等)。

f. 转变了领导方式,消灭了立三路线时拦口子的方式,开始有准备的组织斗争,部分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提出要求的进步,改变立三路线的方式。

主要的缺点是:

1. 领导日常斗争与组织罢工参加罢工的无能。

2. 没有彻底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及争取群众。

3. 失业工作没有成绩与忽视。

4. 没有能组织广大的失业工人到赤色工会里。

5. 反黄色工会的工作没成绩。

6. 在许多大城市大产业没有基础(如武汉等)。

7. 党团工作的薄弱。

又:

1. 我们的领导斗争,没有准备

2. 斗争中没有收获——没有集中力量在工厂中

3. 用错了统一战线
4. 独立的领导和组织,忽视了各种组织
5. 帮助
6. 工会的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帮助少

总之,这一工作是党最弱的环子,这种现象是不能继续。中国党应该知道夺取工人群众大多数是一切工作的环子,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去彻底实现国际的指示。

C. 农民运动:

农民运动,党在各地是进行了相当的工作(如河北、安徽、四川、陕西、福建农民委员会的组织及雇农工会的组织的建立)并且领导了一些斗争(如四川、陕西、河北、安徽,最近的斗争,与农民斗争决议中所指出的),但斗争中许多遭了失败或没有广大的发展起来,这些主要的缺点,农民决议已经指出,现在不详述。但是领导上的富农路线及脱离群众,离开群众斗争的盲动主义与军事投机,是必须严重的指出。

D. 兵士工作:

1. 虽然兵士斗争与哗变到处爆发,我们的工作,却是极其微弱。

2. 士兵运动较有工作者是:四川、河北、满洲等地,特别环绕在苏区地方的工作更弱。

3. 虽然在最近在满洲、四川、华北的军队领导了一些斗争,并且在热河事件,领导了部分兵士与日军作战,在四川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没有得到大的成功,许多兵士斗争哗变及伤兵的斗争,是得不到我们的领导。

4. 这主要的是:在兵士:

1. 没有将兵士工作用全党的力量去工作,只认为军委同志的事,中央对于这一工作,也是不够。

2. 在进行兵士工作中,表现了一些军官路线及脱离群众与冒

险主义的错误。

3. 兵士斗争不能与工农斗争有适当的配合。
4. 支部的领导和关系不健全。忽视秘密工作。
 1. 在满洲日军工作
 2. 苏炳文部有些成功
 3. 主要的缺点
 - A. 不以为是经常工作
 - B. 秘密的不够
 - C. 技术上错误

第三部分

三、两个中国——国民党的统治与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目前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A. 国民党统治的瓦解与疯狂的进攻苏区

1. 国民党统治的瓦解,表现在政治上的破产(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东三省、热河、华北等等),财政上的破产,内部的分裂,军阀战争(如过去山东及四川的军阀战争,最近四川、贵州的新的战争,广东与南京政府日加冲突,冯玉祥的就职等等)的爆发,兵士的动摇等,这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这种瓦解,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国民党新的投降——出卖华北革命运动,苏维埃的发展是要更加迅速与扩大的。

但这决不能得出国民党可以自动崩溃的结论,相反的,我们应该看到:(一)由于国民党统治的瓦解,所以他是更加用一切的恐怖和武断宣传,来企图进攻革命,消灭革命,以维持他的统治。(二)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镇压革命的助力是更加增加的。(三)虽然国民党的统治日加瓦解,但是他现在还不是到了已经没有压迫革命能力,相反的压迫和进攻革命的力量是很大的存在着的。(四)因此他对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起了极大的清道夫与开路的作用,他集

中了很强大的力量去进攻苏区，所以中国民众与中国共产党要顺利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先决条件，等待国民党自动的崩溃是不会有，只有中国共产党努力的领导苏区与白区的民众，以残酷的革命斗争来推翻他。

2. 正因为苏维埃伟大的胜利与发展，国民党的统治日加瓦解，所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疯狂的进攻苏区，虽然国民党内部的冲突日加尖锐，但是镇压革命进攻苏区红军的目的是上是一样的。

出卖华北之后，达种进攻是要更加凶狂，中国党应该看清这种事实，但决不能得出悲观的结论，相反的革命存在与发展，苏维埃的新的胜利，国民党新的围剿的没有成效，各苏区的积极化，国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指出了只要中国党能够正确的执行国际的指示，正确的运用策略的实行和努力，胜利是在我们的。

3. 国民党另一方面进行着武断的宣传，欺骗民众的把戏（如开放政权等）及各反动派的活动，党必须要坚决将欺骗的揭露，加紧与各种反动派别斗争，才能使中国革命顺利的完成。

4. 在上面第一第二部分中都是联系着国民党的统治来说，同时这些事实此地同志都知道，所以不多叙述。

B. 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在很大的地域上胜利了

1. 这一部分开始报告苏区的现状及扩大与发展的情形，报告苏维埃统治的区域，苏维埃一九三一年到现在得到胜利，苏维埃的民众生活，发展和联系的情形（另有各种材料）最后应主要的指出：

苏区已经不是过去的游击区域，而是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广大的领土上统治着，中央政府一年余的存在，证实了工农政权的巩固，他是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2. 在苏区取得了击败国民党伟大的胜利，使千百万的民众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得到了土地和自由，指出了中国民众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的出路。

3. 苏维埃区域的领土的扩大与发展，增加了各苏区联合有力

的条件,中央区最近已与赣东北取得联系与统一,走向着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道路。

4. 无产阶级的领导日加巩固(百分之三十七,及共产党的领导的巩固)。

5. 苏维埃运动深入了北方,四川在那里建立了苏区。

6. 苏区及白区民众的热烈的拥护,证实了苏维埃政权是真正工农自己的。

C. 苏维埃的运动与党在各苏区的领导

I. 红军与革命战争

(一)冲破三次围剿后红军的胜利与苏维埃的发展(材料见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二)国民党出卖淞沪进行四次的围剿

(三)四次围剿中的经过和估计:

估计:在整个的形势上,红军是冲破了四次围剿,国民党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由于我们的错误,鄂豫皖、湘鄂西是受到了部分的损失。

(四)目前战争的状况及红军胜利(红军的胜利使国民党没有得到成功,决定的击碎敌人的大战还是要加紧的努力)

a. 中央区的胜利

b. 赣东北与中区的联系

c. 鄂豫皖的新的发展与湘鄂西的活动

d. 四川新苏区的建立

e. 我们战争的布置与大战准备

(五)战争中我们的成功与缺点:

a. 击溃国民党军队,保卫和发展苏区,加强红军的任务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成功。

b. 最严重的缺点是:

(1)发展苏区群众的积极性,动员苏区的全体民众参加战争,

和加紧附近苏区的白区的群众工作的配合,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等。

(2)因此,在扩大红军和武装民众来保卫和发展苏维埃区域,还不能适用客观的形势。

(3)逃跑和不动的右的倾向,和左的不顾一切损失“轻敌”、“攻坚”以及对战争估计不足仍是存在着没有彻底肃清。

II、工农红军和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与以前不同,成功真正的民众武装力量

1. 各区红军的状况——数量、枪支、待遇、成分
数量与质量的扩大 成分的加强 政治教育
战争能力

2. 扩大红军的工作

A. 扩大红军的成绩数量

B. 扩大红军工作中的错误与障碍——不从政治上的动员,等等

3. 红军中的政治教育与训练——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红军学校等,报纸

4. 政治委员的制度与党的领导

5. 地方武装

6. 上海的提议——新三个模范师创立

1. 总的方面

2. 我们的任务有些不能浪费,大城市不能争取,在露天

3. 其他省份的发展,才能取得更大胜利

4. 政治上领导,中央区很强,合作更接近,湖南湖北缺乏干部,现在可以对付,四川领导弱

5. 巩固苏区,四军没有尽力防苏区,绝对的移动是需要的

1. 领土及人口

分为二种：

A. 巩固,十二万方基罗米突,	}	一七万
七〇〇万人口		
B. 游击,五万方基罗米突,	}	一〇〇〇万人口
三〇〇——五〇〇万人口		

C. 有些区不算

2. 边境

3. 军队枪械

前线作战的队伍	中五 20,000+2,000	}	41,000
	12军(东北)1,000		
	11军(东北)3,000+		
	赣东北(信国)师 5,500		
	23(粤赣)2,000		
	19(福)3,500		
	范(1)4,000		

16. 5,000

8. 5,000

贺 4,000

10军 6,000

4军 15,000 (2万)

鄂豫皖 15,000 (2万)

总 90,000 万战斗单位。大估
计 100,000 1932 增加 1 万至 2 万支

4. 反国民党战争

红军组织——中区及鄂豫皖改正散漫以前的情形

技术上的弱点——很多队伍飞机钢车主要问题在炮上,因为白区城市的工事很严重的

国民党力量——超至六至八倍,作战上三——一之比,政治上的英勇打败了他活动的队伍

四次围剿——敌人得到部分成功(扬子江流域敌人得到了没

有得到成功第二阶段(五次)两方布置阵势)

前途不会失掉地域并且有可能得到反攻

[鄂]豫皖已经进攻,打下七里坪,威吓黄安,恢复失地

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改造:

自四中全会后,在中央政权及各苏的地方城、乡、区都普遍的系统建立起来,中央政府正式的成立,各区从上到下的创立整个系统,改变了过去许多地方只有上级苏维埃,乡、区没有建立的现象,各区的组织系统都是根据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为省、县、乡、区四级。从第一次代表会,各省各区都举行过选举及改选苏维埃的运动,江西举行过代表大会,湘赣于一九三二[年]八一举行了第二次代表会议,赣东北一九三一[年]举行了代表大会,一九三二年四月间举行了第二次扩大的执行委员会,福建及各区最近的改造,都进行了代表大会及改造下级苏维埃的工作。

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经过群众选举,改变了以前指定代表及包办

选举的运动中肃清了阶级异己的分子,增加了新的工农的领袖和无产阶级的成分,现在一般的说,苏维埃的工人成分占百分之三十(如江西百分之三十七,湘赣三分之一等)

改造之后各区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江西——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苏维埃与民众的联系进步

赣东北——从代表会后(一九三一年七月到十月革命)

1. 进行了苏大会的选举运动,提高了群众对于政权的认识
2. 洗刷了异己分子及官僚主义腐化的现象
3. 开始建立了政府的各种委员会的组织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二年四月(省苏第二次执委会前后)

1. 彻底平分了土地,使土地革命的利益落在雇农贫农及中农的手里,发动了反富农的斗争

2. 实际执行了经济政策,流动了苏区经济,使群众生活改善

3. 解决了难民问题,给了群众很好的影响

一九三二年五月到十月间

1. 发动了群众反官僚化和自我批评,发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2. 发动了和领导了群众斗争,进行了加强地方武装及慰劳红军的运动

3. 提高群众增加生产

4. 改进了合作社,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了食盐及冬衣十一月的报告:

1. 现有的苏区,沿信江以北是:弋阳、横峰、德兴、贵溪、上饶、万年、乐平、余江八县及玉山、余干一小部分,信江以南(即闽北)是崇安、建阳、浦城及江西之广丰、铅山五县。在皖南婺源,浙西是开化、江山等处一小部分。这些苏维埃区域在北岸长约三六〇里,横约二〇〇里,完全打成一片的,中间没有一点白点子。

2. 人口四二六,八〇〇余名,成分贫农占大多数,约三〇余万,中农约三万余,工人二万余,雇农四千多(?),富农约一万三千余。

3. 红军的胜利:(1)取得了余干城,(2)十军打下了周坊,打通了闽北,打下了赤石,是村浦城,消灭了刘和鼎三团,获枪五〇〇余支,无线电两架,(3)在丰盘击溃了敌人王文锦第五师共六团的兵力。

4. 群众的情绪:(1)群众说:“现在是国际路线,不比立三路线时候的乱干了啊。”(2)“在赣东北目前的局面,正是要与敌人激烈的斗争,我们的生活是斗争的生活,我们的快乐是斗争,我们的胜利是斗争,我们的一切困难都在从斗争中求得解决,我们相信只有

斗争是唯一的出路。”这是赣东北一般群众一致的壮烈的呼声。

湘赣省苏

1. 揭破了 AB 团攫取苏维埃的阴谋,洗刷了许多反革命分子
2. 提拔了新的工农干部到苏维埃工作,改善官僚主义工作,打破了群众对于政权消沉的状态,相当的发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3. 按土地法使土地得到了正确的解决(其余各种成绩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报告)

至于政府本身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如

中央政府——各部及各种委员会的建立,改变了与红军的关系(不问红军的事只给红军办差),统一财政,改变工作的方式,建立了活的领导等。

一般的政府工作——从过去打纸条子,签通行证,给红军办差的,与群众关系的不适当,现在都是有了极大的转变和进步。

党领导政府的工作也日渐加强,改变以前将不好的或无能力的干部送到政府里的现象。但是许多严重的缺点是存在着,主要的是:

1. 对于民众联系的不够,——如有许多地方很少召集选举大会报告工作,在运动不能动员全体选民群众等
2. 命令主义包办是很严重,不能充分的提高民众的积极性——如命令分配土地,苏维埃负责人到处去大喊工人停止工作实行八小时,以及肃反中的不发动群众,靠苏维埃的命令去实行土地劳动法
3. 乡区的下级的工作薄弱
4. 吸引工人雇农到政府工作的不够
5. 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纸上领导,各自为政,各部工作不健全是没肃清
6. 党对于政府的领导不够,党团工作——特别是下级苏维埃的党团工作薄弱,以及存在着命令主义及包办(以上各种缺点的具

体材料见各区苏维埃工作报告)

这些缺点,在过去湘鄂西、鄂豫皖是特别严重,在各区党及苏维埃的会议已经指出他们的弱点,作斗争。

总之,四中全会后,各苏区的苏维埃有极大的进步,认为现在苏区的苏维埃还是纸上的,是极大的错误,但是必须指出苏维埃与民众的联系是极其不足,因此党在这一方面的必须用一切的努力:

1. 使苏维埃与苏区民众联系在一起,使全苏区的民众认为政权是他自己的——为达到这目的就必须与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积极的去实行各种苏维埃的法令,改善民众的生活,领导他们的斗争,经常的进行选民会,发展自我批评,提高民众的积极性。

2. 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积极的吸引工农干部,与不识字不能作苏维埃工作等倾向作斗争。

3. 加强下级苏维埃的领导,肃清事务主义,一切工作向着民众,一切工作向着领导民众进行革命战争。

4. 动员群众改造,进行苏维埃部分的改造(不能领导民众的),恢复和建立被敌人摧残的苏维埃的组织,改善苏维埃政府工作缺点,要在一切问题上(如财政的公开,政府人员的廉洁等),与贪污的国民党政府对立。

5. 要达到以上的目的,党必须加紧政府的领导,建立强有力的党团,给一切忽视政权工作的倾向严重的打击。

经济政策与财政工作

A. 过去的错误

第一,过去苏区的经济政策及财政工作是没有很好的建立,而主要的是靠打土豪及红军筹款,如:

中央区过去的报告上说——“过去唯一的法子是打土豪,没有实行土地税商业税,因为经济政策是打土豪,所以有钱的便是富农,于是侵及中农,红军军费只靠红军筹款,并要帮助地方政府,因之,使红军变为以筹款为目的,因为没有明确的经济政策,所以财

政也就不能统一，也就没有预算与决算，浪费腐化等现象就发生起来。”

湘赣报告：“过去我们不把税收作为财政主要收入，专以筹款来供给一切用费，苏维埃政府不负供给红军战费，使红军不能最大限度的担负起战争的任务。”

其他各区（湘鄂赣等）过去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第二，累进税及营业税没有积极的执行，如：

中区：“没有实行土地税及营业税，除征收富农的土地税，其它均未执行。”湘赣：从接到中央政府的指示才开始。

湘鄂赣：也是没有很好实行

第三，最主要的是没有积极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流通，没有积极的动员农[民]来为消灭荒田作斗争。对于手工业的生产发展没有积极的帮助，相反的惧怕经济发展（提高小本经营的税率），生产合作社没有普遍的发展，有些地方实行过早的办法（如一切大的工业由苏维埃来办等等），由于经济不发展，使现金流出，产品缺乏。

在另一方面，由土地的分配后，苏区的生产增加，人民买米少，有米出卖者多，手工业的相当发展，苏区的经济的流通成为很重要的，但过去各区流通苏区的经济，发展商业及对外贸易，虽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但是想各种方法来解决这困难是很少的，所以中区：——土产如纸、木、烟等生产品销不出去，农民只靠谷子，别无路可以赚钱，结果使收获米时米价大跌，青黄不接时米价高涨等等。

B. 一九三二年中是有极大的转变

1. 工业是有相当的发展

中区——江西发展生产合作社二四三个，对于纸、茶、竹、烟等产业进行了发展生产的运动，各处进行了突击队的工作，特别是为了战争进行了保障供给红军的生产（最近）

湘赣——成立了生产合作社六〇余个,开办了樟脑,纸厂,煤及石膏等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赣东北——合作社普遍的建立,每月营业也在十万元,有六万会员,纸厂三厂每天可出纸五〇〇刀,可供全苏区用途,每月得利三〇〇元,设立了煤厂二个,锅炉厂五个,纺织厂一个,收容了许多失业工人(一九三二年十月)

2. 农业方面,各处都进行了春耕及秋耕的运动

苏维埃用一切方法帮助农民的种子肥料和耕牛耕具

组织耕牛站,没收地主家属及富农多余的耕具给雇农贫农苏维埃,经过粮食合作社国家银行把种子借给贫农雇农,各苏区在春耕与秋收的时节,动员了民众组织生产队栽秧队割谷队去帮助农民

在许多苏区组织模范队或冲锋队举行比赛

进行开垦荒地,可以免税三年,并且苏维埃给以奖品

3. 财政与税收,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如

中央政府财政部报告是:

1. 财政工作路线的转变——转变了过去依靠红军筹款的路线,而做到政府负责供给红军作战经费。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份以后,前后方红军的给养已经是中央政府负责支付

2. 税收:土地税已征收,营业税在大的城市已开始

3. 进行了统一财政的工作,银行纸币在群众中有信仰

中区:——一九三二年中区的收入

江西:全区人民净收干谷 8,799,264.60 担

(土地税)土地税以百分之六

起累收 527,955.88 担

以每担二元计共 1,055,911.77 元

又茶山 50,000.00 元

闽西:净收干谷 1,266,000 担

(土地税)以百分之五起累	63,000 担
每担以二点五计	158,250 元
又竹山	20,000 元

江西:以九个城计,每县收房租二〇〇元,共计一八、〇〇〇元;每县收营业税三〇〇元,共计二、七〇〇元,七个圩每圩营业税及房租收二四〇元,共计一、六八〇元

依上计算,两省共收一、二九〇、三四一·七七

一九三二年中央政府实际收入数目:

土地税全部	1,284,000 元	} 共计 1,404,000 元 (每月 220,000 元)
营业税半年	60,000 元	
闽西纸款	20,000 元	
江西煤矿	30,000 元	

每月收入:

税收	220,000 元	} 共收 250,000 元
银币每月出	30,000 元	
赣东北:		

1. 设立了对外贸易处一六个,输出苏区的物产,买进白区的货物,每月

营业约二〇〇、〇〇〇元,可得利一二、〇〇〇到一八、〇〇〇元,群众说:“这是神仙想出的法子。”

2. 土地税可收一二〇、〇〇〇担,现在整理与节省费用,对于红军供给可以够用。

3. 设立船舶检查处三处,每月可收一五、〇〇〇到一八、〇〇〇元,以值百抽一至五为止。

4. 苏维埃银行基金一八〇、〇〇〇元,纸币发行七〇、〇〇〇元,信用很好,随时兑现并举行贫苦群众的借贷

5. 开支,军费三二、〇〇〇元,苏维埃九、〇〇〇元,党六、〇〇〇元,群众团体的帮助二、〇〇〇元。

闽西:(财政部报告)

1. 建立了财政系统,已实行十分之九。
2. 各军队各团体不是从前一样向政府拿钱,现十分之九有借有还。
3. 上杭、永定、龙岩、新泉、长汀等县实行了财政统一,由下而上的交来,由上而下的发出。
4. 将没收的竹麻来造纸卖钱,无利借给农民组织造纸合作社,得到很好的影响。
5. 以战争为中心布置财政上一切工作,组织战争物品供给委员会。

其他各地的进步与成绩,兹不多述。

C. 目前的主要缺点与困难

虽然各区的工作有极大的转变,但有许多的缺点是没有消灭的,最主要的是,发展苏区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不能适应目前战争环境,对于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恐惧的情绪(如中央区因为小本经营得利,故提高税率等),有些地方财政不向选民报告,及侵犯中农的利益。

特别应该知道,苏区是在长期的国民党经济封锁中,最近战争更加使苏区受到困难。

共产党在这一方面,要是克服他的缺点与困难,为战争中的经济困难与粮食缺乏而斗争,为发展苏区的生产经济而斗争,不要惧怕苏区的经济发展,和私人资本的发展,须知苏维埃政权是工农的,把一切经济财政工作建筑在战争的利益和改善苏区民众生活,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

土地问题

四中全会后,党在国际的指示下,是在各区正确的实行了分配土地的问题,这一工作,是苏维埃区域很大的成绩,在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转变是:

1. 分配的标准的转变——各区大部是以人口劳动的混合标准,肃清了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

2. 不动中农土地的原则更明确的执行——过去各区有侵犯中农的倾向,在中农不愿意之下常常拿他的土地来平均分配的。

3. 中央区、闽西、赣东北及湘鄂等地都发动了反对富农隐藏好的土地及回收地主家属土地的斗争,这里雇农工会领导贫农团起了很大的作用。

4. 分配时及分配后都有进步,现在分配土地的方式主要是动员群众,改正过去由苏维埃命令。已经分配好的不再分配来动摇农民土地,使农民日渐觉得土地是他的,中区最近明确的决定失业工人及农村手工艺工人只要他能够耕种应该分给土地,这些土地不是再拿过去已经分配再来分而是由富农地主残余的手中隐藏的土地取来的。在分配后:

中区:进行了广大的查田运动,动员群众来考查富农等隐藏的土地,各县分田担数平均每人六石三斗,在这平均的数目中雇农的担数是大的。帮助雇农贫农的耕具种子,现在进行春耕运动得到伟大的成绩——时间提早,荒田减少,收成可以增加两倍。现在进行夏耕运动,苏维埃正组织生产突击队积极进行。

赣东北:在一九三二年春四月前,重新彻底平分了土地,使土地革命的利益落在雇农中农贫农手里(见赣东北报告),分配后进行了检查与总结,对于土地田亩及山林都有详细检查。发动群众提高生产,增加二〇万担的谷子,杂粮、豆子、油菜、麦子等都有大的数量增加,对于春耕、种山、水利等工作发动了群众极大注意,苏区荒田都在进行开垦,除边境外差不多没有荒田。

湘赣:全省土地一般的按照土地法得到了正确的解决,打击了富农窃取土地革命的利益企图,使革命的利益放在雇农贫农中农的身上,纠正过去侵犯中农的倾向,进行了查田运动,分配山地、池塘,发表了保护森林的条例。

总之,土地问题,党在苏区得到了极大成绩,现在主要的缺点是:

1. 在已经分配了的区域中,或者认为分配以后无事可作,不发展保护土地利益与富农斗争及积极帮助雇农贫农耕种土地,或者不断的重新分配,动摇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觉到土地不是他的,没有提高农民耕种和开垦土地更大的积极性,许多荒田还是很大的存在着(仅湘赣苏区有荒田四、五万石)。

2. 在新发展的区域内,许多地方没有动员广大雇农贫农来领导彻底的分配土地,有的是很马虎的敷衍命令的方式,有的同志有“一次无论如何分不好”的理论,因此常常使富农地主残余窃取土地革命的利益。

3. 在游击区域内分配土地没有迅速的执行。

因此党现在的任务是:

1. 在已经分配的区域内:a. 不再重新分配而是要发动广大雇农贫农联合中农进行反富农的斗争,保护土地革命利益,b. 积极的帮助雇农贫农使其不丢掉土地,c. 发展生产,改良水利,充足耕具,发展民众的积极性,为着发展苏区的经济与消灭荒地作斗争。

2. 在新的苏区,要正确的去分配土地,进行广大的分配土地的斗争,务使土地革命的利益落在雇农贫农中农的手里。

3. 游击区域内要立刻实行土地的分配,只是使土地迅速彻底的分配,才能保障游击区的发展与巩固。

4. 因此必须打击对于土地问题上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肃反工作

A. 过去肃反成功及我们严重的错误

1. 不能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否认了肃反工作的成功,这些表现在中区反 AB 团及富田事变等成功,正因为这些成功,才使中区日加巩固,鄂豫皖反第三党改组派的斗争,加强和扩大巩固红四军,湘鄂西部分的胜利,赣东北反革命的总破坏等等。

2. 我们过去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1)造成恐怖主义，(2)没有阶级路线(如对于工农分子与反革命地主一样等)，(3)没有发动民众来作反革命的斗争，(4)仅以恐怖政策代替了思想斗争，(5)阻碍党员群众的积极。

3. 目前反革命活动的情形：虽然由于我们奋斗，反革命的活动是极大的破坏了，但是革命的发展，促使反革命要拚命绝望的活动。如：如最近江西富农 AB 团在敌人进攻中起来破坏战争的动员，永新 AB 团与白军通消息，第三党在群众中说他是真正共产党，因为第三国际与第三党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民主党在福建的活动，上杭邱伯果欺骗民众到社会民主党中去，赣东北改组派在弋阳的活动，其它各区这种事实是很多的。

4. 我们的工作的转变——自一九三一年中央纠正中区后，肃反工作有了转变，例如：

中区：(中区报告)(1)保卫局的工作抓得很紧，普遍的建立，吸收了二、〇〇〇余名的工农担任工作，保卫局受到军事与政治的特别训练，成分改变了：工人百分之二十四，雇农百分之十三，贫农百分之五十八，中农百分之四，领导者大半是工人雇农。(2)动员了群众，召集群众大会，由靠口供而转到侦察和群众的检举。(3)刑讯废除，案件大半经过公审执行，得到了不少效果。(4)群众对于恐怖观念清除，并帮助肃反工作，如兴国因犯人隐蔽事实处罚轻了的，群众提出证据，群众说现在是真正的革命。

福建：(报告)(1)上杭县主席邱伯果(社会民主党首领)领导受他欺骗的武装群众投降钟绍基，群众听说我们转变了肃反路线，对于他们的家属优待，四〇〇人中有三五〇人都回来自首。(2)在“不准枉杀一人，不容许一个反革命在苏区”的口号下，提起了群众的积极。(3)进行了政治教育，编印什么是改组派、AB 团、社会民主党的课本，最近发动了反对托派及自由主义的思想斗争。

湘赣：各县建立了裁判部的工作，有了相当成绩，裁判部各县

各区都有组织,发生了上下级的关系,相当的建立了群众的信仰,过去因为肃反工作错误,吓走的民众,不断的大多数的回来。

其它如赣东北,破坏了反革命的组织都得到了成绩。

5. 虽然工作有了转变,但还是非常不够的,在转变中的可以看到下面的缺点:

(1)纠正过去的错误,在有些地方发生对于肃反的忽视(如中央区有的同志认为现在都肃清了,无反可肃,红军得到了胜利,反革命不敢活动了)。

(2)没有能经常的系统的动员广大的群众,来进行肃反工作(如中区赣东北赤色戒严还是松懈)。

(3)思想的斗争还是非常缺乏,因此反革命利用迷信,煽惑群众说天要长久不明等等,组织新共产党。

(4)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及和广大群众的联系不够,特别是省与县的保卫局。

共产党应该认识,正是因为革命的发展与胜利,敌人大举进攻之时,苏区一切反革命分子,要积极的帮助国民党破坏苏区,湘鄂西的教训是宝贵的(反革命勾引国民党军到苏区腹地),积极的肃清反革命与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坚决斗争,是防卫苏区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苏区的职工运动及其它群众工作

1. 各地职工运动的状况

四中全会后苏区职运有了极大的进步,从过去各苏区没有进行职工会的工作,现在已经组织广大的工人在工会里。据全总的报告,现在江西、福建、湘赣、湘鄂赣、赣东北五地共计会员一八四、九〇〇人,如果加上鄂豫皖、湘鄂西、四川各地(这些地方没有报告)有二十万到二十二万人。

从过去散漫零星的状[况],各地混合的组织没有联系的情况,现在已经按产业的原则来成立了组织,各地都召集了省的县的代

表大会，成立了组织，现各省都有了省总的组织，同时在主要的苏区中建立了雇农工会，运输苦力工会，手工艺工人工会，雇员工会的组织，雇农工会在一般的苏区都建立。各区状况是：

江西全省：——会员六万八千，雇农工会一万八千，有木船工会一、四〇〇，其它店员、手工业、苦力工会共四万一千六百。在今年四月一号举行了雇农工会的代表大会，到五百余代表，都是群众选举的，他们在瑞金、会昌、宁都及其它各地领导雇农、纸工、刨烟、木船、苦力、店员等斗争，领导了各种工人为订立合同的斗争……在一九三二年一、二、三、四月工会动员工人参加红军三、〇〇〇人，胜利县工会九月份动员三二五人……省总于一九三二年五、六月动员到红军中去的一、〇〇五名，苏大会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五，各级执行委员占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人成分等，工会有工人报的刊物。

湘赣：会员据全总电报报告是二万四千六百人，青工一万一千，女工七百，雇农工会的会员二、二〇〇，据湘赣省委报告是一万八千人，湘赣雇农工会报告雇农工会会员五、〇二七人。他们的省总指挥有：永新、莲花、安福、吉安、茶陵、萍乡、宁岗、分宜、遂川、上犹、崇义、攸县、酃县、新峡共十四县，并有兵工厂、石印局、造币厂直属支部（见一月三日报告），有雇农工会、店员工会、手工艺工会、邮务工会、木船工会，发展会员中纠正了过去的造册登记的方式，训练了干部，供给了红军及苏维埃的干部，现在省县两级政府中工人占百分之三十，领导了永新青工斗争，被服厂、莲花失业工人，茶陵、吉安等地的斗争，工会会员参加红军者一、四〇〇人，有红光报纸（见省委报告）。

赣东北：会员三〇、〇〇〇人，工会组织，一方面以产业为原则，一方面是以地域联合组织，省总下雇农、手工业、船工、煤矿，都是独立的产业组织系统。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召集了代表大会，自下而上的进行了选举，到代表四〇〇多人，白区有代表参加，改造

了各级工会,青工又举行了代表会(最近又开过一次),他们进行了订立合同的斗争,领导工人在苏维埃工厂的工人增加生产,组织突击队,兵工厂工人过去每日只能出子弹三、〇〇〇发,现在出五、〇〇〇发。一九三二年五月工会动员工会会员一、八〇〇名,工人自动报名,由工人介绍,船工工人帮助红军探听消息,如敌人进攻或经过常常很快的得到消息,并助红军渡河,输送食盐及必需品到苏区。工会能经常开会,每星期一次。工会有工人报的刊物……(见赣东北代表十月报告)

福建:会员二、〇〇〇人,有省总工会,省雇农工会,会员一、九〇〇人,木船工会六〇〇人,手工业店员苦力工会共一、七〇〇人。

湘鄂赣:会员四二、三〇〇人,有省总的组织,省雇农工会的组织,雇农会员是九、〇〇〇人

国有企业一千六百人

鄂豫皖、湘鄂西过去都有组织,他们的工作过去散漫的,尤其是经过被损失以后,最近我们已经向鄂豫皖的代表严重的指出。

当然在各区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认为苏区工会的状况以为满意,是绝对错误的。在下面各种工作将缺点与错误指出。

2. 劳动法执行的问题

- a. 劳动法得到了工人的拥护,和修改中的错误——仲裁问题
- b. 机械的执行劳动法和劳动法的忽视及对中农贫[农]的

分别

- c. 命令的执行不发动工人的斗争积极性
- d. 中央的纠正

3. 工人的生活改善与领导工人斗争

- a. 工人的生活相当改善,拥护苏维埃的积极
- b. 工人斗争的发展和领导斗争的进步
- c. 改善工人生活发动斗争的错误

(1)不顾战争的利益,不顾苏维埃经济及对农民的联合的“左”

的罢工中心论；

(2) 右的压迫工人斗争，禁止增加工资。

4. 扩大工会与工会会员

a. 分配了土地的工人的问题

b. 沿门卖工的工人不能加入工会

c. 不加入工会不能作工的错误

d. 最近的纠正

e. 最近的计划

5. 青工女工及失业工人

学徒与师傅的问题

6. 土地革命的领导与农民的联合

a. 在分配土地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b. 辅助劳动条例

7. 参加苏维埃红军及参加战争

a. 到政府及红军的情形

b. 参加战争的积极

c. 国有工业的工作

d. 错误的认识——工人落后，工会与政权对立

8. 党在职工运动中的工作

a. 党代表大会后得到了很大的成绩：

(1) 建立了广大的工会组织。(2) 领导工人斗争的进步。
(3) 土地分配中工人起了领导作用。(4) 提拔工人到红军与苏维埃中去。(5) 驱逐了反革命分子，提拔了新干部，发展了工人的积极性。(6) 以产业的原则建立了工会组织，举行代表会及增加了白区的工作。

b. 存在着的错误与缺点：

(1) 包办主义命令主义使工会下层基础的积极性不巩固

(2)扩大工会的工作是非常迟缓与不够,使工会巩固^①

(3)动员工人参加红军不够

(4)对于左倾右倾的斗争没深入——认为苏区没有工人及惧怕群众加入工会的现象以及对于发展工人斗争的机会主义与工团主义的倾向是没有肃清的

总大群众,2. 领导参加与 S,3. 劳法执行及改善群众,恢复组织及白区联系,忽视斗争^②

1. 仲裁问题

2. 合作社国有企业减少

3. 阶级路线

4. 工会的民主

其他群众组织

各方面都有相当的工作,但主要的是命令主义的存在,没有发展群众的最大积极性,如贫农团——各地都有组织,在分配土地与反富农斗争中是起了作用,但许多还是散漫的

反帝拥苏同盟及互济会——都是几十万的组织,工作是相当的有的,但有些组织是没有日常的生活

江西一九三二年报告:

反帝会员五〇万以上,贫农团一四二、五二四(八县),互济会一三五、六四四(八县)

总 结

1. 苏维埃运动是发展,革命向着

2. 不平衡

3. 苏维埃有许多的困难大敌人

党必须努力与克服

配合有很大的进步,但是配合大的工区配合还是很薄弱

①② 原件如此。——原编者注

第四部分

四、党的政治的生活及组织状况

A. 党内生活

1. 四中全会前后,中国党坚决的站在国际路线之下,与立三路线坚决斗争,由于国际的领导和中国党布尔什维克的团结,打塌了立三路线,党的四中全会得到伟大的成功,吸引了党的新的积极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改组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全党像一个人一样在国际的领导下去坚决的执行国际所指出的任务——巩固和扩大苏区,创造有战斗能力、政治上坚定的红军,进行革命的群众工作。党在这时坚决与罗章龙右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及立三路线、两面派、派别残余作斗争,打碎了右派反国际反党分裂党的阴谋,瓦解了他们在全总、江苏、河北、满洲的组织,使一些被右派蒙蔽的同志回到党的组织里,在各省深入了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肃清了派别观念的残余,都得到了极大的成功和胜利,使中国党更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党用了极大的力量加强了苏区的领导,在中央区、鄂豫皖、湘鄂西成立了中央局,赣东北加强了省委,派了中央代表直接领导,使苏区的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与转变(单就鄂豫皖说,从当时六枝枪^①发展到现在的形势)。在白区,加强和改组了江苏、河北、广东省委的组织,加强了和改组全总及工联党团,派了极有能力的同志去。这时期的党,虽然××已向国际作过详细报告,但这些主要的问题还须要简要的指出。

2. 新的政治局成立(一九三一年八月底)到北方各省联席会议(一九三二年六月),由于白色恐怖的严重,向忠发的被捕,政治局有的同志不能立足,在国际的指示下成立了新的政治局,新的政治局在九一八事件的前后成立起来,领导苏区的同志冲破国民党

^① 原文如此。——原编者注

的第三次围剿苏区。党提出武装民众进行革命民族战争的口号,动员工农劳动群众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干涉苏联的企图,这时期党内部分的同志发生一种机会主义的理论,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进占东三省是因为中国革命低落的结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不是要使满洲成为朝鲜式的殖民地,不过是解决中日的悬案而已,党与这种倾向坚决斗争,肃清了这种理论,首先加强满洲党的领导,派同志作中央代表直接领导,在上海北平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反帝斗争。同时为要加强反帝运动的无产阶级骨干,所以加紧转变党的职工运动与职工运动中一切不良的倾向斗争(如忽视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倾向,认为经济恐慌中不能罢工,及一个工厂一个轮船不能罢工的理论,“只要领导经济斗争,没工夫注意反帝运动”及“只要领导工人要饭吃,不要领导工人参加民族战争”等忽视反帝运动倾向作了斗争,以及左的关门主义不去争取黄色工会的群众等)。党为转变职工运动,发表了告同志书,以及最后改组全总党团,使上海的及全总的工作有了转变,使一些同志纠正了错误,在上海一二八事件中组织了四万人的反帝同盟罢工。在苏区的工作,党又派了××同志到中区,××同志到湘鄂西,加强苏区的领导,严重的指出鄂豫皖轻视国民党的错误估计(见一九三二年春给鄂豫皖的信)。这时党又提出创造北方新的苏维埃区域,陕西二十六军的游击区是在这口号之下实现的。但同时满洲的工作是没有进步,所以党决定召集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由于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党内布尔什维克一致的团结,使取消派右派及党内机会主义者和两面派的分子政治上日加破产,取消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一二八后向党提出来要与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向被取消派欺骗的少数工厂中的群众的回答是:号召他们了解取消派破坏反帝运动的罪恶(破坏沪西大罢工),党愿意与他们在全上海工人阶级一致的联合战线上共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党不能与陈独秀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

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这一号召得到了很大的成效，电车及老怡和纱厂中被取消派欺骗的工人，离开取消派来找党的组织；右派非常委员会的干事会主席（张金宝，一个女工）不得不向中央写说明书说：“他们过去反四中全会是对的，因为那时中央没有执行国际路线，现在中央是真正的执行国际路线，所以他们宣布解散右派干事会（右派的中央）的组织”；在党内个别的立三主义者和两面派，在四中全会后，他们以旁观的态度，派别的成见：“以为中央还是一个派别，新的中央不能领导中国党，不出三月就塌台的”，所以他们在坐等时机。但这时他们向党表示错误，说他过去的认识错误是不彻底。党对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愿意纠正自己错误的同志，都分配他们的工作，在工作中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彻底的改正自己的错误。

由于党在国际路线下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使中国党得到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团结。中央的威信日加增高，党内的团结比任何时候都加巩固。

3. 由北方会议到现在——北方会议后，党改组了满洲省委，加强了陕西省委的领导，使满洲的工作有了相当的转变，使北方党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如各地领导农民的暴动和游击战争，但是党检查自己的工作中，指出在反帝运动职工运动中下层统一战线是没有彻底的执行，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在农民斗争表现了脱离群众，放弃农民的日常斗争的倾向，党坚决与这些倾向斗争，在斗争中，使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部分的执行，在反对忽视组织赤色工会及关门主义的倾向中使纱厂工会成立，在黄色工会群众部分的进行了相当的工作。在热河事件前，党加强北方党与工会的领导，派中央代表及全总代表到北方去，最近的北方的反帝工作、职工运动，是有了新的进步。在苏区党肃清了罗明路线——悲观退守路线，接到斯大林同志信，党在各级的组织中进行了讨论，发动了反对党内的自由主义的斗争。

由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深入,提高了党内的理论的水平,与立三路线时是大大的不同了,党员的积极性是日加发展,最近各省的工作都有新的发展,即使过去最落后的省份(如四川),现在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央及各地的党报都有很大的进步,《北方红旗》得到北方广大群众的拥护,曾经在群众中作过《北方红旗》募捐,得到五百元的成绩。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敌人残酷的进攻与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在国际的领导下艰苦的奋斗,得到很大的成功,使党的工作日加进步,肃清了立三路线和右派的组织,使党在国际路线下得到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团结,党的理论水平日加提高,党的政治影响日加扩大,这给了中国党日加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以强有力的保证。

B. 党的组织状况

中国党另一方面的进步是他的组织的增长,与无产阶级成分的增加,他在某些大的企业建立强大的工厂支部,现在的组织状况是:

1. 党的数量与质量:

国民党统治区域里——白区党员的数量没有很好的统计,据组织部的同志的报告约有三〇、〇〇〇人,这些党员的分布,就可以统计出来的是:

江苏八、〇〇〇,河北四、〇〇〇,满洲三、〇〇〇,四川一、五〇〇,安徽一、四六一,山东六七一,以上六处共计一万八千六百三十一〔二〕人。

但陕西、河南、山西、内蒙、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南、云南十处是不在内的,这些地方据各地的零碎的报告及我们的约计,大概是有的:

陕西约计连游击区在内,至少有二、五〇〇人——三、〇〇〇人

河南连豫鄂边省委二、五〇〇人

广东、广西二、〇〇〇人

福建连漳州的游击区至少一、〇〇〇人

山西五〇〇人

内蒙连军队中的同志至少七〇〇人

浙江三〇〇人

以上各地共有九千五百人，此外云南及湖南也有一部分同志，所以白区的党员是有二万八千到三万人的数目。

三万党员中工人同志有六千的数目，这是可靠的，单就上海已有近四千人的数目，所以党的成分，工人占百分之二十。

苏区的数量：

江西：党大会（一九三一年春）前只有一五、〇〇〇人，一九三二年三月为二三、〇〇〇人。

现在：（七八月统计）增

瑞金——八、八〇〇——（二、八八一）

兴国——八、七五七——（三、五〇〇）

宁都——四、九七五——（二、五九八）

胜利——四、七三四——（一、八一九）

永丰——三、五四六——（九一〇）

万太——四、〇一六——（一、四四五）

赣县——五、四五五——（一、三三七）

会昌——二、八一〇——（一、六七八）

安远——一、四二五——（五九〇）

南广——一、八六二——（一、一九八）

公略——五、九三四

雩都——二、五七五——七、九五六（七八九三月十县共发展）

十二县共计五二、八八九^①

这一个数目应注意只是一大部分,而石城、寻邬、信丰以及黎川、宜黄、乐安、新淦等老的及新发展的地方都没统计在内。

第二,这统计是至九月为止,从九月到现在是有很大的发展,如最近得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的零星材料

兴国一〇、五六七(增一、七九〇)

零都(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发展二七八人

宁都五、四一〇(增四三五)

会昌三、五三二(增七二二)

信丰(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增一一四)(只有增加数目,未有总的数目)

南广(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增二三一

胜利(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增六七二

公略(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增二七三

零都(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增一五七

石城(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增一、九一五

总江西于十月二十到十二月二十日共增五[六]、五八七(其余各县没有接到报告)

十二月宜黄有报告,全县党员是:一、一六九

一、三、五军团及十二军中的报告是(三二年七月三十日)九、七四九

加上九月份十二县的统计总数五二、八八九

所以江西党员已知的数目是:六九、三九四人(约七〇、〇〇〇人)

在未有统计老的苏区(如寻邬、信丰、石城等)及新的苏区(如黎川、乐安等区)及一九三三年半年来发展的数目以及最近红五月

^① 此数与各县合计数不符。——原编者注

的征收的数目(据最近苏区来信云,征收运动得到很大的成绩),至少三〇、〇〇〇人有的。

所以江西(连红十二军中的党员在内)的党员数目约共一〇〇、〇〇〇人。

江西党的成分,根据各县的报告,平均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五。

湘赣省委:六月份报告,共十一县委一中心县委(分宜)、河西区、湘南区、长湘区。

其一九三二年五月至九月之统计如下:

1932年5月	男 18647 女 1514 共 20161	成分:工人 171,手工业 2155,苦力工人 169,店 员 223,雇农 1605
1932年6月	男 20194 女 1531 共 21725	
1932年7月	男 20456 女 1590 共 22040	成分:产工 0.77%,手工 10.94%,苦工 1.13%, 店员 0.99%,雇工 8%, 共 21.86%
1932年8月	男 21439 女 1698 共 23137	
1932年9月	男 22125 女 1792 共 23917	成分:产工 197,手工 2314,苦工 228,店员 228, 雇工 1508,共 20.26%
1932年9月	男 22125 女 1792 共 23917	

①

根据上表,湘赣党员共男二五、九〇一,女四、〇二七,总计二

① 数字似有误。——原编者注

九、九二八人。

但这数目,湘南特委无报告,又政治保卫局党员及萍西党员未统计在内,所以湘赣党员至少三〇、〇〇〇人。

湘鄂赣:湘鄂赣的组织情形不很清楚,只就其零碎及团的报告中是:

A 管辖区域:(1)鄂东南道委,(2)修水中心县委,(3)万载中心县委,(4)平浏各县及湖北委员会(白区)

B 党员数量五〇、〇〇〇,团的数量四〇、〇〇〇(见团的一月二十二日的报告)

	成分:工人百分之一七,	
	雇工百分之一五,	
C 红军中:党员二、四〇〇	} 贫农百分之五七,独	
团员二、一〇〇		劳者百分之 H ^① ,中农百
		分之 H ^② ,其它——

赣东北:(据去年十月报告)

党员数量二〇、〇〇〇人余成分:工人百分之二十,雇农百分之二

团员二一、一七二人

湘鄂西:

党员二八、七四〇人成分:工人百分之二二

团员一五、九六一人

福建:党员约二〇、〇〇〇余人

鄂豫皖:党员约二〇、〇〇〇余人

整个的苏区党员是:

① 原文如此。——原编者注

江西	一〇〇、〇〇〇	} 共计二六八、七四〇人 加白区三〇、〇〇〇人 共计党员数量二九八、 七四〇(将近三〇〇、 〇〇〇人)党的成分， 工人占百分之二〇以 上，这就是中国党的数 量和质的数目
福建	二〇、〇〇〇	
湘赣	三〇、〇〇〇	
湘鄂赣	五〇、〇〇〇	
赣东北	二〇、〇〇〇	
湘鄂西	二八、七四〇	
鄂豫皖	二〇、〇〇〇	

2. 党的发展和质量上的进步：

如果我们[同]过去的数量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从四中全会后，江苏的上海由五〇〇人发展到四、〇〇〇人，河北由一、〇〇〇人发展到四、〇〇〇人，即使过去最落后的四川也由五〇〇余人发展到一、五〇〇余人。在苏区是：中区在党大会以前(亦即四中全会以前)有一五、〇〇〇人，即在一九三二年三月间还只有二三、〇〇〇人，福建在党大会以前只有五、〇〇〇人，一九三二年三月只有一三、〇〇〇人，鄂豫皖在四中全会前后遭受了立三路线的摧残，金家寨只有几十人，皖西只有枪六支，这些地方现在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党的发展在许多地方是几倍的发展，为什么党会[得]到这样大的成绩，一方面是中国革命情势的存在，全国反帝运动的高潮，苏区红军伟大的胜利，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在另一方面党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上是根本与过去不同的。比如：

上海一二八的征收运动中，进行的工作是：

(1)支部相当的作了群众工作，建立了支部和工人群众的更多关系，领导了十几次厂内日常斗争及五六次失业工人斗争——大多数是胜利的，恢复七个大区的区报，建立了四十多个壁报……

(2)动员了支部同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动员了所有的支部，召集各支部会议讨论，支部比赛联席会议，三十一个支部竞赛得到成绩，突击队而[有]一定成绩的有十五队。

(3)抓住了中心支部

(4)耐心具体的领导,不是官僚主义的

(5)宣传工作发行工作的改善

(6)改善了支部的秘密工作

如北平在今年二七到三一八发展了一倍的党员,这成绩的获得,主要的是:

(1)把发展党员的路线真正传达到每个支部,根据下层的实际情形而成立具体的计划。

(2)进行了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

(3)具体的领导,严格的检查,经常的监督。

(4)发展了支部和区委的积极性。

在这些艰苦的工作,党才能收到以上的成绩

在党员发展中值得我们深切注意的是党的成分加强,工人成分由过去百分之七增加到百分之二〇,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党在有的产业中建立基础,创造了很大的支部。

由于党的发展和质的改变,告诉了我们以下的事实:

(1)证明了党在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劳苦群众中的信仰是飞腾的增涨着。

(2)党的发展是加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用,保证了党更加可以取得广大群众与他们密切联系。

(3)无产阶级的成分加强,党在产业中的基础更加扩大与巩固。中国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是更加强了,新的工人成分的增加,更保证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

(4)消灭了发展党员的关门主义,流动的现象是大大的减少了。

在党员的发展中,我们必须指出另一方面是:

(1)许多大的城市我们还没有能够恢复与扩大我们的组织(如武汉、广州、□□、天津)。

(2)党的工厂中的基础,主要是在纱厂,有许多重要的产业中(如铁路)我们是没有什么大的基础。

(3)在发展党员中,与发展群众的组织不能配合,各地表现了工会的组织比党还少的现象,这是非常严重的。

(4)日常的系统的工作不够。

(5)巩固我们的成绩,教育这些新的同志,这工作还是不够的。

总之,党在发展党的工作上,得到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弱点是存在,党须巩固这些已得的成绩,必须用极大的力量,将这些缺点弱点克服下去。

(关于组织上的主要任务在最后总合的指出)

3. 工厂支部与支部生活

创造工厂支部党是得到很大的成绩,党在上海的主要企业里建立了很强大的支部,使党在产业中的基础更加巩固,创造了领导工人斗争发展职工运动很好的基础。如:

(1)在党领导沪西大罢工中创造了内外棉各厂九个支部,由于纱厂的罢工的推动,党在中国纱厂中如申一、申六等厂创造了将近百人的支部

(2)在党进行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领导了报馆工人的罢工,党在新闻报馆组织了一百六十人的支部,将新闻报馆的群众夺取在赤色工会领导之下,成立了反对派的组织

(3)由于领导电话罢工,党在那里创造了四〇余人的支部

(4)领导了英美的斗争,党在三厂建立了一六四人的支部

(5)在公共汽车的罢工中,党在那里建立了二〇余人的支部

(6)在领导铁路斗争,建立了北站南站中山路的支部,恢复了吴淞大厂的支部,最近领导反帝运动,打入了长久没有关系的电汽新厂建立了支部

在上海建立工厂支部的成绩,请看江苏三八的总结的报告是:

“(1)党在重工业中创造了十个支部

(2)党在市政工人中创造了六个支部

(3)党在纱厂中创造了十五个支部,恢复了许多重要阵地

(4)党在黄色工会力量最大的地方,党创立了最大的支部

(5)党在失业工人中创造了十九个支部

(6)党在与战争有关系的地方相当的建立了一些基础

党在三个星期中建立了一五三个新的支部,六三个新的单位
党创造了两个一〇〇个同志以上的大支部,开上海的新纪录。”

(7)此外在河北党,在一九三二年春领导唐山的斗争,建立了唐山矿工支部,恢复了立三路线失去的阵地,在井陘矿工建立了五〇余人的支部(一九三二年受了破坏,最近又在恢复),最近领导北宁路的斗争,党在那里建立了支部。

(8)河南党在领导孝义兵工厂的罢工(一九三二春),建立了兵工厂支部,在满洲最近领导电车大罢工,扩大了党的支部。

工厂支部生活与支部改造及群众的联系,党从经上海、北平等地进行了支部的工作,现在的支部生活是比以前改善了,例如:最近支部在领导厂内斗争的能力的增长着,大的支部能够去自动的领导斗争——如最近报馆斗争、英美的罢工、阜丰的罢工以及申新的哈尔滨电车罢工,都是支部领导的和发动的。在北方领导农民斗争,支部也起了作用。上海最近有些支部是已经实行国际对于党团的决议。

在苏区的支部,从党大会以后,中区改变了肃反中的错误,改变了过去官僚主义的领导,支部同志的积极性是日见发展起来,支部会可以经常的开会,开会不是过去背死书的开会公式,而能够在支部会中讨论支部如何领导的斗争,如扩大红军的工作中,兴国、瑞金、上杭的支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赣东北(省委代表报告):

(1)支部能按时开会,多数党员可缴党费,识字的可读党报

刊物

(2)支部与群众的关系改善,党员比群众大些的现象是肃清了

(3)以前支部会议是非常呆板(1. 报告,2. 讨论,3. 其他,4. 散会),开会时没有讨论,只是报告一下就完了,现在都改变,每次都能讨论中心问题并能检查工作

(4)面向支部的口号,组织上是相当的注意,组织部建立了支部巡视员,专门考查支部

在湘赣(一九三二年报告)

(1)过去支部的会议是形式主义,对于支部的领导是命令主义委派制度,因此使支部不积极的进行群众工作。

(2)自坚决的改正错误后,同志的积极性是提高了,同志加入红军的数量是增加了。

(3)党员有了新的发展,有些支部改造了洗刷了异己分子,会议的形式转变,支部能自动开会,能按月缴党费。

(4)同志在群众中的领导增高了。

关于建立工厂支部,改造支部,改善支部生活,等等,过去中央是积极的。注意,对于白区的工厂支部及苏区党的支部都有专门的信和决议,所以有许多问题——如支部组织,大支部的管理,支部的秘密工作,支部的教育——在决议上已经指出,不在此地再重复,总之,在创造工厂支部及改善支部生活上是有很大成绩,现在主要的缺点是:

(1)有许多重要的城市和产业中,我们还没有去建立我们的堡垒。

(2)支部与群众联系不密切,领导厂内的日常斗争和组织与准备工人的罢工能力还是薄弱的。

(3)加紧秘密工作,保护我们的工厂支部,还是不能经常的注意。

(4)领导支部的机关还不能极大的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给他

们以经常的具体的帮助,强有力的去巩固和加强那些支部,必须迅速的克服我们的弱点,在这方面的任务,十二次会议及中央工厂支部的决议中很多,不在此地重叙,问题现在是坚决去执行那些任务。

4. 地方党部的工作:

白区的地方党,四中全会后,积极的吸引了新的干部参加,各地省委工作是日益向前的发展,尤其是中央改组了满洲省委,加强了河北党部,最近各地工作的发展是更加明显的——如满洲工作的进步,河北党努力进行反帝工作,加紧兵士及农民的斗争转变,职工运动,陕西二十六军的发展,四川领导罢工农民及兵士的斗争——一般的说,区委领导支部是有进步,在上海开始了区委的负责人是在业的工人,各省都有地方党报,上海各区也有区报,办的是比以前进步。各省委最强是江苏、河北,最近江苏受了大破坏,满洲省委改组后,工作的领导与各地的联系是比较以前大有进步。江苏省委:对于上海的工作是很大的进步,现在上海是分为西区、内外棉区、中区、北区、南区、杨树浦、引翔港区、烟厂区、浦东区、吴淞区、海员码头委员会,区是比以前加多了,尤其是产业支部的发展,采取了内外棉区及烟厂区的方式,对于集中领导上是比较好的。省委的领导区委是经过巡委的巡视员及区书联席会(分别开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支部是由省委组织部直接领导,工联党团由省委的常委直接领导,省委有一同志专门的作领导工会党团的,对于外县的工作是经巡视员与文件的指导,省委的领导方式日渐具体化,在一般的工作上是有进步,但最大的弱点是:对于工会的具体领导不够,对于外县联系不密切,在外县大的城市中——如南京、无锡等地遭受了破坏,工作尚未完全恢复起来,没动员全党与叛徒斗争。对于秘密工作不能经常的注意。其它各省在报告时可以分别叙述,在此地不一一的举出。

在苏区：

(1)中央区：

A. 代表大会后是有了转变——表现在苏区的扩大,红军的加强,党的力量的增长,群众工作的进步,如果认为是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中区团的意见)。

B. 当然中区的错误是有的——如对于帝国主义的问题,大战的问题,对于国民党三次战争后不会有四次战争的等问题,这些错误是改正了的。目前值得注意特别是存在着的命令主义,对于群众工作和联系的不足,在动员民众参加战争及领导苏维埃及进行职工会的工作是非常不够的,自中央同志到后,这些现象都是相当纠正了的。

(2)赣东北:在四中全会后中央代表直接领导之下是有很大进步——加强了红军,扩大增加了苏区,成立了新的红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对于白区工作用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他们在群众工作苏维埃工作领导的薄弱的缺点,一样的值得注意,而在动员群众扩大红军,职工会的工作,也是极不够的。

(3)在福建,过去在罗明的领导之下是犯了很大的错误(见《斗争》),最近已改组和加强了省委,工作是有了发展。此外湘赣及湘鄂赣,从他们的省代表大会后工作是有了进步,配合中区作战中表示了很大的努力。

(4)鄂豫皖的中局与省委:在四中全会后,党的工作和领导有了极大的发展,创造了很大的苏区和扩大加强了红军,与反革命斗争得到了很大成绩(在湘鄂西要差的),但是由于他们的干部的薄弱与中央联系的不密切,在政治上军事上犯了错误,使我们过去受到部分的损失,他们的错误,在鄂豫皖已纠正了,红四军中已派人进去。湘鄂西还没有与我们发生关系,最近有些工作是有很大的发展的。

在各地方的地方党部,是吸引了新的工农干部,对于支部的领

导是有了转变。

在苏区党部一般的弱点：

(1)对于群众工作及政府工作的领导不够。

(2)对于同志的具体领导还是薄弱，没有极大的启发支部的积极性创造性，有些地方包办命令主义是还没有彻底肃清。

(3)集体的领导在县的及乡区的领导机关中还是表现极弱的。

(4)吸引新的干部还是非常不够的。

总之，虽然我们的地方党部的工作是有进步，但是党必须严重的注意他的缺点与弱点，党在这方面必须是极大的努力去进行下面的主要工作：

(1)一切工作面向着支部，极大的发展支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将党的工作中心放到支部的堡垒中去。

(2)加紧的去领导群众的工作，与群众密切联系，将工厂工会日常斗争与罢工，放在党(尤其是白区)的中心议程中去。

(3)积极的吸引新的工农干部，改造和加强地方党部，吸引在业的工农到指导机关中去。

(4)转变新的具体的活的领导方式，肃清包办命令主义。

(5)积极的经常的动员党与群众，与敌人的白色恐怖斗争，加紧秘密工作的执行，将党的领导机关掩护在广大的群众中——从各种的教训证明如果我们不如此，我们就不能保障党的工厂支部和指导机关的组织，下面报告这一问题。

5. 秘密工作的执行与动员整个的党与叛徒斗争：

革命运动的发展，苏区红军的胜利，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反革命的统治阶级的瓦解，使反动统治阶级更残酷的用白色恐怖、法西斯蒂的组织、收买叛徒来屠杀和摧残党与革命的群众组织。由[于]中国党近来年的破坏，同志和干部的牺牲，更证明，反对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法西斯主义，与叛徒作斗争，就是为着党的存在而斗争。关于这一工作在总的报告中应该指出的是：

A. 虽然中国党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但是过去党对于秘密工作与叛徒作斗争是没有引起全党注意,而对于秘密工作是没有加紧的经常的注意。过去对于秘密工作的错误是:

①认为与叛徒作斗争只是另外一部分同志的事,没有动员全党的同志与叛徒作斗争。

②秘密工作的注意,仅限于技术的注意,没有真正的经常的系统的动员群众的斗争,来反对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与法西司蒂,虽然是不断的指出。

③对于保护工厂支部加紧支部的秘密工作,是极大的松懈的。

④对于秘密工作不是经常的系统的注意而是忽冷忽热的状态。

因此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中,叛徒的积极活动中,党就不能很好的保存他的组织。

B. 在国民党的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党受到了很大的牺牲——各地的党团工会及其它群众组织以及中央全总 G. Y. 都受到损失,在同志和工会会员的被捕牺牲中,百分之九十的表现了为阶级为主义而斗争的英勇的牺牲——如一九三二年春江苏各县、南京、津浦路被捕的同志和赤色工会会员的英勇斗争与遭受枪毙,河北、山东、满洲被捕及枪毙的同志,广东、武汉大批的同志,以及最近全总、工联、省委、中央的同志等。

在另外一小部分的党内的对于革命动摇不坚决的分子,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中,国民党的引诱与欺骗中,叛变了阶级和党,作了叛徒,这般叛徒大都是过去反四中全会的右派分子或立三路线中犯严重的错误的分子。

在这种情形中,党内极大的部分的同志,由于对敌人与叛徒的愤恨,发生不顾一切的不管一切的秘密工作而去拼命冒险,另一方面小部分的同志悲观失望,甚至个别的分子发生不相信党的倾向。中央严重的打击那种悲观失望的情绪,与那些认为党是没有办法

不相信党的极危险的倾向(即使是最小的)作斗争,同时积极去纠正那大部分的同志的不顾一切的拼命冒险,将他们的积极的情绪引导到正确的道路,现在悲观失望的现象是完全肃清了的。

C. 党对过去的错误是相当的纠正了的,尤其是接到十二次会议的决议以后,作了以下的工作:

①对于支部的秘密工作已经积极的注意,改变支部的组织,大的支部成立车间支分部,班次的支分部,支部加紧与群众联系,支部有候补书记及不公开活动分子,由于这些工作的进行,最近支部遭受大的损失是减少了。

②相当的发动了群众的反白色恐怖的斗争……

③把与叛徒作斗争的问题,加紧秘密工作,提到了全党上去,在上海的区委中开始了引用工厂中在业的干部。

④改变了会议的形式和只靠腿的领导方式,各地有了秘密工作委员会来经常检查秘密工作的执行。

⑤严格的执行秘密工作的“注意”,认真的保护和运用干部,进行和加紧党的教育。

这些工作的执行还是不深入,有些只是刚刚开始,所以党以后必须继续努力。

6. 干部,党的教育,报纸:

干部的培养与提拔,党在四中全会后,是努力的进行,在苏区是吸引一些新的工农干部到指导机关,白区各省的组织大部分是新的地方干部,上海各区十分之九是工厂中出来的。这些新干部虽然经验不够,但对接近群众与群众联系是非常好的。党对于干部是一方面培养新干部,另一方面教育老的干部,教育干部的方法,在支部工作和实际工作中锻炼,给以具体的帮助,有些工厂中的积极干部,除在支部中训练外,并且给他一个可能的范围和帮助,去巡视其它支部。在白区,各省及中央都进行过训练班,训练高级干部,训练班得到不少的成绩。同时党在同志中进行了一些

宣传训育工作，印了许多的册子，同志的理论水平是提高了。党的刊物报纸，现在不是过去立三路线那样，一般能讨论他，高级干部能够真正的去读党报及刊物，并且帮助文化低的同志，中央的党报在群众的威信很高，考查的结果，下面最愿意看的是《斗争》。《斗争》《红旗》的发行主要的是在上海，北方及各省都是因为不能大批的运去，是采取送少数纸版去翻印。在苏区最近开办了三〇〇余人的共产大学。

现在无论苏区白区，对于不敢吸引新的干部，或提拔干部的形式主义是纠正了。对于加紧党的政治教育——尤其是支部的和党的刊物报纸是引起各地的注意。但是革命的发展，党的工作的开展，对于干部的需要是增加了，同时白色恐怖的摧残，干部的牺牲，以及吸引干部的不够，所以干部是感到缺乏的，尤其是高级干部，——因为有许多同志在白区不能立足，新的干部还不能很快的培养上来——所以现在要能够适应革命形势和党的工作的发展，必须：

①大胆的耐心的培养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加强党的干部教育。

②极大的加紧秘密工作，保存党的干部。

③系统进行党的政治教育。

④为此，党报《斗争》必须能够更多反映下面的实际情形，能更多的增加对各地的具体领导，《红旗》和布报能使其按期出版。

7. 青年团及其它群众的组织：

关于青年团的工作，团的中央在二月中起草了一个报告，最近的工作，早已要他们去准备供给我的报告，因为我知道团的工作是不多的。此刻我只指出党领导团的工作上几个问题：

①党在四中全会后帮助团恢复了团的组织，肃清立三路线取消团轻视团的残余。

②在党领导下的青年团，工作上得到很大的进步，但这主要

的是在苏区。白区工作,团在领导青年的反帝斗争中得到相当的成绩(如过去上海北平的反帝斗争及最近反帝组织的发展),在领导青工斗争是进行了相当的转变——如参加沪西罢工,领导上海电报斗争及最近满洲电车罢工。据团的同志说,团的组织,白区约一万余人,上海的发展是由三〇〇发展到二、三〇〇,建立了大的工人支部,在英电等企业建立基础,提拔了新的干部。在苏区的团员没有得到统计的报告,一般的说,与党差不多的。

但是从各种工作上,表现着团在白区的工作是落后的,特别在白区的工人运动中,和团的组织,团的主要弱点是不青年化,工作没有深入青年群众,特别是青工群众中,对于下级的联系是不密切的。

③党与团的关系是比较密切了,各地党都能去帮助团的组织,帮助团建立了许多组织。团过去的先锋主义取消主义一般说是肃清了。中央在严重的环境中,给了团极大的帮助,但各地党对于团的具体领导是不够的,个别的地方还不能深刻了解团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部分,给以经常的具体的帮助。今后党必须督促各地严重的执行党过去对于团的决议,帮助团的工作,使之深入广大的青工群众中去,实行统一战线,组织广大的青年劳苦群众的反帝斗争,参加民族革命战争。

其它群众的组织,在上面第二总的部分各种工作及苏区工作中都指出,这里不再详叙。但是此地应指出:

①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是有极大的发展,工会工作在苏区建立了广大的工会组织,在白区实行了以产业的原则建立了纱厂工会,烟厂工会很快的建立成功,发展了工会会员的组织。白区建立雇工会的组织。在农民运动中,党在苏区建立贫农团,在白区中陕西、满洲、安徽南部(秋浦)、漳州、河北、山东建立了农民的游击队,实行游击。农委员会真正组织在委员会中的至少有五万人的组织。在反帝运动,上海、河北建立比较大的组织。——上述的组织

是在日益发展的状况里。

②但是要严重的指出：

a. 在工业区中工会的组织比党员少的严重现象，失业工人我们没很好的去组织，这是不能再继续下去的。

b. 在农村中的组织，有的地方常常是与党分不清楚，群众的组织还是散漫的，各地游击队还不能成为广大的系统。

c. 在群众组织中的下层组织的能力不强，命令主义的包办是没有完全消灭的，群众的积极性没有极大的提高起来。

d. 在反革命派别的群众团体——如黄色工会等，我们还没有进行必要的努力。

这里主要的是我们对厂内的活动，农村中兵士中学校中的工作没有深入、广泛去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同时我们对于下层统一战线没有彻底的具体的运用。

e. 在另一方面是虽然我们党团工作已经开始，但这一工作过去是没有加紧注意。

因此，加紧工厂中农村中学校兵营中的活动，领导他们的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在白区广大的发展和组织工厂的工人，无组织的工人，失业工人到赤区[色]工会和失业委员会里，努力的组织农民委员会，建立雇农工会以及发展兵士及学生的组织，真正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去夺取黄色工会及其它群众组织中的群众，在彻底执行统一战线中，团结广大的群众到反帝的党团里及互济会等组织里。在苏区的群众组织上面已经说过，不重复。

总结党的组织，在四中全会后有了极大的进步和生长，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团结是比任何时候巩固，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但这不能掩盖党的主要弱点存在着，现在党的弱点在哪里？主要是：

a. 党的组织不平衡的发展，许多大的城市没有能完全恢复组织，特别是临近苏区的地[方]——如武汉、南昌、九江、广州等地。

b. 因为许多城市没有工作，因此那些地方的产业中没有建立

起我们堡垒,虽然无产阶级的成分有了增长,但党的无产阶级的薄弱还是严重的问题。

c. 支部生活不健全,支部与群众的联系不密切。

d. 地方党的领导,一般说还是薄弱,干部缺乏,不能适用党的工作。

e. 秘密工作与叛徒作斗争的工作,全国党还没有严重视为一种经常的工作。

f. 由于我们厂中活动的不够,没有广大的发展日常斗争与下层统一战线的实际的运用,因此,我们的群众组织和对于群众的联系还是很薄弱。

这些弱点,中国党已经是采取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具体的步骤来消灭他的,并且在上面各部分所指出的任务积极努力。同时党再三指出,要使党能够在布尔什维克一致团结之下去进行工作,党必须继续与一切不良倾向右的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才能实现党政治上的任务。

五、总结

由于世界的经济危机的打击,帝国主义的剥夺奴役,国民党血腥的统治,日帝国主义的战争,使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深入,国民经济的浩劫,使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失业、破产、死亡、饥寒,到达空前未有的程度,在这个基础上使中国劳苦群众从死亡中选择了革命的出路。

(此地要加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进攻革命,使中国民族陷于民族的危机,及国民党进攻革命的危險)

现在中国是在战争与革命的火焰中,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引起了全国广大的反帝怒潮,苏维埃红军在中国很大的地域得到胜利,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兵士的哗变,弱小

民族的反抗运动的汹涌的爆发,反革命的统治日加瓦解,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与组织上的增长,指出中国革命情势的存在,苏维埃的革命,在战争与革命中是指出了中国民众民族的社会解放的出路,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殖民地的实现。

在革命形势存在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已经无疑义的得到许多的胜利与进步,在苏维埃区域得到伟大的成功,在白区的工作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些英勇反对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党在白区的生长与产业支部的创立,以及职工运动的成绩和进步,这就是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大大的加强,是他胜利的完成革命的保证。但必须指出许多的弱点存在着,这特别是同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的联系的不密切,对于他们的罢工斗争的领导,失业工作进行的薄弱,是非常明显的。

正因为党同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系的不密切,尤其是经过赤色工会与革命反对派的联系的薄弱,所以党没有给群众的反帝斗争以强大的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能够广泛的运用统一战线去团结广大群众,消灭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的欺骗,将反帝运动义勇军的斗争完全争取在我们的领导之下。

正因为有这些缺点,他还不能完全的完成国际所与中国党的任务,使工人运动反帝斗争国民党区域的农民的动员与苏区红军与广大群众斗争汇合起来。

目前必须要克服这些缺点,党正在努力动员全党党员来彻底实行十二次会议的指示,完成中国党历史的任务。我们相信在国际的领导与帮助之下,及中国党全体的努力,是可以使十二次会议给他的六大任务彻底实现的,一直到争取苏维埃全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完成他历史的任务,国际的领导与帮助是有决定意义的。四中全会后国际对中国党给了很大的帮助,并且派代表直接领导,国际代表在中国是很正确的给了党在苏区白区

的工作以极大的和具体的帮助,这是必须指出的。希望国际讨论报告后更给以指示和以后的经常的帮助。^①

1. 中国党在中心城市努力克服城市与农村的不配合,但这不很快的,农村与城市不平衡是很危险的。

2. 停战协定,一切力量反对苏区,我们拿城市不容易,党要尽可能来改变不平衡。

3. 我党对协定估计,日本可以占很大的领土,更大的瓜分,停战协定增加革命的危险,使国民党暂时的集中力量反对革命,中国党看到这危险与这危险战斗。

4. 所以反帝运动更要注意:将武装民众进行革命民族战争的口号更要加紧,必须认识推翻国民党是进行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5. 敌人军队我们要分裂他们,这点全党还没有深刻的了解,所以发生对于义勇军及其它军队中的工作就生出弱点。

6. (略)

7. 农民斗争的左右的倾向的打击——自发斗争不领导,及冒险投机等。

8. (略)

9. (略)

(录自《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七——一九三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① 以下各段,原稿字体不同。

中国当前的政局

(1933年6月)

米 夫

中国的事态雄辩地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关于革命和战争新阶段的决议是正确的。在中国，既发生了革命，又发生了战争。

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日始，迄今行将两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从未遇到中国卖国将军们任何认真的抵抗，两年来它占领了满洲、热河、察哈尔省部分地区和华北部分地区。生息着五千多万人民的国土沦丧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但是，日本军阀并不以此为满足。日本帝国主义者竟公然鼓吹建立“大陆帝国”的计划，力图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诚然，他们现在和南京政府订立了停战协定，但可以断定，这个协定必然是短命的。为了制造进一步入侵蒙古和中国关内的口实，日本人在占领区毗邻地带不断武装寻衅。为了实现自己的侵略计划，他们利用了在其淫威下建立的华北各个傀儡政府和所谓的满洲军，还利用了一些新疆叛军头目，这些人毕业于日本军校，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直接代理人。

日本统治集团的对华侵略政策必然要遇到其他帝国主义的反对，因为它们不能容忍日本的扩张，它们自己也在觊觎中国这块肥肉。日美间的矛盾最为尖锐，很可能会酿成战争。

我们还记得，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后，正是列宁屡次指出，远东很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策源地。列宁还强调指出，中国正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填满其欲壑的牺牲品，因而也是它们纷争

不和的根源。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瓜分中国这块肥肉时的矛盾,必将导致新的战争。列宁关于这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预言,从来没有像现在我们经历的时刻这样符合实际。

另外,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大大增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力图把它占据的中国领土变为进攻苏联的东方战略基地。他们在反苏挑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他们受到其他帝国主义的怂恿,同时也是企图以反苏的冒险行动取得其他国家资产阶级政府的支持,承认他们对中国的占领,从而巩固其在远东的阵地。

如我们所见,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发动的掠夺战争正孕育着重大的国际纠纷,很可能酿成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此外,也有可能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因此,中国的事态自然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其重要性已远远超出这个有4亿人口的国家界限了。中国当前的时局与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劳动大众的斗争尤其值得我们关注。这一斗争同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一道,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条件下,能够打乱国际帝国主义的全部计划,打破他们的如意算盘。研究中国国内局势,首先必须看到,中国的工人运动规模宏大,它正把中国工人阶级推到全民反帝斗争的前列。

1932年,在中国的国统区卷入劳资冲突的工人超过111万。其中有70万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罢工,还采取了游行示威、武装冲突、占领企业以及其他激烈的斗争形式。就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总数来说,1932年远远超过了往年,是中国创纪录的一年。中国无产阶级在最近一次罢工斗争中表现得异常顽强。失业者上街游行日渐频繁,参加的群众也日益广泛。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正在变为政治的、革命的和反帝的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日益高涨的人民反帝斗争的先锋。

诚然,根据极不完全的报道已可判断,1933年头几个月罢工浪潮有所减弱。据初步统计,今年罢工的次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不过应该看到,正是去年第一季度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地区,日资企业工人的总罢工才转入了低潮。当然,再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当局在这一年进行了疯狂的镇压。目前各大工业城市的工人组织都遭到了破坏。然而,也就在这一年,我们仍看到中国工人阶级不断进行强有力的出击,这证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战斗性和坚定性。下面谈谈 1933 年头几个月发生的几次重大的罢工的情况。1 月份,天津 3000 纺织工人胜利地举行了罢工,还有 2000 电车工人罢工。在上海,1 月份,4000 名烟草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2 月份,上海机械厂爆发了 1000 工人要求抗日的罢工。3 月份,上海南洋烟厂有 2700 名工人罢工,取得了部分胜利。汉口爆发了泰安工厂 5000 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就在这个月,上海申新纱厂爆发了 9000 工人大罢工并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4 月份,大新织造厂 2600 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5 月份,上海英美烟公司有 1.2 万工人在革命的工会反对派领导下举行了罢工。5 月份还发生了汉口民生工厂 5000 工人罢工,南通 1 万纺织工人罢工和天津数千纺织工人罢工。还有工人阶级进行了无数小规模斗争。所有这些事例足以雄辩地证明,中国无产阶级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在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中国国统区的农民运动也在迅猛高涨。中国资产阶级报刊报道说,出现了饥民骚动的巨大浪潮,这个浪潮在中国西北蔓延尤甚。报纸大量报道了各地破产农民群众抗租抗税、反对军阀横征暴敛的消息。农民没收地主的资财,占领粮仓,武装袭击守卫的军警。农民群众的这一斗争越来越具有革命性和群众性,开展得越来越广,遍及全国的穷乡僻壤。

《大公报》在报道安徽寿县农民进行这类暴动的情况时写道:

“群众组织起来了,各个组织都有正副领导人。有 13 个纵队,每个纵队都有自己的指挥员。纵队人数 100 至 500 不等。伤员被送去治疗,有人看护。阵亡者的家属也得到抚恤,费用从募集的银

款和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中支出。在皖东北地区农民全都组成了这种纵队；他们发誓要为了保护他们的领袖流尽最后一滴血，要消灭土豪劣绅以及一切剥削者。他们宣布，第一步是杀掉所有的土豪劣绅，第二步是废除一切捐税。老人、妇女和儿童手持棍棒和镰刀参加农民群众对警察的武装斗争。许多地方的警察因对付不了暴动，不得不溜走。”^①

我们再举几则中国国统区农民斗争的例子。例如，2月16日《新闻报》报道说，浙江慈溪县农民暴动捣毁了县警察局^②。2月17日该报报道了镇海县数千农民捣毁县警察局的暴动消息。3月中旬仪征县有3000乡民暴动。浙江余杭、萧山、临安等县也屡屡发生蚕农暴动。在陕西、河南及其他一些省份，大批逃荒难民加入了各种形式的工农群众武装斗争。在四川的大竹和邻水地区，1932年年底有1万多农民举行起义。在江苏，1932年12月上海郊区发生了1万多农民举行反对土地充公顶债的示威游行。

所有这些都是国民党中国当前时局中非常典型的事例。但是，尤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农民大众日益卷入抗日斗争的消息。例如，2月8日的《天津时报》刊出一则新闻：

“河北定县十余乡发生大规模农民抗日示威游行。游行者手持武器，佩戴‘抗日救国会’袖标。”^③

该报2月11日又报道了一则共产党在中国农村加强活动的重要新闻：

“共产党组织在湖北均县的三个乡的农民中积极进行宣传工作。警察抓到了一个张贴‘苏维埃万岁’、‘支援红军’等标语的农

① 此段引文系据俄文译的，原文未查到。——原编者

② 《新闻报》的原文是“焚毁保卫团房屋”。——原编者

③ 引文原文未查到。——原编者

民。有十个乡发现共产党的传单和宣传画。”^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过去那些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只是自发地和无组织地进行斗争的地方,现在农民群众也开始投身苏维埃运动了。华北各省农民群众的斗争同中国工农红军的斗争、华中华南各省的苏维埃运动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了。例如,1932年初华北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1932年10月陕甘边区建立了红军第26军,其影响远及九个县。1932年10月,山东省兖州县有50个乡发生农民暴动。起初他们拒交田赋,后来成立苏维埃,分了地主的田地。

游击战遍及日本帝国主义各占领区。虽然几个主要军团(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都失败了,但是由于工人的组织作用日益提高,群众性的游击运动仍在继续发展。这就是中国国统区中工农运动的现状。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使中国工农大众群情激愤。侵略战争刚一开始,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蓬勃兴起,如火如荼。工厂、学校、机关纷纷成立各种抗日团体。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和罢工的浪潮,连绵不断,此起彼伏。日本军阀的每一侵华行径,都激起了更为强大的反帝斗争怒潮,迫使更多的劳动群众投身抗日斗争。

国民党头目玩弄种种花招企图掩盖其卖国罪行,维护其影响,然而这是枉费心机的。尤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对内对外政策就全面破产了。越来越多的群众看清了国民党统治者投降卖国的嘴脸,看清了正是他们使国家陷于国民经济崩溃的绝境,给帝国主义侵略扫清了道路。国民党军阀这个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统治营垒正日趋崩溃,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将领试图成立新党以取代声名狼藉的国民党。例如,19路军

^① 引文原文未查到。——原编者

军部就提出了一个建立所谓工农社会党的计划。一些原国民党左派人士企图建立一个独特的党。而蒋介石则不遗余力地组建一个法西斯式的党,主要是把南京军界的各级军官拉入党内。

国民党军阀营垒日趋崩溃,而中华苏维埃运动最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这两种情况,我们应加以对比。在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的情况下,苏维埃运动的这些成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华中华南诸省部分地区暴动的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政府军进行残酷的武装斗争,已有四年多了。南京国民党在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下对中国的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①。现在我们可以对最近一次,即第五次^②“围剿”进行总结了。有一个美国观察员,首次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作了较为真实的评论,特别是详细评述了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其新闻稿称之为第四次)“围剿”苏区的结果。他写道:^③

“1931年冬,共产主义运动扩大长江南北(据最保守的估计,此时各类红军兵员总数为12万—15万人。1931年12月共军就在靠近汉口几里的地方作战,1932年初连南京也受到了共军的威胁。在华南,1932年春,红军毅然东进福建,几乎占领厦门。由于外国炮舰麇集厦门,才使城市免于陷落)。1932年夏秋,蒋介石调兵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投入了15个师,都是用法国轻机枪,德国自动步枪武装的,还装备了外国飞机,有外国飞行员参战。派去‘围剿’共产党势力的部队已从共军手中夺得鄂豫皖苏区根据

① 应为第四次,因米夫此文发表于1933年6月,而第五次“围剿”时间为1933年9月。——原编者

② 应为第四次。——原编者

③ 比森:《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研究》(Bisson: Complete Survey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发表在纽约《美国对外政策学会公报》(Bulletin of the U. S.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上,1933年6月3日《密勒氏评论》(The China Weekly Review)转载。——作者

地大部。红军一部退入山区，而红军大部显然转移到陕西去了，因1932年11月他们曾使西安面临被攻陷的威胁。这支约有6万人的部队向南转移，于今年年初入川。川东北大部现已陷入共军手中。最新消息说明，共产党在鄂豫皖的巨大胜利使南京1932年‘围剿’战果几乎全部化为乌有。

尽管共产党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均处于劣势（目前红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稳步改善。譬如，1931年5月，他们就已拥有768挺机枪、29门榴弹炮和74门迫击炮），他们仍能挫败国民党精心组织的进攻。其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苏区农民群众的支援源源不断。红军不仅有许多战士来自农民，其侦察队和宣传队也都由农民组成。由于红军常常被描绘成‘土匪’，有必要对红军的实际成分作如下说明：红军中农民占57.5%，起义士兵占28%，工人占5.75%，土匪占8.75%（见《日本白皮书》，附录A—3，第16页）。总之，在中国，土匪乃是丧失生计的农民。

当地人提供的消息使共产党军队的司令部可以迅速准确地得到关于政府军调动的情报。同样，农民对占领苏区农村的政府军坚持不懈的宣传，是政府军士兵大量开小差的一大原因。红军除了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这一优越性外，还制定了一套战略，使他们能充分发挥熟悉山区情况这个长处。此外，红军战士还受到战斗热情和斗争信念的鼓舞，而这一点正是敌军所根本没有的。”

资产阶级报刊因无法继续掩盖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力量和规模，不得不作出上述报道。中央苏区节节胜利，南京的十余个师被歼，红军缴获大量战利品，四川战绩赫赫，老苏区不断扩大，新苏区纷纷建立。这一切说明，国际帝国主义镇压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希望破灭了，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苏维埃运动在中国是根深蒂固，大有胜利前途的。

那么，中国当前的政局究竟如何呢？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侵略战争，统治集团日趋崩溃，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蓬勃高涨，工运、农

运和反帝运动大发展,苏维埃运动的胜利震惊世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肯定了中国存在着革命形势和中国广大地区苏维埃革命取得胜利的事实。如我们所见,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一评价。

译自《布尔什维克》杂志,1933年

第12期,第82—87页。

陈永秀译 杨淑娟、郑禄校

(录自《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

(1933年)

王 明

大家知道，在1931年中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通过了经济政策底基本条例，并根据这些条例的原则而通过了劳动法和土地法。

这些文件，至今还是苏维埃中国经济政策底根本指南。

现时，在中国苏区里，产生了一些新的情形，发生了一些新的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又特别来研究苏区经济政策问题，并且通过了好些决议以补充和发挥从前的指示。

1931年中国苏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经济政策，是根据着些什么根本思想为基础呢？

第一，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经济政策底决议所根据的第一个思想，就是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中国革命在现在阶段上底资产阶级民主性，就是制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时，足以决定一切的原则。同时，我们很郑重地顾及到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所给的指示——就是估计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因此，中国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底基本任务，就是为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及国内封建残余而斗争。同时中国共产党绝不忘记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话，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在工农革命民主专政阶段上，在经济中，资本主义关系不能不成为经济结构上的基础；因为小的简单商品经济在苏维埃区域内占优势，它构成资本主义底基础，并无

时无刻不产生资本主义。

因此,构成中国苏区经济政策底基础的第一个和基本的思想,就是苏维埃要把自己的主要火力集中去打倒在华的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残余,以便保证中国底民族独立和急激地改良城市和乡村劳动群众底物质生活。

中国苏区经济政策所根据的第二个思想,就是苏维埃政权现时所处的客观情况,即是中国苏维埃所处的军事环境。这种思想的主要基础,就是为要顺利地组织中国工农群众反对中国反革命势力底武装斗争。这种思想的主要根据就是斯大林同志底这一指示,即是“没有建设工作就不能进行国内战争”。

总而言之,我们经济政策底第二个思想,就是要使这种经济政策能最高限度地保证红军及苏区劳动者,在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武装斗争中取得胜利。

构成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的基础的第三个思想,就是中国革命底前途。即是根据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关于这个问题所给的指示。斯大林同志当时说:“中国将来革命政权的性质,将类似于1905年在俄国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是工农专政,不过有这样的区别,就是它主要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这将是使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更正确些说,——走到社会主义发展底过渡政权。”(见斯大林著:《论反对派》,俄文1928年版,429页)^①

因此,中国苏区经济政策底第三个基本思想底出发点,就是工农专政是使中国走到非资本主义发展底过渡政权。

这些就是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实质底三个基本思想。

由此可见,中国苏维埃政权目前经济政策底实质,就是在于巩

^① 参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28页)。

固和发展半殖民地国家的工农专政及顺利进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底国内革命战争。由此显然可见,1931年中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问题底决议——完全根据这些原则决定底决议,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什么中共中央及苏维埃政权近来在经济政策方面又要加以一些补充和确定呢?

经济政策上这些补充和确定,是根据现今中国苏区的具体环境所产生的,这种环境的许多特点,在两年以前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底决议上是未能估计到的。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苏区所处的长期的不断的战争底条件。这种战争,有的地方延长了三四年,有的地方已延长了五年之久。这种情形使苏区底经济状况受了很大的坏影响。凡是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地,凡是受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区域,一切农业和工业都被破坏了。此外,国民党近来更特别加强了对苏区底经济封锁。除此以外,苏区内(特别是老苏区内)苏维埃政权前此所利用以供给红军的粮饷和军需底来源,现在逐渐减少或消失着。

以前红军底供给是怎样来的呢?

此前红军供给底主要来源,第一,是没收地主、军阀、官僚、绅士等方面的财产及储藏品;第二,占领新区域和新县城市;第三,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饷军装;第四,苏维埃政权在苏区内征收赋税。现在的情形是怎样呢?现在这些方法,其中很多都少了成效。因为:(一)在旧苏区内,地主、绅士、军阀等已经没有了。因此,在这些区域内再没有什么可以没收了。(二)至于进攻新的县城,那末,现在这方面的情形是怎样呢?在老苏区方面,这个问题有许多困难,如江西中央苏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江西,许多县城都早已操在苏维埃政权手内,反动派手内暂时剩下的只是南昌、抚州、赣州等等这一类比较大的城市以及那些他们筑有强固工事的县城;这些城市,中国反革命派得着帝国主义的帮助,在军事技术上

筑有强固的防御工事,要占领它们,不是容易和简单的一回事。要占领这种城市,需要有很大的努力,需要相当高度的军事技术,需要有大的准备工作。当然,这并不是说,红军不力图占领这些城市,而这只是说,要占领它们,需要相当时间和适当的政治环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苏维埃邻近的城乡里的地主、官僚、豪绅等,早已将金银细软及一切动产移到上海等大的中心城市里去了,所以近来我们占领了县城,时常多半得不到很多财物和粮饷。(三)再则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械,现在也比以前更困难些。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机关在长期内战过程中,学到了一些教训。就是如果以前国民党军队总是不预先经过仔细侦察,便带着粮饷军械等等深入苏区;那末,现在国民党军队在进攻苏区时,已开始采用更谨慎的方法了。例如:还在去年蒋介石就发下了命令说:任何国民党军队,不得向南昌司令部或者武汉总司令部底相当指示和命令,不得擅自单独向苏区进攻。先要派出飞机侦察,以察明红军底布置、兵力、地势等等,然后才可以开始进攻。因此,虽然近来中国红军屡次得到了大胜利,可是所获的军需品、粮饷等等,有时候比起过去来反而还少些。国民党司令部现在多半把粮饷军需留在后方,这不能不影响到红军底相当战利品底数量。最后,(四)讲到征收赋税,由于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苏维埃政权在征税时不能不遇着许多客观困难。

以上所举的苏区生活上这一切新现象,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及苏维埃政府对经济政策问题之严重注意。中共中央及苏维埃政府最近在经济政策方面定出了好些具体办法,其目的就是要在现有条件之下来改善中国苏区内的经济状况。

此外,必须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苏维埃政权一连存在几年底苏维埃区域;同时,这些区域在最近时期大大扩张了。这些条件,使我们有相当可能在这些区域内来实行恢复及发展经济底经济政策。事实上,要多多少少地实行比较经常的经济政策,

需要些什么最基本的条件呢？在我看来，至少要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政权相当的稳固；第二，政权的领土相当的广大。

从前，苏维埃政府底经济政策主要地是带着宣传鼓动的性质，即是说，它的目的是在于向民众立刻指证他们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生活状况，与他们在旧统治之下的生活状况有何等显著的差别。当时经济政策之所以多带宣传鼓动性，主要地是因为当时苏维埃政权比较多少巩固的苏区简直很少，它们大多是带有临时性质。红军占据了某一区，可是又不得不旋即退出，再向前进到别一区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然不能实行比较经常的经济政策。现在不同了，现时我们已有如江西中央苏区这样的区域，那里苏维埃政权广及于几十县，其中约有十县已经这样巩固，在最近一年多来，国民党军队不能侵入。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不仅巩固了这几县，而且凭据这些根据地，向国民党军队举行了严重的进攻，结果大大地扩展了中央苏区的领土。

由此可见，现时我们已有领土相当广大和政权相当巩固的苏区了。这些情形，使中共和苏维埃政权可能而且必须对以前所施行的经济政策，加以好些补充和改正。

在制定和施行中国苏区经济政策时，也必须要估计到一种情况，就是中国苏维埃政权虽然推广了和巩固了，可是它至今还是处在经济落后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城市中主要都是手工业和手工工厂工业。就整个区域说来，主要的是农业区域。

以前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决议（连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底决议在内），其出发点都是预计苏维埃领土会迅速推广，预计可以很快夺得比较大些的工商业中心，——可是这一点至今还没有做到。

这一切就是现时中国苏区内的新现象。这些新现象使中共去加以研究经济政策问题，并给过去所定的经济政策作出好些补充和确定。

可是问题不止如此。

引起对于经济政策加以补充和确定底另一种原因,就是有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员不懂得党在苏区内经济政策基本原则底实质,而在实际上曲解党和政府的决议。例如关于现今苏区经济政策底性质问题,在实际上,而且有时在理论上,都有个别工作人员犯着时而“左”倾,时而右倾的错误。例如有些同志抱定“左”的立场,其表现就是他们“害怕”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在苏区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了。由此他们就作出结论说:中国苏区内主要的和基本的敌人就是富农,因此,中国苏区底基本任务,就是与富农阶级作决死的斗争。根据这种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底理论,便产生出苏维埃政权个别机关底不正确的“左”倾实际行动。这些工作人员不懂得,中国社会阶级力量底对比,无产阶级底组织性,贫农在无产阶级周围团结的程度,都还没有达到现时就可以顺利地打击富农经济底资本主义方面的地步。现时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和可能性来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些条件之下,企图不仅铲除封建制的残余,而且铲除资本主义的关系,一定会遭受失败,一定容易弄到无产阶级与中农群众及独立手工业者之间关系之破裂。

可是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也有右的倾向。右倾分子认为:在工农民主专政时候,既然资本主义(因有农民及手工业者底简单商品经济为根基)依然还是基础,那末,我们现时就丝毫不能作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底斗争。因此,他们说,革命转变问题,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应该从议事日程上取消,因为这是遥远的将来的问题。根据这种立场,就有一部分中共党员在实际上犯右倾的错误,完全抹煞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反富农的斗争。右倾分子不懂得,苏维埃政权底成绩,红军底胜利,都是实际上创造使工农政权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底前提,都是实际上创造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底前提。所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底前途问题,无论如何不能从议事日程上撤销下去。

因此，中共中央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新决议，关于经济政策底性质加以明显的确定。中央指出，现时在苏区内，资本主义不仅还存留着，而且继续发展着，因为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无时无刻不在产生资本主义。

必须明白，我们暂时还不能在中国苏区内消灭资本主义，而只是准备将来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前提和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在给经济政策所作的补充和确定上，明显而具体地指出，在中国苏区内准许土地买卖（虽然是在苏维埃政权底监督之下），必须坚决实行贸易自由，准许在工商业方面私人投资等等。

可是，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资本主义也有各种不同的。中国苏区内的资本主义与寻常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不同。

第一，这是所谓“民主的”，群众的，主要是由小农生产及手工业生产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是以富农、中小商人、手工工厂作坊老板及雇用人工的手工业者等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

第二，苏区经济上除了这些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之外，还有其他的经济形式。首先是农民的、手工业的、小的、简单的商品生产，这种生产，目前在数量上占着主要的优势。十分显然的，在苏区底现时条件之下，这种小的和中等的商品经济替资本主义造成最广大的基础，然而另一方面，却不能把简单商品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这里须要指出苏区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和平分土地）实行底最大结果之一，就是贫农减少而中农在乡村中成了主要部分。

第三，苏区内除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简单商品经济之外，已有别种社会经济形式，这就是苏维埃国家企业，首先就是公共企业——合作社（消费的和生产的），这些企业暂时还很薄弱，可是它们有向前发展的一切前提。

第四，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权，不仅是不为资本主义底发展而斗争，而且把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造成一切必要的前提

和条件,以便过渡到中国革命底下一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底阶段,当作自己的根本任务。因此,目前苏维埃并不提出自己力量还不能完成底任务,就是说,还不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是利用它(在苏维埃政权机关所能做到的范围内)以谋振兴苏区的经济生活。苏维埃对于这个问题底政策,其主旨应当是保持无产阶级与贫农、中农的联合,使中农脱离富农底影响,巩固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底领导权。

这个问题上的“左”右倾向,都一定要产生出不正确的政治结论。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把这个问题各方面解释得明明白白。

现在来从红军顺利进行武装斗争及改良苏区内劳动者物质生活底观点上,来讨论苏区经济政策问题。有一部分中共党员,甚至有个别的负责同志,曾对于这个问题有过不正确的观点。有一部分同志曾把军事胜利问题与苏区内劳动者物质生活底改良问题互相对立起来。有些中共党员,甚至个别领导同志,认为现在是军事时期,军事环境,因此改良劳动者底物质生活问题现时完全不能提出来,而一切都应该只服从一个任务——军事胜利。当然,现时中国苏维埃政权底政策,应当首先适合于与国民党军事“围剿”作顺利斗争底利益——这是很对的。可是这绝对不是说,在作战时候,在武装斗争时期,苏维埃政权便丝毫没有办法改良工农生活。特别要知道,要不改良苏区劳动者底生活状况,则红军底胜利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正是因为革命将工农生活状况改良了许多倍,革命使群众底幸福提高了很多,所以劳动群众方面才有极大的热忱、努力、英勇和牺牲决心,来争取红军底胜利,来为巩固红军,扩大红军和扩张苏维埃领土而战斗。同时,苏区的事实也指明出来了,虽然在军事时期,改良劳动者物质生活底事情很感困难,但绝对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然而有些人却硬把这两个问题彼此对立起来。他们以为:或者是顾到改良群众底物质生活,或者是顾到红军底军事胜利。关

于这一点,甚至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个别负责人员还有过不正确的意见。他在全总底一个会议上说:在苏区内和在国民党区域内一样,罢工是工人为改良自己物质生活底唯一良好方法等等。甚至有些人关于这一点造出许多理论,这些理论似乎是“左”的,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实质上是右倾的,例如这些理论中之最著名之一的,便是所谓苏区内“阶级斗争无限”论。这个理论底发明家有什么根据呢?他们说:斯大林同志曾指示过,武汉时期中国共产党员底错误之一,就是他们曾经不愿去组织工人阶级为改良自己物质生活底罢工斗争。这些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苏区内不应重复武汉时期的错误,因此,无论如何一定要煽起工人罢工来取得物质生活底改良。这种表面上好像保护工人阶级利益底“左”倾理论,实际上是将斯大林同志底指示加以直接曲解,是对于工人阶级利益这个问题底一种最坏的、纯粹孟塞维克式的了解。实际上,这不是别的,而是把部分工人底局部的、暂时的、行会式的利益与全阶级的利益与整个革命底利益对立起来。至于武汉政府与现时苏维埃政权之间有显然根本的差别,我想这是用不着多讲的。现今的苏维埃政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以苏维埃为形式的工农专政。当时武汉政府还不过是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底政权。

现时苏区内政治上和经济上最重要的和最主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这就是红军底军事胜利!没有这种胜利,便不能有劳动者物质生活底改良,便不能有苏维埃领土底扩张,便不能有中国革命底最后胜利。

由此可见,苏维埃政权底一切设施(经济政策也在内),应当以组织红军底胜利的武装斗争为主旨。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应当服从无产阶级——整个中国革命底领导者——底全阶级的利益。当然,这绝不是说,在苏区内我们要“限制工农的阶级斗争”,或者苏维埃不应该尽可能地来尽力改良工人阶级底物质生活,或者苏区赤色工会不应当尽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利益的职务。恰恰相反,必

须着重指出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和必需的,必须懂得,在工农专政苏维埃统治之下,阶级斗争采取着最尖锐的和最紧张的性质和形式,所以此处所讲的,绝不是有丝毫限制阶级斗争的意思,而只是讲的阶级斗争形式怎样更适于革命向前发展和胜利底问题。同时,这并不是说,共产党人在苏区内要反对一切罢工,例如工人为反对那种经常违反苏维埃政权关于工人问题底法令底雇主而举行的罢工等;——可是,同时另一方面,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也不应在苏区内不顾一切具体条件而定要煽起罢工斗争。因为苏维埃政权在工人群众帮助之下有许多有效办法来对付雇主,采用那些办法的时候,将无须经过停工手段就能得到应有的效果,而停工则一定会减少苏区内本已有限的商品生产。

由此可见,有些中国共产党员,甚至个别的领导同志,对于中国苏区底经济政策底性质和内容有不正确的了解。

党最近所以对于苏区经济政策问题加以一些新的补充和修正,除了以上所举的各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对经济政策问题底基本决议,虽然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其中还有个别的不妥当的辞句,这些辞句有时可以引起不正确的了解和解释。

例如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法,有两条是关于与富农作斗争的。在该法第八条上说,“富农在土地被没收以后,多余房屋、农具、牲畜及水碓、油榨等等,亦须没收”。在该法第三条上说:“富农在没收土地后,如果不参加反革命活动而且用自己劳动来耕种这些土地时,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我们苏区内的同志们有时候如何在实际上了解这一问题呢?他们有时候把这两条法令当作是要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指南针。因此,我们看见好些地方,特别是湘鄂西苏区,那里的苏维埃将一切富农底机器、牲畜、农具、商品一概没收了,至于完全禁止土地买卖和租佃,禁止雇用人工等等,那更不消说了。凡此一切,在相当限度内,是由于土地法在这

方面底不妥当辞句产生出来的。

现在来讲一讲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劳动法。在劳动法第四条上说：“雇农、林业工人、季候工人、交通工人、苦力、家庭女工、厨役及其他有特殊劳动条件的工人，除享受劳动法的一般规定之外，并享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及中央劳动部于这些工人所颁布的个别劳动条例的规定。”从这条法令上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这几种工人底劳动，除了享受劳动法规定的一切之外，还要享受苏维埃政府底特殊的和补充的许多法令底利益。

实际上有时候从这里得出了什么结果呢？

有时候实际上所得出的结果，便是有些同志认为：这部分工人除了八小时工作制，除了为增加工资，改良居住饮食等等的斗争之外，好像还应比其他一切工人享有更大更多的特权。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一类工人恰恰大多数都是在农业上作工，同时不仅在富农家里，而且还在中农家里；因此，如果这类工人将不仅要求履行普通由劳动法所规定的条例，而且还要求补充的优待，那末，这对于那些为自己经济而雇佣他人劳动底那些中农阶层，简直是实际上做不到的。规定农业工人底特殊雇佣条件，当然是必需的。但是它们应当是专门为这类农业工人制定，同时并须要估计到工作底季候性。此外，劳动法上第五十一条还有这样的规定：“工人或职员，被征到红军中去服军役，因此而失去他们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下，须预先发给他三个月平均工资。”这种条件，在中国苏区底现今条件之下是难得实行的。

最后，劳动法没有充分考虑和确定工业中的工匠和学徒底劳动条件问题，而这些工人在中国苏区内占工人群众底大多数。尤其是对于各种雇主没有分别看待。对于富农、中农、中等的和小的手工业主雇用人工的条件没有分别看待。这一点在某些苏区的苏维埃机关底实际工作中已经产生了不良的结果。因此，中共中央最近制出关于经济政策底决议，决定一些确定和补充，使这一切问

题都有必需的明确的规定。同时,关于与富农作斗争方面及对各种企业主分别看待办法方面,都指明了具体的任务。中共中央特别着重指出:中国苏区底全部经济政策,应当服从红军胜利斗争底任务,此外,还应当以中国苏区底经济状况为出发点。

因此,中央决议上指出,苏区内的职工会不仅应当注意保护工人阶级底日常经济利益,而且还应当积极参加以下的工作:提高苏区内的经济幸福,巩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发展工业和农业。

因为有了这一切问题之发生,所以共产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最近对于经济政策问题费了许多时间和注意力,决定许多补充和确定的经济条例,以便把这些问题都弄清楚明白。

这些指示中基本的和主要的之点,就是改良和增加生产,振兴和改良商品流通,以便保证红军底给养和改良劳动群众底物质生活。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内怎样实现这些决议呢?在这方面已经作过些什么呢?现在还须要做什么,来真正实行关于改良苏区内经济状况的指示呢?

要改良苏区的经济状况,首先就要振兴农村经济。

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

在这方面已有了一些经验和相当好的成绩。

苏维埃政府怎样在中国苏区内振兴农村经济呢?

第一,用推广耕种面积的方法。

在苏区也与在全中国一样,有很多荒地,对这些荒地加以相当的开垦,便能变为耕种地亩。例如在赣东北苏区,在去年四个月内开垦了1.8万亩荒地,以后又通过了计划,决定在一年之内还要将耕地面积推广2.5万亩。如果赣东北这个面积不大的苏区,农民能在四个月内变1.8万亩荒地为耕种地亩,那么,这就明白证明:苏区内有很大可能来推广耕种地亩面积了。

第二,苏区内可以看到园艺农作业(蔬菜瓜果等)底发展。从

前农民不大注意这种经济，现时则因为苏维埃政府底督促、奖励和帮助，他们已开始增加自己的园艺经济。

再就是关于增多收获，改良土质和增进肥料问题。以前农民受地主剥削的时候，或者没有，或者可能简直不愿意来改良土地的质量。现在在苏维埃政权之下，他们已经积极起来用增用肥料等等方法来大大改良自己土地的质量了。我们在赣东北苏区、中央苏区及鄂豫皖苏区都见到这类的现象。

关于组织犁牛站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意义。雇农、贫农和中农没有牲畜耕具，很难去经营经济。现在苏维埃政权用收买耕牛、没收地主牲畜及农具底办法组织犁牛站，以帮助没有耕牛及农具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去耕耘土地。

再则耕作互助社之组织也有大的意义。苏区农民经过这种互助的方法，可以大大增加自己的收获。

生产突击队等这类的劳动组织已经在苏区发现了。革命竞赛在播种和收获运动中都在广泛实行。例如在赣东北苏区内，苏维埃政府在去年播种运动时，曾从公费中抽出 1000 大洋以及生活品来奖赏农民突击队员。

最后，灌溉制度底改良也有大的意义。例如在湘鄂西苏区曾作了许多修堤工作，其目的不仅在防止水患，而且在改良灌溉土地方法。

以上所举的一切办法，不能不在中国苏区农业改良和扩展方面发生良好的效果。这一点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了。例如红军主力暂时退出鄂豫皖苏区及湘鄂西苏区以后，国民党曾组织专门所谓“匪区视察团”，名义上是考察苏区状况，实际上是借此来大作反革命宣传煽动；然而《匪区视察记》的通讯不能不承认，苏区农产状况比非苏区要好得多。有些消息不能不承认说，赤区的稻收颇丰，赤区稻禾比国民党区生长得好得多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红军第十军区域内（即赣东北区）有很好的结果。例如从苏区来的

一个文件上说:从红军第10军胜利形成之日起,苏维埃极力振兴农业,同时,说这一区的米、棉及其他农产品,不但足以保证红军本身及本区群众消费,而且足以输入邻近苏区和国民党区内作商品交易。

苏维埃政权尽力设法来保证红军底粮食。

苏维埃政府极力节省粮食底消耗。例如在第二军红军区域——在水灾时期——苏维埃政府及党部通过了决议,规定除红军兵士外,凡后方公民一律只许一天吃一餐米饭,一餐米粥。前线作战的红军则每天吃两顿米饭,一顿米粥。

其他苏区也实行了同样的节省办法。在粮食困难时期,这些节省办法曾有明确的效果,帮助打退国民党军队底进攻。

同时,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底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办法特别在湘鄂西苏区实行得厉害,那里每年举行四五次的土地重新分配。这种办法一定要减低农民对于改良土地及提高生产率的热心,而有时则简直使农民不愿意耕种自己的土地。因此,中共中央在最近关于苏区经济政策底决议案上,特别指出这种办法之不正确,指出必须尽可能地给贫农、中农固定保留他们的所已经分得的土地,避免不必要的重新分配。我党中央底这个指示,在振兴苏区农业方面,无疑义地要发生良好的效果。

现在来谈谈中国苏区内工业发展的问题。

苏区底工业状况比农业状况坏得多,因为直到最近以来,苏维埃政权没有充分注意工业问题。这只要看一事实就可以明白,就是在最好的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在较久时期内,曾没有正确的办法对待手工工匠、手艺工人及手工作坊工匠等。没有充分注意到他们的组织,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劳动组合。有许多手工业劳动者既没有被吸收加入劳动组合,也没有加入职工会。此外,主张凡在农业上服务的手艺工人(即所谓独立劳动者),不得加入职工会,

因为他们在农民家里作工；而农民不是资本家，所以在农民家里作工的手艺工人不能加入职工会。中央苏区全总执行局底工作报告上很明显地说，手艺工人、独立劳动者以及工匠们，因为这样而表示很不满意，——其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苏维埃底经济办法不仅采取消极态度，而且有时还取反对态度。凡此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苏维埃和地方党部曾没有正确的办法对待他们，这是第一。

第二，在许多苏区内，本地工业如纸业、茶业、糖业，至今没有充分发展，而许多地方简直被国民党破坏了。苏维埃机关没有采取必要的办法来恢复和改良这些生产。这当然不是说，苏维埃在这方面丝毫没有做什么，他们多少做了一些工作。例如苏维埃政权首先注意到与军事组织直接联系的工业，例如兵工厂、制弹厂、制造军装的缝纫作坊等等。这些企业到处都有，不仅在每个苏区，而且在每个大队红军之下都设立了。此外，还有好些本地工业部门，现在已组织成为生产合作社，例如以前在湘鄂西的草帽业、草鞋业、竹器业等等。

从这可见，苏区内有可能来恢复和发展工业。要是拿中央苏区来讲，那末，那里有茶、纸、漆、桐油、木子油、麻、大麻、黄麻、米、竹等等，这些东西，以前本地手工作坊的生产，不仅足以供给本省，而且输出去供给全国各地。要是拿鄂豫（皖）苏区来讲，那末，那里也有茶、米、竹、丝、麻、茯苓等等。至于四川苏区，更不用说了，那里差不多什么都有。如果有许多苏区都感觉食盐缺乏，可是四川连盐也有。因此，应当利用自己一切客观的可能性，利用自己的一切富源，来恢复和发展各种的生产。

直到最近时候，还有些中共党员只是看到问题底一方面，他们只看到中国苏区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只看到苏区主要地只有手工业，手工工厂作坊等，因此他们说，要实行经济政策，尤其是整顿工业，这是很困难的任务，或者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务，——这当然是严重的错误。

说中国苏区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这当然是事实,可是这句话内只有几分真理。落后的经济当然使苏区底情形困难,可是,这种现象绝不妨害尽量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性。因为要是大机器工业的话,要想恢复生产,需要大批资本、机器、原料、煤炭等等,那末,手工作坊工业并不需要这一切,而只需要人工、原料及最简单的工具,这些原料及工具等在各农家及手工作坊内就有的。

为改良经济状况起见,苏维埃政权可以利用那种至今还在落后的中国乡村中存在的情况,——就是家庭工业与农业结合,手工业与农业结合。例如以手工织布业来讲,差不多每个农家都有手工织布机。要是过去有许多农户因为不能在市场上销卖自己手工业的生产品,因为他们的制造品不能与机器商品竞争,以致很久不在家庭里织布了。那末,现在在苏区情形之下,他们自己织起布来,不仅可以供给家庭之用,而且同时可以出产一些到市场上去卖。苏维埃政权应该利用这些自然经济底成分,因为外面封锁的环境迫得要走这一步。我们有这样的“经济学家”——共产党员,他们轻视手工业和家庭工业,把它们看作只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经济,主张完全不要利用他们,这种观点只不过证明他们的知识是死板无用的,它们不懂得在具体环境内决定问题。

苏维埃政权应当组织合作社和劳动组合,来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工业,同时它也应该去鼓励私人手工业及私人军工作坊工业。

苏维埃政权也应该提出一定的款子来帮助苏区工业发展,将这些款子由苏维埃银行或储金互助机关,借给手工业及手工作坊业。要是共产党及苏维埃机关对于组织工业的问题能够予以充分的注意,那就很能改良苏区底经济状况。

现时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困难:许多商业公司及商店都关门了,大商人及中等商人很多跑了。此外,有好些地方苏维埃机关对商业问题都有过不正确的态度,在许多苏区内,有时甚至把商业机

关没收了,农民有时把往来的货物没收而彼此瓜分了。这种情形自然要使商业发生困难。

要使苏区的商品流通兴旺起来,首先就要坚决实行贸易自由的原则,同时要反对投机买卖及尽力保证红军的经常供给。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应当禁止经济政策方面的一切过早办法,这些办法,事实上只不过使苏区经济状况变坏。

中共中央最近的决议明白说到,苏维埃政府在现今的革命阶段上,绝对不应该以消灭商人阶层和取消私人贸易等等作为自己的任务。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与投机买卖作斗争和保证军事胜利底条件之下,坚决地实行贸易自由底原则。

同时,在苏区内须要尽力扩充和发展合作社的组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材料,可是我们已经得到的一些材料,已足证明在好些苏区内已经组织了许多合作社,不仅是消费合作社,而且有生产合作社。例如在湘鄂西苏区,即当去年水灾最盛,经济状况特别坏的时候,还有过100个合作社的组织。在红军第4军区域,还特别召集过一次合作社工作人员底代表大会。

在中央苏区及红军第10区域,也决定了召集这样的代表大会。从苏区得来的好些材料看来,经过组织合作社的办法可以大大地改良苏区内部商品流通。

还要稍微谈谈改良苏区货币制度问题。

我们现时在苏区内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在境内流行的也有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也有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货币。以前曾有过这样的办法,就是当商人来到苏区时,须要把带来的国民党政府货币换成苏维埃的货币,如果在某个苏区内,还没有苏维埃自己的货币时,则由苏维埃政府将国民党政府的货币盖印,然后可以通行。

依我们的意见,后一种办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国民党政府可以禁止盖有苏维埃印记的货币回到国民党区内使用,这样就可使

我们的商业发生困难。而这一点又可以使苏维埃区域的经济状况变坏。

因此,依我们的意见,苏维埃政权对待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应当采取以下的办法:当商人将国民党的货币带来苏区时,只能将它们收来换成苏维埃货币,然后存在苏维埃银行内,以便能用它们去向国民党区域采买货物。至于苏维埃的货币,则须要尽可能地限制印发的数量,此外,还要改良整个银行制度。

除了以上所说的之外,我们认为,为改良苏区底经济状况起见,除货币交易外,还可以组织各乡和各区之间的自然物品交换。在苏维埃政权和合作社底帮助之下,这是完全可能和必需的。

苏区工农银行发行了钞票,这些钞票在工农中间有过很大的信仰,但有时候因为滥发纸币,以致信仰减低了。例如:湘鄂西苏区的钞票,有时候不仅在苏区之内,而且在好些邻近的国民党区域内都有过莫大的信仰,商人从国民党区域来与苏区通商的,都非常乐意收用苏维埃的货币,因为他们要在苏区内采买许多货物。可是后来因为苏维埃将纸币无限发行,于是信仰就有些低落了。

以后该区苏维埃政权,曾采取过许多办法来恢复苏维埃货币底价格。

在中央苏区内,苏维埃工农银行的货币,直到现在都有很大的信仰。这只要看一事实就可以知道,例如:当苏维埃银行发行“冲破国民党五次‘围剿’”底公债票时,苏维埃政府原定在一月内将公债销完,可是事实上半月就销完了。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公债券不仅是苏区人民购买了,而且还流行到邻近国民党区内,甚至在上海和武汉,好些工厂工人都开过车间大会,自动决议捐出一天的工钱来买苏维埃的公债票。这个事实指明,要是苏维埃能够正确地进行银行的业务,就很可以改善苏区底经济状况,尤其在兴旺苏区商品流通方面,一定有很大的作用。现时,当然很难使中国苏维埃的金融完全稳定起来。可是,必须要寻找解决这个问题

的方法,要努力向这个方向走。

再则,要提高苏维埃钞票底信仰,必须规定这样的办法,就是要税收和工资都用苏维埃的纸币支付。而以前有时有些地方的工会工作人员,要求厂主发工资时,不用苏维埃的纸币而用现银。很显然地,要是工会工作人员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末,自然会引起农民拒绝收用苏维埃的纸币。也许有些地方的个别苏维埃机关还要求用现银纳税,而不用苏维埃纸币纳税,那就是很大的错误。

党已注意到这些错误,已要求工会机关和个别苏维埃机关恢复和维持苏维埃纸币底信仰。

除此一切之外,苏维埃政权应当在苏区内设法奖励人民储蓄,在工农银行里附设储蓄部。从苏区文件看来,有些苏区内已经开始注意了储蓄事业,并且已得有了一定的成绩。工人和农民,特别是中央苏区工农民众,对苏维埃政权及红军抱有很大的信仰,他们常常把自己的钱存在工农银行储蓄部里。

还有一点也是属于苏维埃银行的任务,就是帮助合作社机关以及手工业者底私人企业等等。如果苏维埃银行在现时能执行这一切,那末,就可以大大改良中国苏区底商品流通的情形,并且一般地振兴苏区经济生活。

现在来谈谈苏维埃政权底赋税政策。直到最近以来,在苏区内征收以下的国税:第一种是土地税。据我们知道的,在湘鄂西苏区及鄂豫皖苏区,大约按以下的定额征收土地税:富农缴出收获底15%,中农5%,贫农或完全免缴,或只缴3%。同时我们知道,也有这样的苏区,其中税制至今还没有明白规定;苏维埃政权正在设法去解决这个严重问题。苏区底最主要和基本的收入就是土地税。土地税在革命以前原是农民底很痛苦的负担,现在苏区的国税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以前农民把自己50%—60%的收获缴给地主和军阀、绅士们,现在苏维埃政权只要农民缴平均5%—6%的税额。土地税很可以保证红军底给养。

第二种是营业税。这项税是按累进原则而征收的。在湘鄂西苏区及鄂豫皖苏区,大概抽收如下的营业税,就是凡企业资本不满150或200元的,完全不纳税;要是资本在200元以上的,则纳一定的税额——由1%—8%(1万元资本),这要看什么企业、投多少资本等等。此外,还要注意到每个企业每日的营业收入若干。每日营业少的,则完全不纳税,只有营业多的,才纳一定的税^①。

第三种是关税。在苏维埃区域与国民党区域相连的边境上设立关税征收处。在关税方面规定了以下的原则:输入少量货物,丝毫不要缴纳关税;向苏区输入本区所感觉缺乏的货物,可以免缴关税。只是对于苏区所不需要的多量货物,才征关税。

如此,关税额底大小及征收的手续,都要看什么货物和数量多少来决定。

中国苏维埃底预算案政策是很复杂的事情,在这方面,至今还作的不十分完善。

苏维埃区域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加以很大的改良,要设立正确预算制。因此,中共中央在自己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补充和确定上,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应当有一定的预算,根据这个预算,它们可以正确开支经费。要是在苏区内能做到这一点,则不仅有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有大的政治意义。例如:要是在每一乡或每一县,苏维埃政府每隔三个月将自己的预算公布一次,指明用于维持机关人员的用费多少,用在改良经济上的有多少,用在红军给养上的有多少,用在发展教育上的有多少等等,同时将某乡、某县国民党政府底收支表一并公布,则民众可以看得明明白白:什么是苏维埃政权,——中国民众拿这两个政权来比较,立刻就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和苏维埃政权底优点。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政治部翻印件此句为“要是营业收入在50元以下则完全不纳税,要是收入在50元以上则要纳一定的税”。

将预算公布给大众看，有莫大的政治意义，这件事能更加提高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底威信。民众看到：只有共产党能造成廉洁的国家机关，造成廉洁的政府。如此，苏维埃政权将在事实上揭破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对于中国苏区所捏造的一切造谣中伤的话。

当然，除此以外还必须与官僚主义、与浪费苏维埃公款的现象作无情的斗争。必须要与某些苏维埃机关、党的机关及职工会机关中个别分子底腐化现象作斗争。只有经过这样的方法，苏区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真正改良苏区底经济状况。

可是要在苏区内扩展生产和扩充商品流通，除了以上所说的一切办法以外，还要进行顺利的斗争，以反对国民党的封锁。

苏维埃政权是否有可能来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作斗争呢？

我们认为苏区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可能。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实例。例如红军第10军底区域，在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一县内，有一个富商，是该县商会会长，而他恰就是与苏区通商的主办人物。他在一年半内与苏区通商，运了很多货物到苏区内。最近国民党政府侦知了这回事，将该商人枪决了。可是我们有根据断定说，愿与苏区通商的，不仅是这一个商人，而且还有很多同样的商人。

当然，中国商人之所以这样干，并不是出自什么革命同情心，而是因为，在苏区内一方面可以比较高价出卖货物，另一方面可以贱价收买货物。商业的利益驱使商人来与苏区通商。

许多商人愿意到苏区来买纸、买木材等等。在福建，有许多纸木商人因为国民党经济封锁苏区，他们买不着原料，逼得他们关闭了在国民党领土内的企业。这一点引起了他们的大不满意，他们曾公开要求国民党准许他们与苏区通商，因为苏区既有纸，又有木料等等。

有一部分中国商人公开说道，经济封锁不仅打击苏区底经济利益，而且使国民党区域内也发生坏影响。

最后，大家知道，在军阀世界的中国这种特殊条件之下，多少

贿赂公行的勾当。只要向国民党的各下级军官及兵士送点人情,就可以容易运过货物。这种现象,差不多在国民党领土底一切边境上都可以看到。

可是最主要的,是国民党的领土上劳动群众方面对苏维埃的帮助和同情。只要举一个例子:在红军第10军(即赣东北)区域,在五一节这一天——1932年——依苏维埃政府底邀请,从国民党区域到该苏区来参观的有1500工农。他们带了大批货物到苏区来,然后又在苏区得了许多各种生产品。这些工人和农民大家约许了,他们以后无论如何要发展与苏区间相互的贸易。我们此地只引这一个例子,至于国民党报纸每天传出许多事实,叙述劳动群众怎样不顾禁令而与苏区通商的事,真是多不胜数。

因此,苏区党和政府机关在经济政策方面底任务,就是要立刻实行上述的这一切办法。换句话说,就是要立刻实行苏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经济政策所通过的一切法令,以及中共中央最近为改良苏区经济状况而通过的许多指示中所规定的办法。

党决定了的这一切政策,必须坚决地实行,以便保证红军底经常给养,并尽可能地改良苏区内劳动群众底物质生活。

同时,我们当然明白,苏维埃中国经济问题底彻底解决,是与全中国内革命底最后胜利有密切联系的。至少是与国内一切最重要工商业中心内革命底最后胜利有联系的。

苏维埃政府目前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时,需要有很大的灵活性。苏区的经济政策应当是具体的,应当估计每一区底经济情形,应当是随地而各有差别的。

苏维埃政府目前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时,应当估计以下情形:第一,苏维埃应当估计每一个区域底经济发展状况和程度;第二,要注意到是旧苏区还是新苏区;第三,必须估计到,某一区是苏维埃需要巩固起来作为根据地,还是红军临时路过或临时占领的区域等等。如果在这后一种区域内,苏维埃底经济设施应当多带着

宣传鼓动的性质，应当注意向群众立刻表明苏维埃政权底一切优点。

至于在旧的稳定的苏区内，共产党应当实行更灵活的，更适于具体条件的办法，这些办法要能在事实上长期的改良红军给养和改善劳动群众生活。

要是中国苏区党部及苏维埃机关，真能根据这些原则和步骤来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那末，一定就能大大地改良苏区底经济状况。

（编者按：此文月日无考，大概是在1933年下半年）^①

根据1941年12月出版的《六大以来》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① 这是《六大以来》编者的按语。

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中国共产党五中全会通过)

(1934年1月18日)

(一)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在对于目前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已经开始,但在最重要的与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目前正处在走向阶级与阶级间国家与国家间的伟大冲突的新阶段——即走向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的过渡期中。”

五中全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基本论点,并责成全党以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来澈底的实现从这个结论中产生起来的党当前的伟大的负责的任务。

一年来的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十二次全会的论断之正确。全会以后事变发展之总和,正是明显的带着过渡到新的战争与革命的性质。

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飞速的跃进着,他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集体化与文化革命的计划,正向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大踏步的迈进。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之成功,不仅在经济上,更大的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立性,而且在国防上亦大大的提高了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苏联的国际意义及其对于全世界劳苦群众的革命影响,日益增高,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之愤恨与嫉视,他们正在进行各种的阴谋挑衅与军事准备来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他正在疯狂般的准备反苏联的军事冒险。同时,正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国防力量之增

高与澈底的和平政策,使得许多帝国主义的国家不能不在苏联和平政策之下屈服,而与苏联订立不侵犯条约及恢复邦交。

经济危机之发展促使资本主义系统更进一步的崩溃,而且明显的带着战前的性质,各国资产阶级企图用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手段同时亦即是准备新的战争的手段。罗斯福的复兴运动的“试验”,遭受到完全的失败,德国法西斯蒂的诡诈的阴谋,并没有减少失业。资本主义世界中剧烈的进行着经济战争,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之失败,证明帝国主义放弃了谈判与外交辞令,而代之以剧烈的关税壁垒与货币战争,及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准备。而日内瓦“军缩”会议的“结果”,则是美日英法意帝国主义列强的扩大军备的宣言,法西斯蒂德国要求武装的合法权利的喊叫,帝国主义在中国飞机大炮轰炸雷鸣和新的反苏联战争的准备。英美、美日、英日间的冲突,首先在争夺中国方面,在太平洋上正在迅速的增长着。希脱娄^①的登台增加了欧洲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在增长着的帝国主义矛盾前面,国际联盟正处在分崩离析[析]与解体的状态之中。战争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口实之下爆发起来,同时帝国主义者正在企图暂时和缓自己之间的生长着的矛盾,以便首先爆发一个反苏联的战争。世界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正面临着战争的威胁。

波兰、捷克斯拉夫、英国、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之顽强的罢工,波兰农民暴动,西班牙的土地革命之发展,中国苏区之扩大和巩固,印度北方之农民暴动,斯脱拉堡之巷战,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士兵与海军中之骚动,证明虽然革命运动之发展还是不平衡的,但明显的带着走向新的革命与战争的过渡的性质。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地主军阀,则以更加厉害的压迫剥削,更加疯狂的法西斯蒂恐怖,更加剧烈的战争进攻中国民众及苏维埃政权,来回答这个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涨。

^① 今译希特勒,下同。

第二国际下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亚姆斯国际的黄色工会,更在法西斯化的过程中前进了几步。不但德国的社会主义法西斯蒂和黄色领袖完全投降希脱娄,而且在法、英及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亦公开的替法西斯蒂做清道夫的工作,竭力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第二国际正在崩溃为各个独立的社会法西斯蒂政党,这个过渡还没有完结,因为战争还没有爆发。这种崩溃的过程,正是反映着过渡时期之特点。各国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持,正在各自为了自己的主人准备战争。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伟大胜利,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的增長,经济战争,扩张军备,反苏联战争准备,革命运动之发展及第二国际之崩溃,都证明着“走向革命与战争新阶段”的过渡是迅速地如[加]紧着。

(二)一年来事变之开展证明十二次全会之论断——在中国存在着革命形势之完全正确。中国正处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之中,最深刻的民族危机影响到民族生命之一切形态。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已到了新的高的阶段——即是直接瓜分中国的阶段。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保证着这个政策之加速度的进行。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但占领了满洲与热河,而且已经实际地统治了华北,正在经过他忠实走狗——国民党,及组织内蒙的王公,而准备最后地占领整个黄河以北的中国领土,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猛烈地巩固他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及依据台湾为根据地加强着他在福建的阵地,准备着在一个适当的口实之下,公开的占领福建,他的势力亦正深入于广东。日本帝国主义正以全力来争取自己在中国的优势,并将中国变成为自己的奴隶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步骤与军事布置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准备着进攻苏联的战争及争取太平洋上主人翁地位的帝国主义战争。

英国帝国主义赞助着日本的侵略,只不过企图将日本的刀锋离开他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转向北方去进攻苏联。同时他公开地经

过西藏的傀儡进攻四川和青海。在新疆事变的幕后亦明显的看到英帝国主义的血手。虽然英日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是增加着,但是这不会减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相反地,帝国主义所遭遇着的生长着的困难,只有增加他们侵略的贪欲。

法国帝国主义一样的利用安南的优越地位而操纵云南、广西、贵州的统治,并时刻准备着公开地占领这些区域。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狂热的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太平洋霸权的强盗战争。同时他在帝国主义强盗反苏联的挑衅与战争准备上成为更加积极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者尽力的企图维持和加强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经过这个工具来奴役中国民众,使中国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以棉麦借款帮助国民党进攻中国革命和中国民众,摧残中国经济,奴役中国民众。

国际联盟积极的参加和组织瓜分中国奴役中国的计划及反苏联战争的准备。九一八事变以来,国际联盟尽量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领土,摧残和屠杀中国的民众。国联的一些“反日”的决议,与日本之“退出”国联的滑稽戏,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的反映,和用来欺骗中国民众及世界劳苦群众的烟幕弹。

可是不管在瓜分中国上帝国主义者内部的冲突是怎样的剧烈,但是他们都一致地积极地指挥和组织国民党对于中国苏维埃的疯狂的进攻。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中国之存在,是帝国主义者进行瓜分中国将中国变为完全的殖民地的计划的障碍。为着实现完全瓜分与奴役中国的计划,各个帝国主义列强一致的组织反对苏维埃中国的反革命战争,供给国民党以金钱、枪炮、飞机与军事专家,企图将中国苏维埃及几千万苏区劳苦群众沉没在海海之中。

(三)中国的经济状况是一幅崩溃破产失业饥饿的悲惨图画。这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中国之结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更使中国的经济状况极度的恶化起来。

农业的危机已经达到空前的极点。农村经济在完全毁灭的状态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与掠夺,洋米洋麦与人造丝的倾销,军阀的搜括,内战与强迫种雅[鸦]片,巨大的水灾和其他灾难,使千百万农民群众饥饿死亡,流离失所。丝茶与其他的特殊生产品是全部的毁灭了;家庭手工业是被资本主义的倾销消灭了;米麦及其他基本的农产品,在洋米洋麦倾销之下,即使在良好的收获状态之中,亦不能够抵偿成本与劳动力的消耗,及满足军阀地主高利贷的贪欲。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在饿饭,几千百万农民没有饭吃,没有地种,没有地方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在漂泊的难民队中挨冷受饿,忍受着非人的痛苦与死亡。

民族工业也在崩溃的状态之中,重工业差不多全部都被帝国主义霸占着,棉业丝业及其他的轻工业是在破产的状态之中,许多工厂关门,许多工厂减少工作的日子,中外资本家同样毒辣地减少工人阶级的饿饭的工资和恶化他们工作的条件。60%以上的工人是失业了,他们得不到任何的救济,在都市中街道上流浪着,过着悲惨苦痛的非人的“生活”。

农村经济之浩劫,民族工业的衰落,与世界经济恐慌之深刻化,影响到整个国内国外贸易之惊人地锐减,入超更大大的增功[加],国内市场的缩小更使国内商业处于停滞和破产的情况之中。

与国民经济崩溃与浩劫并驾齐驱的是的[的是]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激增。巨额的入超在数量上超过了整个中国的出口数,大批的投资于准备战争与镇压革命运动的军事工业,长途航空线的设立,重工业甚至轻工业中帝国主义的资本已经占取着垄断的地位,大批的借款不仅在财政上资助反革命的统治来屠杀中国民众以尽其清道夫的作用,而且更进一步加紧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和巩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

(四)暴风雨般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上燃烧着。不管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残酷的恐怖和压迫,城市中的

工人更多集合于他们自己的革命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而战斗。不管黄色工会领袖的出卖,反对中外资本家的空前未有的伟大的罢工时常爆发起来。罢工的人数是逐年的增加着,最近两年来的罢工人数远超过于1925—1927年大革命时代。斗争的性质是异常的坚持与顽强,常常为着达到自己的要求,工人群众不惜接二连二的利用罢工的武器。罢工工人的热烈的战斗热情,更加明显的揭露了罢工的革命反攻的性质,工人群众常常以革命的自卫来回答资本家国民党当局军警与工贼之残酷的恐怖。罢工工人与军警之肉搏冲突是屡见不鲜的事实。罢工斗争不仅在地域上普遍到全中国,而且牵动到一切的生产部门。浓厚的政治性的反帝国主义罢工,更加清楚的显露了工人阶级在反帝运动中之领导作用。

农民的抗税、抗债、抗租、分粮的斗争,往往发展到武装暴动,发展到游击队伍的建立。农民自己将土地革命的旗帜非常鲜明地高举起来。为着挽救自己的死亡与饥饿,农民群众坚决地平民式地没收和分配地主豪绅的粮食与土地。在反帝国主义斗争及土地革命的影响之下,国民党的部队的瓦解,是在急速的成熟着。广大的士兵群众的反对进攻红军要求抗日的斗争是在开展着。兵变与暴动不断的产生。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及自己的封建剥削者压迫之下的少数民族,亦开始被吸引到革命斗争的舞台上来,为争取弱小民族的解放,为争取土地,为推翻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军阀官僚和自己的封建剥削者而斗争。

国民党的投降与卖国,及他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残酷的压迫,非但不能阻止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发展,而且相反的使反帝运动正在脱离民族主义的幻想与国民党的影响,坚强自己的队伍,驱逐自己队伍中的动摇分子与反动领袖,而团集在共产党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周围,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游击战争是越发发展起来了。满洲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在困艰的条件之下坚强地进行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

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

(五)中国革命形势存在的最好标志就是苏维埃运动之茁长、胜利与成功,他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坚强与雄大,苏维埃运动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有力的柱石,成为一切国民党区域中群众斗争所环绕着的太阳,并使中国革命成为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革命的先锋队。

苏区的工人和农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土地、工作、与自由。真实的改善与提高了经济的文化的生活,整个的力量与热忱卷入建设新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建设工作之中,卷入于神圣的保卫苏维埃领土的革命战争之中。伟大的常胜的铁的红军是创立了起来,接连粉碎了帝国主义国民党集其全力进行的四次大举进攻,不仅保卫了原有的苏区而且大大地扩大了苏维埃版图,在广大的中国西北部创立大块的川陕苏区,得着全中国几万万劳苦群众拥护的苏维埃运动是坚强不可战胜的力量。苏区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成功与胜利的经验,给全中国的民众指出:只有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推翻,苏维埃中国的确立,才能够解放中国统一中国,脱离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奴役,脱离剥削压迫饥饿失业和非人的法西斯蒂恐怖。

目前的形势是中国领土内存在着的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两个绝对相反的世界,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在中国及中国的劳苦群众前面尖锐的摆着一个问题,或者是直接的和经过国民党的工具而变为帝国主义的奴隶的殖民地,或者是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确立。

在累次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动员其所能动员的一切力量,向着中央苏区作绝望的进攻。这个进攻已经继续了几个月,但是由于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由于全中国苏区与国民党区域中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拥护,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发展,蒋介石五

次“围剿”的原有计划是失败了。但是，五次“围剿”还没有完结，蒋介石的变更作战的部署，只是为了他能够最迅速的经过福建来从东方侵入基本苏区，继续他的五次“围剿”。决定胜负的决战还在前面。每个工人农民，每个赤色的战士，每个革命者，在这个紧张与负责的关头，必须以一切的力量来准备迎接这个决定胜负的战斗，而取得其胜利，这个胜利将实现一省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并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的坚固基础。

(六)民族危机之深刻化，苏维埃运动之成功与胜利，革命形势的开展，最清楚的显示了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统治之破产。国民党最无耻地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卑污地担任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的作用。蒋介石已经公开宣言，“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这个宣言最清楚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之完全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在理论上实际上，都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毫无顾忌的代言人与走狗。他压迫中国民众的抵货运动，和反帝国主义的其他一切的方式；压迫反日的义勇军，缴义勇军的械，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实行其进攻苏区的大规模的战争，用白色恐怖屠杀和拷打中国工农，为的是要延长他们的残酷的剥削，要增加几万万群众的痛苦和饥饿，他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塘沽协定，实际上将黄河以北中国领土全部的交给日本帝国主义。他毫无顾忌地进行中日直接交涉，更大的出卖中国与激励其他帝国主义的贪欲。

国民党广东系的反对南京政府，用抗日的宣传来粉饰自己，这是企图欺骗民众和获得群众的拥护以维持其破产的统治。广东系的抗日宣传，同时是英日帝国主义间生长着的对立的反映，其结果是广东系在英帝国主义面前尽其极端卑鄙献媚之能事，同时广东系又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借款，推进日货的倾销，使日货由广州而深入中国。

华北的军阀，尤其是南京政府所委任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主席黄郛，都是日本的代理人。他们与“满洲国”汉奸没有丝毫的

差别,他们准备建立一个公开的日本的傀儡政权,充当日本忠顺的工具。只要日本帝国主义视为可以不必顾虑其他帝国主义在北方的利益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他们就要这样干起来。

云南和贵州的省政府完全被法帝国主义所支配,英帝国主义日益统治广东和四川省政府。从此所呈现的一幅图画里,可以看出国民党和封建军阀将中国出卖给外国帝国主义,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

19路军之公开揭树独立的旗帜、抛弃国民党的外衣,创立所谓人民革命政府酷[和]提出一些“左”的革命空话及武断宣传,这是证明着国民党内部的纷争与崩溃的深刻。“人民革命政府”存在以来一个多月的事实,证明他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只不过是—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要维持这个统治,为了阻止和妨碍中国民众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被民族危机国民经济浩劫及群众革命斗争所震撼着的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内部,矛盾冲突和崩溃正在激烈的增长着。这种矛盾和冲突同时正是反映国际帝国主义争夺和瓜分中国的紧张而不可调和的斗争,帝国主义者正各自利用各个军阀的集团,为着侵略与瓜分中国清除道路。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和冲突,财政上增长的困难,与反革命之武断宣传与欺骗之破产,都促使反革命的统治在政治上军事上之日渐削弱,与促进他们的没落的速度。蒋介石及蒋系法西斯蒂独裁的企图,并不表示国民党统治之坚强,恰恰相反,反映着国民党统治之破产与革命势力之加强,因而须要在—个人独裁的支配之下,集中一切反动势力来镇压革命。福建事变同样是证明着,依国民党的旧的方式来继续统治,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有一部分的军阀与政客想以毁弃国民党的旗帜来引诱民众,而维持地主资产阶级之政权。而所谓人民革命政府存在的短短的

历史与其惨酷的破产,已经足够证明,在中国面前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地民[民地]的道路,或者是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苏维埃的道路。中间的出路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党在动员广大的劳苦群众,为着粉碎五次“围剿”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中,“必须最谨慎周到,细心敏捷地,一方面利用敌人间每一个(即令是最小的)可能机会间隙,利用……各种资产阶级间每个利益冲突,他方面利用每一个(即令是最小的)可能机会,以获得群众的联盟者,尽管这个联盟者是一时的,动摇的,不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都不要紧”(列宁)^①。而同时必须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派别(社会民主党、AB团、生产党等等),这些派别目前以找寻殖民地道路与苏维埃道路之间的中间道路为标榜,而实际上则是为着挽救破产的反革命的统治,并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放射烟幕弹。

(七)四中全会后三年来的事变与党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所获得的伟大成绩,愈益明显地显示了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坚决的两条战线斗争的基础上,四中全会一方面击溃了以立三同志为首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严厉的指斥了当时政治局某几个同志对于共产国际路线的虚伪的两面派的态度,另一方面严厉的打击了右派的取消主义,他们企图利用党内一部分工人干部对立三主义及调和主义之不满,进行反党的斗争。这个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和党的领导机关之革新,政治路线之纠正,奠定了党的工作全部转变的基础,保证了党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与坚定。四中全会完成了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面极大的进步。

^① 以上引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今译文见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印刷的《列宁全集》第31卷第52页,下同。

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在艰苦的环境之下,忠实地执行着共产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地进行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倾向和动摇,粉碎了各种[主义]机会主义(如职工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北方落后论及苏区中的罗明路线等)。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了党的全部工作之彻底转变,得到许多重要的成功与胜利。

五中全会指出在这个时期内党的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之创立,工农红军数量与质量上的扩大及提高,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及其在全国民众中影响与威信的增高,反革命阴谋的扑灭,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屡次的疯狂的进攻苏区。在苏区中党的政治组织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进步。这首先在中央苏区方面,土地革命问题在基本的苏区已经彻底的解决了,工农联盟在这个基础(上)大大的巩固了,广大的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与创造性是提高了,他们积极的参加保卫苏区的斗争,加入红军,组织游击队,保证红军的给养与供给,伟大的经济建设与文化革命正在开始,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的确立,更加密切了苏维埃与群众的联系,吸收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国家建设的工作。

然而在苏区党的工作中,严重的弱点还很明白的暴露着。特别是边区新区的薄弱,游击战争的开展异常的不足,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工作的薄弱,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的存在,许多区域中首先是鄂豫皖与川陕,工会工作之不可容忍的薄弱等等。

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在非人的白色恐怖的统治之下,共产党的工作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下党的条件之中。虽然如此,党依旧生长活跃着,加强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在许多省份中党得着了一些成绩与进步。党不顾一切困难与恐怖,努力发动与争取反日反帝运动的领导,组织与争取反目义勇军,团集他们在彻底的革命政纲周围,党努力的加强自己对于罢工运动的准备与领导,在许多省份中党加强了农民运动的领导,尽量提高农民斗争的积极性与觉悟程度,发展革命的游击战争,在陕甘边创立了新的红军部队

与苏维埃根据地。但是五中全会着重指出，在白区中党的工作是太薄弱，尤其是许多重要的产业中心城市党的工作的状况是很严重的。党的最大的弱点，是在工会工作之极端不够，对于工会工作之估计不足，及其忽视的倾向，依然存在着。罢工之准备及领导不足，结果使工人阶级的若干重要部分仍旧在国民党黄色工会领袖的笼罩之下，党与工厂的联系极端的微弱，赤色工会没有能够真实地转变为广大的群众工会。在反帝运动中建立广大下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依然没有应得的成绩，因此在反帝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亦不能加强起来。在农村中缺乏有计划的坚持的工作，玩弄游击战争，而在许多条件成熟的区域中则不能迅速的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因而使我们游击队遭受到失败。瓦解白军士兵工作极薄弱。党在组织上的巩固，尚远远的落后于政治影响的开展。这些严重的弱点，必须迅速的克服，这争是[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提。

(八)尖锐的革命形势的存在，要求党千百万倍的加强自己的革命的群众工作，用一切力量经过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之运用去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发展他们经济和政治的日常斗争中，提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领导他们为着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革命出路而斗争，为着苏维埃的中国而斗争，这个斗争之胜利，紧密的联结于完全与彻底的粉碎[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因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他殖民地化中国中间的最具体与凶恶的步骤，而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动员全部力量，为着完全与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而斗争，这是党当前最战斗的紧急任务。

为着完成这个光荣的伟大的任务，(甲)在苏区的党的组织应该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与努力来完成下列的任务：

(1)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扬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

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将一切其他的任务围绕在这个任务的周围。一切党的工作应该在“一切为着国内战争前线上的胜利”的列宁的口号之下进行。尖锐的革命形势要求我们在尽可能的短时期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必须加强党的群众的青年的妇女的组织,使他们在动员新的战斗力量上起更大的作用,尤其重要的健全赤卫军和少先队的组织,使他们变成为红军的现成的有良好训练的后备军与地方部队。在党的领导之下,红军已经在行动上达到了高度的配合,这是由于红军战士的明确的阶级意识,自觉的铁的纪律,组织与战斗经验的丰富,政治与军事领导之改善与加强。虽然如此,决不能丝毫的放松继续的加强与改善这个工作,每一个革命者必须以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战术的素养,提高阶级的觉悟与自觉的铁的纪律为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更加须要红军各部在一个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遂行战斗的任务,更加须要将川陕苏区与鄂豫皖苏区及红二军团的部队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任务与中央苏区的伟大的任务配合起来。极端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敌人的后方侧翼,与苏区的周围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组织群众参加斗争,发展土地革命与新的苏区。游击队必须成为土地革命的发动者与组织者,党和苏维埃政权影响之散布者与群众武装斗争之骨干。

(2)加强与改善苏维埃工作,使苏维埃政权加更[更加]加强与密切自己与千百万劳苦群众的联紧[系],吸收他们最积极的参加国家行政与管理的各方面的活动,必须继续的坚持的进行反对暗藏在苏维埃机关中之阶级异己分子之斗争,必须广大的开展反对苏维埃机关中的个别的贪污腐化浪费公款及官僚主义的分子的斗争,这个斗争除掉健全工农检察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个别的打击和反对具体的罪恶的负责者外,必须与提高群众的文化的水平,文化革命及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与监督苏维埃的工作联结起来,与发展苏维埃的民主主义及自我批评联结起来。上级的苏维埃政

府(中央政府各省政府)必须加强对于下级苏维埃工作之领导,——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仅要成为苏区工农之政权的机关,而且要成为白区劳苦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斗争之组织者和领导者。

(3)正确的实行苏维埃的土地的经济的政策,是国内战争与经济封锁之中加强苏维埃政权权力与影响之重要的方法与步骤。土地革命之澈底进行,在基本的苏区之中,已经有着伟大的进步,但在新苏区与一部分边境区域中,土地问题依然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里屡次为党所指斥的错误的办法与“富农路线”还是部分地或多或少地执行着。因此在土地革命已澈底实行了的基本区域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将这些土地在农民手中稳固起来。党和苏维埃政权应该用一切力量与方法,来提高与组织农民群众的生产与劳动热忱,组织广大的耕种与收获的运动,使得土地的生产量大大的提高,党和苏维埃必须以极大的注意来进行河道、灌溉、水利的修整与开发,工具耕牛之适当的分配与增加,劳动力调剂互助之组织,科学的农事智识之灌施与传布。而在那些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区域,基本问题即在依据党的历次的指示,迅速进行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及大的私有土地,将他在雇农、苦力、贫农、中农之间平均分配,并且必须迅速的进行查田运动,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最基本群众身上。在经济建设的范围,目前最主要的是广大的发展各种各色的合作社的组织,恢复那已经破坏了的手工业的生产,与活跃苏区内部和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商业,这样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及更进的改善工农生活。

(4)为着实现在苏区党而[面]前的伟大的任务,必须努力地扩大加强健全一切苏区内的党的工人的青年的妇女的以及一切群众的组织。

苏区的工会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柱石,是苏维埃政权最可靠的支柱,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党必须将工会工作提到最高的水平,必

须克服对于工会工作之忽视。苏区的工会必须坚决地在保卫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的斗争中,在改善工人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中,吸收最广大的工人群众来积极的参加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的各方面,党应该提出并实现“每一个苏区工人应该是工会会员”的口号。青年工人与农民在革命与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已经在国内战争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各方面表现了起来,党必须更加注意青年中的工作和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的需要。青年团必须在最短的时期内迅速的转变为比现在更大几倍的青年工人半无产阶级贫农及中农的觉悟分子的群众的组织,必须以最大的注意来开展在团员中间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教育,青年团应该成为在一切战线上的尖兵与党的第一个助手。

必须根据党以前的决议案来健全各个区域中的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吸收最广大的女工妇女[农妇]群众积极的参加经济与文化的建设。

在严重剧烈的国内战争的环境之中,加强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使他能够适应迅速变化着的国内战争的环境,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苏区的党必须最大限度注意到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必须训练工人的新干部,提拔他们到领导的机关,必须将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靠的分子从组织上肃清出去。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与坚强不倦怠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保证党能完成自己的伟大任务的保证。

乙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党的任务是:

(1)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之下,罢工的意义是极大的增涨了,党必须将整个注意力放到我们这个工作的最薄弱的一环而求得坚决的转变。党的全部力量应放到工厂、工会、罢工上面,这里我们的注意首先应该集中在重要的工业中心,最受资本进攻威胁的大的工厂之内——尤其是许多接近苏区的工业中心城市中。五中全会严厉的

指斥许多地方组织及个别党员的忽视工会工作的倾向,并且认为忽视和躲避工会工作的人不能算共产党员。为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五中全会责成每一个组织,自中央至支部,订立具体的工作的计划,这个计划中必须包括着在大的工厂和企业中组织巨大的赤色反对派小组及群众的赤色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各种具体步骤,并经常的检查其执行的程度,加强我们在工厂中的影响及胜利的领导罢工斗争的锁钥,是广大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只有在正确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只有为着工人每一个细小的要求坚持不挠的斗争中,我们才能够争取工人到我们方面来,才能够建立群众的赤色反对派与赤色小组,才能够胜利的领导罢工,及隔绝黄色领袖在工人中的影响。对于每一个罢工,党必须郑重的准备,必须消灭我们口号与要求的呆板与机械性。为着罢工的胜利,群众的人数众多的罢工委员会是必需的。在失业工人中的工作必须加强起来,要加强与改善我们在失业工人中的宣传鼓动的工作,要组织失业工人的委员会,要把失业工人斗争与在业工人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要领导失业工人为要求救济要求继续照付工资,要求工作做而示威而斗争。为加强我们与工人的联系,要更大的注意一切工人的附属组织和体育组织中的工作。

(2)在农民中,党的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农民群众一切反对捐税反对高利贷反对地租的斗争,发展分粮抢米,夺取土地的斗争,提高这些斗争到革命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党的注意力应该首先集中到苏维埃运动发展上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中去,使这些区域的农民斗争与工农红军的作战直接的联结起来。在水旱灾荒的区域里面,党必须加强自己宣传鼓动与组织的工作,组织灾民要饭吃要房子住要救济的斗争。在农村中工作时党必须注意到农民中的分化,坚决地组织农村工人的单独的组织(农业工人工会),而将贫农团结在他的周围。在坚决的反富农的斗争中团集中农在自己的周围。在农民群众的原始的宗教性的组织中(如红枪

会大刀会等),党必须加强自己的工作,夺取其下层群众。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党必须坚决的组织与领导农民进行游击战争,驱逐国民党官僚,打倒地主豪绅没收与分配土地。党必须加强在白军士兵和民团中的工作,根据士兵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满意,鼓动他们的愤恨,反对国民党进攻红军,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他们的哗变与暴动。

(3)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与国民党的无耻投降,给我们以良好的机会去加强和扩大群众的反帝斗争。党必须坚决地为着创造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个统一战线必须依据在明了通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纲领之上,而在一切反帝斗争的形式中实现起来,并在这个统一战线之中加强与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党必须最广大的散播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全国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的号召及其所提出的三个条件,无情的暴露国民党及改良主义派别的替帝国主义侵略清扫道路的作用。党必须利用各种各色的名义去发展反帝反日的群众组织,并且积极的参加一切反日的组织,到那里去提出我们的纲领路线提议,来揭露这些组织中的领袖分子的面目,动员群众积极的反对帝国主义。党应该加强抵货运动的领导,使他们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在满洲、热河、河北、党应该积极的去参加义勇军的活动。派遣可靠的同志与工人分子去加强义勇军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与影响之下的义勇军与游击队,必须在明确的革命纲领的基础上,与其他反日的部队订立共同的反日作战的协同动作,以自己的英勇的例子及对士兵的政治工作争取这些部队。这些义勇军的部队必须将反日斗争与发动土地革命联结起来,消灭在自己行动的区域中的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民众的政权,号召满洲及其他日本占领区域中的民众拒绝缴纳租税及一切“满洲国”及日本当局的命令。

(4)由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斗争的高涨,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的不可容忍的薄弱亦清楚地暴露了起来。党必须加强在蒙古人

回族苗族瑶[瑶]族之间的工作。党必须领导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与自主(包括分立权)而斗争,必须发展他们中间的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土著的地主土司喇嘛贵族与高利贷者,密切的将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与土地革命联结起来,指出只有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够保证少数民族取得解放与建立他们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①,与各个民族间的真正的和平与自由。五中全会责成政治局及各省委根据党的革命的民族政策定出各民族中具体工作的纲领。

(5)白区党的组织上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巩固党的组织,建立坚固的工厂支部,改善秘密工作与领导的方式,改善宣传鼓动与接近群众的方法。这里最主要的任务是创立与加强党在大的工业中心的工作与组织。必须派遣可靠的得力的同志到这些城市的重要企业中建立壮大与巩固的党的堡垒。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工厂中、工房中、农村中、学校中、兵营中,只有这样才能够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及避免国民党法西斯蒂恐怖之袭击。白色恐怖的打击与党多方面活动之结果,新的干部的需要是大大增加了,只有勇敢的提拔那与群众密切联系及在群众斗争中表现其忠实与先锋作用的工人干部,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必须反对借口秘密工作而拒绝提拔新干部的保守主义,这在那些知识分子仍然占主要领导地位的省份(如四川、北方的某些地方)中更加重要。在疯狂的恐怖之下,党必须最严格的改善秘密工作,改善党的各组织间的联系,坚持的进行反对敌人奸细的斗争。党对青年团的领导必须加强,不

^①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方针,是针对国民党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压迫、剥削的政策和为了支持少数民族的解放而提出的。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少数民族已经获得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各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合作的大家庭已经形成。此后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确认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下同。

但要派得力的代表去工作,而且要把团的工作与生活的问题经常放在党的工作日程上。

(九)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

只有坚决地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解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争取苏维埃中国的斗争。

自从四中全会以来,党在坚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坚强了锻炼了自己,获得了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与一致,最后走上了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丝毫的使我们减弱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及两面派的态度无情的斗争。在新的形势前面,在新的困难的前面,在革命形势激剧转变的关头,在党内最不坚决的一部分中新的动摇新的倾向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已经明白的暴露着。党必须毫不放松的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对工会反帝和其他群众组织与工作之忽视和估计不足,反对在安心的乐观主义的托词之下忽视加强我们的力量和工作之倾向。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者怀疑革命的发展,忽视群众的力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慌失措,妨害革命运动的发展,降低工人斗争的水平,尾巴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党的队伍之中散布悲观失望灰心丧气的叫喊,混乱我们的队伍,帮助敌人的进攻,引导革命到失败的道路。右倾机会主义不常提出公开的政纲反对党的路线,更多的是将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澈底的实现,同时必须最广大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与真实的实现新的活的领导方

式，坚持不屈的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我们能够在伟大的事变前面担负起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光荣的任务。

(十)中国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漩涡中，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在面前，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正是尖锐的提了出来。五中全会坚信，在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基础上，在十几万党员积极坚苦不倦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党将要领导工农群众和工农红军获得新的胜利，给反革命势力更大的打击。党在这个基础上，会加强在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会更加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到达社会主义革命；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才会脱离国民党的帝国主义的统治，劳苦群众才会从奴役剥削饥饿之下解放出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工农才会走上苏联各民族在胜利的革命中所指出的光荣大道。

根据 1934 年 2 月 16 日出版的
苏区中央局《斗争》第 47 期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1934年4月)

米 夫

国民党反革命派在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和全面援助下顽固而凶残地反对苏维埃运动,已有五年多了。但是,尽管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用尽全副力量,也没有能够扼杀中国劳动群众的革命解放运动。奥托·鲍威尔^①、托洛茨基、王德威尔得^②以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其他仆从们,竭力把中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说成是反对资本主义“进步力量”的“反动暴动”,而且预言中国的苏维埃运动行将遭到可耻的覆灭,然而,备受奴役的中国工农却同他们的谬论和愿望相反,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几年来,中国工农红军击退了国民党反革命派对苏区的五次“围剿”。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居于优势,尽管帝国主义向中国军阀提供巨款,尽管国民党当权者得到帝国主义的大量军火,尽管国民党军队有几百名帝国主义国家派来援助国民党的军事顾问,这一切都不能保证他们打败和压倒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在决定国民党“围剿”成败的历次重大战斗中,中国红军都一直是屡战皆捷的。每次“围剿”结果,都是红军发展壮大,苏区不断扩展,又

① 奥托·鲍威尔(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翼首领之一。——原编者

② 王德威尔得(1866—1938),比利时工人党和第二国际的右翼首领之一。——原编者

有几百万劳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也日益加强。

现在,国民党正对苏维埃进行第六次“围剿”。人们曾一度不无根据地认为,这次围剿还会遭到以往几次“围剿”的同样下场。但是,蒋介石是在福建的19路军失败^①之后继续进行这次“围剿”的,而且这次“围剿”的规模超过以往各次反革命围剿许多倍。第六次“围剿”虽尚未结束,但对这场斗争的结局则是无须怀疑的。确实不能排除国民党可能在个别地区取得斗争的暂时而微小的成功。但是,中国的整个形势已不容对第六次“围剿”的结局有所怀疑了,这次“围剿”的结局,对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来说,必将比历次“围剿”更不光彩、更加可悲。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胜利的前景已清晰可见。

近年来,中国苏维埃已证明,它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苏维埃在中国成立是由日益发展和不断胜利的中国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所引起,中国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根源则是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而在保持地主奴役、军阀压迫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条件下,这些矛盾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分析中国当前形势,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展望今后事态的进程,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个思想,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群众所接受。经济危机的毁灭性后果,帝国主义者空前规模的侵略,以及国民党的卖国政策,都不能不加速中国工农的革命化。甚至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的力量在日益壮大,劳动群众对苏维埃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口号更加向往。

^① 1933年11月,19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并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1934年1月19路军失败。——原编者

的确,国民党报刊的字里行间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苏维埃运动,充满了刻骨仇恨和不共戴天的敌意。被剥夺了世代特权的的地主们,受到苏维埃运动损害的中国银行家和资本家们,在帝国主义者鼓动和支持下,已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运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威胁,因而,他们动员一切力量反对苏维埃运动,同时不遗余力地进行咒骂。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的代表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诽谤苏维埃运动是“土匪”,“反革命”,诅咒它“已经苟延残喘”,这是不足为奇的。但他们究竟无法掩盖红军和苏埃维政府在广大劳动群众中日益增长的声望。他们对广大工农群众真诚支持红军的事实无法讳言。不仅如此,这些反革命阵营代表人物在言谈中越来越经常地流露出一种想法,认为国民党反对苏维埃运动是徒劳无望的,还透露出一种看法,认为专事剥削的统治阶级已把国家弄到山穷水尽、极端贫弱的地步,为帝国主义者廓清了对中国进行殖民奴役的道路,因而历史注定他们是必然要失败的。

我们不再空泛议论。我们面前有一份武昌大学视察团的报告。这份报告刊登在国民党杂志《政治评论》^①(1934年1月11日,第84—85期合刊)上。报告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对国民党反革命制度的无可辩驳的宣判。在我们援引这份报告之前,关于这个文件的背景还要说几句。在第五次“围剿”之初,国民党集中大量兵力于个别地区,特别是鄂豫皖边界苏区,使红军稍受挫伤,暂时占领了部分苏区。不消说,国民党立即恢复了地主所有制和以前的一切剥削制度。嚣张至极的反动派对占领区大肆烧杀。凡敢去参加起义反对可恨的国民党政权的劳动人民,一律格杀勿论,“以警效尤”。整个的村庄付之一炬,贫苦农民的茅舍和可怜的家什洗劫一空。1927年以来历次军阀战争和国民党军队袭击苏区造成

^① 此篇文章题为:《从视察匪区说到匪区善后》,署名为武昌中华大学夏更新。刊载于《政治评论》1934年84—85期合刊,第195—199页。——原编者

中国农民生命财产损失的情况，可从姚莘农所著《中国农业的崩溃》一文的附表中，略知一二：

省 份	死亡人数	财产损失
安 徽	170,270 人	47,867,500 元
河 南	804,436 人	126,057,023 元
湖 北	246,550 人	477,033,880 元
江 西	186,000 人	650,000,000 元
湖 南	89,000 人	300,000,000 元
五省共计	1,496,256 人	1,600,958,403 元

国民党一方面建立血腥的恐怖制度，造成大片地区荒无人烟，另一方面又把共产党人污蔑为压迫人民的恶棍，而把自己描写成人民的救星，似乎农民们简直要箪食壶浆来欢迎他们了。为了不择手段地诋毁共产党人，国民党机关还派遣特务冒充“公正无私的视察者”到政府军占领区去。

视察团一份报告的作者谈了他鄂南之行的观感。首先，作者指出这个地区的壮丁已经绝迹，“鄂南一带被匪（在国民党的字典里就是这样称呼共产党人的）之区，壮丁大半被胁（！）从匪，所到各村，不但人烟稀少，并且在这极少数的居民中，所能看见的，亦只是些龙钟老态的老人，壮丁绝少看见，十二三岁以上儿童亦很难觅得，你想，这该是如何凄凉的一个世界！他所给与人们的印象还会小吗？”^①

甚至大部分老人也同红军一起走了，不得已留下的人，生活很艰难：“只要看看他们脸上的颜色，又黄又黑，又枯槁，又衰颓，三分

^① 同前引文，第195—196页。——原编者

像人,七分像鬼!真可怜呵!匪区仅有的几个老头子亦十九是人形鬼脸,瘦得骇人。”^①接着,我们从报告中了解到,这个地区很少有完好无损的屋宇,几乎所有房舍都已塌毁,就是幸存的房舍中,也是十室九空了。

田园荒芜的情景给作者留下了强烈印象:“鄂南一带被匪之区,因农民多数逃亡……以无人耕种之故,现都长满了野草,阡陌之间,很少看见有人来往。这种荒芜凄凉景象……这在我,是一个最深刻的印象。”^②

作者谈到他们同村民谈话的情况,并据此得出结论说,全体农民都是红军的奸细。他说,国民党军队来犯时村民有各种规定的信号用来通知红军。这位作者同村民的一次谈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在姜桥村视察的时候,为了要明瞭匪化的实情起见,曾找了许多人来问话,我们问他们:‘这里到过土匪吗?’他们答:‘没有,没有。’我们再问他们:‘这里到过红军吗?’他们便立刻回答:‘到过,到过,一个月以前还有红军在这里。’”^③不消说,作者对视察区内村民的情绪大为恼火。要知道,国民党已经下了禁令,凡不称共产党和红军为匪者要以死罪论处。

报告的作者又通过其他例子来说明共产党的影响。“匪化(应读为苏维埃化)过的地方,一般民众的谈吐,多半带些赤色的意味:他们竟都知道什么叫做‘敌军’,什么叫做‘土劣’,什么叫做‘列宁主义’,赤匪的《国际歌》是人人会唱的。”^④

作者感叹不已的是“赤匪麻醉的宣传真太可怕了”。他正确地指出,如果红军仅仅使用武力,而不去影响民心,如果红军像国民

① 同前引文,第196页。——原编者

② 同前引文,第195页。——原编者

③ 同前引文,第197页。——原编者

④ 同前引文,第197页。——原编者

党当权者所竭力渲染的那样,在其占领区内专事破坏和洗劫,那么中国的苏维埃就不会成为国民党制度的有增无已的威胁。“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赤匪不但有武力,可以作破坏的工作,同时还有政治力量,可以作建设性的工作。赤匪最有效的政治工作便是宣传;他的宣传,是含有充分的麻醉性的,譬如写标语,他们多半用的是这一类口吻:‘亲爱的农工们,红军给你们的是抗税抗粮,大家有饭吃,国民党给了你们什么呢?’”^①共产党散发的声明,语言简单明白,“使一般民众看了或听了,最容易受麻醉,的确,赤匪麻醉的宣传真太可怕了。”^②

正因为如此,视察者对于国民党今后反对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得出了极为悲观的结论。他指出,红军的影响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要重新改造这些地区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写道:“匪化过的地方,人心是完全变了,赤匪的毒菌,深深地侵入了民众的血液”,因此,“只要军队一撤走,匪徒就会再出现(此二句该文中没有。——原编者)。所以匪是越剿越多,有形之匪未除,无形之匪又继续变匪了!这一点,我们应当率直说出”。(原文中此句为:这是应当纠正的。——原编者)

另一个名叫赓雅的国民党视察员,于1934年2月周游鄂豫皖边区一遭后,在《申报月刊》上写文章^③说,这个地区在苏维埃政权下,广泛建立了不收学费的初级列宁学校。“各乡村学生数,与各乡村学龄儿童数之比例,达92%。”^④

午后时间,学校用于进行成人教育。赓雅同这些地区的居民特别是在列宁学校上过学的儿童谈过话。他说:“若问他们过去的

① 同前引文,第197页。——原编者

② 同前引文,第197页。——原编者

③ 此文登于《申报月刊》1934年第2期第91—92页,题为:《赤区教育的片断》。——原编者

④ 同上,第91页。——译者

情形,他们都能简单明了地告诉你,你听了令你满意。‘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国际路线’一类名词,语间提及,惯用如数家珍。”^①

阶级敌人这些无可奈何的自白确实引人注目,而且是颇有象征意味的。这些话反映了国民党队伍中一片混乱、张皇失措,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苏区正在从事革命实践,苏区采取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来根本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领导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农反帝运动,所有这一切每天都把越来越多的工农群众吸引到苏维埃革命方面来。不仅在工人和农民中间,而且在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甚至在至今仍相信和追随国民党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间,中国共产党的威望也在不断提高,他们更加同情党所领导的、唯一能使中国实现国家独立和统一的苏维埃运动。由于国民党屈辱投降,劳动群众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们对国民党失望的同时,对领导劳动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共产党更加同情了。去年年底,中国资产阶级报纸《益世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写道:“即使国内进行某种政治变革,毕竟是次要问题。但使人民沦为洋人的奴隶,使民族沦为被奴役的民族,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②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福建政府失败以后,中国另一家最老的报纸《大公报》,虽然不是直言不讳,但也不得不指出,中国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国民党的道路,即中国进一步遭受殖民奴役的道路,另一条就是苏维埃道路,即胜利争取中国国家独立的道路。其他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事变的结局令人不再相信第三势力的

^① 此文登于《申报月刊》1934年第2期第92页,题为:《赤区教育的片断》。——原编者

^② 此段中文引文未查到。——译者

能力了。当今的情形已经说明,第三集团根本无法解决国家的问题。”^①对 19 路军或任何别的“第三势力”能救中国的幻想已经破灭,这就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反帝斗争中公认的领袖地位。

近来,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越来越多地发表统治阶级中有远见卓识的代表人物的文章,他们无情地批评了南京政府的所作所为,以十分阴郁的笔调描述了农民群众的状况,指出中国当前的危机同土地关系的紧张有直接联系。

姚莘农在论述中国农业的长篇论文中写道:“目前,灾难深重的中国所面临的一切迫切问题之中,以农业问题最为尖锐,不容或缓。几千年来,中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因此,农业的凋蔽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崩溃……中国农村已破败不堪。几百万农民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没有土地,无以谋生。几百万人挣扎于生和死之间。甚至连最富足者,由于负担日重,也困苦不堪。这些年的灾难和忧患,酿到了火山爆发的程度,中国有化为庞培之虞。”^②

农民群众生计日蹙、破产和贫困的情况,可以用一些数字加以说明。例如,根据 21 个省 731 个县的调查材料,自耕农的比例由 1921 年的 50%,下降到 1933 年的 45%,与此同时,无地农民的比例,则由 28%上升到 32%,半佃农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1922 年占 22%,1933 年占 23%)^③。根据乔启明的调查^④,昆山地区自耕

① 1934 年 1 月 11 日《大公报》社论题为《闽变告一段落后之政局》,认为福建事变的发动者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第三势力,“然今日则证明此派之主张及力量,绝不足解决国事。其影响,将使凡思想左倾者,从此断念第三势力之建树”。米夫的引述有出入。——原编者

② 载于英文报纸《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s Herald),1934 年 1 月 24 日,题为《中国农业的崩溃》(Rural China's CollaPse),作者为姚莘农。——作者

③ 《中华日报》,1934 年 1 月。——作者

④ 见乔启明著《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载南京金陵大学《农林丛刊》1926 年第 30 号。——原编者

农的比例,自1905年至1924年由16%下降到8.3%,而无地农民却相应地增加(在这些年间,无地农民的比例由57.4%增至77.6%)。在宿县地区,1905年自耕农占59.5%,土地甚少的半佃农占22.6%,无地农民占17.9%。而20年过后,自耕农则为44%,土地甚少被迫租田的农民达到30.5%,无地农民占25.5%。这些年来,南通地区的自耕农由20.2%下降到13%,而无地农民的数字由56.9%增至64.4%。

关于中国农民破产贫困与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陈翰笙^①提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材料。地主不仅把国有的、公有的、祠堂寺庙土地以及用于军垦的土地攫为己有,独吞这些土地的地租,而且乘破产农民之危年复一年地扩大自己的田产。近年的经济危机、饥荒和天灾使土地的占有更加集中。“1931年长江流域几省的大水灾,是更多的土地转入地主富农之手的又一个原因。”

以无锡的三个乡村为例,就可知农民生计日益衰败的情况。这几个村子中,有十亩以下土地的人家,1922年占农户总数的38.35%,1927年为41.5%,至1932年则已为50.3%了。

湖北省金水湖(译音)各村的调查材料说明了这个过程,这个村子耕种五亩土地以下的人家,1923年占农户总数的31%,1933年则已是49%了。农民耕地规模缩小,又兼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牲畜、农具与肥料缺乏。如,陕西合阳县无牲畜农户,近十年来由29%增至47%。

陈翰笙认为,地主是“农业瓦解的主要因素”。无疑,地主土地占有制决定了中国土地关系的紧张情况。同时,应重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使当前中国阶级矛盾加剧的一些特点。列宁在分析革命前俄国改革后的经济,并说明经济发展的动向时,着重指出,贵

^① 引自陈翰笙英文著作《中国当前农业问题》(The Present Agrarian Problem in China)。——作者

族的地产在减少(1877年为7300万俄亩,1905年减到5300万俄亩),还指出,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的发展方向,就在于小面积经营转为大生产经济。在中国,尤其是近几年,这是经济危机极为深重的年代。我们看到了个体农户急速分化和变小的过程,而寄生的地主却特别明显地扩大地产。

这种发展趋势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这里起重要作用的是国际帝国主义。由于帝国主义实行瓜分和彻底奴役中国,阻挠工业发展的政策,由于存在着剥削中国人民和榨取超额利润的整个制度,由于外国金融资本扶持和强化中国的封建和半封建制度,中国农村中的农民依附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

地主大量占有土地以及由此而加剧了“土地紧张”的情况,地主的盘剥变本加厉,这必然使本已困苦的生活更为恶化。《申报年鉴》指出了地主收入不断增长的趋势。江苏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省每亩田赋1921年为3.5元,1927年就增至7.86元。据华洋义赈会的材料,有76.6%的农民,每年收入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这76.6%的中国农民就是在正常年景也要被迫负债。

高利贷利率苛刻,又加上不胜负担的、名目繁多的赋税。以江苏为例就可以知道田赋迅速增长的情况。如果以这个省1915—1923年间的田赋为100,则1929年的田赋指数为151,1931年增至165,而到1933年竟达到18%。^①这是正常田赋。但是,近年来又广泛通行附加田赋和特别田赋。例如,山东省的特别田赋总额要超过一般田赋的10倍,而且多数省份早已是寅征卯粮了。在这方面,四川的军阀最为卖力。如成都县,1931年1月已预征1961年的赋税;遂宁县,1931年1月已预征了1971年的赋税;蓬安县,1933年2月已预征了1957年的赋税,等等。陈翰笙写道,资中县

^① 见民国二十三年《申报年鉴》,第840页。——原编者

1930—1933年间已预征完14年的赋税,南充县从1931年10月至1933年3月已预征完11年的赋税。

除田赋而外,还有其他五花八门、数不胜数的赋税。我们只指出一个情况。在河南省一些战火频仍的地区,1930年4月至10月间,国民党当局的税收和征用已超过基本田赋40倍。中国农民身受的赋税剥削是农业凋蔽的相当重要的原因。

中国农民收完一年劳动的成果之后,不得不去同采购商人进行吃亏的交易。上面提到的姚莘农的论文说:“稻谷在产地的出售价格惯常低于市场价格的60%—70%。农民当然知道现价,但急切用钱,比如要交纳地租、赋税,要清还债务和利息以及经营方面的开支等等交相煎迫,以致他们无法使自己的产品保留到好价时再出售。这就使商人乘机作赚钱生意。农民们出卖自己产品的价格常常是大大低于成本。因此,农民的劳动果实,又从自己手中匆匆而过,仍然债台高筑,处于饥饿和绝望的境地。”

只要考虑到中国农民所遭遇的重重灾难,考虑到世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军阀军队使田园荒芜的情况,就不难想象中国农民的这种惊人的困苦景况,他们的迅速贫困化以及农业凋蔽的情况。甚至国民党的反革命报刊也无法掩饰中国农业经济这种前所未有的低落和衰败景象。

人民群众贫困不堪,致使稻麦种植面积锐减,而对廉价粮食的需求却稍有增多。

中国内地十七省的种植面积如下(以百万亩为单位):

年代	小麦	稻	高粱	黍
1931	—	—	102.9	105.9
1932	334.0	314.0	—	—
1933	296.3	279.8	99.2	108.8

农村的危机,特别是像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不能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反映出来。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外贸额中看到。由于外贸入超严重,中国的外贸额继续锐减。现相应列表如下(以鹰洋为单位):^①

当谈论国民党中国的当前经济形势时,还有一个颇为典型的情况,不能避而不谈。这就是由于土地危机和农民骇人听闻的破产,以及由于土地革命不断发展、节节胜利的影响而造成的土地价格低落的情况。

	1932年	1933年	减少的绝对数	减少的%
入口	1,634,726,298	1,345,567,188	289,159,110	18
出口	767,535,334	611,827,990	155,707,344	20

我们从上述陈翰笙的论文中可以读到:

“当前,农产品价格猛跌,行情极端不稳,赋税不堪负担,高利贷牟取暴利,所有这一切导致了资金周转的全面停滞,造成了土地市场的危机。不仅中农、贫农和雇农要卖土地,而且许多富农和地主也想要把土地脱手,变为现金来保存资财,以求减轻困难。”

福州的土地价格,1931年春同1929年相比,下降了33%,浙江永康县下降40%,江苏盐城县下降了70%,山西则由50%下降到81%。近几年河北的土地价格下降了33.75%。

陈翰笙开列了一个河北省1929—1933年间每亩土地平均价格表:

1933年12月20日《大公报》报道玉由县土地落价50%时,写道:这个县“由于土地价格低廉和苛捐杂税繁重,农业处于严重衰败状态,农民除去卖地而外,别无出路,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同时

^① 见《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34年2月9日。——作者

也无人买地,资本家不愿多置田地。”^①

县 名	价格(鹰洋)		指数(与 1929 年相比)	
	1929 年	1933 年	1929 年	1933 年
涿 县	90	60	100	67
邢 台	150	100	100	67
南 和	100	60	100	60
固 安	50	20	100	40
景 县	100	40	100	40
束 鹿	100	30	100	30
保 定	80	20	100	25

得注意的是,距离中央苏区不远的江西省国统区各县,土地价格落到了原价的 15%。

农业的持续衰落,加强了反对派的地位,资产阶级报刊尖锐抨击南京政府。姚莘农认为,军阀混战是万恶之源,军阀混战仍在继续发展,它鲸吞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

“争执,让步,内战以及言和,年复一年消耗了大量金钱,吞噬了政府的全部精力和资金,无法进行建设……政府不是实行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方针,而唯上海银行家马首是瞻,因而债台高筑,找不到出路,几年来似乎一切都很顺利,而实际上这个政府是软弱无能的、不可救药的。长江泛滥、日本入侵以及财政危机,使这个政府的一切弱点暴露无遗。”

姚莘农在指出近年的军费开支占国家总开支的 80% 以上时,

^① 1933 年 12 月 2 日《大公报》有《玉田通信》《玉由地价奇贱》一则,原文是:“且因粮米之价贱,农村经济已告破产……村民无法维持生活,以致不得不出卖田地者,比比皆是。但本年地价又极低廉……一般资本家不愿多置田地。”——原编者

又发问道：

“但是，中国为什么要从自己可怜的收入中，拿出这么多钱用于军事目的呢？为了保卫国家吗？不到两年之间，中国就失去了496164万平方哩的领土。为了剿匪吗？现在，‘匪’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为了铲除共产主义吗？人民还没像现在这样甘愿做一个赤色分子。”

这位作者断言，人民反对这种徒劳的“围剿”苏区运动，这个运动只能加重赋税和公债，导致镇压、流放、屠杀，造成一片废墟。“假定说，共产党被逐出自己的堡垒了。这是否就意味着运动成功了呢？共产党人十之八九还会重新夺回他们的失地。”他接着写道：“目前，政府虽然动员人力和财力进行这个运动，但要彻底镇压下去，看来仍是遥遥无期。我们不知道，这个运动可能持续多久，结局究竟如何。但我们知道，政府现已遇到财政危机，这就预示着军事上的失败。”

但作者不仅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别的。他知道，穷困不堪的农民一定会找到，而且已经找到了出路。作者并不隐讳这个事实，即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已迅速投入了革命斗争，他们已被更广泛地纳入了苏维埃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轨道。

“现在，在中国的土地上已到处都是共产主义，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速度膨胀着。是谁如此精心地为这种惊人发展准备了土壤呢？中国军阀当然憎恨共产主义，他们屠杀共产主义的信徒，迫害共产主义的刊物……但中国军阀正是以自己的行动使农民赤化。我们以四川为例。那里的军阀强迫人民种植罂粟，强迫人民预交田赋，一直提前到替孙子预交田赋。人民吃尽了战争和军队的苦头，如果没有这些当地军阀的帮助，共产党人能不能取得胜利呢？如果有谁认为，中国人宁愿在军阀统治下坐以待毙，也不愿当赤色分子，那么，这些人对于中国人民的忍耐心未免过于相信了。”

由于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国民党政府把中国领土一块一块

地出卖给外国压迫者,中国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了。在危机深重、群众空前贫困和军阀横行的条件下,人民也已忍无可忍。

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劳动群众不能不恍然大悟,因为苏区已摆脱了贫困和危机的绝望状况,这一成就在他们眼里确是一项为之瞠目的范例。苏区同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完全是霄壤之别。在那里,一切难于解决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取缔了地主和高利贷的盘剥,消除了群众无权的状态。在那里,根本没有令人憎恨的帝国主义压迫,根本没有军阀的强梁欺凌,农民们获得了土地和自由,解脱了难以负担的赋税,工人们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和改善了劳动条件,妇女们争得了解放,全体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新生活,巩固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我们利用中国资产阶级报刊代表人物的亲身见闻,描绘了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贫困不堪、每况愈下的情景。通过这些作者之口,道出了农民们的心愿。这同中国苏区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一方面,自由的苏维埃共和国地区报刊的报道和文章,可我们参考。

先从土地问题说起。赣东北苏区的柯扬(译音)同志写道:

“土地按家庭人口和劳动力分配。现以葛源乡为例。这个乡有1836家农户。分配土地以后,有1703户得到了比革命前较多的土地,只有133户(即在7%以下)分得的土地相当于或少于从前。这里有两个原因:或者这些农户是富农,或者在此期间家庭人口减少了。土地革命的结果是阶级营垒分明,农村的阶级斗争更加明朗。一向竭力冒充中农,甚至冒充贫农的富农,被劳动群众揭穿了。由于苏区采取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出现了农民反击敌人‘围剿’的战斗热潮。”

这种典型情景,其他苏区亦然。

但是,苏维埃政府并非仅限于没收地主土地和给农民分配土地而已。土地归私人耕种的情况并没有使苏维埃机关不去关心提

高农业技术、扩大播种面积、改进土地耕作和提高产量等方面的工作了。五年来，苏维埃政府尽管忙于同国民党军阀不断打仗，但又不能忽略改善经济状况的任务，一刻也不能忽略经济建设。恰恰相反，为了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为了不断改善对日益壮大的红军的供应，为了提高群众生活，苏维埃政府在共产党领导下，尽最大努力来提高生产，恢复工业和改善苏区的农业经济。

这些努力不无效果。在《红旗》杂志第62期上刊登了亮平的一篇文章，我们可以知道：

“在我们党的号召之下今年的春耕运动，夏耕运动，秋收秋种运动无疑的是得到了不少的成绩，全苏区米谷的生产，据一般的估计，虽然没有完全增加两成，可是平均至少在一成以上，此外今年的杂粮（豆、麦、蕃薯、菜等）的种植，有了大批的增加。”^①

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在赣南十七县会议上做报告说，总的看来，“今年（1933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20%—25%。”^②这是言之有据的。

为了进一步改善苏区的农业经济，苏维埃机关热火朝天地开展工作，组织精选良种供应农民的工作，扩大生产石灰作农田的肥料，组织维修和生产农具，修筑灌渠，改建和新建灌溉设施。广大群众正动员起来，模范地开展春耕和秋收运动。

苏区还在开展植树运动，建造谷仓。为了克服居民布匹供应的困难，大力扩大棉花种植面积，组织用大麻和稻草造纸。

尽管同国民党反革命派不断打仗，除盐的供应时有中断外，可以认为苏区的粮食是富足的。政府设特别机构（粮食调剂局），采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原编者

② 米夫引文不确，毛泽东同志原话为“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7页）——原编者

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提高粮食价格。粮价的调高是输出和国家粮库大量收购与贮存商品粮的结果。苏区的工业也慢慢得到恢复。毛泽东同志在赣南十七县会议上做报告说:“手工业方面,农具和石灰的生产在恢复过程中,钨砂的生产开始恢复。烟、纸和木头的生产也开始有了点生气。”^①纸张生产和钨砂开采,受到特别重视。

关于这方面,亮平同志在《经济建设的初步总结》一文中指出:

“在帝国主义疯狂的准备战争的形势下,他们迫切的需要钨砂,因为钨砂是制造军用品的重要原料……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钨矿,是在我们苏区里面,我们应该用力发展钨砂生产,以其出口来加紧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并且我们要用很大力量,来保护这样重要的钨矿的生产。”^②

想再谈几句关于商业和合作社的组织工作。如所周知,蒋介石对封锁苏区抱很大希望,企图破坏和完全打乱苏区的经济生活。当然,封锁引起了一些不良后果。然而,苏维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经济封锁。同苏区做买卖的不仅有国统区的农民,还有国统区的商人,他们为了追求厚利,不顾蒋介石的严厉禁令而冒险前来。另一方面,由于红军不断取胜,游击队积极活动,国民党军阀也无法建成巩固的封锁线。

在苏区的进出口贸易中,还有不少严重的弱点,这在劳动群众的生活上有所反映。比如,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得知,每年中央苏区大约有300万担谷子出口。谷子的出口几乎完全操于商人之手,商人在这种交易中要赚六倍的钱。盐和布的进口(盐每年

① 作者引述不确。毛泽东同志原文为:“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是在开始走向恢复。这里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8页)——原编者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原编者

大约要用 900 万元,布要用 600 万元)也由商人一手垄断。有时这些产品的售价相当于国内工业城市的十倍。这种情况迫使苏维埃中国的活动家们特别关注合作运动的发展。1933 年 8 月召开的赣南北经济建设大会大大推动了 this 运动。大会以前,中央苏区只有 406 个消费合作社,社员 8.3 万人,股金 9 万元,粮食合作社只有 513 个,社员 11.2 万人。大会以后,关于合作社状况,还没有总的统计。但从瑞金和兴国等县材料,可以看到合作社在迅速发展。例如,瑞金在 8 月经济大会以前,消费合作社社员有 9000 人,一个月以后,社员就增到 1.43 万人,股金增加了 50%。兴国县在大会以后一个月中,入股人数就增加了一倍(增加 1.46 万人)。不少合作社是优秀的工作模范。如亮平同志指出的,壬田区的消费合作社,能够经常供给群众盐、布、医药等必需品,价格比市场低廉,而且每一元股金一年还能分得七毛的红利。

在其他措施方面,经济会议还决定发行 300 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可以从下面的材料中看到群众对公债的态度:云集区一个月就销去了 3.2 万元,红坊区五天之内就购买公债 1 万元,杰村区有一个乡,公债尚未发下,就已认购了 4200 元。群众的支持,保证了公债的顺利发行。

为了说明苏区劳动群众的革命创造性,他们地位的根本改善,以及他们对重视教育的情况,我们可举几则学校建设方面的事实。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内关闭学校已成为普遍现象,但与此同时,苏区却广泛地建立学校。比如,宁都县过去只有几所学校,而今苏维埃机关已建立起 350 所初等国民学校,580 所夜校,13 个俱乐部,以及为数众多的扫盲班。

工会和贫农团在巩固苏维埃制度,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提高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没有这些组织,要正确地完 成土地分配和打击富农的种种阴谋活动,是不可思议的。

去年 7 月,中央苏区依靠这些组织进行了认真的查田运动。

在许多地方查出了混进苏维埃的异己分子。那里还发现有不少土地仍然在地主手里,发现富农留有超过标准的多余土地。如在壬田区,中央政府工作团依靠工会、贫农团和全体劳动群众“查出土地2.7万担,全区2万余劳动群众差不多平均每人重新得了一担二斗谷土地,分配了豪绅地主的无数财物给予群众”^①。苏维埃清洗了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由于群众积极性高涨,各方面工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区有700多人自愿参加了红军。

工会和贫农团十分积极地参加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扩大合作社运动的工作。工会不断帮助加强红军。比如,据湘鄂苏区报道,“在最近扩大红军运动期间,工会动员和派遣了2372名工人参加红军。其中一部分工人是工会活动的优秀分子。这批工人很快在实际中表明,他们可以在军队中发挥先锋作用。”中央苏区有一些引人注意的数字说明工人们是积极参军的。中央苏区扩大红军运动期间,即去年的7—9月,工人在参加红军总数中的百分比是:瑞金县占16%,胜利县占24%,公略县占27%,万安县占28%,赣县占24%,兴国县占百分之29%。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1933年10月第116期中我们看到,由于实行革命竞赛,1933年只9月份一个月,中央苏区23个县就有28850人应募参加了红军,各社会团体联合制作30万双草鞋慰劳红军。

以四川为例,可以看出苏区对周围地区所产生的革命影响。红军的胜利促进了这个广大省份各县工人斗争和农民运动的高涨。一些地区(中江、罗江、绵阳)掀起了抗税斗争,一些地区(周口

^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247页。——原编者

等)农民起义浪潮开始有所发展^①,一些地区(邛崃一大邑)游击运动开始扩大。这个省的一家兵工厂工人提出“不造一枪一弹供给军阀进攻红军”的口号^②,组织怠工式罢工。在成都,失业工人典当衣物作盘缠去苏区加入红军。中国其他各省也有类似情况。

限于篇幅,不允许我们在本文对许多问题逐一详谈。例如,我们没有谈到,中国共产党大力采取措施来进一步巩固中国苏维埃。中国苏维埃,这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一种形式,这是一种新型的革命国家,它的全部活动与实践,同国民党、同中国以前历届政府根本不同。不久前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如何进一步加强苏维埃,更加认真地监督苏维埃政权、正确而坚决地贯彻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们也没有触及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阶级状况和工人运动问题,虽然那里的工人运动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全民斗争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近几年来,这个运动规模宏大,汹涌澎湃,上海无产阶级的多次斗争、华北开滦煤矿以及其他地区矿工的英勇罢工,就是最好的说明。

我们没有涉及反帝运动,特别是满洲的游击战争。满洲的游击战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的斗争中,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同样,我们也没有专门阐述英勇的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活动。这个党现有40万党员,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因素,成为中国劳动群众公认的领袖。

我们对这些问题都没有谈到,因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全面说明中国当前的情况。我们只想在国民党中国和苏维埃中国之间做一

① 《红旗周报》(第2卷第3期第58页)载:“周口的农民自动发动起来响应红军的行动,结果周口被红军占领。”——原编者

② 指四川“顺庆兵工厂工人在‘不造一枪一弹供给军阀进攻红军’的口号下实行怠工,每日少造一箱子弹”。据《红旗周报》第2卷第3期,怀冰《是刘湘统一四川,还是红军建立四川苏维埃》一文。——原编者

个对比。从我们引述的材料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中国劳动者极端困苦的处境是无法同苏区群众的状况相比的。年轻的中国苏维埃政权，唤醒了工农群众的革命创造性，尽管困难重重，仍然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苏维埃中国击退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地主资本家的不断进攻，它虽然还有一些缺点，但仍满怀信心，勇往直前，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国却腐败不堪，江河日下，是注定要覆灭的。苏维埃中国能够战胜而且必将战胜国民党中国。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活动家们对自己领导的这场斗争的历史意义，作了正确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在苏维埃改选运动的演说中指出：“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盼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全中国劳苦群众都睁开眼睛望着苏维埃旗子，他们明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①

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不辜负这个期望。

译自《布尔什维克》杂志，1934年第7期，第56—69页。

王福曾译 郑禄校

(录自《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① 《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第108期。——原编者

为争取殖民地革命中的 领导权而斗争

(1934年10月)

米 夫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劳动群众顺利进行革命解放斗争的决定性前提。由于殖民地革命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过程中的组成部分,所以,无产阶级在殖民地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是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十月革命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具体进程已完全证实,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意义。这个运动的经验表明,殖民地要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下做到经济上自主发展,经济上和政治上完全独立,历史注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战略目标。”

本文拟对近年来一些最发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情况,进行一定的总结。

首先谈谈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争取领导权的条件。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扩大侵略,把危机的相当一部分重担转嫁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劳动群众的身上,这就导致在这些国家产生以下后果:(一)殖民地的全部经济基础发生极为深刻的动荡;(二)外国和本国资本家不择手段地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工人大批失业;(三)千百万殖民

地的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身受剥削，陷于破产，贫困不堪；(四)殖民地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阶层同宗主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虽然殖民地资产阶级主要还是趋向于同他们合作，向外国资本屈膝投降；(五)殖民地是帝国主义者之间冲突的根源，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市场进行新的世界大战的争夺对象。殖民地的这种作用更加明显。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转入一种特殊的萧条时期。这并没有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因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转入萧条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掠夺和加重剥削的结果。这种情况加剧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危机的持续性。因此，尽管个别国家和个别经济部门有某些改善，然而总的说来，尚不能从目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状况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宗主国转入特殊萧条时期的情况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情况一模一样。这是因为这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再者，这些国家的土地危机仍在继续加剧，而且农业在殖民地既然是占主要地位，这就不能不决定了这些国家共同的经济状况。

如果说，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劳动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过去引起了反对压迫者的斗争，那么在目前的条件下这种斗争就必然爆发得更为猛烈。实际上，近几年已一再证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加强了。

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作为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危机的因素，其意义已更为重要，又指出，“幅员辽阔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已成为不可扑灭的革命群众运动的策源地”。这些指示现已完全得到证实。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几年来，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印度支那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反帝斗争，中美和南美各国特别是古巴的解放运动声势浩大，朝鲜爆发了著名的元山罢工，波斯石油工人的罢工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等等。

仅仅几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就足以雄辩地说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劳动群众怒潮的不断高涨。但必须指出，不仅是反帝战线扩大了，而革命阵营中的各阶级也发生了变化。近几年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究竟有哪些新的现象呢？

一个新现象就是，无产阶级在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方面正日益获得更大的成功。战后几年中民族解放运动的特点就是资产阶级一向独占领导权，而现在，则已日渐让位于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劳动群众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斗争的首倡者。中国无产阶级已牢牢掌握了领导权。在印度支那于1930—1931年斗争处于最高潮的时刻，共产党领导了整个反帝反封建运动。印度无产阶级向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并节节胜利。

我们上面指出的无产阶级在争取领导权斗争中的胜利，也表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发展上。没有必要强调这一情况的全部意义。无产阶级如不建立坚强而又联系群众的共产党这样一个新型的善于战斗的革命政党，要想争得领导权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近几年共产国际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就。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强大的政治因素，成为中国劳动者公认的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领导者。印度成立了共产党。印度支那在几经严峻考验之后，建立了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南美洲和美洲加勒比地区（萨尔瓦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秘鲁、委内瑞拉以及波多黎各）成立了六个共产党。台湾地区、菲律宾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成立了共产党。

进一步使这些党布尔什维克化并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党，仍然是一项迫切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由于共产党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扩大，以及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成功，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这就是殖民地革命的两股洪流的

汇合,即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这两股洪流的汇合。在解放运动初期,资产阶级竭尽全力使反帝革命局限于上层民族革命的范围内。只有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才能使殖民地革命别开生面。

当谈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劳动群众革命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现象时,我们就应当谈谈这个运动的苏维埃形式的问题。苏维埃口号在殖民地国家已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了。这个口号在殖民地国家劳动群众中正逐步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在中国,苏维埃存在着,而且节节胜利。这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引起了巨大共鸣。印度支那曾经有过苏维埃。印度尼西亚曾有数万武装工农在苏维埃的旗帜下进行过斗争。智利也曾有过苏维埃。在古巴,苏维埃口号已作为实际革命行动的口号提了出来。仅举上列事例就足可看出,苏维埃思想正不断深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广大劳动群众之中。

※ ※ ※

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就是工人阶级要进行忘我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应当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并把他们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主要手段。近几年70个国家的罢工统计材料(见下表)说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罢工占有很大比重,而且也说明,甚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这些罢工的参加人数,也是比较可观的。

我们从下表看到,中国和印度所占的比例很大。1929年这两个国家参加罢工的人占总数的37%,1930年占20%,1931年占36%,1932年占46.1%,也就是说,中国和印度约占罢工工人总数的一半。1933年比重虽略有降低,但仍占35.3%。

应当指出中国和印度罢工的群众性。例如,1929年中国的罢工次数仅占罢工总数的5%,但却占17个国家罢工总人数的22%。1929年印度罢工次数占2%,罢工工人数占15%。此后几年仍是这种比例关系。

近几年,印度和中国发生了多起大罢工。只要提一下 1928 年孟买纺织工人大罢工情况就够了。这次罢工有 15 万工人参加,持续六个月之久。1929 年 8 月,加尔各答黄麻工人的罢工,总共有 27 万人。1929 年第二次孟买大罢工有 11 万工人参加,持续近半年之久。1934 年孟买纺织工人大罢工,罢工人数不下 13 万,而且,印度报刊报道说,罢工工人表现出极大积极性和战斗精神。

1929 年至 1933 年危机时期 17 个国家的

罢工次数和人数(以千人计)

(英国、德国、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瑞士、匈牙利、丹麦、美国、加拿大、中国、日本、印度、新西兰)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冲突和 罢工 次数	参加 人数	冲突和 罢工 次数	参加 人数	冲突和 罢工 次数	参加 人数	冲突和 罢工 次数	参加 人数	冲突和 罢工 次数	参加 人数
17 国	5944	3440	6931	2576	5946	2656	5974	2911.5	5277	2416.3
其中:										
中国……	300	750	635	357	391	730	327	1215.5	359	691.5
%	5	22	9	13	7	28	5.5	41.7	6.8	28.5
印度……	141	531	148	196	166	203	118	128	146	165
%	2	15	2	8	3	8	2	4.1	2.7	6.8
日本……	571	77	906	81	998	64	2217	123.3	1508	97.5
%	9	3	13	4	16	2	37	4.2	28.5	4
东方国家	1012	1358	1689	634	1555	997	2662	1467.1	2013	954
总数										
百分比	16	40	24	25	26	38	44.5	50.1	38	39.3

中国也可以作为罢工浪潮强大高涨的一个范例。中国的罢工

运动对于全国人民革命解放斗争的发展,无论过去和现在,其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1922年香港大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1926年上海和香港大罢工的作用皆为人所共知。这些罢工加强了民族解放运动,并使之上升到更高阶段。近几年中国无产阶级的罢工,仍继续起着这种作用。我们只需回顾一下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些斗争情况就足以看清这种作用;例如,沈阳和安东工人发动了总罢工,作为对占领满洲的回击,再者,上海日资企业的工人在日本进行武装干涉时发动了总罢工。除这几次大罢工以外,中国近几年还多次发生丝织业工人、矿工的总罢工和纺织、铁路、卷烟工人的大罢工等等。

近几年,朝鲜、南非联邦、南美洲和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罢工运动在不断发展。当然,这些国家国土不大,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但那里罢工运动的规模却年复一年地扩大。如朝鲜,过去每年有3000—5000人罢工,1929年参加罢工的工人达1.9万人,1930年为1.5万人,1931年为2.7万人,1932年为1.6万人,1933年为1.43万人。鉴于朝鲜产业工人总共约有10万人,那么,近几年参加罢工斗争的人数就占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了。

南美洲和美洲加勒比地区的罢工斗争也有很大发展。1932年巴西发生多起重大斗争。1933年6月至7月间,古巴的强大罢工运动发展为政治大罢工,最后爆发了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1934年这个国家参加反对孟地埃塔政府总罢工的工人超过25万人。

从上述例子就足可得出结论,殖民地无产阶级罢工斗争的发展和这些英勇的行动,不仅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意义重大的事件,而且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也是非比寻常的现象。这些斗争促进了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加速了无产阶级组织自己队伍的过程,证实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存在着一个能够带领群众

前进的革命阶级。

如果我们认为罢工斗争之所以具有这样巨大的规模完全是由于共产党的作用,这当然是不对的。不可低估革命工会运动的弱点和共产党在组织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斗争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应充分考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工人阶级的一些典型特点。这种特点首先表现在工人阶级成分上。那里女工和童工居多数,不易把他们组织起来。工人的工资制度通过包工和所谓分红(一种酬金)的办法保留着许多家长制的特点。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比较年轻,工人中间有一个很大阶层是不久前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还没有最后摆脱小私有者意识。民族改良主义者也有很大影响。大多数工人文化低,操不同方言,彼此语言不通以及其他因素,不易将殖民地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这些国家有的根本没有工会,有的即或有了工会,也是极其软弱的。没有组织的工人不得不在完全没有罢工基金的情况下、在大批工人失业的情况下、在可能遭到报复而有饿死之虞的情况下进行斗争。但对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惨无人道的剥削,引起无产阶级的不断反抗,促使他们更坚决地进行斗争。

由此可知,这些国家的统一战线问题,有着何等特殊重大的意义;共产党人在所有的工人群众组织中的工作是何等重要;利用合法和半合法条件的任务是何等迫切;共产党为争取独立地领导和组织罢工,并全力加强革命工会运动而顽强和有步骤地进行斗争,又是何等必要。

这就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在争取组织无产阶级队伍的斗争中所面临的共同条件。

现在,简要谈一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农民运动的经验。近几年我们在这方面看到了哪些新情况呢?第一,应当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运动规模巨大。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是在土地问题上冲突四起的。

试举几个例子。就拿朝鲜来说吧。过去,朝鲜农村每年平均发生 30 起冲突,而 1932 年爆发了约 600 起,1933 年一年就有 724 起。1930 年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端川县发生了有 3000 多农民参加的斗争,结果 40 人死亡,约 2000 千人被捕。1931 年洪川县和明川县发生了有几千农民参加的抗租抗税的严重骚动。1931 年底和 1932 年初永兴县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几乎全县农民都参加了斗争。其他国家农民斗争的次数也是年复一年地增长。据波斯报刊报道,波斯自 1928 年至 1933 年间除大规模斗争外,还发生了 98 起所谓“夺地”事件。

第二个新情况,就是低级的消极斗争形式转变为积极进攻的斗争形式。武装暴动已愈益成为殖民地农村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如,黑非洲 17 个国家自 1928 年起至 1934 年最初几个月,就发生了 86 起农民武装暴动。

当然,黑人农民的各次武装暴动,其声势大小不同,持续时间长短不同,性质也迥然不同。暴动的起因,无非是土地归公,赋税加重,强迫劳动,以及帝国主义者的暴行与压迫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有 46 起事件,警察和当地卫戍部队的兵力不足以镇压这些武装暴动。在这 46 起事件中,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动用空军,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以及调遣大批部队前来镇压,而其中有四起事件,英、法和比利时部队不得不对之采取联合行动。

这几年,印度支那也已转而采取武装斗争形式,1930—1931 年间发生的某些事件可以作为例子。

还可以举出不少类似例子来说明,积极形式的农民斗争在日益发展。

可以说少数民族和被压迫部族参加农民的土地运动,是一个新鲜而又极其重要的现象。中国广西和贵州两省,除汉族外,其他民族也开始参加农民的共同斗争。我们在印度支那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近几年波斯发生了俾路支族、阿拉伯的古莱氏族、纳沙尔

族、路尔族、库尔德族等部族的暴动。当然，在某种情况下，这些暴动并不带有革命性质，因为是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挑唆而起的。但少数民族的大部分暴动无疑直接反映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日益发展的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影响，因而也是革命的另一方面的征兆。

应当强调指出，日益发展的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已经影响到军队，首先是影响到士兵群众。如所周知，已发生多起南京国民党部队转向红军方面的事件。大家还知道，满洲部队转向游击队方面的情况也偶有发生。这些事实不仅在中国有，在印度支那，正是整个卫戍部队的起义，在某种程度上说强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性的革命解放斗争，促进整个运动上升到更高阶段，为这个运动建立了军事基础。1933年2月，在印度尼西亚本地和欧洲的水手举行起义，夺占了“七省号”装甲舰。在南美洲和美洲加勒比地区，秘鲁发生了第五团起义，巴西北方发生了军事起义，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军队发生了革命的哗变，阿根廷的部分部队发生了革命的骚动。萨尔瓦多士兵多次拒不参加镇压1932年1月的雇农起义。1931年爆发了著名的整个智利海军的起义，革命运动遍及古巴军队，在推翻马查多之后，士兵们驱逐了他们所憎恨的军官。

对这些事件的革命意义切不可估计不足。这些事实十分令人信服地说明，革命高潮开始动摇了统治阶级的武力支柱说明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可以顺利地士兵群众中开展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

我们想研究的最后一个情况是，农民斗争主要地仍然是无组织的和自发性的。在中国，无产阶级对农民斗争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取得了极大成就。中国的经验之所以为我们所关注，是因为它表明农民斗争已由低级形式转化到高级形式，并证明把劳动农民直接吸收到共产党领导之下是可能的，共产党人在组织武装的革命农民运动，并使这个运动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协调一致也是可

能的。

现在,把我们谈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农民运动情况,做一总结。目前正在形成逐步克服运动发展不平衡和农民运动落后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条件。农民运动已由消极的低级斗争形式过渡到积极进攻的高级斗争形式。农民运动主要仍然是自发性的。多数国家的无产阶级组织仅仅是初步尝试去同农民运动建立联系。但无可争议的是,无产阶级对殖民地农民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影响将不断加强,因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越来越多的农民已觉醒到要斗争,而且斗争的逻辑正推动他们去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实行联合。任务就在于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当前的形势。

无产阶级要领导殖民地革命,就要求作为领导力量的工人阶级最积极地投入反帝斗争。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向劳动群众表明,它最热情、最勇敢、最顽强、最彻底地反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被奴役人民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

在这方面,我们要指出中国和印度共产党的经验。在印度,各共产主义小组和一些共产党人不久前有宗派主义倾向,脱离了反帝斗争,把反帝运动的领导权让给了资产阶级的国民大会党。在中国,共产党尽量利用每一次冲突,利用帝国主义的每一桩暴行,利用群众的每一次反帝行动,以扩大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斗争。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反帝运动,虽然有某些失误和缺点,但它善于在全民反帝斗争中争取领导地位,以坚强的苏维埃国家为依靠,成为强大的政治因素,这个苏维埃国家正引导中国各族人民沿着苏维埃道路,实现彻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在争取反帝运动领导权和进一步加强反帝运动的斗争中,殖民地各国共产党应当消除对于群众革命斗争起瓦解作用的民族改良主义影响。共产党如若不把仍在追随民族改良主义者的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就不能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的斗争中取得决

定性胜利。目前,共产党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的可能性更大了。民族改良主义现在正经历着严重危机,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形势下,帝国主义者不断加强对民族改良主义者的压力,进一步胁迫其向外国资本彻底投降,另一方面,劳动群众反帝斗争的规模日益壮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改良主义无所施其技了。一方面为了掩盖其投降行径,另一方面又迫于日益发展的群众运动的压力,民族改良主义正玩弄各种花招。例如,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宣言就说什么他们仍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期望建立集体农庄(但实际依靠的是日本资本的扶持!)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所谓“左翼”民族改良主义这种俨然是社会主义的新组织,以取代那些声名狼藉的官方民族改良主义组织。

无产阶级不去揭露民族改良主义的一切伎俩,就不可能取得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应该预见到民族改良主义者会在大战爆发的形势下进行活动,个别民族改良主义集团可能趁战局错综复杂之际进行投机。1914年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的教训,大家还记忆犹新。当时给帝国主义帮了大忙的,就是民族改良主义者。他们为帝国主义者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利用殖民地作为必不可少的军需原料产地,作为轻工业的补充基地,作为兵力以及军事工业和兵工工程的辅助劳动力的供应地。1914年大战期间,无论是印度,还是南非联邦,以及阿拉伯各国,民族改良主义者都是站在国内和平的立场上保卫“自己的”帝国。现在,当新战争的阴霾密布的时候,民族改良主义者又来为武装干涉苏联而积极进行煽动了。他们鼓噪反苏的诽谤运动。他们散布“赤色帝国主义”、“迫害少数民族”、“欺凌穆斯林”、“压制宗教”以及“强迫劳动”等等臆想之词。而且,这种运动总是在苏联同帝国主义世界的关系稍有紧张时,与后者配合默契,它总是与资产阶级报刊相配合,进行反对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宣传。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帝国主义者制造社会舆论,为反苏战争做准备。殖民地国家共产党面临一项极为严肃的任务,就是揭露民族改良主义宣扬战争威胁的全部政策和活动,揭露他们一切反苏的诽谤攻击。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必须吸收他们加入共同的反帝斗争战线,这一点我们已经谈到了。

无产阶级要取得殖民地革命领导权,还要制定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正确策略,以利用和引导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广大破产阶层的不满情绪,将其纳入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轨道。

※ ※ ※

但是,如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不能认识本国目前发生的基本过程,不能正确分析本国的具体发展特点,不能提出符合本国条件的口号和要求以适应现实情况的迫切要求,如果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不坚持自己路线的阶级纯洁性并始终不渝地予以贯彻,那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就不可能发挥重大的历史作用。而正确认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土地关系及其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则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在帝国主义统治年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这是无可争议的。在那里,古老的、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遭到破坏,商品金钱关系发展了,农业的商品化和专业化也发展了,形成了一整批技术作物区,当地工业已经出现,也正在发展,尽管速度缓慢,像上海、孟买、加尔各答、武汉等工业中心也发达起来了。问题在于要弄清楚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特点。

殖民地过去和现在都是帝国主义宗主国的附庸。垄断资本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使殖民地继续处于农业原料附属国的地位。而殖民地的这种地位造成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特点。商品金钱关系的发展主要有利于宗主国的工业发展。殖民地自然经济遭到破坏的结果,与其说是殖民地本身,倒不如说是宗主

国的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殖民地正在形成中的市场与其说是本国工业市场,倒不如说是外国资本的市场。殖民地因交纳赋税而资金大量外流,宗主国经济大得实惠。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商品化过程,形成了农业的片面专业化形式。这些国家的工业迟迟不能发展,而且在发展中受到阻滞的工业当然没有能力为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工业发展缓慢,也就迟迟不能排斥商业高利贷资本,而任其继续盘剥直接生产者。

马克思和列宁指出,农村的人力外流,是对农业发展和农业使用技术装备的一个推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发展同迅速急剧的赤贫化过程不相适应,其特点是,人口过剩,土地严重不足和分散小块的经营。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地主富农如用纯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雇用劳动力以及应用机耕技术,则获利较少,而把小块的零星土地租佃出去,残酷剥削农民群众,则获利很大。

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这些特点,不能不在因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阶级分化过程中留下相应的印痕。

有必要较为详细地谈一下土地问题。在这方面,把殖民地经济进步情况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加以比较,是不无兴味的。列宁在分析革命前俄国经过改革的经济和判明经济进步的方向时,曾强调指出贵族占有土地减少的情况(由 1877 年的 7300 万俄顷减到 1905 年的 5300 万俄顷),还指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方针就在于把小土地经济改变为大生产经济。消灭封建关系的两种倾向,说明了俄国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斗争。列宁则把这两种倾向定名为“普鲁士式”发展道路和“美国式”发展道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我们来详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理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基本特点的关键。

先从朝鲜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说起。地主占有的可耕地,从 1928 年的 237.7 万公顷增至 1932 年的 251.5 万公顷。1928 年地

主占有 54.1% 的耕地,目前则占有 56.4% 的耕地。与此同时,佃农和无地农民户数相应地由 1926 年的 190.1 万户,增至 1931 年的 1393424 户。佃农和无地农民的比重增大了。1926 年他们占农户总数的 43.3%,1931 年则占 48.4%。

再说埃及的土地占有情况。^①

地产集团 (英亩)	地 产 数			土 地 面 积			平均面积	
	1905 年	1932 年	增长百 分比	1905 年	1932 年	增长百 分比	1905 年	1932 年
5 英亩以下	1,005,705	2,111,316	109.0	1,264,034	1,764,434	39.6	1.26	0.83
5—10 英亩	77,060	84,627	9.0	544,624	72,094	5.1	7.01	0.75
10—30 英亩	49,305	52,318	6.0	802,323	827,811	3.2	16.30	15.80
30—50 英亩	8,601	9,247	9.0	331,501	361,387	9.0	38.50	38.30
50 英亩以上	12,475	12,492	0.1	2,356,602	290,617	2.8	189.00	183.00

如果细看一下埃及地主占有土地的曲线,则这条线先是下降,然后上升。由上表可以看到,近 27 年来,大地主占有的土地面积实质上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如果 50 英亩以上的地主占有土地面积,加上 50 万英亩寺庙和宫廷土地以及 40 万英亩租佃出去的国有耕地,那么,封建地主就占有大约全部土地的一半。但是,如果大地主的地产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那么,近 27 年来中小地主的土地是增加了,富农的土地也增加了。与此同时,小农的地产明显地化整为零。贫农的户数增加了一倍,每户平均耕地面积由 1.26 英亩减至 0.83 英亩。

《埃及日报》^②于 1934 年 4 月 13 日报道了一则埃及土地占有急剧化小过程的有趣材料:

① 据 1933 年 11 月《埃及农业和经济统计月报》和 1926 年至 1927 年《统计年鉴》所载资料。——作者

② 该报是当时用英文出版的埃及重要报纸。——译者

“下列数字说明了埃及农民的赤贫化。不足5英亩的小土地所有者1894年占埃及土地所有者总数的77.6%，1914年为90.6%，1932年为93%。1894年小块土地(五英亩以下)占全部土地的19.8%，1932年占33.3%。”

这就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以及同时发生的不劳而获的地主扩大占有土地的过程。谁都知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主大多不事耕种，而以苛刻的条件把土地零星租佃出去。

为此，研究一下日本的土地占有情况，也是不无兴味的。日本的土地关系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近50年来，即资本主义刚好迅速发展的这些年代，日本地主占有的土地面积由全部可耕地的36%增至46%。这些年代，奴役性的租佃——半农奴制剥削——不仅扩展到更广的农民阶层，而且采取了更苛刻的形式。如果以1886年的田赋为100，那么，1909—1913年间是113，1917年至1921年间则已达到117。

据日本官方统计可知，近25年来，小地主和富农(10—16公顷土地)数目增加了16%，有50公顷以上土地的地主数目增加了40%，其余的一批土地所有者在数量上减少了，但土地占有量最少的一批人(平均有五分之一公顷土地者)例外，他们却增加了11%。因此，这里也发生了大地主和部分富农迅速兼并中小土地所有者土地的情况。这里迄今仍未停止土地所有者土地不断由大化小的过程，这种土地面积如此之小，以致无法靠它糊口。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地主也在扩大占有土地，这是印度和南美洲以及美洲加勒比地区各国的特点。比如，墨西哥90%的私有土地为地主和外国金融资本所有。阿根廷是南美洲和美洲加勒比地区最为发达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大约有95%的可耕地在地主和外国资本家手里。

再简单说一下印度尼西亚的土地占有情况。一方面，这个国

家村社土地所有制农村数目在锐减。1882年村社土地所有制农村有2.36万个,而1927年只有1.1万个。农民的金钱收入在增加。1901年金钱收入占48%,而1924年已为56%。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但在印度尼西亚,自然经济的破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半封建剥削方式加强的过程结合交织在一起。地主和商业高利贷手中的土地一般不是用于建立较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主要成了对无地和少地农民加紧进行前资本主义剥削的来源。1800万块租佃土地,其总面积为600万公顷,亦即平均每块租佃土地不到三分之一公顷,可见农民耕地分散到了何等程度。我们见到,这里的前资本主义残余的重负已变得更加沉重,这里的地主吞噬着农民仅存的土地,这里正以残酷压榨群众的方式发展殖民地类型的资本主义。

在研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时候,没有必要再行补充中国的资料。有许多著作,特别是姚莘农和陈翰笙的著作,已详尽研究了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半封建奴役制发展的同时,中国农民破产、贫穷和失去土地的过程。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农村,我们看到的是农户的规模日益缩小,耕畜与其他生产资料日益减少。只须强调指出,世界经济危机并未改变我们前面提到的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方向,而仅仅是极大地、灾难性地加速了这一过程。这种情况,不仅中国如此,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都如此。

※ ※ ※

中国苏维埃革命极其丰富的经验,可以使我们看清殖民地革命民主阶段的特点,明察这个革命进一步转变的前景,以及正确估计无产阶级领导权在其中所具有的全部意义。的确,目前尚不可能依据中国经验得出任何最后定论。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发挥出全部创造力,还不能实施整个建设纲领。中国苏维埃革命暂时局限于该国一部分地区,况且还是比较落后的地

区,而且这些地区尚未完全稳固,要在连绵不断的内战条件下进行内部建设。但目前已可以从中国经验中得出许多有益的教训。

现在,中国苏维埃革命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中国苏维埃实际上已证实,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列宁主义方针是正确的。但中国苏维埃革命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就已具有社会主义成分,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特点。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特征表现在,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是运动的先锋队。再者,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一)是反帝政权,(二)具有适当的苏维埃形式(它依靠群众组织,它对劳动者实行民主,对剥削阶级实行严厉的专政);(三)其特点是,共产党集中掌握对政府和群众组织的领导权;(四)拥有以工农红军为代表的武装力量;(五)在采取一些基本上民主措施的同时,还实行某些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这些措施是:领导革命国家所掌握的企业,并监督其生产,国家采取调整物价,组织进出口,以及供应人民生活必需品的措施,开展提高农业生产的运动(春耕秋收运动,支援农具种子的运动),帮助和鼓励合作化运动,等等。

上面说的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革命抹杀了革命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的任何界限了呢?不是的,不能抹杀这种界限,因为在一种情况下我们说的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说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政府和社会团体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但他们必须以经济上已形成的条件和群众觉悟现有的程度为依据。共产党人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工作。如果我们说,共产党人在中国领导着一个政府,那么就需要看到,他们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而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条件下进行领导的。这就能把他们的活动安排在恰如其分的范围之内了。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是推翻资产阶级和建设社会

主义,同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下(目前中国就是这种情况),资本主义仍然是基础。根据中国的条件,小商品生产仍然是基础。确实,革命国家为了实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要利用并全力加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这种地位从一开始就同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展针锋相对。但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不能立即提出把资本主义从各个时期的社会关系中排除出去的任务。

因此,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特征,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现阶段仍然有效。但是有革命的苏维埃国家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和中国苏区所创造的条件,这些无疑都是有利于中国革命下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阶段的全过程的。

在其他方面也形成了中国革命继续发展的良好前景。在中国革命的民主阶段,苏维埃已经建立了贫农团。无疑,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贫农的组织性将不断提高,贫农同城市无产阶级的联系也将更加密切。

这就是中国革命转变的内在前提。无论是对于彻底完成革命的民主任务,还是对于保障下一步走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要起这样的领导作用。这些条件之外,再加上苏联和日益发展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这样极其有利的外部因素,只要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政策,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是无可置疑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将照亮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劳动群众革命解放斗争的前途。

译自《布尔什维克》杂志,1934年第19—20期。

王福曾译 郑 禄校

(录自《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争取建立苏维埃的经验

(1935年2月)

米 夫

自从中国开始建立苏区和创建正规以来,已过去六年多了。初创时人数不多的红军逐步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力量。革命斗争的基地也巩固和扩大了。这些年代是红军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从未停息和日益激烈的年代,因而不断积累了在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无比丰富和不可抹杀的经验。

正当1905年革命处于高潮时,列宁指出,起初在国内一小部分地区起义可能成功,同时考虑到因军心动荡倾向革命,导致许多部队转到人民方面来并引起“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因此他提出了组建革命军队的任务:

“这些队伍的任务是:宣告起义,给群众以进行国内战争(也像进行任何战争一样)所必须的**军事领导**,建立公开的全民斗争的根据地,把起义传播到邻近地区,保证(起初哪怕是在国内一小部分地区)完全的政治自由,用革命手段着手改造已腐朽的专制制度,尽量扩展下层群众的革命创造力,在和平时期,这些下层群众很少表现出这种创造性,但在革命时代他们就站到第一线上来了。只有意识到这些新的任务,只有大胆地和广泛地提出这些任务,革命的队伍才能获得完全胜利,才能成为**革命政府**的支柱。而革命政府,在人民起义的现阶段上,也像革命军队一样是迫切必需的东西。革命军队是进行军事斗争和从军事上领导人民群众对付专制制度军事力量的残余所必需的。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

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①

这一指示在中国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中得到了证实和成功的运用。中国红军年复一年地发展壮大,苏维埃中国也年复一年地发展壮大。中国苏维埃的存在及其胜利发展这一事实本身特别引人注目,无疑是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尽管国际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革命剥削阶级千方百计来扼杀苏维埃运动,尽管中国人民的敌人为此目的不惜动员庞大的财力和人力,中国苏维埃革命仍在不断发展。几年来,中国苏维埃在国际帝国主义面前巍然不动。中国苏维埃能够经受得住帝国主义者、中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一切打击,能够镇压内部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中国苏维埃正在发展壮大。我们只要考虑到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和这个国家的革命过程中一切崭新的事物,我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看到苏维埃运动的成就。事实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没有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没有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没有造成双重政权(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情况),而是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执掌大权的革命民主专政。半殖民地国家工农第一次掌握了政权,以便确立本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完全独立,以便对这个受帝国主义蹂躏的国家的一切社会关系进行革命改造。

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采取苏维埃形式。在此之前,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经验证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实践上可以赢得和确立苏维埃政权。但这里的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与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它保证资产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528页。——原编者

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①

在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思想上的和初级形式的国家领导权,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胜利完成革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它赋予革命以极大的力量,保证彻底解决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中的各项任务,从而为这个革命下一步转变成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前途。在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建立了一个**新型的革命国家**。无疑,中国苏维埃的出现应归功于十月革命的强大影响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无疑,苏联劳动人民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中有许多东西可资中国苏维埃借鉴和运用。但是,中国苏维埃不应机械地、全盘地搬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实行的措施。切不可把中国苏维埃同苏联等量齐观,切不可忽略这两种类型的革命国家之间的区别,因为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不同,阶级力量对比不同,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也不同。

1911年列宁在《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中写道:“如果我们支持‘农民’没收土地的斗争,那就是说,我们认为斗争的胜利是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都是有利的。而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中的胜利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只有这种专政能够彻底肃清一切封建残余,保证生产力获得最迅速的发展。”^②

如所周知,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顺便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任务,特别是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以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则是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实现的。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通过的提纲《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作者

②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77—378页。——原编者

中国资产阶级不能、也不想解决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问题。农民本身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依靠中国无产阶级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无私帮助,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土地问题才能在苏维埃中国得到切实的解决。以中国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向全世界劳动人民表明,他们有决心而且有能力彻底消灭封建残余,根除地主压迫和高利贷剥削。

中国苏区无偿没收了地主和其他大土地私有者的土地,并把没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取缔了成文的和口头的各种封建奴役契约和高利贷契约。农民和城市贫民原欠的全部债务统统作废。凡企图恢复奴役性借债制度和各种苛刻的高利贷关系者,就要受到革命法令的严厉惩处。革命的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有进行活动的自由,因为在实行革命性的土地改革中,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是中国农村苏维埃的主要支柱。以前名目繁多和不胜负担的赋税改为统一的累进税,这种税收全部由富户和剥削分子负担。

经过所有这些改革之后,中国苏区农民群众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关于这一点,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道:“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粃,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得很烂,现在一般有了改善,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

哪一种生活哪一种政权是农民群众愿意的呢?让一切国民党区域的农民群众自己去答复这个问题吧!”^①

但是,中国苏维埃不仅仅限于没收地主土地和分配土地给

^① 《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1957 年翻印,第 275 页。——原编者

农民,而且还关心改进农业技术,扩大播种面积,改良土地耕作方法以及提高产量。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材料表明,政权机关挑选良种供应各农户,增加石灰和其他肥料的生产,供给农民肥田,组织修理和制造农具,疏浚旧的和修建新的灌溉设施,广大群众都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春播和秋收运动。大家知道,苏维埃机关的这些措施促进了农民群众福利的进一步改善,因而是有不无成果的。

列宁在我们前面引述的《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一文中写道：“革命政府所以必要,是为了从政治上领导人民群众,——起初在革命军队已从沙皇制度方面夺来的地区里,然后就在全国。革命政府所以必要,是为了立刻着手实行革命所争取的种种政治改造……革命政府务必要依靠人民的下层,依靠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不这样,革命政府就不能支持,没有人民的革命主动性,革命政府就等于零,甚至更坏。我们的任务在于使人民不要相信那些响亮而荒谬的空喊的冒险主义(如什么立刻实行‘社会化’,其实说这种话的人自己都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同时提出现时确实可以实现的和巩固革命事业真正必需的那些改革。”^①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谈到,即使在从沙皇制度手里夺来的不大的地区内,也必须实际地实现各种改革,他强调指出:“实际实现比任何宣言都重要千万倍,当然,也困难千万倍。”^②

从中国苏维埃的实例中,我们看到,经过革命争夺来的地区已经实现了革命为之奋斗以及巩固革命事业所必需的种种实际改革。

中国苏维埃在这个领域内的成就具有极为巨大的意义。这些成就为在全国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做了最好的宣传。中国人民群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529、532页。——原编者

② 《列宁全集》第8卷,第533页。——原编者

众通过实际体验确信,只有苏维埃才能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才能把经济生活组织得如此之好,以致不仅使劳动人民摆脱他们在国民党政权下所身受的冻馁之苦,而且还可能日新月异地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

中国苏区的工人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已普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业工人的工作日则根据契约确定。实现了同工同酬的原则。童工的工作日较成年人为短。劳动条件大有改善,真是今非昔比。苏区的绝大多数工人参加了工会。例如,中央苏区的工会占全体工人的95%,个别县份,如兴国县,甚至占98%。

我们从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摘引一些数字,就可以了解苏区工资增长的情况。

汀州的月工资增长情况

(以元为单位)

职业	革命前	现在	
		(最低工资)	(最高工资)
纸业工人	3	31	35
油业工人	3	12	18
刨烟工人	3.5	30	36
印刷工人	5	28	36
五金工人	—	14	18
木船工人	—	—	46
染业工人	2	18	20
布业工人	2	31	35

农村工人的工资也有了相应的增加。如赣县田村区的数字就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每日工资的增加情况

(以分为单位)

职业	革命前	现在	革命前	现在
	(最低工资)			(最高工资)
手工艺工人	10	20	30	35
农业工人	3	10	28	32
苦力、运输工人	10	20	45	96

由上述实例可知,中国的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何等的改善。虽然中国现阶段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个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苏维埃形式发展起来的,并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而就不同于过去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它不能不把民族解放同劳动群众的社会解放结合起来,所以,这个革命就不能不给工人阶级和农民带来直接的利益。

“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劳动群众是永远不会同意去想象什么全国的共同‘进步’的。只有在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条件下,群众才会投入运动,积极参加运动,重视运动,发扬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对伟大事业表现出坚定不移,忠心耿耿。否则情况就不会这样,因为工人‘平’日的生活艰苦到了极点。工人阶级在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在道德上、精神上、政治上也成长起来了,变得更能够实现自己伟大的解放目的了。”^①

中国苏维埃为了工农利益而采取的实际措施,有助于唤起广大劳动群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有助于他们组织性和政治觉悟的提高。苏区的各种社会组织都在朝气蓬勃地工作。苏区的工农渴望学习。基层人民的革命创造性得到了发挥。群众已意识到自己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第71页。——原编者

是新生活的建设者和创造者。苏区在解放妇女和各民族劳动者权利完全平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也有助于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久前,中国的工农备受穷困煎熬和军阀欺凌,现在已自觉而积极地参加了伟大的解放运动。

中国苏维埃正在克服由于苏区的经济落后、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巨大困难,已基本正确地解决了革命解放斗争中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并通过政策保证工农的状况大有改善。而这一切不能不使国民党统治区劳动者向往苏区的事业和口号。

不过,在全部实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苏区刚刚建立时,犯过一些严重错误和发生了一些偏差,而这主要是由于阶级敌人千方百计破坏或阻挠中国苏维埃事业所造成的。譬如,起初苏区的工作中曾发生过借口什么有“好地主”、“善良地主”而分给他们土地的个别情况。还有主张按生产资料多少在农民中间分配没收来的土地的。个别地区不分田给雇农,说是“以免失去在农村的无产阶级基础”。还有人散布说不应分田给红军战士,因为“如果他们得到土地,就不愿再去打仗了”。个别地区用纯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普遍平均分配土地,而不去考虑农民群众本身的愿望和情绪。有许多地区主张人为地去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之类。个别地区没有任何重大理由就几乎每隔三四个月分一次土地。这些作法不能不降低深耕细作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中国共产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顽强而毫不妥协的斗争,克服了党的个别组织对中国苏维埃建设政治路线和政策的一切歪曲之处。共产党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保证了中国亿万劳动群众对红军的英勇支援。

广大工农群众以手执武器保卫苏区与发展苏区为自己神圣的责任,而大批地不断地涌向前线去。其中如江西的长岗乡 16 岁至 45 岁的青年成年男子 407 人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去了

320人,留在乡间的87人,去的与留的成为80%与20%之比。福建的上才溪乡,全部青年成年男子554人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留在乡间的只有67人,去与留的比例为88%与12%。^①

红军正是得到群众的支持,才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胜利。中国红军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派的军事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最近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国民党军阀依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全面支持,对苏维埃根据地进行了六次“围剿”,但都没有奏效。

持续了一年多的最后一次对苏区的“围剿”即第六次“围剿”的规模特别大,性质极其酷烈。目前可以说第六次“围剿”已经结束。结果如何呢?第六次“围剿”的结果,红军主力撤离江西,经广东、广西和贵州,进入四川。撤离江西,是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并使其进一步发展。固然,中国红军是能够保卫江西中央苏区的。但是,红军统帅部考虑到国民党部队合围红军主力的危机日益严重,另一方面,仅仅防御还不足以击败敌人主力,于是,决定以一个军在东面突破敌人防线,而把主力放在西面。

红军由于最近转移而丧失大部中央苏区,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损失,更何况,苏维埃政权在许多地区已经存在五年之久。但土地的丧失不仅可以由红军夺取其他省份的地区来弥补,不仅可以看作是短暂的插曲,而且因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战果,已经得胜于失了。

在这些积极战果之中要首推赛克特^②—蒋介石战略计划的破产,他们曾经设想一举包围和歼灭中国红军。敌人尽管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动员了雄厚的兵力,然而,没有达到目的。红军最近已转移,在这种新情况下,要顺利实施这个战略计划,已不大可能了。

^① 《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256页。——原编者

^② 赛克特，蒋介石的德籍军事顾问。——原编者

红军不仅在数量上没有减弱,反而在残酷斗争过程中大大发展了有生力量,红军队伍得到了巩固。而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正如共产国际历次决议中指出的,中国红军是“保证革命必定取得进一步强大发展的力量”。

但不仅如此。如果说过去红军主要是在中央苏区内部受防御战役所掣肘,那么现在已有可能转而采取机动作战的策略,采取更加积极的反攻性行动,掌握了主动权。如果说过去的重大缺点是红军各部没有彼此配合行动,那么现在,红军在最近转移之后,其主力就可能同其他部队更好地协调作战,因而大大提高其战斗素质,打更多的胜仗。

如果说过去多年来中央苏区处于接连不断的国内战争的形势下,它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经受六次大“围剿”(由此而产生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重重困难),那么,现在则已形成了建立更为稳固、更为可靠的苏维埃根据地的条件。

现已可能分出相当部分的红军作为机动部队,这些部队不为一城一地的得失所困,而是要审度新地区的革命成熟程度,像一架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耕犁,翻松新地区的土壤,发动更多的劳动群众参加斗争。在新形势下,在进一步建设正规红军的同时,游击运动也将得到相当广泛的发展,因而,中国苏维埃的政策和成就将更为家喻户晓。

关于这一点,还应补充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就是活动于赣浙皖交界的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合并,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①。在华中和华北各省建立这种部队,就有可能组织和动员广大劳动群众去参加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武装人民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① 此处记述有误。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由福建长汀、清流、大田、古田等地,于10月到达赣东北苏区的德兴、重溪与红十军会合,按中央军委指示,两部合编为第十军团,继续北上抗日。——原编者

者和国民党反革命派。

同样,这就更有可能利用各军阀集团之间的矛盾。但是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要重犯福建事变时的错误,当时红军没有采取积极行动给予 19 路军和所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以应有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是为当时反对主要敌人——蒋介石的斗争所必需的。

同样还形成了更加有利于瓦解军阀军队和争取士兵群众转到红军方面来的条件。早在 1926 年底,斯大林同志一再强调军事因素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①近年来,军事因素在中国的作用有很大增强。这一点可以由下述事例具体说明:北伐之初,广州政府为了占领中国的大部土地,有四至五万军队就足够了,而现在,蒋介石一家就有近百万军队。粤系、桂系、四川、北方军阀以及其他小军阀也大体拥有这样的兵力。近几年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兵力的巨大增长,说明在当前形势下,瓦解军阀军队的工作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总起来说,第六次“围剿”后,无疑对中国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武装斗争正在形成有利的前景。中国红军顺利进行斗争的条件和可能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要加快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策略,它的苏区政策,以及它在扩大和领导反帝斗争方面的积极活动。

分析了国内的总形势,就会加强对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信心。目前,中国各阶级力量对比的特点是,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连同国际帝国主义已经不能扑灭日益发展的苏维埃革命,而革命力量还不够充分,还不能一举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推翻国民党在

^①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8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6页。——原编者

全国的政权。但是,在全国罢工、农民暴动日益发展和反帝斗争强大高涨的形势下,苏维埃和红军的成就,必将使各阶级力量对比逐步地、不断地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一方面是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阀阵营日益瓦解。

日本不断扩大经济侵略,帝国主义者力图通过进一步掠夺中国来摆脱危机,再加上有 11 个重要省份遭逢大旱,导致中国白区经济状况近几个月进一步急剧恶化。日本进一步扩大武力侵华,国民党当权者向帝国主义者公开屈膝投降,蒋介石试图把法西斯主义的一套方式方法移植到中国来,这就导致劳动群众的状况极大恶化,使他们对国民党现政权愈益不满,也导致军阀内讧加剧(粤蒋之间、四川军阀同蒋介石之间的内讧)以及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动荡不已。

所有这一切都便于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反对日本和国民党反革命派的口号下,把包括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去全力揭露蒋介石企图掩盖其卖国政策的各种阴谋伎俩。但是,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无疑都更有可能彻底揭露和消除民族改良主义对群众的影响,更有可能扩大和领导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当说到这个前景的时候,不可忽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困难,不可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所必须解决的复杂课题,等闲视之。这些困难同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特点有关。首先,应当指出中国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武装斗争所特有的**长期性**。这场斗争已持续了七年多,仍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其次,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特点是**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个革命走的是一条特殊“路线”,特别是还不能立即占领全国的行政和工业中心。同时,它必须同强大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而国际帝国主义正在组成统一战线反对中国苏维埃,千方百计支持和武装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

反革命派。

为使苏维埃革命进一步胜利发展,就必须发动更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斗争。在革命的现阶段,共产党应更认真地强调、更加坚定地贯彻和更广泛地宣传苏维埃革命的民族解放特点和革命民主特点,因为这场革命是真正全民性的,应牢牢掌握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

无可置疑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是正确的,它必将引导中国劳动群众取得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通过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试验,共产国际路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完全证实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因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历次决议所依据的是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同时,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成就说明,中国有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党,这个党善于领导群众,善于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苏区正在扩大,而中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势力阻止不住这种扩大”。^①

译自《布尔什维克》杂志,1935年第4期,第71—79页。

王福曾译 郑禄校

(录自《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0页。——原编者

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在反帝反国民党 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1935年8月11日)

王 荣

一、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是反帝反国民党反法西斯主义 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到国际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时,着重指出“在目前国内外环境变迁的情形之下,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特别重要”。这对于中国新环境尤为适合。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又不断地加紧进攻中国,中国民族危机到了空前未有的时候,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日寇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日寇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日寇血洗,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日寇干涉,中国早已被日寇看为不是一个国家,而只是一块需要强国来占领的“无组织的领土”。但是中国这个广大的领土上,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块沙漠和一些不文明的人类,而是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曾经驱逐过外来的侵略者,曾经推翻过强暴的压迫者。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现在这些横暴行为,正遭到中国民众的打击,正如斯大林同志说:“要是以为帝国主义者的这些暴行,将白白地把他们放过去,那就是笑话了。中国的工农已经以建立苏维埃和红军来答复他们了。”(《列宁主义》问题

496页),但是广大人民的抗日斗争,还是散漫不一致,因此需要有一个特殊的力量来团结民众去进行反帝特别是反日的斗争,才能把中国从强有力的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卖国辱国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仅不能抵抗日本强盗,而且也不愿抵抗,反而加紧压迫反日运动,作了日本强盗忠顺的奴隶和侵略的工具。因此,引起中国广大民众痛恨日寇不断地加紧进攻和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断地无耻投降,中国人民正迫切要求联合一致来打倒日本强盗及其走狗蒋介石南京政府。但是谁能够去组织和领导这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革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来挽救民族危机呢?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才能实现这个任务。为什么?因为:

只有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才能把民众组织起来统一起来。

因为:第一,自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节节进攻以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再三以民族革命战争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自卫,并揭破国民党蒋介石的欺骗、投降、卖国、不断的事实证明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主张是绝对正确的,使中国民众深信只有苏维埃和红军才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领导者;第二,中国苏维埃实行反帝与土地革命的任务,在苏区内首先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势力,民众相信他是真正能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三,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是中国工农革命民众,经过自己的1905年—1925年到1927年——革命以后,由一乡一村经过六七年艰苦的斗争而发展起来的,几年来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卖国的国民党蒋介石所组织的六次“围剿”,在事实上证明了他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不可战胜的唯一的民众武装。同时,苏维埃的人民和红军的将士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长期的军事锻炼,正确的政治培养,他们好像在火炉中锻炼过的钢铁一样,是新时代的模范人物,只有他们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民众,争取中华民族的澈底解放;第四,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是在布尔塞维主义化的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及其领袖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的立场上,正确地走上了人类发展历史的光明大道。

二、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在反帝反国民党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应用中取得的成绩

我要说到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应用反帝反国民党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几个成绩:

当1931年9月东三省事变发生,国民党采取极可耻的“不抵抗”政策时,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时局的新策略所提出的口号是:“(一)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二)推翻国民党卖国辱国政府是顺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底必要条件;(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工农红军是唯一澈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人民底政府和军队”。这个口号立刻得到全中国民众的拥护和响应,工人、学生和城市贫民,到处起来罢工、罢课、抵货和游行示威,特别是日寇进攻上海时,不仅与红军作战受了苏维埃和红军影响的19路军将士转而防卫上海,抗日救国的英勇战士,而一般工农劳苦民众,抗日助战的悲壮事实,简直数不胜数。例如:“当日本武装进攻上海的时候,有几个中国汽车夫被日本人在军事行动时用武力强迫他们转载日本兵士和军械,但是他们竟开到扬子江里去,连人带械一并沉没,自己也一同牺牲了!”(摘自中文《共产国际》四卷一期20页)这种民族英雄的牺牲精神,使19路军能击退日本优势的军队,逼得日本帝国主义与不抵抗的蒋介石不能不急急互相妥协,成立《上海协定》。如果不是卖国的蒋介石以机关枪逼迫19路军撤退及残酷地压迫民众抗日,则上海民众定能把日寇驱逐出去。这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成绩。

1933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进攻察哈尔、长城一带的时候,中国苏维埃和红军为更扩大反帝统一战线,发出宣言愿以“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共同抗日”三条件,

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这宣言动摇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前线官兵，迫得蒋介石的前敌总指挥陈诚及其他将领，不能不向蒋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急忙发出“谁言抗日者杀无赦”的严命，才勉强镇压了官兵的动摇；而察哈尔长城一带宋哲元的大刀队与义勇军等在喜峰口、独石口一带的拼命杀敌，又迫得日寇赶快与反革命的蒋介石互相勾结，成立《塘沽协定》。因此，民众日益相信推翻蒋介石的南京卖国政府是抗日必要条件。到1933年冬季曾在上海抗日作战的19路军，就响应苏维埃的号召，与苏维埃政府订立共同抗日讨蒋的作战协定，成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是统一战线的第二个成绩。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紧进攻，国民党南京政府更投降无耻，由通车、通邮、长城设关，进到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民族危机更加深了。中国苏维埃和红军为直接抗日，派红七军和红十军为抗日救国先遣队，胜利地由福建、浙江进到安徽，这更推动了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情，因而有宋庆龄等提出抗日六大纲领来组织民众武装自卫会的宣言。中国苏维埃和红军首先拥护这个宣言，签名于这宣言的，不仅包含广大的劳动群众，而且有一些不满意国民党的各种派别，也来参加，这是统一战线的第三个成绩。

自“九一八”东三省事变以后，最初的“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游击队等大半还在国民党军阀影响之下，他们常常以“关内出兵，收复失地”来欺骗民众；但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由“暂时不抵抗”、“长期抵抗”、“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抗日是自杀政策”，“谁言抗日者，严惩不怠”等每况愈下的口号，把南京政府卖国面目节节暴露，逼得在游击队中的国民党军官也不得不与广大抗日救国的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现在东北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之下，把一些游击队团结起来，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建立了统一的指挥，这是统一战线的第四个成绩。

尽管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再三提出愿意与任何军队联合抗日，实行救国，而蒋介石总是加紧进攻。红军为要扩大反帝统一战线，打破蒋介石说“红军扰乱后方”的武断宣传，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将主力红军于1934年10月由江西赤都瑞京(金)向西北迁移，以便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现在红军主要势力已进到川陕甘，中国苏维埃领土扩大了，红军发展到近50万，游击队发展到近百万，这就使民众更有信心更有勇气来抗日讨蒋。这一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潮，又引起国民党营垒的动摇和分化，苏维埃和红军为更扩大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即使认为不坚定的，不可靠的，暂时的，局部的同道者，也愿与他们结成反日反卖国贼蒋介石的统一战线。如今年正月初，据报载四川国民党的军长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曾通电反蒋，蒋遂逼迫邓田让出四川的昭化、广元二县给其亲信的法西斯蒂组织最强的第一师胡宗南驻防。邓田虽然一面让了防地，而一面却又让红军去打胡宗南，使红军得到伟大的胜利；四月中红军进攻成都时，据报载，邓与红军订立互不相攻条约。五月中，蒋令邓军进攻红军，而邓军反撤退，使红军易于占领极重要的隘口土门。这一特殊的反国民党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更有重大的意义，这是统一战线第五个成绩。

至于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在国内弱小民族中所进行的反帝反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在东三省革命的高丽民众与我们亲密合作，已是明显的事实，用不着多说。前几年陕、甘、新的回族暴动，广西的瑶(瑶)民暴动，国民党的报都说是共产党的“煽惑”。最近贵州的苗族，四川、西康的番族，只要红军经过，他们都与红军结成统一战线，使国民党军阀大叫“红军勾结土人，故能渡过大天险的大渡河”。这是统一战线第六个成绩。

这些都是证明中国苏维埃和红军能够应用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是他能得到民众拥护，继续不断的打破敌人“围剿”得到巨大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我们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中的缺点和错误

我们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中并不是没有缺点与错误的。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报告中，很详细地批评了我们各地党部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党和苏维埃红军在继续开展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最好的指示。我不重复他的话，我仅指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有些同志还不了解中国目前新环境，就是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的扩大，不敢大胆地去进行统一战线，而保留有很多宗派主义的残余。因此，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及其他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是胜利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保障。

四、现在统一战线应采的策略与发展的前途

我要说到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现在在统一战线应采取的策略与其发展的前途。现在世界已处在过渡到革命与战争的新周期底时期，革命危机更加日益增长着，而中国是四年来已处在革命战争与武装干涉的漩涡中。最近更有了新现象，就是日寇更加紧的进攻，国民党统治的破产，民族危机到了最紧急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已到民众欲直接用革命方法来推翻卖国的国民党政权成立新的保国卫民的政权。现在不是宣传共同行动的时期，而是如何实现共同行动的时期。我们党和苏维埃红军应该大胆地极广大普遍地进行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推翻卖国政府，建立国防政府来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应该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兵士，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一切关心祖国的华侨，在中国境内的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古、回、韩、苗、瑶（瑶）、黎、番等），以至国民党中一切有民族国家意识的热血青年，都联合起来结成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

这个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发展的前途怎么样呢?日寇虽然有新的强大的海陆空军,但是以我们红军战胜了帝国主义与蒋介石联合进行的六次“围剿”的经验,上海、长城、察哈尔对日作战摧毁日军的事实,以及东北游击队数年的顽强抵抗,都证明战争的最终的胜利是决定于广大群众的参加与拥护。我们坚决地相信列宁指示我们的真理说:“革命战争,当他真正吸引和感动被压迫劳动群众时,当他使被压迫劳动群众觉悟到他们是反对剥削者的时候,这个革命战争就会引起神通广大的毅力和能力。”(《列宁全集》24卷544页)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人民联合一致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一定有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可能。再加以日本国内革命斗争的展开,有英勇的日本共产党在战争时能够领导日本广大群众以失败主义来帮助中国,如上海战争时,日本兵士在 frontline 拒绝与中国作战,去年奉天车站的日兵哗变,这些都充分表现了日本共产党英勇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更有高丽革命青年在上海战争时炸死了几个日本高级军官的事实以及其余各殖民地的民众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农,对于中国革命都有过帮助。将来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帮助。这种国际反帝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再往前发展下去,则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更有保障。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日本法西斯蒂是世界大战的挑衅者,突击队。他和德国波兰法西斯蒂联合起来,企图用军事冒险来进攻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并作争霸太平洋的大战。他野蛮疯狂地霸占中国领土,正是为着进攻苏联反革命的战争的必要准备。我们要用革命的战争来阻止反革命的战争,来阻止人类的灾祸。

中国共产党,中国全国民众正站在这个革命战争的前线上。我们要灵活地把中国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团结成坚强的反帝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阻止反苏联的战争及帝国主义大战,完成我们在世界革命历史上国际的任务。我

们相信,中国苏维埃红军在中国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及其领袖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在各兄弟党的帮助下,在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帮助之下;在各国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帮助之下,我们的任务是能完成的。

中国苏维埃红军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及其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1935年8月11日

(选自《新政权与新军队》,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5年版。)

七年来的中国苏维埃

(1935年8月)

周和生

在共产国际六大大会的时候,中国苏维埃运动,还只是在萌芽的时期,只有在大革命中奠定了基础的那些区域开始了游击运动。到1930年开始了中国新的革命高潮,苏维埃运动有了初步的发展,在广东的海陆丰江西之西南部与东北部,和湖南之平浏,广西之龙州百色,福建之闽西,湖北之鄂东南,和鄂豫皖边等区,建立了些不大的苏区;可是在这些区域里还没有做任何巩固工作,还没有集中的组织,还表现很散漫的状态,因此共产国际在1930年6月决议上正确指出:“苏维埃运动在党面前提出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即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并改善这个政府的工作,对于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党应当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完全服从共产党底领导和能成为政府支柱的真正红军,然后这个政府才能够有应有的力量和意义,因此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政治军事的环境,而能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中国苏维埃运动,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七年以来,依靠于中国英勇的工农红军,依靠于全中国人民的拥护,依靠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及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的帮助,依靠于社会主义苏联胜利的影响,获得了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的开展,以及在部分领土上的胜利。它已经从小小的游击区域,创造成为有广大领土和人口的苏维埃区域,就根据国民党报纸的记载,它的

领土面积已包括有 200 万方里,在这些区域包括了 5600 万以上人口。它不但有些固定苏维埃区域,并且还有许多游击区域环绕着,不但有固定区域的广大人口,而且有游击区和白区的广大群众的拥护,在苏维埃区域内,已经没有其他政权,也没有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也没有帝国主义来干涉行政,而走上了中国人民所迫切希望的民族独立自由的光明大道。

在六次大会的时候,中国苏维埃政权,还只是一个雏形,不但没有全国的中央领导机关,即就一省的统一领导机关也还没有建立;对于苏维埃工作的实际经验更是非常缺乏。只是到 1930 年红军占领湖南省城,占领吉安府,占领黄安、六安等地,赤化福建闽西,才开始建立省的苏维埃政权。到 1931 年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节日),经过全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才正式在江西瑞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同时组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朱德同志为主席。从那天便产生在半殖民地与殖民地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在世界上是第二个苏维埃国家。当它成立的那一天,便发表了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的宣言,说明中华苏维埃政府,是不愿使中国人民永远作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资本家的牛马奴隶,它要为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为民众政治经济改善而奋斗,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华民族任何侵略与掠夺,主张澈底的民族自决,同时明白地向全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宣布,只要他们造成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苏维埃政府并不反对与这些国家政府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在遵守苏维埃的法令下,并准许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在苏维埃中国领土内经营工商业的自由。

中华苏维埃政府为确定它的中国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的政策,颁布了自己的根本法(宪法),和劳动法,土地法,选举法,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婚姻法,并确定了苏维埃的教育方针,财政政策等。并且发表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接受帝国主义的意旨,拘捕牛兰夫妇的宣言,愿意将苏维埃区域所逮捕的帝国主义侦探释放,来作

为释放牛兰夫妇的条件。1934年又发表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拘捕九黑工友的宣言。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又发表了反对德国法西斯蒂拘捕特尔曼,季米特洛夫及摧残德国革命民众的宣言。从此可以看到中华苏维埃政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政权,它也是世界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的第二个祖国。

同时共产国际1930年6月决议案上又指出:“共产党应当了解,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和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为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底强大的开展。”这个任务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胜利与否有决定意义的。在六次大会的时候,中国红军还是小的游击队,即就朱毛彭黄贺几位领袖自己所领导的,每支至多也不过几千人,除此而外,有些只是几百人一支的,而且有的还不完全是共产党领导的,其中包括了不少的旧军阀军队的成份,在组织上也还没有统一的指挥。但是在今天,它已经使这些小的游击队发展成为完全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有产业工人为骨干,有最大多数的红色战士是得到了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手工业工人,有丰富的坚强的战斗经验,有统一的指挥,有进步的武器的正规红军。据敌人报纸的记载数量上已达到了50万,并且有100万以上的赤色游击队环绕着,有无数百万的苏区赤卫军,少年先锋队作后备军。红军在英勇保卫苏维埃的实际锻炼中,曾经粉碎了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的六次“围剿”,粉碎了帝国主义法西斯蒂赛克特“围剿”红军苏维埃的军事计划;它曾经举行过有名的三千启罗米达以上的长途远征;它英勇的实行了保卫苏维埃的任务,使我们有权力来说:中国红军是铁的正规的红军,是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的主要的武装,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

中华苏维埃政府,正在开办高级的中级的初级的军事政治学校,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学说来武装红军。为着提高红军的政治经济地位,颁布了优待红军条例,抚恤红军条例,

红军比任何公民，享受苏维埃的特别优待，苏维埃区域每个公民对于红军都是有无限尊崇与爱护的。

中国苏维埃运动所以获得伟大的胜利，特别是因为有共产党的中坚，智勇双全，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群众所最爱戴的领袖，毛泽东、张国涛(焘)^①、博古、张闻天、项英、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嘉(稼)祥、黄公略、方志敏、徐向前、陈昌浩、曾山、张鼎臣(丞)、贺龙等同志的领导。这些苏维埃与红军的首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之下，善于把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路线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去，这是能引导中国广大民众走上解放胜利的道路的最主要原因。所以中国苏维埃运动每一步的胜利就是列宁斯大林旗帜的胜利，就是共产国际路线的胜利。

现在我具体的来说苏维埃政府各方面政策的问题。

中华苏维埃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救国的政府

因为中国事实上是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着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尤其是自“九一八”事变后，差不多整个华北领土，完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陷中国民族于灭亡的危险；因此当“九一八”事变时，虽然那时中华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各地苏维埃便联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民众用罢工罢课罢市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中国，要求赔偿民众所受的一切损失，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到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为实行苏维埃政府抗日号召，又曾经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书”号召白军士兵与红军一起去为打倒剥削压迫与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战。到了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时，又曾经发表以日本帝国

^① 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危害和分裂党中央，给中国革命带来损失。后叛党而去。——编者

主义强占满洲,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告全国同胞书,主张立即武装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东三省。及至上海民众与19(路)军官兵进行抗日的民族防卫战争时,中华苏维埃政府便立即号召全苏区民众举行示威游行,并发出通电,拥护上海人民与19路军官兵坚决抗日到底。另又发表告19路军官兵书,并进行各苏区的募捐运动,单就江西苏区便汇到上海有数万大洋,作为当时罢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人建立饭堂之用,一面准备动员全体红军和千百万赤卫军和少先队游击队实行对日作战。如果那时国民党不把苏区红军四方八面围困的话,红军便开到了上海与抗日民众和抗日官兵共同抗日了。到1932年4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了上海抗日防卫战后,中华苏维埃政府便正式对日宣战,号召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号召白区人民组织义勇军并动员全国红军对日作战,号召全苏区人民从各方面帮助红军,以便红军顺利地去完成抗日救国的任务。正当在这个动员的时候,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竟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协定”,并立即压迫英勇抗日的19路军官兵,从福建方面来进攻红军,阻止红军北上抗日,使中华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计划,遭受到牵制。然而中华苏维埃政府并不因为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①等几个汉奸卖国贼的阻碍而停止抗日救国的行动。如是到1933年1月,又一再向全国民众宣言,提出全国民众共同抗日所必需的下列三大条件: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

(二)立即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队伍。

^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使蒋介石由“剿共”转为抗日。——编者

并正式宣言无论任何军队，只要实行这些条件，中国红军便愿意与之联合共同抗日。可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仅没有丝毫觉悟，反而更加紧对苏区和红军的经济封锁，集合全国军队对苏区和红军举行五次“围剿”的总攻击。幸而在红军英勇保卫苏维埃的热忱下，完全冲破了国民党的进攻，消灭了他的主力部队 52、59、11 等三师，活捉了师长李明、陈时骥二名，伤击了师长萧乾，这就证明汉奸卖国贼的可耻的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是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遭受失败的。虽然国民党南京政府屡次想破坏与阻碍苏维埃的抗日救国行动，但它始终没有丝毫放松自己的救国主张，也就更加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忱，使那些在蒋介石高压下而有救国天良的军官士兵不得不接受苏维埃的提议，于是便发生了苏维埃政府与福建的人民政府及 19 路军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协定，因而产生了福建事变。当蒋介石出兵福建压迫 19（路）军的时候，苏维埃政府为着履行协定条文，便立即动员红军援助 19（路）军，只是因为人民政府与 19（路）军中几个领袖的动摇，以致遭到瓦解。当然红军在战略上欠缺灵活的与 19（路）军的密切配合，也是一个原因。此后中国工农红军，在 1934 年夏季时，又曾经在敌人正当疯狂的六次“围剿”中，抽出了两个军团的兵力，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取得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至于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章任琢等几千人签名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是首先响应的。总之，中华苏维埃政府，不管国民党南京政府怎样压迫抗日运动，不管日本帝国主义怎样强暴，它誓死始终领导全中国民众，动员全中国工农红军为抗日救国，为争取民族生存而战，决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威迫之下作亡国奴。它愿意与一切政见利害不同的反日的党派团体合作，决不肯对任何一个卖国贼汉奸让步。

苏维埃政府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所希望的政府

苏维埃政府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做到了每个工人、农民、贫民、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艺术家、革命家不分男女、不分国籍的都有选举权。为着保障最能坚决彻底抗日救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所以在市(乡亦同)苏维埃中,工人只要 13 人便选举一个代表,农民及其他公民要 50 人才选举一个代表。中国妇女,自有历史以来就处在奴隶的地位,从没有参加政权的机会,而苏维埃特别保障妇女至少要占代表成分中 25%。在 1933 年改选运动中,完全做到了许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数量,如福建省上杭县才溪区之上才溪乡 75 个代表中妇女占 43 个,下才溪乡 91 个代表中妇女占 59 人。经过这样选举出来之妇女代表,有许多是被选到县、省以至中央机关充当委员部长科长主席等职。像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 10 个部长中占了 2 个妇女,在江西省各县,有过 4 个妇女当县苏维埃主席,在区乡两级苏维埃中妇女当主席的数量又更多了。

市乡苏维埃代表选举出来之后,又将居民适当组织于各个代表领导之下,(通常以 30 到 70 人置于一个代表领导之下)。以便代表与居民建立固定的关系,这样使人民与苏维埃打成一片。市乡苏的代表又按其住址接近,在 3 个到 7 个代表中又选举一个代表主任。代表主任在市乡苏维埃主席团指挥下分配和指导各个代表的工作,传达主席团决定的问题于各个代表。召集其领导下的居民开会,解决居民中的日常问题。在每个街道或每个村必须有一个代表主任居住,这样才好领导全街或全村的工作。在每个市乡苏维埃下面,又组织有各种临时的固定的委员会,如教育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山林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春耕委员会、备荒委员会、优待红军委员会、桥梁道路茶亭管理委员会、妇女、劳动、教育等委员会,农业研究委员会等等。这些组织都是吸收苏维埃公民中一切积极分子组织的,既可以发扬选民的创造性,

又可以教育人民管理国家。同时在市乡苏维埃下面的公民又有各种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组织，如贫农团、妇女代表会、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合作社、劳动互助社、互济会、反帝大同盟、拥护苏联大同盟等等。这样一来，使每个公民都成为有组织的。苏维埃经过这些组织可以使一切建设工作，动员工作，深入公民中去，公民对苏维埃的意见也容易反映到苏维埃来。市乡苏维埃全体选民大会是半年开一次，总结半年工作，讨论下届工作，改造代表会议，这样使人民新的意见可以涌进苏维埃，能吸引新的积极分子当代表。至于在每年两次，改选期间中发生有代表犯重大错误，需要撤换时，得由十个选民的提议，半数选民的通过，可行使公民召回权。或由代表会议开除之。至于市乡苏维埃以上各级政权，均是由市乡基本选举所产生出来之代表组织而成的。这就为整个苏维埃组织系统完全自下而上的彻底的民主。在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不少国家的法西斯蒂疯狂般的剥夺了人民最后一点自由与民主，只有苏联与中国苏维埃才实行了真正广泛的民主制度。同时苏维埃政府真正做到了中国人民所最希望的廉洁政府。它的每个工作人员，无论他担负任何工作，他的生活费不能超过工人农民劳动所得的生活费水平。政府一切收支完全是公开的，统一的，有预算决算的。财政的支配不容许个人操纵，贪污浪费的现象是不容许存在的，在江西、湖南、河南各个苏维埃区域，因为敌人的不断进攻，经济封锁，或是水灾而致粮食缺乏，经济困难等，因此许多政府的委员及工作人员完全不支任何报酬而纯粹尽义务。在中央苏区、湘鄂西、鄂豫皖苏区，则有过一时期每天只吃一顿干饭，一顿稀饭，或减少食米分量，或只吃两顿稀饭，自己栽菜，这样节省出粮食借给前线战士。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曾经感动了千百万劳动群众，而得到他们的热烈拥护。并且对于人民日常发生的问题，无论事之大小，总是随时发生随时解决，不要人民一再催请，更不须人民费用分文。

至于国民党衙门又是怎样呢？不但人民没有丝毫权利过问政府一切事情，并且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呼声，即是“无官不贪，无绅不滥”，上下勾结，狼狈为奸，想尽一切讹索敲诈的方法来剥削人民，这些现象，在国民党统治下更加厉害。至于人民中发生什么重大案件或是水旱灾荒，直到人民饿死冻死，那些官僚们深居衙署，拥妻抱妾，终日花天酒地，人民的呼吁，照例是“三八告期”“定期踏看”“定期审讯”“另期宣判”等。经过这些方式一再敲榨，直到人民家产净尽，人民的痛苦还是没有解决。所谓“衙门深似海，弊病大如天”，国民党政府的衙门，真是人间的十八层黑暗地狱。

苏维埃给农民以土地实行救灾治水

中国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农民需要的是土地。可是中国很多的土地，甚至南部有些地方，80%以上的土地是操在地主阶级手里。地主把土地转租于农民，从农民手上夺去60%到80%以上的收入，使农民劳动终年，而不能弄到衣食，所以中国的农民均希望自己有一份土地，而不再受地主的剥削。因此苏维埃运动一开始便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基本任务。在六次大会的时候，便有许多区域的农民要求分配土地，但是那时还只有个别地方开始了，并且分配得不甚妥当。到了1930年春，才把分配土地的任务提得更高些，开始在闽西、江西正式分配土地。但最初虽然在口号上是没收地主阶级大私有者的土地分配给无田及少田的农民，而实际却成了把一切土地分配给一切人的现象。那时在立三路线错误领导之下，既没有具体的分配法，而政权中又混入有不少的反对土地革命分子，结果就发生有些地方名义上分了田，而实际上未分，有的地方虽然分了田，但地主也分了好田；反之贫农、雇农、中农，分了坏田，或是少分了田，甚至未分到田。只有在接到国际1930年6月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时，指出：“在苏区党应该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革命应当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中农的。土

地革命中的动力应当是雇农和贫农,同时他们应与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并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必须坚决打破富农们的企图,富农或者企图阻碍没收地主的土地,或者企图按照生产工具之多少做比例去分配已经没收之地主土地。党应当实行没收一切地主,教堂,寺院以及大私有者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去交给贫农中农去平均分配,来与富农的企图对立起来。但没收的原则不要实行到生活优裕的中农身上。同时党应该宣传土地国有的中心口号,把土地国有口号的实行,与全中国的革命高潮以及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胜利联系起来”。国际这个正确指示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在执行这一指示后,土地斗争也就更加走上深入的一步,斗争也随着开展了。直到1931年中央政府成立,把几年来零碎的各地的斗争经验归纳起来,便正式颁布了土地分配法。这时才有了统一的办法,使许多分配得不好的区域和未分配的区域都重新起来分配过了。以后又在1933年进行了普遍的查田运动,严厉地打击了地主富农争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这时土地革命才进到了深入阶段,使土地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在雇农贫农中农身上。

在这几年来,苏维埃政府关于领导土地斗争方面,确实得到了许多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是澈底推翻农村封建势力,使农民从残酷剥削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的良好方法。这个问题在某些地方,发生了不正确的策略,可以使一部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封建势力的分子被排挤出民族革命战线之外,使他们更坚决来反对土地革命。因此根据国际的决定,在苏维埃区域应该是没收地主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占有的寺院公堂的土地,以及大私有者的土地。至于富农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小商人,甚至中等的商人兼有少数土地,而不是专以出租土地为主的,并未谈到没收。并且苏维埃根据国际的指示,在自己的政策上亦规定暂时不禁止土地买卖出租的自由。在今天还可以顾及到在地主阶级中有些分子,他们看见帝国主义日益加紧完全殖民地化中国,有

妨碍到或动摇到他们的利益方面,因而愿意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愿意以一部分财产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经费,我们对这些分子可以不执行没收土地,准许他们根据苏维埃法令出租土地。但是过去的确有些区域,没有正确的去执行国际的决定,缺乏深入的广泛的宣传工作,因而实行了没收富农多余土地,而分给以较坏的所谓“劳动份地”,甚至把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等兼有少数土地的,亦没收了。事实上是取消了苏维埃政策上准许土地买卖出租自由的规定。另一方面便是不估计当地的斗争具体环境,机械的随处运用分配土地,来代替某些区域暂时只能实行减租抗租抗债抗税的斗争。当然分配土地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澈底推翻封建势力,使农民从残酷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良好武器。但今天正当是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用武力占据了东三省、热河、察哈尔、河北等中国领土,加紧完全殖民地化全中国。“日本法西斯蒂军阀是反对中国反帝土地革命的先锋队”(国际十三次全会决议)我们就必须“在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国际十二次全会决议)。在这个任务下,将来所新发展的某些区域,因为还没有具备分配土地的条件,那时我们不能机械的立即进行分配土地。或者在某些新发展的区域,在执行土地革命基本策略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时,对于那些积极参加反日民族战争的地主则不应没收。因此无条件的到处一律无例外的没收地主土地,是有害的。

现在我再讲到苏维埃政府为着使农民分得土地后,能够在土地上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便领导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救灾治水。本来中国农业生产一般是降落的,其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农村的影响。这已是中国普遍现象。可是苏维埃区域还加上因为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残酷的破坏,以及军阀国民党不断的对苏区的军事进攻,影响农民不能安居乐业,以及富农

商人的投机与怠工,而影响到外来工业品价高,而农产品价又降落。这些种种原因,便使苏区农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且遭受了不小的损害。我可以举下面的例子来说明:

比如国民党在第三次“围剿”苏区和红军时,在国民党大烧大杀的口号下,中央苏区的兴国、吉安、永丰、万太等县,一部分区域一时曾被敌人占领,结果损失的耕牛在50万以上,兴国全县永丰之龙冈,吉安之东固等区域的房屋,农具,种子,肥料完全被国民党焚毁一空,弄得农民不仅不能继续耕种,并且连住的房子也没有了。又如当国民党军队卫立煌部进到鄂豫皖卫区时,农民整区整乡的遭其屠杀,房屋尽被焚毁,所有的农作物均纵放军队的马匹去践踏。又如当何键军队进到湘鄂赣苏区之平浏时,成年青年不分男女,没有屠杀的,便整批的压迫到白区去做苦工,或是逼迫妇女去当娼妓。在敌人这种残暴情形下,当然只有增加苏区土地的荒芜,而产生最初时农产品的向下降落。可是苏维埃政府对于敌人所加予的这些困难,它依靠于广大群众的创造性,依靠于群众加倍仇视军阀国民党的革命热忱,它一面号召群众以革命的阶级的同情举行了互相救济,一面由国家银行贷款予农民购买耕牛农具,并在财政部提出一部分现金作为救济金。同时把所有的劳动力均组织起来了。从劳动互助社,妇女劳动生产教育委员会,开荒队,修堤队,一直到老年人小孩子所组织的肥料队,看水队等等,使所有的劳动力均组织到生产战线上去了。苏维埃政府对于生产战线上突击队员又予以名誉上和物质上的奖励,以提高劳动热忱。再则是号召了农民组织耕牛合作社,农具合作社,鼓励耕牛入口,鼓励农民,帮助农民购买耕牛等,以解决耕具。对于荒芜的土地,经农民开垦的,政府按其荒芜程度,免收三年到十年的土地税。苏区农民在政府这些号召和帮助下,将国民党所加予的困难,一般的说来,是相当克服了。因此在1933年,中央苏区的粮食生产便比1932年增加了一成半,赣东北省增加两成。到1934年,全国各地

均大遭干旱水灾,江苏、浙江、湖北等省许多区域完全没有收成,灾民全国达一万万以上的人口,可是苏维埃区域粮食生产反而比1933年又增加了10%以上。最明显的是江西省的白区各县,大部分闹旱灾水灾,平均收成只有60%至70%,而江西的苏区内反增高收成到110%以上。这样迫得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苏区是丰收的。这并不是苏区有什么天保佑而没有干旱水灾,问题是由于苏维埃实行了救灾治水。比如四川苏区,他们在1932年到1933年一年中,便开凿了一条由通江为起点以接陕南渭水的一座运河,横贯数县,长约一百余里,这条运河的修成,不仅在运输上便利,对于灌溉上更有绝大的作用。中央苏区为预防水旱,广泛的修理坡堤,并在瑞金福建等地修筑了好几条数十里的大坡堤。所以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也不能不在民众面前公开承认,“并且赤匪还是井然地耕种一切谷物,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荒芜,有些地方树木和菜蔬还保存得比我们自己的区域内好些”(《国闻周报》12卷19期《川东北剿匪印象记》一文中)。

至于国民党政府所统治的区域,拿经济条件来说,比苏区有着绝对的优势,应该比苏区要好些,可是实际却完全相反。就拿救灾治水来说吧,黄河是有保堤经费的,为保堤而设有衙门,有固定的经费,可是这些经费都被蒋介石等军阀移作战费,或是军阀官僚们饱私囊去了,因此弄到年年决堤,整县整区的人民财产被决堤而冲毁,使人民流离死亡无家可归,又如江浙是湖泽最多的,又近长江,纵然干旱也可以利用江湖之水灌溉,纵然歉收也不能完全绝望,但是国民党政府只知把一切剥削而来的经费用来延长内战,用来自己发财,对于救灾治水完全不理,乃造成了全国一万万以上的灾民。什么赈济灾荒,只是国民党军阀官僚们借来欺骗人民加重剥削人民增加税收的口实而已。真正发展农业实行救灾治水的,只有苏维埃。

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建设

苏维埃政府为着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着便利人民需要,保障红军供给,改善苏区人民生活起见,对于发展工商业,发展对外贸易,及人民合作事业等同样看作重要的任务。在苏区私人资本的工商业是占主要的地位。为着发展私人工商业,曾经颁布了工商业的投资条例,鼓励私人投资,取消了苛捐杂税,予商业上以便利。农民在苏维埃下面分得了土地,工人增加了工资,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使商家能够多做生意。凡是那些相信苏维埃而继续在苏区营业的,都在苏区获得了利益,只有那些故意对苏维埃停业怠工,故意破坏苏维埃经济,才受到苏维埃政府与广大人民的制裁。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经营工商业的,都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而走上了破产。

在发展苏区的经济上,另一途径,便是领导人民进行合作事业。这在苏区已经有过显著的成绩,像江西福建两省里面的 17 个县中到 1933 年 9 月止,单是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两种,已经有统计的,便有 1423 个,股金有 355510 元。这些股金是从五角起到一元的。社员成分以农民手工工人占绝对多数。每人不得超过 20 股(或 30 股),但一个社员只有一个表决权。这些合作社完全是吸收私人资本组织的。所有合作社差不多没有一个受过损失,而是完全获得红利的。所得红利,按月按季照股金摊分。合作社一切工作的进行,完全取决于社员,政府居于帮助提倡的地位。这些合作社实际的给予了人民以很大的利益,因此合作社在苏区得到极广泛的极迅速的发展。其次是国家经营的,像四川苏维埃经营有盐井、国营商店、对外贸易局,在江西苏区则国家经营有乌(钨)砂、铸铁、纸张、木材等公司,以及国营商店、粮食总调济局、对外贸易局等。这些营业主要是站在反对国民党经济封锁,减轻苏区经济困难,改善人民生活的意义上,而不是希望马上实行国家垄

断反对私人资本的政策。苏维埃政府采取这些办法来发展经济是获得了成绩,使破坏不堪的经济得到相当的恢复。并且苏维埃政府还采取了别的途径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曾与福建人民政府在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协定时,附带订立了通商的协定,这不但是苏区的利益,而且是福建人民政府统治区域内工农商业的利益。此外白区许多商人在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经济封锁政策,特别是苏维埃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因而商人便暗中进行与苏区通商。就拿食盐来说,这是国民党封锁政策中最主要的一项,但吉安赣州的商人,却大批的暗中运到苏区,特别是苦力农民小商[人]更加努力的不分昼夜的由白区挑运进苏区。此外敌人的经济封锁,也大大的发展了苏区人民的创造性,曾经发明了自制药剂代替西药,自制樟油代替煤油,自制油墨蜡(蜡)纸,自己熬盐,在农业上加种棉花糖蔗等,都部分地解决了人民的和战争的需要。

苏维埃政府在解决军政费用方面,自然也依靠税收,在苏区现行的税收有关税、商业税、农业税三种,税收的重担是放在有资产富裕者身上,采取累进的方式。税收的轻重,是按其物品的消费与人民的需要来决定。如工农日常需要的食盐、粮食、布匹、药材、煤油、火柴等,则免税。如非人民日常需要的奢侈品,则收税较重,从1%到30%。至于农业税则按分土地多少,人口多少,及成分等来决定。中农贫农收税较低,富农大商人收税较重,而中小商人,因取消了过去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所以他们的负担是比以前轻些。工人雇农、红军家属的土地则免收农业税。水旱虫灾歉收的地方,则按情形免收或减收。任何物品经过一次征收后,无论转到任何区域,不再重征。这种良好的税收制度,使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也不是不认为是“和传统的、现行的、从富人身上取得轻,从穷人身上取得重的税制完全相反”(《国闻周报》12页19期《川东北剿匪印象记》)。

苏维埃政府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救济了失业工人

在苏区的工人,一般的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订立了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建立了劳动检查所,设立了社会保险局,设立了劳动介绍所,工人一般的增加了工资,对于工人的利益,苏维埃颁布了劳动法,用法律来保障工人,雇主违反劳动法,则有专门设立的劳动法庭裁判。但这只是对于工商业主与地主富农的,对于农民或贫农工人间彼此发生的工价待遇等的争论,则一般地由当地工会贫农团用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这不是剥削劳动力的问题。在苏区中由国民党所遗留下的失业工人,绝对大多数都得到了工作,如瑞金城内,只有两个绸缎店员失业,而他除了能做绸缎店员外,别的工作又不能做,因此只能实行救济,并分给他一份土地,并力图恢复绸缎业来解决工作问题。这比在国民党区域,工人在失业后除了自己找得工作,或当土匪当娼妓饿肚子而外,得不到政府任何救济,真有天壤之别了。在目前资本主义长期的经济恐慌之下,陷数千万失业工人于饥饿的地位,只有苏联和中国苏维埃区域才扫除了失业的现象。苏维埃政府并且欢迎白区的失业工人到苏区做工。红军占领福建漳州时,那里有1000多失业工人,红军政治部实行着遍地救济,每人均得到15元大洋以上的救济金。红军离开漳州时,带了200多人来苏区做工,有300多人当红军或到政府工作。苏维埃区域的工人均组织了自己的工会,政府给予工会的房屋,印刷机器,开办工人的学校,俱乐部等。对于工人的报纸,苏维埃政府的邮政局减费或免费寄递。

苏维埃政府实行免费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在国民党区域,文化教育机关完全操在地主资本家手里,受教育的也是富家子弟,贫寒子弟受到自然的排斥,无法入学或升学,工人农民更没有受到教育的机会。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是教育地主

资本家来怎样统治工农,教育工农来怎样驯服他们的统治;现在更用“念经救国”,不要武装抗日,取消中国人编制的教科书,而代之以日本帝国主义编制的奴化教本;以法西斯蒂的反动来围剿学校,以消灭人民的爱国思想,这样来替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造成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便利日本帝国主义来统治中国。另一方面,将教育经费移作战费,使青年失学,教员失业,造成全国人民80%以上的文盲。对于稍有革命思想、进步思想的文学家、科学家、新闻记者、一切文化机关的革命分子,法西斯蒂均加以摧残暗杀。在不久以前,竟枪毙了我们中国人民最爱戴的、伟大的教育家革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同志,使中国教育建设上遭受莫大的损失。国民党南京政府这种法西斯蒂的白色恐怖,决不能丝毫降低中国苏维埃运动,只有加深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加倍仇恨与反抗。中华苏维埃政府最痛心疾首的是失去了自己的教育领袖,它当领导全人民起来打倒摧残教育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它当更广泛的发展文化教育,创造成千成万的教育家,将团结并解放国民党法西斯蒂压迫摧残下的千百万的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学、一切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以继承瞿秋白同志的遗志。

现在我来说到苏维埃在教育方面所作的工作。它首先是实现了普及农村教育。在1933年的时候,曾在江西福建做了2932个乡的统计,计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学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有识字组(福建在外)32318组,组员155371人;有俱乐部1656所,在俱乐部工作的有49660人。这个数目是一般的统计,还不能说明入学与失学的比例,因此再举兴国一个例子来说明:兴国计有学龄(八岁以上)的儿童总数为20969人,那时已有入学的12806人,失学的占8163人(内女的占四、九一二),入学与失学的比例恰恰60%与40%之比(在国民党统治时,入学儿童不到10%)。但这些失学的儿童均加入了儿童团,在

儿童团内也有很多学习机会，如识字、唱歌、打球等比赛。至于补习学校与识字组，则是为失学青年与成年而设的，在从事生产外来提高文化水平的。至于俱乐部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文化工作的；内中分体育、识字、田径赛、演讲、歌舞、新剧、魔术、艺术、读报、墙报等各组。以各种各样的有兴趣的方式来吸引人民加入文化运动中来。

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还可以从报纸发行上表现出来。中央苏区有大小报纸 14 种，每种每期都发行到数万份之多；这些报纸发行出去之后，经过读报组的方式，每份至少也能吸引十余个读者。另方面还可以从许多穷乡僻壤的村野中，每当夕阳西下或红日初升的时候，便有成群的青年成年儿童在体育场上活跃着。以前妇女几乎百分之百不识字，现在许多能写数，记账能写信作墙报；有的能作几千字的文章，能作长篇演讲。在兴国夜校学生 15740 人中，女子占 10752 人；识字组组长 22519 人中女子占 13519 人。再方面，则是鸦片，赌博，妇女缠足等，一般的是消灭了，迷信是大大的减少了；尤其是语言一般的都能懂或说普通话，这些都是文化教育的结晶。

苏维埃政府，对于教育经费，虽然今天还是处在财政相当困难条件下，但它始终只是逐年扩大教育经费，并不如国民党政府把最低微的一点教育经费去移作战费。并且为着更高更广泛的发展文化教育起见，已经开办有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列宁师范学校、卫生大学、交通学校、红军军事政治大学、艺术大学、高尔基艺术学校、中央农业学校等，以造就专门人才。同时对于旧的知识分子、教育家、艺术家等，苏维埃政府，又予以特别优待，以吸引他们参加苏维埃文化建设工作。

总之苏维埃政府自成立以来，无论它现在所占领的区域经济如何落后，无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的策略如何残酷；可是中华苏维埃政府，它能在敌人不断进攻的紧张军事环境中，仍然在各方面

进行了极大的建设工作,把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饥饿、野蛮、封建奴役与剥削的地方,造成了新的世界,使广大人民走上了自由光明快乐的道路。

可是苏维埃运动还只是在中国小部分领土上取得了胜利,而大部分中国领土,整个中国民族今天所处的环境,外而日本帝国主义差不多占据了整个华北,内而国民党南京政府更加无耻的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苏维埃和红军进攻,延长内战。国民党统治的结果,造成了全国经济的破产,使人民处于失业饥饿死亡的状态中,国亡家破,迫在眉睫,舍救亡图存而外,别无出路。中华苏维埃政府为着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战线,以求救亡图存,将根据最近发表的宣言,抱定了十二万分的决心与希望,愿意领导全国人民,愿意动员全国红军,愿意与具有救国天良的中国各党派各军队共同携手一致抗日,以实现挽救中国危亡的当前唯一任务。它相信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拥护,有中国人民血汗换来的一千万以上的武装,有中国人民血汗换来的一千架以上的飞机,一致动员起来,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能取得中国的完全独立与自由,必能打倒少数出卖中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汪精卫等南京政府,以及溥仪等的所谓满洲国政府,及一切卖国军阀。

中华苏维埃政府,要求全世界各国劳动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它同时愿意与一切赞成中国民族独立的任何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

我们相信各国无产阶级在兄弟党领导之下,在列宁斯大林的国际领导之下,必能肃清一切社会民族侵略主义的残余,而坚决起来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的殖民地政策,而给中国革命与中国苏维埃以巨大的帮助。中华苏维埃政府深深赞美日本兄弟党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义占据满洲的英勇斗争,深深赞美国兄弟党领导广大群众募捐援助中国革命的义举,他给了其他兄弟党与全

世界帝国主义各国统治下的无产阶级的最好先例。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巨大因素，保护中国革命，保护中国苏维埃，即是为世界革命而斗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相信真正列宁斯大林的国际党员决不会轻易忽视他的国际主义者的伟大任务。

世界革命的领袖斯大林万岁！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万岁！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苏维埃万岁！

（摘自《新政权与新军队》，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 1935 年版。）

方志敏——中国人民的英雄

(1935年9月12日)

Ar·哈马丹

在南昌市大家都十分熟悉这位健壮朴素的人。在群众集会上，在工人住宅区，常常可以听到他那热情洋溢的演说，号召人们同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和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具有革命鼓动家的无限充沛的精力，不停息地奔波于城市、江西偏僻的山村和敌军士兵群众之中。他始终同群众在一起，一向走在群众的前头。

方志敏生于农村，并在那里度过自己的童年。他亲眼目睹中国农民遭受封建剥削和奴役之苦，深受军阀横行霸道和苛捐杂税之害。

他离开农村和家乡，到城里求学。

他读过专科学校，得到工程师称号。但他并不是只顾学习。他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

1927年8月1日夜爆发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在贺龙和叶挺率领下的军队举起了战斗的革命旗帜。南昌起义中极为活跃的参加者方志敏后来留在江西开展活动。他那充满炽热情感的声音响彻了工农已经奋起斗争的江西省。方志敏走到哪里，就号召那里的工农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他在家乡弋阳组织了最早的革命游击队之一，领导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江西省各地的武装工农纷纷投奔于方志敏，加入他的队伍。组织游击队的消息传开后，邻省的劳苦大众也渐渐奋起。

1928年末，在浙、赣、闽三省边界地区出现了第一批苏维埃。

方志敏被选为边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① 在方志敏领导下开展了没收地主土地和废除盘剥性契约的活动。获得了解放的土地回到了它真正的主人——劳动农民手里。

1929—1930年，国民党反革命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之下向江西、湖南、湖北三省苏维埃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大批国民党军队向苏区发动了进攻。武器装备都很差的红军和游击队成功地抗击了国民党匪徒的进攻。方志敏领导的游击队英勇地捍卫着苏区的边界地带。通过锐不可挡的反击。红军不仅打退了敌军，而且用被击溃的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武装了自己。

1931年，方志敏将分散活动的游击队组成红军的一支正规的大部队。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唤起中国各阶层成百万群众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江西、湖北、陕西、贵州，湖南、安徽、福建和四川，全国各地都在大踏步发展苏区，组织游击队，建立正规的中国红军部队。

由于恐惧而发狂的反革命连续向苏区发动“围剿”。在国民党军队总司令部工作的日、德、美等国军事顾问制订了“消灭红军”的战略计划。用外国贷款装备起来的百万国民党军队先后六次实行“围剿”，但在同红军和苏维埃中国人民的较量中遭到惨败。

1933年，在南昌、福州、安庆等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大幅告示，悬赏大洋五万块捉拿“赤匪”方志敏（无论死活）。而1932年时是赏洋三万块。可是，方志敏的队伍一直在苏区城乡活动，从无一人出卖人民的最好的朋友。

1934年，中国在帝国主义强盗的铁蹄下呻吟。日本占领军横行满洲、热河和华北大地。方志敏指挥的红十军改编为第一支抗日先遣队。方志敏同志被任命为这支军队的司令员。^②

① 当时方志敏任闽浙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原编者注

② 方志敏当时的正式职务是军政委员会主席，该军政委员会随红十军团，即抗日先遣队行动。——原编者注

此时,国民党将领们愿出八万块大洋买方志敏的头。上海报纸要求“立即消灭这位赤匪头目”。蒋介石派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好几个师去对付方志敏的部队,但是,同过去一样方志敏闪电般地打击敌人后又无影无踪了。

1934年末,红军主力离开江西,开始了向川陕新根据地的历史性进军。方志敏所率部队顶住大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保障了红军主力的撤退。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军队同占绝对优势之敌奋战。几个月(1934年9月—1935年1月)中,方志敏的部队几乎天天都打胜仗。

1935年1月28日夜,方志敏在一小队士兵随伴下深入敌占区进行侦察。在江西省德兴县怀玉山下方志敏被敌军官团包围,经激烈交火,终于被俘。^①

国民党军阀们为此而欣喜若狂。“赤匪大头目”落到了凶恶的反动派魔掌之中。方志敏被戴上手铐脚镣投入监狱,被带往国民党控制区城镇游街示众,借以炫耀“对红军取得的重大胜利”。

非人的折磨并未能摧毁这位杰出革命者钢铁般的意志。国民党报刊偶尔报道一点审讯方志敏的消息。在国民党刑讯室“受审”,那就是受令人毛骨悚然的中世纪式的刑罚。敌人的报刊也承认,“方志敏还是那样死硬”。

1935年2月6日,国民党在南昌豫章公园集会,“欢呼活捉方志敏”。

请看美国报纸是怎样描述这次庆祝大会的。公园四周布置了警察、宪兵和军队。两旁人行道架上了机枪。任何人不得离开人

① 方志敏所率红十军团(即抗日先遣队)在北上抗日途中因遭国民党优势兵力堵截,多次受挫。1935年1月,该部主力在怀玉山地区被七倍于我之敌包围,奋战数日,弹尽粮绝,部队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在突围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原编译者注

行道走上马路。被戴上手铐脚镣的方志敏用装甲车运到现场。他在大批士兵押解下露面。没有一人欢呼，个个沉默不语，连蒋介石总部的军官也是如此。这种沉默表示了对昂首挺立于高台之上毫无畏惧神色的人的尊敬和同情。他被匆匆带走，因为人群的这种沉默使当局感到十分可怕。装甲车刚一离去，人群立刻骚动起来。可是，一挺挺机枪把枪口对准了他们的胸口和头颅，这才使他们安静下来……

在“审讯”过程中，敌人答应不杀方志敏，但交换条件是……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读一段国民党官方通讯社“中央社”的一段话：

“方志敏拒绝一切建议。他顽固不化。看来，他至死也变不了这种态度。他拒绝回答一切有关红军情况的问题。”

中国人民的英雄方志敏被反动派血腥的手杀害于南昌。

(马宝华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司令员朱德

(1935年12月6日)

Ar·哈马丹

民间传说常常创造出充满热情称颂的传奇故事,赞美那些破坏旧中国并扫除其千年残酷压迫、奴役和暴力的新人,歌颂那些砸烂束缚人民和国家的帝国主义锁链的人们。请听中国人民创作的歌颂朱德司令的传奇故事。

“他来自遥远偏僻的山区。身躯高过任何大树。他伸出双手,就能喷出团团烈火,烧死任何敌手,他的敌人就是人民的敌人。他眼观四方,能看到百里之外。

“任何东西都逃不出他锐利的眼睛。他的军队不计其数,全体人民都跟着他走。连外国人也怕送命,纷纷逃出中国。论力量、论勇敢和智慧,无人可与他较量,可他为人朴实,性格和善。他睡在山岭、旷野,全体人民都为他警戒。他一觉醒来,又率领人民前进,再前进。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住他,他走遍我国大地,给一切穷人、无家可归者、善良的人们带来解放。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的人民热爱他,到处都有人热爱他。他来自人民,人民给了他朴素而响亮的名字——朱德。”

朱德是四川人。他在华南和西南生活了一段时间。他认真而深入地观察了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的生活。被封建主义锁链捆绑的丝毫动弹不得并遭受野蛮剥削的中国农民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穷困不堪的城市工人受到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压榨,这种种悲惨情景在朱德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以巨大的毅力克制着

满腔怒火。在他身上，超人的勇敢精神和清晰冷静的智慧兼备。他清楚地懂得，“独木不成林”。但他也知道，点点星火，一旦被投入千百万人民群众之中，必将燃起伟大的革命烈火。

朱德是人民的真正的儿子。他来自人民大众，不仅善于同群众保持联系，而且与群众生死与共，因而使这种联系不断加深，不断巩固。人民赋予他非凡的才能。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之下，他都显示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智慧，而且对群众的心理和情绪了如指掌。他总是把群众所受的苦难当作是自己的苦难。

在云南讲武堂，他初次与军事接触，马上就意识到军事手段在人民斗争中的重大作用。从此，他就成为一名有才干的学生，连他的教官老谋深算的将领也只好表示叹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呵。

在中国的军界，朱德享有通晓军事学术的盛名。大军阀们互相争抢，以争得朱德为其部下而视作荣耀。沉默寡言的朱德眼看这种争抢，暗自好笑。因为他早已选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1917年10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声炮响，其轰鸣声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了，一部分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精神立刻振奋起来了。不久，中国出现了共产党。朱德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运动迅速在国内掀起。

朱德担任一个团的指挥官。这支部队与华南的其他部队不同，它具有良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熟悉军事知识。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个团会有一个由团长亲自领导的党组织。经朱德精心挑选的士兵和青年团员都是一些对革命忠贞的人。朱德悄悄地、耐心地培育着革命骨干。

按照党的要求，朱德离开中国。^①他在欧洲度过了若干岁月，考察新的国家，研究军事学术，学习外国语言。他显示了非凡的才

^① 朱德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去欧洲留学，他是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编者注

能,短短时间内就掌握了法语、德语和英语。^①当他进一步学习俄语时,他的朋友们称他是革命的语言学家。不过,他最为注意的还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制定的革命战争理论和实践。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对十月革命丰富经验的研究之中。

返回中国后,他曾对亲密的同志说过:“我开了眼界,学到了新知识。我将把这些知识贡献给我们的事业。”

党再次把他派往华南,到军阀部队工作。先是担任原先那个团的团长,不久升任旅长。著名的云南军阀范石生还任命在他手下当旅长的朱德担任其幕僚,向他倾诉自己的内心秘密。占据云、桂、粤三省,乃至整个华南地区;到那时候,范当华南王,朱德将被任命为督军。

朱德心里发笑,但仍表示同意,与此同时,他不失时机地抓紧组织和训练第一批革命队伍。朱德在云桂两省军事将领中享有无可争议的威望。他的军事知识超过所有将领。所以当传说朱德是共产党人,他的旅是共产党旅的时候,范石生根本不相信,以为朱德大概是想“独树一帜,当个将军”。对于范石生来说,失去朱德将意味着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垮台。

贺龙和叶挺 1927 年 8 月举行南昌起义后,朱德率部前往江西与贺、叶部队会师。从此,朱德同志开始了自己生活和活动中光辉的崭新阶段。^②

朱德所率部队经过艰苦战斗,通过粤北地区来到湖南。^③一路上又吸收了许多农民游击队和听到“赤党朱德之名投靠而来的军阀部队”。

1928 年 4 月,伟大中国革命的两支主力——朱德和毛泽东率

① 原文如此。朱德在德国留学后,又于 1925 年去俄国学习,于 1926 年夏回国。

②③ 此处所述与事实有出入。朱德同志参加了南昌起义,后与起义部队一起撤出,向广东进发。十月,起义军在粤北作战失利,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率部经江西转移广东北部,后转入湖南南部。——原编译者注

领的部队，在巍峨的井冈山脉宁冈县举行了历史性的会师。从此之后，两位革命的人民领袖在无数次战斗中凝成了思想上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堪称为人们同心同德亲密合作的典范。

毛泽东率领湖南煤矿工人自卫队和江西贫苦革命农民游击队来到宁冈县后，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各省农民和工人游击队纷纷向宁冈汇集。人民战士手执长矛、短刀和棍棒汇聚到革命旗帜之下。第一支英勇的中国红军就是在这里，在宁冈县诞生的。在朱德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苏维埃中国第一支大部队——举世闻名的工农红军第四军终于诞生。

在第四军占领的地区，聚集着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南京派去同第四军作战的三个师达 3.5 万人，全副新式装备。而第四军当时只有 8000 人，2000 支步枪和少数几挺机枪，而且子弹极端缺乏。对于中国苏维埃的年轻军队来说，这是第一次受到如此严重的考验。

朱德要具有非凡的战略灵活性、忘我的勇敢精神和真正的革命英雄主义才行。朱德天才地实施机动，率领第四军成功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从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给敌军以打击。敌军一个师被全歼，另两师不得不仓皇逃窜。经过这次光辉的战役，红四军一下缴获步枪 3000 余支和其他大量军事装备。

初战获得大胜，为朱德加紧组建红军新部队创造了条件。至 1930 年初，红四军已扩大到近两万人。与此同时，贺龙、彭德怀、方志敏等人指挥的军队也相继成立并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不过，毫无疑问，创建现代中国红军的历史功绩应全部归于朱德和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是他们在军事上正确地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①

^① 原文如此，实际上朱德和毛泽东实行的游击战略与共产国际主张的“进攻，再进攻”的思想及以后于 1933 年进入苏区的李德所主张的堡垒战术大相径庭。因此，根本谈不上，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原编者注

朱德的一生是与苏维埃中国的英雄军队的诞生和发展壮大紧密相联的。谈到朱德,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谈到红军,而讲到光荣的红军,我们不可能不讲朱德这位红军统帅。

从我们下面摘引的红军初创时期发布的命令之一,可以看到红四军力量发展的规模。

“1930年3月10日第三号命令:①

1. 第四军(军长朱德)应于接到本命令之后3个月内挺进边界地区,解放赣闽两省交界下列敌占县并予以占领:全南、江乡②、江都③、瑞金、会昌、南康、信丰、安远、东固、五华、兴宁,以及清源、蕉岭、大埔、长汀、宁化……”

两个月后,我们在注明日期为1930年5月5日的简报中看到:

“我红四军已圆满完成1930年3月10日命令第一条所定各项任务。给命令所指各地区的劳苦大众以大力支持,帮助他们建立苏维埃政权机构和肃清人民的敌人……

军长 朱德 党代表 毛泽东”④

朱德不仅是一位天才的指挥员,而且是无所畏惧的勇敢战士。在作战的危急时刻,红军战士们总看到自己英勇无畏的总司令微弓着身躯冲在前头。他十分爱护自己的战士,撤退总是走在最后,而且从不忘记组织对红军伤员的救护。休息时,朱德总是坐到疲乏的战士身旁,向他们讲述关于另一个国家不平常的故事,在这个国家中,红军已取得胜利,人民已获得解放,新世界的灿烂阳光沐浴着大地。

行军途中,朱德总是和红军战士同吃同住。遇有空时便向指

① 未查到命令原件。此系从俄文回译。——原编者注

② 系音译。——原编者注

③ 系音译。——原编者注

④ 未查到原件,此系从俄文回译。——原编者注

挥员讲授革命军队的战略战术！并向他们介绍俄国国内战争的丰富经验。这位平时并不多言的人，讲课时却十分威严，听课人无不听从他的指挥。红军指挥员和苏维埃中国的劳动人民都很熟悉他那坚定而略带沙哑的声音。

※ ※ ※

1934 年末，中国红军开始了从江西至四川的历史性进军。

朱德率领大军跋山涉水，穿越草地，打破了穷凶极恶的敌人的前堵后追。经过史无前例的将近三千公里的远程行军，他把军队带到了四川。红军犹如一股无坚不摧的铁流横扫华中和华南地区，不曾打一次败仗。^①

※ ※ ※

朱德现在正向中国西北开辟战场。多年前他离开四川，现在他又回到四川。五千万四川人翘首盼望着他回来，他果然回来了。在他还未回到四川之时，民间就传开了，“朱德回到我们四川了。他是我们的人”。

朱德正站在离军阀的堡垒成都（四川省会）不远的山岗之上，用望远镜瞭望着省会的城墙，正如民间传说那样，“眼观四方，能看到百里之外”。

（马宝华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

^① 此处所述很多不合实际情况。——原编者注

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

(1935年12月13日)

Ar·哈马丹

1921年的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个个发言都热情洋溢,激动人心。小小的会场里聚集着几十个人,有工人、农民、苦力,也有知识分子。^①人们发出充满炽热感情的号召:奋起斗争。在城市、工矿、军队、农村建立共产主义组织。一位身材修长、面容清瘦的青年起立发言。从外表看,他是典型的学生打扮,像一位朴实谦逊的乡村教师。面部表情文静而严肃,两眼深陷,常带有机警的微笑。

“同志们!我是湖南代表”,——他说。“我在湖南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我们联合了一批革命工人、农民和学生。我们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工作……”

说完,他小心地坐下,从内衣口袋取出一个长长的小本,不时地用铅笔在上面记着什么。几位老工人代表走到他跟前,向他提出种种问题。他一一作了答复。工人们深怀友情地与他握手。^②

这位青年平常沉默寡言,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却变成了一位感情炽热的演说家,以其天才精确地指出本阶段斗争应采用的途径和方法。他的演说使听众激奋,给听众以鼓舞。他善于打

^{①②} 党的一大并无老工人代表参加,也无农民和苦力。这里的描述,显然是失实的。——原编者注

动别人的心，适时而巧妙地纠正出现的错误，培育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和真正的革命战士。

他对一位同志说：“做一名共产党人，并不是仅仅参加一个政党而已。我们是受残酷压迫的劳苦大众的党。我们是革命党，它要把地球上一切腐朽现象扫除干净。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共产党人，如能以自己的牺牲或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给别人带来好处，那他应当毫不犹豫地去做。他应当勇敢而自豪地去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个为人民利益而生存，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党是不可摧毁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战胜劳苦大众的战斗先锋队——共产党。”

短短数语，就使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形象。

※ ※ ※

毛泽东同志出身于湖南农村一个穷困的农民家庭。艰难的童年生活在他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在农村时为地主、富农干过活。^①通过这种艰辛，他深刻地了解到惨无人道的地主剥削制度，研究了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沉重的压迫制度。这种艰辛的生活经历也培养了他对寄生虫、剥削者的无法抑制的仇恨。他离开家乡，摆脱开这种为人当牛做马的生活，曾到军阀部队^②当过兵。严酷粗野的训练生活和随意受嘲弄的对待，他都忍受过了。为了学好文化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渴求知识，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好学精神，因此，视野日渐开阔，学识日益广博。

生活不仅从未对他表示过任何怜悯，还企图使他屈服，磨灭他

① 此处有误。按毛泽东同志与斯诺谈话所述，他并未给地主干过活。——原编者注

② 指辛亥革命后的湖南新军。——原编者注

对产生各种野蛮、奴役、压迫、饥饿的社会制度的日益强烈的不满。但是,这种几乎史无前例的难以想象的斗争并没有能够摧毁他的意志。他不求任何人的宽容,他以无比顽强的精神抗争着,而决不屈服。

在长沙街头、工人居住区和城市贫民区,出现了一位陌生人。这就是瘦瘦的、面带倦容的毛泽东。他走街串巷同工人交谈。在街上、路边,细心地收集着各种报纸的残页。他贪婪地阅读着一切能看到的新闻。新结交的朋友为他学习提供了帮助。他飞快地进步着。丰富的生活经历对他各方面都有帮助。没过多久,他就成了师范学校的高才生。他开始阅读各种革命书籍。

毛泽东不顾自己挨饿,热心帮助自己的同学和工农朋友。他参加各种工人集会,用极其朴素而为群众易懂的语言揭露剥削者的面目。“这位不出奇的学生毛泽东”如今成了全城“知名人物”。警察开始“注意起”这个居无定处的学生了。毛泽东成了工人居住区的常客,成了他们最知心的朋友。城里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一切革命分子都渐聚渐集在毛的周围。再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他都能令人吃惊地、十分轻松地予以阐明。在筹备了最初一次罢工以后,他便能归纳出一些基本要求,如缩短工作日,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

在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影响下,中国革命运动迅速掀起。毛泽东创办了“文化书社”,许多革命学生和工人到此聚会。在这里,毛泽东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宣传员小组。警察当局密切地注视着他的活动,这家书社十分热闹,但远非都是商业活动。

不久,毛泽东成立了省党委会形式的组织。^①创办了《新湖南》周报。通过这个刊物,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抨击当时的社会制度,开始时比较谨慎,后来日益公开。警察奉命逮捕这个闹革

^① 似应为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原编者注

命的头头。于是毛泽东离开长沙，来到华北。北平也在逮捕他，但因为没有认出来，把他放过了。他又回到华中，先到汉口，后转到武昌。

1925—1927年的大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毛泽东自始至终置身于革命热潮之中心。在工人居住区，在工业城市，在湖北、江西、湖南地处边远的农村，到处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身影。他的名字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播。人们热爱并熟悉这位勇敢的、以炽热感情号召人民奋起斗争的鼓动家。军阀派出的密探和警察到处跟踪他，但工人、农民掩护他，所以总是抓不到他。

反帝斗争中的暂时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转向反革命阵营。工人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农民运动受到“围剿”。

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领导未能阻挡得住反动势力对工人农民的反革命“围剿”。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一。他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前头，率领他们向反动势力展开斗争。他再次强调指出农民的巨大作用，而这一点是陈独秀主义者一直不愿承认的。

1925—1927年的革命遭到了失败。国民党变成成为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血腥的白色恐怖蔓延全国，十分猖獗。共产党转入了完全的地下状态。毛泽东英勇坚持斗争。他领导着转入地下的农民革命组织，保持并扩大着同军阀部队中革命士兵组织的联系。

1927年8月1日，南昌警备部队举行起义并在叶挺和贺龙率领下向广东进发。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赣北采取行动。在士兵中的共产党员帮助下，他成功地策动一个团起义并把它拉了出去。一路上，许多贫苦农民的支队和矿工战斗小组投奔毛泽东。经过长途跋涉和艰苦的战斗，他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到了江西宁冈县。在这举世闻名的井冈山上，他同另一位久经考验的中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朱德会见了。毛泽东与朱德携手并肩，创建了屡战获胜、

威名大振的中国红军。

※ ※ ※

毛泽东亲手创建了江西省的第一个苏维埃地区。他动员的一切力量,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他和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四军是他主要的野战参谋部。毛泽东亲率红四军转战于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数省,踏遍了数省的崇山峻岭,河谷平原。红四军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了苏维埃,出现了苏区。毛泽东这位从不知疲倦的鼓动家和组织家唤起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奋起进行斗争。无论何地群众都愿跟随毛泽东。他亲自领导分田地,没收资产阶级财产的斗争。

这位体弱并患有疾病的人,^①像一部功率无比大的机器,不停地运转着,摧毁那旧世界的大厦,创立着新的世界。他把许多年积下的深仇大恨统统倾向寄生虫和吸中国人民血的吸血鬼们。他用热情洋溢的演说,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吸引了人民,又向人民传播着新的思想。上海、广州和汉口的苦力和工人,湖南、福建和江西的贫雇农、学生和教师,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投奔毛泽东。一切被压迫和被奴役的人们,一切有觉悟和勇敢的人们都奔向毛泽东。是他亲手培育了英勇的中国红军的骨干,是他在井冈山亲自教战士们学文化和练习打枪。他既用思想武装他们,又教他们作战。

1931年,在苏维埃中国的首都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②,在中国人民的代表的热烈掌声中,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苏维埃国家的首脑。他在担任这一职务中,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非凡才能。中华苏维埃共

① 原文如此,其实不然,毛泽东同志青年时爱好锻炼,常爬山、游泳,故能经得起革命活动中各种艰苦的磨炼。——原编者注

② 即第一届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原编者注

和国宪法大纲和新国家的许多基本法令都出自毛泽东之手。毛泽东深知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所以经他手制定的苏维埃政权的许多法令，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夙愿。

毛泽东的战友们在称道他时说：他每天要工作二十个小时，只睡四小时觉。他在后方时，走遍了苏区的城市和乡村。无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把他当作亲人对待。他顽强地工作着，一心为人民谋求安宁而幸福的生活。毛泽东来自人民，深深懂得得老百姓的心理，他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① 人民知道毛泽东经历过多么艰苦的生活，所以对他报以无限的爱戴和崇敬。他到前方时，总是深入到最前线，同红军战士们一起参加战斗，以自己的英雄行为给战士们以鼓舞。红军指战员都亲眼见过毛泽东，熟悉毛泽东。他参加了红军各次重大战役，他培育了指挥骨干。毛泽东是红军的第一位党代表。

在离开江西向大西北实施长征之前，毛泽东和朱德在红军总部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细致地制定长征的战略计划。^② 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对国家情况的透彻了解，给毛泽东制定计划带来了许多方便。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中国红军的基本力量突出重围，摆脱了在江西受包围的处境。

这位领袖虽身患疾病，可是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铁流指引着前进的道路。由于牛马般的长工劳动和军阀部队的军营生活，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健康遭到损害。但他表现出了自己的坚强力量和钢毅精神，以大无畏的精神率领中华苏维埃大军，跋山涉水，辗转战斗，奔向新的革命基地。

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

① 原文如此，实际上毛泽东同志多次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原编者注。

② 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对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即遭排斥，因而也没有参与制定长征的战略计划。——原编者注

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德。

(马宝华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五、共产国际与下层统一战线策略

上海中央局转发共产国际、少共国际关于 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

(1933年6月15日)

兹将国际来指示转你们。我们已根据此电发一苏维埃政府与全总宣言及关于反帝统一战线致各级党部信^①，国际原文如下：

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为高度开展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加强这一斗争中我们的领导起见，我们提议：

第一，重申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民众的宣言，在先前所提的条件下，愿与任何部队作武力的共同战争，着重的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急迫的进攻与国民党无条件投降事实：失掉热河、蒙古与华北的一部，愿意放弃平津，号召民众与武装部队起来作反国民党意志的战争，不许国民党这样干下去。我们相信你们的提议会产生极力抵抗日本军队的结果。我[你]们应以全国总工会与职业团体的名义，提出保护中国的领土，是劳苦群众生死存亡的问题，且以共同斗争的唯一提议，去接近国民党工会、工人俱乐部、兄弟会、爱国团体以及无组织的工人，反对减低工资，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日，要求政府与资本家救济一切工人，立刻释放一切政治

^① 即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6月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对一切国民党工会工人俱乐部友谊的团体和中国一切有组织及无组织的工人的宣言》、6月8日《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论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

犯,武装民众,极力真正武装抵抗日本的侵略。用上述口号来提议具体的共同行动,在广泛的基础上创造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首先,利用工会、全国民众御侮自救会,提出以下几点,作为共同行动的纲领:

第一,抨击国民党的投降叛变,指出,希望国联与美国的援助是一个危险与失望的幻想,着重的说明只有团结并统一工人、农民及劳动群众,只有民众抵抗的力量是胜利的保证。

第二,着重提出全国民众必须起来,为着保卫中国的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三,号召民众参加战争与游击战争,应当积极的援助群众行动的抵制日货的宣传,募集援助义勇军的物品等。

第四,用武器库与人口武器来武装农民群众,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尽量动员。

第五,完全脱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民族叛徒的影响,并争取得我们的自由,必须取消一切对日债款与借款利息的支付,实施累进税,以应付开支。

第六,中国必须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救国会必须极端的利用如宋庆龄等的公开和半公开的可能性,在工厂、学校、兵营及其他组织中,创造有力的组织。

关于中东路问题,党必须用以下内容宣言启发群众的运动。苏联是世界上唯一反帝国主义的力量,是中国民众的忠诚的朋友,在他成立的最初,他就停止了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放弃了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使中东路变为商业性的企业,且与中国共同管理,而且曾屡次提议请中国政府收买铁路;这样,苏联不仅遵守了先前与中国所订的一切条约中平等权利,而且就在1929年在帝国主义嗾使及其利益下实行夺取中东路企图之时,也严守平等的条

约。现在南京政府允许整个资本家做主^①，不去抵抗日本的侵占强夺，拒绝执行关于中东〈路〉的协定，他们始终不去防卫中国继续做帝国主义手中的工具，却企图利用中东路问题来挑拨日本对苏联的战争。扯碎国民党罪恶政策的假面具，号召鼓动群众起来反对卖国的国民党政府，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当中国工人在闸北抵抗日本并英勇的作战之时，全世界工人是站在中国民众一方的，苏联坚决的拥护和平而斗争，因为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苏联提议出卖中东路，这已扰乱了帝国主义的计划。中国工人很知道胜利的社会主义的建立和苏联力量的增加，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中国民众的利益，正如我们为中国独立而抵抗帝国主义，这也是日本工农的利益，我们能够恢复热河与满洲，收回中东路，这可以破坏帝国主义以满洲与华北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的企图。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建立中苏全国劳动群众的兄弟联盟。

以下是少共国际致团中央电：

青年团应当不惜一切力量把党这一建立统一的反日战线的行动纲领，使每个人都见到、听到。在青年的一切会议、工会、学校抵货团体中，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行为的提议，扯碎一切反动的领袖的假面具，注意学生暑期休假时去发展农民运动的工作，发展军事训练，向自己政府要求集会权利^②，发给武器给战斗员，要求有宣传自由权，唤起并团结军队中的革命分子，在士兵群众中有力的去宣传党的这一纲领，加强北方的工作。

中央局

① 中央档案油印件此句为“现在南京政府和整个资本家地主”。

② 中央档案油印件此处为“向市政府要求集会权利，与军事训练的设备；要求选择军事教官的权利”。

6月15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建立反对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告各国工人

(载于 1933 年 6 月 20 日出版的上海《斗争》)

全世界各国劳动者!

经济恐慌仍在继续,失业人数不断的增加。饥饿,困难又落到更多的工人头上来了。资本家则采取了更加尖刻的方法进攻。准备剥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已经争得的地位。法西斯蒂的反动一国又一国的发生。法西斯独裁在德国的公开成立,向全世界千百万的工人提出了建立反对资产阶级法西斯蒂进攻的统一战线的必要问题,特别是反对德国资本家,因为他们得步进步的攫夺工人所争得的经济权利和政治地位,并且他们企图用最野蛮的恐怖手段来压平工人运动。

在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建立斗争的统一战争[线]上,主要的阻力,过去是现在还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他们把全世界无产阶级断送到阶级敌人的暴力之下去了。他们这种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政策,所谓“小害”的政策,事实上正是促成了反动法西斯蒂在德国的胜利。

共产国际和各国的共产党再三声明过,为反对资本家的进攻,反对反动政治,反对战争,时时准备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群众建立共同斗争的联合。共产党始终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和非党工人的共同作战的组织者,不管社会民主党领袖如何有计划的破坏。在去年 7 月 20 日,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被巴本推翻之后,德国共产党首先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总工联(ADGB)

建议组织一个联合罢工来反对法西斯蒂,可是,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总工会在整个第二国际的拥护之下,反而说这种建议是阴谋的挑拨。在希特拉握得政权的时候,德国共产党再一次向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总工会提议建立共同行动来反抗法西斯蒂,这次又遭到拒绝。不但如此,去年11月间柏林交通工人一致罢工反对减少工资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反而来离间统一战线的斗争。全部国际劳动运动的经验充满了这类例子。

劳动社会主义国际局最近于2月19日发出一个宣言,宣称准备联合共产国际与共产党成立统一战线来和德国法西斯反动统治斗争。这个宣言,显然和劳动社会主义国际与社会民主党过去的整个行动相矛盾。直到现在的劳动社会主义国际的全部政策与行动,证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怀疑他们直到许多国家特别是德国的工人群众,已在自动组织统一战线的时候,才发这种宣言之诚意,是有理由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虽然明了这点,但鉴于法西斯蒂正在团结全世界反动势力来对付德国无产阶级,所以号召各国共产党,就再试试经过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相信,这样做,建立在阶级斗争上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足以抵抗资本家与法西斯蒂的进攻,特别加速一切资本主义剥削的必然没落。

各国的情形不同,并且各国工人阶级的具体斗争任务也不同,只有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情形和社会民主党订立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的特定行动的协定,这个斗争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于各国共产党,去向属于劳动社会主义国际的本国社会民主党提议关于反对法西斯蒂,反对资本家进攻的具体的共同行动。但两党间订立这种协定,必须根据共同斗争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没有反对资产阶级的具体行动纲领,任何协定都是反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这样的协定必须基于下列的条件上:

一、共产党党员与社会民主党党员应即刻开始组织并实行反攻，去反抗法西斯蒂与反动统治对于政治的、工会的、合作社的和其他工人的组织的打击，对于工人报纸，以及对于集会示威，罢工自由等的打击。共同组织群众抗议，街道示威与群众政治罢工来反抗法西斯团体的武装袭击。进而至于在作坊、工厂、工作介绍所和工房建立行动委员会和自卫团(纠察队)。

二、共产党员与社会民主党员应立刻开始用开会、示威、罢工等方法组织工人的抗议；来反对减工钱，反对待遇变劣，反对动用社会保险费，反对减少失业救济费，反对开除。

三、采用和实行了上面这两个条件，共产国际执委会以为，在共同向法西斯蒂与资本家作战的时候，可以不攻击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但是，谁要是在实行统一战线时破坏协定，就应当像对付分裂工人的统一战线的破坏罢工的工贼那样的向他作残酷斗争。

这些条件是向劳动社会主义国际提出的，也可以向其他与共产国际提议联合战线的政党(如英之独立工党)提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之前，提出了上面的三个条件，同时更号召各国共产党，首先是德国的德国共产党，不必等待到和社会民主党接洽联合斗争有结果，就立刻进行与社会民主党的或其他派别的工人群众组织联合斗争委员会。

在长久的斗争历史中，证明共产党人不是嘴上而是事实上，过去是将来也是站在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最前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相信，无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对统一战线取什么态度，社会民主主义和非党的工人始终要排除一切阻碍，和共产主义者一起来建立不是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统一战线。

特别是现在，德国法西斯蒂罗织毒辣的挑拨(国会的纵火，伪造被捕共党叛变的文件等)，企图打击德国的工人运动，每一个工人，必须认识他自己在反对资本家的进攻与法西斯蒂统治的斗争

中的阶级任务。

打倒法西斯蒂反动统治！打倒压迫工人阶级的恐怖手段！拥护无产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作反对资本家进攻与资本主义的斗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根据上海《斗争》第四十五、四十六期合刊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为建立统一战线而斗争

(1934年11月7日)

季米特洛夫

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7周年,资本主义各国的先进工人首先必须吸取和运用社会主义革命经验来进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

在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通过与孟什维主义的激烈斗争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依靠的是政治上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1917年10月工人武装起义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这次起义依靠了**苏维埃**——它是组织起义和夺取政权的机关,以后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苏联劳动人民之所以能够保卫住十月革命成果,是因为十月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

在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党的领导下,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在过去17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现在已为全世界所共知。无产阶级专政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彻底消灭了失业和贫困现象。由于农业以集体农庄为基础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苏联变成了一个大规模机械化集体耕作的国家。在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城乡劳动群众的物质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新文化迅速繁荣。过去是各族人民大监狱的俄国,已成为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兄弟联盟**。苏联现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地、社会主义堡垒、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支柱、全世界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祖国。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各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其持续时间和深度来说,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使千百万人陷入了饥饿和贫困的境地。甚至在危机转入特种萧条的时期,虽然生产有所增长,但广大群众的生产状况并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坏了。数百万工人仍然没有工作,而且没有希望得到工作。资产阶级减发工资,取消剩余的最后一项社会保险待遇,广大农民经济破产,数百万劳动青年失业,体制下降,精神沮丧。

资产阶级企图通过重新瓜分市场、原料产地和势力范围来摆脱危机,便加紧准备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战争。他们疯狂地增加武器装备,作好国民经济为战争服务的准备,以及组织工人从事新的军事劳役,等等。

资产阶级的经济进攻和战争准备迫使广大劳动群众的反抗日益增强。在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走上革命斗争道路。

各国资产阶级为了在这种情况下更好地实行掠夺劳动群众和准备战争的政策,越来越加紧进行专政,越来越多地采取法西斯的资产阶级专政形式,剥夺了剩余的最后一项民主权利和自由。法西斯的基本任务是摧毁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从肉体上消灭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使千百万劳动者处于恐怖、无权和暗无天日的被奴役地位。

法西斯是一些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和最反动的沙文主义分子的代表,他们在采取重新瓜分世界的办法来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时,竭力用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宣传来愚弄广大群众,唆使一些民族反对另一些民族,以此来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法西斯效忠于本阶级的基本任务,即扑灭工人运动,他们企图把资产阶级世界最反对的力量纠集起来进攻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

目前有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乘无产阶级力量分散之机,尚能逐个打败工人阶级并利用部分农民的力量来打败工人阶级。资产阶

级有的能够打垮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因为后者脱离了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又脱离了农民,譬如奥地利的情况就是这样;有的能够击败起义的城市工人,因为这些工人没有同农民建立战斗联盟,而资产阶级却得到农民军的援助,譬如西班牙的情况正是这样。还有的资产阶级在一国内建立起法西斯专政,因为相邻各国的工人阶级未能给遭到法西斯袭击的阶级兄弟以有效的支援。

为什么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胜利了,而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却在1918—1920年的革命行动中失败了呢?为什么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奥地利、芬兰的革命,意大利工人的夺取工厂,——总之,为什么所有这些运动都被破坏,遭到挫败,被践踏在血泊之中呢?为什么法西斯竟然能够在德国和奥地利上台执政?为什么现在法西斯还威胁到其他一些国家,甚至那些似乎是最民主的国家的工人阶级呢?

这些问题目前已摆在每一个勇于思考的工人面前。参加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工会和其他组织的工人们都越来越坚定地提出了这些问题。

上述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欧洲的工人绝大多数是跟着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走的,他们遵循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相信社会民主党关于同资产阶级合作就可以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而毫无痛苦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上述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欧洲的无产阶级没有一个坚强的、统一的政党。上述情况之所以发生,还因为欧洲的无产阶级不善于发动和引导千百万农民后备力量进行斗争。

由此可见,1918—1920年革命的失败和法西斯上台执政的历史责任要由社会民主党及其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来承担。数百万追随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开始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责任。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们已开始日益懂得,必须恢复自己被打垮的力量,并越来越有力地支持共产党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

的首倡精神。当前,关于无产阶级统一阵线的问题已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和首要任务。

※ ※ ※

统一阵线问题使社会民主党和其他非共产主义工人组织的队伍发生内部分化和斗争。这些政党中与资产阶级紧密勾结的左翼分子竭尽全力干扰统一阵线的建立。社会民主党中的先进工人则与此相反,越来越大胆地拥护统一阵线,主张与共产党人联合斗争。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却拼命利用一些蛊惑性的言词阻止动摇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站到统一阵线的立场上去,并以此来妨碍社会民主党群众的进一步革命化。

今后随着统一阵线的发展和扩大,社会民主党内这种较长时期的分化过程必将得到发展,社会民主党队伍的内部斗争将越来越激烈,在许多情况下会发展到右翼集团分裂出去,与资产阶级政党接近得更加紧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革命化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某些集团和组织与共产党联合起来。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具有巨大意义的、最近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即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甚至与共产党一起进行反抗法西斯的武装斗争。我们看到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先进工人在摒弃社会民主党妥协政策之后是怎样拿起武器与共产党工人携手作战,试图在最后关头阻止法西斯进攻的。现在奥地利的工人阶级吸取了二月战斗^①的经验教训,正通过革命斗争的道路寻求自身的统一。在西班牙,共产党、社会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人们都手持武器抵抗法西斯反动派的进攻。就在开始武装斗争前不久,共产党参加了工人同盟,把它变成了统一阵线的组织。只有在斗争的过程中才开始形成统一阵线、也只有统一阵线才使原先未能把农民革命后备力量拉到自己一边的西班牙

^① 指 1934 年 2 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反法西斯起义。——原编者注

工人阶级进行了这样顽强、这样长期的斗争，而且曾经在某些地区建立起工农政权。

近数月来，法国的统一阵线有了迅速的发展：共产党和社会党签订了为反对法西斯和抗击资产阶级进攻而联合斗争的条约；由统一阵线所团结起来并开始联合组成统一工会的法国工人阶级，正顺利地抵抗法西斯的挑衅活动。各国工人要求统一、要求斗争的愿望与日俱增。

但是，所有这一切仅不过是最初步骤。不管第二国际和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们如何抵制统一阵线，都必须继续前进，在群众中扩大和巩固统一阵线。统一阵线——这就是从下面，即在企业中，广泛动员和联合群众，把他们团结在群众自己建立统一的斗争机构的周围。现在，统一阵线的当前任务是在下面，主要是在工厂，建立通过选举产生的统一阵线机构。再有，统一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把这些组织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机构，这同样是进一步扩大统一阵线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任务。

统一阵线尔后的胜利，首先取决于共产党的全面巩固，取决于正确的政策和共产党人自身坚强有力的群众工作，因为正是共产党人才是统一阵线的真正创始者和主要的组织力量。

在实现建立统一阵线的策略时，往往会遇到双重的阻力，在不同的国家，根据具体情况，这种阻力有大有小。第一种阻力是：不理解组织无产阶级统一阵线这项工作的整个重要性和迫切性，带有宗派主义的偏见害怕群众、害怕广泛的群众性的政治行动。在群众中组织统一阵线本来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工作，却往往被简化为只是向社会民主党形式主义地提出呼吁而了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拒绝联合行动只不过使另一些同志感到松了一口气而不是促使这些同志加倍努力，利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这种抵制行为，不顾他们的反对而相反地去接近社会民主党工人，并引导他们参加统一阵线。

有时,某些同志把统一阵线的整个策略单纯地看作是使社会民主党工人迅速转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然而,社会民主党和其他非共产党工人向革命斗争道路的转变,乃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为争取每一个工人而奋斗。

第二种阻力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为了希望同社会民主党签订协议或者保持已经签订的协议,有时可能掩饰我们与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原则分歧,或者把统一阵线所进行的斗争局限于协议的范围之内,而不把统一阵线的工作重点转到对群众本身的动员。必须懂得,为建立统一阵线以及巩固和扩大阵线而进行的斗争不仅不排斥,相反地,还要求做经常的思想工作,向工人群众阐明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路线与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路线之间、布尔什维主义道路(它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与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它使一系列国家的反动派和法西斯取得了胜利)之间的各种原则性分歧。

为了共同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和战争而与社会民主党签订协议,这只是具体实现无产阶级统一阵线的手段之一,而决不意味着中止或削弱我们与社会民主主义这种对资产阶级妥协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斗争。

恰恰相反,为了统一阵线本身的利益,这种原则性的斗争应当加强。而且,我们的宣传要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策结合起来,必须避免用抽象的宣传代替具体的政策。不应当忘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团体。共产党人在为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阵线而斗争时,一分一秒都不应忘掉革命的前景,要善于把统一阵线的策略同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战略任务结合起来。

如果不同上述两种基本阻力进行经常的斗争,要想顺利地完成建立和扩大无产阶级统一阵线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予

以重点排除的阻力,应当是在那个时刻、那个具体情况下、那个斗争阶段成为实现和加强统一战线**主要干扰**的那种阻力。必须特别避免刻板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而不考虑到每个国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具体条件,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譬如说法国的经验,照搬到另一些条件、有时是截然不同条件的其他国家如英国去。这种生搬硬套地、不加批判地把一国的政治经验和组织经验运用于所有其他国家,常常使工人阶级遭致代价巨大的失败。

共产主义根据各国支部的壮大和团结情况,以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工会和其他组织中的革命化工人群众为后盾,认为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共同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威胁。因为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现在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主要环节**。

(章任贤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 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
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

(1933年1月17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帝国主义及国际联盟的公开援助之下,已经开始侵入华北。这是帝国主义强盗更进一步的完全瓜分中国及奴役整个中国的侵掠,这种侵掠造成了和平居民的整批残杀,城市与乡村的毁灭,以及痛苦与饥荒的增加。上海与满洲的惨状,在大部分的中国土地上,极残酷的重复着。

因为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张学良等的不抵抗与投降,因为他们对于抗日士兵的压迫遣散与屠杀,使中国士兵大批的死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之下。国民党军阀帮助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更进一步的侵略与屠杀,同时他们用一切力量镇压反帝国主义斗争,抵货运动与组织武装的义勇军。

国民党政府及其政客,解释他们的罪恶行为卖国勾当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中国苏维埃的存在,使他们不能动员一切力量来进行国防,使蒋介石不愿意与日本军阀作战,而用将近一百万的大军,去进攻已经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的中国工农。

但是中国民众愿意自己保卫自己,许多部队与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赞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

主义。他们开始了解只有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能够胜利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斥国民党的解释是愚笨的谎话,他们想用这些愚笨的谎话,在全国民众的面前掩盖自己的卖国行为。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再一次提醒中国民众,我们在去年4月已经号召全国民众与大家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而蒋介石对于这个号召的回答是动员一切军队来进攻中国工农政府与工农红军,而不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个号召,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英

张国焘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

1933年1月17日

(选自《红色中华》第48期。)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

(1933年1月26日)

(一)日本占据满洲后,满洲一般的状况

满洲已经被日本占据一年零四个月了。日帝国主义用全部的力量,企图把满洲变为他垄断的殖民地,变为进一步的进攻中国革命,公开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进行冒险主义的反革命的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战争,以及为着争夺太平洋上的霸权,而与自己极大的竞争者——美国,彼此进行强盗战争,而最后是对本国工农和一切劳苦群众,加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进攻等等的大本营。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计划能完成到什么程度和如何范围,这首先要依满洲的内部为转移。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有张学良和南京政府完全可耻的投降政策——“不抵抗”而能在短期间占据全满洲,那末现在他不得已而承认了,须要十万武装整齐的正式日本军队,用十年的功夫,才能在满洲建立起应有的秩序来,这个承认是十分有价值 and 十分值得注意的。满洲现在的经济状况,正和侵略者所应许的“经济兴隆”相反,而是沿着经济危机继续加紧的道路前进着。危机几乎扩大到了灾难浩劫的状态。抚顺,穆稜等煤矿井关闭了一半。铁路(南满、北宁)不但减少了运输,而且还不经常的通行。奉天的14739个商店关闭了7000余个。北满的收成只有常年的二分之一。在整个的北满这项损失超过了农产品的商品余额,这

些余额通常是出口的。因水灾而受害者在 800 万人以上，城市和乡村中的失业者，贫民饥民逐日的增加。在政治管理方面，借口铲除军阀而进行着真正的殖民地制度，保存着一切军阀官僚的国家机关系统，更加上日军直接血的统治。“满洲国”傀儡政治的压迫，不但未按着侵略者的应许而建立“廉洁政府”和减轻捐税，反而增加了许多新的捐税和直接抢夺农民的土地等等。不但没有侵略者所应许的“和平秩序”，反而进行着不断的战争和各样的扰乱。劳动者所受的压迫竟如此之深，农民甚至不能自由的种高粱和使用器具家什（如三五家许可共用一刀等等）。日本帝国主义野兽般的白色恐怖竟如此之甚，如抚顺煤矿的成百甚至成千的工人被活埋了。

因为日本侵略军的民族压迫，及广大群众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恶化，于是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为他们是他们的利益的竞争者。正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所谓满洲国，直到现在还未能造下坚固的社会靠山，而且，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组织十分薄弱，但满洲的游击运动，却逐渐更多带着群众的性质。

因为这个，以及因为国际方面以及日本内部许多其他的原因，所以日本国内不仅经济危机猛烈的加深和扩展，而且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以及意见分歧日趋紧张起来。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不满意，以及革命情绪和波动迅速的增长起来（工人罢工运动发展着，农民不断的骚动，而且有些地方竟变成了武装斗争，先进工人和农民及知识分子中的反战争情绪正在加紧，日本共产党的发展等等），这些教训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分宝贵，而且对一切想用战争走出危机的人都十分宝贵。

虽然国际间和国内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日本帝国主义却继续

用加紧的速度准备着满洲的大本营,首先是为着进一步的进攻中国和实行武装干涉苏联的计划,占据山海关和进攻热河以及准备割据中国北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抢劫和侵略计划的有机的继续。

(二)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

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在上海工人及 19 路军兵士所实行的英勇的民族革命的防守推动之下,而一天天的更带着群众性质。现在各游击队的数目约有 3 万人,这些队伍因其社会成分政治领导及影响的不同而带着各种不同的色彩。现在主要的可分为以下几种:

(1)纯由旧吉林军部队所组织者,其领导属于张学良部下的各将领(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朱霁青等),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着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这一些人,在另一帝国主义(美国)影响下,同时在广大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及其自己的军队中兵士和一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胁之下,而且为着自己剥削者的利益,才实行抗日的战争。然而,他们却绝对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的革命运动。他们枪杀革命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解除反日义勇军的武装,压迫劳动者,他们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在适宜的条件下和必要的时候,能够叛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而且现在已经阻碍着满洲真正群众游击运动的发展了。他们的战斗力较低及其失败(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和投降(几乎完全没有激烈的战争,而把阵地让给日军),主要的由他们仇视劳动者的政策产生出来的。

苏、李、马等的失败,绝对不是表明满洲反帝国主义游击运动没有希望或是低落,这只是又一次的表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以及一切军阀将军在反帝斗争中的无能,这只是又一次的证明我们说的:只有广大民众武装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这

话的正确,这只能使工农兵士贫民及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军官们相信,他们应该违反国民党张学良及一切军阀而自己来保护中国,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同时也必须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最狡猾的奸细。在这些军阀失败和投降之下,有更大的可能在满洲热河中国北部及全中国吸收成千成万的工农和一切真诚反帝分子,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中国北部而参加反日反一切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2)第二种游击队伍,如王德林这一部队,不是大部的旧吉林军,而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工人的反日义勇军,国民党的影响较小,有一时期在某种程度内,曾经允许我们党反帝国主义及革命煽动的自由。这些队伍的领导者企图各种民族的和社会的武断宣传而能依靠在农民小资产阶级身上。最近在上级和下级军官间,在政治方面看出了内部分化过程的开始,这个队伍的命运,是首先要看他对于工农的政策如何。

(3)第三种游击队,是各种农民的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其中也有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其成分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政治的成熟(不够),及军事技术的弱点,一部分(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吉林军官的影响和指挥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运动走上真正革命的轨道,而且有时候简直被反动的领袖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影响和领导之下,他们对于本阶级弟兄的态度极好,然而还未能找着正确的彻底的革命斗争的方法和道路。

(4)第四种游击队,赤色游击队,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队伍,它执行我们党对满洲问题的纲领中彻底反帝的要求。它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这队伍在自己进一步的开展中,有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不仅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与“满洲国”政府,而且与国民党政府作胜利的斗争。但是可惜我们的组织

及影响过于薄弱,所以虽然党,苏维埃,赤色游击队的本身的政治影响不断增加(比如许多游击队不断地找我们的领导),然而赤色游击队直到现在不但还不是满洲整个反日游击队运动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为这运动的基本力量。

整个国民党的各个派别,一贯地继续对各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投降政策,在准备进攻苏联的反革命战争及为着瓜分中国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方面尽着奸细的作用。对满洲的反日运动,执行着最可耻最狡猾的策略。

所有一切反动派别在全国广大群众反日反帝反国民党怒潮威胁之下,不得已采取了这样的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面上处反对的立场,对满洲的反日运动假装着同情,他们提出援助反日运动的口号与空谈,不仅是为着掩饰自己民族叛徒的真面目,而且是有一定反革命目的:(一)为着借口“肃清后方破坏分子”而加紧进攻苏维埃中国和英勇的工农红军。(二)借口“国难期间全国一致”、“各阶级为救国而牺牲”、“不允许阶级斗争”、“维持后方和秩序”等等,而对工农兵及革命知识分子加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进攻。(三)散布对国民党“民族革命”的幻想,以求挽救自己的腐败和垂死的统治。(四)夺取反日运动的领导,以保护自己反革命伙伴——军阀的统治,把反日游击运动限制在国民党监督下的个别军队的“单纯军事行动”,并且不但不援助群众真正的革命反日运动,而且直接的用“铁和血”来压服他。并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认为适合的时候,而完全叛变满洲一切反日运动。(五)为着夺取和垄断广大群众们的为给满洲游击队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企图这样使满洲游击队没有真能从外面得到此种帮助的可能。并借此以减小满洲和全国反日运动的程度和范围。

因此便是借保护民族利益,而实际限制这个运动,并准备与日帝国主义共同来破坏他。挂革命的招牌来行反革命的政策,这是国民党各派别对满洲问题政策的一致的实质。同时国民党各不同

派别因其与各不同的帝国主义主人的基本联系，而在对满洲问题所玩的手腕中也本着各不同的帝国主义的利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派逐渐倾向于与日帝国主义直接谈判，以及强盗国际联盟的提议，而同时大喊反对日本在满洲的侵略，其目的是在执行美帝国主义的命令。以陈济棠、胡汉民等为首的广东派，武断的喊〈反对〉日本侵略满洲，其目的是引诱群众视线和注意脱离所谓康藏纠纷，以便英帝国主义能安心执行在中国西北的占据西藏西康等计划，另一方面取得些政治资本以作反南京之用。北方国民党（冯玉祥阎锡山）即〔及〕非国民党的（段祺瑞、吴佩孚）军阀官僚们口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侵略者及国民党南京派，实际共同的是建立所谓北方独立国及〔即〕变相的第二“满洲国”。

上述的事实，又一次证明共产国际及中央对满洲事变的策略与立场绝对正确的，即是“推翻国民党这个背叛民族羞辱民族的政府，是武装民众顺利进行反日及反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护中国的独立完整和统一的条件”。所有这些事实，毫无疑问的是说国民党张学良在满洲游击运动中的影响和局部领导，是阻碍满洲反日运动及一般革命群众进一步的扩大和深入的基本事实。就是国民党这个影响和局部的领导在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中政治方面很不成熟及满洲我们党软弱条件下是主要的危险。他能使满洲的游击战争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前失败。因为实际情形如果继续不变，则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失败的前途，不仅由旧吉林军将领及国民党的必然叛变投降而产生，而且还可以因为运动本身致变成散漫和政治绝望及组织瓦解而产生出来。

为避免失败和瓦解，为使反日游击运动胜利，那必须要坚决的为夺取和巩固我们党——无产阶级唯一的彻底革命的党——在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及各种革命群众运动中领导权而斗争。他，并且只有他，能够组织和动员满洲本部及全中国成千成万民众作武装斗争，从满洲、西藏和全中国赶走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极广大的

民众,是战胜帝国主义唯一的力量。而我们党是他们唯一的可靠的组织者和领袖,满洲事变使我们党负起极大的任务。

(三)我们党在满洲的战斗任务

满洲问题,有了很大的全世界的意义。满洲的命运不仅是与反苏联武装干涉及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命运联系着,而且是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整个殖民地世界解放斗争进程的命运密切的联系着,我们党胜利的指导满洲的革命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完成自己民族解放革命任务和保护苏维埃的中国,而且也是完成国际的任务——在实际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武装拥护苏联。

我们党应该十分清楚了解和提出夺取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到自己手里的任务,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在阶段上的基本任务之一(即除此之外,更有发展和联合苏区,巩固红军,推翻国民党和扩大群众革命斗争,而首先是工人阶级罢工的斗争,目的是借吸收黄色工会及无组织的工人,而把赤色工会变为真正广大群众的组织等任务)。事实的整个过程完全证明了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央关于用革命方法解决满洲问题总策略的方向的正确,以及根据这个策略方向而规定的及由其中产生出来的总政治口号的正确。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在这个策略基础上所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这些口号毫无疑义地,将得到

满洲和全国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同情。然而实现这些总的政治口号的成功，首先要靠着我们党正确的和灵活的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我们党利用 1925—1927（年）革命在这方面已有的极丰富的经验，计算到满洲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现在阶段上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和配置的特别情形，在执行这个策略时，对下列的情形应当严格的注意！

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同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如对上述的第一种游击队（朱霁青本人的队伍，这里不包括群众的反日义勇军，这些义勇军是暂时的和形式上的服从他的指挥）主要是从下面和兵士组织统一战线。并且在有共同作反日斗争必要时，订立具体的作战行动的协约。对第二种游击队，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对第三种游击队，根据其反对反动领袖的斗争以及我们在他们中间的革命政治影响的程度而决定具体的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甚至可与他们订立某种反帝联盟的形式。

然而，第三，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必须]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坚固的下层统

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才能使满洲的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能够得着实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策略的效果。

第四,必须慎重的计算到这一点:即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当这部分人还用武装的方法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那么,这不仅是表明共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且特别是表明为着夺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而用特殊的方式来与这资产阶级奋斗。不保证反帝运动有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则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或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必想夺得无产阶级的领导。因此,尽量扩展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人)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基本的是借着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斗争的方法,这是我们党现在在满洲的第一等基本的任务。

满洲的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伟大的政治力量(在数量上,工业、运输、小手工业内约 60 万,乡村工人约 120 万,在质量上主要的干部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奉天、大连、哈尔滨、抚顺等等,和几个主要的经济部门:铁路、煤矿、兵工厂,80%的大产业工人和大部的林木工人,是直接在日本的企业上做工,与乡村的关系密切)。虽然他有一定的弱点(没有 1925—1927 年中国革命及其苏维埃阶段上的直接经验,在政治上,阶级觉悟和组织性较小等等),然而,无条件的他是革命和民族革命战线最基本的动力。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不断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人的积极参加游击战争,完完全全证明无产阶级伟大的政治力量,然而,他们基本上还带着自发的性质。党的任务就在于尽量扩展和指导无产阶级各式各样的群众斗争(特别是罢工和武装斗争),而首先是在他们日常迫切的部分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基础上,例如:按时发工资和发现

洋,同等劳动同等工资,成年八小时工作日、青工六小时,并保留已有的工资标准,反对裁人和关厂,在裁人和关厂时,业主须付工人六个月工资,反对用白俄和日本工贼代替中国工人。要求增加林木工人和雇农的工资,并且业主应当供给工人及其家属满意的住所。“满洲国”当局及业主须给失业工人免费的饭食、衣服、烧柴、住所;反对宪兵警察在兵工厂、作坊、矿井上的压迫,反对逮捕和屠杀工人,要求工人言论集会和组织工会的自由,组织工人拒绝运输和服务于日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工人劳动,并在反帝及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尽量地把工人组织在上述的革命群众组织内找出、提拔和训练工人先进的分子作为党、团赤色工会、民众革命政权骨干,并这样来保证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必须十分清楚的认识,反日斗争一天天发动起更多的广大劳动农民群众,因之而一天天与反对中国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农民土地运动的发展配合起来。

我们保持最宽广的反帝统一战线,但要坚决的拥护农民的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须明了,独立的组织我们的武装力量以及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是靠着巧妙的和及时的援助和组织加入反帝统一战线及正在斗争着的农民。

东三省党的组织,必须坚决的反对其队伍间对满洲土地问题估计得不够(如说满洲有很多荒地,因此土地问题不紧张)以及对土地革命运动已达到的程度估计得不够。必须计算到满洲作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程度比中国其他部分都大,并且他在中国是农村经济商品性最发达的一部,在乡村中,无论反日斗争和阶级斗争发展的速度都更快。

根据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对组织满洲的农村工人特别注意,经过他们来实现我们在农民土地运动上的领导权。除了斗争没有方法挽救农民脱离饥饿贫困与死亡。党的任务在于提出最切实的要

求和口号——譬如：80%的收成归农民，不向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及军阀纳任何的捐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大批的屠杀农民，反对焚烧农民的住宅及抢劫农民的财产和牲畜，停止还高利贷，自由种高粱及农民所愿种的其他东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实行的对待奴隶的法律（禁止自由使用刀、锤、铲等农具和家具），并在这些口号的周围组织和联合农民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并把他们的斗争与城市工人斗争联系起来。党应在扩展农民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在各种革命的群众组织之内，尤其是农民委员会，这个农民委员会应该成为实际的乡村政权机关，并成为民众政权宽广的和强大的基础之一。他应该调节农民与游击队间的关系，经常的供给游击队以食品，组织武装自卫队，党应用全力使雇农和贫农成为农民委员会的指导力量，并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组织广大的中农群众。

因水灾和战争而受害的饥民难民为数极多（约由800万到1000千万人），他们正在为米，为高粱，为衣服，为烧柴，为住所而作着生死的斗争，那些能动员他们和组织他们与侵略者及剥削者斗争的口号，如：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财产和货物给饥民，没收民族叛徒的财产给饥民，饥民自动的打开财主的米仓和高粱栈拿米吃，大家合力来抢财主的煤木柴衣服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饥民难民建筑铁路，修飞机场，汽车路，工厂，制造厂等等，如作这个建筑工作时，则日本侵略者须给他们和铁路及工厂工人适合的工资，反对关饥民在收容所里等死，要求日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无代价的发米粮衣服煤劈柴住所等等。所有这些口号，我们党必须广泛的传播，他们的组织形式可以是“饥民会”、“饥民灾民联合会”等等。

对“满洲国”的军队应当提出这样的口号：谁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当兵就是可耻的民族叛徒！兵士们！“满洲国”军队中的弟兄们！带枪到反日的游击队方面来，杀死你们的长官

民族叛徒，暴动起来，反对屠杀中国民众的刽子手——日本帝国主义。而对反动军官所领导下的尚在斗争着的旧吉林军兵士们，可提出下列的要求和口号：兵士弟兄们！组织兵士委员会来监督各种反帝团体为我们捐来的几百万几千万元的进款和用途，不要压迫和杀害自己的弟兄——工人农民学生和饥民！和工农联合及友好，不服从反动长官的反革命命令去投降和压迫工农！小心你们的长官和国民党党外[官]的叛变！最后，兵士选举长官的口号要小心仔细和有准备的提出来实行等等……便把他们夺取到革命方面来，并加紧武装革命与全副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

对小资产阶级提出停止和减少各式各样的捐税(首先是盐税粮食税户口捐)，无代价的退还当铺里的衣被器具，反对城市里戒严，要求言论集会结社信教等自由。对于学生和知识学生[分子]提出反对关闭学校，反对屠杀学生和新闻记者，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学习的自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式的教育计划，因为这是对学生的污辱和讽刺。反对孙文主义，因为它是流血的白色恐怖和卖国辱国的旗帜。不要忘记，在民族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它的最初阶段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学生，在扩展群众反帝运动上能起很大的作用。对高丽人(其中一部分曾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来反对中国人，而另一部分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经常的与中国劳动者共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对蒙古人(日本帝国主义根据其已定的使满洲及蒙古殖民地化的计划，而进一步进攻的最近和最先的对象)须提出特殊的斗争的口号，即是一方面借此可以揭穿和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内蒙自主[立]，间岛自治区)的武断宣传，和它之利用及故意挑拨民族恶感及冲突，以利于自己的帝国主义强盗事业，另一方面，组织和联络他们与中国劳动者共同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应当提出如下的口号：第一，一致抵抗日本国政府及“满洲国”政府的捐税和命令；第二，中韩蒙及其他劳动者共同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其他

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奸细——中韩蒙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第三，苏联的工农与中韩蒙民众的友谊联盟万岁。为朝鲜人所提出的特殊口号大致是：朝鲜的农民们，日帝国主义抢去了你们的土地，并把你们从故乡赶出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归还自己的土地而奋斗，不给中韩日地主缴租。为蒙古人所提出的特殊口号：组织游击队武装反对日帝国主义侵入热河和内蒙！中国革命，外蒙人民共和国及内蒙群众友谊的联盟万岁，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北方军阀的压迫，不给国民党及一切军阀纳税，不给本地王公督统纳税，反对喇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蒙古民众的民族叛徒政策。

计算满洲有1万到1.5万的日本工人，他们比中国工人及其本国日本工人都处于特权地位，并且顾及建立他们的革命斗争与日本国内斗争的联系，而应该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利益相同的口号，组织共同的罢工，在满洲的日本工人中间，组织共产党的支部，同时必须提出共同的要求，在满洲有建立工会组织之权。

根据上海所有的经验和满洲的事实，满洲反日会等等，能成为联合广大民众的组织，同时必须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到我们的手里。满洲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都必须提出那些是群众最感奋和在各地都能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斗争的口号，并把他们日常部分要求和斗争与我们党总的政治任务和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联系起来。此外，党还必须慎重的估计到满洲的复杂国际关系与无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还必须进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正为着压迫和奴役满洲的中国和其他民众，而与日本帝国主义竞争着，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必须尽可能不怕是极小的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强盗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它有利于革命的群众运动。

党必须经常的和广泛的传播苏联的工农和中国工农友谊联盟的口号，以及中国民众和外蒙人民友谊联盟的口号，同时党必须在满洲的民众间作广泛的解释运动，来解释苏联所坚决执行的和平

政策(特别是关于满洲事件)的实质和意义。

最后,党必须根据 1925—1927 年革命,“一二八”上海防守以及满洲游击运动的实际经验和朱霁青等将军——国民党张学良段祺瑞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等等每一件具体的反革命事实,来进行广大的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张学良及其他反革命的团体,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罗章龙派对于满洲事变投降叛卖政策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广泛的宣传苏维埃的中国在解决一般的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问题方面所得到的成绩,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已经对日宣战的问题,以便向广大的群众证明只有苏维埃政府和他的英勇的红军是中国唯一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和军队,假如国民党不是四面围攻我们的苏区,那么,我们的红军早已和全国反日游击队及义勇军在一起在第一道战线上直接的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参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日宣战的宣言”)。并且要指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声明同任何的军队和队伍缔结作战的协定,共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有两种条件:(一)停止向苏维埃区域进攻;(二)给他们自己领土内的民众以一般的民权(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示威的自由)和武装民众的自由。这样,党不但能冲碎国民党的武断宣传,而且会得到满洲民众对我们党广大的同情和拥护,并且真正准备满洲革命发展的基础。

只有正确的灵活的完成上述的任务,我们党才不仅能夺得和巩固自己在反日游击队内的领导,而且只有在我们的直接领导之下,目前的反日游击运动,才能变成千百万武装民众反日的及反对其他帝国主义的真正的彻底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才能造成真正民众的和真正由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民众(工人农民兵士城市贫民学生知识分子革命的军官)所选举出来的政权,有一定的适合的领土基础,和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由最好的游击队所构成的民众革命军,并且只有在我们领导之下,满洲的反日游

击运动和革命运动,才能得到完全胜利。

此外,党必须在全中国在这运动中灵活和勇敢的利用各种公开的可能,以便把援助满洲游击运动的发起和领导都夺到我们手里,以便一方面揭穿国民党的手腕和欺骗,而另一方面利用这运动而公开的派革命分子和我们的人、钱,去帮助满洲的游击队。在全国特别是华北党必须立刻在群众中广泛的进行一种运动来解释,组织所谓“北方独立国”,即是变相的“满洲国”这运动的实质在于:借此以动员广大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热河及内蒙古的全部领土和进一步的进攻中国北部和全中国。在我们的苏维埃区域里,党应当发起一种运动和举动,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帮助满洲的游击队。这运动不仅给满洲的游击队以有力的帮助,同样也会掀起和提高国民党中国里反帝运动的战斗精神和情绪,而同时也提高苏维埃中国里的红军兵士和劳动者的精神。募捐援助游击队,不(应)当只限于金钱,而应该普遍到各种东西——米粮、衣服等等。

(四)我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保障

我们上面已经指出了,满洲民族革命斗争胜利的前途,在基本上要看我们党如何的执行目前阶段上伟大的基本的革命任务。因此我们党在满洲必须有自己的能执行上边为满洲提出的任何[务]的组织。然而可惜在满洲我们党的组织,在最近一年中虽然有发展,然还远远的落在客观可能之后,党员和团员数量不大,群众组织非常薄弱。因此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发展和巩固我们党在满洲的组织,是目前我们党最要紧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应当加强和巩固满洲党的领导,以便这领导真能和真会应付这复杂的环境和极端重大的任务。顾虑到了军事的环境及在满洲省委和地方党委员会间时常没有必须的联系,省委须在各地建立

起强健的和有独立及自动的工作能力的党委员会，譬如在南满东满北满各处，以及在各主要游击区域和抚顺等，同对在各大城市——大连、哈尔滨、奉天、长春等等。所有满洲党的组织，从省委到支部以及每个党员都必须用全力和一切政治方法，努力的打入一切游击队伍（首先是最大的）和一切重要企业（首先是南满铁路，抚顺、穆稜等煤矿，大连、松花江的航业等等）以及一切群众组织（反帝同盟、反日会、农民委员会、大刀会、红枪会等等）去，以便和群众发生联系及在其中建立党的支部。这些支部要十分的秘密，然也必须能扩展革命的群众工作。对于找出、提拔和教育，以及正确的利用党组织的干部的问题，特别要严重的注意。应当消灭那种以为满洲“无人”可作我们干部的不正确的意见，在满洲天天有更多新的力量被吸进游击运动和反帝运动中来，为什么能说在满洲没有先进的工人和劳动分子呢？满洲党的组织须在群众反日游击战争，罢工斗争，群众的农民骚动等发展的过程中，找出、训练成千成万的新干部。党的教育工作，经过党校训练班、研究组 and 个人的帮助教育每个党员以基本的马克思列宁的理论、知识，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满洲党的组织须有计划的和有系统的进行这个工作。在正发展着的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中，党员和积极分子能很快的了解马克思列宁的理论。

在满洲目前极复杂的条件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方法，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系的问题，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然而根据我们所有的材料（如满洲省委关于五一运动的决议案），省委本身对这问题也没有正确的提出，他简直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对立了，从他们的决议案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或是公开工作，或是秘密工作”。这毫无疑义的是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现在在满洲，一方面因为日帝国主义直接警察统治的关系，我们必须深深的加紧我们的秘密工作，另一方面，因为有群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广泛的发展，我们就能利用很大公开的可能，在群众中作公开和半公开的

工作。在游击队的区域里,这问题的作用,也不比在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直接统治的区域小。

在两条战线上无情的斗争,首先是反对右倾(对满洲的形势估计得不足),对游击和罢工斗争采取取消的态度,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为着与其他阶级统一的战线,而失去我们党独立的政治面目,对国民党有幻想等等——这是主要危险。同时要反对各种的“左倾”(如对游击队抱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反日及反其他帝国主义的统一民族革命战线的估计得不够,李立三路线残余),必须成为一切行动及其指导的基础。同时必须顾到满洲党组织与苏维埃中国和中国南方中部比较要年幼得多和经验少得多,因此在批评某个同志或某些同志特别是年青幼稚和少经验的同志们的错误时,要多有忍耐心,而说服之和给以解释。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和托陈派的斗争,必须是不留情的。和反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奸细一样,不但在思想上与他们宣战,而且在组织上也要断绝我们组织和他们的一切关系。只有这样的方法,我们才能在组织上政治上发展和巩固我们党在满洲的组织。只有我们在满洲强固的党的组织,才是革命运动彻底的唯一的和有能力的领导者。

满洲党组织的基本弱点之一,在于他未经过 1925—1927 年大革命的学校。然而满洲党是我们党不可分离的及组织的部分。因此 1925—1927 年革命极丰富的教训,以及最近几年中国中部及南部胜利的苏维埃革命极宝贵的经验,和联共伟大胜利的经验,都应当有系统的被我们在满洲的组织在中央指导之下所利用。

同志们!满洲的客观环境对于扩展胜利的群众斗争是十分顺利的。

我们相信满洲的党和全体同志坚决执行着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案和中央这一指示,在广大的劳动者工人武装的广大群众中进行着无畏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而首先是最勇敢最牺牲最努力的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奋斗,在满洲最后的胜利

是属于我们的！

中央

1933年1月26日

※ ※ ※

国民党签订卖国的“华北停战协定”承认了“满洲一国”，最后出卖了满洲、热河、平津华北，进一步的更无耻的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帮助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彻底瓜分中国，造成更严重的民族危机。除发表反对“华北停战协定”的一切文件以外，中央认为把本年1月给满洲党部的信公布出来是必要的。希望一切组织，首先是华北的党把这一信中所指出的任务与策略适宜的应用于目前各地实际斗争环境中，去组织与开展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中央

1933年6月9日

根据1933年6月10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四十四期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 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

——重申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
部队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3年4月15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在“五一”我们谨向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呻吟于帝国主义国民党血腥统治之下的工农与城市贫民，被迫反对中国工农的士兵，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学生与青年，成千成百的被监禁和虐待在国民党牢狱中的革命犯人们致革命的敬礼!

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完全瓜分中国的危险之空前增长，与整个民族危机的深入使我们不得不向一切为中国利益而斗争的人们及劳苦群众再作一次宣言。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在日帝国主义毫无阻碍的长驱直入平津的区域。同时英帝国主义正在新疆进攻，并经过他的西藏以及其他傀儡准备占据中国的西部。在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所进行的秘密谈判中，蒋介石又与帝国主义强盗们作了一笔生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秘书唐有任[壬]代表南京政府与蒋介石在上海秘密与日本代表芳泽谈判。蒋介石——中国工农的刽子手，1929年要求日本军阀占据山东与1932年在背后屠杀上海防卫者的罪魁，现已抛弃了北方战线，重新升用替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开路的卖国贼汤玉林[麟]。蒋介石到北方并没有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而

是承继他的朋友——卖国贼张学良的产业。

西南政府与福建的军阀一样是不反对日本及其他任何帝国主义的，最近他们的“北上抗日”的宣传完全是欺骗民众的鬼话，实际上，是为着扩张自己的地盘和进攻苏区与红军。

为什么蒋介石要回到江西呢？为什么他抛弃了北方军队，使他们没有武装徒手对着日本的大炮飞机呢？为什么国民党及其政府集中了大批的军队，所有的飞机与军事技术来反对江西的工人和农民呢？因为他们正在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商量要把中国当着他们的私产出卖干净。因为他们希望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也如对“满洲国”一样，允许他们作几省的傀儡统治者。因为他们要屠杀中国的民众来维持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国民党为着掩饰自己的投降与出卖，造谣说日本帝国主义帮助红军金钱与军火，污蔑中国苏维埃政府与日本军阀进行谈判。这种无耻的下流的造谣，早已被许多铁的事实粉碎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的民众政权与武装力量，在历次英勇的战争中，证明中国苏维埃红军与任何帝国主义势不两立，我们与日本的工人和农民是不可分离的联系着，因为他们同样是在进行英勇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样是受统治阶级的掠夺、压迫、虐待和屠杀。但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正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正在为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利益而斗争，为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而斗争。目前正需要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作战，谁反对这个战争，我们就要打倒他。

我们完全相信中国的工人农民与兵士的斗争，以及红军的英勇防卫能够阻止帝国主义，蒋介石与破产的国民党实现他们的瓜分中国的计划。

在最近三个月中，江西的工农及其红军击破了敌人九师以上的兵力。在几次的战争中俘虏了人枪各在3万以上，以及大批军

需及其他武器无算。1万左右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已经自愿的加入江西红军。在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的红军也在迅速的增长着。从最近在江西被俘的52师,59师两师长及其师部人员的宣言中,完全可以看出国民党军队的瓦解是怎样的深刻,他们责骂国民党与蒋介石,懊悔自己过去反对中国工农的罪过,要求白军的士兵与官长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调转枪头去打出卖祖国的国民党卖国贼。蒋介石、汪精卫等卖国贼见于最近红军的伟大胜利与前线士兵的动摇以及全国民众的愤怒,又想以“剿共即抗日”,“在共未肃清前,不许言抗日”的武断宣传来阻止广大士兵群众的革命化,来掩盖自己的出卖和投降。但是这种欺骗和威吓是不会成功的,恰恰相反,只会更加暴露他们的罪恶。

根据目前的情形与我们的胜利,必得重述今年一月间我们的提议,来粉碎国民党关于红军及苏区工农阻碍有效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污蔑。我们认为只要能依照我们过去的提议,积极抵抗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刻是可能的,因此再将我们的提议向全国宣言:

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战争的作战的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
-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之自由与释放政治犯等等);
-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队伍,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每一个工人、农民、兵士都会了解,没有以上的条件,想与帝国主义作胜利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的政策是破产了,他引导瓜分中国与更加奴役中国的民众,继续增加民众的痛苦,饥饿与屠杀。

我们号召一切劳动者与士兵在广大的群众中,军队中,以及义

勇军中加紧工作,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民族的革命的政策。我们号召一切劳苦群众拥护我们防卫中国及民众的权利。

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英

张国焘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

1933年4月15日

根据1933年4月21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40期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

(1934年2月22日)

中央审查了你们送来的各种文件,并听了××同志^①的报告,写给你们这个指示信。此外还写给你们关于职工运动和关于反日游击战争的两个专门的指示。

(一)

一年来满洲^②反日民族革命斗争的发展,显示出下面的特点:(一)“华北停战协定”签字后,日本强盗更集中力量向满洲反日民众与游击队实行残酷的压迫与屠杀,同时疯狂般的进行着进攻苏联的挑衅与军事准备,现在满洲已处在进攻苏联战争的前夜的形势。国民党南京政府是日本强盗这种行动的最忠实的拥护者。(二)在大部分义勇军中,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将军们相继叛变,国民党的影响大大的缩小,而共产党的影响则日益扩大,他们更多的吸收了劳苦民众到自己队伍中来,与居民的关系比以前更改善了,新的游击队正在继续的生长。就因为这些缘故,他们能够继续的与日本强盗进行残酷的战争。特别是共产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人民革命军,多次的打败了日本强盗的“围剿”,他的胜利告诉了全满洲的民众,只有共产党是唯

^① 指何成湘。

^② 本指示信的中央档案原抄件中的“满洲”大部错写成“满州”;凡错写的,均直改为“满洲”。

一彻底反日反帝的政党。这些新的有利的因素，使满洲反日游击队成为一种不能消灭的力量。一切认为国民党将军们的相继叛变之后，满洲反日游击战争已经开始下降和失败，都是违背事实的反革命派武断宣传的应声虫。（三）在估计到这些新的有利的因素的时候，必须着重指出，满洲反日游击队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部分的队伍还在国民党等反革命派领导或影响之下，大部分几万人几千人的队伍，自从他们的首领叛变投降后，分散成为无数数量比较小的队伍，虽然共产党在他们之间有了日益扩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但他们还是散漫的，不统一的，没有联络的，各自为战的。总之，他们带着浓厚的自发性。工人和农民的群众继续投到队伍中去，也多是自发的。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还没有能够在组织上去巩固自己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如果这种散漫的自发的形势继续下去，国民党等的反革命派别的影响以及他们的部分的领导作用不能消灭，反日游击战争在日本强盗积极的各个击破的政策之前，有遭受暂时失败的危险。

为着胜利的开展满洲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为着实际的实行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满洲党必须积极的参加一切群众的反日运动，广泛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实际运动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提出我们的主张与纲领，并实际的揭露与孤立国民党和一切其他反革命派别，把散漫的自发的游击队在无产阶级政策的基础之上组织起来，成为尽可能统一的真正反日的武装，扩大人民革命军，建立临时的人民革命政权，组织工人农民的群众的革命斗争，团结他们参加反日战争，争取满洲反日民族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也就是真正实现在游击运动及各种革命群众运动中共产党的独立的领导，能够使满洲反日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彻底的胜利。

(二)

检查一年来满洲省委,在执行中央去年1月的指示^①方面,进行了许多工作。然而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时,还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存在着,这里主要的便是浓厚的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使我们的活动限制在极狭小的一部分比较先进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之中。这种倾向的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在我们的反日纲领上,常常写上“拥护苏维埃红军与联合苏联”一条,磐石人民革命军纲领上,还加上了一条“拥护人民革命军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有些工人斗争的纲领中,机械的摆上许多政治口号。除此我们同志还时常把反日会等群众组织变成第二党的模型,个别的反日会曾经因此解体。至今反日会的组织不过4000会员,哈尔滨50余个反日会的单位,总计会员不过300人。满洲的同志必须了解,在满洲反日运动中,卷入极广大的群众,他们确实是诚心要反日并且实际的参加了反日战线,但他们之间有部分的甚至大部分的群众,对于反革命派的武断宣传还没有完全识破,对于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采取上述这些关门主义的办法,无疑的只有“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在客观上实际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不应当站在群众外面空喊,我们首先重要的是参加一切群众的反日运动,争取与群众打在一起。只有我们能够接近群众与群众打在一起,群众相信我们是和他们一起去反对日本强盗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更广大的发动群众运动,在运动中有一切机会使群众认识反革命的欺骗而接受我们的主张。

^① 指1933年1月26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本指示信中的引文均引自该信。

我们党在坚决的打进[击]了自己队伍里面的关门主义倾向，走进反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时候，一刻不许忘记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当这部分人还用武装的方法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不仅是表明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特别是表明为着夺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而用特殊的方式与这资产阶级斗争”（同上）。所以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必须坚决的领导工人的阶级斗争，在反帝及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组织和武装工人，以保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骨干；在任何时候，必须坚决的拥护农民的要求，灵活的和及时的援助和组织加入统一反帝战线及正在斗争着的农民；在任何时候，必须坚持和保持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同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投降的企图和事实。所以“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必须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上层统一战线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同上）。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反对把夺取无声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

这一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没有被满洲同志正确的了解，而发生机会主义的曲解，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对立起来。例如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传上，有同志认为主要的要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之上，而把“拥护被压迫民族的朋友——苏联”与“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如在工人群众中空喊反日，而对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表示消极，（甚至在电业罢工中，我们同志拒绝工人提出经济要求），在农村中没有积极组织“二八分粮”和拒抗捐税的斗争，对于广大的失业工人和数百万流离失所的灾民，没有工作，在义勇军中时常拿上层勾

结代替下层的统一战线等等。这种尾巴主义的倾向,在满洲党内所以没有能够克服,基本的还由于省委在统一战线内部进行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有了曲解,这表现在省委去年6[8]月“论全民族反日反帝的统一战线”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指示信^①的上面,那封信分析在满洲应当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统一战线时,认为是由于“群众政治经验幼稚,未经过1925—1927年大革命洗礼,未有直接苏维埃革命的经验,他们刚从政治上觉醒过来”,由于“全体民众是反日的”,由于“满洲党政治上和组织上还非常薄弱”。这种分析,很明显的是有他的缺点和错误:第一,这里说“全民众是反日的”,显然忘记了中央指示信所分析的满洲有产阶级对侵略者采取敌视的态度,只是他们之间的一部分,而且是为着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时刻准备着投降叛变,并且拿着改良欺骗的空谈来掩盖自己投降叛变的企图和事实。第二,分析中,只看到主观的弱点,对于群众的政治觉悟估计过低,特别是完全忽视了满洲无产阶级在反日运动中伟大的政治力量 and 作用。“满洲的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伟大的政治力量,虽然他有一定的弱点(没有1925—1927年中国革命及苏维埃阶段上的直接经验,在政治上阶级觉悟和组织性较小等),然而无条件的他是革命和民族革命战线最基本的动力,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不断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人的积极参加游击战争,完完全全证明无产阶级伟大的政治力量”。中央在这方面的着重的指示,完全被满洲省委忘记了。总结起来说,省委指示信表现着过分的估计了有产阶级“敌视”日本强盗的作用,过低的估计了反日群众的阶级觉悟,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因为这种基本分析上的模糊和错误,所以省委指示信上没有能够清楚的提出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问题。(工人农民的阶级斗

① 指1933年8月10日《满洲省委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论全民族反日反帝的统一战线》。

争,反对领袖动摇等),而只简单的空洞的说“工厂作坊是我们的基本阵地”,“在农村里发动农民斗争特别是秋收斗争”等。

与这个问题密切联络[结]着的便是孤立反革命派别的问题。“国民党张学良在满洲游击运动中的影响和局部领导是阻碍着反日运动及一般革命群众进一步的扩大和深入的基本事实。就是国民党这个影响和局部的领导在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中政治方面很不成熟及满洲我们党较弱条件下是主要的危险”(中央去年一月指示信)。因此满洲党必须经过统一战线的策略去争取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到自己的手里来。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意义就是为着团结一切愿意反日民众(不分党派的)去共同的反对共同的敌人,而在斗争过程中反对反革命派一直到孤立他们而完全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但是满洲的同志对反革命派别的作用的估计是不足的。许多文件上虽然写上许多“反对改良欺骗”等词句,但实际的行动是极缺乏的,甚至有些同志根本否认反革命派别的欺骗作用。例如说“国民党在群众中没有什么影响了,其他反革命派没有什么活动”,“黄色工会被解散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都没有什么欺骗”等等。这种说话,实际是减轻了以至否认了统一战线,特别是下层统一战线的必要。因为如果在反日群众运动中没有反革命派的改良欺骗的影响,统一战线便失去了意义。然而事实是与这种估计相反的,国民党在满洲民众和义勇军中的影响虽然比以前缩小了,但并没有消灭,而且没有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也不会完全消灭。在某些部队中(如陈东山等所领导的),国民党还占着领导地位。另外有许多队伍中,有我们的影响,同时也还存在着国民党的影响,特别是上层分子的中间。在工人之中,虽然有许多黄色工会被日本强盗解散了,黄色工会的影响以及部分的黄色领袖还留在工人当中,黄色工会形式上的解散,有时反增加了黄色领袖以欺骗群众的可能。中东路还有华工事务所,海员中也有黄色工会的组织,中国资本家还会利用民族武断宣传来缓

和阶级斗争(例如电业罢工中),日本强盗和其走狗也曾利用欺骗的手段来挑拨中韩民族间的恶感,在某些区域(例如磐石)之中,他们曾进行过对劳苦民众的欺骗行为(发救济费、药品等),所以满洲党在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中,必须把反对反革命派的斗争在思想上和实际上都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首先在党内克服对反革命派的欺骗估计不足的倾向,在工人农民中、义勇军中,反革命军队的士兵中和一切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对于任何一个小的欺骗的事实,都要努力去揭破。

在满洲反日民族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不仅要在保持宽广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时候,能够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去孤立资产阶级,肃清反革命派别的影响,为着争取反日游击战争以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到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同样重要的,还要为着实际创立民众政权而斗争,就是说在整个运动中,党要努力争取适当的条件,如在我们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比较固定的区域等,去建立临时的革命政权。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政权的创立与扩大,是团结和组织全满反日游击战争和反日群众运动最有力的杠杆,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实现的最重要的工具。但满洲省委对于经过统一战线去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本问题上面的模糊和曲解,同样在缺乏建立革命政权的观念上面表现出来。照××同志的声明,省委认为现在只是建立群众的反日会与农民委员会并使之成为事实上的政权,经过了这些步骤,才能建立政权。这种意见无疑的表现出政权阶段论的倾向。当然我们要建立广大群众的反日会农民委员会士兵代表会议等,使之成为革命政权的基础,但如果认为必须经过这些阶段就错了。此外省委认为提出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在今天过早的。当然在满洲现在情形之下,要防止死守根据地不发展,但并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反对在可能条件下争取革命政权和根据地的建立。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所坚持的真理,磐石人民革命军与间岛人民革命政府(刚从报纸上看到),不仅在满

洲民众中而且在全国都起了极大的影响。满洲党必须把建立和扩大革命政权与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提到实际的工作日程上来。

总结起来,中央指示信到了满洲后,省委曾经反对了过去满洲党内显明的“左”倾的错误,如在今天就要建立满洲苏维埃和红军,拒绝与反日义勇军联合,甚至围剿[缴]反日胡匪的枪械等。但省委没有能够正确的了解中央的指示信,对于统一战线基本问题上,省委自己作了右倾曲解的错误,所以不能正确的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放松了反对右倾尾巴主义的主要危险。因此不能够粉碎右倾,也不能肃清“左”倾。“左”右机会主义倾向同时并存的最好的标志,莫如反日游击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或则没有统一战线,或则只是上层联合,放弃艰苦的下层统一战线的群众互作。满洲党必须真正正确的开展反对主要危险的尾巴主义,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最重要的要在实际问题上,具体的指导和开展这个斗争,这样来保障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

(三)

根据上面关于实行统一战线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批评和分析,对于现在散漫自发而缺乏中心领导的反日游击队,满洲党必须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到他们中间,首先是主要的和我们影响较大的部队中间,去进行我们的宣传鼓动,详细解释中央最近所提出来的对日作战纲领^①,说明统一作战的必要等等,随时揭破一切任何反革命派的欺骗和武断宣传,就是很小的机会都要利用着

^① 指《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的发出时间是1934年4月2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1934年4月20日《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和同日发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早在1933年10月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已经提出,因此,此处提到了这个纲领。下同。

来作反对反革命派的武器。对于首领的任何动摇,都要无情的批评。必须建立公开的反日会和士兵代表会议的组织,建立坚强的党的组织,特别注意团结投到义勇军中的城市工人的分子到反日组织和我们党里面来。只有这样的在下层士兵群众中建立了巩固的政治的和组织的基础,才能够实现我们党在游击战争中的独立的领导,为着共同的反对日本强盗及其走狗各个击破的政策,我们不仅不应该拒绝某些反日队伍联合作战的要求,而且应该尽力号召一切反日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去反对共同的仇敌。应该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现象,分别的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如中央去年1月给省委信所指示的。但实行上层的联合,建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就只有那种愿意接受我们反日作战纲领的部队,而我们在这部队中有了巩固的下层基础,才可能和有效。并且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也要尽可能的经过士兵代表会议来选举指挥机关,尽一切力量在士兵群众中发展和巩固政治的组织的工作,以便当首领企图叛变时,有力量去打倒他。

为着实现这种任务,必须首先纠正党内在这方面所作的许多错误。这首先要反对那种学究式的背诵“四种游击队”^①的公式,这不是说关于四种游击队的指示是不正确,而是反对你们不去具体的分析每个队伍的实际情形,定出每个部队中的具体的策略,而死板的在四种游击队的模型中兜圈子。这种学院的方式,需要立即唾弃!其次你们分析某个部队属于某一种,或在某种与某种的过渡中间的时候,多半只看部队首领的面貌,不去分析部队的下层状况,士兵的成分,政治觉悟及我们的影响与力量等,而拿首领的态度作侧[测]验整个部队的标准,这种非阶级的分析方法,无形中

^① 见1933年1月26日《中共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中对当时满洲四种类型抗日游击队政治状况的分析与分类。

帮助了某些地方党部把联合战线当作上层周旋去运用的错误。他们为着怕得罪上层领袖,不敢进行公开批评,甚至连反日会都秘密起来。最后,省委估计磐石“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是正确的组织,这个司令部的破产,只是由于磐石党没有注意下层统一战线的工作(见省委给磐石县委信^①),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因为“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是上层统一作战的机关,他只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当时参加这个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宋司令与毛团只能算第一种游击队,对于他们应该如中央去年指示信所指示的方式:“主要是从下面和兵士组织统一战线,并且在有共同作反日斗争必要时,订立具体的作战的行动的协约。”磐石人民革命军与宋司令毛团组织的联合军总司令部,其结果是上层勾结代替了下层统一战线,而至于完全破产。这些错误,都必须迅速的纠正过来。

中央同意你们把磐石间岛汤原绥宁^②珠河等五个游击区当作我们工作的中心。但是要在这些区域里有效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和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除开正确的在各个部队中进行政治和组织的工作外,必须执行下列的具体任务:第一,要坚决的创造完全在我们领导之下而在政治上同样在军事上能够领导和影响一切反日游击队伍的中心力量——人民革命军。在磐石我们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已经存在着的人民革命军,在间岛汤原绥宁与珠河进行创造人民革命军。当人民革命军还是数量不大的游击队的形式的时候,必须利用一切旧式武器作辅助的武装,必须在自己的周围尽量武装工人农民,组织工人义勇军农民义勇军等,并号召他们加

① 指1933年9月23日《满洲省委给南满中心县委及磐石人民革命军的信》。

② 指当时吉林省的绥宁抗日游击区,包括今属黑龙江省的宁安县、穆稜县、密山县、绥芬河、东宁县一带,下同。

入人民革命军。在人民革命军中要最高限度的进行政治工作,建立有健全生活的党的组织,必须征调最好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去担负领导工作。磐石人民革命军在这些工作上都表现很大的弱点,必须迅速的克服过来。第二,在暴动胜利的区域或我们领导下的游击战争胜利的区域,都有建立临时革命政权机关(临时的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可能,党应争取这种可能,首先在磐石应尽可能的建立起来,对间岛的革命政权,应迅速给以指示和帮助。临时革命政权在建立的第一天就必要宣布革命的政纲和法令,实行武装工农群众,镇压反革命,保护工人农民的斗争和一切反日的行动和组织,动员群众参加反日战争,以真正实施民族革命战争和暴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作用。第三,在游击区域里面必须坚决的实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财产(连土地在内),没收来的东西,主要充作反日战费之用,但同时要尽可能的拿一部分给群众,使人民革命军和游击战争得到更广大的群众的拥护。“必须十分清楚的认识反日斗争一天天发动起更多的广大劳动农民群众,因之而一天天与反对中国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农民土地运动的〈发展〉配合起来”。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对满洲土地问题估计不足的倾向,在一切游击区域和我们有工作的农村,必须根据中央去年指示信所指示出来的关于领导农民斗争的策略,口号和组织方式等去实行,把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的阶段。这就是说:我们要在领导反日斗争中根据群众迫切要求,提出没收反革命卖国贼的财产,拒绝“满洲国”的一切捐税等等口号,以走向土地革命的阶段去。

(四)

为要建立极广泛的群众的反日统一战线,并保障在这一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骨干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除掉坚决的执行自己在游击战争中和农民中的战斗任务而外,满洲党在基本上必须用极大力量去进行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极大的转变。

必须清楚的认识“不保证反帝运动有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则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或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必想夺得无产阶级的领导”。

满洲无产阶级虽然在反日运动中表现了伟大的政治力量和作用,但基本的还带着自发的性质。满洲党的任务,就在于尽量去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各式的斗争,而首先是在他们日常迫切的部分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基础之上,去组织和开展阶级的和反帝的斗争。尽量把他们组织在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之内,提拔和训练工人先进的分子,作为党,团,工会,民众革命政权的骨干。满洲党对于中央去年1月这个基本的指示,一般的来说是没有执行的。许多决议和指示文件中,虽然常常写上了组织罢工,打入某某等处大企业等,但实际都成了空喊。大连、奉天和有些重要铁路与矿山,虽然在那些地方仍然有着下层的组织,但省委与他们没有关系。在我们有工作的地方,赤色工会仍然限在几个人十几个人的极端狭隘的组织之中。农业工人工会的组织,也是只空喊,没有动手作。就在我们有基础的游击区域,也没有建立起工会工作的机关。有些同志和地方党部还把职工运动当作只是为着征调工人到义勇军中去的目的。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满总的同志对于太平洋秘书处的指示信采取了极端不尊重的态度。总括起来,满洲省委对于职工运动采取了极端忽视的态度。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你们对于满洲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五中全会严厉的指斥许多地方组织及个别党员的忽视工会工作的倾向,并且认为忽视和躲避工会工作的人不能算作共产党员”(五中全会决议),满洲党必须给五中全会这个指斥以布尔什维克的回答。根据着五中全会的指示和中央这次给你们的专门的信,从省委到支部定出具体的工作的计划,把党的工作放到工厂,工会,罢工的上层,坚持厂内的群众的组织与宣传的工作,去建

立群众的工会和准备罢工。依照中央另外的专门指示所提议的几个主要的企业,首先集中力量去作。从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和游击队中征调工人的积极分子派到这些主要的企业中去工作。省委要具体的指示和帮助地方建立工会工作的领导,在几个游击区域中应当建立满总的代表机关,以准备建立群众的工会。对于失业工人的工作必须立即开始。各级党的组织从省委到支部,对于工作的计划,必须定期检查,绝对纠正过去空喊清谈的现象。必须耐心的培养工会工作的干部,提拔在群众中有密切联系的积极的工人担任工会工作,对于满总的成分必须重新审查和改造。

在满洲现在的形势之下,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反对资本进攻,“二八分粮”,抵抗捐税,反对高利贷等的斗争,失业工人和灾民的斗争,都不可免的要同时成为反对日本强盗的斗争。我们应该去影响和组织这种斗争。我们必须学会把群众日常部分斗争与反日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党必须随时随地能够揭破一切民族主义的武断宣传,如剥削阶级借口反日来缓和阶级斗争,用“共产党破坏反日”来中伤党与群众的关系等等。党必须反对党内对反日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估计不足的关门主义倾向,真正到群众中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工作,这里要采取许多深入群众的宣传和组织的方法:

一、要把“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具体纲领”,在全满人民中,工人农民、游击队中、士兵中、学生中,和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贫民以至商人中,做极广大的通俗的解释工作。号召一切赞同这个纲领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行动。在这方面应该采取的许多具体步骤,上海中央局将给你们以具体的指示。

二、“反日会”本来是团结反日人民的最好的方式,但因为我们的同志曾经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关门主义的错误,如提出过左的纲领,如把他变成第二党的模型等,以致至今没有能将他变成群众的组织,因此我们去进行团结一切赞同右面纲领的人民的时候,不要机

械的提出“反日会”的形式，组织的名称完全可由人民自己选择。

三、关于“成立工农兵商学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工作，要把重心放在群众中去，基本的要在工厂、作坊、矿山、铁路、学校、兵营、商店、马路等去建立群众的组织。要在各城市农村游击区域去建立地方的委员会。我们要经过下层的工作，选举坚决反日的分子到领导机关之内。但我们不要企图包办这些组织的领导机关。对于个别动摇不可靠的领袖，如果群众还不明了还拥护他的时候，不应机械的拒绝他加入领导机关。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经过这些方式去团结极广大的群众以至在各种反革命派别影响下的群众在反日战线之内，在群众特别是工人中和游击队中建立巩固的党的核心以及党团的组织，注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去孤立反革命的动摇的首领。

四、要经常运用下层的各种代表会议去讨论和解决一切反日的工作。代表必须是经过选举出来的，要保持广大的群众性，绝对不许运用指定等方式。特别要注意去发起和领导游击区域里面的游击队士兵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城市的工人代表会议、学生代表会议等。

五、要在右述纲领之上，尽量武装群众，号召一切反日群众，自己动手武装起来，利用各种各式的武器武装起来。

(五)

满洲一年来的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中央去年一月指示信的正确，并且一般的总的方针，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所以中央这次写给你们信，只根据着一年多斗争发展中的特点和满洲党在坚持斗争中所作的许多错误，给以分析和指示。中央完全赞扬满洲党在艰苦的复杂的环境中的奋斗精神和所得的某些成绩（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创造了人民革命军，以及在几个主要游击区域里的工作有了进步等）。但满洲党领导机关中所作的许多重大错误，必

须坚决的改正。

关于满洲党的组织上的任务,我们同样坚持去年1月给你们的许多指示。首先重要的是建立起强健的和有独立自动的工作能力的地方党委员会。现在满洲党的地方委员会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问题,大连、抚顺、奉天等重要城市至今没有建立起来。哈尔滨、长春及各游击区域的领导机关还很薄弱,吉东局只一个人工作,并且省委和各个地方的领导机关中的成分,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因为这些缘故,地方委员不仅缺乏独立自动的工作能力,而且与群众的联系极其薄弱。这种情形的继续没有转变,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满洲党内存在着“满洲无人”的倾向,××同志的报告甚至说,“满洲连最低限度的干部都无办法”。满洲二年半以来,不断的爆发着罢工,兵变,农民暴动,几十万义勇军的反日战争,成千成万的工人投入到义勇军。这些伟大的斗争在成千成万的领袖领导之下,“为什么能说满洲没有先进的工人和劳动分子呢”?省委必须毫不留情的唾弃和粉碎“满洲无人”的糊[胡]说,把眼光向着斗争中的领袖,特别是工厂中企业中和义勇军中先进的工人,征收他们到党内来,提拔他们到领导机关中来。他们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是群众中有威信的领袖,他们参加到党的领导机关和各种领导工作,可以使党与群众的关系立刻密切起来,使党可能掌握住运动的潮流。一切列宁主义者都应当看得见这个列宁主义的真理!

为着完成这个任务,对于新的干部的教育和培养,要采取极耐心的方法,经过党校训练班研究组 and 个人的帮助,教育每个党员首先是每个新的干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知识,特别还要注意在日常工作中以同志的态度去帮助新的干部,在无情的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时,必须顾及到满洲党的组织与苏维埃中国和中国南方中部比较要年幼得多经验少得多。因此在批评某个同志特别是年轻幼稚和少经验的同志的错误时,要多有忍耐心而说服之和给以解释。满洲党的领导机关首先从省委起,对于去年中央这个

有极大重要政治意义的指示是没有注意的。例如省委对于电业罢工中支部同志的错误和给磐石党关于组织工作的指示所采取的方法,是违背上面所指出的原则的。满洲党在领导方式上必须同样有极大的转变,废除那种空洞的一般的决议和工作计划,以及没有具体内容的和单纯“责备”一顿的指示信。从省委起必须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使党的领导转变到具体的带有充分说服精神的方式,保障中央的指示在实际工作中收到实际的效果。

最后中央向着你们及艰苦奋斗的党员,在反日前线上的战士和民众,致极诚恳的热烈的革命的敬礼!

中共中央

1934年2月22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

(1934年4月10日)

全中国民众!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在其傀儡溥仪称帝之后,现在又进而实行公开占领华北和并吞中国了!

日本帝国主义新进攻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日本已经对其华北代理人黄郛和国民党提出哀的美敦书:(一)立即答复中日直接交涉的一切条件;(二)东北军及其他部队完全离开华北,由日满军队驻守;(三)一切反日反帝团体,工会和革命组织完全取消,代以傀儡的组织;(四)由华北当局保护溥仪入关祭东陵;(五)黄河以北的土地完全划为“满洲国”领土;(六)保障日本在华投资的优先权,实行所谓中日“经济提携”,诸如此类等等。一句话,日本已不满意于华北现存的变相的傀儡政权,要求把整个华北以至于全中国都(放)在日本直接统治之下,如“满洲国”一样。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日本已经积极实行军事上的动员:大批日满军队向马兰峪与察东增调和集中;大批华工的招收,新兵的编练,军用汽车路与铁道的修筑;滦东察东土匪的编制与冀察等省土匪的联络;日本先遣队——刘桂堂之数省流窜;大批飞机的侦察与到处军事的演习;国际军事侦探部的积极活动;军事测绘机关测好了黄河形势与察蒙新疆的联络线以及绥新的联络线;由热河至西蒙已设有电台20余处——所有这些步骤,表示出日本大规模新进攻的准备。这个新进攻的目的就是:以西进南进双管齐下的手段

公开占领整个华北，并吞中国，同时准备进攻新疆与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实行反苏联的反革命武装干涉。

与日本进攻华北和反苏联战争准备同时并进的，是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加紧：英国扩大了对新疆、青海、康藏的进攻，占领滇边的班洪与澜沧等地，同时企图复活旧时的英日同盟，来共同进攻苏联；法帝国主义利用其在安南的优越地位操纵云贵、广西的统治，并时时准备占领这些地方；美帝国主义极力企图维持并加强其对中国的统治，使中国完全变为自己的殖民地，疯狂的与日本进行着太平洋上的争霸，同时最近又与日本换文，企图进行反苏联阴谋；为了瓜分共管中国与反苏联大战，一切帝国主义者，首先是德国帝国主义准备着承认“满洲国”，各国银行团正在接洽给国民党新的大借款。

劳动群众们！华北和全国民众是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反苏联战争危险，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已到了新的阶段——即直接瓜分中国的阶段！

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的出卖是更加无耻了。黄郛、何应钦等卖国贼天天与日本接洽出卖条件；南京政府外次唐有壬已亲到长春朝见溥仪了；黄郛、汪精卫、蒋介石等刽子手又在南昌大开卖国分赃会议；国民党华北当局已答应保护溥仪入关；蒋介石的党徒已决定接受日本一切要求，和完全放弃整个华北；东北军与其他部队正被派南下去进攻红军，把华北送给日本；国民党法西斯蒂借口反对“汉奸”去镇压真正反日的革命运动，反对开滦工人的罢工；蒋介石卖国贼又重申严禁一切罢工怠工与革命斗争的命令……凡此一切已证明国民党成了日本的可靠工具与溥仪的忠臣孝子！

为掩盖其无可掩饰的卖国真面目，国民党法西斯帝大肆其最卑鄙的武断宣传，他们认为华北之存亡“不算什么”，横竖中国是“国难”，何必“大惊小怪”！英国并没有占领班洪，这是“班弄”之

误! 英国也没有占领澜沧,这只是“与土人的小冲突”! 谁敢说日、英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岂有此理! 这是破坏中国与列强的“感情”和“亲善”! 不仅如此,国民党法西斯蒂“借口”中国“无力”抗日,认为“治本莫无先建设”,“治标莫先于剿共”! 以此来掩盖其卖国的罪恶,一切反日反帝斗争都认为是破坏“建设”与“剿共”,而加以无情的镇压! 在溥仪称帝与日本大举进攻的现在,国民党法西斯蒂集中一切力量去进攻红军与苏区,实行大借款,进行奴隶式的“新生活运动”,取缔一切罢工,怠工,屠杀一切革命分子,禁止任何进步思想与言论,以此替帝国主义最后瓜分中国作清道夫。这就是国民党所谓“复兴民族”!

劳动群众们! 所谓“无力抗日”,完全是帝国主义奴才的胡说! 完全是国民党法西斯蒂卖国的护符! 真正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可以而且应当战胜一切帝国主义。俄国国内战争时粉碎了十四国联合的干涉;1925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一二八”上海战争,满洲、华北的抗日战争,屡次战胜了军事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尤其是英勇的工农红军冲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多次的“围剿”。并且在苏区肃清了任何帝国主义势力与反动统治,这完全揭破了国民党的卑鄙的武断宣传。在非苏区的中国所以至今没有驱逐出帝国主义,只因为国民党一贯的投降出卖,镇压反日反帝斗争,为帝国主义瓜分共管中国作清道夫! 劳苦群众们! 这就是全部的真理! 不要相信一切卖国贼奴才走狗的欺骗吧,不要让国民党这样干下去吧!

工农劳动群众们! 帝国主义的屠刀在全中国民众头上飞舞着,国民党的投降出卖是无止境的,殖民地化的奴隶悲惨命运威吓着全国民众! 情势是万分急迫了!

民众们! 你们愿意做亡国奴吗? 你们能让国民党任意出卖中国吗? 不,不能! 中国共产党号召你们团结起来,自动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保护华北和中国,驱逐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出

中国，打倒帝国主义清道夫——国民党法西斯主义！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吧！我们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纲领，应当是：

（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抛弃对国联和美国的任何的幻想，只有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团结与统一，才是中国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力量及其胜利的保证。

（二）全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三）号召民众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积极援助群众抵制日货的行动与宣传，募捐援助义勇军。

（四）用军器库及人口武器来武装民众，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财产和一切卖国贼汉奸的财产，以为抗日用费。

（五）完全脱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影响，取消一切对债务和借款利息的支付，实施累进税以应开支。

（六）中国必须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

（七）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东北，华北和中国的塘沽协定以及中日直接交涉。

民众们！这就是我们的斗争纲领。每个劳动者，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分子，应当拥护这个纲领。

满洲的义勇军，游击队和劳苦群众们！你们在长期的英勇抗日反满斗争中锻炼了和长大了你们的队伍，建立了强有力的人民革命军，这是“满洲国”的致命的力量！你们已经屡次打退和战胜了日满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对你们英勇的革命战争表示十二分的敬意与拥护！扩大你们的战线，与广大的群众更密切的联合起来，更坚决的和日本强盗及其傀儡作战吧！反对日满军队向关内和北满开拔，反对进攻苏联，打倒“满洲国”，为满洲的民众政权而斗争！

华北的士兵和劳苦民众们！在长城一带的抗日战争中，你们作了最英勇的抗日战斗，给了日本的进攻最大的打击。继续你们过去光荣的抗日精神，坚决反对日本的新进攻，反对日本在华北的傀儡——政整会与国民党的新出卖，反对东北军南下进攻红军，武装保卫华北，以民族革命战争来粉碎塘沽卖国协定，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全国的工人们！中外资本家和国民党在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的现在，更疯狂的实行资本进攻和镇压你们的斗争，企图把世界经济危机与中国国民经济浩劫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使你们活活的饿死。唐山的矿工，上海美亚的绸工，已经以英勇的罢工来回答中外资本家和国民党的进攻与压迫，来反对日、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的伟大的罢工战斗又证明了工人阶级是反帝国主义的先锋。全国工友们！效法开滦美亚工人的榜样，罢工起来，为自己的要求而斗争，反对蒋介石最近发出的“严厉处置”罢工怠工的命令，援助开滦、美亚的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组织你们自己的工会，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反对工贼走狗和赵大中等汉奸的破坏，组织工人反日会与义勇军！只有你们的革命斗争，只有你们的领导才能保证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

劳苦农民、灾民、难民和城市贫民们！由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不断的出卖，使你们陷于破产，穷困，失地，失业，流离失所，转死沟壑。国民党不但让你们在战区中死于帝国主义的炮火之下，不加以丝毫的援助，反而诬蔑你们都是“汉奸”（《晨报》），来镇压你们的一切反抗与斗争，来掩盖他们自己真正汉奸的真面。中国共产党号召你们反对国民党的诬蔑与压迫，反对一切苛捐什税，反对地主豪绅的掠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将一切借款和进攻红军的一切用费拿来救济你们，进行抢粮，分粮，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只有这种革命斗争才能使你们脱离现在所处的地狱生活！

革命的学生和智识劳动者们！国民党法西斯蒂在中世纪的“文化统制”和“新生活运动”之下，进行了“学校剿匪”，屠杀了一切求进步与新思想的人们，取缔了任何进步的出版，言论，电影，压迫一切反帝运动，甚至稍为不合蒋介石刽子手口味的言论，就遭到镇压。法西斯蒂用奴隶式的“新生活运动”来转移你们的反帝斗争，使你们在野蛮的“礼义廉耻”与反动的孔孟学说束缚之下，做亡国顺民与法西斯蒂牺牲品。中国共产党号召你们起来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求学反帝的绝对自由而斗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血腥恐怖，反对“文化统制”，实行罢课，反对日本进攻华北与中国，组织学生反日会和义勇军，自动武装起来，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全国的白军士兵们！你们的长官不让你们去抗日，把你们送去反对你们的父老兄弟姊妹，把你们送去反对唯一反帝到底的红军，替军阀当炮灰。中国共产党号召你们反对你们的卖国长官，反对进攻自己的苏维埃与红军，要求把一切军队从苏区周围撤退，与红军携手共同去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拥护红军对日宣战通电和抗日作战协定的号召！全国海陆空军的士兵们，一致动员起来，进行抗日反帝战争！

全国民众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

打倒断送满洲华北和出卖中国的国民党！

撕毁《塘沽协定》及一切卖国条约，反对国民党与日、英及其他帝国主义进行拍卖中国的谈判！

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反对东北军南下，要求全国海陆空军开到华北与日帝国主义作战！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满洲国”！满洲的人民革命军及一切抗日义勇军万岁！

武装拥护苏联！不准干涉蒙古人民共和国！

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万岁！
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34年4月10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六、共产国际与苏区反“围剿”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摘录)

(1933年3月)

总的来说,我们赞同中央1932年10月16日给中央苏区的指示,现作如下补充:在决定军事策略问题时,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在保卫苏维埃领土时,必须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能以付出重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一个地方,这一点对于保卫中心地区尤为重要;必须预先确定和准备可以利用的退路,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障的基地,使红军可以隐蔽和等待有利时机;必须避免同敌人大股部队发生对我不利的冲突,要运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瓦解敌军和消耗敌人的战术,还要尽量利用游击斗争方法。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和加强我们的有生力量,加强(军事、政治)学习,提高作战能力和纪律性,加快组建红军步伐。相邻苏区联合的方针并不排除而是要求建立新的苏区和我们同时拥有几个根据地,这会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周旋。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①。我们认为,在四川、在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必须设法里应外合

^① 1932年秋,在敌人优势兵力逼迫下,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鄂豫皖苏区,转入四川北部,1933年初在川北建立新的苏区;红二方面军放弃湘鄂西根据地,转入湘鄂川黔交界地区。中央苏区(赣南、闽西)领土扩大了;1932年夏,红军主力打退了从南面入侵中央苏区的粤军。秋天向福建省进军,占领许多县城。

占领苏区内仍旧是反革命巢穴的中心城市。对于大城市,如果有足够的兵力和充分的把握,则要采取旨在瓦解敌人、诱使敌军离开苏区而我们的有生力量又不遭受很大损失的包围战术。必须建立秘密活动机构和游击小组,它们应该在我军撤退时开展工作和进行斗争。要进一步加强军政领导力量。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录自《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①

(1934年2月5日)

王 明

同志们，请允许我再一次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和出席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并通过他们向整个伟大联盟的无产阶级和集体农庄庄员们，致以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鼓掌）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关于最近时期中国状况的基本材料。

首先谈谈苏维埃中国的形势。你们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是苏维埃中国成长的年代，是由一些零星的小的苏维埃根据地变成一个庞大的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以及由一些零星的小的红军游击队变成一支强大的工农红军的年代。联共（布）第十六次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间的这一时期乃是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与其死敌进行激烈的浴血斗争的时期。

从1930年11月起，国民党组织了六次反苏维埃的军事“围剿”。第一次“围剿”时，蒋介石动用了约10万军队，第二次“围剿”时为20多个师，第三次“围剿”时计30多万人，第四次“围剿”时共65个师，第五次“围剿”时动用了86个师的正规军和好几千支由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非正规武装部队。在所有“围剿”中，

① 本文是1934年2月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讨论曼努伊尔斯基《关于联共（布）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时所作的发言。——原编译者注

最大最凶的一次,就是最近的第六次“围剿”^①。这次“围剿”的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分子除了向蒋介石提供金钱和枪炮外,还直接参加作战行动。以塞克特将军为首的法西斯德国的70名参谋军官,不仅制定了第六次“围剿”的军事计划,不仅组织了专门练军事专家和军事技术专家的讲习班和学校,不仅领导了从技术上加强城防和战线的工作,而且直接参加了军事行动。150名美国和加拿大的飞行员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江西、福建、河南和我国其他各省的上空飞来飞去。原柏林警察总监社会民主党人格尔热津斯基及其助手魏斯等人,像一群饿狗一样,在蒋介石军队的后方——上海、南京等城市窜来窜去,帮助整顿秩序。

这场战争的结果将会怎样呢?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断失败以及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一次又一次胜利。(鼓掌)

根据不完整的材料,红军在国民党前四次“围剿”中取得的成果如下:国民党军队50多个师被击退,其中20个师被彻底粉碎,约20万支步枪、5000挺轻重机枪、数百门加农炮和重炮、几十部电台、12架飞机和不计其数的装备、粮秣,均为我英勇的红军缴获。(鼓掌)

曼努伊尔斯基已经谈到了我们的辉煌战果,对此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在这些战斗中,红军俘虏了白军许多师长、旅长和团长。1932年,仅在中央苏区一个地区,红军就俘虏了3名师长、13名旅长、18名团长,1933年1—4月,又抓住了2名师长、2名旅长、4名团长。约3万名士兵投奔到红军方面来。(鼓掌)

关于第六次“围剿”的结果,我们至今尚未掌握充分的材料,但据部分材料得知,红军在福建、四川和赣北等战线击溃了国民党

^① 此即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原编者注

18个师。缴获步枪2万多支，机枪180挺，驳壳枪500支。钢盔2000顶，子弹40万发，手榴弹5000枚，无线电收发报机3部，满载军用装备、粮秣和钱财的大轮12艘。（鼓掌）为了卸载这些大轮中8艘船上的物资，动员了1万多名工人。红军在福建战线也俘虏了第19路军的1名旅长和3名团长。^①

结果，塞克特和蒋介石的第六次“围剿”又遭到了可耻的失败！^② 这便立刻揭露了一个秘密：谁是我们红军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者，什么地方是红军的兵工厂和军事仓库！

正是由于红军取得上述各种胜利的结果，近几年来苏维埃中国的形势大大改善。截至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维埃中国的总面积（包括固定的苏区和红色游击区）已达1348180平方公里。仅固定的苏区面积就有681255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大31.3%，比日本大54.15%。比英国大64.5%。现在，红军的正规部队已有35万多人，非正规武装支队有6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各种半军事性群众组织。但是，形势之好不仅表现在数量上的增长，军队的质量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善。红军的主力部队中，共产党员占50%—60%，无产阶级成分占25%—30%。

我们的红军战士通常只要一息尚存就战斗到底，不缴枪，不投降。但是有一次，第三军团某团的红军战士张庆荣在第四次“围剿”期间被白匪突然捉去。他留在匪军中一共只四个月，经过巧妙的工作就把整整一连士兵拉到了自己一边。第五次“围剿”开始时，张庆荣同志带着这一整连人连同武器一起回到了红军队伍中。（鼓掌）。

我们取得了一个很大的成就，这就是现在红军的所有部队和

① 上述红军作战的成果有很多与事实不符，显系夸张。——原编者注

② 此与事实不符。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最后遭到了失败。——原编者注

群众性武装组织都服从于以朱德同志及其副手王稼祥和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的中央领导。(鼓掌)

我们现在有了几百个县苏维埃。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以张国焘和项英同志任副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对十个省苏维埃实行统一的领导。苏维埃政府有自己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1931年11月7日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的两项法令,以及苏维埃及其机关、机构的组织系统条例,等等。根据这些法律,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了工资,规定了社会保险。工人们对于生产实行监督,随时随地表现为新的苏维埃国家的主人和领导者。

根据这些法律,农民得到从地主、军阀和富农那里没收来的所有土地,缺少耕地、没有牲畜的农民从苏维埃国家方面获得种子、耕具、牲畜和贷款。根据这些法律,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开始积极参加苏维埃中国的一切社会活动。

从1930年底起,在1931年整个一年中,许多苏区都发生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所组织的大量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暴乱。这些阴谋活动得到了反布尔什维克同盟、托洛茨基分子、国民党人、甚至还有什么性问题研究会等团体的掩护。但是,在最近大约两年内,由于我们光荣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坚强组织和出色的工作,我们得以揭露并消灭了所有的反革命阴谋和组织。

最近几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并日益巩固的这一事实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首先,它在实践中证实了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发展的列宁天才思想的正确性,证实了在经济落后和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以及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只有苏维埃才能拯救中国免于彻底崩溃和贫困的英明指示的现实性。

其次，既然国际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三四年间共同努力都未能消灭中国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那么，如果荒木和希特勒真正发动战争，胆敢同坚强、伟大的苏联作战，又能有什么好的结果？斯大林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谈到彻底打败进犯者，谈到欧亚一系列国家的革命和一系列资产阶级地主政府的垮台，这些话必将得到证实。

现在，我来谈谈中国非苏区的状况。

1930年，蒋介石及其走卒托洛茨基、陈独秀之流还在做着甜蜜的梦，大叫大嚷什么中国的政治统一和国家的经济繁荣。现在国民党中国的形势究竟怎样呢？整个国民经济处于经济崩溃状态，武装干涉者肢解着中国的躯体，日本占领了满洲、热河、察哈尔，并对整个华北实行军事监督，英国攫取了西藏和川边地区，英日两国加紧实现其彻底瓜分新疆的阴谋活动，法国夺取了南海九岛，等等，国民党在日本和国际帝国主义面前极其可耻地屈膝投降，中国人民今后的民族生存受到直接威胁，千百万工人和农民因水灾、饥荒、失业、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而死亡，反动派对革命运动实行疯狂的白色恐怖活动，学校关闭，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惨遭杀害——所有这一切就是国民党中国现状的概貌。

两个基本事实，即国民党的日益衰败和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是上述情况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又是怎样呢？

由于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无情斗争，由于我党沿着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道路前进，中共在1930—1931年间顺利地纠正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粉碎了罗章龙一伙反革命分子。全党在思想政治上取得了空前未有的坚强团结。

1930年我党有党员9至11万人，1931年约20万人，1932年为294500人，1933年年中为41.6万人。其中，非苏区的党员人数为：1930年约1万人，1931年1.2万人至1.5万人，1932年2

至3万人,1933年年中为6万多人。

我们胜利的主要源泉,首先是,我们的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始终一贯地执行着列宁的共产国际的政治总路线,而领导共产国际的,正是我们历史时代的伟大领袖,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事业的最佳继承人,他的每句话都在鼓舞着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激烈的、坚决的斗争,并使他们牢固地树立起对自己事业的必胜信心,——这就是我们所敬爱的斯大林。(鼓掌)

其次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向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学会了一件最困难的工作,即争取并引导千百万的广大劳动群众。千百万人的积极性、热情、进取精神和创造性,这是中国红军和苏维埃取之不尽的力量。

第三,我们的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向列宁和斯大林同志学会了竭尽全力以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及保证无产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权。

第四,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胜利。我们的党运用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月全会上的报告,目的是以苏联的实践为依据来表明,只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及其所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能使中国摆脱目前的状况。我们的党运用了苏联的实践和胜利,为的是向大家表明,今天的苏联,就是苏维埃中国今后发展的生动榜样。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复杂而又大胆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愧为世界共产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党——的支部之一,正是因为它不害怕在向既定历史性目的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困难。它知道,应当把事业引向哪里,而且一定能大胆地引导到全面的、彻底的胜利。

列宁的共产国际和世界十月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全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突击队——联共(布)及其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英勇的工农红军及其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斯大林同志万岁! 万岁! 万岁! (热烈鼓掌,全体起立向王明同志致敬)

(章任贤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小 引

这个小册子中的两篇论文,第一篇是我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先由天微和周翼两同志笔记下来,然后经过我自己的校对和整理的。第二篇是应英文国际新闻通讯记者的要求而写的。两篇论文解释的中心是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红军反对六次“围剿”的策略问题。第二篇论文说明的红军放弃瑞金问题。当我做报告的时候,已经在原则上一般地说过了,即是我当时曾说明中央区红军在向前执行新策略时,有自动放弃瑞金等城市的可能,不过当时这一点还不便公开发表。

为使读者对于中国红军最近策略方针有明白了解起见,我同意把这两篇论文合印成这个小册子。

王 明

1934年11月24日

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

同志们:

我今天要报告的,不是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般问题,而是关于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与红军策略这一个问题。

现在,蒋介石六次“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业已继续到一年以上,并且到现在还未遭受到决定意义的失败。在前五次“围剿”中,蒋介石从来没有能将其军事行动继续至一年以上的。这次,这一反革命的进攻能够比较持久,其原因在哪里?在反对这一较长的“围剿”的战争中,我们党和红军得了些什么教训?我们党和红军

采用些什么策略？这一战争的进展和今后的形势是怎样？这些都是关心中国革命底人们盼望知道，也应该知道底问题。

为要了解和解答上述的问题，我将我的报告分成下列四部分：（一）蒋介石的新计划和红军应采的新策略；（二）反对六次“围剿”战争的四个主要阶段；（三）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为什么具有这样长期性；（四）中国现状及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近前途。

（一）蒋介石的新计划和红军应采的新策略

大家都记得：蒋介石在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便提出了“剿共”的新策略问题。他的新策略的主要之点，就是一方面要规定的新的军事计划，另一方面，企图把军事行动和政治方法密切地联系起来。同时，还在五次“围剿”的时候，蒋介石便提出实行“曾国藩计划”的口号，同时，便提出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但是，直到六次“围剿”的时候，蒋介石在德国赛克特将军的帮助之下，才真正开始实行他所希望实行的新计划。这计划的中心内容，据国民党说是“曾国藩和赛克特计划的联合”。所谓曾国藩计划的特点，就是模仿以前曾国藩、胡麟翼等为满清皇帝杀中国人（压迫太平天国革命）的办法一样，就是除去用正式军队以外，一方面办保甲团练，另一方面，请洋大人出马帮忙；曾国藩请的是英将戈登，蒋介石现在请的是德国赛克特顾问，美国意国的飞机师，以及日本的军事参谋和海军顾问。而所谓赛克特计划的中心特点，就是用英帝国主义屠杀非洲和印度的反帝民众的办法来屠杀中国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民众，就是用四面包围，步步为营，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方法，企图将苏区红军和民众逼到很小地方去，然后用飞机大炮以及毒气完全屠杀死！

现在我们就比较详细地来研究一下蒋介石这个卖国杀民的计划吧。

蒋介石所说的“七分政治”的计划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个

计划内,他提出的第一个口号是“政治剿共”。在“政治剿共”这个口号之下,蒋介石主要地进行了下列各事:(一)组织专门杀人、放火、绑票、暗杀的恐怖组织,这个组织公开的名称叫作“蓝衣社”,秘密的自名为中国的法西斯蒂党。虽然这个组织是暗杀和绑劫一切反蒋派别的人物的,但是,它特别注意反对革命的工农兵学生及他们的唯一领袖——中国共产党;(二)进行武断的欺骗的宣传(如什么“复兴农村”,什么“经济建设”,什么“废除苛税杂捐”等等);(三)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一方面企图以此遮盖其卖国降日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实行镇压一切革命运动,以便替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灭亡中国起清道夫的作用;(四)进行所谓“新生活运动”,实际上是尊孔读经,反动复古,焚书坑儒,卖国殃民的运动……等等。在这个计划内,他提出的第二个口号是“经济剿共”。在这个口号之下,蒋介石所干的勾当便是,第一,实行所谓“经济封锁苏区”,禁止苏区与非苏区商业来往,因此,一方面,使苏区与非苏区商业均受损失,另一方面枪杀许多商人和藉端敲诈许多商人的竹杆[杠];第二,用飞机大炮轰炸苏区和苏区附近人民的财产、田地、房屋、工厂、学校、商店等;第三,焚烧山林;第四,抢劫苏区及其周围人民的米麦牲畜等财产。在这个计划内,他提出的第三个口号是“交通剿共”,在这个口号之下,蒋介石所做的是,第一,破坏和摧毁苏区人民的一切道路、桥梁和水陆交通工具;(二)在苏区附近地方建筑铁路和汽车路,一方面便利运兵运饷,另一方面替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销售汽车、汽车油和机器材料,以及代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计划内,蒋介石提出的第四个口号是“文化剿共”。在这个口号之下,国民党实行的便是,第一,所谓“到学校剿匪去”的行动,因此,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的成百成千的大中学生,有的被蓝衣社匪徒暗杀了,有的在黑夜被绑走了,有的被军警逮捕监禁了,有的被开除(离)校了,而(学)校会考的实行,更是公开的监视和考察学生的思想,以便蓝衣社匪徒屠杀和逮捕;第

二，收买无聊政客文人，利用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反动分子，威吓利诱许多共产党已经开除出去的叛徒和奸细，大办各种反动报纸杂志来宣传卖国殃民的思想；（如《社会新闻》，《汗血月刊》，《社会主义月刊》，《中国与苏俄》，《青年月刊》，《铲共半月刊》等等），第三，学郑孝胥宣传王道一样，宣传孔教、道教、佛教、耶教等，以麻醉青年思想。

蒋介石所说的“三分军事”的计划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不是说，蒋介石在六次“围剿”中少用一些军事力量呢？不，绝不是的。这只是说，蒋介石除了军力以外，在六次“围剿”中更多特别注意政治力量而已。实际上，第一，蒋介石在六次“围剿”所用的兵力比前此任何时候都大些多些。例如，只在中央苏区周围，蒋介石便集中了 70 师以上的正式军队，如果把全国所谓正式军队 99 师的数目比较，则只反对中央苏区的便占其全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时，这些军队差不多包括了一切蒋介石现有的和能调动的军队的全部。除此以外，蒋介石还组织了许多民国和所谓“剿共义勇队”来帮助作战。第二，蒋介石在德国法西斯蒂的 200 多个军事顾问帮助之下，成立了新的军事计划。这个新军事计划的内容是什么呢？新军事计划包括下列主要各点：

第一，蒋介石从原来轻进长追的战略，转变到四面包围和步步为营的战略。

第二，蒋介石从原来长驱直入和求胜心急的战略，转变到所谓“碉楼政策”、“炮垒政策”及“公路政策”，换句话说，即是行军迟缓，但每占领一地，便赶快建筑炮台、碉楼及交通线，一定要等到这些建筑完成，然后才再向前推进。因此，蒋介石的军队的行动非常缓慢，平均每天至多不过五六里路光景。

第三，蒋介石从原来以军或师为单位作战的办法，转变到改用大的集团军或方面军为作战单位的办法；他的每个集团军或方面军包含自 5 师至 12 师军队。

第四,蒋介石在各帝国主义的积极援助之下,更加多量地采用最新的军事技术反对红军。在作战时,总是把飞机在前面轰击,接着是重炮轰击,然后才是步兵作战。

第五,蒋介石在这一年中,特别设法巩固其军队的战斗力——为达到这一点,第一,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好几所军官训练学校,一方面教军官山地战、夜战及堡垒战等军事,另一方面进行政治武断欺骗宣传;第二,极力把蓝衣社干部分布在各“剿共”主要部队中,用政治训练处名义,一方面进行欺骗宣传,另一方面起宪兵队作用,实行在战时及平时监督士兵和官佐,以保证“连坐法”的有效,即以残酷的屠杀来威胁兵士与官长。

蒋介石在六次“围剿”中整个计划的根本目的在于一点,即是将苏区领土四面包围,然后逐渐缩小,以便将红军主力逐步逼迫到很小地域以内去,然后采用飞机大炮及毒气将红军及苏区民众,完全消灭!

蒋介石的新军事计划,使红军在反对六次“围剿”中发生许多困难:

以前红军用以战胜敌人底策略,主要是所谓“诱敌深入,击破一方”。而现在因为敌方采取集团军和方面军为作战单位,以及力戒轻进深入等办法的关系,这个旧日特别与红军有利及常用以取胜的策略,现在已经是比较少成效了;这是困难底第一点。

敌人应用了一切最新的军事技术特别是飞机轰炸(蒋介石在六次“围剿”时,共动用300架以上的飞机,其中有150架经常到苏区及战线上投弹;这些飞机不仅是美德意英帝国主义帮助的,其中还有十几架战斗机是海内外同胞募捐买来抗日救国的,而蒋介石把这些飞机,不拿去抗日,而专拿来屠杀本国人民和抗日救国的红军,蒋贼卖国殃民的罪恶,真是令人发指!)和重炮轰击;红军军事技术较弱的缘故,所以很难与敌人正面作战,因此,不能不发生难于很快消灭敌军主力的困难,以及暂时不得不退出某些苏区领土

等,这是困难底第二点。

因为敌人底集团军作战,敌人的前方和后方联络密切,敌人的碉楼炮垒政策,以及敌人对军队实实用蓝衣社分子来监视和威胁利诱,所以红军在夺取敌人武器及粮饷方面,以及敌人军队投降红军方面,都比以前要困难些;这是困难底第三点。

由此可见,红军在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中,遇到许多新困难。

如果要问:红军有没有可能战胜敌人的这个新策略呢?那我们就能明白回答说:这种可能是有的。一般地说来,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实行这个新计划,只是因为:第一,中国苏维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弱点依然存在着,即是说,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底武装斗争还只限于中国广大领土的一部分,因此,蒋介石才有可能把他的一切军事力量集中到中央苏区来实行这种包围计划。在这种情形之下,很明显地,如果苏维埃革命发展到更大的范围,特别是在中心城市或蒋介石军队主要后方发生了很大的革命战斗(例如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武装起义或大的武装行动等),那么,蒋介石这种包围中央苏区计划,很快就会完全破产的。第二,蒋介石之所以能实行这种计划,是由于红军缺乏军事技术——飞机、重炮等,因此,如果红军一旦有了这种新的军事技术的话,蒋介石这种计划,也会很快受到失败的。

然而以上所说的两点,在今天只能作为一般问题的提法,而具体的问题是:在现在条件之下,即是在中心城市及蒋军主要后方暂时还没有大的革命战斗,以及红军还缺乏新的军事技术这些条件之下,红军有没有可能战胜蒋介石这种新计划呢?我们可以回答说,这种可能红军是有的。在目前根据已有的经验,红军至少有两种应有的和可能的策略办法来打破蒋介石的新计划。

第一种策略办法就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再加上蒋军内部的大规模的士兵武装

发动或者是蒋与反蒋军阀之间发生军阀战争。这种策略办法当然是最好的和最有效的办法；但是，必须估量到，最后这个条件，即是敌人内部发生大的武装斗争（或者是军队武装发动，或者是军阀战争），并不是能全靠我们的意志来决定的。这一方面需要我们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因此，我们除此以外，还须有第二种策略办法来战胜蒋介石的新计划。

第二种策略办法就是：一方面使中央苏区红军和游击队在内防卫的军事行动，尽量地和中央苏区周围的一切红军和游击队在敌军两翼及远近后方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把中央苏区及其周围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中央苏区内外的防卫战争与其他一切大的苏区和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底力量和行动互相配合起来。

这个第二种策略办法，当然并不与第一种策略办法冲突，恰恰相反，我们总是认为第一种策略办法更有效些和更有力些。因此，当我们采用第二种策略办法时，我们经常注意创造那第一种策略办法之中的优越条件，即是敌人内部战斗的爆发，以便红军更易于和快些得到胜利。但是无论采用第一种或第二种策略办法，红军反对蒋介石新计划的最主要的策略方针，应当是尽可能地保存、巩固和更加发展红军底实力，因为红军实力——这是最主要的东西。它不仅是战胜蒋介石六次“围剿”底根本保障，它——红军实力是争取中国苏维埃革命彻底胜利底最主要的条件和武器。

（二）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底四个阶段

现在我讲到报告的第二部分——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底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去年（1933年）九十月，蒋介石开始第六次“围剿”起，到去年12月福建事变发生时止。在这一阶段上，六次“围剿”战争刚才开始，蒋介石的军事布置还未完全周密，而同时东

路的红军，则在闽江上游一带得到了巨大的胜利。

19路军的六师主力中有四师被红军打败了，红军占领延平、邵武、黎川一带主要军事区域，并直接威胁福州，因此，停止了19路军对红军的进攻。同时在赣北的蒋介石军队，也屡被红军击败。红军在这一阶段中占了胜利的优势，蒋介石被逼迫重新规定作战计划。因此，中共代表团在去年共产国际执委十三次全会上曾认为中国红军在那时已经获得了开始冲破六次“围剿”的巨大胜利，这种估计确是合乎这一阶段的形势。

第二个阶段——从福建事变——即是19路军公开宣布反日反蒋和成立所谓福建人民政府之日起，至19路军失败时止。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蒋介石不能不把主要部队从江西北部调到福建去进攻19路军，因而江西前线底红军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暂时的军事休息，而另一方面，19路军公开实行反蒋军事行动，事实上使19路军由进攻红军的军队转变成成为随同红军一起反日反蒋的友军。这一阶段中的形势，较之第一阶段对于红军还更为有利。因为这个形势，恰好符合我们上面所说的第一种策略办法，就是说，恰可以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战争，与中央苏区外部的红军和游击队底行动配合起来，还加上19路军公开反蒋的军事行动。如果红军善于运用福建事变的一切结果，则当时的确有很快冲破六次“围剿”的可能。可惜的是，红军和19路军两方面都做下了错误，以致未能在当时达到共同战胜蒋卖国贼底目的。因此，这一最有利形势底阶段，很快就结束了。

第三个阶段——从19路军在福建失败起，至今年7月底止。这一阶段是中区红军主力和蒋军主力之间进行最酷烈、最艰苦战争底阶段，同时也是红军斗争中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因为在这一阶段内，一方面蒋介石才能实行赛克特等所定的新策略和新战术，换句话说，即是由于19路军的失败，福建全省落入了蒋贼的手中，因此，不仅使红军要在两条战线——北线和东线——上进行战斗，

而且使红军暂时处在四面被围底形势。因为蒋贼在福建胜利以后,会逼迫得原来比较不十分积极进攻红军底部队,也暂时底积极活动起来。另方面,这一阶段内,中区红军主要地是采取了从内防守底战略。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区红军在这一阶段内没有得部分的军事胜利,实际上中区红军在这一阶段内得到过很多的胜利。

例如:1月16日至18日尤溪之战,红军击溃敌方第52师,直抵卢兴邦大本营,夺获步马枪200支左右,炮4门,很多炮弹及银洋,并夺得兵工厂全部(有40架机器)。1月25日沙县之战,红军击溃敌方第5师,夺获步马枪1420支,盒子枪34支,机关枪29架,炮8门,炸弹1550个,俘敌兵1300余人。1月16日南丰宜介坳凤翔山之战,红军击溃敌军第67和79两师。3月15日三溪圩五都之战,红军击败周罗两纵队。3月23至25日太宁之太阳嶂及新桥之战,红军击溃敌军两纵队,缴得步马枪182支,盒子枪4支,机关枪17架,炮4门,步枪弹10万余发,炸弹5000余枚。4月18日永安之战,红军打退敌第52师,缴步马枪900支以上,机关枪10余架,炮7尊,无线电3架,俘虏敌军在1000人以上。4月18日广昌之战,红军击溃陆军第11师,缴得步马枪数百支,机关枪7支,子弹约3万发。4月26日至5月19日建宁战役,红军击溃周罗两纵队,缴得步马枪数百支,盒子枪10余支,机关枪8架,子弹2万余发。5月27日沙县梅引之役,红军打败敌第80师二营,缴枪约400支,机关枪4架,子弹约10万发,并300人以上俘虏。5月29日胡源之役,红军打溃敌第80师一旅,缴得约900支步马枪,25架盒子枪,42架机关枪,3尊炮,并1420人俘虏。6月8日永丰龙岗之役,敌第91师被红军打败了,红军俘获敌400人以上,夺得步马枪350支,机关枪11挺。在六七两月在广昌建宁一带,发生极剧烈的战争,红军曾给进攻蒋军以许多严重的打击。如果把最近一年来反六次“围剿”战争作个约略的总结,那就更加明显地可以看到蒋贼受到以下的损失:据不完全的敌方统计,

蒋贼在一年来与中区红军作战中，军队死亡在4万至4.5万人以上，受伤者约4万人，被俘虏者约1.2万至1.5万人。换句话说，损失在10万人以上。同时，如果我们要估计到，六次“围剿”严重战役只是在第三阶段才大规模进行，那就可以更加明白地看出红军得到不小的胜利。但是，虽然红军得到了这许多胜利，然而，第一，因为蒋贼能够很快从别省调兵来江西或新招队伍来补充；第二，因为红军方面没有新的军事技术，不能很快冲破敌人的防御工事，因此，直到现在红军不能冲破敌人包围的最主要的北方战线，去消灭敌人的主力，于是也就还不能得到冲破六次“围剿”底决定意义的胜利；此外，蒋介石利用其军事技术的优点，在这个第三阶段上，曾使红军不能不及时地和自动地退出一部分县城（如**广昌、建宁、泰宁**等）。

第四个阶段——从今年8月初，第七军北上抗日和第六军团西进长征之日起至现在。在今年7月底和8月初，红军开始实行了更合乎现时战争条件需要底新策略。这个新策略实现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红七军和红九军的东征。红七军和红九军迅速地冲破了敌人的东路包围线，如入无人之境地通过了福建西南部，一直逼近到福州城，沿路一带，红七军得到许多胜利，它占领过沙县、尤溪、水口诸城市，它夺得很多武器和粮食等战利品，它曾经夺得23架运兵汽车，它用这些汽车把队伍很快地运到福州城周围实行攻击，然后又很快地折向东北，与福宁福鼎一带游击队联系起来，在占领福宁以后，迅速北上，经过寿宁、政和一带，达到了闽浙边境，并且占领了浙江的开化、庆元、常山、玉山等各县。红七军这种军事行动的结果，创造成了反对蒋军底新战线，即是，它与游击队一起创造起闽浙赣边一带的新苏维埃区和新游击区。此外，根据一切消息看来，红七军已经与闽赣皖边红十军联系起来。红七军与红十军的联合，不仅造成威胁蒋军江西后方和震动蒋贼最重要老巢的浙江，而且在政治上大大地提高了红军的威信。红七军的北上，不仅是为的讨蒋，而且是为的抗日。红七军在百战百胜的指

挥员领导之下,在实际上证明了它不愧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它英勇地完成着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所给予它的最伟大的和最光荣的任务——打通红军北上抗日的道路,以便红军主力能够在最短期间与全国民众一起直接实行抗日的神圣战争。同时,红七军在这次胜利长征中,又一次在实际上证明红军军事战略的灵巧和军事行动的神速。

红军新策略采用底第二个结果,就是红六军团的西征。红六军团在萧克同志领导之下,在8月中,冲破了敌军在湘赣边境的包围线,顺利无阻地通过了整个湖南省东南部,沿途占领过汝城、桂东、桂阳、新田、道县等城市。然后道出广西,占令全州,然后再走向贵州边境,与在当地一带行动的贺龙红二军团联合起来。根据10月8日《真理报》登载的消息,红六军团在与红二军团会合之后,以一部军力直向四川边境进发,现在与胜利的红四军隔江呼应,共同威胁重庆,红六军这种军事行动的结果,把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等苏区与游击区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桥梁和孔道。这就使红军和游击队在各方面更加便于在蒋贼两翼及后方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由此可见,红军在第四阶段上采取的新策略完全是正确的。红七军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只还不过是实行新策略的一部分和开端。然而即就这部分行动的结果看来,红军反六次“围剿”战争已经逐渐地开展起一幅新局面。这新局面发展的特征有下列各点:

一、将中央苏区及其周围的红军和游击队底力量和行动更加配合起来;

二、将中央苏区及其周围的红军和游击队,与以前比较远隔着的大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底力量和行动,逐渐联系起来和会合起来,以便共同进行斗争去反对敌人;

三、在敌军远近后方及左右两翼建立起新阵势,以便利于中央

苏区的防卫战,同时,使敌军军事行动感受困难;

四、逐渐地把**军事主动地位**从蒋介石手中夺取过来,使江西、福建、湖南各方面红军从纯粹防卫地位转向反攻或进攻的形势;

五、完全打破蒋介石以封锁和堡垒政策四面包围苏区,以便消灭红军主力底计划;

六、很快地使红军和游击队实力增加,使红军的军用品和粮食增加,并且创造新的苏区和游击区。

因为红军作战计划底改变,蒋介石也很快地改变了他的军事计划。蒋介石以前是集中最大力量在江西北线,现在却从东线实行对红军猛力攻击。蒋介石以前是缓进行军,现在却企图很快达到占领汀州、石城和瑞金等城市的目的。因此,从9月26日起,蒋贼便实行下令全线猛烈总进攻。在进攻汀州、石城线上,蒋贼除用十四师兵力外,还采用重轰炸机去轰炸城市和乡村。蒋介石之所以采取这些新的军事行动,其原因是:第一,蒋贼相信,在红军新策略条件之下,他的封锁和包围苏区以便消灭红军主力这一计划,很快消失效力,所以企图用猛进力攻的方法,以便能够早日达到苏区根据地,使红军主力受到损害;第二,蒋贼害怕,红军其他部分又离开江西而北上浙江,而浙江是蒋贼的最主要的军事的和财政的根据地;第三,蒋介石企图在所谓国民党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原来拟定在11月间开会)之前,用一切力量在进攻江西中央苏区方面得到某些足以吹牛的“胜利”,以便一方面多少维持下“面子”;另一方面拿武力来威胁反蒋派别(首先是广东派的陈济棠、李宗仁、胡汉民等)使之屈服;同时,第三方面,使蒋贼得以在所谓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易于实行他的计划,就是将党政军各机关中反蒋分子完全排除,而代之以蒋系的最忠实的走狗;以便蒋贼一方面更加易于实行个人专政,另一方面用五全大会名义去反对一切反蒋的新旧敌人。

很明显地,在上述这各种情形之下,红军方面最聪明的和最恰当的策略,就是继续更坚决地实行自己的新策略,以便:第一,不使

自己实力受敌人打击；第二，不受敌人挑衅和不中敌人奸计；第三，真正进行斗争去准备一切必要条件以便完全冲破六次“围剿”并争取苏维埃革命更大更新的胜利。

在敌我两方面这些策略办法底情形之下，敌人再占领去苏区的几个城市——甚至最主要根据地内的城市，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但是，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很容易懂得这一点，就是这是红军军事战略上所必需采取的手段，这是真正准备争取新的伟大的胜利。

从破坏赛克特包围红军计划底观点看，从保存和发展红军实力底观点看，从使一切红军和游击队互相呼应和互相配合去反对敌人底观点看来，从中国苏维埃革命最近发展前途底观点看来，红军在目前第四个阶段上的情形，要比反对六次“围剿”斗争底第三阶段上的情形好得多。

根据下列事实：(一)红军与人数超过它数倍而且又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物质上(金钱、军火、专门家)和精神上帮助的反革命军队残酷地大规模地作战到一年以上，由于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实行灵巧的攻守进退的战略，中央苏区红军实力——这个最主要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不仅未曾被敌人消灭，不仅未曾减少，而且大大地加强和增多了；(二)甚至个别的部队和军团能够从中央苏区冲破敌人的包围线，而按时地达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指定的地点；(三)中央苏区以外的红军和游击队都在蒸蒸日上地向前发展；(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之下的红军和苏维埃在全国民众心目中的威信日益增高，全国人民都公认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是能挽救中国危亡底唯一力量，因此，民众对苏维埃和红军底援助和同情空前增长。同时，对蒋介石卖国贼底仇恨与日俱增；最后，(五)全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向与红军和苏维埃有利底方向发展——根据这一切事实，我们深刻相信，虽然中国红军和苏维埃在中央苏区有部分领土上的损失，一定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完

全冲破蒋介石的六次“围剿”。

(三)为什么红军反对六次“围剿”底斗争有这样长期性和延续性？

现在我讲到报告的第三部分——为什么红军反对六次“围剿”底斗争有这样长期性和延续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这首先就是由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目前阶段上发展底特点产生出来的。我们每个人最近几年来大概时常都会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苏维埃革命发展已经几年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底武装斗争也继续好几年了。但是，在这几年的长时间，为什么无论革命方面也好，无论反革命方面也好，都不能给与敌方以致命的打击？一方面，苏维埃革命已经在几省领土内取得了首先胜利，但是，它直到现在还依然不能取得决定意义底胜利；而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底联合进攻，直到如今不仅不能给革命运动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不能停止革命的向前增长和发展。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这种长期性和延续性的主要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这些原因就是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双方所具有的力量和弱点。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从国内的条件看来，它有以下各点：

一、中国革命有可靠的领导——群众性的和布尔塞维克化的共产党底领导。

二、中国革命在新高潮开始发展的阶段上，便创造出了自己底武装组织——工农红军。

三、中国革命在新高潮开始发展阶段上，便成立了人民底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四、中国革命已经有了一定领土的根据地。

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不但得着各苏区民众拥护，而且得到全国民众底赞助和同情。

六、中国是一个所谓地大物博的国家,因此,红军有充分富源可供使用,且在军事行动上能够进退自如。

七、很重要地,中国革命目前的直接敌人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阀,这些军阀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而且时常或者根据帝国主义主人命令,或者为的抢夺地盘而实行武装内哄,这些军阀在广大民众心中是最可恨的卖国贼和刽子手。

从国际环境的条件看来,中国革命有下列优点:

一、中国革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底新阶段,发生在世界革命和战争底第二个新周期底前夜;

二、中国革命能够利用由共产国际集聚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丰富的经验,特别是联邦共产党的胜利经验,尤其是布尔塞维克在国内战争时打败本国白党和帝国主义干涉底经验;

三、中国革命能够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底同情和援助——首先是正在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底苏联工农底同情和声援。苏联社会主义胜利,对于中国革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谁都懂得,今日的苏联,正是将来苏维埃中国的写照,而今日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的一切设施,正是使中国人民得到完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底开始。

但同时,中国革命有严重的弱点:

一、一直到现在,革命还是在不平衡状态中发展着,在中心城市及敌人军队方面,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及力量到现在还很薄弱;

二、革命首先胜利的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区域,而且这些区域还是分碎和零散;

三、最重要的弱点,就是中国革命底敌人,不仅是中国底地主资产阶级,而且是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虽然因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削弱了。但它还有力量干涉中国革命。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这个问题上,中国革命比其他任何国家革命要受到更多更大的困难。例如,第一,拿中国革命与印

度、安南等革命比较，则我们马上可以看出，印度安南的革命运动（至少是在最初阶段）首先遇到的是某一个帝国主义强盗（英或法）底干涉；而中国革命，一开始就遇到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妨碍和干涉（从美、日、英、法、德、意直至荷、比、葡等）；第二，拿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则我们马上可以看出，外国帝国主义对俄国革命底公开武装干涉，只是在布尔塞维克已经在国内有决定意义的中心城市得到胜利以后才发生的，而中国则因为帝国主义在平时早已用武装力量占领了一切中心城市和海江口岸，所以革命一发生的时候，就随时随地受到帝国主义力量的防害和干涉；第三，中国虽然在地理上和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心距离较远，但是，中国的最近的邻国之一，便是那个贪婪无厌和公开掠夺的明治和荒木统治的日本。日本帝国主义可以在极短时间输送海陆空军到中国腹地镇压革命运动，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把镇压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行政看作是：完全殖民地化全中国，准备反苏联战争和太平洋日美根据地和后方，以及防止日本本国工农苏维埃革命爆发底必要条件。

蒋介石反革命方面底力量在什么地方呢？

一、蒋介石的力量，首先就是在于，它能够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军事上、军事技术上，以至于精神上底大量的帮助。例如，据日本报纸消息，在最近三年来，蒋介石在各种名义借口之下，向欧美各国借到了五万万大洋的款项，而秘密军事借款，还不在于内。现在每个人都明白知道了：蒋介石对红军底历次“围剿”，实际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底隐蔽方式，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等军阀，作为统治中国民众底走狗；蒋介石等屠杀中国民众，为的是拥护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血腥统治。

二、蒋介石等反革命军阀的力量，就是能够得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拥护和帮助——特别是浙江财阀的帮助。浙江财阀是中国

经济上最有力量的资产阶级派别,同时,是蒋介石经济财政的主要来源。浙江财阀对外是专为蒋介石借外债的买办,对内是专为蒋介石承销公债和库券的经济人。浙江财阀每年仅从这种代借内外债的回扣和利息当中,便要弄几千万甚至上万万的大洋到腰包里去,浙江财阀是吮吮中国人民血汗的一群大寄生虫!

三、蒋介石的力量,就是他能够把国家机关向人民榨取的一切苛捐杂税以及关税等用作“剿共”底军费。

四、蒋介石等的力量建筑在军阀制度和雇佣兵制上面——中国因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结果,有广大失业和饥饿的群众,蒋介石现在还能利用这些暂时受了他的欺骗和为着找碗饭吃而去当兵的群众来组织军队去反对红军。

五、蒋介石等的力量,还在于蒋介石等在一定范围内比较善于散布欺骗宣传和玩弄政治手腕。因此,在中国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中,造成了对国民党的某种幻想。这种幻想之所以能够造成的来源,主要地当然并不是由于群众对现在反革命的国民党底言行有什么真正的相信,而多半是由于有一部分人对过去国民党的作用——即是当国民党联共、联俄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时的革命作用,还有时起许多回忆和幻想。同时,蒋介石等之所以能在一部分人中散布对国民党幻想的原因,也是由于我们许多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对于敌人的各种欺骗宣传和政治手腕,抱着轻视的和不注意的态度。因此,就不能在群众面前按时地和彻底地揭穿蒋介石等这些欺骗宣传和政治手腕底真实意义。

但是,反革命方面也有它不能补救的弱点,就是它无论如何不能有我们党及中国革命方面所具有的那种特殊优点——即是百战百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全中国和全世界广大劳苦民众的同情、拥护和帮助!同时,全部世界史再三证明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底最后命运,不是由军事技术决定的,而是由广大的千百万的民众底意志和毅力决定的。

正是上述革命与反革命双方所具有的这些力量和弱点，使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带有这样长期性和延续性，使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发生长期相持不下的局面；同时，也正是革命与反革命双方所具有的这些力量和弱点，可以解释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底长期性和延续性。如果要问：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底这种长期性和延续性还能够继续到好些时候呢？那么，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答复这个问题，就是，肯定地和机械地来指出时期和决定时间，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样设想，大概是不会错误的，即是中国革命目前还没有渡过这个长期性的阶段，但是从几年来长期革命斗争已经准备下了相当基础来更快地发展更大规模的阶级战斗这个观点看，从中国全国事变发展的趋势看，从国际事变——特别是远东事变发展的情形看，就作为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底斗争不很快地走向突变式的发展，但至少有可能比前此这个时期发展的速度要快些。

六次“围剿”战争能够支持很久底第二种原因，就是蒋介石实行更公开的降日卖国政策底结果。

从去年塘沽协定签定以来，蒋介石便从暗中卖国走到公开降日底道路。大家都还记得，塘沽密约的内容是：

“一、中国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前隶于中华民国之奉、吉、黑、热四省，即为‘满洲国’领土。

二、中日满为保证东亚和平，于必要时，日本得派遣舰队停泊中国沿海，日满陆军得通过或防守中国察绥两省境内，以防止中日满之共同敌人来侵，但必须事先通知中国。

三、为复兴东亚经济于平定之途，中日满得互为经济的友好的提携，及内乱戡平的援助，而中国方面，尤须注意国内之排货排满之制止。

四、日中满正式协定，于中国认为可能时始得协定。

中满国界确定，于中日满正式协定成立之后，始曾同确实划定

之。中日满正式协定成立时,此原则即失效力。

五、休战之协商及缓冲地带之划定,由中日军事当局于此原则成立之翌日实行之”。

塘沽协定规定的条件,蒋介石在各种形式之下已逐步实行着,滦东一带划为所谓“非军事区域”,实际上是交给了日帝管理;北平天津一带已成了日本军事根据地;实行通车通邮,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了“满洲国”;公开禁止一切反日反“满洲国”宣传,在蒋贼(最近对外记者谈话)御用的报纸杂志上(如《社会新闻》等)公开申明收复东北问题现在根本谈不到;汪精卫、戴季陶、何健(键)等公开宣传“中日共存共荣”和中日亲善底主张;尽力镇压一切反日运动——首先用一切力量进攻共产党和在他领导之下的抗日救国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实行铁路和航路中日联运,颁布新关税税则减轻一切日货进口税,以便日货在中国各地倾销……所有这一切,都是南京政府实行塘沽协定的具体表示。蒋介石这种更公开降日的政策,当然在政治上更加在广大民众面前暴露了他自己的卖国贼真面目。但同时,也正是这种公开降日卖国政策,使蒋介石能够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更多更大的帮助,因而暂时地和部分地加强了他的军事势力。例如:第一,蒋介石在日本帮助之下,逼使一部分东北军南下,因此,蒋介石能够利用这部分东北军去反对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而把原来在湖北、河南的许多部队调到江西和福建去进攻中央苏区;第二,北方反蒋派别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监督之下,暂时地不能实行公开反蒋行动,因此,使蒋贼对北方暂时能多少放心得下,并把原来用以监视北方反蒋势力底军力调到江西福建方面来;第三,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帮助和日蒋双方武力夹攻之下,蒋介石很快地解决了吉鸿昌、方振武、冯玉祥、孙殿英等反日反蒋底行动,因此,使北方反蒋运动暂时受到打击;第四,蒋介石在日本的军事上和精神上帮助之下,很快地战胜了反日反蒋的 19 路军,因此,使广东派等反蒋行动都受到暂时的阻碍。正因为如此,所以蒋

介石在此次“围剿”当中，才能将全国正式军队的三分之二和差不多他的全部军队集中到江西福建等省去反对中央苏区。最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蒋介石在六次“围剿”中，除得到美、德、意等帝国主义帮助之外，还得到日本帝国主义大量的帮助（金钱、军火、专家和顾问——据各方面消息，蒋介石已辞退赛克特，而另请日本军官做军事顾问），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的心思比任何人都急切，而帮助中国反革命也比任何人更便当。由此可见，蒋介石更公开降日卖国和日帝对蒋贼加紧了各方面的帮助，是六次“围剿”战争带有这样长期性和延续性底第二种原因。

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之所以带有长期性和延续性的第三种原因，不仅是由于在六次“围剿”中蒋介石动员了空前未有过的军力和采用了赛克特的新计划，而且是由于我们党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有许多错误和弱点。

论到我们的这些错误和弱点时，我首先就应当指出我们在福建事变时军事计划底错误。直到现在，关于福建事变教训问题，在一部分人中间多少有些争论。讲到福建事变发生的原因，大家现在都一致承认了：福建事变不简单地是反映国民党军阀内部冲突，而同时是中国广大民众——尤其是 19 路军士兵和一部分官佐的反日反蒋底革命情绪底反映，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号召一切军队共同抗日讨蒋底第一次实际响应，并且是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力量和威信日益增长底结果。讲到福建事变失败底主要客观原因，即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帮助，以极大军力向 19 路军猛攻，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讲到福建事变失败底主观原因时，事实上现在也不容争论，因为 19 路军领导方面的错误和缺点，现在事过境迁更看得非常明显的。现在谁都知道，即是站在最友谊和最爱护 19 路军底观点上讲，也不能不指出，当福建事变时，19 路军领导方面确实犯了下列的错误：第一，19 路军领导在

政治方面上了生产党、甚至个别托陈取消派分子这类无聊政客的当；这些政客们一方面想利用 19 路军这支军力来达到他们幻想的中国的“第三条出路”(即是既不是国民党的反革命的殖民地化底出路，也不是苏维埃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底出路)，因此，他们故意在口头上提出许多他们自己认为“过左的”口号(如什么“耕者有其田”，“分配土地”，“国有矿山、森林、水利”等等)，而在实际上，他们不仅不能执行这些口号，而且甚至连一般民主自由权利(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身体、居住、罢工、示威等自由)都不能和不愿给予民众，另一方面，他们企图利用 19 路军来作为升官发财和争权夺利底工具；结果，使 19 路军和所谓福建人民政府陷入这样一种政治环境里，就是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实际行动不合乎他们的革命词句，所以劳苦民众不能真正起来帮助他们；另一方面，因为他们高唱革命口号，于是使各种可能的以至原来多少有过成约的反蒋军阀方面的同盟军，暂时地对福建事变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第二，19 路军领导方面仅仅执行了它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方面签订的协定底一部分，(例如，公开宣布反日反蒋，停止进攻苏区和立即进行讨蒋军事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和建立经常相互通商关系，释放政治犯等)，但是未有执行协定中的另外一些部分(如武装民众抗日讨蒋，广大组织工农群众等等)，以致不能得到群众武装和群众组织底援助；第三，19 路军对于闽赣东北边境这条战线底严重意义估计得不够，以致把防守延平这个战略要地底责任交给了那些靠不住的和见利思迁的将领；尤其重要的，当那些叛将把延平一带出卖以后，19 路军领导方面未能接受红军总司令部及苏维埃政府底忠告和提议(即立刻武装民众，继续进行坚决反蒋武装斗争等等)，未曾企图继续与红军共同对蒋作战，以便尽力造成新局面，而竟然几乎不战而退出福州。

但是讲到在福建事变时，我们红军指导在军事计划方面是否犯了错误这一点，却直到现在，还在个别分子中间，不免有时发生

争论。我们的党和红军领导方面，早已了解到我们在福建事变时，在军事计划方面，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的领导方面和 19 路军领导方面一样，对于闽赣东北战线底严重政治意义和重要军事战略地位估计得不够；我们的领导方面和 19 路军领导方面一样，以为 19 路军和蒋贼军底主力战应在浙江方面；因此，不仅未曾特别加强力量去巩固这一道战线，而且将当时在延平邵武一带驻防的一部红军主力调向抚州战线方面去，同时，甚至企图使红军渡过赣江从后方去给蒋贼军以严重的打击；而事实上因为我们军力在这条极严重战线上底减弱，所以蒋贼军在其走狗刘和鼎等帮助之下，能够比较顺利无阻地向这条战线方面推进。蒋介石军占领延平，就造成了一方面截断 19 路军攻浙部队后方，而另一方面直接威胁福州底形势。因此，在 19 路军方面形成了惊惶失措底情绪；而在那个时候，红军又来不及立刻给 19 路军以应有的和有利的援助了。红军领导在军事计划方面这个错误，以及 19 路军领导方面的各种错误，就形成了福建事变失败底重要原因。19 路军在福建的失败，马上增加了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底困难。如果我们红军领导方面及 19 路军领导方面没有这些错误和缺点，那么，福建事变或许会得到完全另样的结局。因为在 19 路军顺利攻入浙江和红军积极在闽赣东北线活动底情形之下，蒋介石的地位便感到非常困难。蒋介石无论在浙江战线上或闽赣东北战线上受到失败，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他的全线总溃退。而在福建事变继续向前发展的条件之下，全中国政局将会产生完全另外一种新局面。因为如果 19 路军和红军能够在共同作战条件下给蒋介石以巨大的打击，那么，毫无疑问地，一方面要引起广大民众的反日反蒋的革命巨潮，另一方面，要引起一切反蒋军阀派别以至蒋系内部动摇队伍起来实行武装反蒋。这种假定在实际上完全有实现的可能；例如，甚至在 19 路军已经失败之后，北方吉鸿昌、方振武、孙殿英、冯玉祥等部队还公开打起了抗日讨蒋底旗帜。如果福建事变能继续

发展到北方武装反蒋发动之日,那么,北方反蒋势力和 19 路军都或许会得到另样的结果。如果当时能形成像以上我们所说的这种政局,那么,不仅蒋介石对红军六次“围剿”早已完全破产了,而且全中国的政治情况,在今天有可能早已是另外一种局面,即是更加有利于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发展底局面。

有个别的分子对我们党和红军领导机关对于福建事变时我们军事计划底这种估计,有些不同意,这些人以为福建事变时红军的军事计划是对的。这些人的第一种理由是,红军不应当代 19 路军接受蒋介石的打击,因为当时蒋介石集中一切力量去打击的目标是 19 路军。这种理由猛然从表面上看去,好像也言之成理,但实际上简直经不起任何批驳。因为问题的中心不在于我们红军愿意不愿意接受蒋介石这个打击,而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或者红军和 19 路军一起来击退蒋介石的力量,或者是蒋介石先打败我们的同盟军——19 路军,然后再集中一切力量来打击我们的红军。这些人的第二种理由是,红军因为缺乏空军及重炮队,实际上不能够真正妨碍和阻止蒋介石从东北战线对福建底进攻。这种理由已经被事实粉碎了;事实证明了,中央苏区红军在福建事变失败后,在军事环境比较福建事变时困难得多底条件之下,仅仅靠自己的力量,还能在几个月期间内妨碍和阻止蒋介石从各方面战线底进攻,还能使蒋介石军队在几个月期内非常困难地和缓慢地侵入苏区某些领土,而在福建事变时,红军妨碍和阻止蒋介石对福建底进攻,要比现在妨碍和阻止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底进攻更容易做到些。同时,我已经说过了,红军在当时阻碍蒋介石从东北战线向福建进攻底每一天时光,不仅有非常大的军事作用,而且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此外,最坏的就是另一部分极少数人的观点,他们否认福建事变时我们的错误,是从企图抹煞这些错误和掩盖这些错误底观点出发的。这些人完全不了解,共产党的优点和力量之一,就在于我

们的布尔塞维克党与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就是我们不仅不抹煞和掩盖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而且勇敢地揭发和公开地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便在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教训当中来学习，使将来再不重复这些错误和缺点，并且懂得应该怎样去战胜敌人。

第二，在最近一年来，我们工作当中的错误和缺点，对于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有直接影响的，我认为我们北方党部对于吉、方、孙、冯等部队在本年春季发生的反日反蒋武装行动意义底忽视。这些军队反日反蒋行动受到失败的主要原因，一切站在抗日讨蒋的统一战线底友谊观点上的人，都不能不指出下列各点：（一）蒋介石公然派兵去打击这些军队的后方，因此，给所谓日满联军军事行动上以莫大的便利；换句话说，这些军队失败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蒋介石与日满匪军的公开的军事联合行动；（二）这些军队发动迟了一些，就是他们未能与南方福建事变同时发生，而是发生在福建事变失败以后；（三）这些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不仅不真正允许民众自由地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以便向全副武装的日本强盗及其走狗蒋介石进行严重的斗争，反而用尽方法去妨碍和限制民众组织和民众武装底行动；（四）这些军队的高级将领，在军事行动当中，经常表示出动摇和不坚决。但是，同时，必须指出革命力量在这些军队行动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可以断定说，这些军队的武装反日反蒋行动，在一定程度内，是由于我们的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军队中和民众中英勇工作准备起来的，那么，同样应当指出，我们的北方党部在这些事变当中犯了极大的错误。他们的错误首先就表现在，他们没有对于这些事变加以严重的注意，他们没有企图把这些军队争取到真正进行坚决反帝反蒋斗争方面来。关于这一点，举这样一事实，便可以证明。例如，虽然中央再三发下指令，虽然许多同志再四提出要求，要北方党部派遣大批党团员到这些军队中去形成坚强的革命骨干，并派得力的领导分子去形成有战

斗力的坚强领导机关,但北方党部只派了很少的同志到军队中去,而且派了三个同志去组织领导机关,这三个人之中,有一个还是不久才用写声明书这种简单方法混回党内来的反革命罗章龙派的分子(张金级或名张慕陶),另外两个人无论在军事上在政治上也都是不能起独立领导作用的。结果就造成这样的现象,就是一方面,这个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分子,在军队中假借党的名义,进行奸细的和破坏的工作,在群众中和军队中破坏我党威信,并进行分裂反日反蒋队伍的工作;另一方面,革命力量在这些军队中还表示出非常薄弱,以致我们不能在紧急关头,将这些军队引导到继续坚决反日反蒋斗争道路上去。现在每个参加过和晓得这些事变的人,都公开承认,如果当时我们的北方党部不犯了这个错误,那么,我们的确有可能使这些军队之中底很大一部分,走到真正坚决的反日反蒋的战斗道路上去,结果便可以在北方和西北形成反蒋的新阵容。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逼使蒋介石把许多部队不能不从江西福建战线上调到北方去反对这些反日反蒋的军队;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北方和西北民众的广大反日反蒋新高潮,同时,还可引起其他反蒋势力起来行动。要是当时能形成这样的局面,那么,红军在江西福建战线上的斗争早已容易得多了。

第三,我们工作当中的错误和缺点,对于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有直接影响的,我认为是在非苏区的反帝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底错误和弱点——特别是我们党部和党员对在敌人军队中底工作抱着不可允许的忽视态度。而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在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的环境当中,在红军反对敌人六次“围剿”的情况之下,我党在敌人军队中工作有第一等重要的和决定胜负的意义。

如果要问:我们在福建事变错误,在北方反日反蒋武装行动时错误,以及我们一般地忽视在敌人军队中工作底错误,有没有共同的原因呢?在我个人看来,共同原因是有的。因为如果我们详细

地和具体地分析一下，我们就可看出这些错误或多或少地都是从下列一个共同来源产生出来的，就是不了解在这些工作方面有了些什么新的特点。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底工作以及利用军阀派别内部冲突方面，目下应当特别注意哪些新特点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各点：

一、因为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广大的民众反帝高潮，所以许多军阀的军队都不能不带有情愿为武装保护祖国而对日作战的情绪；

二、红军在最近两年来已经成为全中国内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红军自始至终地为“武装人民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障中国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这个神圣口号而奋斗。红军在事实上证明了，在一切反蒋军事力量中，它是能够胜利地打退蒋介石的历次军事大进攻的唯一力量。因此，一切反日反蒋的军事和政治派别，不管他们是从真正爱国的和爱民族的观点出发也好，或者是根据帝国主义矛盾和军阀派别冲突的背景出发也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不能不把红军看作是反日反蒋的一种巨大军事力量；

三、根据几年来的事实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在组织和进行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事业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和必需的，不仅有工农红军和一切觉悟的广大民众参加，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参加，虽然这些参加者之中有一部分只是暂时的，动摇的和不坚决的力量。

从这些新的特点看来，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底工作及利用军阀派别冲突问题，都不能不按照新的观点和新的办法来解决。

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工作方面底新观点和新方法应该是：第一，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我们不仅能够夺取士兵群众，而且在武装保护祖国的战斗旗帜之下能够夺取很大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成分；第二，在一定条件之下，甚至一部分高级将领，在自己军队和广大民众的革命情绪逼迫之下，不能不实行公开的反日反

蒋武装行动,同时,就不能不允许共产党和革命组织在他们统治范围内公开宣传和活动自由,结果时常形成很便利的条件,可以使我党不仅有可能夺取很大部分军队,而且甚至整师整军的队伍到革命运动方面来;第三,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工作的目的,已经不仅是在于使之瓦解,而且更多注意于夺取他们到武装挽救祖国斗争方面来。

我们党在利用军阀派别冲突问题方面底新观点和新方法应该是:第一,无论军阀派别之间存在和发生某种矛盾和冲突,我们党都要尽量使之发展并特别使之有利于红军的武装斗争;第二,必须估计到这一事实,就是在中国目前条件之下,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的最主要敌人;蒋介石对任何反蒋派别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加强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红军底力量;同时,蒋介石对红军底每一个任何胜利,也同样会增加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一切反蒋派别底势力。据此,红军领导方面,要比前此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加特别注意利用军阀派别之间底冲突,首先尤其应当注意设法打碎蒋介石这个主要敌人的军事力量集团;据此,红军领导不仅不应当拒绝任何反蒋派别向他提出的订立作战协定,以便反对共同敌人(蒋介石)的要求,而且自己应当加倍地积极起来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而当蒋介石与反蒋派别之间底战争真正开始了的时候,不管反蒋派别与红军方面是否订立过共同反蒋的作战协定,红军领导都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反对蒋介石的军队;第三,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每一个真正的严重的反日武装行动,早迟不免转变成为反蒋武装斗争(如19路军行动);同时,每一个大的反蒋武装行动,也有可能变成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战争(如吉、方、冯等在北方行动),因此,我们的党不应当对反蒋派别底反蒋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而应当尽力企图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底一般民族解放斗争之某几种组成部分。

最后,第四种形成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长期性和延续性底原因。同样是形成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长期性和延续性底原因,便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对于中国红军所给的实际的和直接的帮助太弱了或甚至没有过。很显然地,既然世界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敌人和不断反苏维埃“围剿”的真正组织者,那么,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兄弟党对中国红军加以实力援助,在实际上有第一等重要的意义。谁都相信,如果美、日、英、德、意、法等国的无产阶级,能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用真正群众斗争的方法(罢工、示威等等),逼迫他们的帝国主义政府停止对中国军阀底经济帮助(停止一切军事的或名义上非军事的借款),逼迫他们的帝国主义政府召回在华的军事顾问和军事专门家,并阻碍和停止运输军火(飞机、大炮、毒气弹药等)到中国去供给蒋介石和其他军阀,那么,蒋介石的六次“围剿”早已完全失败了。然而,直到现在,所有这一切,还只不过是一种好意的希望和假定,而都还未能成为事实。因此,蒋介石反对红军底最主要力量——帝国主义力量依然存在和加强着。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党和红军才再三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宣言号召,首先就是要求我们的兄弟党要向一切工人解释并使他们相信:在中共领导之下的红军的英勇斗争,是他们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和资本家斗争的一部分;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想得到和保证自己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底胜利,那么,除了建立工人阶级内部的战斗统一之外,还需要建立工人阶级与其同盟军(本国的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劳动者)之间底联合战线;以便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明白懂得和坚决相信,他们对红军斗争底直接的和实际的援助,实际上就是帮助他们自己加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底斗争。我们不仅希望,而且相信,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此后在实际上证明他们对中国红

军和苏维埃的英勇斗争底真正的国际革命同情。

(四)中国一般的政治形势与苏维埃革命最近前途

现在讲到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国一般的政治形势与苏维埃革命最近前途。我在这里并不想详细地去讨论和分析,而只是举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来说明目前中国一般政治形势。

一、首先说到苏维埃区域情形——拿具体事实作为红军与蒋介石等军阀军队一年来斗争底总结,根据极不完备的材料,大约可得到下列情形:

(一)在军队实力方面——这是决定战争形势底最主要的因素,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一年来红军实力底增长:——

(甲)在中央苏区方面——增加50%至60%,而只在今年5月至7月三个月当中,红军便扩大了6.2万人;

(乙)在川陕苏区方面——增加到许多倍,四军团主力入川陕时不过1.5万人,现增加到十几万人以上;

(丙)在红二军团方面——增加100%至120%;

(丁)在红十军方面——增加40%;

(戊)在红十六军方面——增加50%;

(己)在鄂豫皖苏区方面——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增加了50%;

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一年敌军底损失——

(甲)在进攻中央苏区战争中——损失10万人以上;

(乙)在进攻川陕苏区战争中——敌军被红四军团击败30师到35师,而仅在今年9、10两月,敌军便死伤7万人以上;

(丙)在进攻红二军团战争中——约有10师人被打败过;

(丁)在进攻红十军战争中——约有8师人被打退过;

(戊)在进攻红二十五和二十八军战争中——约8师人被击败过;

至于在苏区群众武装队伍方面，也同样有极大的增长。例如，在去年年底时，各苏区武装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和一切地方武装队伍等，共计 60 万至 80 万人，现在只在中央苏区方面，群众武装及游击队便差不多有这样大的数目了。

(二)在地域方面——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统计，但根据已有的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我们红军和游击队一年来新占领的地域，差不多比我们损失的地域要大一倍以上。(例如：红四军团在川陕方面占领了约 15 县至 20 县地方，红二军团在湖北、湖南、贵州、四川方面占领了 10 县至 15 县以上的地域；红六军团在湖南、贵州方面占领了许多部分；红七军新占领了浙江、福建方面好几县等等。而我们在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及湘赣苏区方面损失的约有 15 县至 20 座城市，同时，在我们红军退出县城后，很多的乡村依然在红军和游击队手里)。然而，虽然我们新占领的地域要比损失的多，但我们不能不认为这部分苏区领土损失，是我们反对六次“围剿”斗争中的一个损失，因为这些损失的区域之中，有很多是我们最近两三年来的根据地。那些地方有我们的苏维埃建设，那些地方留下有我们的人民经济，那些地方有我们的劳苦父老兄弟和母姊妹，他们曾和我们党及红军手携着手地进行了几年的英勇斗争，去反对革命的死敌——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在白匪占领这些区域以后，黑暗野蛮的中世纪制度又复活起来，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又复活起来，对人民群众底奴役制度又复辟起来，非人的残酷的白色恐怖又盛行起来。不过同时一定要特别指出，这种部分的旧领土损失，不仅不能成为红军反对敌军斗争的决定胜负的因素，而且不能成为决定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命运底主要因素。因为在红军实力保存和增长的条件之下，部分的旧领土损失，可以很快地由新占领的地域来补偿；而经过相当时间的政治准备与军事准备，新占领的地域可以很快地又变成红军和苏维埃的根据地。

在这里，必须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去反对有些个别分子对于

红军方面部分领土损失底不正确意见和解释。首先必须反对那些根据部分领土损失这件事实,来作出中国苏维埃革命已经失败或部分失败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第一,它绝不合乎事实;第二,它完全曲解了我们党和红军在过去和现在以至在将来一定条件之下,还必须采用的正确的和灵巧的策略;第三,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它散布悲观和失望的情绪,使人们认不清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真实状况和最近前途。同时,也必须进行斗争去反对另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就是有些人完全否认我们在斗争中的困难,完全轻视我们苏维埃领土底损失,以及完全不了解和否认革命根据地底作用和意义。

三、在民众对红军和白军底态度方面——在一切苏区里,民众对红军表示出极好的关系,对红军加以各方面的援助,从尽力实行优待红军条例(为红军家属耕种田地和收获麦谷等)起,一直到动员青年和成年扩大红军及妇孺都参加作战止,无一不完全表示出苏区民众对自己的红军底爱护和赞助。为的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一个情形最困难的苏区作为例子,譬如在鄂豫皖苏区在红四军团主力退走以后,民众在这些区域受尽了国民党统治各种各样底压迫和愚弄。除空前的白色恐怖之外,国民党用尽了各种欺骗宣传和政治手腕,企图使民众脱离苏维埃和红军的影响。现在为时已经一年,这些区域民众对红军和白匪关系,已经在事实上表示出自己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国民党已经在报纸上公开承认自己在这些区域所施行的政策的破产,另一方面,原来很少数量的而且暂时被敌人打退了的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民众多方同情和拥护之下,在最近五六个月以来,又逐渐地增加了自己的实力,并且已经恢复了一部分原来已经失去的苏维埃领土,现在他们有时又威胁着平汉铁路和武汉区域了。不仅苏区民众,而且全中国民众,已经逐渐懂得和相信了: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和红军,才能使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和饿死鬼。民众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苏维埃和红军这种坚决信心，就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取之无尽和用之不竭底力量的泉源。

从上述这些事实看来，可见中国红军在反对蒋介石空前的大“围剿”底一年斗争过程中，除中央苏区有部分领土损失外，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胜利——特别是在保存、巩固和发展红军实力方面。最大的甚至空前未有过的胜利是属于川陕苏区方面的红四军团。从中国革命全部斗争的政治观点看，从军事和军事战略的优越观点看，在红军及苏区更加向前巩固和扩大的条件之下，川陕苏区将逐渐走上为争取中国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胜利底第一等地位上去。

红军反对蒋介石六次“围剿”斗争目前底一般状况是这样：红军在中央苏区方面虽然还未能完全冲破蒋军主力的各方面包围线，但现在正在积极向这一方面准备着；红四军团在川陕苏区方面已经打败了最主要敌人——刘湘，一切四川军阀现在都公开地由进攻转向防守的地位；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已经汇合起来了，正在顺利地向着湖南、贵州、四川、江西等军阀部队实行进攻；而红七军和红十军正汇合起来了去进攻蒋贼的主要老巢——浙江。所有这一切指明出，红军在中央区全部战线上完全冲破敌人“围剿”底计划，只是不远将来的事。

一、现在说到国民党统治区域情形——国民党统治区域情形，也证明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着。反帝的首先是反日的斗争，日益包括更广大的民众。即就最近宋庆龄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以及发表反日宣言和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这件震惊世界的著名事件看来，也可证明反帝运动正带着更大的威力向前进展着。宋庆龄等在这个纲领中，公开指出中国人民幻想国民党和蒋介石抗日救国的无望，以及等待美国或国联出来替中国人民主持公道的蠢笨和有害，同时，坚决号召中国人民认清救国自救的唯一正确道路，便是以武装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宋庆龄等在这个纲领上提出了六大具体主

张,为使大家都知道这些主张起见,我就把它们全部念给你们听:

“(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

中国的陆军常备军,在数量上比全世界任何国家要多些,除警察、民团、商团不计外,我国人民平时要养活三百万人的军队,海军和空军虽然还比较薄弱,但是人民为养活他们,花了很大的经费,特别是最近几年,海军和空军的开支比以前大得多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因此人民完全有权利,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然而大家都晓得,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仅仅靠我们的军队是不够的。所以必须: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

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可以用志愿兵的办法,将来要逐渐的实行征兵制,要立刻成立广大的千百万人的群众的反日民众义勇军(工人反日义勇军,农民反日义勇军,学生反日义勇军,职员及各种自由职业者——医生、教职员、新闻记者等等的反日义勇军,同样要组织商人的反日义勇军),并且要使他们到前方或后方对敌作战,此外必须组织广大的人民参战组织(如供给粮食队、交通队、救护队、破坏队、宣传队等等),很明显地,要想这样作,那就必须: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

为达到这一点,必须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立刻把全国兵工厂、军械处、火药局已有的、正在制造和将来制造的各种武器(大炮、步枪、机关枪、手枪、炸弹、迫击炮、子弹、飞机,甚至土炮、土枪、长枪、大刀等等)完全发给人民反日义勇军,以便实行武装训练,并直接对日作战。如果谁要不愿意将武器自动的发出来,

那么人民只有自动的去拿这些武器,如果这些武器还不够,那么,就要想法筹款向外国购买。但大家都知识,要对日作战这还不够,所以我们还须要:

(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

在战争一开始时,我们提议采取下列办法,解放抗日经费问题: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银行、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大商店、日货等等,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经费,因为日本在华投资已经超过日洋二十万万,同时停付日债一切本息(这又是一笔大款);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

三、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

四、实行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

五、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人民的人士当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如果这些办法都实行的话,至少可以保证第一个时期的对日作战经费,如果将来还感觉经费不够时,我们还可以想出其他的办法来,保证对日作战的经费,以便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

此外,在对日作战时,我们还须要强有力的集中的领导机关,因此必须: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 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这是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这个委员会的各界代表,是由各团体(各界反日会、反日义勇军等)在全体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在各省由各界反日团体选出各省的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各县、各城市、各城镇、各区成立县、市、乡、区民族武装

自卫委员会,在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轮船、乡村、兵营、学校、公司、商店等等组织反日会分会及反日义勇军及其他反日队伍。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有权利解决和支配与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有关的一切事件,此外为保证对日作战的胜利,我们还必须: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

首先要联合高丽、台湾、内蒙古及日本代管的各岛屿的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同样的要联合在日本国内进行英勇斗争反对日本天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工人、农民、兵士、智识界等等,以便共同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我们公开向全世界宣言: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朋友,同时对于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的,或者学日本强盗一样实行瓜分中国的国家,我们把他们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伙伴,我们将他们视为中国人民之敌。”

这个公布的纲领,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空前的同情和拥护,引起了一切爱国青年的无限兴奋,同时,引起了一切中外报纸的注意和反响。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和东北以及中日各地的报纸,对于这个事变表示出极度的恐慌和愤慨。在纲领未公布以前,只在上海一地,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时间内,便有三千人以上签名作为发起人和赞助人。在这三千多人当中,不仅有工、农、兵、商、学各界的爱国先进代表,不仅有许多诚意抗日救国的专家、学者、名流、教授、律师、新闻记者、医生等各种自由职业者,也不仅有著名的进步政治活动家(如宋庆龄氏本人及何香凝氏等),而且还有许多抗日爱国军人(如前义勇军领袖李杜,以及彭浩然、张奋武、冯巽占等),还有银行经理及著名学者(如章壬琢先生等),还有以老健著名的政论家马相伯氏,甚至还有老政客胡汉民先生。虽然蒋介石、汪精卫、杨永泰、黄郛、陈立夫、陈果夫等日本走狗,已经密议并且下令逮捕一切在这

个反日纲领上签名的人物,虽然为这个纲领而积极奋斗的一部分反日战士(如余其全、林子明、刘月英、王振生、陈在葛、李锦峰、张金标、刘志刚、郑玉龙、李文碧、张文清、王文彬、王秀英、宋玉美、宋美英等二十余人),在本年7月26日被上海英租界巡捕会同华界探狗逮捕去了,并且已经引渡到南京,现在正在监狱中受各种非人的虐待和折磨;但是,拥护这个纲领的签名运动,正一日千里地风靡上海、香港、广州、北平、天津、武汉等全国各大中心城市,在各国的侨胞当中,同样在这个纲领影响之下,正蓬勃发展着极大的抗日讨蒋运动。这个伟大事变,在事实上又一次地证明了,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中间,已经成熟了武装保护祖国的必要这种神圣思想。谁能不相信这一点,就是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武装斗争日剧一日的情形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刀枪每日每时都有可能加上全中国人民头颈上来底情形之下,中国人民的这种正义的思想,在最近的将来,必然会变成神圣的行动!

工人群众在中心城市的革命斗争也正向前发展着。这不仅表现在工人斗争数量上的增长,而且特别表现在罢工工人与警察宪兵等武装流血冲突的加多,以及同一产业的全盟罢工的时常爆发。在农民和灾民斗争中也发生着新现象,就是一方面农民骚动和暴动已经蔓延到中国平日所谓最富庶的省份——江苏、浙江等;而这些省份恰是蒋介石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大本营;另一方面,中国西北部(四川、陕西等),西南部(贵州、云南等)的农民运动,因为红军的四军团、二军团、六军团以及四十二师等在这些省份及其周围底飞快发展,日益卷入到胜利发展的苏维埃革命巨潮中去。

而反革命营垒方面,则是日甚一日地发生分崩离析的现象,广东派与蒋介石的冲突,因为英、日、美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国长江流域和南部各省冲突底加紧,因为所谓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开幕,已经发展到很快可能以武力相见的地步,两方剑拔弩张的严重空气,已经逼迫得蒋介石不能不宣布所谓国民党第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召集。在蒋介石派本身方面,内哄暗潮也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第一方面,在蒋介石、汪精卫、陈立夫、陈果夫以及政学系老政客杨永泰和安福系老政客黄郛等这般日本走狗,与亲美派宋子文、孙科、顾维钧,颜惠庆等之间,发生着极露骨的明争暗斗;第二方面,在杨永泰和黄郛为领导的政学系和安福系,与自命为蒋贼嫡系的黄浦(埔)系之间,同时,在杨永泰、黄郛系,与陈立夫陈果夫派之间;以及陈立夫陈果夫系与黄浦(埔)系之间,为着升官发财,为着争权夺利,经常打闹得像饿狗争食一样;第三方面,所谓黄浦(埔)系早已实际上分裂成为三派:一部分最反动、最腐化、最下流无耻和最卑鄙龌龊的分子,形成了蒋贼走狗和蓝衣社主要核心;另一部分不满意蒋介石降日卖国的分子,但是,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于是去拉拢和联络反蒋派别(如广东派等);第三部分是左倾的青年分子,他们很痛恨蒋介石卖国殃民的罪恶,他们愿意与人民携手来“救国救民”,因此,与各种革命团体和革命运动力求发生联系。蒋介石派内部这种大小派别之间冲突发展到如何剧烈的程度,只拿最近几件事实,便可以证明了。南昌 58 架战斗机被炸毁,杭州航空堆栈机械材料被焚烧,徐培根(蒋介石的航空军总队长、航空学校校长和蓝衣社主要首领之一)被枪杀,邓文仪(蒋贼的机要秘书)、贺衷寒(蒋贼的政训部主任和亲信)等 70 余蓝衣社活动分子被逮捕,东路“剿匪”总司令蒋鼎文及参谋长等 8 人被逮捕和监禁(首先是由于蒋鼎文与陈仪的冲突,陈仪之所以做福建省政府主席,就是由于日本经过杨永泰向蒋提出的,但蒋鼎文以为转战闽赣有功,大不服气,于是时常与陈仪冲突,并且联络广东派;不久以前,日本报纸及“满洲报”上都公开登载蒋陈在福建不睦消息,并明白表示对蒋鼎文不满意,并“要求”二人之中必去其一,以便安定闽省政局,蒋介石逮捕蒋鼎文不仅为反对广东派,而且为实行日本指令),所有这一切事实,便是蒋派内哄底真凭实据。而蒋介石与北方军阀派别之间的冲突,无论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如何

拉拢操纵，而有时恰正因为日本方面的拉拢操纵，也日益带着显明的和尖锐的性质。在蒋介石与广东派战争爆发的时候，一切蒋与反蒋派别以及蒋派内部各派之间的各种冲突矛盾，必不可免地要乘机爆发出来。反革命营垒之中相互间的争斗和战争，客观上不可避免地要便于红军和苏维埃反蒋反帝底斗争。

三、至于讲到东北四省情形，需要一个专门的报告。今天我只简单地讲到几点最主要事情，首先我当指出的一件事，就是虽然在三年期间内，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军事方面**多多少少地已经把东北四省变成军事根据地，以便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底战争，以便组织反苏联战争和准备太平洋日美大战；但是在**政治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还经常感觉到处在东北四省四千万人民的普遍仇视和愤恨底环境之中。其次我要指出的第二件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三年过程中，在十万以上的全副武装的日本常备军，几万所谓“满洲国”军队，以及成千累万的武装移民这样大的武装力量帮助之下，经过不断的残酷的武装“讨伐”和“围剿”，不仅不能完全消灭，而且甚至不能阻止东北人民反日救国游击运动底增长，并且这些反日游击队直到今天，在政治领导上和组织方面，都还有极大的弱点，至于军事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薄弱，更用不着说了。这件事的确有非常伟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这件事，在实际上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万分正确的，证明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仅有可能，而且真能得到胜利的。这件事，在实际上完全证明了这样一种真理，就是如果中国四万万人完全丢开蒋介石那种对日战争不能胜利的可耻的降日卖国烂谈，在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之下，有工农红军作武装先锋队，一致起来进行抗日救国的神圣战争，胜利一定是有保证的！再其次我们要讲到的第三件事，就是因为**在东北四省游击运动中国民党的破坏和捣乱影响底很快减弱**，同时，**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东北人民心目中威信和革命影响的极大增高**，使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我们党

正确地和灵巧地实行建立广大民众反日统一战线这个策略之下，东北反日游击运动将要更加扩大和深入。

同志们！以上这些就是我讲的一切具体事实，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这些具体事实来估计中国现时的一般政治形势。根据这些具体事实，我们不能不作出结论说，现时中国一般政治形势是苏维埃革命力量向前增长的形势，这个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利于红军战胜蒋介石的。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近前途，与红军冲破六次“围剿”所得到的胜利底范围和程度有极大的关系。如果红军在冲破六次“围剿”胜利中，未能给蒋介石以真正致命的打击，那么，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帮助之下，有可能经过很短的准备时间，很快地再来一个新的军事“围剿”。而如果红军在冲破六次“围剿”胜利中，给蒋介石以严重的和致命的打击，使蒋介石永远地或至少很久时期内不能翻转身来、再去组织新的大规模的对红军底“围剿”，那么，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或者要冒险地来实行自己直接的公开的武装干涉，以反对中国人民及其红军和苏维埃，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红军在其斗争中，当然要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然而在目前中国国内和国际一般的政治条件之下，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这种行动，不能不引起全中国人民空前的愤怒，不能不引起全中国人民起来向帝国主义者进行伟大的和拼命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而这个战争不能不震动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基础。我们的党应当而且能够向这方面去准备的。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坚决地相信，中国人民的这种正义的、进步的和神圣的反对帝国主义野兽的神圣战争，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尽力帮助之下——首先是苏联工农群众声援之下，将能够战胜所有的和任何的外国武装干涉者及刽子手。

（录自王明著《新条件与新策略》。）

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

李 德

中央苏区的红军，在过去战胜国民党的军队中曾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由于在运动战中攻击运动中之敌并与在敌人后方发展游击战争有艺术的配合，这明白地表示出革命军队的基本优点：高度的机动性、机断专行以及勇敢的突击。

敌人在过去是受了许多苦的教训，目前敌人的五次“围剿”，是同以前的根本不同。在战略上敌人放弃了过去坚决的突击，目前敌[人]的企图，是在逐步地消灭我们的兵力及资材，并且他有其特殊的战术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一战术的主要特质即是堡垒主义，逐步地紧缩我们的苏区、剥压我们进行运动战的可能性，将我们的游击队隔断在他的后方，离开我们的主力军，结果在苏区及红军的周围，造成紧缩的堡垒圈。敌人有系统的采用技术战在地上有充实的火器（机关枪迫击炮及炮兵）并且有空军来加强及援助其微[弱]的步兵。

很明显的，在敌人这样的战术下，用我们过去简单游击战争的方式已经是不够的，为要在敌人新战术的条件下，取得决定的胜利，红军必须研究并应用现代的军事战术。除了保持我们原来的主要优点以外，并充实以新的战斗方式。在目前条件下的现代战术，主要的应限下列的三个原则：

（甲）为进行游击动作，派出不大的部队并配合地方部队在敌人的后方翼侧有时甚至于在正面，进行游击战争，钳制削弱并瓦解敌人，在居民的帮助下，在一切的战斗动作中表示充分的自动性、

灵活性和坚决性,才能执行其所负担的重大任务。进行游击战争时,包含有破坏道路,毁拆工事及坚壁清野的任务。

(乙)在最主要的方向部署防御以行直接保卫苏区,要以最少数的兵力和资材(弹药亦然)钳制敌人大的兵力,才是真正的防御。因此构筑支撑点或堡垒地域,以便确实的能抵抗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或是在山地地区进行连续的运动防御战。

在各种情况下,应估量到我们军队的特性,特别是他奋勇的威力。防御时应布置积极的防御,以少数的兵力及火器守备堡垒,而主力则用来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消极的防御一定是失败的。

(丙)在某一方向集中主力以行坚决的突击并在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游击战争和防御虽是革命战争必须的方式,但是辅助的方式,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五次“围剿”中及敌人以后进攻中的胜利,而重新转到战略上的进攻。

但是在这一方面战术的方式也是变动了,照正规说来,敌人往往是不离开其堡垒一二十里以上(往往是少些),诱敌深入已是达不到目的的,而要去寻求敌人,自己要隐蔽,当敌人出击时,则有计划的或诱致敌人而猛扑之。主要是从侧面突击敌人的后续部队,或是突击其先头部队,但总要切断敌人与其基本堡垒的联络,以便确实的消灭其有生兵力及夺取其物质资材。作战时应使用全力以便一举而迅速的解决战斗。

全体的指挥员都应该了解我们战术的这三个原则,并且应该了解我军诸种战斗活动的保证办法,在堡垒主义的条件,几乎在与敌人不断的接触中和与现代化技术的战斗中,这些办法是关系于胜利地执行战斗的机动。间谍及部队的侦察,行军驻军和战斗警戒,消极和积极的防空,这就是战斗保证,可是我们现在的了解是不够的,敌人便利用我们这方面的疏忽,进行夜间的袭击急袭和

空中的袭击。

在本军及敌军中的政治工作，常常是照着平时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所要求的却是下层灵活的政治工作方式。

物质的保证即是节省地使用我们现有的资材而特别是弹药，不要过早的消耗他，爱护武器和一般的物质资材，在这一方面，我们要作的还很多。

在战争新的条件下，要求我们红色的指挥员比从前应具有更大的机断专行和勇敢的决心，我们的指挥员应该会很正确迅速的估量情况，对比敌人和我军的力量地形的好坏和时间的计算，他们应该迅速确切地地下决心，并且坚定的实施其决心，这要求我们的指挥员不仅靠个人的勇敢，而且应具有机断专行，坚强的毅力和战术的素养，如果未具备这条件时，则他们的现代战斗复杂的条件下，不能指挥灵活的机动，这要求政治工作人员，能灵活地估量不断变动的情况，了解与敌人不断战斗中的困难条件，则他们必须了解军事战术的原则，使他们不致脱离军事行动，而能够真正地从政治上保证战斗的胜利。革命与战争复杂的任务，是要帮助我们红色的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培养训练，以求得了解现代战术的方式及政治工作的方法，使自己成为具有高度素养的红色指挥员。

我们许多的指挥员的政治工作人员是从战斗兵中提拔起来的，他们不能受到有系统的教育而只是靠着自己的实际战斗中所得到的经验。

《革命与战争》是要补足这种贵重的知识，不仅是整理我们红军许多宝贵的经验及一切革命战争，尤其是苏联战争的经验，这样可使我们的干部不离开他们的前线上的战斗任务，在工作中来培养自己。

为要实行这一任务，我们的指挥员，必须积极的来参加我们杂志——《革命与战争》。如果我们红军中军事和政治工作的原则与

我们日常的经验融合起来,那才算解决了我们重新培养干部的任务。

(载于《革命与战争》第二期)

(录自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敌人的山地战术

李 德

敌人在孤岭军官学校所印发的九个例图为我们的是对我们进行山地战，这些例图是标示山地中的行军驻军进攻及防御。因有下列两个原因我们必须详细地来研究他。

甲，这些图例表示在运动中敌人先头部队所应用的战术方式，可是在这一方面这些例图已经是相当地明了，因此没有充分地估计到在堡垒主义新的系统下，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不会离开堡垒五里至十里以外。

乙，这些例图对于我们的指挥员亦是有益的，因为一般是对的，而且我们也可以采用，虽有稍许的更正，但无论如何不应看着是死的模型。在实际的动作中应估量敌人具体的条件，自己的兵力地形时间，并在某种情况下更应有自己的决心。

一、行军，头四个例图是标示先头团的行军运动。

甲，行军的组织其正确及我们应采用之处即是在前面派有部队侦察；特别重要的不仅是沿道路派出侦察而且要在宽正面上派出侦察组，在各个方向派出相等兵力的侦察组，这是不对的，结果在运动中是疏散的，虽然易于观察，但无力在主要的方向作战，侦察干队到行军警戒的距离在例图中未指出，在我们的条件下可以到团前面五里至十里，如果前面没有师的侦察队时，可派二十至三十里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团的侦察排是不够的，而应以一两个步枪排及手机关枪加强之。

第二个正确之点即是有行军警戒，而前面仍然是宽正面的，并

在翼侧派有侧方警戒,前方不必须派出一个营,在遭遇战中为保持最高度的兵力进行突击,一般的派出一个到两个连并附以重机关枪排就够了。翼侧方警戒应比例图上的少些为宜,因为从山后侧方袭击我们的危险是比敌人的要少。

第三个优点即是诸分队间能以联络复哨保证活的联络,在山地运动间这是最可靠的联络手段,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采用根据在山地条件下有限的射距离,警戒与本队的距离,应照现在所规定的行之。

这些例图上除了上面所指示的以外如两方面没有□着本军时则应该向双方派出警戒。有些不能通过的山地是例图中未估计到的,如果附近没有并行路,无法运动而不派出运动中的侧方警戒时,则应在重要的地区派出停止间的掩护队,因此必须加强先头警戒部队的兵力,当本队通过后则随本队跟进。

机关枪分到全纵队中这对于敌人是好的,当我们侧面袭击时,敌人能迅速地展开他的机关枪,而我们则应该力求迎击敌人的先头部队或侧击敌人的主力,因此我们多数的火器应在纵队的先头,部分的可放在先头的警戒部队内,则能保证迅速的开火,掩护我们展开,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占领阵地作战,这便是遭遇战斗胜利的重要保证。因为要迅速展开本队内之诸分队间勿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好是集结兵力,缩短本队的长径,因为成一路纵队行进已经是很长了。

二、对第二例图上所标示的行军已讲过了,没有特殊的补充。

三、第三例图上进行侦察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先遣的侦察队派一定的地区前进,并与本队保持距离,先遣的侦察队,有其自己任务而勿须顾及自己后面的敌人。甚至为执行自己的基本任务(侦察敌人的主力)让敌人小的部队在自己的后面(敌人的侦察及警戒部队)是可能而且是正确的。先头部队(团或营)的辅助侦察队及警戒的任务,应补充侦察及消灭敌人的小部队。

四、上述的那个原则，在第四例图中则可看出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本队也是照预先侦察好了的地区前进，当与敌人接触时，经常地可以保证在较好的地区上展开兵力，因此则更容易迅速正确的执行战斗任务。

下面的五个例图是表示山地中在行军条件下能够遇到的军队战斗活动的各种形式，我们不再重复已指出的行军序列的缺点，而只指出战斗序列的要点。

(一)行军休息时的警戒(见例图五)除了行军时所派出的警戒部队继续负担警戒勤务外，还要派出直线警戒，主要的是由行军纵队中所派出的轻机关枪及重机关枪，于纵队翼侧的有利阵地，这是敌人特殊的直接警戒方法。敌人恐怕我们的侧击或袭击，以及感觉他的军队不可靠，所以靠着火力来掩护，我们对于敌人的这种火力的战术原则了解还很不够，以致于常常有向炽盛火力直冲的现象，而我们应该在某一两个方向佯攻，以诱致敌人的火力，而主要的方向，应选择在隐蔽接近地，有最多的死角，以便最高度的避免敌火的杀伤。上述的警戒原则，对于我们的部队少有采用，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火器有限，其次便是我们大部的火器，分到先头部队中去了，以便与敌人遭遇时，迅速地接触和解决战斗，因此基本上我们应该用有生兵力来代替火力的警戒，在最受威胁的方向，则该步枪警戒部队，当以轻机关或重机关加强之。

(二)第六例图是表示先头团与敌遭遇时的展开，其特点如下：(甲)成宽正面的展开，以钳制敌人，保证后续主力的突击；(乙)其侦察队保持与敌人不断的接触；(丙)各方面派出侧方警戒；(丁)诸连已不和[照]从前的[?]式战术安排疏开而是照着现代的集团战术，这在原则上都是对的，而我们也应该采用他。同时有以下严重缺点：(甲)火器没有充分的展开及前出(这是将机关枪平均分配在纵队中的自然结果)，结果在敌方

迅速动作时,其先头部队得不到火力的援助;(乙)当成宽正面展开时,第一梯队的翼侧是非常的薄弱,特别是在第六例图上的右侧,因为第二梯队营是在左侧后跟进呢。在我们的动作中应计算到这些弱点,如果敌人企图照着这个图例动作时,则迅速的接触战斗及包围其薄弱的翼侧,可保证动作的胜利,我们可在正面展开少数的兵力(到一营为止)钳制敌人,这样可使先头的团,不等待主力而求得相当的机动和突击的力量,这种初步的胜利,已经是破坏了敌人的战斗序列,使我们后续的主力更易于向敌人行坚决的进攻。

(三)在第七例图上是表示团的冲锋准备,与其他诸例图不同点,即是对其敌人(即我们)估计的不够。敌人似乎像没有任何的侦察和警戒及机断专行,而是消极等待向其阵地冲锋,这种估计的不足也许是由于我们过去许多的错误所造成的,但是现在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根据了。派往前面的侦察及战斗警戒的动作是值得注意的。

同时可以向保证敌人翼侧冲锋的出发地,这种方式绝对是正确的,可是不知该团为什么在宽广地段的正面上准备冲锋?就是担任钳制的任务也不能集中必须的兵力以行侧击,换一句话说,先头部队的动作与本队的动作是不同的,这正是指挥员在任何情况下,应该记着的。此外,第二梯队的第三营也是展开在后面宽广的地段上几乎成为一线,当第一梯队的部队得利时,很难迅速使用该营遂[进]行突击扩张初步的战果。

这样的部署,虽然是能保证自己的翼侧,但不能保障旺盛[盛]的攻击精神,此外在这个例图上还有下列的两个优点,即向前面派出有机枪掩护自己的步兵并且有组织很好的战场观察,这是在山地中正确指挥战斗所必须的。

(四)最后是团转为防御,敌人在什么地方是没有的,因此第八例图,在问题的原则上是有其价值的。但不能成为战斗的示范,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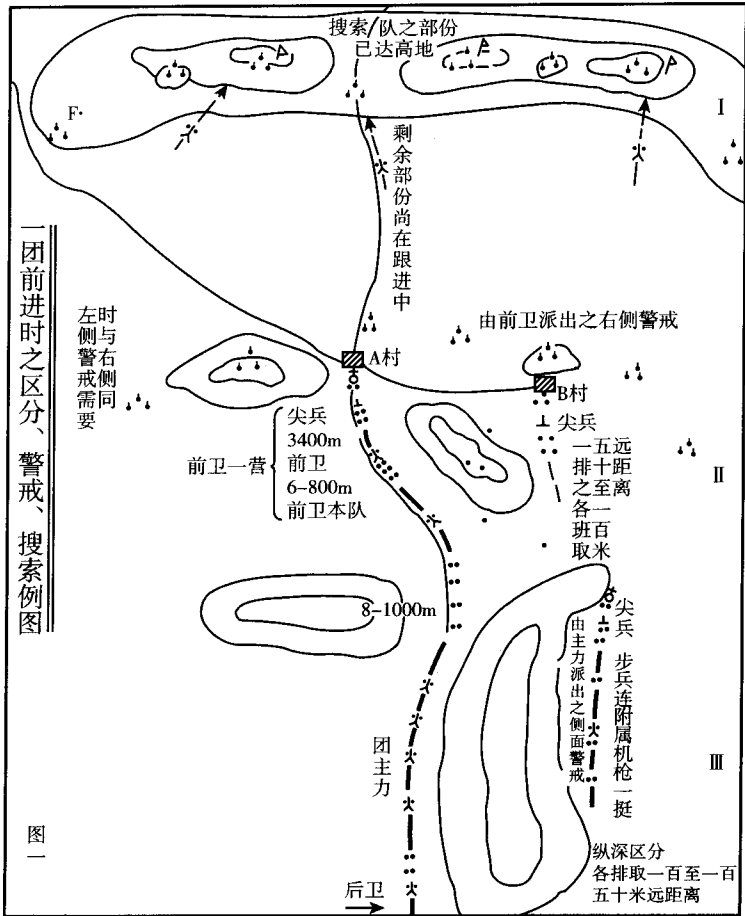
这一方面，他是没有估计到山地战的条件，为进行顽强的防御应组织防御纵深配备，依照地形，组织精密的火力配系，这在原则上是对的。

在例图上所看到的，只是地区的秩序，而利用地形火力配系都没有，为要达到防御配置的纵深，在例图上所标示的，通常组织五线，第一线是侦察，第二线是警戒，第三线是防御的主要阵地（前缘），第四线是防御地域内的据点，第五线是后方地区，这使得敌人主要地区之前展开而暴露其部署，当敌人侵入阵地时，因其在主要地区的战斗已被混乱，则以据点及反突击的配合而消灭之，后方地区可停止敌人的追击及保证有组织的退却，这个例图根本错误，即是完全不适合我们的条件，要求他很多的部队及充实的火器而且是在一般的地形条件下，纵深自然是要的，如地形许可时，后续的阵地也是应该有的，如在第八例图上的后方地域，依靠在谷地内，这是无意义的，在山地上各要有不断的防线这是不可能的，只要掩护道路居民地及指挥阵地就够了。这种有间隙的防御配系，可以节约兵力和兵器，使我们能集中较多的兵力以行突击，并保证进行积极的防御。例图中第二个基本的错误，即防御的组织是线的原则，而在山地中，即或单个小的分队，包围和迂回式翼侧的可能是非常之多的，从营以下都应进行周围的防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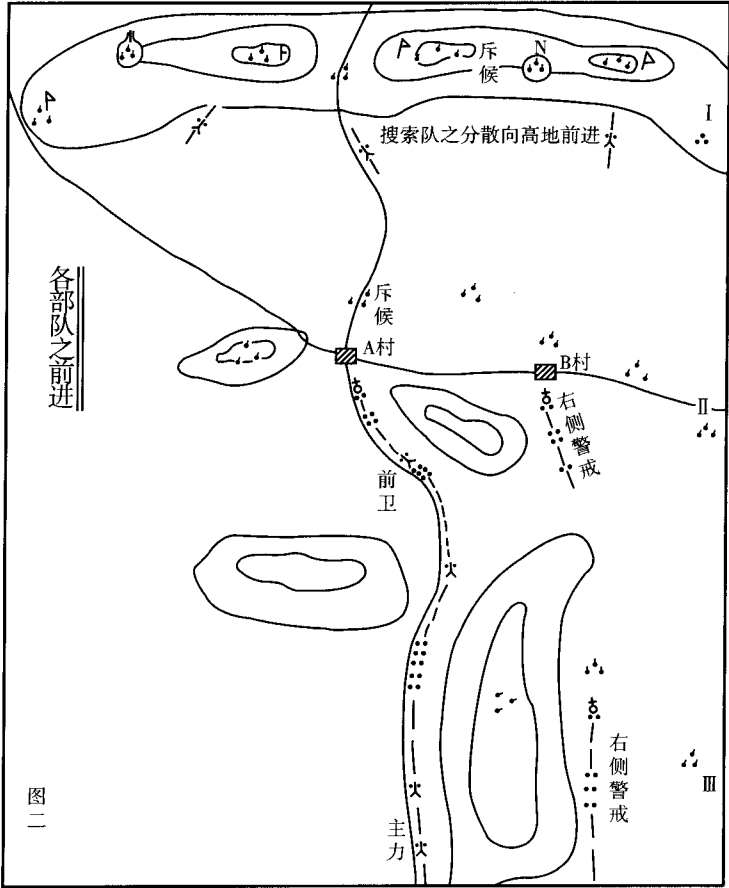
（五）第九例图是标示前卫营由行军警戒转驻军警戒，这用不着特别的解释和批评，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按房子配置搜索侦察这是中国军队旧的封建习惯的残余，应该铲除，但在警戒配备的其他方面都是很确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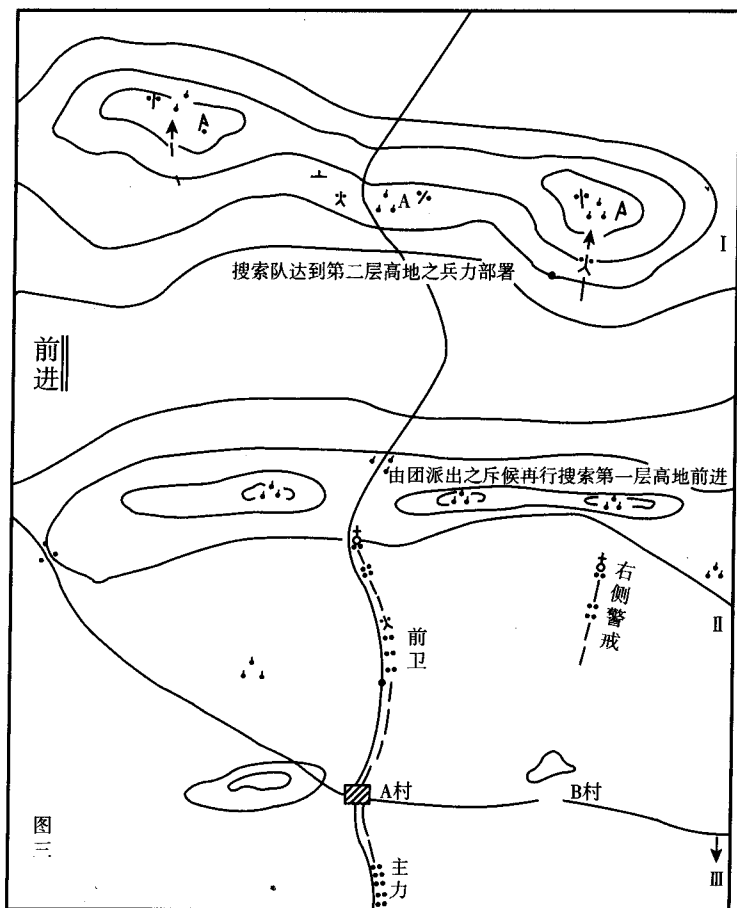
附图解一至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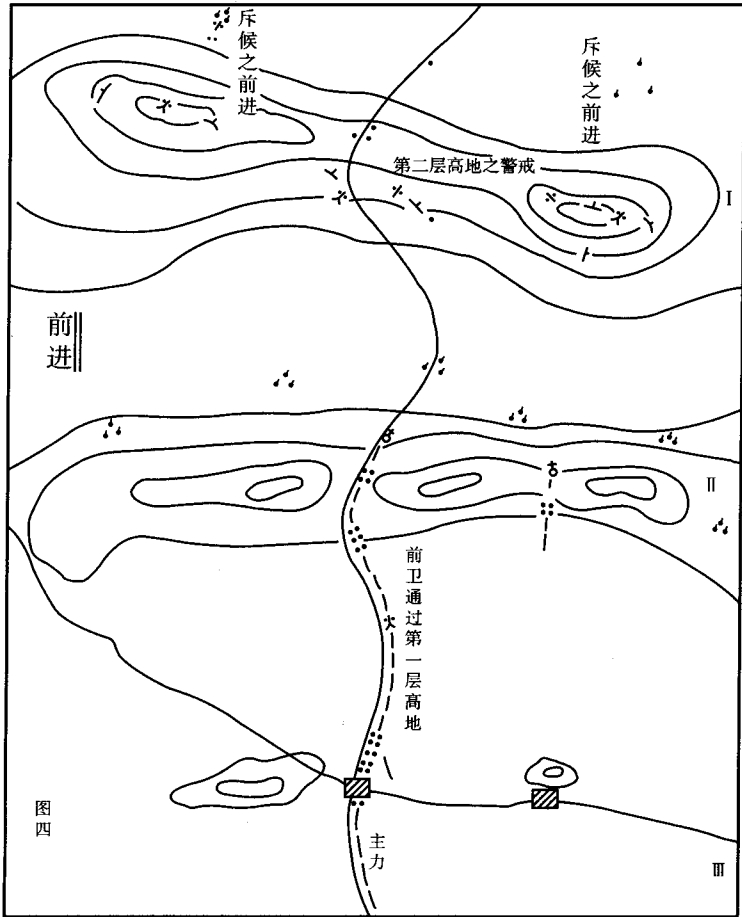
《敌人的山地战术》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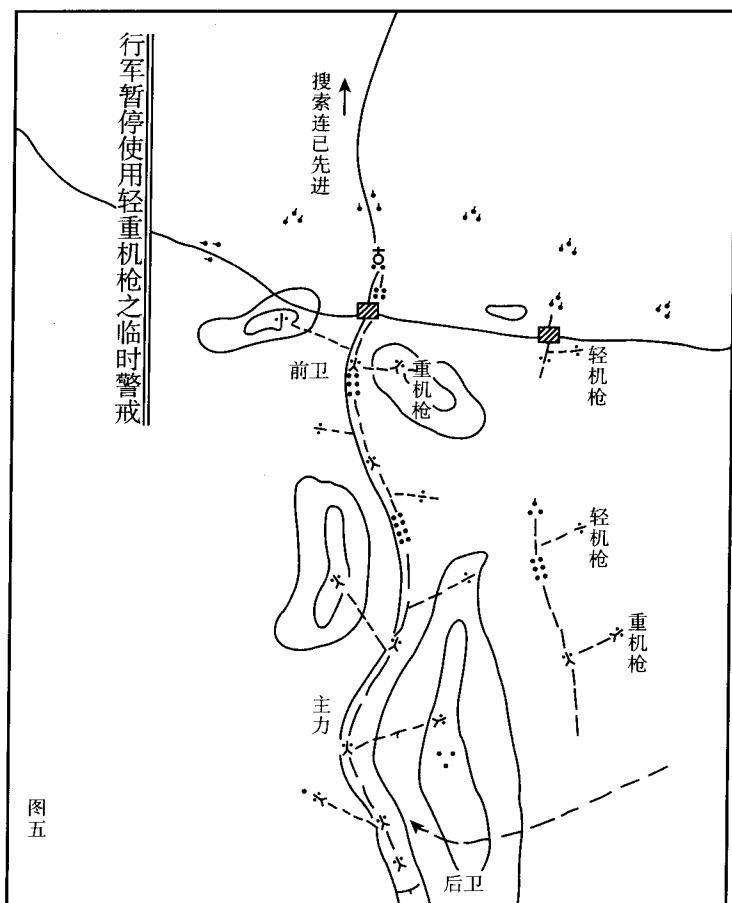
《敌人的山地战术》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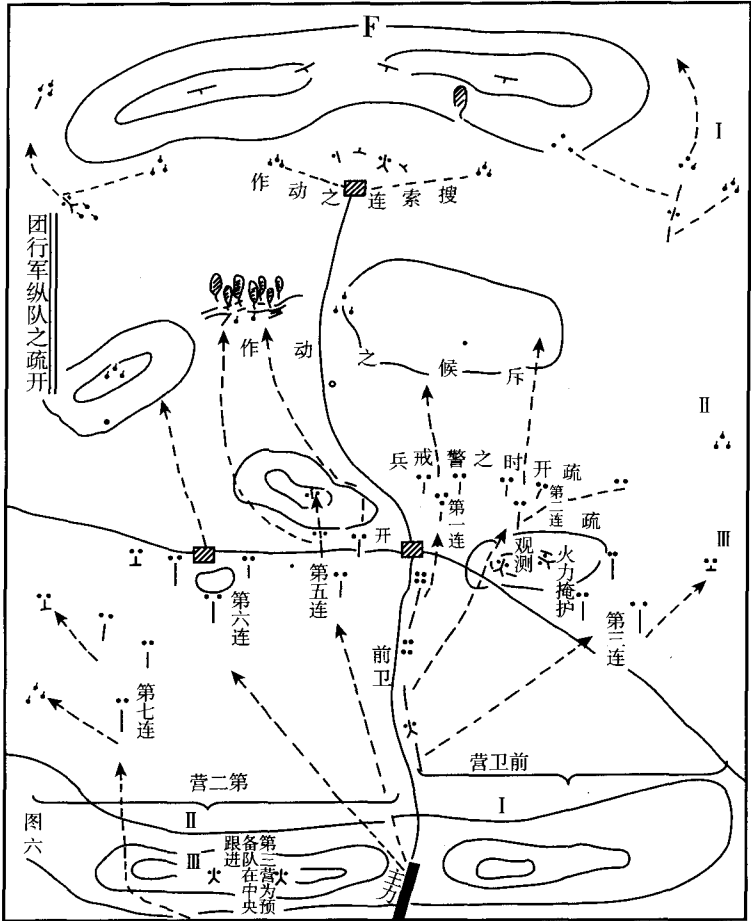
《敌人的山地战术》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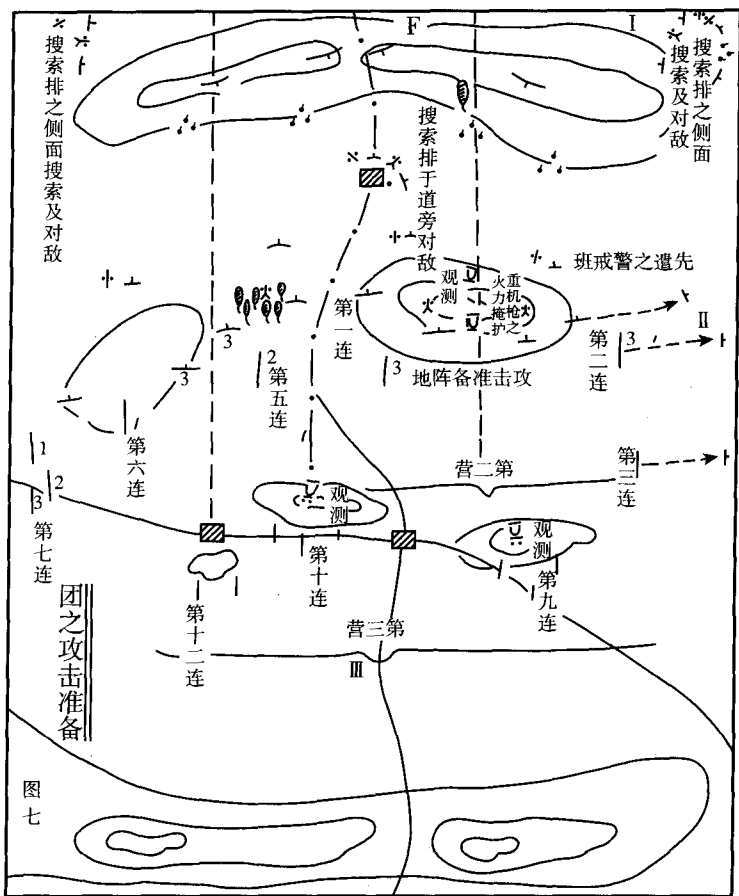
《敌人的山地战术》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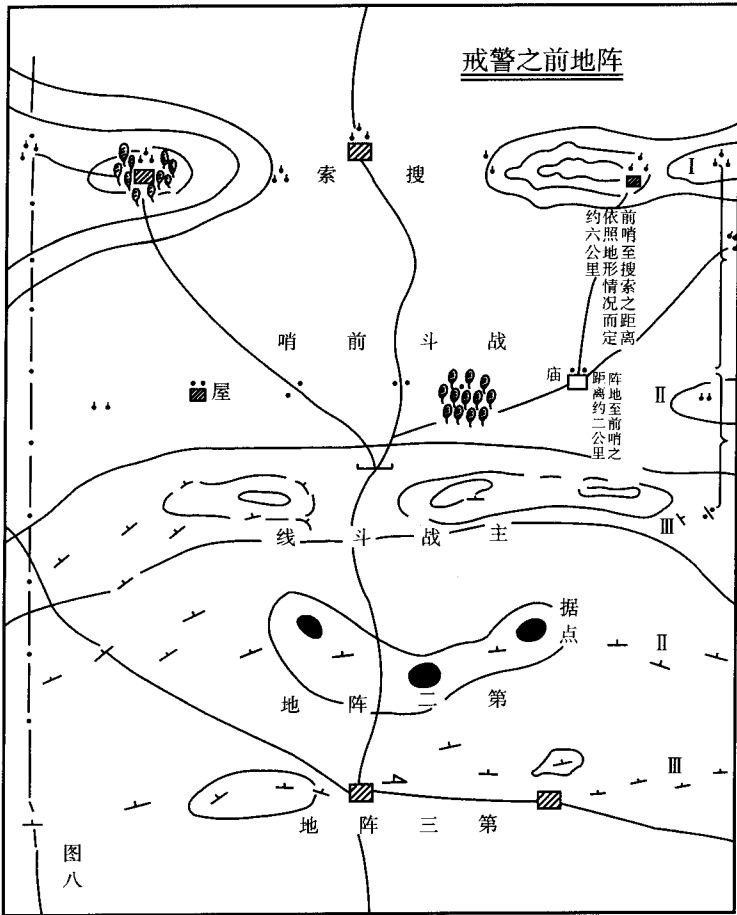
《敌人的山地战术》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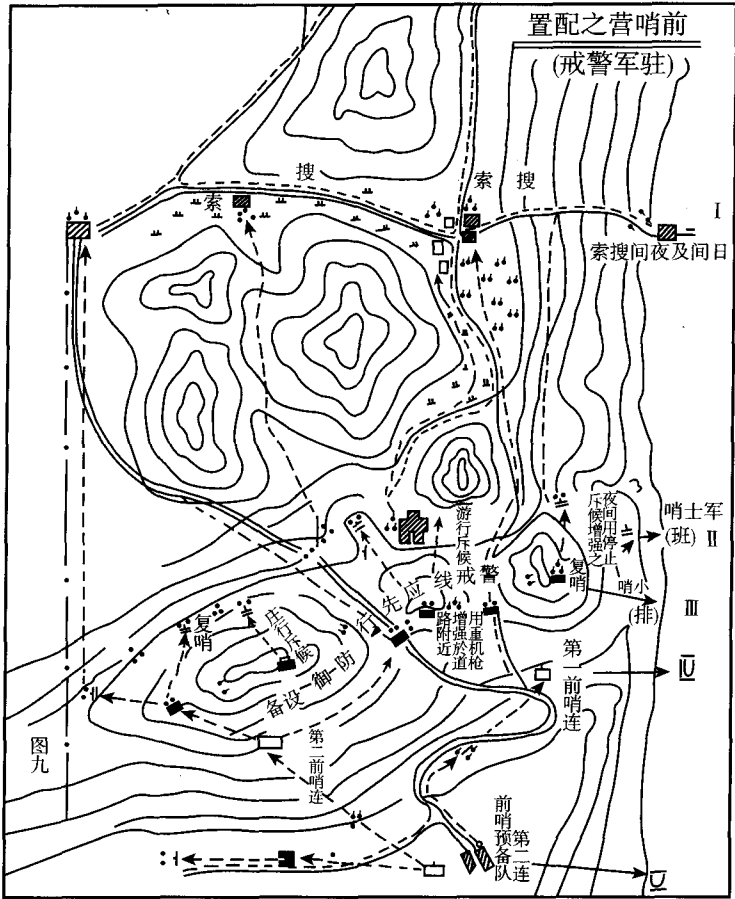
《敌人的山地战术》图六



《敌人的山地战术》图七



《敌人的山地战术》图八



《敌人的山地战术》图九

(载于1934年4月出版的《革命与战争》第二期)

(录自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

李 德

第一，敌人堡垒主义的战术，为的是逐渐消耗红军的兵力及兵器，目前敌人拒绝与我们的主力作战，当其进行战斗时，为的是有系统的逐渐的占领并巩固其领土，目的是在安全的逐渐的深入到我们的苏区，因此敌人的动作，有下述基本原则：

A. 步步为营。依靠现有的堡垒，向前推进五里至十里后，立即停止并补筑堡垒；只有他确知道了我们的主力不在时，才敢逐段跃进，迅速占领某个要点，然后再向后补筑堡垒。

B. 分梯队前进，以便从纵深内进行战斗，当其第一梯队前进时，其第二第三梯队，则仍在基本的堡垒内。然后当第一梯队筑堡时，第二梯队则在其后跟进，如此短距离的向前跃进。当我们进攻时，其第一梯队的任务，是从正面钳制，而其后续梯队，则企图迂回而消灭我军。

C. 几个纵队同时于几个方向前进，当其某一纵队遇见我军时，即停止并筑堡垒，而其他的纵队，则利用此时机，向没有我军的方向前进，这个办法，可以保证同时在几个方向推进筑堡，并且相互间也很容易于联系起来，如此造成了纵深和正面的整个封锁网。

D. 使用技术，以诸兵种配合的动作（迫击炮炮兵及飞机），来协助其脆弱的步兵。

E. 进行特种的游击战争，地主土匪的队伍，在我们部队的后方，特别是在边区活动，或是派遣法西斯蒂的别动队敢死队，或平常的侦察队，到我军的近后方或前线活动。这种游击部队，是非正

规的部队,他们改装农民,有时甚或改装红军活动。

F. 在苏区内甚或在我们的部队内,依靠着地主富农部分的俘虏,及假装搞到我们红军中来的侦探等,利用这些分子,来扩大其侦探网和反宣传的工作。

第二,敌人进行战争的这些方法,使我们严格的估计到这些新的条件,而红军应有回答敌人的战术。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寻求运动战,不要在进攻堡垒中,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垒外,于敌人的运动中,来消灭其有生兵力。

发展游击战争,支撑地域的防御及进攻敌人的堡垒,为革命战争的辅助方式。这些战争方式,应协助造成战术的环境,使我们能实现基本的原则:即是以主动的机动,于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

我们的基本原则如下:

A. 向敌人运动中的部队进行短促的侧击。当敌人稍向前进时,则突击其先头部队,当敌人较大胆前进到十里以外时,主要的则是突击其后梯队;但是我们总应使敌人于基本堡垒有效火力援助范围以外,并且要切断敌人被突击的部队,与其后续梯队及堡垒间的联系。

B. 在敌人后续梯队或堡垒内来的增援队未到达前,迅速解决战斗,这样使敌人无法补助堡垒及进行防御战。因此进攻和冲锋主要的是带着突然袭击的性质,同时要最坚决的使用最高度的兵力作战,以便确实的避免延长战斗。

C. 迅速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敌人诸纵队的内翼侧,在其诸纵队间执行机动。这样可以避免敌人于一个方向钳制我们的主力,而在另一个方向前进。为保证在新的方向实施突击,出敌意表(外),要有各方面的侦察和最高的敏捷性。

D. 为要预防敌人使用技术的影响起见,应注意下述的动作:

1. 利用夜间及昏暗的条件(雨天雾罩森林等),进行机动及局

部的战斗。

2. 采取积极和消极的防空方法。

3. 隐蔽的接敌,火器主要的是用来直接(按时间和地形)的协助近距离的战斗,但最主要的是进行白刃战斗。

E. 在我们的后方,与敌人的游击部队(刀匪别动队及其他)斗争,原则上是使用地方的独立部队,而不得分散我们正式部队的兵力,削弱我们前方部队的力量,但是在时间允许及极端必须时,我们的正式部队,可短时期的用来和刀匪别动队等斗争。

F. 为要更确实的钳制(削弱、阻止及部分的消灭)敌人,我们应利用支撑点及其他的堡垒。这些堡垒,不仅要能抵御机关枪火力,而且要能抵御迫击炮兵的炮弹和飞机的炸弹;应有很好的伪装以避免地下和室中的观察,并且应有周围的防御,破坏通敌人的道路及设置障碍物(地雷亦在内)。守备队的火力队在堡垒内,而突击队则[在]堡垒外行反突击,防御应该是积极的;因此,突击队应有三分之二或更多的兵力,乘着敌人进攻或冲锋之过程中,不仅从纵深内,而且常常从自己阵地的翼侧出来行反突击。

G. 加强在敌人前线、翼侧及近后方的游击战争,如情况必要时,并应由部队中派出游击部队。除此以外,我们的独立部队,在敌人的远后方,应最高度的发展游击战争。游击队的动作,应有最高度的敏捷性机动性和弹性,其动作主要的是靠着打埋伏,急袭和袭击,并且与我们正式部队的动作,就有严格的配合。

第三,敌人堡垒主义的战术是由其步兵的脆弱(政治情绪的低落)及充分的技术所造成的;而我们回答敌[人]的战术,是基于革命军队高度的政治质量,这些质量是表现于敏捷性机动性和进攻的勇气上面。这些特点即是在现代战斗的困难条件下,我们政治工作的基础。新的战术是要求我们的指挥员战士们体力的十分紧张刻苦耐劳和高度的机断专行;战斗的政治保证,时间必须缩短,

认真讲来,整个的政治工作,要在进行中来。我们从此就可以决定在部队中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

A. 在新条件下的政治工作,应该使我们的指挥员战士对于联系于各种复杂的机动的战术方式,根本相信,并要求其具有高度的纪律和顽强性和各[个]人的自发力。政治工作要具体,在每种情况下,对敌情,对自己部队和所负的作战任务,都应有正确的估计,(我们原则上要确定敌人靠着技术力量和脆弱步兵,其结果敌人已无能进行速决的突击)在这些问题的周围,全部的政治工作,更加重要,为的是造成最高度的兴奋及了解其所负的战斗任务。

B. 部队战斗活动的政治保障,是由直接的战斗情况中的任务和要求来决定的,特别是使全体战士了解各种战斗的技术方式。当进攻时,应在政治上培养战士不停止的前进,深刻了解利用地形的方法,[利用死角]坚决的投入冲锋及白刃战斗。在防御时则应该特别注意克服惊慌,射击军纪及坚决顽强的行反突击等问题。当退出战斗及运动防御时,应保证机动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同时要使战士准备当前的动作(转为防御或反攻),克服对敌人技术和堡垒的恐慌,坚信我们对付这种技术斗争和积极防护的手段。这也是政治工作主要任务之一。在这个问题上,部队中的政治人员及党团员除了解释以外,还应成为坚定的模范,并保障全体人员的沉着。所提出的这些任务,要求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学习军事,而特别是新的战术方式,应保持与指挥员密切的关系,要能迅速正确的估计,在某种战斗情况中的政治任务及方法。

C. 政治领导的集体方式,及政治工作冗长的方式,都是受限制的。群众会议,演戏及其他类似的鼓动方式,只有在时间容许及在火线的后方时才可采用。各[个]别的号令(经过团的通信机关,政委及政治工作人员到诸分队中去,及有时叫下级的同志来等)及以身作则(按规定说来是在连上),是主要的领导方式。个别的及

分组的宣传,简单的指示谈话、口号及简单的行军报是主要鼓动方式。

对于某种战斗任务的中心问题的周围,诸分队诸指挥员及诸战士应发挥彼此间的革命竞赛和突击运动,这在整个的政治工作中是有很大的作用。

这种方式是靠着指挥员的机动性,党支部的核心、十人团和指定模范战士帮助某个战斗单位及某些落后战士的积极性,并且经常的要与他们打成一片。

D. 在战斗间,政治委员如有相当的战术素养时,则可依照上级指挥员的指示或同级指挥员的付托,任指挥的职责。或是到在政治上必须巩固的分队里去(因其任务的重要和欠坚定性),或是随同指挥员政治指导员及以下的人员,其一切的工作,是靠着在战斗中能以身作则,保持与战士的联系,并领导他们前进,团及以上有政治委员,其主要的任务是要注意部队的指挥,弹药的补充,供给、撤退看护伤员及保持秩序等;而不应该到自己部队的前面去,放弃了整个部队或兵团的政治领导。

E. 考察全体指挥员及战士的成分,及正确的分别阶级的层次,是政治工作必需的条件。诸分队在担任单独负责的战斗任务时(任侦察、警戒、游击、第一梯队的突击队及守备队时),应加强政治领导,对部队的逃跑者、俘虏,应有特别的个别考察和教育,要检举反革命分子;另一方面要克服不自觉的动摇,经常的考察好的战士,造成部队中的模范,要奖励并提升他们。

F. 战斗新的条件要有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对于一切的反革命分子(当情况紧张时甚或怀疑的分子),如匪首、当土匪的地主、敌探、别动队及逃跑者、降敌的宣传组织者,应向之作坚决的无情的斗争,才能保障我们红军的阶级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要开展与游击习气残余的斗争,主要的是表现在怕敌人的技术和物质的困难,无纪律,地方观念,消极,结果便是向敌人的堡垒

主义投降。在红军战士中,我们的新战士及政治工作是要最终的克服这些落后的倾向,以保证在我们武装斗争新的阶段上战胜敌人。

(载于1934年4月20日出版的《革命与战争》第三期)

(录自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反对曲解我们的战术

李 德

根据我们军事学校在教育上和部队在实际战斗中的经验，证明我们的指挥员，还有些没有真正的了解新的战术。

一般肤浅的了解及机械的应用正确的原则，结果做出不正确的动作来。

第一，支撑点的构筑及防御

一、错误：构筑广大的支撑地域或绵延几十启罗米达的支撑地区，要有一个到两个师的兵力才能守备。诸支撑点配置很稠密，仿佛是为着保持相互间的火力联系；而质量很差以致不能抵抗炮兵迫击炮及飞机的轰炸。

据下面的理由，构筑及守备这样的地域及地区是不适当的，因为：

1. 首先要有大的守备队，这样便削弱了我们进攻部队的兵力。

在困难的条件之下，特别是在轰炸之下，而我们的支撑点又不十分坚固时，我们的守备队就要有高度的坚定性，这即是说，要将好的部队用来钳制敌人，在质量上也就削弱了我们突击的兵力。

2. 其次须要有大量的弹药，否则便不能守备，可是我们的弹药是有限的。

3. 第三我们的突击兵力，在其进攻的动作中，依据于支撑点地域以保持协同动作，这便限制了我们机动的自由，因此便不能灵活的机动及自如的包围或迂回敌人。

二、怎样才对：放弃构筑大的支撑地域及地区，仅在战略战术上有重大意义的方向及地点，构筑单个的支撑点或不多于三至五个支撑点的地区，而这些支撑点，确应认真的构筑，要使任何什么技术，都无法夺取他。支撑点主要的是配置机关枪，在其周围，构筑辅助的野战工事(前出的散兵壕)，主要的应向着敌方的斜面上。堡垒必须是纵深的配系，否则不能进行顽强的防御。构筑支撑点最好的是照高级首长的指示行之，保证这些支撑点守备队的粮食及弹药，以便在没有我们突击兵力的时候，也能够抵抗任何敌人的挺进。在其他的情况下只限于构筑野战工事。

这样的支撑点便不会限制我们的突击兵力，并可保持弹韧性与自由的机动。因为守备队不多，便可供给充分的弹药，使他能够长久的钳制敌人大的兵力，成为我们突击兵力机动的骨干而不妨碍其展开。

第二，没有了解在目前条件下防御的原则

一、错误：在宽正面防御时(依据于延长的工事地区或野战工事)，在整个方面上平均的分散兵力，敌人则以密集纵队进攻狭窄的正面，很易于突破防御的配系，深入到我们守备队的翼侧及后方，迫令我们无计划的撤退。

积极防御自然应该减小阵地的守备队及其火力配系而来，但同时要估计到这有可能使敌人迅速的征服钳制队的抵抗，而突击队又不能适时的赶到，以致失去钳制队及突击队的协同动作。

缺乏有计划的进行运动防御而且常常的变为退却，因为全部的力量都用来进行突击的机动，而未从纵深的几个地区进行组织战斗。

二、正确的了解：组织有间隔的宽正面防御。

一般说来，是靠着野战工事并以各种障碍物加强之(掘断道路的窄狭部设陷阱地雷等)；守备队应扼守敌人前进中必须要占领的瞰制高地，而突击队(两个或三个)配置于间隔的后面，以便察明敌

情时，一下子就从纵深内前出于被威胁的地段，行反冲锋；如时间允许时则从守备队的翼侧行反冲锋。在宽正面防御时，守备队的协同动作是特别的重要，如敌人只占领一两个重要地点，并依据来突入到纵深时，则其他的守备队就没有扼守之必要，否则他们将要孤立甚或与主力隔绝。因此防御的配系应该是有弹韧性的。有时机动应采取运动防御的形式，并在纵深内有计划的构成补充的防御地点及地区。积极防御自然由钳制队省出兵力来加强突击队；但我们不要忘记，防御是由地形巩固，火力配系及反突击三个因素构成的，要加强某一因素，但不得忽视其他的因素。火器应最高度的使用于钳制队内。要行突击必须有明确的决心。如突击的兵力较小于敌人的进攻部队时，一般说来，则只是由防御地域的纵深内进行突击，大兵团转为反攻的突击时，最好是从守备队的翼侧进行突击。因为敌人先头部队被我们的守备队及反突击队钳制着，而其后续梯队在向前增援时，我们就可以与以外的突击。

很明显的，部队的协同动作及时间正确的估计，是有决定意义的。

运动防御的目的不是为要顽强扼守阵地或消灭敌人，而是为争取时间或诱引敌人（诱引敌人远离其堡垒以便我突击队隐蔽的突击之）；因此运动防御只应同敌人的先头部队（侦察、前卫游击队等）作战，并迫使敌人的主力展开，当执行了这个任务时，即有计划的转移到后一个地区。为要和敌人的先头部队进行战斗，则仅行局部的突击，而不要进行任何的决战。但是我们要记着，运动防御是为着保证我们主力在有利条件下施行突击的机动，如过早的退出战斗或顽强的战斗，都不能保证这些条件的构成。

很明显的，这种机动的性质很少容许我们构筑工事，因为这些工事将被敌人来抗击我们突击的支柱。

第三，短促突击

一、错误：有些同志还没有分清短促突击和防御时的反突击。

他们以为短促突击,只是为着寻求战术上的胜利,而不是以坚决的战斗消灭敌人大的兵力;于是短距离的突击常从正面实施(在战场上没有弹韧性的机动),或者缺乏顽强性(有时在得利时亦缺乏有组织的追击)。

二、正确的了解短促的突击部[队]是极端隐蔽的开到进攻出发地,接近敌人必要经过的道路,突然的实行进攻和冲锋,以便在极短的时间内,进[经]过敌我间的地域,以乘敌人未及构筑工事及展开其火力以前,一下子进入白刃战斗。

这样短促的突击是相当的带有袭击或者打埋伏的性质。

这种短促突击的特点,是要适时的选择及研究与敌人作战的地区,减少在战场上机动的时间及距离(少受敌人的观察及空中的威胁),而能够在敌人主力增援未到以前,以白刃扑搏迅速解决战斗。

最有利的是行短促的侧击,但这也不是机械的,有时也得从正面行遭遇的突击;但是突击时,常常是分两个方向,向敌人的先头部队行辅助的突击,而向敌人后续梯队行主动的突击(钳制队或突击队)。短促突击绝不是说在战场上不能机动,相反的,恰恰是要最敏[灵]活的使用部队,因为开始在出发地的部署,是根据预先的决定,而敌人的动作是有变动的,所以必须在战斗开始时,调动突击部队,这样才可免去构成不好的战斗正面及对峙阵势。

如在构成战斗正面及坚固工事之前,而不能解决敌人的有生兵力时,最好是退出战斗。如果已得到战术上初步的胜利时,则须有组织的坚决的深入到敌人的纵深内,进行追击,这样才可以把短促的纵深突击及战术上的胜利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现在只讲到这三个问题,以后还须确定我们战术上所规定的其他原则。

我们要特别指出,最危险的就是简单化的及机械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果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

因此我们必须估计到每次战斗的经验,以新的方式来补足及变更我们的战术。在这一创造的工作中,我们应造成最后胜利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一九三四·五·九

(载于1934年5月18日出版的《革命与战争》第四期。)

(录自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再论战术原则

李 德

根据最近战斗的经验,对以前几篇文章所提及关于战术上的几个问题,有补述及更确切说明的必要:

一、敌人并不经常的拒绝同我们主力决战,而有时依据在狭窄正面上密集的强大兵力(例如在 20 至 30 里的地域上集中 10 个师以上,而在 10 里以内的地域内有 3 个到 4 个师的突击队),甚至寻求决战。

二、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并不放弃较大胆的前进,一下子离开其基本堡垒 15 里至 20 里,集中几个纵队,每纵队有两个到三个师,进行其特殊的机动,主要的是轮番的进攻(例如:开始以某翼或两翼纵队前进,然后则中央的主力纵队迅速前进,当其某一纵队与我们的主力遭遇时,则该纵队即暂时停进筑堡,展开他的火器,构成战斗正面,而其他纵队则企图击破我们钳制部队的抵抗,以便进到预定的地区或居民地筑堡)。这样便构成了战役上全线扇形的进攻。分梯队的纵深配备,易于转移到发现我们主力的方向,并可迅速的确定的构成战斗正面。

三、敌人进攻的战术是依据于我们火力相对的薄弱,并企图在冲锋时,以密集队形集结大的兵力,以克服其部队政治上的弱点。结果像拿破仑式的战术? 在先头行进的是其最可靠的部队,成宽广的较疏散的火力队,来进行火力战;在其掩护之下,很密集的突击纵队,成密集队形前进;后面则是法西斯蒂的隊伍(带大刀驳壳或机关枪),他们无情的驱逐士兵冲锋,不许他们退却(退的不是杀

头就是枪毙)。

这种冲锋的方式,敌人常常是有很大的伤亡;而在另一方面,白刃扑搏,却是最顽强及长久战斗的性质(往往是整天的冲来冲去或是冲七八次)。

四、使用技术也是适合于这个战术的方式,但敌人少有系统的预先进行空军轰炸及炮兵的火力准备。其进攻一开始,就出动步兵(步兵的火器及其突击队),炮兵及迫击炮的射击,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步兵;而飞机则不断的进行战场上的观察,以妨碍我们在战场上的机动,飞机轰炸也和炮兵一样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其步兵。

五、我们的火力配系,应严格的估计到敌人的这种战术。在步兵白刃战斗以前,区分时间地形来进行远距离的射击及长久的火力准备是没有必要的。大刀战斗及白刃战斗应汇合一起,而成为有严密计划的机动。

从隐蔽的出发地出动时,机关枪在前面行进,占领阵地,机关枪不是为着压制敌人的火力(因敌人有多数的火器及弹药,故不能实现),而是为着向敌人密集的突击纵队,实施突然的火力袭击。在展开时及到大冲锋距离以前(即距敌人有生兵力 200 至 500 米达的距离),步枪的火力也是同样的任务。敌人机关枪的射手及炮手及其指挥官是特等射手应特别选定的目标。到达投入冲锋距离时,机关枪及部分的射击手等应继续其抵进的射击,而突击队则转入近距离抛手榴弹及刺刀战斗。迫击炮及炮兵的火力(估计我们在这方面的缺乏),仅应集中于一个方向(某个突击师),主要的是射击敌人突击纵队的后续部队,即是射击敌人密集纵队的有生力量。

这种火力配系造成最有效的杀伤整个纵队内敌人的突击兵力,并且最确实的直接援助我们步兵的冲锋。

六、在战场上的机动如下:

(一)在敌人还未停止及初步做工事以前(这种工事只需半点至一点钟),及其后续梯队未及增援以前,即迅速的接近敌人的有生力量,在白刃扑搏中解决战斗。(参看本期另一论文上所讲的“短促突击”。)

(二)隐蔽的接近敌人的有生力量(虽敌从空中和地下实施观察)。在战场上指挥步兵的艺术就是要会展开成稀薄的战斗队形,利用地形的死角及天然的伪装,以避免敌火的损害,然而还是要敌时的集中有生力量,实行白刃扑搏,来打击敌人的突击纵队。

(三)灵敏的查明并回答敌人的机动,不应被吸引于次要的方向,使我们屈从敌人意旨与他作战;而应争取并保持主动权在我们手中。为此要迷惑敌人,放他进到有利于我们的地区来,查明其辅助的突击方面(时间上常常是预先行动的方向)。当敌人大胆前进时,我们的主力不应该只求消灭其先头部队(这样正使敌人易于构成战斗正面),而应力求突击其后续梯队。

有时,在战斗中,特别是敌人在我们预定的主要突击方向,停止并巩固筑堡时,则需变更我们的主要方向。从已经进入战斗的先头部队中留下钳制队,而主力则应迅速秘密坚决的移到新的方向(虽是在业已停止的敌人的翼侧几里路也好),突然出现于还有进行遭遇战的可能的地方,或战斗还未变成阵地战的地方。

七、如敌人决定和我们的主力作战时,则他一定有相当胜利的前提(操主动权,选定的战场及时间,集中的兵力和兵器)。要严格估计到这些条件,如果不利于战斗,徒消耗我们的实力时,最好是放弃战斗。此处须避免下述的两个错误:

(一)我们的兵力既已展开战斗,而又要退出战斗,那就不能免去多余的损伤。保持战斗,为的是迷惑敌人及掩护我们主力的撤退。

(二)如遭遇的突击未成功,而敌人又已构成“战斗正面”时,则不宜继续强攻固守的敌人,而应当退出战斗,争取其他方向的先机

之利。立于主动地位,决心,和实现决心的灵活性,在这里是有重大意义的。由已得的胜利争取全部胜利的顽强性与在不利时勇敢的退出战斗,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辅助的,这就在乎良好(沉着与坚定)指挥员的适当运用。

(载于1934年5月18日出版的《革命与战争》第四期。)

(录自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短促突击的战例

李 德

(一)甲军团部队在龙冈以南的战斗(见图1)

(1)情况 敌人在龙冈以南,已筑成堡垒及修好了公路,一定要继续推进堡垒。在其堡垒的后面,有一两个师的移动及集中,更证明其前进的意图,在B指挥阵地上观察得很清楚,按其集中的地点说,敌人将会由东岸前进。

我甲军团由东南进到B地域,当敌人向A、B、C地域前进时,给敌不意的突击而消灭之。甲军团有以下的情报:

甲,敌人 在这方向作战的59、92及其他各师,战斗力不强,只惯于和我们军区的独立部队作战,他们是很谨慎的,很少前进两三里路以外,受不住激烈的冲锋,他通常是用一个团到一个师在其堡垒的火力援助之下前进。

乙,我军 D地域是由军区的独立团在西岸扼守,A地域的阵地有独立团,C地域有独立营扼守,这些部队熟于游击战争及运动防御,但因其弹药有限,在长久防御中缺乏顽强性。

丙,地形 A及D地域中间,隔一条河,因涨水不能徒涉,桥梁亦被冲毁,而在A地域以北的小河是可徒涉的。A地域的指挥阵地,是个比较孤立纵长的火烧山,但在我们方面,在许多隐蔽的接近地,在道路以外的山坡上可以展开。

丁,时间 对敌人进攻的时间,虽是不明了,但敌人一开始移动就可很好的观察得到,敌人进到A及C地域要一个钟头,我们的部队由隐蔽出发地,最少要两小时才能赶到(估计十里

路地形的复杂并只能成一种纵队接近)。(附图 NO. 1)

(2) 战斗经过

甲,基本的决心 在 A 地的独立团,在打退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后即撤退。主要的突击是由东南经 A 地域的独立高地,及由东经 C 地域行之,这样可以切断前进敌人的归路,左翼则靠着河从南及从西面行辅助的突击。

以一个师担任由东面突击及断敌归路,并预先进(占)C 地域,而其余的部队则隐蔽在 B 以南的地域,指挥所在 B 高地上,当晚的部队即如此。

乙,约十点钟时,看见敌人集中有两三个团,向 A 地域出动,甲军团的先头部队,亦开始接近(图一),一点钟后,敌人两个团即占领了 A 地域,我们的守卫队,依令撤退,敌人则停止筑堡,没有继续前进的模样。

决心:不等主力到达前,以先头部队之三个团实行攻击,并令 C 地域之先头团断敌归路。

丙,十二时我先头部队已赶到,敌人已构筑了初步的工事,进行着很激烈的火力战斗,同时我们在各方面,都在前进冲锋;但是敌人不等待白刃战斗,即开始撤退,我们短促的追击到河边,而在 C 地域的一个团,则由河的北岸追击。

战斗结果,夺回了原有的阵地,俘获人枪各三四百,轻重机关枪十余架,子弹五万余发。

(3) 教训 战斗结果的收获虽不大,但是决心及战斗的经过,在短促的突击上是很有意义的。这里应指出的是:我们部队的赶到和敌人的进攻时间,是相合的,而不能过早接近。但我们要问,放弃 A 地域,在 B 地域作战(控制地形),这样则可展开全力,是否更有利呢?这完全决定于敌人的行动了。敌人在过去及这次的战斗中,证明他的目的,只限于占领最近的高地,因此这个决心是正确的。在决心中对于利用地形上,是特别值得注

意的,虽然这次是仰攻也是正确的,因为控制阵地在我们手里,有隐蔽的接近地,而且敌人很弱。这证明在某种条件下,仰攻并不像某些同志所想象的那样要不得。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放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由上往下打”的拜物论。

在实现决心上有以下的缺点:

(甲)按情况说,独立团用不着从 A 地域退得那样快,他的动作,本可使得敌人增派预备队,并取得余裕时间,以便我包围和迂回部队赶到,若如此时,则将使这次的战斗,有更大的效果。

(乙)正面进攻的一个团出击及冲锋时,在时间上本可有更好的配合,就是说在侧翼部队接触战斗以前,可将部队停止不进;另一方面在 C 地的一个团则出动过迟,使敌人部分的能回到其基本的堡垒内,减少了我们全部消灭敌人的可能性。

(丙)诸步兵分队中对战术的了解还很差,实际上只有团按营疏开了,而营连排是没有展开的。运动时是沿小路前进,没有利用山坡丛树及其他成战斗队形来隐蔽前进及伪装,因此必须要有火力的准备来避免损害。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所消耗的子弹并不少于敌人,可是我们是应该节省弹药,主要的只以火力袭击有利的目标及直接援助冲锋的步兵,在到达冲锋出发地以前,主要的是靠着展开及利用地形来避免损害。

估计到上述缺点,这次的战斗,应该成为我们在堡垒主义特殊的条件下,实施迅速秘密短促突击的示范。

(二) A、B 两师在门岭北的战斗(见图 2)

(1)情况 粤敌七师早就在门岭地域构筑好了堡垒,其连哨在 D 村,在 C 地域有联防队千余,枪数百支,机枪数挺,并依据于土围外壕据守。我们以一个师于 R 地域钳制门岭方向之敌,而由另一方面调来的一个师,则隐蔽于 B 的山地。在 A 地域之一个师的任务,是袭击 C 地域的联防队,以吸引门岭之敌增援,而在 B 地域的师,则向增援队行短促突击的侧击。

(2)根据以下各项定下决心：

甲，敌情（敌人的一般特性见革战〈即《革命与战争》——原编者注〉五期给广东同志的信）联防队的工事及武装都很差，但过去在 C 地域作战时，是表示有相关的顽强。敌七师的增援队，不会起过一团以上，大约将有一营人来增援（因其驻得散，并惯于和我们的军区独立部队作战，所以他很自信的），按过去的经验来说，敌人通常是企图迂回我们的外翼侧，这即是说敌人将会由 C 地域以西来进攻。

乙，我们的兵力 R 地域的师熟于游击战争，但已惯于不爱和敌人的正规部队作战，缺乏顽强性，在 B 地域的师，在连续的胜利后，在战斗中是很坚决顽强的并有充分的弹药。

丙，地形 C 地域是个大的谷地，在其西北两面有小高地，从 B 地域可控制各方，河不易徒涉，但有许多桥梁。

丁，时间 敌七师要两小时后才能赶到增援，这使我们能首先消灭联防队，而后以全力来打敌人的增援队。在 B 地域的师位置过远得一点，为得不致迟误；逐靠近 C 地域，而 C 地域开阔，故应在夜间开始战斗。

决心 在 A 地域的师，其主力于拂晓前（四时）袭击联防队，一团从北面一团从西面动作，在占领 C 地域后即扼守之，并在 B 地域之师未行突击前，应抗击敌人的增援队；另一团缺一营向 D 方向活动保证我之翼侧，其余一营则在 R 地域保证后方的安全；B 地域的师于拂晓时进至 C 地域以 C，向西地域以南之增援队施行侧击。（附图 No. 2）

(3)战斗经过 在战斗的第一阶段中，是有计划的，四点钟时各部队为均已到达出发地，五点钟占领 C 地域并击溃联防队；

第二阶段：六点钟敌七师一个营突然由东反击，而我在 C 地域的部队，当 B 地域的师未突出以前，不战而退出战斗。

第三阶段：粤敌未行追击，而联防队的残部，则前出到 C 地域

以北,而我在 B 地域的师,将自己的突击方向改在 C 地域以北,最后是消灭了联防队,这时广东又有部队进到 C 地域以南停止,未参加战斗,午时战斗结束。

战斗结果虽说是打死俘虏(头子也在内)联防队数百,缴获不多,但是没有达到战斗的基本目的,而我 A 师亦有相当的损失。

(4)教训 基本决心无疑问的是正确的;但是要严格估计到敌人的战术与北线上是如何的不同!

究竟不得手的原因何在?

甲,没有充分估计到 A 师游击队的性质,该师过早的缺乏组织的不战而退出战斗。

乙,敌人的增援队是出于意料之外沿河而来的,而我们在河东岸的侧面掩护队全无作用。

丙,因敌人未追击,使我们不能在 C 地域以北进行突击。但是不能说这都是客观的原因,就是变更基本的决心,也不能克服这些原因的。

在 D 地域以北的一个团缺一营,应该积极动作,行火力的袭击,夺回□地域以东的桥梁以及迅速的冲锋,这样可以充公扰乱沿河前进的增援队,使其变更自己的方向□□□□前进。对付 A 师游击的倾向,可采取政治工作的可靠办法,如拦阻等等。B 师则以一部分迅速进入战斗,一直向□地域突击(从正面通过的突击),并分出一部在自己的右侧后。

如果这样动作时,则一定可以部分的完成基本的任务;但为得如此,必须很迅速的了解情况的变动及灵活的指挥,但这是没有的。以上便是这次战斗中的基本教训。

结 论

上面所引证的战例及最近的战斗,证明在大的兵团内,对短促的突击,是了解的。在形的意义(适时的侦察和工事准备)上则了解更好些。

弱点如下：

甲，时间估计 短促突击这并不是简单的冲锋，而是很艺术的机动，而适时的进入战斗（不过早不过迟）以求达到意外的突击及兴奋是有决定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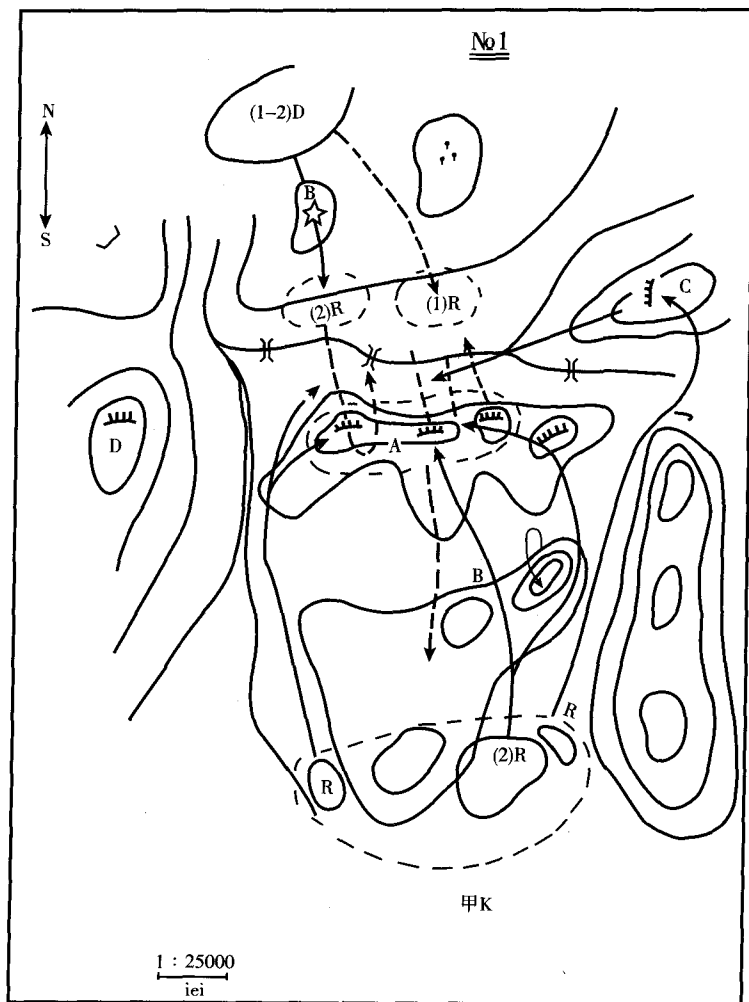
乙，指挥 钳制队与突击队及诸突击队间的协同动作，在时间上，地形上，胜利必须的前提上，是我们最大的弱点，在这方面，我们应用一切的方法，如解决通讯联络的问题（即或有时没有充分的工具），及时调解（无线电、电话、通讯员、专员、指挥员、□□视力和联络的信号）导致因某师通讯中断或迟慢而失去指挥。特别是独立部队为钳制队时，他们不惯于打大仗，则更需要健全的指挥。

丙，虽说大的兵团了解了短促突击，而诸部队及分队尚未了解短促突击，我们应该知道，包围敌人翼侧，利用地形，施行特种的火力战斗，正确的展开，分队的集结，这都是短促突击的有机部分。无论在部队训练中及战斗中都不应放过这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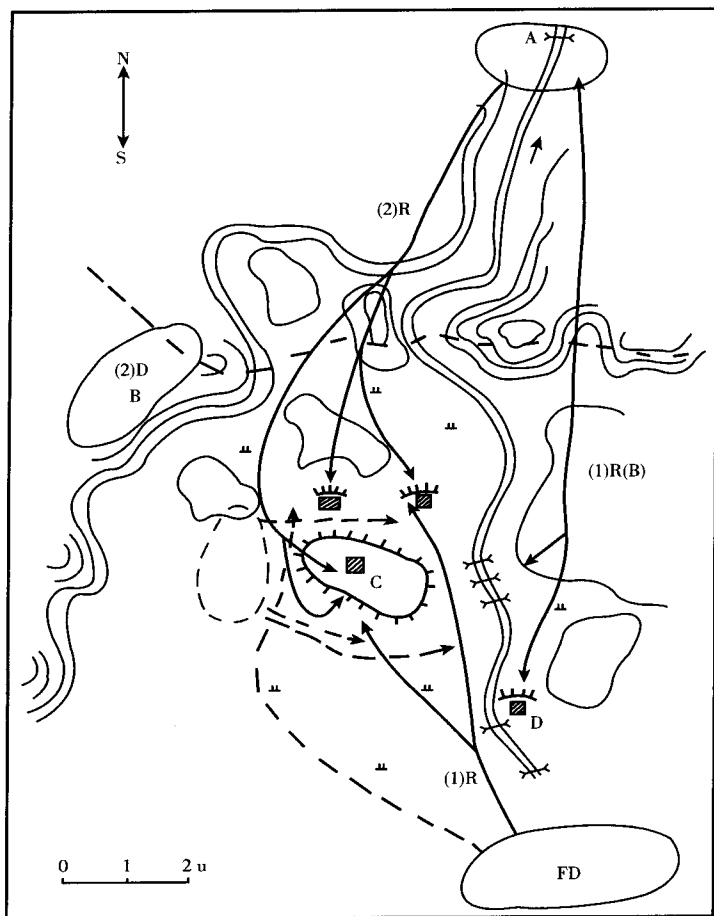
这些战例或可引起这种意见，以为短促突击只能达到小的战术上的胜利而不能争取大的胜利，如做出这样的结论时，那是根本错误的。

在实行短促突击中，因我们有了很多的弱点和缺点，结果只取得了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现在我们只作了第一步，了解了基本的原则。

第二步更是要深入到诸分队的正确战术中去，实现准确的指挥，这是在堡垒条件下取得更大胜利的保证。



《短促突击的战例》图一



《短促突击的战例》图二

(载于1934年7月25日出版的《革命与战争》第七期。)

(录自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论防空几个新的问题

李 德

第一,敌人现在已了解其从前所采用的空战兵器,收效甚微。空中侦察得不到必须的结果,因为我们的部队主要是夜间移动,日间有很好的伪装。敌机在我们高射的威胁之下飞得高,预先的侦察又无结果,故轰炸的效果甚微。而我们的掩蔽部及支撑点(如预先是先[遵]照规定构筑的)完全可以抵抗敌人以前所采用的轻飞机炸弹。因此,敌人现正使用新的空战有威力的兵器,并在空中用新的战术,其主要的內容如下:

甲,敌人引用新式有力的轰炸机(600 匹马力不论天气气候都能飞,并且有很大的载重力和射程)。

乙,在轰炸时,不仅利用轻炸弹,而且利用中等和重炸弹;其信管不仅起碰炸的作用,并有慢性管,在侵入到某种物体的内部以后才起爆炸的作用。这种炸弹是专门用来作堡垒战,轰炸我们的支撑点及掩蔽的[地]。重炸弹的性能如下:

(1)没有慢性管的碰炸弹在着物时爆炸,其爆炸孔有一米半至二米达深,其直径有三至四米达,并且有很大的碎片作用,其威力圈的直径有 200—300 米达以上,普通的掩蔽部而未用木梁特别来加强时,则可打穿。(见图一)

(2)慢性炸弹(有穿炸作用的)不是碰炸的,因此他有很大的侵入力,平均可穿透三四米达厚的土壤,然后在内部爆炸。我们一般的支撑点及掩蔽部不能确实抵抗这种炸弹。在另一方面其碎片的作用却较小,甚或没有。有时因炸弹侵入太深及土壤的抗力,以致

减弱其爆炸力，甚或不炸。（见图二）

丙，敌人重新来轰炸我们的后方，以便扰乱并妨碍我们有系统的指挥。

丁，敌人在前线上进攻我们的堡垒时，采用下列的动作方式：

（1）在冲锋前，对我们的支撑点进行轰炸和炮兵轰击，以压倒我守备队的抵抗。

（2）冲锋时，则将其炮火及飞机轰炸转移到我们阵地的纵深内，以阻止我突击队的接近，而当我守备队撤退时，即进行火力的追击。

第二，敌人这些新的兵器和方式，我们应立刻估计到，而避免不应有的损失，虽然暂时的扰乱了我们的后方。

甲，我们对空防御的基本内容，如军委防空指示中所述，现仍发生效力，特别要注意日间移动时的防空和正确的应用指示。在行军中要遵守下列各项：

如无直接的战斗任务的移动时，则首要的原则是防空，也就是要成行军队形，隐蔽于山的倾斜面上及森林边，而不要分散。在开阔地时，则从各方面散开，并利用自然的掩蔽物，如无掩蔽物时，则于田间坐下或卧下。（见第三、四、五等图）

在战斗中，主要的原则是执行自己的战斗任务，以便于把诸分队成纵深的疏开，如可能构成战线时，应迅速运动，以便与地下敌人迅速的进入战斗。

乙，掩蔽部及支撑点须适合于其目的。构筑抵御碎片的，这常常是有用的。这种轻的掩蔽部，通常是野战工事守备用的，并配置在战壕的旁边（在土□□成是在山的回环斜面上），并且用交通壕与战壕联系起来。（见图六）

支撑点要少做些，如做就要做得坚固。要在地面上构筑确实能抵抗重的慢性炸弹的支点，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有洋灰的建筑），而在地下则可构筑最坚固的抵抗中心。构筑坚固的掩蔽部亦然，

从地下挖出去而勿须盖土,故应作在山地,以便有自然的掩盖。为使其坚固,则于内部构筑木墙及顶木,否则地下的构筑物也会因震动而倒塌。此外可加强上面掩盖,用各种材料加几层,以便缓和削弱并抵抗炸弹的力量。(见图七、八)

没有作战任务的普通的坚固掩蔽物,自然用不着在山顶上,而做在倾斜面上,上面的掩盖则须加厚。

丙,抗击敌人从空中配合地下冲锋的方法如下:

1. 在作战计划中(特别是在选择钳制队的阵地时),应预定阵地的两个地区,第一个地区即加强的警戒线,在前斜面构筑简易的工事,这也可说是第一抵抗线,使敌人在其前面展开兵力及兵器,并诱惑敌人轰炸。在行突击的控制地域即为主要阵地,当敌人进攻时,其势已衰,并已相当紊乱,其炮兵未曾试射。空军在时间上并较难配合步兵冲锋。

在这种情形下,并可加强伪工事,使敌人对之射击及轰炸,而真的抵抗中心应有更好的伪装,而不应过早的暴露自己。因此主要是进行短兵式的射击,而突击队则集结在回还斜面上。(见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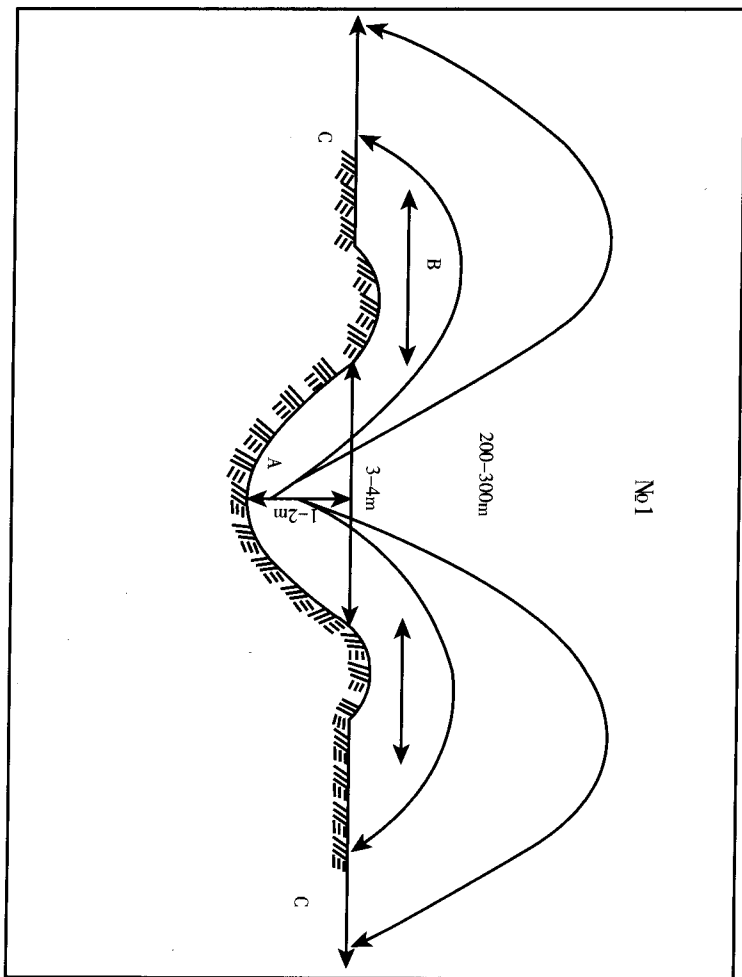
当敌人炮兵射击,飞机轰炸,行火力的准备时,在主要的阵地上,只留下不大的值班部队,而主力则隐蔽于掩蔽部后斜面土坑及森林中等。当敌人占领或进攻我警戒阵地时,守备队则应全部进入阵地,而突击队则应靠近,以便突击。这时,部队适时地疏开及展开(必须在道路外),及各个战士能利用地形为防护自己的基本方式。

要适时的(不早不迟)突击冲锋之敌,而不顾一切的轰炸。如已集结的队伍,而不立刻进入白刃扑(拼)搏或撤退时,则损失较大。因为在白刃战斗中,敌人的炮火及轰炸已失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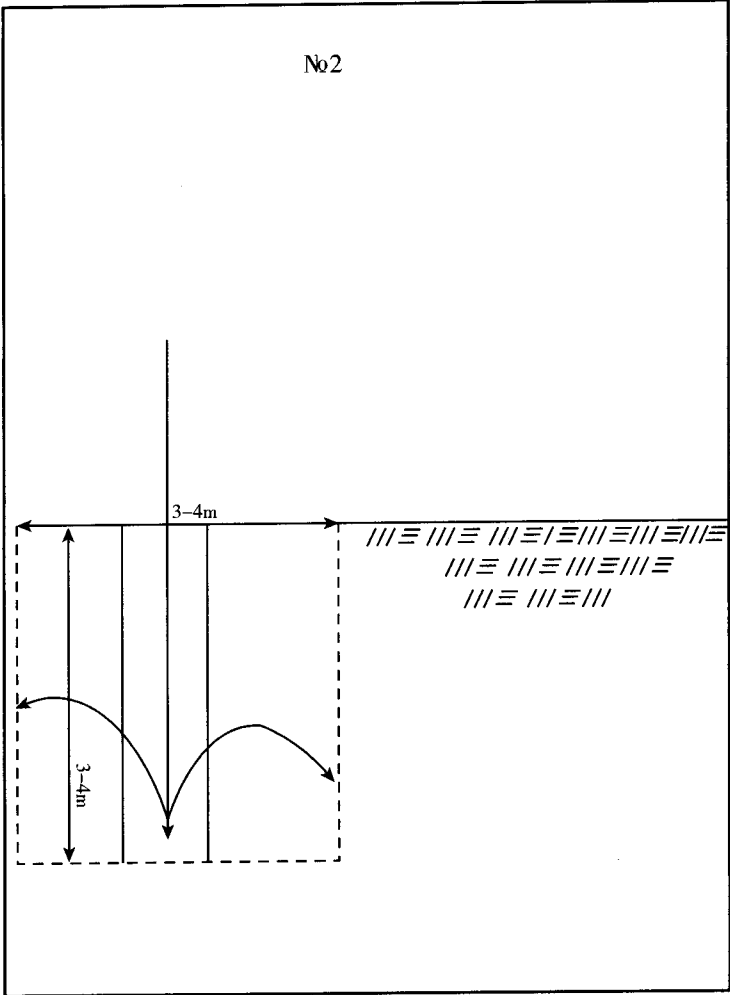
退出战斗是最困难的。我们应记着此时受敌炮火追击及飞机轰炸的威胁,由此受地面由堡垒内出来追击敌人的威胁危险得多。

因此，在敌射界内退出战斗时，应成疏开的战斗队形，直到天黑或进入森林后，才得集结。无论如何，在撤退中不应集结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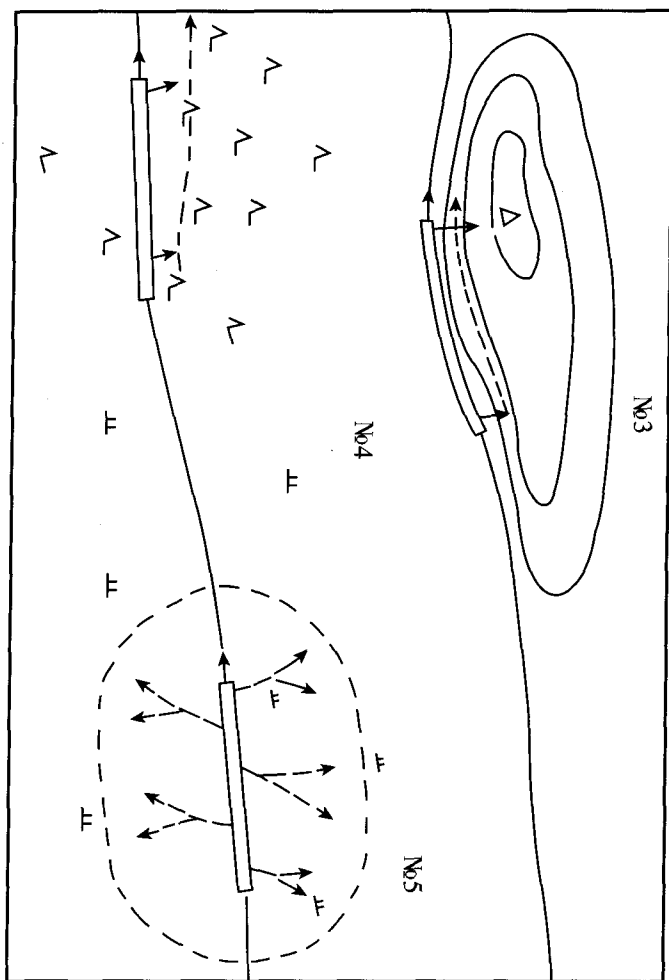
这是几点没有整理的意见，要我们在实际中来检查而使其系统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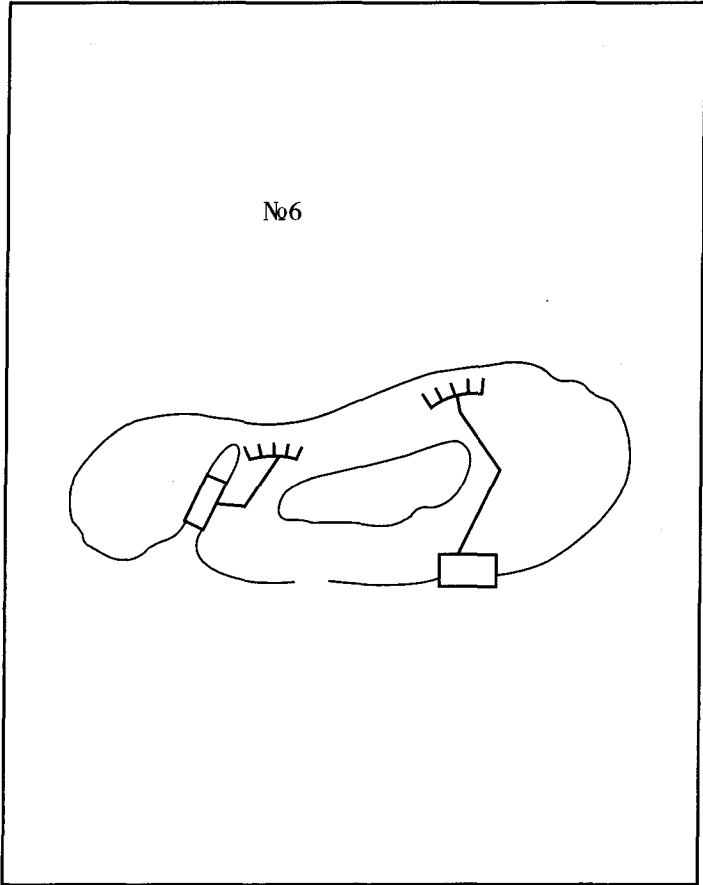
《论防空几个新的问题》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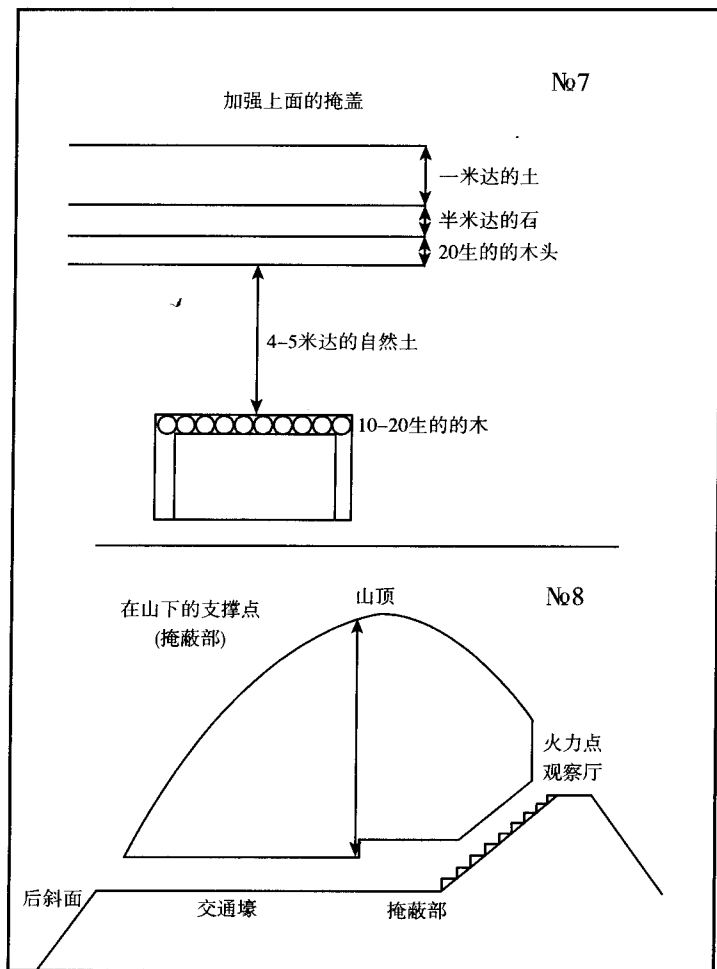
《论防空几个新的问题》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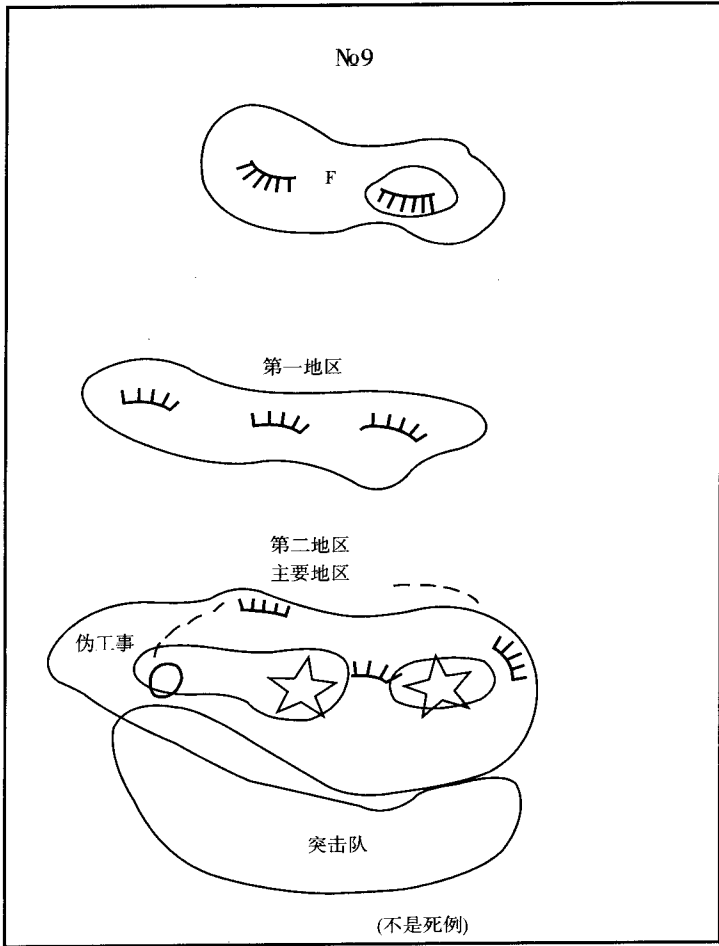
《论防空几个新的问题》图三、四、五



《论防空几个新的问题》图六



《论防空几个新的问题》图七、八



《论防空几个新的问题》图九

(载于1934年8月15日出版的《革命与战争》第八期。)

(录自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某独立师袭击敌人未成堡垒的经过

(游击战术的战例)(节录)

李 德

二

这次的战斗在战术用不着多的说明,其决心及实施是正确的,可成为游击动作的模范。但我们应说,在这样情况下,是用不着这么大的优势兵力,而每个独立团,都应该能胜利的解决这样的战斗任务。

同时,在政治工作方面都有许多不好的例子,证明在部队中还保存着旧的游击主义的政治工作方式,还未熟悉新的政治工作方式。

为明了起见,拿几个在这次战斗中对比的例子来说:

<p>一、出发前来不及召集会议解释,政委利用夜行军休息时召开干部会。</p>	<p>在战斗情况下,特别是夜行军靠近敌人时,不应有任何的会议,任务的传达和解释,应经过某些政治和军事人员,而他们则经过政指传达到战斗员中去。</p>
<p>二、沿路派出宣传员向通过的战士进行关于战斗动员的喊话。</p>	<p>这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暴露秘密破坏肃静的,如此则不能保持纪律及夜行军的秩序,而应经过政指班排长政治战士于行进休息中,在班排范围内,进行宣传。</p>

续表

三、宣传员在敌堡前喊话。	这在敌我对峙时是好的,而用在夜袭时则是错误的,如此则预告了敌人而失去了突然性。在这时,政治人员的任务不是喊话,而是同着战士作战,并以身作则的来巩固他们。
四、俘虏不区分开送往军区政治部。	应迅速将长官及士兵分开,破坏法西斯蒂分子。官长及法西斯蒂应立即严格的押解保卫局,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五、口号的内容是不搜俘虏腰包,不私发洋财。	<p>这些口号是不够的。主要的口号应保证执行战斗的任务,如夜行军及袭击时应该是:</p> <p>甲,不怕疲劳不落伍;</p> <p>乙,保持绝对的肃静和遵守纪律;</p> <p>丙,袭击时应勇敢前进,夜间敌人的火力是无效的。</p>

这些例子应该用来使这个好的战术例子再加上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式,只是如此才能真正达到游击战争中良好结果。

(载于1934年8月15日出版的《革命与战争》第八期。)

(录自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争夺四川的斗争^①

(1934年11月14日)

四川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省份。该省人口,据一些资料统计为5200万人(1934年出版的《中国年鉴》),另一些材料则确定为6900万人(1934年10月20日《中国每周评论》)。第二个数字最接近实际情况。在人口上,四川不少于、更确切地说,超过了德国或日本(不含殖民地)。

该省拥有丰富的煤、锌、铜、银、金、石油等矿藏,有一块土地肥沃的高原,人们称之为“红色的盆地”,又称“成都平原”,该省面积超过日本本土。^②现在四川已成为全国注意的中心。劳动人民满怀希望地观察四川形势的发展,统治阶级的惊慌情绪则与日俱增。

四川广大劳动群众经受了难以承担的剥削,经历了数不清的军阀混战,被压迫得奄奄一息。

捐税已经征收到许多年以后。《密勒氏评论报》(周刊)绘制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表,列举了四川军阀预征税款的情况:

四川省被敌对的军阀们分割成几个部分,其中主要的对手是刘湘将军和他的“亲叔”刘文辉将军。刘湘将军统率21军,占有重庆和万县地区,即长江以东的整个土地。他控制着长江一线的交通,因而也控制了与外界的整体贸易联系,实际上近年来统治了本省的大部分地区。刘文辉驻防于自流井,此地盛产井

^① 本文在《真理报》刊登时署名“A、Г、”,据判断即A. 加尔特曼。——原编译者注

^② 四川省面积为156,000平方英里,日本为149,000平方英里。——原作者注

盐。1931年，刘湘将军夺取了这些盐田。1932年二刘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刘湘收买了“叔叔”麾下的几名将领，封锁了他的领地，切断了该地区与中国其他部分的联系，最终取得了对自己“叔叔”的“胜利”，把他赶到川康边境，宣布自己是四川督军。

四川将领	税款已征到	共计预支
刘 湘	1956年	22年
杨 森	1956年	22年
刘文辉	1961年	27年
邓锡侯	1956年	22年
李家钰 ^①	1956年	22年
田颂尧	1965年	31年
刘存厚	1972年	38年

10月21日的《上海日报》在一篇题为《在四川省军阀辖区内》的社论中问道：

“谁是军阀混战中的受害者呢？——人民。城市和农村被炸毁，不幸的居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四川将领们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榨取居民的钱财’。他们进行管理的基本方法就是征税。但是，他们还不仅仅是各种苛捐杂税的勒索者，这些将军们同时还是银行家、企业主和商人。四川实力量大的一位将军是四家地方银行的所有人。与其他军阀一样，他在自己辖区内的各大城市中也拥有大量商店。这些商店都享有特权，免交重税。他们在四川致富的另一重要手段，那就是贩卖鸦片。他们强迫农民种植罂粟，生产鸦片。四川农民已陷入无法忍受的境地。因此红军在该省取

① 俄文原文为“Дя Чисиян”(李志湘)，据史料记载，似应为李家钰。——原编译者注

得胜利就没有什么可以惊奇的了。”

《密勒氏评论报》在10月20日的一期周刊中肯定四川省内当兵的有80万人……

外国资本都虎视眈眈地垂涎该省。1934年夏,代表四川主要将领利益的上海“杨氏家族”银行^①派经理到伦敦去,在那里同伦敦各大银行就英国给予贷款开发四川自然财富问题进行了秘密谈判。为了获得这笔贷款和将英国资本引进四川,本应成立一个英中合营公司,更确切说,是英川合营公司^②。据报纸报道,1934年初秋红军转入进攻。使刘湘遭到了沉重打击。刘湘虽宣布辞职,但实际上仍然统率着自己的残部。不过,关于英国贷款的谈判却因此而暂告中断。可是,有几十家目前在四川各大城市开设有“出口分行”的日本出口公司代表已匆匆赶来四川。

但是,红军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四川的工人和农民作为一个强大的因素,登上了阶级斗争的舞台,打乱了这些将军兼银行家、将军兼地主、将军兼商人以及他们的帝国主义监护人的一切计划。

1934年10月20日一期的《密勒氏评论报》就此写道:

“两年前,一支数千人的红军队伍开入四川。随后不久,红军就对田颂尧将军统率的川军转入进攻,先后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城,在四川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虽然田颂尧将军也收复了几座丢失的县城,但最后仍然被红军击溃,损失步枪一万支。一年不到的时间,红军兵力扩大为十倍。1933年9月,红军对杨森将军发起进攻。红军还攻击了刘文辉将军所部,占领了遂金、中议。省

① 即川帮的“聚兴诚银行”,由杨燊三及其兄弟叔侄等合资创办,故人称“杨氏家族银行”,英文译名为“*Young Brothers Bantang Corporation*”。——原编者注

② 指1934年夏杨燊三偕其子访欧,在伦敦与英商“德善公司”洽谈联合组织“联益金融有限公司”,投资四川工矿企业。——原编者注

军的战败有力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使红军获得了许多装备,大大扩充了军队。遂宁兵工厂被用来武装红军。现在红军又开始继续进攻,力图夺占万县和重庆。”

上海的《中国评论》周刊用同样的语调写道:

“尽管报纸的综合报道低估了四川局势的严重性,但是甚至南京参谋总部的代表也在10月初向路透社通讯记者证实,红军正向川西最富饶的地区重庆方向运动。据《独立评论》报道,最近以来红军损失甚微,然而当时一些报刊却企图让我们相信,红军已经被歼。情势紧急,是应当重视四川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只是忙于对其他省的红军,而将四川拱手相让,那时红军将对全国所有地区造成严重威胁。如果四川完全落入红军手中,再要将他们赶出去,将是非常困难的事。这不仅因为该省的地形使它与外界隔绝,而且由于红军在该省将获得有力的支持。那时,任何经济封锁都不会成功。如果红军在那里扎下根来,队伍得到扩大,他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出川东下到邻近各省。必须派遣精锐部队到四川去。应当在湖北和陕西两省都进行军队动员”。

接着,《中国评论》肯定地说,四川广大劳动群众同情红军,军阀统治“无疑地帮助了红军影响的扩大和促使将军们的失败”。这份杂志认为省军是不可靠的,写道:“四川居民有充分的根据把川军部队中的许多士兵称作赤色分子。”

……10月19日,上海一家日本报纸报道:“四川省红军部队已进到长江沿岸的万县和宜昌之间。”

A·Γ·于上海

(章任贤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 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

(1935年1月8日^①政治局会议通过)

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同志^②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③中,曾经清楚的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1933年7月24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罪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

① 档案原件所标“1月8日”有误。这次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于1935年1月15日开始,17日结束的。决议是在会后写成,并于2月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另有一份档案原件即标“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主要内容是遵义会议所定。

② 在会上作报告的是博古(即秦邦宪),作副报告的是周恩来。现存决议的各种版本中,这里和下文许多地方的姓名以“××”隐去。其中第452页第5、14行,第453、454、464、467、469、470、471页的“××”均指博古,其他待查。

③ 指1933年7月24日《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

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报告[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模范赤少队开始成为红军的现存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之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关系的澈底改善，更大大的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应该指出在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党对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的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报告与结论中却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

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四、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历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五、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围剿”与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

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围剿”，保卫苏区，并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这一战略路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或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的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进[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矜骄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的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的恰当的部署战斗。不要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的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止他，应该待他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就是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一切这些，都是为着使红军能够经常主动的有利的去战胜敌人的进攻与“围剿”，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结果。

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我们觉得似乎在目前这一时期中区军事指挥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差不多可以说常常是由敌人逼迫而产生的，敌人向我们挑拨，使我们常常不必要的改组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的变动，就不能积极参加作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我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

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2月以前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击败敌人,而是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止敌人。××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则变为全线抵御,而在战略上则二者都是错误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的应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的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六、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至十数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然而这对于我们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的外线作战(局部外线)的利益。即是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之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之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红军经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则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计划。

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五次战争中许多次的战役(如洵口战役、团村战役、建宁战役、温坊战役等)都由于我们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伟大的胜利。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红军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权,不是争取决战的胜利。其结果就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数量极少,而苏区也终于受敌人蹂躏。

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二月来电又重复的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之下,我们虽不能像在一、二、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取得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役,特别是19路军事变时)。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于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的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之下是应该拒绝的,只有在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形之下,在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队或为了调动敌人的情形之下才容许攻击堡垒。五次战争中常常轻易的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是以战斗当儿戏。

对于五次战争中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围剿”与过去一、二、三、四“围剿”绝然地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在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理。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过分估计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上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文章及××,××两同志给林

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见××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红星》报文章),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们不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困难(而他们最初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同志《红星》报文章),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飞机大炮),特别是堡垒内的工农士兵暴动,以战胜将来敌人更坚固的堡垒,但就在现时条件之下,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堡垒主义疲劳了敌人的兵力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他们脱离堡垒即失去胜利的信心。同时敌人无法不脱离堡垒向我们前进,又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行动的堡垒。一切这些,造成了使我们能够克服堡垒主义的困难的条件。因此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运动战,依靠堡垒线前后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白军士兵运动。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战略战术的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堡垒主义。并且只有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正确的领导战役,并正确的运用战术以粉碎堡垒主义与粉碎“围剿”。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胜利主要不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领导,而仅仅依靠于战术,实际上只是对堡垒主义的投降,到底不能粉碎堡垒主义。

九、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的了解也是错误的。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粉碎敌人的“围剿”中

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完全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如一、二、三、四次战争及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前）。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如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后），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之速决。因为在现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对于一次“围剿”与一个战役采取持久战的方略，对于我们是极端不利的。当着敌人以持久战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如五次“围剿”），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这种计划。在我们可能支持的时间之内取得决定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拿我们人力财力以及军火的补充的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即所谓同敌人拼消耗，见××同志《红星》文章），这种持久战的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这些方面，现时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这种数目字的比较，只能证明相反的结论，即持久战对于我们是没有什么胜利前途的。

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于每一“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计划。五次战争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之下进行的许多拼命主义的战斗（如丁毛山、三溪圩、平寮、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错误的，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就是作战的决定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即应拒绝这种战斗。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与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以为五次战争中没有休息训练的可能的说法是不对的，那只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主义者必然的结论。以为红军

行动积极化便是使他经常的不停止的打仗而不应该注重休息训练也是不对的,须知没有必要的休息训练就不能好好的打胜仗。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该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该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兵骨干,并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挥之下训练出战斗经验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轻的组织与装备是不对的,应该是尽可能的轻装。必须充实连队与加强师以下的领导。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论。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阶级武装的特质,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是换得了胜利。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拼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起来。

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围剿”被我们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由于疲劳情绪与过分估计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使我们懈怠消极,使我们停顿不动,使我们不能由反攻转入进攻,消灭更多敌人,发展更大苏区,扩大红军力量,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充分条件。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分估计与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这种冒险主义使我们的进攻得不到胜利(如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等),甚至使反攻中已经得到的胜利归于减削或抛弃,使红军有生力量过分牺牲,使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

地区的发展与巩固的任务放弃不顾。这同样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他的充分条件。因此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党在战略的进攻问题上即在敌人两个“围剿”之间的严重的任务。

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促应战，或对于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或对敌人战略计划企图先发制敌，一战不胜就认为没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围剿”不作必要的与尽可能支持的时期内的一切准备等等机会主义的倾向。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领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归于粉碎。

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 19 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党中央当时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同 19 路军订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 19 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的××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 19 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 19 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 19 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 19 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 19 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这并不是因为 19 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这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词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我

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给在 19 路军欺骗下的工农士兵群众看,我们帮助任何派别反日反蒋的斗争,我们才能更容易的揭破 19 路军(军)阀的欺骗,在共同反日反蒋的战争中争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只有我们军事上采取与 19 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才能使我们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的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争中所没有的。然而我们军事上没有去利用,这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来不过为了抵御敌人的前进,至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他们看来是冒险的行动。

十一、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首先应该说的:当我们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1934 年 5 月—7 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期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与保卫老苏区。国际 6 月 25 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①:“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及红军灵活的策略,必须进行解释的工作,说明这种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这一重要关节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显然也是错误的。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

^① 以下引文未能找到原电校对,维持了这个决议现存各种档案文本的原样。

准备,然而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依然是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节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完全忽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发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只[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开[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战场转移到运动战战场上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促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忱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方部的组织,使行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缓,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这是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就使得三个月的突围

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就使得口头上虽经常说“备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外,却经常是“避战”。就使得红军士气不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休息,因而减员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确口号在实际上变成了××同志等的避战主义的掩盖,而不准备于必要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就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保卫中央苏区,以粉碎五次“围剿”,以建立湖南根据地,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所有这些,都是在基本的战略方针上采取了避战主义的必然的结果。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错误观点出发,即是说红军一定要到达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①),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弊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错误观点的来源,则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容许我们这样简单地轻巧地径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殊不知这种简单轻巧与径直的干法,在短距离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在五次“围剿”环境中的主力红军的巨大的战略的转移,则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该避免的。而对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此次突围行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的敌我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

①:指国民党军周浑元、薛岳两部。

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虽则最后两次错误都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则适足表现其战略问题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十二、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的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

政治局扩大会更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于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与[对于]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于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十三、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经常的现象。

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于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绩,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与华夫同志。我们没有清楚的了解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然而政治局扩大会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经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在这一方面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而××同志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会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

十四、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虽是由于我们过去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了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的领导,我们有着物质上地形上比较良好的地区,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胜利的配合,再

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色指战员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活动的地区远远的离开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据地,蒋介石几年经营的堡垒地带的依靠是没有了。军阀内部的矛盾与不统一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我们主要敌人蒋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围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全国国民经济的空前的崩溃,使全国民众更清楚的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而更加同情与拥护苏维埃革命运动以至直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些都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发扬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利条件。

必须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这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军阀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我们,我们现在是在敌人新的围攻的前面,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存的苏区,而需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战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为了完成作战任务必须灵活的使用这些原则。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争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灭[减]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对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则须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红军更要从作战中休养与整理自己,并大量的扩大自己。红军必须严肃自己的纪律,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的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红军应该是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红军的领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的

切实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瓦解白军工作必须真正的开始。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严重的任务,我们是能够完成的。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争的新的胜利的保障。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①,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变到胜利的大革命。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

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们党

① 根据当时中央军委发出的电报等材料判断,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新根据地。从1935年2月7日起,中央根据新情况,又决定暂不渡江,改为“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由于本决议是在会后起草的,此处记述的已是改变后的新方针,下同。

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来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政治局扩大会号召全党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反对一切张惶失措与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首先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更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①

(1935年2月或3月)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題。(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

① 这是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提纲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时间在2月中旬至3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长征时期,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

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二、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A)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碎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基本上是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

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及与19路军订定作战协定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19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19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19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19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去侧击向延平前进的将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19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

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战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拒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拼“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龙岗战斗），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们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广昌）。“短促突击”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太阳嶂战斗、石城战斗，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1933年红5月直到1934年9月扩大来的15万以上（将近20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以上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错误的。

(C)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没有信心。

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

(a)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b)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c)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纵队之温坊战斗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北上外,其他在敌

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拼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

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 A、博、周三同志，而 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

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个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扩大会中周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录自《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

(1935年7月3日)

Ar·哈马丹

自1933年起蒋介石在同中国红军作战中采用的战术是，逐步包围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的各中央苏区。^①在苏区周围修筑了碉堡和工事；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苏区边境；凡企图从国民党地区偷入苏区者，一律就地处决。

1934年，在江西省境内及其与邻省交界处驻有60万蒋介石军队和30万地方军阀的部队。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仅江西一省就有150余架轰炸机逐日出动；南京军队的每一个旅都辖有一个特种化学部队。江西各苏区周围的敌军包围圈一个月比一个月缩小。鉴于敌方兵力占有绝对优势，中国共产党为保存装备比蒋介石军队远为低劣的红军主力部队，不得不让它们冲出敌军的包围圈，到广阔地区开展机动作战。

同样重要的是，必须保证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全部巨大兵力拥有最好的根据地。斯大林同志说：“在一般战争中，特别是在国内战争中，胜利和决定性胜利往往取决于正确地选择突击地域，取决于正确地选择对敌人实施主要突击并继续扩大这个突击的地域。”^②

① 原文如此。——编者注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88页。

这项艰巨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最大限度地紧张调动全部力量。中国革命的这项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战略任务,不是依靠红军部队从江西省突围进入福建、湖南或湖北等邻省就能完成的,当然就是突围进入这些省份也需要付出极其紧张的努力和发挥高度的勇敢精神。

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沿海各省的种种特点,作出了从政治、战略、经济等观点看极其卓越的决策,选定了革命战争的主要基地,新的出发地区。中国苏维埃的主要基地位于江西省,这使它经常处于被包围的威胁之中,与其他苏区隔绝,也不便于同其他苏区进行联系和对它们实行领导。

新的红色根据地因此应选在距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军事中心较远的地方。同时,新的根据地应能保证苏维埃革命的浪潮能广泛地向全国各地推开。选中的是四川、西康、陕西这样一个广袤的,战略上十分有利的地区。

只要看一眼中国地图,就足以了解中国苏维埃的新根据地具有多么优越的战略前景。新根据地的后方是渺无人迹的荒漠——西康西部和西藏;右侧是云南、贵州、广西诸省,左翼是甘肃、陕西、宁夏等省。这使中国红军有可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与旧的根据地相比,红军在新的根据地有开展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由于新根据地的战略地理位置有利,苏维埃革命的汹涌浪潮可以发动而且已经在发动着千百万劳动者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

中国红军主力离开江西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丝毫也不意味着中部各省的革命运动就此收缩。福建、江西、安徽、浙江、湖北等省的苏区仍然存在,并不断扩大。贺龙和肖克率领的中国红军第二军团在湖南西北和贵州东北活动,钳制了反革命的强大兵力。第十

军团在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地区活动。^① 据最新消息，这三个省内有 60 万名游击队员在顺利地进行着顽强的斗争。^②

中国红军主力部队从江西省向四川省的进军，^③是真正革命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大无畏气概的卓越范例。世界上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过去和现在都不曾实施过如此艰苦卓绝的行军。中国红军的英勇战士冲破层层封锁，在前进的道路上多次粉碎敌人强大兵力的堵截，击退敌军的攻击，巧妙地进行机动，穿越了五个省（福建、湖南、广东、贵州、云南）的广大地区。在从江西到四川的行军中，红军跨越了极大的距离，总计约 3000 公里，通过急流险滩，绝壁峻岭，荒原沙漠，以及被骄阳烧烤和经过敌人烧杀的不毛之地。

在革命战争的历史上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进军。红军在向四川进军途中，为自己打开通路，以辉煌的短促突击不断杀伤人，多次击溃蒋介石的精锐嫡系部队。红军像一股巨流冲垮了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

红军冲破南京政府军队的江西防线并继续进军，在反革命阵营中引起一片惶恐不安。为了挽回局势，总司令蒋介石“亲临”贵州前线。在那里，他又一次尝到了惨败的苦果。红军主力部队在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率领下实施卓越的机动作战，在贵阳（贵州省会）一带分割了蒋介石的军队，粉碎了南京政府军队担任“追击军”的六个师。^④ 在这一系列的作战中，一个拥有 20 架飞机的轰炸机大队被消灭，其中包括总司令本人的座机。敌人龟缩在 cities，不敢再和红军部队遭遇。

① 此时第十军团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已经遭到失败。——编译者注

② 此处的数字是夸大的。——编译者注

③ 指中央红军的长征。——编译者注

④ 此处有误。红军消灭国民党军队十几个团的战斗是在遵义附近进行的。——编译者注

“瑞金事件”在这里又重复了一次。人所共知,红军在离开江西时,分为几个纵队先后撤走。各纵队严格按照总部的规定行动。红军的各军团已经退往福建和湖南,而南京军队未能识破红军指挥部的谋略,仍然继续在已经撤空的苏维埃中国首都瑞金四周布防,整整两个星期不敢入城。可见他们害怕红军部队到了何种程度!直到红军的军团穿越湖南全境进至贵州边界时,南京军队才看出了红军的计谋。这次又是如此。直到红军接近云南省边境而把蒋介石的“追击军”远远丢在后面时,南京军队才打开了贵阳的城门……

贵阳城下的胜利对于红军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那一仗中,我军虏获蒋介石被击溃各师的大量武器。在贵阳城下是两种战略、两种战术的交锋:革命的和资产阶级的。红军方面实施主要作战行动的是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白军方面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追击军”六个师。彭军团表现了卓越异常的机动能力、作战技巧和无畏精神。“追击军”的兵力超过彭军团三倍,更不谈敌方在技术装备上的优势,这些装备是三军团根本没有的。作战结果已为众所周知。“追击军”被击溃,残部被赶入贵阳城内,闭门不出。

在完成另一项重要任务时(保证红军主力从江西安全撤退和协助贺龙同志的二军团同肖克同志的六军团会合),三军团的机动作战也同样十分卓越。完成第一部分任务后,三军团在靠近湖南边界赣江一带承受了南京政府军队的全部突击。在那里,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巧妙用兵使敌军的八个师首尾不能相顾,并先后击溃了南京部队的三个师。

红军主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西康省全境(首先占领西康首府康定),到达四川省西部,进入新根据地境内。红军主力已完全接近预定的目的。此时,在陕西、甘肃两省和四川东北部活动的其他红军大部队也向新根据地开进,这一支军队集团由徐向前同志率

领,计拥有 10 万多名战士。其主要核心是四军团。^①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拟定的战略计划的最后一部分作战行动,看来应是徐向前集团与朱德、毛泽东的红军主力相会合。今后我们当注意观察,徐向前同志的军队集团将如何行动。

以四川、陕西边界苏区(宁羌、勉县、褒城、南江、朝天驿等县城)为基地加速进入四川的第一次行动,因受到胡宗南将军的陕西军队在徐向前同志集团后方的进攻而被阻止。四军团沿四川北部向四川首府成都迂回的行动被迫停止。为了彻底解除后顾之忧,四军团派出一个 4 万人的突击集团进攻 6 万人的胡宗南军队。交战在昭化城附近进行。胡宗南军队被击溃,残部退回陕西内地乃至甘肃一带。

击退胡宗南军队以后,四军团开始弥补损失的时间。该军团要克服的下一个障碍是四川大军阀邓锡侯将军的军队。红军予以有力的杀伤,邓锡侯向红军投降:他的相当一部分部队转向红四军团方面。另一个四川大军阀刘文辉将军的军队也重复了同样的过程。

1935 年 6 月中旬,由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红军主力与徐向前的四军团会合。中国红军两支大军的历史性会师是在距四川首府成都约一天行程的天全地区实现的。

中国红军所以能不断取得胜利,不仅仅是因为红军具有作战顽强和机动灵活的卓越素质。在整个大跨度的进军途中,劳动居民热烈欢迎红军战士,欢迎英勇的革命军队。红军部队所到之处,居民组织欢迎,向战士奉献面包和盐。在历史性进军途中,又有成万名新战士加入红军。

中国红军所承担的主要军事政治任务已经完成。目前,英勇军队的联合力量正在四川根据地开展一个新的作战线。蒋介石正

① 红军当时并无四军团的编制番号,此处实即是红军第四方面军。——编译者注

派出大批兵力向四川的两个大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前进。据资产阶级报刊报道，成都附近已集中了近 50 万国民党军队。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之间正面临着艰苦激烈的战斗。

(乌传袞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

随军西行见闻录*

(1935 年秋)

我国共产势力,年来伸张极速。朱毛、徐向前、贺龙、萧克等赤军,已成为中国的一强大力量。当赤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则成燎原之势。朱毛赤军原系民国 16 年国共分裂时朱德率领之叶挺、贺龙残部及毛泽东率领之湘赣农民军会合而成,南京及各省军队征剿已历八九载,但朱毛实力,有增无减。年来蒋委员长亲身督剿,步步筑碉,满拟一鼓歼灭之,不料朱毛早见及此,于去年 10 月中突围西走,由湘粤边而入黔,逗留于黔川滇三省一个时期,最后竟冒险突过金沙江、大渡河(此两河均为长江上游,河宽水急)而入川,与川北徐向前会合。现在中国两大赤军会合,声势大振,且军事重心,已由东南而移到西北,剿共军事,无论在作战上运输上皆大感困难,赤军活动愈难抑止矣。

记者向业医,服务于南京军者四年,前年随南京军 59 师于江西东黄陂之役,被俘于赤军。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赤区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押于赤军卫生部,赤军卫生部长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

* 这是陈云同志为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莫斯科写的一篇文章。为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署名“廉臣”,并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本文最早于 1936 年 3 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同年 7 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随后,在国内多次印刷发行。此次收入本书时,除作了个别文字、标点符号订正外,均保持原貌。

务,并称愿照 59 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 60 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赤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赤军中最高人物如朱、毛、林、彭及共党中央局等赤区要人,亦曾屡为诊病。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去年 10 月中旬,南京军已占兴国,赤军即突围西行,我也被携同走。这次行军,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除在黔北之遵义府休息十余日,以及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县地界休息五日以外,不分晴雨,终日行军,由江西而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而转入四川之理番、松潘。足迹几遍大江以南,历时八月余,约计行程一万二千里,历尽无数高山大川,而与徐向前会合。我以文弱之躯,经此磨折而今日还能生还,自庆更生。但同时自幸此生竟能走遍长江及珠江流域之各省,并且到了许多梦想不到的地方,亦足自豪。至本年 7 月上旬,我被卫生部长贺诚派往懋(功)宝(兴)游击大队当军医,出没于两县之山地。某日晨,川军来攻,我被川军冲散,身存之现洋二十余元均被民团搜去。后幸遇川军五旅之军医正蒋君系昔年同学,得其帮助,由天全、雅州、成都、重庆而搭轮回家。合家欢叙,几如梦中。

此次赤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赤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自 5 月到 9 月召集了赤军新兵将近 10 万人。当我与林何两医生(何亦系张辉瓒部之被俘者)于 8 月被派至军事工业

局(赤军各军需工厂之管理机关)卫生所时,见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工人,日夜作工,状极忙碌。以后,9月间在《红色中华》报(赤区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赤军有抛弃江西而到赤区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果然,10月中,全部队伍均行西走矣。朱毛破围之时,除在江西留有小部队外,朱毛率领退出江西之赤军人马兵仗,有8万多人。共党要人几全体随军。各县共党中下级干部之随军者甚多。并有妇女干部数十人,均腰悬短枪,脚穿草鞋随军出走。此辈娘子军,均系身体强壮,健步如飞者,常在卫生部招呼伤病兵。有时竟能充伕子抬伤病兵。

赤军分两路渡过信丰河后(一路由信丰北之王母渡,一路击退信丰东南之古陂、新田粤军),即在南康、大庾两县之间渡过章水,突过赣州、南雄之汽车路。在古陂、新田及赣雄汽车路上,粤军本筑有碉堡,并有守军,但寡不敌众,闻风逃逸。由此国军年来包围赣省赤军之第一道碉堡线,全被冲破。沿途碉堡,均被赤军及当地怨恨国军守碉兵士之平日强赎硬买之居民拆毁。碉堡系用以进攻及封锁赤军者,常筑于汽车路之两旁、重要路口及路旁之山巅。碉堡以石及砖造成,有方形或六角形不等;大小不一,有排堡、连堡及营堡。平日守军居于堡内,有步枪、机关枪之枪洞,可以向外射击。出入碉堡只有一小门,遇有赤军进攻,守碉兵士即闭门固守,向外射击。此种碉堡对赤军军事行动妨害甚大,故赤军须拆毁之;而守碉兵士平日对居民不守纪律,故赤军一至,居民亦起而拆毁碉堡。赤军一出封锁线,如虎添翼,即猛扑湘粤边之汝城(湘境)、城口(粤之仁化北),旋即占领城口,粤军之军用煤油几千箱及大批弹药均被赤军夺去。粤军在城口与湘南汝城、桂东相连之碉堡线(即国军第二道封锁线)即被突破,碉堡全被拆毁。此时,赤军锐不可当,中央军远在湘赣边,粤军只图自保,湘军则何能独力抵御,且早已闻风远走。故赤军未遇抵抗即占领宜章城,通过粤汉路之汽车线(此

为国军之第三道封锁线)照例拆毁碉堡,前锋即占领临武、嘉禾、蓝山。此时湘军李云杰部从宁远南下,拟在天堂圩附江拦截赤军,岂知在天堂圩反被赤军包围,全部击溃,狼狈北退,赤军又获枪弹不少,此时也,赤军势如破竹,分两路:一出道州,一出江华、永明,城市悉被占领,即全部渡过潇水。南京军及湘军此时跟踪追剿,已无能为力,仅派少数部队,尾随赤军监视。而薛岳、周浑元及湘军之大部集中湘江沿岸之零陵(湘境)、全州(桂境),命桂军集中灌阳、兴安。当时蒋委员长之计划,拟以大兵拦阻赤军渡江,并从北方驱逐赤军入桂,使赤军与桂军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利。但桂军李(宗仁)白(崇禧)深知此隐,故一方惧怕损失实力,同时并惧赤军不能过江则必然停留桂省或桂林附近活动,则薛周两纵队将尾随赤军之后,而深入广西,桂省大权将落南京政府之手,所以将兴安桂军向南撤退。薛周及湘军在全州单方出击,不能阻止赤军渡江。赤军渡过湘江,把沿湘江两岸汽车路上之碉堡拆毁(此为国军第四道封锁线)。赤军一出此四道封锁线,如虎出柙,可以东奔西突矣。微闻兴安桂军之撤退,系与赤军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南京政府蒋委员长几年来碉堡政策与剿共军事,全部付之东流矣。

赤军当时之喜悦,真是无以形容。赤军政治部印编一歌曲,系用中国马号进行曲旧谱,教赤军兵士唱,因此我所在之总卫生部之200多个看护生(都是十五六岁者),天天高唱入云。这一歌曲之调句是表示对赤军之喜悦和对于蒋委员长之碉堡政策的讥笑。歌词云:“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人民拥护真真多,红军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意即国军之碉堡),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赤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即如赤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朱毛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党之宣传甚深,故见赤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赤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

旁，观者如堵。而且湘南各县在几年前，朱毛在此活动时，已有居民加入赤军者。故此次赤军路过时，此辈赤军之家属，闻风早在路口探问其子侄还在赤军否。总卫生部之管理科长（如南京军之司务长）即为宜章之文明司人，当日路过文明司时，其老母在路边迎接。但队伍休息 15 分钟即前进。管理科长向卫生部之主任参谋（当时卫生部为一个梯队）告假两小时，回家一次。当日按时归队，又带了 11 个农民来当赤军，两个当伙子（一个伙子以后即与我挑行李），又携来家制极甜之白酒（以米制的，远优于江西所产）分给我等。

湖南农民之所以能接受共党宣传者，半由于共党之活动，半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平日欺压农民之故。昔年朱毛退出湘南时，当地土豪回乡以后，以搜共为名，敲榨农民，因此农民以冤报冤，甚之农民有如此痛恨者，据由管理科长代我招来之伙子云：“前几天我们街上早在传说红军要来了，我们村上前五年受那个李区长害的 30 余家，就秘密商量，暗中监视李区长的行动。前天早晨团防退出文明司时，这 30 余家百余男女即在离镇 20 余里之某村中，捉获李区长，当日上午 12 点钟即把李区长送到红军司令部，而且还领了一连红军上山搜出团防的长短枪 20 余支。现在这 30 余家有 51 个人都当红军了。”他又继续说：“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不说别的，像我这样当挑伙，每两天工钱就一元，而且先付 10 天工资安家。我家里那两个村子上前两天即有 88 个人去当红军挑伙了。”湘南农民之相信共党有如此之深，而且不是一处，在湘南以至全州附近渡过湘江时，所过城镇乡村，都是如此。至此而我更深叹剿共之不易矣。

赤军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赤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由于军队有纪律。朱毛赤军中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我已记不清），确使赤军兵士遵守。不说旁的，即如进延寿圩（湘南大镇）、

宜章城时，赤军所用苏维埃银行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这一点我在南京军中已服务多年，在乡僻之区行军或驻军时，均未见过。而且因为对于中央银行钞票之行使，过去各省门户之见特深，许多地方未设分行，当然不能兑现。故军队一到时，仅凭该军官长之一纸命令“按市通用”，而又无兑现机关，使商民对中央银行钞票反生疑虑。特别是兵士不守纪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印象。

还有一事为国民党及国军所无者，亦使我有深感者：赤军路过宜章时，在粤汉铁道（未筑成，现在只通汽车）上有修路工人四百余，内有几个共产党员，已秘密活动几年。且内中有一学生，亦为该党所派在修路工人中活动者。赤军来时，全数工人加入赤军。当我路过该处时，正见修路工人在持枪上操，赤军已派军官去训练，而该共党学生作修路工几年者已当政治委员（赤军营以上都有政治委员，职权甚大），正在向修路工人演讲。此事深深使我忆起，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各处民众响应，北伐军势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师。自国共分裂以后，像北伐时民众响应之事，已销声匿迹。反之，全国人心，大都失望。共党分子如此埋头苦干，而返视国民党员，则徒争名利，何曾见一个在东三省日本势力下埋头苦干的人！我深感共党自有其社会上根深蒂固之潜势力，剿共与消灭共党决难成功也。

赤军渡过湘江之后，已使当时薛周两军与桂军之迎头拦阻完全失败，而且尾追亦极困难。因为赤军渡过湘江以后，即上越城岭之西延山脉，山势连绵，追剿军无法包围。赤军之后卫节节抵抗，而赤军前锋即向湘黔边西进。

赤军之能够翻过越城岭之西延山脉，而且在此山高入迹稀少之区，未受损失者，确是赤军上至首领下至兵伏具有刻苦耐劳与其他各种优点，而这些都为国军所不及者。

西延山脉之高峰老山界，确为我十几年来第一次上过的高山。千家寺是在老山界的山脚下。我记得是一天的下午，总卫生部才抵千家寺，当时休息吃饭后，即上山。上了20里，到一小村子，只七八家人户。此时太阳西下，伏子、马伏均忙于找火把。过一下天黑了，队伍还是前进。可是因为队伍中有些人没有找到火把（因为人家少，找不到火把的材料），在黑夜里黑摸，走得慢得很。我在第六连的先头走，简直是走一步停一下，走一步停一下。天气又冷，风又大，山又高，山下的泉水的流水声如万马奔腾。人又疲倦，可是不敢合眼，因为路太狭了，只有一海关尺阔的路。有一个看护生在行军时，因为天黑未找火把，再加上睡眼朦胧地走着，忽然一失足滚入水沟里去了。当时就命传令兵执了火把，慢慢地拉住树根攀到水沟里，可是那个看护生已经跌得不只满身泥水，而且不能言语了。这就警惕了各人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走着，因为走得慢，即使下午预备了火把的人，也已经把两三个火把烧光了，以后简直前后看不见火把了，只有稀稀地看见几个马灯的灯光在走动。队伍越走越慢了。走几步，停五分十分钟，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时间已经是次晨两点钟了，前面顺次序地传下了司令员的口头命令：“各连队随地靠路旁露营。各连火伏到前面煮饭。”同时大家又顺次序地喊：“向后传……”实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湿是干的，大家就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下把被单往身上一盖就睡。人生再没有比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睡得舒服的，不要两分钟已经鼻息呼呼地入睡乡了。

次晨天尚未明，吹号，起身，吃饭，并且各人还带了午饭。据当地居民说，此地到唐庄还有60里，而上山还有40里。

山实在太耸了，因此队伍走不快。的确空身上山还要脚酸气喘，而那些伏子还要挑上35斤的担子，真是不容易。

在我们总卫生部先头走的是赤军总政治部，而苏维埃中央政府之要人林祖涵、徐特立等亦均与总政治部同一行列，故我时与林

徐路遇。当日上老山界时,我见林徐两人亦正步行上山。林祖涵为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曾与孙中山共事,创办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北伐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在赤区所有财政均出其一手计划。林年将五十,白发童颜,身体甚健,在八月余的行军中,林只骑 18 天马,经常步行。徐特立为教育部副部长,年逾五十。赤军离江西时,徐本有一马,但半途因知伤兵缺乏驴马,徐竟转送给卫生部之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此林徐两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诚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拟也。

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浹背。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一张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的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 25 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我们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们队伍内的那些小看护生也唱起来了:“……骂一声×××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这样一唱,又到处引起唱着:“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唱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照着路向上走,这样走了共有 12 个高峰,才到山顶。当然到了山之最高顶,大家就兴高采烈,精神也兴奋了。时间已经下午四时了,但是 80 里路的高山,终于走到了山顶。

从山顶到唐庄,名为 20 里,实则将近 35 里,所以大家又走了一节黑路,当晚就到唐庄宿营。

80 里路的老山界,比之后来赤军所过的高山看来当然不算高。但是赤军在高山上两天两晚的不断地行军,而没有多少掉队

落伍的兵伙(卫生部的病员都到齐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实在是由于赤军中兵伙的团结,同时在山上行军中,赤军政治部能设法以减少行军疲劳及提起行军精神,如用宣传棚等等,这确是他们设想得周到。

赤军在西延山脉周围遭遇了极多困难。最重要困难之一,就是赤军每到一处,全村全镇房屋,粮食统统烧了。究竟是谁烧的呢?开始老百姓传说是赤军烧的,但是事实上我不能完全相信,因为许多镇市在赤军未到前已在火烧了,这样难道是赤军自造困难吗?把房屋、粮食统统烧光,岂非使赤军自己无处住无处吃吗?后来这个事情水落石出了。当赤军驻广南寨(广西龙胜县之西北)时,我们总卫生部于次晨集合于广南寨镇外田野间而快将出发时,忽见镇内三处房屋同时起火,显系有人放火。总卫生部司令员贺诚即下令警备连回镇搜索,忽然捉到七八个穿赤军军装的放火人来。一问他们,都是广西口音,就供出他们是龙胜县政府所派,专烧民房,每日得大洋两元,作用在一方使赤军无处住,不得食,一方则引起居民对于赤军之怀恨。一询其何处得来军衣,均说县政府捉获赤军之掉队落伍兵伙,杀之而剥去其军服,即由所派之放火人穿上赤军军服,冒充赤军。放火之后,使居民愤恨赤军。这几个人已放火烧了好几个镇市了。他们穿上赤军军衣,冒充有病而掉伍者,天天随在赤军队伍后面走,或者冒充赤军之侦察队,在赤军将来时,先放火烧屋。

总卫生部长贺诚当然不是一个笨人。他听了他们如此说后,即传令部队大家去救火。救熄后,召集全镇居民来开会,当场要这放火的冒充赤军的七八人在居民面前自供。结果,几百居民立刻动手,把这七八人一顿拳足,打得那几个人气都快没有了。贺诚忽然又劝止说:“这是广西军阀官僚一方面诬害红军;一方面是残酷地使你们年终的时候,弄得无家可归。红军是帮助百姓的,我们帮助你们救火。现在你们太可怜了,哪家房子被烧的,红军愿把没收

土豪的洋钱救济你们。大家到那边去领。这几个放火的人，大家愿意怎样办呢？”一经贺诚的演说，数百居民众口一声要求枪毙这七八个人。结果把这七八个人拖到镇外去了，大家跟着去，一会儿又回来在一个空场角上的桌子上领洋钱。忽一会就有五六十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到贺诚面前说：“我们要当红军。”结果就有一百多人连续地写上名字当红军了。

我于此事深深感觉，桂军领袖白崇禧氏，虽有小诸葛之称，但派人纵火以嫁祸于赤军之举，终属太惨，且也不智。如广南寨之事，岂非反增居民对于地方当局之恶感而助赤军以取得民心乎！

赤军由广南寨西北进，即为两河口与牛皮山，地处桂湘交界，由此下山西通湘之通道，北通绥宁，南通三江。当时薛周两纵队及湘军大部集中于城步、绥宁、靖县、会同等县以阻赤军北上与贺龙、萧克之赤军会合。桂军以一部扼于桂湘边以阻赤军南下，并以一部尾追赤军。当时赤军前锋已占通道县，即避实就虚而径趋贵州之黎平府。

贵州东部与北部之守军为侯之担部两个师。侯之担本为贵州三首领之一(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兵力虽号称两师，但枪弹均系其赤水兵工厂所土造，且无新式武器。这样兵力，如何能当朱毛赤军，故赤军分路连占锦屏、柳霁、剑河、台拱，而入镇远占领通贵阳之汽车线。侯之担部可怜连战连败，直败至乌江边。王家烈部此时在新黄平扼守，但亦被赤军击败，弃城而走。此时赤军即完全占领镇远、施秉、黄平。

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兰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贵州居民之贫苦真是远非我等居住于江浙十里洋场者所能想

象。做庄稼的(农民)冬穿单衣,且无完整者。每人有一件已补缝千百次的“家常衣”,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当我等行军经过时,立于路边之小孩,正在发抖。而居民唯一御冬之物,即为“烤火”。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个贫穷的地域中,煤炭却到处可得。上海卖30余元一吨之无烟煤,那里只要1吊钱,而且1元大洋要兑20余吊。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贵州东部各县之苗家甚多。过去我见《东方杂志》或其他游记上所载苗家之照片及村落,此次则亲睹苗家而且住于苗家。苗民自称苗家,称汉人为汉家。汉人向来欺侮苗家,故苗汉之间时相械斗。此处苗家身穿汉服,女装如清末民初之阔边长衣大袖之服装。苗语则与汉语全不相同。惟一般苗民皆能汉语,苗家好武,常身携利刃。在黔东之苗家已与汉人相处甚久,除城市外四处都住苗家,间有汉人同住者。苗家之房屋系用木板制成,上覆草或松树皮,屋之周围用木编之篱绕一圈。苗家食物为玉黍,但间有白米者。惟苗家无存米,只储谷子于树杈上所筑之谷仓内,每天吃米,每天打谷子。

赤军一入贵州,更尽力在汉民、苗民中活动。赤军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对贵州军阀压迫苗家等之宣传取得苗家之拥护,并鼓动苗家、汉人到当地平日压迫汉苗贫民之区公所长等的家里,把财物谷子散给汉苗民。间有缴获民团枪支者,亦发给苗家,武装苗民。赤军时时防备不使引起与苗家的冲突,而且处处给苗家以利益。如赤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绝对

遵守纪律,并叫赤军兵士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

贵州之一般贫苦汉人与苗家,确受赤军之宣传甚大。当萧克由湘边转入湘西时,亦由此经过,亦给当地汉苗居民以好感。故朱毛赤军一至,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赤军者,并有时询问赤军何时“安民”者。赤军因有汉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贫瘠之区未受饥饿。

贵州汉苗贫民之所以接受赤军之宣传者,不仅因赤军之活动的结果,亦由贵州当地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造成。贵州人民受军阀之压迫,亦非江浙人士所能想象。军队则抽丁、苛捐杂税、勒种烟苗,使农民之生活,终年辛勤而不得一饱。此次赤军入黔,侯之担已勒收过两次“剿赤捐”。军队既不能卫民而反是害民,此实为共党取得人心之一大助力也。

一入贵州,除见居民之贫困而外,尚有三事,为长江流域所未见者,即是:一为鸦片满地;一为天天下一丝丝的毛毛雨;一为处处是高山峻岭,找不到如湘赣两省之平地,更说不上江浙之平原矣。所以地图上有形容贵州地方情形之言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确符事实。入黔两月,未尝连晴三天。

乌江战役为赤军入黔以来第一次激战。当时侯之担部扼守乌江北岸,赤军则占余庆、瓮安两城,向乌江边之猴场前进。猴场为黔北四大场之一,商业极盛。我至猴场时赤军已占三日矣。此时正值阳历新年,到处布满赤军之布告与标语。赤军中每人发过年费,商店及小贩莫不利市三倍。此处居民多能道“萧军长”(即赤军萧克部)经过猴场之情形者。此时因为赤军驱逐乌江北岸之侯部尚未成功,故后方部队在猴场停止。第二日见一老者携一病者至,询之则称赣之莲花人,系萧克部赤军过此时所留养居民家中之病兵,现在病将愈,愿随朱毛赤军去。后将此人送给司令部去。此事亦使我感觉赤军兵士之深受共党之训练与对共党信仰之深。

第三日部队都向乌江边之江界河前进。一至江边,则深叹乌

江确为军事上的天险。河之两岸，均为高山绝壁，河面之宽，远过湘江，水流之急，为一秒钟三米特之流速。赤军以竹子架一浮桥，不用一船，人行其上，不能负重，而每人行列须隔一米特。赤军夺获一船，用以载渡无线电机械及马匹者。我等走上竹子浮桥时，见两旁水流甚急，心甚惴惴。渡过河之北岸，即上高山。山上险要处，侯部所筑之工事，累累在目。

乌江战役中有赤军之伤兵七名及黔军之伤兵两名，均由总卫生部之担架队抬着。我为之治伤时，询及一轻伤者，据云乌江战役之经过如下：

侯部在河北工事中扼守时，赤军于拂晓时依树木竹林之隐蔽而接近江边。赤军当即以机枪、迫击炮攻击对岸侯部，侯部立即还击。但侯部之手提机枪及花机关都系赤水兵工厂所土造者，射力不远，不能达南岸，所以赤军做好了几个以竹捆成之竹排子后，即冲下河边。以工兵连之一部及步兵连之一部架竹排强渡过河。但水流太急，第一次之两个竹排子全被水流冲入下游。但赤军并不因此气馁，又有六七个竹排一齐过河。这次有六个排子达到北岸，赤军即一跃登岸，驱逐河边工事内之侯部而占领其工事。侯部即退守半山之工事，同时向下射击。此时也，赤军坚守河边工事，河之南岸继续放竹排载赤军过河。三小时后，赤军以奇兵由上游十二里处偷渡一团人，向下游之侯部侧击，并抄袭侯部之后。这样侯部一部被缴枪，一部突围而向团溪、遵义退走。赤军则一方架桥，一方追击。指挥乌江战役之红军军官为刘伯承，四川有名之军官，曾击败吴佩孚，并为四川军队中极有声威者。在川时已加入共党。国共分裂后，曾领导四川军队于泸州起事。

赤军渡过乌江之后，侯之担残部已无抵抗能力。故赤军于占团溪后乘胜直追，在两百里路中节节追击，不停留地攻击前进，终于在第三日上午三时占领遵义城。同时赤军右路即占湄潭、绥阳，中路占桐梓城与川黔边之松坎场，击败川军廖泽旅，大有乘胜入重

庆的形势。当时重庆富豪顿现不安,川省汇款至上海之汇水,增至70%。人心不安,可见一斑。但赤军消灭侯部后,并未前进,在遵义、桐梓、湄潭、绥阳休养兵力。

此次赤军入黔北后,确使赤军得到极大之收获。

收获之一:赤军击败侯之担两师,大部枪弹多被赤军缴去,赤军武器弹药因此得以补充。赤军以此而击败二进遵义时之王家烈之两师与南京追剿军薛岳之两师。此种小军阀在剿赤声中不知淘汰几多。平日鱼肉人民,一旦有事,则兵败师丧,而以枪弹济赤军,故赤军称南京及各省军队之长官为输送队长,称蒋委员长为输送总指挥。诚属刻薄之至。

赤军收获之二:使赤军在黔北休养12天。而这12天的休息,使赤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乏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

当时赤军之所以能得休息12天者,由于南京进剿军薛周两部急急进贵阳城,争夺贵阳地盘,不愿向赤军攻击,深惧牺牲自己实力。然而侯之担、王家烈等小军阀之命运则均至末路矣。薛岳用彼等以当赤军之锋,借赤军之力以除其实力,结果王家烈、侯之担实力一完,不是枪毙,就是下野。南京军此种办法,莫怪各省当局均有飞鸟尽良弓藏之叹,大有畏南京军甚于畏赤军之慨。因赤军只在乡僻之区,而南京军名正言顺,则可以取其地盘,驱之以御赤军,而使其实力丧失也。惟此种情形,亦是俗语所云:“斧头吃凿子,凿子吃木头。”薛岳之被命为追剿部队,亦非薛岳所愿也。

赤军收获之三:莫大于收获人心。因赤军在黔东之纪律较侯之担部好得多,此事已风传黔省。因此遵义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赤军,旗上高书欢迎苏维埃政府毛主席、欢迎红军总司令朱德。朱毛两赤军首领竟在欢迎声与爆竹声中进入遵义城,在城门口空场上与欢迎代表一一握手后,即略略与欢迎之民众讲一些话,并表示感谢

欢迎，赤军愿为黔民解除痛苦。

赤军于第三天在第三中学操场开民众大会，朱毛亲自出席，工农、学生、商民被宣传而执旗参加大会者将万人。朱德大讲其赤军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说赤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毛泽东则大讲其苏维埃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全民选举及主张抗日等等。

赤军这种宣传，影响黔省人心极大。赤军在这个大会上成立革命委员会，并真有几个学生、工农、商民当选并演讲，且内有教育界分子。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不几日就成立了几百人的抗捐队，自动去清查贪官污吏，没收其财产，当场鸣锣聚众散发。贫民之集在县公署（驻总政治部）天井中等发“土豪衣服”者何止千数。

赤军一方宣传，一方招募赤军新兵。12天中确有四五千加入赤军。此辈均系川黔滇籍之贫民或退伍者，对于川黔滇之地方情形均熟悉。此辈加入赤军，对于赤军有莫大之作用。以后朱毛之能转战于黔北者，此辈出力甚大也。

赤军办事之敏捷，我在国军中亦未见者。赤军进遵义城后第二日，被服厂、修械所、粮秣厂均已开办。新兵之军装不久即发出，旧枪即修理完竣。

总卫生部所有之伤病兵约300余人，在此休息期中，有十分之八医愈出院。赤军总司令朱德曾亲至总卫生部之病房，慰问伤病兵，与参加乌江战役之赤军受伤兵士谈话半小时。当时有乌江战役中侯之担部之伤兵二名为总卫生部收容而为其医治者，朱德亦略与其谈话，嘱他们安心静养。

我以驻军有暇，曾步游遵义全城。遵义地处黔北要冲，有汽车路北通川边之松坎场，自遵义向南，越乌江而直达贵阳。遵义为黔省通川重庆之要埠，因地处川边，故风俗习惯及商业情形，均与川省有密切关系。遵义城有新旧两城，新城为商业集中之区，旧城为官署与住宅区域。两城之间有小河，中贯以石桥。城中官署庙宇，

当时悉被赤军驻满。据闻黔军柏辉章师长之公馆(在旧城)驻有赤军总司令部,朱毛即驻于此。遵义全城有男女中学校五六所,赤军对于学校机关不驻兵,以示维护教育,但各校均未上课。惟赤军对于青年学生曾特殊注意,派人组织抗日救国会及赤军之友社等等。所以赤军进城之第一日即有几十男女学生,大部为中等学校学生,执旗在街上演讲,为赤军演说。当我步至县立三中时,见操场上有该校学生之篮球队与赤军篮球队正在比赛。赤军球艺甚精,因平日提倡体育甚力。赤军想尽方法鼓动青年学子,由此亦可见赤军对于青年学子之注意焉。

尤有一事可记者:当赤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李小侠者,年约二十,同情赤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为当地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当赤军退出遵义时,李小侠亦随红军而去。闻黔军进入遵义以后,李小侠之家属有70岁之祖母,并有父母及一弟,均为王家烈氏枪杀。待红军二进遵义城时,李小侠已不能再见其全家矣。因此李小侠活动益积极。后闻赤军逼近贵阳时,李曾单身混入贵阳城中进行密谋。以后此黔北女将不知还在否。

当我步行遵义全城时,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空;二为书店,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遵城酒肆中颇饶川菜滋味,我亦同二三人去过一次,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均饶川味,且价极廉。

赤军在遵义时,所以商店照常营业者,系因赤军之苏维埃纸票按日均兑现。赤军没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经营之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订购之白金龙香烟值5万元,准备旧历年节以慰薛岳军队者,均被赤军截获没收。赤军除此盐及香烟一部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出售。每赤军钞

洋一元可买盐七斤，可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价值远贱于平昔。故赤军以盐及香烟两项收入之现洋兑付纸钞也。

赤军在黔北休息 12 天后，即全部经桐梓、习水而由土城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前进。

桐梓县为黔北入川的门户，县城不大，自南至北只一里余，但有一特点，足使我永远不忘者，桐梓城为贵州历年来该省军政领袖之家乡，故有美丽堂皇之洋楼数十座。这些洋房，都属贵州历年来之军政要人的。而在洋房之旁则有无数鄙陋之草屋。军政要人之前门有汽车，可以来往于遵义及川边，而贫民则背负背斗（云贵川几省运夫及小贩，不用肩挑而用背斗），终年辛劳而不得饱。贫富之分，宛然如画。

自桐梓经良村至赤水县之土城，均系大路，地势均向上，间有几段筑有汽车路基。但此种汽车路，确为中国最难行之汽车路。我经过时，正值下雪，故路上湿而且滑，行路之难莫基于此。当我上桐梓西门外之高山时，见赤军领袖毛泽东正手提竹杖步行上山，两脚污泥及膝，且满身沾泥，恐系路滑跌于污泥中所致。

赤军由土城、太平渡两镇架浮桥渡过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前进，此即由贵州而入四川省矣。以后经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赤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河隘为最险要。由两河隘进威信县为 30 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历尽无数困难，而到达云南之威信县（旧名扎西，在滇黔边）。部队达到威信之时，正系旧历正月初三。即在该县休息一天。但气候严寒，夜间降雪。

云南之民族问题，值得注意者，龙云为彝家，云南军队与政府中上级官员，都属彝家，汉人则受压迫。故赤军未到威信时，在某一乡村中，曾有北京大学毕业而曾任云南某县县长者，晤赤军首领，愿率当地民团并可号召各县民团助赤军进攻云南，为汉人解除

压迫。赤军在此区域时,以各民族解放为口号,以取得汉回苗各民族的同情。以后,赤军曾以罗炳辉(云南人,久在云南军队中服务,曾属朱培德部下。早为秘密共产党员。在江西吉安为兵团指挥时,率几百兵团加入赤军)的九军团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震动全滇。滇民盛传赤军有一苗民籍之罗军长要回滇驱逐龙云。罗之声名,亦以大振。但赤军虽反对龙云彝家压迫汉回苗民,同时却对一般彝民,则以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民族主义等等进行宣传。

赤军原定计划本拟由威信继续西进,渡过牛栏江而入川。但在威信休息一天之后,忽然又向东回,恐系当时局势不能过江,故不冒险。但赤军之忽然折回黔北,确出川黔军队意料之外。川军本在北面与赤军并行向西追击,以便迅速驰赴江边扼阻。而赤军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东,待川军发觉而折回时,赤军已渡赤水河而占桐梓、娄山关。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赤军重回黔北之桐梓、遵义,曾打一大胜仗,此为赤军自江西突围以来有数之胜仗。此仗似出赤军极有计划之行动。当赤军占领桐梓之日,即整备野战医院,我被贺诚派往野战医院收容伤兵。当日下午赤军在娄山关即与由遵义向娄山关攻击前进之王家烈部两师人接触。王部几次仰攻娄山关,均为赤军守军击退。赤军则派大部由两翼包抄王军之后,攻战王军之后之遵桐马路上之板桥镇,截断王军归路。而当时娄山关之赤军亦居高临下进攻王军,王军不支,四方包围,两师人大部缴枪,小部溃散。赤军则猛烈追击,当夜三时占领遵义新旧两城。闻王家烈出走时只率师长柏辉章等随从数人。此仗实使王家烈倾家荡产,不久即出黔游历而作下野客矣。

当时野战医院即随军进遵义城,但次晨又开始大战。进攻赤

军之军队系薛岳所部由吴奇伟率领之两师人，自贵阳北进，渡过乌江后，本拟增援王部，不意王部失败如此之快。至烂板凳（离遵义城约 60 里）时，王氏率随从退下与吴军遇，备告失利情形，吴氏即急趋遵城。在遵城南之十里铺以外（离遵义城约 20 里），与赤军彭德怀之三军团接触。彭德怀亲在火线上指挥。在接战后一小时，彭德怀即断言当日下午吴部两师可大部缴械。未几林彪率领之一军团由捷径迂回至吴军之后。当日上午 12 时，吴军两师即陷入赤军四面包围。四周有利阵地，均为赤军夺去。吴氏见势不佳，拟即撤退。但赤军愈逼愈近，缴枪之声四起。大部已被缴枪，吴即拼命率领两团突破南面赤军包围线，由汽车路上向乌江撤退。幸乌江浮桥未撤，故吴氏等即得渡河。但赤军勇悍异常，一部由汽车路上向南尾追吴军，一部即由左翼山路急行军赶到乌江边。此种急行军亦为赤军之特长，综计夜行军在山路上八小时走了 100 里。当赶到乌江边时，吴氏本人早已过河，但所部尚有 1800 余人正在渡河。吴氏见赤军到，恐乌江浮桥被占，而乘势进迫贵阳，故下令立即在江南斩断浮桥之保险索，桥即为急流冲断，赤军不得过江，但在乌江北岸之 1800 余人，均被缴枪。闻吴军全部辎重都在江北尽为赤军所得。此仗之后，遵义城中布满了赤军与黔军、南京军之被俘缴枪者。此项俘兵，赤军特为之组织新编师，每人发缴枪费三元，专派共党人员进行宣传。后闻被俘官兵有十分之八被鼓动加入赤军，不愿当赤军者，每人发路费送出赤军警戒线。赤军对被俘之中上级官长，亦由朱德亲自召集谈话，多方安慰，说明赤军主张抗日救国，希望全国军人一致合作，被俘军官之愿留赤军者留在赤军，不愿者就给川资送出赤军区域。此种办法确为赤军新办法，故一般被释之官长，殊有死里逃生之感。

赤军这一胜仗，确使南京军及川滇黔湘各省军阀为之震动。薛岳、周浑元以川军不能冒险前进，须重新布置。湘军则由围攻贺龙、萧克之部队抽调几师，扼守乌江东岸。据以后赤军之捷报云，

贺龙、萧克之部队亦由此而将湘军陈渠珍旅全部缴枪。自遵义赤军获胜之后，赤军兵士及下级官长都愿与薛岳、周浑元部打仗，自谓：川滇黔军队之武器不足，缴之无味，与南京军作战，则有新式武器与充足之弹药可缴。骄傲气概，可见一斑。

赤军此次所以能连胜王家烈部与吴奇伟部之原因，一方面因赤军之有顽强作战之能力，而且赤军兵心之团结一致。当犹国才二进桐梓城时，赤军政治部所派之地方工作团中有一儿童局书记（即专在儿童中活动者），年仅13岁，由江西随军来，当时被犹军截断于娄山关附近之高山上，与赤军失去联络。但此13岁之童子毫不惧怕及失望，竟日夜爬山，走了两天三夜，终与赤军会合。闻此童子在行路口渴而找不到一点水饮时，实在口渴不能耐，曾以自己之小便盛之于口杯中而饮之，以解口渴。此诚趣事，亦可见赤军团结之坚矣。同时其中另一原因，因赤军中有大部黔省新兵。此辈在未当赤军时，愤恨黔省当局之苛捐杂税，使之生活不安，故作战时据赤军云新兵极勇敢。且此辈新来之黔籍赤军均熟道路，几次带领赤军由捷径包抄王军及吴军之后，包围王吴两军而缴枪。故赤军沿途打仗，非但未有极大减员，而且能到处熟知地理者，正由于赤军每到一地，即鼓动当地居民加入赤军，而在作战时，则得此辈之助也。

赤军在遵义战役胜利之后，驻重兵于鸭溪（在遵城西南60里），几次想引诱薛周两军及川军决战。但薛周两部及川军郭勋祺、廖泽、潘佐等部均小心异常，不轻易进攻。故虽赤军几次在赤水河两岸引诱决战，薛周两军均不前进。只小心地建筑碉堡。赤军见黔北无计可施，即急行军乘隙偷过乌江，拟向南威胁贵阳。此时贵阳确大为震动，后我到上海时，见当时报载有贵阳飞机场被赤军占领、飞机20余架被毁等事。

以我猜测，赤军南渡乌江，即思入川。但赤军则故向东，佯攻瓮安、黄平，待南京军东向及滇军出滇而向贵阳时。赤军忽然向西

南插入贵阳，竟由贵阳与龙里之间通过，以佯攻贵阳姿势，而以主力占领定番、长寨、紫云、贞丰、安龙、兴义等各县城，并渡过北盘江。赤军此种狡狴之机动，确出蒋委员长意料之外，而当时滇军四旅已入黔，赤军反得乘空入滇，毫无阻碍。南京军、川军、黔军、滇军，均落于赤军之后。故赤军得一路无阻，到处缴少数滇军之枪械，占领滇中许多城市，截断昆明通黔之几条汽车路，而得从容渡过金沙江。

赤军入滇后，有两件有趣的事，亦为赤军兵士平日引为笑谈者：

一为赤军包围曲靖而向马龙前进时，截得由昆明来之薛岳副官所乘汽车一辆，内满载军用地图并云南著名之白药（可医枪伤，极贵重）。据被俘之副官云，他系由薛岳派入滇省谒龙云者。前日薛岳来电，因无云南军用地图，请龙云送去。龙云接电之后，本拟派飞机送去，但次日机师忽病，故改用汽车送去。但未知曲靖已被赤军包围，汽车路亦被截断。龙云并送薛大批白药、云南之宣威火腿及普洱名茶，共满载一车。车离曲靖 20 里时正遇赤军。因此卫兵、副官均被缴枪，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赤军用以渡过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赤军享受。故赤军兵士每谈至此，皆为捧腹。咸谓三国时刘备入川系由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川，则有龙云献地图。

另一事则为赤军进嵩明城及官渡时，皆由县长及当地军警各界领袖迎入。原因并非此辈通赤。盖云南地处中国西南，年来虽知湘鄂赣川等省赤军活动之消息，但官场布告向称赤军为“赤匪”，而云南人心目中之“匪”均系衣衫褴褛，困苦不堪，并无新式武器，而且抢劫居民者。彼等见赤军临该地时，既未沿途抢劫，而且纪律甚好，买卖公平，钞票兑现，并且服装整齐，有许多新式武器，为云南军队所未见者。此辈地方官绅自以为此必是南京军，因纪律、军容远优滇军，此非南京军而谁？因此排队欢迎，且将省府命办之军

米、军款全数交出，并募几百伙子与大批向导以供“南京军”。赤军亦将计就计自认“南京军”，将一切军需及伙役接收后，并应地方之盛宴。席间，由该县长一一介绍，谁为县长，谁为局长，谁为民团指挥，谁为绅士。一一介绍之后，各地方领袖并请此“南京军”长官训话。赤军领袖即席起立，口呼“同志们！”即在此时赤军伙兵四出，立即将地方领袖监视矣。赤军官长当即宣布：“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南京军，而是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此时地方领袖早已相顾失色。但赤军并未与地方领袖为难，即好言安慰而去。

当时赤军立即召集由地方交来之几百伙子、向导开会，即席宣布他们不是南京军而是赤军，并询问伙子是出钱雇来抑系强迫派来当兵差者。众伙子异口同声均称被强迫派来，并言概无工资，家中妻小亦将因本人出外而饿死。赤军当即宣布：“云南军阀官僚如何使你们吃苦，红军现决全部放你们回家；但如有人愿留为红军伙子者，每日工资五角大洋，先付半月工资安家。”当时十分之九以上之伙子及向导均愿被赤军雇用，只有十余人则要求回家，当由赤军发给每人一元之路费回家。

我自经滇省以后，对滇省有极好之感想，先是赤军中，常以为滇省为中国西部高原，必系高山峻岭，道路难行，气候恶劣，物产不丰，不意自入滇省以后，虽觉云南之地势甚高，但在滇东北有很大的平原。自黔入滇，地势虽系向上，但此处地势，绝非黔省可比，而与赣省入湘南之地势相似。在向滇省前进时，虽面前有许多高山，但一到山巅，则并不是下山，而是一片平原。以后走完平原，前面又是高山。上山之后，又是平原。地势层层向上，且每一县城及镇市周围又有几十里几百里之平原，俗称昆明坝子、大理坝子、曲靖坝子等等。坝子者即县城周围之平地也。因云南之道路平坦，兼以道路甚宽，可行北方之骡车，在交通事业之开展上又觉便利，如修汽车路则较黔省之凿山开路容易多矣，故云南汽车路发展甚早。

云南气候甚佳，远非贵州之“天无三日晴”可比。昆明附近气候温和，正如江浙。我等经过曲靖附近时，即已不能穿棉衣。惟每天气候之变化甚大，时至下午四五时，常有巨风及阵雨，气候亦较寒。

因云南之气候好，所以物产甚丰。曲靖、马龙以及滇东北产米甚多，且有棉花。惟全国闻名之云南鸦片烟，确是遍地种植。云南鸦片之所以贵于黔川几省者，系云南鸦片所结之果实如拳，较大于川黔所出者。惟鸦片在云南亦极便宜。在马龙、嵩明，每现洋一元可购云土半斤。我常笑谓江浙之瘾君子闻云土如此便宜，岂不将口涎欲滴乎。

滇省居民最多者为汉人，其次为苗家、彝家、回民。而现在彝家则为统治云南者，故彝家一般之生活亦较富裕。乡间之村长、区长，在某些区域中，以彝家为多。我等在官渡经过时，有几十里路都系回民所居。风俗习惯，亦如江浙之回民，有清真教堂。赤军之五军团中亦有不少甘肃之回民，故与回民感情极好。赤军亦极尊重回民之教堂。赤军领袖朱德曾亲至清真教堂与其教民首领谈话。次日教堂以赤军与回民之感情甚好，且排队欢送，并有几十回民加入赤军。此辈回民加入赤军之后，赤军为之单独成立回民队伍，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悉照回民原有习惯。

在昆明附近，我常见居民之年 30 岁以上者，多数在颈间（即喉部）生一瘤，男女均然。据云居民中十之七八均生瘤，此系泉水缺乏碘质所致，并有一个山上之泉水不能饮，饮之喉部即烂，故赤军经此山时，均未饮水。

云南不仅在气候上、物产上、地形上均对我之印象甚佳，而且云南在政治地位上有过讨袁之云南起义，拥护共和政体，有过光荣之历史。

赤军入滇目的本在渡过金沙江，故即分兵两路入滇：主力则占沾益、马龙、寻甸、嵩明而直逼昆明；而其另一路则先在滇黔边吸引

黔滇军,曾击败犹国才之五团,缴获甚多,乘胜入滇占宣威、东川两府,后直趋巧家县而渡过金沙江。赤军之生力逼近昆明时,昆明及全省震动。但赤军目的并不在占昆明,而是引诱滇军不向金沙江边而急援昆明。同时赤军原定在交西渡口渡过金沙江,但为迷惑追军而故意西占禄劝、武定,更西进而占元谋,由元谋北上至龙街佯作渡河。这一调虎离山之计,追军确又上一大当。周浑元、滇军、湘军将全部进剿部队,均趋元谋,而赤军却全部在交西渡全无障碍地渡过金沙江。龙街之佯渡部队,亦由捷径赶回交西渡。赤军在金沙江边计渡九天九夜。而追军则直至赤军渡过金沙江占领通安州、直逼会理州城下时,才知赤军已由交西渡渡河。待追剿部队折回交西渡,则赤军早已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早将船只破坏矣。故赤军安然渡了九天九夜,周浑元之追兵在第11天下午才接近江边,但船只已毁,且江北山洞内有赤军扼守,不能接近河边,徒呼负负而已。赤军此计一成,赤军士兵均极快乐。在第五军团的政治部机关报上,编出一出新剧,名为《破草鞋》,形容蒋委员长自江西起追剿红军几省,历时半年以上,对赤军追剿毫无所获,只在赤军之后尾随,拾得少许赤军穿烂而抛弃之“破草鞋”而已。当时赤军傲慢之精神,亦可见一斑矣。

赤军之渡金沙江为自离江西以来,最险要亦最得意之事。渡河情形,我见上海及各地报纸所载者,不确也不详。我曾亲自渡过金沙江,我亦觉此事为平生一大幸事,使我永远不能忘却者。

金沙江为扬子江之上游,发源于青海,在西康、云南省境者,均称金沙江,再下流而至四川之宜宾(即叙府)称扬子江。金沙江之两岸,均为高山峻岭,除几个渡口外,均为悬崖绝壁。自云南省走向金沙江时,离江60里处,即为下坡。连下40里而至交西渡,由交西渡到江边为20里,路上的山峰嵯峨,千奇百怪,状甚可怕。夕阳西照时,山峰照耀如黄金。自交西渡至江边则山势更陡,下山必用手杖,否则有滚下山沟之危险。而且这20里中在当时天气(阳

历四月底)已极炎热。20里中几无草木,愈下山,愈觉热。一到江边,天气更热,赤军士兵莫不痛饮冷水。江边居民只五六家,系平日借渡船为生者,因春夏天气炎热及秋冬气候严寒,故均凿山洞而居。相传三国时诸葛武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即系此处。《三国志》上并云江边气候极热,马岱过水之2000人,中水毒死了1500人,或真有其事也。

金沙江之北岸有船夫六七家,并设有关卡。川滇两省之货物来往,均须在此纳税。闻云南著名之鸦片——云土过江以后,即价高两倍。居民自称江北岸为四川,江南岸为云南。我渡江时,船之两旁所坐之人数不均,且有立于船中者,船就倾折于北面,船夫则大呼“先生!背靠云南”,意即叫立于船中之人,坐于船之南边,面向四川而背靠云南,以免船之倾斜。南岸之泊船处为沙滩,北岸都系悬崖,悬崖内凿一将近一百米特之孔道,并有山窗洞,船到北岸即泊于悬崖内之孔道口。渡客即由孔道内走入东边半山之关卡。我等渡河时,水还未涨,故江水尚距孔道口二丈余。有石级直上孔道。

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特。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而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我渡过之时正值怪风骤起,沙滩上之沙土,随风飞舞,河边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风吹去。我站立路中,忽来一阵巨风,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上,因此我等莫不叹金沙江风威之大。但半小时后,风停雨止,且见太阳。询问居民,始知金沙江边之风雨每次不过半小时,过后就晴。中国西部气候变化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金沙江如此水急,因此不能通船只,自宜宾以至泸州,才通木船,泸州以下则通轮船。但金沙江之渡船在东川、巧家以下则船只较多。巧家以上每渡口最多十余只。龙街以上则只通皮船。船以

兽皮制造,每船只渡一人。上游之所以用皮船者,因水流太急,江中礁石极多,木船易破。

赤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6只船,大者可渡30人,小者可渡11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每次来回,均须专人在船舱中将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故危险异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而赤军全部人马,几乎都从此渡河,故除日间渡河而外,夜间则于江之两岸,燃烧木材,火光照耀江面,终夜渡河。

赤军之渡过金沙江而仅凭此6只破烂之船,国人未目睹此或不信之。但事实赤军确仅仅靠这6只破船以渡江。当然赤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军、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故有充裕之时间渡过全部人马。而且全部渡完两天之后,追军才到,所以掉队落班者亦极少。但另一原因,则因赤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试想,如无较好的组织,则在渡河时,人马拥挤,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只稍有损失,即将延长渡河时间矣。故赤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我曾见赤军总司令部及共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而赤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军所可及。即如赤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赤军之组织能力,除表

现于组织秩序外，而同时极好地组织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 18 人，后闻增加至 27 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赤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鸦片，赤军则命人烧云南鸦片一大锅，随便由工人抽吸不算钱。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语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诚可信也。并闻渡河以后，共党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之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 30 元及几斤鸦片，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对赤军有好感而随赤军入川者。

赤军之人枪由船渡金沙江，而同时亦将全军马匹渡过金沙江。渡船上本不许载马匹，但渡河时赤军想出方法，命马夫弃马鞍，拉住马口索坐于船尾，使马立河边上，船离岸时，岸上派人执鞭驱马，马即跟于船尾游泳过江。故赤军自豪，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诚趣事也。

渡过金沙江以后，自江之北岸，至川省之通安州为 30 里，均为上坡路，而且山极耸，正如交西渡至金沙江南岸一样。在这个 30 里中全系荒山，极少树木，沿途只见一家人户，偶于山坡上见些羊群，此处已为游牧区域。自通安州至会理城须再上坡 30 里以后，道路始稍平，但两旁仍有高山。通安州只一镇市，为川滇通商之第一镇市，居户约三百余家，有小学一所。我到时，正见几百乡人，身佩红布列队将行，系由共党鼓动去当赤军者。闻共党曾在通安州成立革命委员会、抗捐军等等。过通安州将到会理时，远见会理城正在火烧。至宿营地后，才知会理守军为川康军刘文辉所部之刘元璋师。刘师据城死守，因恐赤军爬城，故将城外附近之房屋全部烧毁，使赤军不能接近城墙。但此举却引起城外居民之大愤，因被赤军鼓动，数千居民，协同赤军攻城。后闻此数千人大部加入了赤军。

会理既有刘师死守，赤军亦未强攻，只加监视。赤军之目的，

系在渡河以后,南京军的追剿部队暂时不能过河时,借此休息补充。故红军总司令部命令全军在会理休息五天,并命各部队加紧居民中宣传工作,规定招募赤军新兵 5000 人的计划。这一计划,赤军各部都执行,总卫生部亦亟亟执行。五天后果然有新兵 5000 人加入赤军。赤军部队之所以经常得如此补充,一因赤军善于宣传居民,二因云贵川三省居民平日之生活实在太苦。会理居民莫不怨愤刘元塘平日种种之压迫: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自铸铜质银元,强令通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年轻女子,随意奸淫,不从者累及全家。如此行为,岂有不遭民怨之理。加以赤军领导贫民“打刘家”、“打土豪”,莫怪贫民之成千成万加入赤军。

五天以后,赤军即北上,由会理、德昌、西昌、泸沽、越嶲,而至大渡河边,每天行程六七十里,计行 29 天。赤军因急于抢大渡河,故未攻西昌,绕道而北上。自会理到大渡河边,为沿安宁河之大道,平坦处有 20 余里之宽度,但狭隘处只一安宁河与河边之小道而已。安宁河两旁均系高山峻岭,东为大凉山,西为雅砻江流域之高山。这两旁高山都住彝家,汉人只居手沿安宁河之大道上,且每家筑有碉楼,因彝汉民族冲突甚烈,彝家时常下山攻击汉人村落,故筑碉以御之。赤军至泸沽时,即分兵两路,小部至富林南岸,佯作强渡姿势,以吸引对河之敌。大部则由泸沽向西北进,占冕宁县城,而企图在大渡河边之安顺场渡河。但由冕宁西北 50 里之大桥镇而至安顺场,须经过彝民所居之高山,历时两日半,这是赤军当时之一大困难也。

四川之彝家为川人所最恐惧者,安宁河以东之大凉山为彝家之根据地。大凉山面积极大,南至宁南县,北至大渡河,西起安宁河,东至金沙江沿岸之雷(波)马(边)屏(山)。冕宁西北,直至康定以南,均属彝家区域。此处彝家,相传为诸葛武侯征伐之所谓“南蛮”。在冕宁西北之彝家山上确有哑泉,饮之即哑。冕宁县志及宁远府志均有记载。彝家均有武装,有数千快枪并有

少数手提机关枪(只就冕宁西北山上的彝家而言),均缴自汉军。沿安宁河两岸土地,本为彝家之土司官所有,但自刘文辉成都失败而入雅州后,即驱逐彝家土司官而据其土地为己有,因此彝家与刘家军结仇甚深。实际上政府官吏之统治,只及于沿安宁河两旁平原上之汉人而已。彝家则不受统治,而且抗缴一切租税。政府军队通过彝家之山时必须大队,一团以下可被缴械。

此处彝家不若蒙古、西藏等民族。彝家还系部落。性情多猜忌,疑虑无定。各部落之间,常有世仇,故常相械斗。彝家之生活,半为游牧,半为种植。种植以玉黍为多,畜牧牛羊马为多。

彝家中有两种阶级:一为黑彝,即为彝家中之统治阶级;一为白彝,白彝即为黑彝之奴隶,终身为黑彝耕作,除衣食外,其他无所得。黑彝随时有权置白彝于死地。每一黑彝常有白彝数百人、少则数十人为之耕作,黑彝则终岁不劳动。黑彝与白彝不通婚。现在黑彝人数渐少,但仍保有其统治势力,所谓土司者即此辈黑彝中之首领也。白彝原系汉人,系由黑彝掳来。黑彝将汉人掳来以后,常由大凉山与冕宁西北山上之黑彝相互交换掳获之汉人,使其不知道路而不能逃逸。黑彝并为白彝之男女配婚,均称男女白彝为娃子(意即四川话之孩子)。但每一黑彝家必信任一个白彝为当家娃子(如当家人)。当家娃子掌有一切银钱出入及日常事务之权。因过去汉人只笼统地不分黑白只反对彝民,加以彝民中之文化落后,所以白彝都助黑彝反对汉人。遇与汉军作战时,白彝均参加。

汉人之与彝家贸易,系由通司翻译,亦有彝家能汉语者,但黑彝恐汉人杀之,故不下山,遇事则命白彝与汉人往来。彝民常以兽皮、麝香等物售于汉人,换布匹及盐而回。

彝民之服装与汉人完全不同,头包青布而在脑后堕下一尺布。如上海之印度马巡。有些鼻穿银环。不论男女,均悬耳环。耳环不是金属制,而以骨制,共有三四颗或圆或长圆之骨块连成一串而

挂在耳上。面部熏黑。身上穿的如和尚之袈裟,系由羊毛自织而成(此种外衣,质轻而软,且可御风,极适于行军之用)。腰系带。彝民所居之山上气候一日数变:中午炎热,下午四时起发巨风,晚八九时下雨,次晨天晴。我们经过彝民之山地历时七八天,均系如此顺序不变。因每日气候变化甚烈,所以彝民出门,不论何时,必将外衣带在身上。遇刮风落雨即以外衣裹身。彝家每人身携利刃,用以防身,亦用以割肉进食。足有绑腿,终年不穿鞋袜,只少数穿草鞋。但彝民生长山地,善于爬山。赤军于山路行进时,彝民则由路旁之山石攀登而上,而且上山之快,宛如猿猴。

彝民生活之痛苦,远过于汉人。汉人还能耕平坦之田亩,彝民之田亩,日渐被川军之官长及当地官吏所侵占,而只耕植于山地。在山下远望彝民所耕种之山坡上的山地,倾斜度几如削壁,望之可怕,但彝民终年耕植于此。因其只耕种山地,故彝民平日所食者,亦只玉黍而已。至于彝民所居之家室,则更鄙陋不堪,以竹木编为壁,上覆松树皮,潮湿特殊,跳蚤成群。

赤军所过之彝民居住之山,共有彝民十余部落。当赤军之前卫团出大桥镇上山 20 里时,即有三个部落之彝民在前后及左翼包围赤军,意欲缴枪。但赤军善用宣传政策,向白彝声明共产党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并提出为彝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刘家”(意即打刘文辉的军队,因刘文辉压迫彝民甚烈)。当时赤军领袖即与当前的一部落名“沽鸡”者以鸡血充酒,与彝民领袖共饮,表示歃血为盟共打刘家。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赤军,而反被赤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赤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十余部落。此后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

走完彝民山地,即至开罗场,该镇有人户 20 余家但此处有一

趣事可记者：刘文辉驻西康打箭炉之队伍，米粮须由西昌府供给，故刘军设粮站于开罗场。当赤军前卫行抵开罗场时，刘军粮站之人员还以为南京军至，亟为设筵招待官长，并将军米如数点交，计有4000余包。每包60斤以麻皮袋装之。赤军领袖将此项军米照数发给各赤军部队，剩余甚多，悉发当地民众。我至开罗场时，正见民众不论老幼均肩负一袋回家，面有喜色。询之则云：“红军先生，我们白米好久没得吃了。红军来了，才把刘家的米发给我们吃。红军好！”刘文辉之搜刮民食反以之济赤军，而赤军则以发给民众，此则愈使当地民众反对刘军而欢迎赤军矣。

自开罗场至大渡河边之安顺场为60里。赤军政治部谓安顺场为“有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地方”。原因是太平天国时，北王韦昌辉杀东王杨秀清后，当时太平天国内部顿起分裂，石达开率部离南京而入川，安顺场即为石达开兵败身擒之处也。当晚我为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诊脚病，适李召见一老者，年已90以外，为当地之童馆教师，尝亲见当年石达开在此失败者，正由李富春享之以酒肉，请其讲述石军历史。据老者言，石军到安顺场时尚有五六万人，刀枪马匹无数。但一至安顺场，忽遇上游大水，安顺场前面之山水暴发不能渡河。前有大渡河，右有清军，且拆断渡河之铁索桥，左为山崖绝壁，后为彝民，且当时彝民之数量远过于现在，石军被困于此者，凡47天。当时军心不固，而石氏本人亦动摇，故自缚入清营。石军均为俘获。老者并云“长毛”并非强盗，自称“复汉驱胡”。石部对人民甚和气，军队有纪律。老者并云“红军之纪律则较翼王（即石达开）军更好”。据老者之所云若是。石达开当时未能渡过大渡河而失败于大渡河边确系事实。我后见沪川各报，蒋委员长亦曾伸引石军为例，以比喻赤军之必然不能渡过大渡河而失败于河边。但赤军竟安然渡过大渡河，故赤军颇以之自豪，认为渡过大渡河是历史上的军事胜利。

大渡河亦扬子江之上游。大渡河流入岷江而转流入扬子江。

赤军至大渡河时,时已5月底,气候已暖,上游雪山正溶解,故水势暴发,水流甚急。大渡河之河面及水流均较金沙江为更宽更急,水浪更高。渡船每一往返,历时50分钟。且每只小船之船夫,至少须有八人作工。渡河方法,先将载客之船由南岸河埠沿南岸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顺流如飞箭似的斜过对面河埠。船至北岸河埠时不能稍前稍后,一不小心,即触礁石,船即破裂,故非当地熟知水路礁石之船夫,不能驾船。船返南岸时,亦须由北岸沿江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顺流飞箭似的斜过南岸来,故如此往返需时50分钟。

赤军抵安顺场时只获两只船。有刘文辉军之一营兵驻于安顺场对岸之大渡河北岸,并筑有野战工事,沿河扼阻赤军渡河。但既有守军,何以船只不收容于北岸而系之于南岸呢?事有如此凑巧者,北岸刘军营长之岳家在河南岸之安顺场。该营长当晚宿于岳家,以备明晨将其岳家及当地绅商全部渡至河北岸。因其情报赤军尚距安顺场60里,须次日下午才能抵安顺场,故安心在岳家与其娇妻酣睡,不料赤军行动如神,当夜急行军,半夜即抵安顺场,因此两船被扣,营长被俘。

但赤军即使有两船,并不易渡过大渡河,因河之北岸有守军一营,船只不能接近对岸。且当时船夫早逃,没有驾船之熟练工人。但赤军终于击溃对岸刘军而渡过大渡河。此事亦为赤军据以自豪者。但即以我之旁观者目光视之,亦觉赤军之士气勇敢及共产党团员之奋不顾身有以致之也。

据闻渡河经过如此:赤军领袖获得两船之后,即拣选17个共产党团员,中有几个为江西、福建之木船工人。17人即携梭标、步枪、驳壳、手榴弹及机关枪,驾着这两只船,不顾一切,向河之北岸驶去。河之南岸,赤军则布置机关枪及迫击炮之阵地,并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强渡部队。

当赤军所驾之两船离南岸时,刘军即对之射击。但赤军不

稍畏缩，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当即一跳上岸。虽刘军对之射击，但只有四个受伤者，其余则一齐扑至刘军工事内。此时刘军一方惊于赤军之英勇，胆气已寒，又加河南岸赤军之机枪、迫击炮瞄准射击，刘军几不敢抬头，而渡河之十余赤军即击刘军工事而缴其一部枪支。闻刘军有一机关枪手，正拟至高山阵地架机关枪，行不十步，即被对岸赤军之特等射手射倒于地。因此刘军全部向后退上高山。赤军即抢守工事制止刘军向下，一方则重驾两船返至南岸载赤军渡河。待赤军渡过一营后，赤军即向刘军冲锋。刘军兵心已寒，全部溃败，赤军即占高山，乘势向刘军猛追，闻刘军大部被其缴枪。此次战役，赤军在队伍中大施宣传及奖励此 17 个抢渡大渡河者，尊之为英雄。的确，我虽非军人，但在军队中服务已有几年，强渡河流之冲锋部队亦已见过不少，但在如此水宽流急之大渡河中，能以 17 人驱逐敌军一营，占领敌垒，却未之见也。故共产党常以共产党团员为赤军模范。此辈共产分子常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自任，此诚非国军及其他一切军队所可比拟也。

赤军既获两船之后，即开始渡河。但仅依此两船而思全部赤军渡过大渡河，历时甚久，且后面追兵将至。故赤军以两天半的时间，渡过轻装之赤军一师，而当时目的即转向夺取泸定县之泸定桥，以求赤军之全部由泸定桥上过河。故赤军大部由河南岸西进，经西康省区而向泸定桥前进。已渡之一师，由北岸西进，同以夺取泸定桥为目的。

但在河之北岸，刘军沿河布防，故河北岸之赤军，自离安顺场对岸向西走了 30 里以后，即与抗击之刘军节节作战。但刘军如此分散，且缺乏通信工具，故被赤军节节击溃。刘军中大部为抽丁得来之新兵，不愿作战，且亦不会作战，早闻赤军之宣传不杀白军官长及士兵，故沿途缴枪。赤军以缴得刘部之枪弹，还击刘军，闻河北之一师获利不少（赤军打仗时如消耗之弹药与缴获

之弹药相等,则云“不折本”,如缴获与消耗核对有余,则谓“获利”)。在离泸定桥45里之冷碛,赤军曾与顽强扼守之刘军作激烈之战斗。后由赤军南岸之部队,隔河向刘军之后射击,结果河北正面赤军得迂回至冷碛之后而包围刘军。闻此处刘军一团全部被俘,冷碛被占。此时赤军南岸前锋即抵泸定桥矣。

泸定桥为四川通西康、西藏之桥梁,泸定县城即在河之北岸。此处之大渡河,河面虽较狭,但两旁绝壁,水势更急。泸定桥为铁索桥,以13根铁链为之。铁链之两端,系于河之两岸。9根铁链并排于下,4条则为两旁之扶手。下面并排之9根铁链上横铺木板,再在横铺木板之上铺长条直板。人马即由桥上过去。吾始闻铁索桥时,以为极难行走。但泸定桥则非但可以过人,而且可以过马。泸定桥长有9丈,阔约1丈,13根铁链,系由中国13省募捐而造成。

南岸赤军因无刘军抵抗,故先抵泸定桥之南岸。此时北岸桥头有刘军筑工事扼守,且刘军将桥上之木板抽去,只剩13根铁索,以阻赤军过河。赤军领袖林彪(第一军团长)即命该部最有战斗力及共产党团员最多之一连,担任冲锋,并在河南岸之天主堂内收集许多堆积之木板。这一连人前面冲锋者从9根铁索爬过去,后面的赤军则在后铺板子。当时冲锋部队,勇往直前,冲至桥北岸之刘军工事前,刘军已无斗志,即呼愿缴枪。赤军当即缴其枪并占领其工事。泸定城内刘军退出时,沿街放火。目的在使赤军之粮食及宿营两感困难。但赤军一过桥北,一面向刘军追击,一面救火。不一刻赤军由北岸冷碛攻来,把泸定县撤退之刘军前后包围而缴械。此时城内之火已救熄,但全城一半以上之房屋均被刘军火毁矣。幸存之一半,则大感赤军救火之恩惠,而莫不痛骂“刘家兵”。刘文辉部队在会理、西昌、泸定等县沿途放火,以阻赤军,实质上非但不能阻赤军前进,而且反遭民怨。

赤军之全部渡过泸定桥，确为赤军之莫大成功。如赤军不能过桥，则安顺场渡河至北岸之一师，势将孤军作战，而南岸之赤军主力则必走西康。西康则系游牧区域，粮食、宿营两感困难。而国军进剿则以雅安为后方，追剿部队虽感困难，但有后路接济；赤军则极难克服困难也。今赤军全部渡河，自此川陕甘青几省均将为赤军活动之地区矣。

赤军既占泸定县后，如向雅州前进，则仍须走向东南至汉源、荥经而达雅州。但赤军将至泥头分县时，知汉源川军扼守高地，居高临下以待赤军。赤军当即改变方向，折向东北至天全河边，强攻天全河守军杨森部之六个旅。这一转动，使赤军部队由大道转入高山小路矣。我记得赤军在化林坪分县驻军一晚，化林坪在4500米特之高山顶上。此时已阳历六月初，但当晚气候极寒，明晨出发时，则四望皆系雪山，盖昨夜已下大雪矣。此时气候骤寒，而赤军军士之棉衣早于云南丢掉，但赤军士兵虽在严寒之下，依旧人人面有喜色而毫无怨言。

赤军大部抵水子田时，前锋已击退天全河岸杨森之六个旅，而占领天全、芦山两城。我等由水子田出发，经一高山，几无路，亦无石阶。两旁竹木丛生，遮蔽天空，山上泥水极深，两腿全在泥沟中爬走。上下此山共只30里，但自天明走起，后卫部队半夜才达山顶。既无人户，当然找不到火把，所以大部伫立于泥沟中，待至天明后才下山来。赤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为国共合作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亦在山顶泥沟中站立一晚，次晨我见其虽仍神清气爽，但已满身污泥矣，下山至山麓，有居户六七家，见赤军至如天而降，群相惊奇。据云彼等世居于此山麓，虽闻祖先言此山有路可通，但荒山野地，野兽成群，从无人敢走此小路，群围赤军询山路上之所遇。

赤军虽经化林坪之降雪高山，虽经水子田之泥沟小道，但赤军兵士人人面有喜色而未出怨言。此无它，因此时赤军军心一

致,坚信必可与川北赤军徐向前部会合,而同时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可径与日本军队开战,实现共党几年来抗日及收复失地之主张。故赤军至天全时,部队中有一歌曲,词云:“(一)目前中心的任务,要打日本兵,收复华北、东三省,保卫民族。(二)四川地方顶呱呱,什么也不缺乏,敌人要想封锁我,那才笑话。(三)工农红军铁一般,渡过金沙江,两大主力来会合,敌人发慌。(四)红军越打越有劲,团结像一人,我们伟大的任务,一定完成。”这一歌曲之词句,即可见当时赤军情绪矣。

赤军占领天全、芦山两县之后,曾出兵于飞仙关,离雅州只20余里。此时赤军的目的系在急求与川北之松潘、茂县、北川等县之徐向前赤军会合。故避开川军之拦阻,向西走邛崃山脉,占宝兴、懋功,而与在理番之徐部会合。不久两支赤军即已会合,而我于此时,即被贺诚遣往川西特委之独立营为卫生主任。不久即被川军冲散,幸遇旧同学蒋君而得安全返抵家乡。当搭民权轮至上海时,全家在码头候我,别后重逢,诚庆更生。

我三年来在赤军中之见闻所及和此次随赤军西行入川,我觉到赤军及共党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的一个实力派,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赤军仅系跳梁小丑,那末何需乎南京政府及各省当局集中百万军队,费时几载,每年耗费国家财政之大部?并且何需蒋委员长亲自在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督剿?很显然的,赤军已经是南京军的一个主要对手,而且这个对手——赤军——的实力,超过国内除南京军而外的其他各个实力派。论全国赤军数量,除南京军而外,赤军则超过任何中国南方、北方各个实力派。若论赤军之质量,则我虽不知其详,但有一事可以反证者,国内过去及现在之实力派,如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等,当年都占有比赤军优越之地区及优越之经济条件,但一旦与南京政府作战,则在短时期内,都被蒋军所败。而赤军则相反,蒋委员长之剿共已

历数载，屡屡限期消灭，可是赤军并未消灭，而且朱毛徐会合，活动愈烈。并且南京军几年来之剿共，却送了赤军不少枪弹武器。赤军所有武器之来源何在？既无海口可买，又无新式兵工厂，而连年作战之消耗，以及赤军武器之扩充，都系缴自国军。即退一步言，至少是赤军能够在几年来，并且直到现在还在与南京政府对峙，而不相上下，故我谓赤军在数量上在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数一数二的实力派。

以我旁观者之地位观察，赤军部队之所以坚固与有战斗力，是由于下面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赤军兵心团结，这确系事实。试想赤军几年来在这样困难条件之下作战，如果军心不固，则早已失败。而赤军兵心之所以团结，一方面确因共党在赤军兵士中进行许多教育工作，赤军兵士是自认抗日救国、解放工农是自己的责任，这就使赤军士气大振。同时共产党员及共产青年团员于赤军兵士中占百分之四五十，而这些共产分子，曾受共党之专门教育者，在赤军兵士中确有极大的细胞作用。譬如，赤军之新兵，大半依靠赤军各连中党团员去教育他们；在赤军行军中发生困难时（如粮食及宿营地缺乏等等），共产分子必让非党分子之赤军士兵先吃先宿；作战时共产分子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共产分子在火线上受伤时，非但丝毫无懊丧呼号者，而且还大声疾呼：“同志们！努力冲锋！”“不要顾我而妨害战斗啊！”而赤军之富有战斗力者，亦由于共产分子的领导。赤军在作战之前夜，每连之共产分子必先召集会议，决定明日作战时如连长、指导员伤亡，谁为继任，如再受伤，谁再继任，这样准备了四五个。所以在作战时，即使下级干部受伤，仍有继续不断的候补者，也正因此，所以赤军部队极不易击溃。

赤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第二个原因，赤军所以不被击败，而反日益扩大，由手民众给

赤军以帮助。即以江西赤区而论,赤军在此作战已多年,人口、经济已两感缺乏,但能坚持如此之久长,正由于当地民众之极力帮助赤军。再如此次赤军入川,沿途经过不知几许困难,但赤军有居民为助,故并未饿饭,而且沿途民众之加入赤军者有几万。

有人说赤军沿途强迫居民以从赤军,实质上,不但无其事,而且不可能。试想,赤军初至一地,只要居民远避,赤军何处去找居民?实际上赤军一至某地,当地居民除非所谓“土豪”外,均未逃走,而且为赤军带路,当挑伏,沿途到处成群地加入赤军当兵。

以我观之,赤军之所以得民众帮助,不由赤军之威胁民众,而由于赤军兵士守纪律,的确不扰民,不动民间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而且常常没收军阀、官僚、劣绅的财物,散给居民。民众感觉赤军对他们有实际利益,所以趋之若狂。

第三个原因,赤军经过许多困难,终于克服了困难。赤军所处环境之困难,远非南京军可比。欲问赤军何以能克服困难?我以为赤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譬如朱德、毛泽东为赤军之首创者,在各省军队及南京军之不断围攻与物质条件如此困难情形之下,对战七八年,竟以少数赤军而组成现在几十万赤军,这确非易事。我觉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张国焘、林祖涵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之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

赤军中之上级军官如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徐向前、董振堂、周昆、罗炳辉、陈毅等,大部均系国共合作北伐时之国民革命军军官出身,富有作战指挥的能力,率领赤军作战已多年,在国事及政治问题上,均对共党有坚决之信心。刘伯承、彭德怀、罗炳辉及以后 26 路军之赵博生、董振堂辈均为北伐前后国民革命

军中之共党党员，举行“兵变”而为赤军者。他们为坚信共产主义的分子，在赤军中领导赤军与国军对抗达七八年。

我在赤军中对赤军领袖之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这也许是由于我在南京军中服务时所感影响太坏而有所致之。大家知道，在别的军队中当一团长，个人生活已极奢华，更无论师长、军长矣。但赤军军官则反是：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伙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而且赤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杂在兵士中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这种赤军军官与兵士同甘苦之日常生活，确为国内其他军队之军官所无。也正因为赤军领袖在日常生活上¹与兵士同甘苦，所以虽在各种困难环境之下，而赤军兵士仍毫无怨言。赤军领袖之品行及办事精神，亦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者。兹略举一二事为例：赤军领袖自朱毛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赤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赤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还有一事，非但为国军军官所无，而且为常人所不及者。如赵博生、董振堂两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26路军一万六七千人投入赤军。赵董两人均原系共党秘密党员，他们一至赤区，即将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数捐给共党中央。由此可见，赤军领袖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

故我谓赤军之几年苦战与赤军之所以逐渐发展，确由于赤军中有天才之领袖，有能为之干部。赤军中及共党中之许多人才，确为全国不可多得之人才。

我自离赤军至家乡以后，自思既参加了剿共的南京军，后又参加了被围剿的赤军。我在两方面参加了对战七八年，详思

几年对战之结果,对内只有破坏,对外则坐视日本强吞东三省,而且目睹北方将全落他人之手。如果现在南京军、赤军以及全国军队只要枪口一致向外,则日本之欲图我国,决非易事。政府诸公时以“攘外必先安内”为言,但时至今日,事已至此,应该及时改变方针。从消极方面说,国府及蒋委员长曾以全力剿共数年,赤军并未剿灭,反而使赤军之朱毛徐会合。彼等现今所处之地区;远非如江西时之易于包围。国内军人之稍知局势者,均知根本消灭赤军已不可能。如与赤军再战几年,则不问谁胜谁败,日本将早已亡我全国矣!如国内自相残杀而坐视强敌并吞全国,则党国诸公非但不能对国人,而且中华民族将永劫不复。

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政府当局应该改变计划,协同赤军以共御外侮。全国赤军数量,赤军之质量,有识者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极大的力量。这一个力量,过去在环境十分困难的情形之下,与南京军及各省军队百万对战几年,如果现在给以物质之补充,则赤军之战斗力将更加增加。为什么不许这个能战的赤军去抵抗日本呢?若合我全国兵力一致对外,则不难收复失地。同时赤军之领袖不乏极有才能者,现在正需集中全国人才以御外侮,为什么不利用赤军之兵力与赤军之人才以为国家对外之用呢?

如果有人以为赤军甘心内战,不顾外患,这我觉不然。赤军领袖如朱毛、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昔年北伐前、北伐时均为国民党中央委及国民革命军之上级军官,且也不能不说有相当功绩于北伐,徒以各方主义不同,以致分兵对抗。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并闻友人传说,共党中央及苏维埃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

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作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袭，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录自《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论中国红军

(1935年8月)

李光

爱尔科里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报告和根据他的报告所通过的决议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进行战争,这已经是开始重新瓜分世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战争学说底原则为指南,用布尔塞维克的精神,进行了和正在组织领导和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英勇的工农红军,是全国民族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是在远东和太平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底最大力量,是对日本强盗瓜分中国,进攻苏联和挑动世界大战底一种巨大威胁。中国英勇红军,历年来为救国救民所得到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

我不来叙述这方面经过的总结,和中国红军一般问题,而只是说到关于红军冲破第六次“围剿”的问题,特别是红军北上抗日,红军主力西征,和红军目前所处新的形势,以及红军在最近将来在全世界反战方面所能起的作用问题。我想这是关心中国革命的人,以及一切愿意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想要知道的,也是应该知道的问题。

一、红军主力西征战斗的简单总结

大家知道,赛克特蒋介石的六次“围剿”红军的计划,开始于1933年5月,蒋介石调动了步兵共109师,又8个独立旅,300架

以上飞机,数百尊大炮等参加作战,此外,在蒋介石军队里,有几百个德国的和日本的军事专家,有几百个美国的意大利和加拿大的飞机师,帮助军事行动的领导和军事技术的使用,所谓赛克特计划的中心特点,就是用英帝国主义屠杀非洲和印度的反帝民众的办法来屠杀中国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民众,就是用四面包围,步步为营,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方法,企图将苏联红军和民众逼到很小地方去,然后用飞机大炮及毒瓦斯完全屠杀死。

我们党的中央,苏维埃中央和红军领导,所采取的打破蒋介石的计划底最主要的新策略方针是怎样呢?

“红军反对蒋介石新计划底最主要的策略方针,应当是尽可能地保存巩固和更加发展红军底实力,因为红军实力——这是最主要的东西。它不仅是战胜蒋介石六次“围剿”底根本保障,它——红军实力是争取中国苏维埃革命彻底胜利最主要的条件和武器。”(见王明同志的新条件与新策略)

我们红军北上抗日和主力离开原有根据地向西进发,就是这种新策略方针底实际运用。

大家知道,红军主力西征战斗的过程,是从去年10月间突破敌人江西包围线起,至今年6月16日红军两大主力——朱德同志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徐向前同志所领导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天全县有历史意义的会合止,一总经过了四个阶段,为时将近10个月,经过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等9个省份,占领过170多个县份,围逼过贵阳、昆明两个省都,与国民党的中央军及各省军阀,作战数百次,英勇的长途行军到3000多个启罗米达,开了世界有历史以来革命军队徒步远征的新纪录!

你们大家知道,红军这次西征,全靠步行,沿途跋过了最大的山脉20余座如大格岭(闽赣) 雩山脉(赣) 九连山脉(赣粤) 罗霄山脉(湘、赣) 五岭(赣、湘、粤、桂) 衡山脉雪峰山脉(湘) 武陵山脉(湘、

黔)凤皇山脉(黔桂)苗岭脉(黔)娄山脉(黔)乌蒙山脉(黔滇)大凉山山脉大雪山脉(康)邛崃山脉(川)和几百座的大小岗峦,其中贡尔山岭,越过海拔16000尺之高,大雪山之高峰挺臻24000尺,涉过了20多条最大的江河,如赣江(赣),北江(粤)桂江(桂)湘水,潇水,资江,沅江(湘)乌江,綦江、赤水河,盘江(黔)金沙江——即长江之上游,(川、滇)大渡河,打冲河,安宁河,大金川,小金川,岷江等,和几百条大小的河流,特别其中有历史上号称天险,军事上有战略意义的乌江、金沙江、大渡河。

此外,红军又跋涉了无数的泥潭,和算不清的披荆斩棘。同时大小军阀部队为数数十万,不断的向红军左右前后袭击,在天空用飞机轰炸红军,在沿途破坏道路桥梁,大小经过数百战。尤其必需指出,红军的远征,不是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而是十几万人以上,在这十几万人中,除掉年少力壮的红色战士外,还有不愿给蒋介石屠杀,而自愿跟红军西征,共同奋斗的广大群众,与一些老太婆、老头子、男孩子、女孩子,怀了孕的少妇,带了伤的伤兵,以及大批的粮食枪炮军用品金银各种日常东西等等。

这就是英勇的中国红军西征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可惊可讶的条件。

当红军主力西征开始的时候,人们未必设想过:西征计划,将能够有今日所起的伟大政治意义,反之,许多人曾经以为西征计划,是红军退却逃跑的行动,甚至认为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失败的序幕!

从红军在去年11月10日自动放弃过去中央苏区的首都瑞京(金)这个时候起,也就开始了所谓舆论、资产阶级报纸,以及红军敌人的各种政派团体、对红军西征,议论纷纷,蒋介石在红军主力退出江西不久后,便发表了“告江西全省民众书”这里,蒋介石曾不怕羞耻的大胆作出了以下的结论说:“此次赤‘匪’根本歼除之后,往昔共党之斗争,其掠夺暴虐残忍的唯物史观,实不敌于吾忠孝仁

爱信义和平为基础的三民主义之精神……足知此次剿‘匪’之结果，实为三民主义战胜共产主义最后之决战与唯一之佐证也”。

这样一来，红军西征，成为唯物史观，敌不过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战胜共产主义之佐证了！？

随后，事实证明朱毛红军是很快的达到了四川大渡河与金沙江中间，蒋介石又自豪的说：“朱毛已处绝境！前阻大渡河，后有金沙江，不啻天罗地网，石达开败亡于此”！

这样一来，朱毛红军又落了天罗地网，已届绝境！

后来，事实证明天罗地网，并没有把朱毛红军网罗得住，红军还是前进，于是另一种更吓人的电讯，由南京本店自造，经过各种资产阶级报纸用大号字标题传出来，而且这位新闻记者能手，描写得总还算不坏：“……朱德已阵亡，毛泽东被夷人所杀，毛之尸首，不知下落；朱尸则依照苏联方式，用红底镰刀斧头旗帜掩盖，沿途居民，焚香秉烛致哀，红军士兵过其尸旁，有的说‘朱德先生，请你保佑我们打胜仗！’有的甚至流泪！……”

这样一来，红军失了领导，朱毛也被奉为偶像了。

敌人方面诸如此类的记载和谩骂、造谣，是不少的，我想，值不得来批评这些评论的作家。“因为这些‘硬头’人是与中世纪时代的化石一类的东西，在这些人看来，事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斯大林同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文第14页）。

自然，在敌人当中，虽然都具有眼睛，但是也有近视与远视的分别。譬如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阪每日新闻》报在社论中解释南京军队占领瑞京（金）这件事情时，写道：“中国红军并非被打败了，红军放弃瑞京（金），利用着南京政府，广东政府以及湖南军队相互之间的冲突，很快地向四川进发，以便与其他红军部队会合起来，并在四川组织根据地。”

所有这些，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奇怪。可惜的，就是在共产党队伍中，也有个别党员，患着近视，后来经过医生和他们配着眼镜，才

把远景看清了。

同志们,中国红军西征的胜利,这已是众目共睹,无可争辩的事实。现在来说到西征胜利几个简单的总结,根据1934年10月至1935年6月敌人各报纸上材料,归纳来的统计,大概是这样:

(一)消灭敌人和敌人损失在100团以上,敌军伤亡在7万人左右;

(二)缴得敌人步枪8万余支,机关枪千余挺,炮数十门;

(三)红军扩充到将近50万人,更加锻炼了精锐的主力;

(四)苏维埃领土较前更大的扩展了,苏维埃的影响,已经散布到更大的范围;

(五)游击区域亦较前大大的扩大了;

在冲破敌人第六次“围剿”开始时起,至红军主力西征开始以前,这一个时期的简单数字总结,根据中央苏区《红星报》第53期所作的统计(从1933年7月至1934年7月)是这样:

(一)消灭敌人6旅30余团9个营;

(二)击溃敌人7个师,5个旅,34个团,13个营——共约120个团;

(三)俘虏敌人官兵2万余人(仅是红军第一方面军);

(四)缴得步枪3万数千支,机关枪300余挺,迫击炮五六十门,手射炮10余门,无线电台10余架。

(五)活捉敌人旅长4个,团长4个。

关于红军主力西征和冲破第六次“围剿”整个简单数字的总结,便是如此。

同志们,这些简单数字的总结,告诉我们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著名的残酷的第六次“围剿”的结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是不断的失败,中国苏维埃红军是不断的胜利,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党,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我们的红军,并没有害怕困难,回避困难,反之,他们前去迎接困难,以便克服和消灭困难。它告

诉我们：蒋介石等军阀以及他们应声虫的预言，可耻的破产了！而我们的党，党的中央委员会，及王明同志下列的预见，完全被证实了。

这种更适合于目前斗争条件底新策略，在最近四五个月来部分运用中间，已经使红军得到许多新胜利。在将来，红军能正确地彻底地将这个新策略运用下去，那末，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这种新策略，不仅能够使我们能够完全冲破六次“围剿”。而且能使我们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底斗争得到许多便利的条件（王明同志——新条件与新策略第121页中文版）。

在这里用下面斯大林同志的话来做这一点的总结是适当的：“事实证明：没有这种勇气和对工人阶级力量的信任，党就不能达到那种我们现在有权利来自豪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文版第44页）

二、红军胜利底原因

我上面已经将中国红军击破敌人第六次“围剿”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简单叙述过了，现在我转到说明红军胜利底秘密。

很可惜的，就是一直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秘密，也有了解了的而不愿公开出来，甚至还有的怀疑这些胜利的。

我想，来说明一下我们红军胜利而敌人失败底秘密，也可以教育一下为蒋介石作计划的德国法西斯蒂的赛克特将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们。

现在我具体说到以下的红军取得胜利的原因：

第一：红军的战士自觉的知道为什么而战，他表现在：

（一）在训练上；红军战士是经过长期的政治训练，我们党积极的设法启发他们，使他们从自身经验中，自觉了解到他们为什么而战，政治课每日一次；就是行军作战时，也很小停止，我们在红军

中举行消灭文盲运动。据 1934 年 1 月份的统计,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新战士和老战士,平均能认识三四百字的很多,墙报每月出二三次,投稿的红色战士占 60% 至 80%。有的是 100%。并常举行集会如展览会、晚会、运动会及参观等。

(二)红军成分上:工人 30%,农民 68%,职员 1%,其他 1%。而红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已有六期(至 1934 年初)学生成分比较的百分比是:

学生成分	工人	贫农	中农	苦力	小商人
第一期	七,五	〇,四	一九	五〇	四,五
第六期	二四,四	七,二	四,五	五六,四	〇,四四

而且,他们中间的 77%,是曾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与劳动法的保护的;而白军兵士则大多数是被饥寒所迫而应募的和国民党军阀实行的强迫征募的。

(三)对兵士的待遇上:我们对待红色战士甚至白军俘虏都看作自己的亲兄弟,我们的口号是:“一切好的物质,都归红色战士与劳动人民”。譬如在前线的红军,每天是吃三顿白米饭,肉菜是常有的,而在后方党的苏维埃政府的及其他机关工作同志,只吃一顿白米干饭,两顿稀饭,并常有牲畜鸡蛋猪羊干菜手巾肥皂鞋子等物慰劳红军,每季发新军服一套。受了伤的红色战士,待遇更是比任何人要好。此外最紧要的还分给红色战士以土地并要发真正人面兽心,吃人的魔王,卖国的汉奸!因为我们每个红色战士自觉的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他们知道是为中国四万万人民争饭吃,争自由而战,他们知道是为大中华民族争生存,争独立,争解放而战。这就是关于红军取得胜利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红军军事战略巧妙与红军英勇善战;我们就拿这次红军西征所经过的四个阶段为例吧:

(一)第一个阶段(1934 年 10 月至 12 月底)红军突破敌人包围线而开始西征的阶段。

蒋介石之军事计划怎样呢？其主要内容是：当红军突破江西包围后开始向西进发，蒋介石预先已有准备，强迫湘桂人民搬避一空，进行坚壁清野；同时，全湘军以六师约5万人，布防于湖南之衡州，祁阳，永州并集中大兵于广西之全州；令桂军四个师与民团，布防于兴安贵阳等县，与湘军联成一线，实行堵截红军；又令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八师红10万多人实行尾追红军；又令粤军第一第二两纵队约5万余人实行侧击，总共调动了30万以上的兵力，企图消灭西征红军于湘境，同时，动员数十架飞机专门在此区域实行轰炸红军实力，以实现蒋介石所谓“调虎离山”底计划。

我们红军采取的军事计划是怎样呢？其主要内容是：采取了灵活的战术，即红军七军团和红十军团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取道闽、赣、浙而抄到蒋介石之后方安徽省之芜湖附近，威胁长江一带；另派红六军团之一部由萧克同志率领取道湘粤桂黔边境，一则与贺龙红军取得联络，一则为主力西征红军开辟道路，此外，西征红军主力，在朱德毛泽东同志指挥下，实行向广东北部作突然的进攻，坚决突破了四道封锁线，由湘桂黔的边境，迅速的进入贵州。使蒋介石预定的计划完全变成不落实际的具文，所谓十几万“追剿”军底部队，因疲尽奔命，饥饿疾病而减少三分之二。

(二)第二个阶段(1935年1月至3月)是从西征红军占领黔北川南各县一直到包围贵阳止。这一阶段蒋介石之军事计划是怎样呢？其主要内容是：

蒋介石认为红军西征主力必过乌江扬子江而深入四川，以便与红四军方面会合，故令川军15个旅布防扬子江并在川黔边迎击红军，并以侯之担犹国才王家烈部扼守乌江流域，断绝西征红军与贺萧红军会合的道路；全湘军对待贺萧的红军；同时令滇军至黔边协攻，而以黔军在前，薛岳等八师在后，敌方兵力总共集中30万以上，企图在长江以南与乌江沿岸消灭红军。

我们红军采取的军事计划是怎样呢？其主要内容是：以高度

的机动的战术,各个击破敌人,乘敌人新的计划未完成以前,首先迅速的消灭侯之担之两师与王家烈之一部,占领黔东南九县,渡过乌江,占领遵义,湄潭,桐梓,涪水。击溃川军于土城与叙永,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获得了威震西南的娄山关与遵义战斗的伟大胜利,消灭了王家烈的两师与吴奇伟的两师。继续以机动的战术击败周浑元三个师,四次来往于赤水河的两岸,两次占领遵义,桐梓,终于击破蒋介石几次包围红军的计划,而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城下。结果使蒋介石在黔北川南消灭红军的计划又完全失败。

(三)第三个阶段:是从红四军团绕道陕甘南部至击破胡宗南部在川北威胁为止。

这一阶段蒋介石之军事计划是怎样呢?其主要内容是:蒋以为西征红军主力必须经过乌江,长江。东与贺萧红军策应,北与红四军团会合,故蒋以30万大兵包围黔北川南,阻止红军渡江,而以胡宗南部五六万人由甘肃南下,向红四军团后方猛击,企图这样夹攻,来阻止第一方面军与红四军的会合。

我们的红军所采取的军事计划是怎样呢?其主要内容是:采取最大的机动迂回的战术。我们没有依照蒋介石所想象的而是出其不意,红四军团,忽然迅速的由川北经陕南,折入甘肃南部,抄在胡宗南后方180个启罗米达的地方,猛击胡师,使胡宗南措手不及。红四军团消灭其部队主力后,肃清川北对红军的威胁,旋即又南下回击川军,消灭并击溃川军邓锡侯与田颂尧之大部。使邓锡侯与田颂尧部共同和红军作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这就是造成了红四军团与西征红军主力会合的先决条件,使蒋介石的计划又完全失败。

(四)第四个阶段:(从今年4月至6日底)即是红军肃清川黔边与川北对红军威胁之敌军起,至四川之懋功与理番之间会师以至现在止。

这一个阶段，蒋介石的军事计划是怎样呢？应该说这个时期蒋介石的每次军事计划都遭到了严重的失败。由于红军的最高度的机动与灵活，使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由于红军的机动，数次变更蒋军包围红军的计划，并吸引蒋军及黔滇浙桂十余万军队于黔东地区，使蒋介石之阻止红军渡过金沙江与大渡河的企图，完全失败。

我们红军在这一阶段，采取了什么计划呢？其主要内容是：红军并没有去占领贵阳，而是取得了渡过乌江与包围贵阳所得的胜利后，以一部牵制敌军并取得胜利于滇黔边之毕节附近，红军主力采取了强行军的手段和机动的战术直趋昆明（云南省城），于是蒋介石又不知红军真正意向之所在，不得不调集大军奔向昆明一带。

但红军又不占昆明而西进，以机动的战术，经过元谋，组织强行军，并得当地少数民族夷（彝）民之帮助，渡过天险的金沙江，扼阻了尾追的敌人，并击溃和消灭了刘文辉的防守部队而渡过了大渡河，达到6月下旬有历史意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与西征红军主力的会合；而蒋介石之一切尾追截击红军与阻止红军会合的计划，完全失败。

同志们这就是红军主力西征，对我军事计划和其结果的情形。

关于红军在西征的四个阶段中，我还想引两个很英勇而很有趣味的例子给大家听，来看一看我们红军是如何的善于执行党的和红军领导的军事计划和如何英勇的杀贼！

第一个例子，中国报纸说：当红军占领遵义之前，派有一千余便衣队，化装玩把戏的，挑担生意的，先行进城然后内应外攻的占领县城。

第二个例子：再如《国闻周报》载云：红四方面军在川北作战时，收集羊狗数百只，每只身上缠以电光灯，向敌人防守阵地之前放去，后面以步兵随之冲锋，竟将川军全线冲破。

所有这些都足以充分的证明党中央和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制定的一切作战计划和执行新的军事策略的巧妙性,灵活性,机动性,坚决性,与红色战士之无限英勇性!

同志们,所有这些,就是我们红军取得这些胜利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红军能够取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中国的红军,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武装,实行保护中国人民的利益,所以它随时随地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与帮助。第一个事实如在天津《国闻周报》第12卷第14期里写道:“去年1月底,21军炮兵司令部发生过有人纵火的事件,幸而没有成灾;据说是共党的阴谋;五路军所用的迫击炮,接二连三的炸裂,每次都惨死了多数的官兵……到5月中,重庆的兵工厂,不知是因何种线索发现了其中有12个工人是赤化分子。他们供称:从1933年以来所制的炮弹,凡是经过他们的手的都‘做有手脚’(有毛病),而且在这种炮弹底每一个底面上还做得有个若非很仔细地去看便看不出的暗记——‘斧头镰刀’。这案件才说明了迫击炮炸裂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事实,就是今年1月23日《大公报》写道:“赤水方面,尚有骚乱”,据闻侯之担在赤水,设有造枪厂一所,有工人400余名……16日夜,赤水枪厂工人首先暴动,高呼口号,与守城之营兵相抵战,同时贫民一时多附和,将侯之担住宅焚毁。

第三个事实,就是夷(彝)人及自流井工农游击队接引红军渡过长江,大渡河。

此外,我们还有成千成万的男女青年赤少队、儿童团、为红军作侦探、放哨、送信、送物、洗衣服、看护伤兵、与参加作战的光荣例子。白区里的许多劳苦群众、学生、知识分子、医生、商人也给我们以不少的帮助。

像这样最明显的例子是很多的,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工人是如何起着他自己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红军又是如何得到

广大群众的拥护与帮助。

这就是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就是红军是在共产党唯一领导之下的：蒋介石曾预料我们西征红军必被消灭于天险的大渡河，并引 1850 至 1865 年太平天国暴动，石达开及其军队曾被消灭于此，以为佐证。敌人想错了，他们忘想了现在不是 19 世纪的时代，而是 20 世纪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一个时代在中国产生这样一个阶段——即是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这一个阶级的最先进分子组织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锻炼，在中国人民中有绝高威望并有伟大战斗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并有它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做领导。在红军中党员成分占红军总数 28%，团员占 16.6%，党经过这些党员团员及红军政治委员政治部的组织实现他对红军的领导。党经过他的白区的党员与组织，来发动群众与进行对红军的帮助，有这样新式的党，有这样高举列宁斯大林旗帜的党，是中国红军取得胜利的有决定意义的原因。这就是红军取得胜利的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就是红军有党的布尔什维克与非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有政府的红军的干部：

大家知道，我们年轻的红军，军事技术，还是比较落后，我们的敌人是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其中中国代理人，我们还处在全国经济比较落后的区域，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很大很复杂的。可是我们可以自傲，我们有这样在党方面的干部作红军的领导，这种干部是始终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活的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而为全党所爱戴的为全体红军战士所自觉的服从。这种党的政府的干部首先就是如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同志。我们有智勇兼全，英勇善战的红军总司令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打着红军的大旗，领导着 50 万红军，百万的游击队，勇敢的前进，胜利的前进。我们有不怕牺

牲,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底红色将才军事家如彭德怀、徐向前、贺龙、林彪、董振堂、陈昌浩、章炳辉、徐彦刚、萧克等同志。我们有将近50万的红军战士和百万的红军游击队员,这些党的布尔什维克与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正在用自己的鲜血头颅,为抗日反蒋为救国事业,为拥护中国人民利益,为保卫国家国防作革命的战斗!我们永远不忘最后以自己生命,献给党和中国人民的我们的红军第三军长黄公略同志,等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同志,红军北上抗日先遣军总司令方志敏同志,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同志,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第七军团长寻淮洲同志与政委乐少华同志,他们领导红色战士,冲锋杀敌,一直流到最后一滴血!

上述的这些不怕困难与牺牲的战斗干部,是成千成万的不断的从国内战争火焰中锻炼生长出来的、所以使中国红军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常胜的铁的红军,成为“在太平洋沿岸形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底新的前哨——中国苏维埃”(曼努意斯基同志说的),成为解决世界政策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斯大林同志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干部决定一切”底发言,在中国红军中,又得到证明。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我们的军队,有充分的数量的真正受过锻炼的干部,那末,它就成为不能被人战胜的军队。”

斯大林同志这个指示,不仅是苏联红军的任务,同时也是中国红军的任务。我们向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郑重宣誓,我们为最好完成斯大林同志这个指示而斗争。

这就是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第五个原因。

三、中国红军目前所处的新形势与任务

现在红军所处的新形势是怎样呢?如果拿现在红军在四川所处的新形势与西征以前在江西过去的情形来比较一下!那末,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红军活的实力大大地增加了,过去我们有红军35万人,

现在却有将近 50 万了，过去有游击队 60 万到 80 万人，现在已在百万以上了；

过去所暂时失去的苏区领土，固然是一个不小损失，但现在却比从前有了更大的领土填补了——并扩大苏维埃的影响到更多的省区；

过去我们是处在被敌人包围的形势，而现在我们却成包围敌人的形势了；

过去我们处在被动防守地位，现在我们却变成主动进攻的地位了；

过去对于红军的扩大与给养问题，处在较困难的情形下面，而现在却变成在较顺利的情况下面了；

过去蒋介石碉堡封锁政策，曾起了相当的作用，现在却不能像从前那样所起过那种的作用了；

过去所处的继续发展的条件，是远不如现在顺利了。

凡此一切结果，就造成了红军战略上新的良好的革命根据地很优越的条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并便利与全国人民更加接近，更便于实行目前苏维埃红军的抗日反蒋救中国的政策，仅四川一省，就有 6000 至 7000 万以上的人口，连四川周围的省份合起来，人口当在一万万以上。并且在这里有广大的盐业工人、五金工人、兵工厂工人等极大的无产阶级底基础。这就是扩大巩固红军的良好客观条件，同时红军比过去易于实行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红军的英勇战斗已直接威胁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扬子江流域侵略的野心与计划。

自然，现在比过去也有他的弱点和困难：比如现在新苏区内群众不如过去那些老的苏区的群众久受政治军事上的训练；在新占领苏区内有很大数量的少数民族，需要党和苏维埃政府更耐烦地谨慎地去说服、宣传、组织、领导这些群众；红军的扩大，更要求党和苏维埃政府去培植更多的坚定的政治上军事上有准

备的干部,最后,新占领区域,还需要百倍努力造成巩固的后方。

不过,这些弱点和困难,在红军日益发展过程中,是一定可以克服的。

此外,除掉四川中心及其周围苏区主力红军以外,首先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大大提高了红军反日先锋的威信,例如皖浙一带农民,见路上修路的红旗,便以为是抗日先遣队的红旗,群起欢呼。卖国贼蒋介石南京政府为反对抗日先遣队的英勇行动,调动了极大的军力。抗日先遣队的领导者方志敏同志虽然不幸被俘,但其部队,在刘英同志领导下,不仅仍保存,而且在浙江得到很大的发展,甚至继续领导进行北上抗日。据最近可靠消息,这位民族英雄,这位名震全国而为全国人民所爱戴的红军领袖,我们最亲爱的方志敏同志,已被蒋贼介石所枪杀了。他在敌人酷刑拷打与百方引诱之下,严厉地斥骂国民党历年来卖国辱国的事实,慷慨的陈述抗日救国为无上光荣的事业。他的忠义气节,英勇精神,将永远存在着。全中国人民正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之下,继续他的血迹前进,胜利的前进。方志敏同志不死!

江西苏区自红军主力西征后,留下在江西福建一带之红军与游击队,还是日益发展、许多乡村仍在红军手里。本年4月《新国民日报》载:“叶剑英部中国苏维埃政府红军总司令直属两军四师,每军万余人,共2.3万余人,迩来势甚猖獗”。湘鄂赣苏区与红军在平江刘(浏)阳得到胜利,湘赣苏区游击战争的发展,闽东与闽北苏区的游击战争的存在与发展,鄂豫皖苏区的群众游击战争的再起。所有原有的苏区群众与游击队是热血的斗争者。

北方陕甘边之苏区是比前扩大了,如果共产国际第十三次扩大会时,在武装上那里只有第26军,那末,现在又新成立了红军第27军,在游击区和苏区地域上,那时只有几县,现在有二三十县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川陕甘晋红军之会合的这一

前途。

鄂豫皖苏区之红军第25军第28军，现在已经在陕鄂豫边积极活动，向四川红军汇合，而且得了大的胜利，最近有一部已进占陕甘边之留填等地。

最后，还有一个不大的新的苏区的建立，这就是桂滇边之镇边、靖西、敬德、百色，有红军游击队700余人，在九龙、弄所、百油、板峯，遍设劳农会，在归阳有苏维埃政府、游击队分五个联队、每联队有四个大队另有特务团、别动队、红军大队（《新国民日报》5月25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除掉我们所建立了新的大的从来没有过的四川苏区外，其他各个苏区和游击区，也是正在日益发展。

在目前中国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在蓬勃发展的苏维埃红军运动中，摆在中国红军面前迫切的任务，就是在于扩大反日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斗争底战线，其方法，就是进行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我们全党爱戴的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报告，曾经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中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号召：联合共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如何有历史意义的号召呀！请看这就是王明同志底战斗号召：“现在的任务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要向全体人民、一切党派、军队、群众组织和一切政治与社会名人提议：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准备与他们共同组织全中国统一的人民国防政府和**中国反日联军**”。

我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郑重宣誓：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首先响应党的和苏维埃政府的这个号召，我们决心诚意地首先加入抗日联军，并受国防政府指挥抗日到底。对于一切和我们作过战的国民党的军队，我们都不咎既往，今日之事，抗日则友，否则，不抗日而降日则视为敌。

我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在全中国人民面前，郑重号召：

一切东北和各地的游击队,义勇军,山林队,红枪会,大刀会各种各样武装力量,手携手的加入抗日联军,共同抗日吧!

一切国民党军队中有救国天良愿意真正抗日的各派武装,黄埔系,保定系,日本士官系,南京,东北,西南,西北各个政派与武装派别、手携手的加入抗日联军,共同抗日吧!

一切有爱国心肠,不愿当亡国奴的武装战士,过去参加过或未参加过抗日的将军,名将,士兵们,手携手的加入抗日联军,共同抗日吧!

只有那个时候,全国所有武装力量,一切站到抗日战线上,所有的力量(人力财力等)都为抗日而用,只有坚决地不动摇地进行抗日反帝和其代理人到底,那时候,才能收复失地,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才能得到解放!

一、用革命的民族战争,反对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

二、中国工农红军和它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三、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首脑斯大林同志万岁!

1935年8月15日

(选自《新政权与新军队》,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5年版。)

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①

(1935年10月10日)

陈 云

同志们!

今天我要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报告的不是中国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问题。我只讲一讲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西征的情况。

我在讲西征之前,先要讲一讲我们党为何决定西征。

我们党对苏维埃革命根据地问题的认识是正确的。巩固的根据地对红军来说是必需的,没有这样的根据地会给今后的国内战争带来很大的困难。还在1930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已经指出:建立根据地是中国党头等重要的任务。共产党过去执行这一任务,在今天它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当敌人包围了我们以前的苏区,把我们挤到一小块地区里时,我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目的,中国党组织了红军著名的英勇的西征,自江西向中国西部挺进。

为这次西征,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呢?

首先,在我军主力纵队撤出中央苏区向西部进发之前,党先派一部分部队打出苏区,深入敌后。尤其是我们派了抗日先遣队红

① 这是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标题为编者所加。原俄文记录稿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是当时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

七军团向福建方向和赣闽边界地区挺进,于是我们的部队便插到了东北方向敌人的后方。

第二个行动:派部队从湘赣边区打到福建^①去。这一行动由与贺龙^②部会合的萧克^③的红六军团^④完成。于是我们在西北方向敌人的后方也部署了部队。

此外,我们做了保障红军主力此后西征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为红军主力部队补充了青年战士。我们吸收了3万名志愿者参军。

第二,我们培养了一批基本干部和部队的骨干。这些干部都经过三所军校的培训,这三所军校是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知识的特科学学校。我军大多数干部都毕业于这三所学校。

第三,我们筹集了60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食用。还加紧生产弹药,弹药生产增加了6倍到30倍。还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

西征的准备工作按计划应在三个月内完成。但是由于局势变得严峻,我们不得不把期限缩短到两个月。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西征时红军的主力为: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教导师,总政治部直属部队,后备团。

从红军主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共花了八个半月的时间,行程1.1万至1.2万里,即5000多公里。我们共跨越12个省份: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

① 原文如此。应为湖南。

② 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当时任红三军军长。

③ 萧克,1907年生,湖南嘉禾人。当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

④ 红六军团的最高领导机关为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

南、西康、甘肃、青海和陕西。^① 中国的 18 个省^②中我们走过了 12 个。

我们走的都是些什么路呢？当然不是柏油马路或石板路。我们走过的大多是难以通行的羊肠小路。我们翻越了中国最高的山脉，跨过了 20 多条著名的大江大河，如长江、乌江、湘江、金沙江、大渡河。

我们有什么渡河工具呢？什么也没有。

川康交界处的山脉高达 1.6 万多英尺。5 月，中国正酷暑难耐，但是山上却白雪皑皑。我们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确切地说，受到来自南、西、北、东、天上和水里六面的夹击。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行军。如果仅仅是和追击我们的敌人比赛谁跑得快，那倒不太可怕，而我们在行军路上还进行了大小一百多次战斗。

（曼努伊尔斯基^③：粮食问题怎样解决呢？）

基本上靠各地人民自愿供给我们。后来红军采取没收敌人和土豪劣绅、地主粮食的办法。

西征达到了以下目的：

1. 我们确实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2. 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

3. 两军会师后，建立了新的、实力更强大、资源更丰富的苏维埃根据地。

西征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江西到贵州。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封锁线上有许多用钢骨水泥筑起的工事，埋伏了机关枪。这些地带敌人认为是攻

① 原文如此。红一方面军长征没有经过青海省，这里应为 11 个省份。西康，即西康省，1955 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四川省西部、西藏自治区东部。

② 原文如此。根据 1934 年 4 月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全国当时共有 30 个省份。

③ 曼努伊尔斯基(1883—1959)，苏联人。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

不破的,他们本想以此来把我们困死在苏区里。我们击溃了工事里的敌军,冲过了四道堡垒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沿着江西的赣江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修在粤北的仁化至赣南一线^①。第三道封锁线沿粤汉铁路修筑(这条铁路当时尚未建成,但公路已通,水泥工事就沿公路修建)。第四道封锁线建在湘南至桂北一线。

这四道封锁线上都埋伏了机关枪,构成了密密层层의 弹幕。我们尽管两翼受到敌人夹攻,后面又有大军追击,仍很快越过三条交通线,渡过赣江,占领了城口,也就是说我们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随后我们攻占了宜章,也就是说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第三道与第四道封锁线之间,全是崇山峻岭,蒋介石正是打算将我们消灭在这里。

我们攻占宜章之后,又一连攻克了六个县:临武、嘉禾、蓝山、江华、道州、永明。于是,第四道封锁线也被我们迅速冲破了。这实际上意味着蒋介石把我们围而歼之的计划完全落空。我们出乎敌人的预料,走出了这一地区。

但是,应该指出我们的一些不足和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于没有进行解释工作,一部分青年战士和个别人开了小差。这种情况发生在湘南。这些青年战士不明了我们转移的目的与前途。这给苏区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这是因为我们对保守军事秘密问题理解得过于机械了。当时我们以为,西征这件事,不能告诉党员、战士和群众。

第二个错误,就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

^① 原文如此。“赣南”应为湖南汝城。

的机器和大量的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统统都抬走了。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 5000 人。

（曼努伊尔斯基：有没有马匹和骡子？）

经验证明，马匹、骡子和毛驴反而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道路太窄了。总之，由于这些笨重的辎重，我们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十天的距离。我本人是后卫部队的政委^①，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有一次，我们顶着倾盆大雨，跋涉在泥泞之中，花了 12 个小时，才走了四公里。

我们基本上以三路纵队的形式行军：左路，右路，主力部队居中。除此之外，还有先头部队和后卫部队。但是，由于道路状况并非总是一样，我们不能始终按照这一部署行军。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编成两路纵队行进。但我们从来不成合成一个纵队前进。

我们占领宜章之后，本应立即攻克全州并马上渡江。这个地方十分重要。但是我们由于辎重太多而没能及时攻下全州。结果敌人抢先占领了全州。如果不是带的辎重太多，我们的先头部队本可以走得更快一些，我们也可以少打几次仗。在湘黔边界地区，^②我们为战胜敌人的阻击，大约耗费了 100 天的时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由于我们的主力部队全都变成了辎重护卫队，没有足够的自由机动的部队。先头部队往前挺进，而后卫部队还落后在二三百里之外，也就是落后 100 公里到 150 公里。因此，大大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使敌人得以从侧翼攻击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辎重呢？这是由于一种不正确的幼稚的政治观念导致的后果。当时认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就是简单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不需要再进行一番新的艰

① 原文如此。长征初期，陈云担任红五军团（后卫部队）中央代表。

② 原文如此。“湘黔”应为湘桂。

苦的斗争和极大的努力。

西征第一阶段所犯的第三个错误,就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既然这样,我们本应加快行进速度、迅速占领据点,可是敌人拥有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战斗来夺取这些据点。我们的行军从不改变方向。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有一个地方,我们打了三天,才走了四公里。为了寻找尽可能走快些的近路,司令部的同志们和几个军长,一连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没有吃饭。我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在湘南,敌人对我们两面夹攻,切断了第34师与大部队的联系。这个师便留在了当地,变成了一支游击队。^①不能跟我们一起继续行军的伤病员也留在了当地。在第一阶段西征中,军事上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曼努伊尔斯基:在这种条件下,你们是如何安置伤员的?)

我们把带不走的伤员安置在老百姓家里。我们有时为了掩护伤员,组建了一些游击队。老百姓对待我们的伤员很好,当他们的伤养好后便把他们送回部队。

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湘黔^②边界,敌人集结了四五倍于我军的兵力严阵以待。以为我们会沿

^① 实际上第34师大部壮烈牺牲。

^② 原文如此。应为湘桂。

着红六军团从前进军的路线行进。桂军则从南面进攻我们的后卫部队。此外,后面还有大部队追击。

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指出这一计划只能有助于敌人,不会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好处。原来的领导人竟要将持此种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你们这些领导人,而不是我们。

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至此,西征的第一阶段完成。这一阶段大体上持续了一百天。当我们到达贵州时,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

西征的第二阶段,是从进入贵州开始,到占领遵义城结束。

在第二阶段,红军战士已经清楚了西征的前途和目的。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打到贵州去,“活捉王家烈”^①。这成了我们战士奋斗的目标。

我们抛弃了过去的“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了,我们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我们在这里击溃了奎伊担^②的两个师。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已比较容易得手。我们占领了乌江南岸的九个县,随后渡过了乌江。乌江在军事上历来是战略天险之一。指挥渡江者为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学院的刘伯承^③。他指挥一个师外加一个团,不断向前推进,十分迅速地占领了敌人的桥头据点。当敌人还

① 王家烈(1893—1966),贵州桐梓人,当时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

② 音译,原文为 Куйзи-Ден,应为侯之担。侯之担当时任黔军第25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

③ 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今属重庆)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来不及把桥炸掉时,他已指挥部队过了江。我们过桥后,占领了重镇遵义城和湄潭城。

我们的又一个大胜利是在当地招募新兵,扩充了我们的队伍。部队在遵义休整了12天,政工干部在这里招募了新兵。我们一共招了3000名年轻的新战士。从这一阶段起,我们已不再携带笨重的辎重。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容光焕发地继续行军。精神面貌改变了,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

我们在这里组织当地的力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建立了地方武装游击队。我们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豪绅、军阀的财产,并把没收的财产分给了群众。我们的这些做法使当地老百姓拥护红军的热情高涨。

我们认为,在遵义城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地方革命政权是我们取得的第三个胜利。

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进军四川。此外,我们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六次反“围剿”^①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至此,结束了我们西征的第二个阶段。

西征的第三阶段,从攻下遵义城开始,一直延续到过长江为止。在这个阶段我们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敌人手里。我们强渡了中国第一大

^① 原文如此。应为第五次反“围剿”。

河——长江的支流金沙江。这个阶段的领导是正确的。我们决定进军四川，先向北运动，然后转而向西。起初我们不了解敌情，当我们接近四川边界时，发现敌人的兵力超过我们几倍。于是我们占领了黄家^①，在这里集结部队并改变了行军路线。敌人得知我们要强行渡江，因此在川黔边界集结兵力。如果我们从这里一直向西，一定会遇到敌人最强的抵抗，因为敌人已在那里做好了防守的准备。所以我们转而向东，直抵桐梓城。这时敌人才发现我们不向西进，却挥师东行。但这时我们已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是我们红军一次漂亮的机动战。

西征第三阶段的第二个关键时刻，就是红军占领了距桐梓30公里处贵州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关隘^②，这时王家烈部两师人马向我们扼守的关隘发起进攻。我们大大加强了两翼的守备，守住了阵地。当王家烈部逼近时，我们便将他们包围起来。敌人主力被歼，只有少数敌人溃逃。当晚我们重又占领遵义城。

第二天，龙奇伟^③部又从另一侧向遵义城发起进攻，但我们自从战胜王家烈后早已做好战斗准备。我们把两翼的部队埋伏好，只等敌军前来进攻。早上八时战斗开始打响，到十二时龙部^④已被我军团团围住。敌人大部被缴械，只有一小股敌人乘汽车向贵阳方向逃窜。

因此，我军在桐梓与遵义之间歼敌整整四个师。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提高了红军在湘、川、滇、黔四省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民众感到红军实力强大。此外，这一胜利缓解了贺龙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的困难处境，因为他们正遭到敌人

① 音译，原文为 Хуанцзя，应为渡过赤水上游占领滇边扎西（今威信）。

② 关隘，指娄山关。

③ 音译，应为吴奇伟（1890—1953），广东大埔人。当时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官。

④ 应为吴部。

四个师的进攻。这时敌人便不得不暂停对他们的进攻,转而攻击我们。

红二军团乘敌军军力削弱之际,很快歼敌一个旅。这一胜利使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得以在苏区站稳脚跟。这是1935年4月底或5月初发生的事情。

这个阶段取得的第三个胜利,就是我军获得了许多被服、弹药和驮畜等。老实说,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大乐意打敌人的地方武装,而更喜欢打南京的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富有得多,战利品也要丰厚得多。我们每歼灭一支中央军,通常可以缴获大批粮食、被服和弹药,而地方军阀就穷得多了。(笑)

西征第三阶段的另一成功之处,是我们十分灵活机动,敌人很难摸清我们的行踪。敌人以为我们在西时,而我们偏偏在东面出现;敌人以为我们在东时,我们却已挥师西进。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白区与敌人作战,和在苏区与敌人作战完全不同。在苏区如果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为了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有时主动退却,诱敌深入,但敌人不能确切掌握我军主力的位置,因为苏区人民是决不会告诉他们的,因此我们常能迫使敌人改变原来的计划,放弃最初的作战意图。但在白区作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敌人在白区可以分几路从不同方向自由地进攻我们,如果有一路兵力受损,马上能派来增援部队。

因此,显而易见,我们的实力既然还不足以同时击溃四路敌人,便不能与敌人作持久战。如果敌人从几个方向进攻我们,而我们又无力应战,也就是说不能进行反攻时,我们必须采用机动战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这便是我们在黔北地区四进四退的原因。我们了解到在这一地区很难渡江后,便决定另觅渡江的地点。

强渡乌江是西征路上极为艰难的一次行动。如果按原定的路线直插乌江,我们就根本渡不过江。当我们最后一次占领遵义城

时,由于敌人预计我们会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早已在黔东南重兵设防。我们也就往这一方向派出部队,作出欲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的姿态。而我军的主力这时却向相反的方向进发。一夜之间,我们架起三座浮桥,全军顺利渡江。应该指出,乌江波涛汹涌,水流湍急,流速达每秒钟三米。江中险滩林立,没有一条渡船。我们同苏联红军不一样,没有迅速架设浮桥的军事技术装备。那末,我们是如何渡江的呢?我们扎了许多竹排,红军全体官兵就是用这些竹排渡过乌江的。

在架桥技术方面,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把普通的几股铁丝拧起来,将拧成的铁索两端分别固定在江两岸,然后在上面横铺木板,一座浮桥便架成了。

我们制造主力东进的假象,其实我们却正向西挺进。滇军^①奉命向贵州方向移动,也就是说集结兵力在东面阻截我们。

我军主力却向南面推进,绕过贵阳,经黔南又迅速折而向西。如此一来,所有的敌军——湘军、川军^②和中央军全都被我们抛在了后面。

根据西征的经验,可以说,我们从来不怕后面的追兵,因为道路太少,敌人不可能投入大量兵力,也很难将兵力在全线展开。

我们攻占了定番、广顺、归化、长寨、贞丰。

同时,为了拉开战线,我们派出另一路纵队与我们齐头并进。这一路纵队歼灭了滇军五个团,缴获了大批弹药和装备。我们进入瑶族聚居区后,招募了1万多名新兵。我们在这一地区没收了地主的钱财,仅银元一项就得用40多头骡子驮运。我们还缴获了数十担鸦片。而鸦片就等于是钱。

随后我们攻占了曲靖,在曲靖以西强渡金沙江。我们在占领

① 原文如此。应为湘军。

② 原文如此。应为黔军。

了滇黔边界上的一个据点后,本想直插江边强行渡江,但如果这样做,敌人会很快追上我们。于是我们挥师向南,深入云南腹地并攻占了云南首府昆明附近的许多城镇,截断了敌人通往江边的道路。但对于能否成功渡江,当时我们还没有很大的把握。

(弗洛林^①:当时红四方面军有联络员在你们那里吗?)

当时只有无线电联系。已经下令让红四方面军向南运动接应我们。但我们还是没有太大的把握。我们缴获了敌人的军用地图,但这些地图比我们使用的不太精确的地图好不了多少。我们还是在这些地图上标出了三处渡江地点,其中一处标有渡船的记号。这里必须叙述一件事,就是云南的龙云^②将军无意中帮了我们很大的忙。龙云本想派飞机给四川的一位将军送去军用地图和大批药品,可是飞行员病了,于是龙云决定派汽车送去。有一位司机自告奋勇,愿意担此重任。我们攻克一座城镇后,我和司令部的其他几位同志从公路上过,发现迎面驶来一辆汽车。我们当即缴获了这辆汽车,在车上发现了几十份军用地图和大批治伤的好药。这些正是我们急需的东西。我们打开这些地图,发现有九处渡口。我们还了解到,有的渡口只有一条渡船,有的渡口有三条渡船。这使我们对成功渡江信心大增。

滇军将领后来一再干出此类蠢事。有一次,红军来到贵州^③某城。战士们穿着红军制服,雄赳赳地直奔城下。这个县的县长从瞭望孔里探出头来,十分惊讶地看着我们。他想,既然这支军队着装如此整齐,肯定不会是红军。在他们的心目中,红军是“盗匪”,行装必破烂不堪。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中央军,因为滇军和川

① 弗洛林(1894—1944),德国人。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候补书记。

② 龙云(1884—1962),云南昭通人。当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

③ 原文如此。“贵州”应为云南。

军的着装比起中央军来要差多了。

顺便说一句，在共产国际七大^①的展览会上有一大幅宣传画，画的是中国红军战士。必须指出，我们的敌人才把我们画成这样。事实上，红军的穿着要比画上的好得多。红军总是精神抖擞、英姿焕发地攻城夺地。红军根本不像这幅画上画的那样穿着破衣烂衫。展出的一些照片上的部队，都是儿童团或赤卫队，决不是我们红军的正规部队。

我们在占领刚才说到的那个县城时，着装都十分整齐：头戴钢盔，上穿四兜上装，下着马裤，腰缠精致皮带，裹腿整齐。每人都挂着一只从蒋军那里缴获的皮包，营以上军官都配有望远镜。我们还拥有轻重机枪，而滇军和黔军的机枪都没有我们这么多。

县长见来者不是土匪，马上打开城门，热情邀请我们进城“坐一坐、吃点东西”。我们得到了盛情款待。休息之后，我们问道：“你们给我军准备好粮草和军饷了吗？”县长回答说：“早已准备好了。”我们还向他们要了几十名向导。城里的头面人物都来拜访我们。我们便逐一询问他们的身份，他们也一一作答，谁是民团指挥，谁是警察局长，谁是县长等。我们待他们自我介绍完毕后，便把他们统统抓了起来。

敌人做的此类蠢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毛泽东有一次讲，如果所有的敌人都像云南这个县长这样蠢，中国革命早就胜利了。

我们在缴获军用地图后，立即决定了渡江的地点。最大的渡口有十几只木筏，但我们想，敌人肯定会把这些木筏烧毁。为了掩盖我们渡江的意图，便向另一方向派出一支部队，以此来分散敌人

^①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听取了季米特洛夫所作的《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根据报告通过了决议，指出为了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决议号召世界无产阶级尽量支持中国红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有王明、康生、吴玉章等。

的注意力。当我们攻占县城以后,敌人便把一个渡口的木筏都烧毁了。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我们就在那个渡口着手架桥。当桥造了三分之一时,蒋介石的飞机马上注意到了这一地区,他们发现我们正在架桥,于是所有的追兵都向这里扑来。这时我们在其他渡口的过江准备已经完毕。

(弗洛林:敌人在空中一般每次有多少架飞机?)

四架、六架或八架。

我们迅速集中到指定的真正的渡江地点。我们在江边找到了六条渡船。我军主力就是靠这六条渡船渡过江的。我在这里应该介绍一下金沙江。金沙江并不太宽,与文化公园旁边的莫斯科河的宽度差不多,但是水流却要比莫斯科河湍急很多。金沙江两岸悬崖峭壁,高达300多米。在这里架桥很不容易。金沙江两岸十公里左右的地带都是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中国史书记载,三国时期的一位将军^①正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的。江边的风力很大,能把人刮倒。此处渡口的六条渡船都已经破损,需要修理,才能渡江。

渡江持续了九天九夜。我们没有损失一人一马。我们把马匹拴在渡船后面过江。当时哪怕有一条船沉没,都会极大地影响士气。我们必须迅速渡完,以免敌人追上。这一切都需要有严密的组织性。

为了顺利完成渡江工作,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渡河司令部,负责渡江行动。所有部队都必须服从这个司令部的指挥。我担任这个司令部的领导工作^②。我在这九个昼夜中几乎没有合过眼。我们指定专门部队负责渡江的秩序。必须防止人员蜂

① 指马岱。《三国志》记载,因为气候炎热,随马岱渡金沙江的2000名将士中,中水毒死了1500人。

② 当时陈云担任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治委员,刘伯承担任司令员。

拥上船,否则就会翻船。这就要求有高度的组织性。还需要有经验的船工,因为水流湍急,很容易翻船。我们对当地熟练的船工付给优厚的报酬。当地老百姓对我们都很好,附近船工都自愿来帮助我们。许多船工在渡江后加入了红军。

这次渡江再次证明我们红军战士服从纪律,组织严密,觉悟很高。

我们过江后直逼会理城下。敌人得知我们的行动后,花了11天才追到江边,而我们只用了9天,早已渡江完毕,蒋介石已无法追上我们了。

红军战士就这件事编了一出新剧,讽刺蒋介石,说他尾随我军历经数省,好不容易追到金沙江畔,却只在空船上捡到一双破草鞋。

当蒋军试图渡江时,我们的机枪早已准备迎击敌人。敌人只好转而向北,另找别的渡口。敌人由于粮草不足,士兵饥肠辘辘,士气低落,大批士兵开了小差。

我们渡江之后,居于主动地位。我们可以阻止敌人过江。我们的处境逐渐好转。从此西征开始进入第四阶段。

在会理城我们休整了五天,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指出,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政治局的决议传达到广大红军战士并得到广泛的拥护。

我们决定加速向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需要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的第二个重大成果,是我们考虑到在雅州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必将与敌人作战,于是决定扩充红军。我们招收了5000名有战斗力的年轻战士,并组织了大批游击队。我们还制定了筹粮筹饷的计划,也都全部完成了。

我们在会理休整五天后,继续朝大渡河前进。如果以每天行军30公里计,总共需要29天时间,才能到达。还应估计到沿途到处有敌人。他们在很多地方为了阻挡我们渡河,把桥梁都烧毁了。

我们以异常快的速度插向大渡河，不去攻打沿途的城镇。我们在沿途各地组织了游击队。在这一地区，我们遇到了与省委已经失去联系三年的“野”组织。我们找到了当地领导革命运动的党委，找到了当地的共产党组织。第二天，他们就动员了1000多人，成立了抗税军。这个地方的党委现在还在工作，组织已得到了加强。

从这里出发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如果走大路，则可以料到敌人会毁掉一切可供食用的粮食储备。我们派出一支部队走大路以吸引敌人，而其余部队都走另一条小路。我们进入了当地土著彝民聚居的山区。这个部落系突厥后裔，对汉人有极深的成见。我们到来之前不久，白军的一个将领曾试图穿越这里而被当地人击毙，其所部亦被消灭。

我们红军一到这里，也被他们团团围住。这支部队是由工农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亲自指挥的。他不仅会打仗，而且善于搞统一战线。他利用了这个部落内部的纠纷，并且当着彝民大众的面杀鸡饮血酒，以表示歃血为盟。自此以后，彝民部落待我们很好，建立了友谊。但仍有一部分人严守中立，而另一部分人却尾随我们，欲与我军交战。他们开枪打我们，我们架起机枪给予还击，打死了一二十人，其他人立即四下逃散。我们开展宣传工作，说我们愿意帮助他们等等。这种态度，使他们非常感动，友好关系渐渐巩固。我们继续前进。他们送给我们马匹、牛羊以及各种礼物，我们回赠他们金钱等等，甚至还送给他们鸦片。

此后，我们抵达大渡河边。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自太平天国时代起就已闻名于世。太平军将领石达开自南京退入四川后，正是牺牲在这里的。我们遇到一位九旬老人，他是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亲眼见过石达开和太平军。老人告诉我们说，太平军和石达开被歼是因为军队内部产生矛盾，还说太平军并不是什么“长毛”。我问他：“老公公，你认为我们红军对老百姓好些，还是太平军对老百姓好些？”他回答说，你们对老百姓要好得多。

这个地方只有两条渡船。河对岸有一营敌军驻守。敌营长怕我们到来，命令将两条船都拴在对岸。当夜红军抵达河边。第二天早晨，黎明时分，我们发现河面很宽，难以渡过。大渡河比金沙江宽些，但水流更急。渡船往返一次，至少要用50分钟。因此，红军主力要想渡完，得用一个半月的时间。这当然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找不到当地的船工。于是从党团员中挑选了19名勇士^①，给他们配备了匕首、步枪和轻机枪。我们在岸上架设了机枪和迫击炮，还安排了有经验的狙击手。19名勇士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尽管一次又一次被水流推回，敌人的机枪不停地扫射，他们却毫不畏惧，勇往直前，顺利登上了对岸。上岸后，他们缴了部分敌人的械。我们的炮火迫使敌人转移了机枪阵地。我们的同志趁机占领了山上的制高点。在19名勇士的掩护下，我们开始渡河。经过两个半昼夜，渡过了一个师。

我们这19名勇士，在冲锋时只伤了5人。政治部给了勇士们最高的奖赏。他们获得了“红军英雄”的称号。但是只有一个师渡过河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红军主力仍然在河的这一边。于是我们转而西进，准备从那里唯一的险峻泸定铁索桥上通过。当南岸的红军主力部队向西挺进时，已在北岸的红军师也向西运动。北岸的敌人边退边死守，负隅顽抗。尽管如此，我们在北岸的部队仍顺利到达指定的地点。

我们从三面发动进攻，敌人虽然筑有坚固的工事，仍然抵抗不住我们的冲击。敌人中的许多新兵知道红军不杀他们，纷纷丢下步枪，等待我们的到来。我们吸收他们参加红军，从而充实了自己的力量。

我们来到铁索桥时，发现吊桥已部分被破坏了。铁索上的木板已被拆掉。桥长900多尺，合300多米，由13根铁索组成。上

^① 原文如此。应为17名勇士。

面4根作为扶手,下面9根并行以便横铺木板。桥的铁索都固定在高高的崖石上。要走到桥头,必须先经过一个石洞。

蒋介石的空军连续对吊桥轰炸了三天。但是他们连一根铁索都没有炸断,因为河岸太高,飞机飞过铁索桥时无法降到需要的高度。

刚才我已经讲过,桥板在我们到达之前已被拆去,只剩下铁索。敌人又不停地从对岸射击,火力凶猛。我们派出一个最优秀的连队作为前锋,他们双手抓住铁索前进。我们终于找到了木板,大家在前锋连掩护之下爬过了桥。敌人见红军战士如此顽强,大声喊道:“好啦,我们投降。”随即便交出了武器。

中国军事史上最英勇善战的队伍,在大渡河边都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蒋介石预料我们也会全军覆没。他曾对部下说:此处乃“赤匪”必死之地。但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我们攻下了这座桥。毫无疑问,这是红军西征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

从渡口到雅州,都是平坦大道。敌人沿路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显然于我们不利。我们决定避开大道走小路,但要翻过一个山口。当我们翻过山口进到村落时,村民们简直惊呆了。他们想象不出我们是怎样到来的,因为他们只听先辈传说有山路可通,但是几百年来从没听说有人翻过这么高的山。我们仿佛从天而降。这座高山,我们是爬着过来的。有些地方,泥深过膝,我们从中间穿行。

下山后,我们却又碰上了敌人的碉堡。我们整整攻了一天,仍未能将敌人赶走。于是我们派出一支部队轻装前进。待他们占领了一座高达1.6万英尺的山峰时,我们才攻占了天全县城。

为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我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大路,路上有敌人修筑的大型工事并驻有重兵把守。如果走另外一条小路,则会遇到粮食不足的困难。我们还是决定走小路。

红四方面军这时已经攻占了理番^①。我们逐步向北推进，而他们则由北向南接应我们。我们就这样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两支大军——红四方面军和江西中央红军终于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师。

我想就此结束关于西征的介绍。下面我将就建立中央苏区斗争的意义讲几点看法。

（休息五分钟）

这次历史性会师有什么政治意义呢？

首先，蒋介石的意图是包围中央苏区，修筑碉堡，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我们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主力红军实现了大转移，这标志着蒋介石“清剿”红军计划的破产。中国红军经过战斗得到了更多的锻炼，越战越强。参加西征的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经受了极大的磨炼。他们已不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素质很高的干部。经过这次远征的军队，已经是一支干部军队。

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这是这次西征最大的胜利之一。

其次，红军从前分散在各个地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曾不止一次地向红军提出过创建强大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苏区的任务。红四方面军与红军主力会师后，我们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根据地，而且具备了红军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实力。因此我们可以与敌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较量。

第三，西征又一个重大的胜利，就是现在红军的军事战略条件比以前更加有利。在江西时敌人可以把我们团团包围，现在红军则位于川北、陕西、甘肃和青海一带^②，敌人不可能从西北方向进攻我们。因为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粮食供应部队。在西康，我们每天光口粮就需要 180 吨牛羊肉。那里都是些居无定所的牧民，

① 理番，即今四川省马尔康县。

② 原文如此。当时红军没有到过青海。

米、面很少。

蒋介石现在只能从东向西或从南向北对我们发动进攻,他再也不能从四面包围我们。这种有利的战略位置是今后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处于这样有利的军事战略条件下,我们得以实施两个重要措施。

首先,主力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有两个月时间用来休整、补充和加强。这时怎么会有时间休整呢?因为蒋介石要再次发动进攻,必须从华中调集部队,而且这些部队必然要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这也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再者,红军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征战后,十分疲惫,自然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休整。我要再次强调指出,这不是简单的休息,而是使我们得以补充新兵、加强力量的一次休整。

我们在会理五天之内就招募到 5000 名年轻战士。大家由此可以推算,两个月内红军的人数能够增加多少。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确实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其次,另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是:我们的部队在会师后,挥师北上,向广西^①、陕西挺进。在攻克隋良^②时,歼灭胡宗南^③模范师 12 个团^④。这 12 个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歼灭了胡宗南的这个师之后,我们才能继续进军西北。

为什么红军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呢?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刚才我已

① 原文如此。应为甘肃。

② 音译,原文为 Суялан。应为松潘。

③ 胡宗南(1896—1962),浙江孝丰(今属安吉)人。当时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三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官兼第一师师长。

④ 原文如此。应为两个团。

经举了几个例子，我还可以给你们列举出许多足以证明中国红军举世无双的英雄气概的事例。

我们红军是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锻炼成长的。红军能冲能打，同时又能有组织地顺利退却。红军进行了伟大的西征。我们团结一致，决不能被敌人战胜。

我想讲一讲红军的进攻能力。

当我们在遵义向王家烈的两个师进攻时，发现敌人正在沿公路撤退。于是我们沿着小路，在不能点火把照明的情况下，连夜急行军，八小时走了50公里路。当我们赶到乌江时，敌人后面的几个团还没过江。我们烧毁桥梁后全歼剩下的几团敌人。难道这不足以证明我们红军十分灵活的机动能力和进攻能力吗？

敌人在川黔边界上修了三层工事，并集中了强大的火力。敌人的上层火力点分布在1000米高的山崖上。我们在十分钟之内就占领了中层和下层工事。攻破敌人第一道防线的消息是通过电话报告我们的。我们还没有放下话筒，马上又响了铃声，报告说第二道防线也被攻克了。我们前进的速度非常快。那天，我们发起进攻不是从山脚下开始的，而是从30公里外的地方赶来的。冲锋的时候，我们唱着战歌。这证明红军士气高昂、能攻善战。

红军不但善于进攻，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也能秩序井然地撤退。

例如赤水之战。白天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晚上十点，我们得知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于是决定撤退。我们搭了渡桥。桥是晚上修好的，而黎明时红军主力已过河走出15公里了。一夜之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渡过了河。

最后的这次撤退是我和周恩来同志一起组织的。没有一个红军战士对这次撤退发牢骚或闹情绪。敌人撤退时，总是惊慌失措、溃不成军，而我们红军撤退时，却是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经过八个月的锻炼，我们平均每天可以走100里到120里，也就是50公里到60公里，都是山路，而且往往还是夜行军。红军平

均每小时行军两公里半。如果有一支小部队遭到敌人阻截,他们就有组织地撤退,然后重新与大部队会合。

有这样一件事。一个13岁的孩子,是儿童局的书记,在当地居民中活动。他与红军大部队失去联系后,爬山过岭,整整找了三天三夜,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他饥渴难忍时,就喝自己的小便解渴。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和队伍。

这一个个具体的事例,证明了我们战士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和我们红军的团结一致,证明了他们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有组织地行动。

我们掌握军事技术的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各个军事学校已经培养了七批指挥员。我们有军事技术特科学校,还有专门为游击队培养干部的学校。

我们在进行国内战争的这几年中,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我们用这些经验教育我们的战士,提高整个红军的战斗力。

红军技术兵种的水平也大大提高了。比如说,虽然我们没有良好的渡河装备,但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渡河技术,可以组织渡河。

西征途中,我们从未放松对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每天早晨出发前,训练时,或每天晚上,我们都进行政治谈话。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来教育红军战士,教他们如何使用步枪,如何看军用地图等等。这些工作主要靠那些在军校学习过的同志来做,他们在红军中间起着很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的战士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英雄主义。红军在江西时知道他们的使命是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现在他们依然很明确自己的任务,即为民族解放和在全中国完成苏维埃革命而斗争。我们教育红军战士不仅要为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而战,而且要为世界革命胜利而战。

共产国际在红军中的威信是极高的。如果共产国际的材料或

决议传到中国红军战士手中,马上就会引发一股钻研材料、领会精神的热潮。

与中央苏区失去联系的其他苏区的战士们,不知道我们党开展了反对立三路线^①的斗争,也不知道我们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我们就把这些情况在小组活动中或谈话时讲给战士们听。所有红军战士都知道苏联。苏区的每个地方,几乎都有列宁、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②的画像。列宁、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在红军战士中无人不知。战士们还知道苏联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五年计划。这些情况,在我们的报纸、书刊上都有反映。我们那里有一首歌很流行,名字叫《武装保卫苏联》,内容很简单:“苏联是国际无产者的家园。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是她最大的成就。帝国主义者准备武装颠覆苏联。我们组织力量予以反击。我们武装起来保卫苏联。”

这首歌很简单也很流行,老老少少到处传唱。我们那些上过莫斯科军校的同志,把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讲给战士们听。他们说,“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并告诉人们,这个口号是列宁提出来的,苏联红军在这个口号的号召下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红军战士非常关心国际事态,尤其希望知道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情况。党的报刊、苏维埃机关报和红军机关报《红星报》,都经常发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消息和文章。

-
- ① 立三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久,李立三又制定了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 ② 伏罗希洛夫(1881—1969),苏联人。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苏联元帅。

在中央苏区时,我们组织了为季米特洛夫^①募捐、争取释放季米特洛夫的运动,救助政治犯的募捐活动,保卫台尔曼^②的运动和支援西班牙无产阶级起义的募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可以帮助训练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干部。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苏维埃学校中学习的还有朝鲜、越南以及其他东方民族的学生。

红军之所以这么英勇顽强,是因为工人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工人成分在红军中占20%。我们用新生力量扩充了红军队伍,应当说,年轻战士与老同志一样英勇顽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很高,每个战士都对敌人无比仇恨。

红军之所以这么英勇顽强,还在于她有一支优秀的、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干部为什么有力量呢?红军的主要骨干都是在国内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革命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红军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许多指挥员从年龄上讲都非常年轻,比如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共产党员,28岁;第二师师长才24岁;红四军团^③的指挥员陈昌浩(即伊兹马罗多夫,在青年共产国际大会上被选进主席团)也就二十四五岁^④,他曾在苏联的列宁学校学习过。

这些干部都是在国内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的干部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积极

① 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亚人。1923年9月领导反法西斯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933年德国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时被捕,在莱比锡审判中英勇揭露法西斯罪行。翌年获释到苏联。1935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② 台尔曼(1886—1944),德国人。1925年当选为德共中央主席。1933年3月被法西斯逮捕入狱,关押11年后惨遭杀害。

③ 原文如此。应为红四方面军。

④ 原文如此。应为29岁。陈昌浩(1906—1967),湖北汉阳人,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

主动,经常就下一步的计划、红军的任务和发展前途等问题,向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党给他们的任务,他们都能独立完成。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我们在西征中才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我们这次西征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它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

军队有大批党员也是保证我们西征胜利的一个原因。在某些部队中,党员占了40%。连长以上的指挥员一律都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排长也都是党员或共青团员。军队里的共产党员,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战士,都作出了勇敢无畏、忠于党、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表率。

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党员受伤后,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情绪,总是对他们说:“没关系,你们继续前进吧。”应该说,我们红军中的共产党员都是我们党的优秀分子。

我们的共产党员,无论他们是做工会工作,做共青团工作,还是做群众工作,都十分关心为红军培养干部。我们党常常把优秀的同志派到红军部队中去。因此,军队里实际上集中了我们党的全部精华。

我们的共产党员不仅在红军部队中是工作出色的榜样,而且在后方,如在筹备给养、补充兵员、征集粮食等方面也作出了榜样。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要实现土地革命,要获得自由,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当红军。”我们有红军的后备队,这就是加入儿童团、赤卫队等辅助组织的青年。这些青年都逐步转入红军部队。

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群众组织网动员群众。各地群众都自愿

为我们提供粮食。在第六次反“围剿”^①时,还是在原中央苏区,我们就从群众那里得到了60万担粮食供给红军。

在这次西征中,我们在供应上没有遇到过困难。只是在人烟稀少的山区,我们的供给有过一两天的短时中断。在经济封锁的条件下,我们能够为我们的战士提供新军服、新物资。

军工厂和军械制造厂的生产大大提高。党中央领导人把我们的优秀同志派到这里,负责各部门的工作。红军的供给由专人负责。我本人就曾受命做过后方工作。我抓过军械制造厂和军工厂的生产。

党一直领导军队,主持制定军事计划和战略战术。我们同国民党已经持续了多年内战。如果没有真正正确的党的领导,我们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在领导工作中,当然也有过个别的错误和失败,但我们的力量恰恰在于我们能够及时地发现并纠正这些缺点。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

我们取得胜利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我们每占领一个新的地区,就动员群众没收当地军阀、地主豪绅的财产和存粮。我们把这些财产和粮食分给贫苦百姓。只要有可能,我们到处都建立起地方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我们拨出一部分武器组织地方游击队。我们还组织了抗税军等。

四川军阀孔垂^②在经过群众忍饥挨饿的村子时,散布谣言说,红军沿途将烧光一切。事实上,我们的军队一路上看见有火灾,总是帮助群众灭火。

① 原文如此。应为第五次反“围剿”。

② 音译,原文为 Кунчуй,应为刘文辉(1895—1976),四川大邑人。当时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我们成立了抗租斗争的群众组织，因此才赢得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

我们还在少数民族中如广西的瑶族、贵州的苗族、西康和四川的彝族中开展工作。我们在传单和口号中提出了这些弱小民族的解放问题。我们提供了一些武器，让他们去组织游击队性质的自卫队。红军里面有不少人来自这些民族，还有来自回族的。

正是由于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所以我们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得以为红军招募到志愿兵。我们随处可以找到帮助我们搬运辎重的脚夫，到处可以把红军战士安置在老百姓的家中。当我们需要粮食时，老百姓会卖给我们，尤其在四川，这样的情况很多。我们红军常常帮助当地老百姓反抗军阀。

这里，我想简单谈谈红军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们无法长期呆在一个地方，我们要不断前进。晚上来到一个村子，次日早晨就要离开。但我们仍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

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规定包含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战士务必遵守。

每个住在这家或那家的战士，都应该同户主一起召集一次家庭会议，给这家人讲解红军的性质、红军的奋斗目标，力求使他的宣传得以在老百姓中传播。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三条标语。

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师政治部、各部队的政治处、各连队都有专门负责群众工作的部门。党、团、工会及群众组织，都派优秀地方干部在红军经过的地方做群众工作。尽管如此，这项工作还是做得不够，但每一个红军战士都做群众工作，这却是事实。

以下三个基本特点，是我们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

- (1)英雄主义精神和高明的领导。
- (2)党的正确领导。
- (3)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

我前面说的都是我们西征中好的一面。我现在也想讲讲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西征中不好的一面。

我们有没有犯过错误?当然犯过。如果我们不犯这些错误,我们的胜利会更大。

现在,简单谈谈我们主要的错误,即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我这里指的是我们对 19 路军所犯的错误。我们同 19 路军签订的军事协定,不是建立在创建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立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把 19 路军看作是某种试图走特殊道路的反动势力,把它视为没有任何前途的第三种力量。

由于我们对 19 路军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首先犯了军事错误。当蒋介石进攻瓯江^①时,本该派军队抗击,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相反,红军的主力部队却开向了滕盖^②,也就是朝相反的方向去了。政治局获悉这一情况后,便下令军队返回,但此时蒋介石已将 19 路军击溃。如果我们不犯这个错误,那末,现在福建和中央苏区的局面就会完全不同。

我到莫斯科后,在同王明谈话时指出,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应该指出,如果我们在西征时采取新的策略方针,那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但即使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仍不算晚。统一战线在当前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引起了中国广大民众强烈的愤慨。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我们应该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这对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是十分有利的。

我们的第二个错误是,我们组织西征时,没有向广大群众、

① 音译,原文为 Линцзян,应为延平(今南平)。

② 音译,原文为 Тынгай,应为永丰。

我们的红军战士、甚至我们党内讲清楚这次西征的意义。这一问题甚至政治局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错误的后果，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的第三个错误与干部政策有关。我仅举两个例子。当我们离开江西时，带走了我们主要的军事干部、军事学校的所有学员等等，但却把我们党主要的宝贵干部——那些在民政机关中工作的干部留在了那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该撤离，而且也是可以撤离的。当时是可以找到人代替他们的。瞿秋白^①同志和楚苏希^②同志本应同红军一起走。可他们却留在了当地，后来被捕遇害了。这对我们党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

另外一点是，干部使用不十分适当。我们有许多用人不当的例子。常有人做不了军队工作，在军队里工作不太合适，可以并且应该让他去做别的工作，但我们有时却没有这样做。

我们的第四个错误与我们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有关。我不去详细谈这一问题了，因为另一位同志将专门来讲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这个任务。我们在对待商人问题上也犯有错误。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

-
- ①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8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9月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1931年1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排斥于党中央领导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1934年到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1935年2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 ② 音译，原文为 Цу Су-хи，疑为周以栗(1897—1934)，湖南长沙人。曾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和内务人民委员。1934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因病赴上海治疗。途经江西信丰时被捕，后惨遭杀害。

第五个错误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这就是 19 路军失败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我们在两次大的战斗中犯了错误。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运动战术。我们本应深入敌人后方,却采用了阵地战术。我们为与敌人的堡垒进行对峙,也试图修建碉堡和堡垒。其实,可以诱敌深入苏区,围而歼之。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都曾采用过这样的战术,而且卓有成效。

我们运用过以往所有的作战经验,但却主张要打阵地战和进行正面攻击。敌人向前推进两三公里,我们就开火迎击。于是敌人停了下来,开始修筑工事,包围我们。起初,蒋介石是每隔五公里到十公里修筑一道工事,后来修得更加密集,每隔一公里到两公里就修筑一道工事。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紧挨碉堡的地方开始还击。例如,第三军军长迎战敌人时,敌人刚离开碉堡 2.5 公里,他便开始转入进攻,敌人马上就撤回到工事里去。

我们本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但我们接到司令部的命令,刚发现敌人就开了火。我们以为,不应该推迟胜利的到来。我们的一些军长尽管知道机动撤退是违背司令部的命令的,但仍然后退十公里左右。敌人没有遇到抵抗,便向苏区推进,然后在那里被围歼。

当然,我们的工事应该可以保卫我们的苏区。群众支持我们。但是,敌人就在附近活动,他们轰炸我们的工事。部分工事被敌人摧毁,还有一部分变为他们的据点。我们的这些碉堡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相反,却给我们造成了装备、干部等方面的损失。这不能称之为正确的保卫苏区的策略。

我们犯的第二个大的军事错误是我们分散了红军主力。以往的战斗经验表明,必须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可我们却把军队分散,使之变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自己则丧失了机动能力。

这就是我们在最后一次反“围剿”中所犯的五个错误。犯错误

当然是件坏事，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克服并纠正这些错误。

这次西征后，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党作出评价。在连年国内战争之后，红军增强了战斗力，真正成长壮大起来了。当然，我们在这次西征中遇到了许多艰难险阻。在原苏区，在赣东北地区，我们的红军都受到了相当损失。另一方面，我们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取得了胜利。我们在中国的西北，在陕西、四川和甘肃一带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红军尽管遭到了损失，但目前红军的总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反而增加了。红军西征时，沿途组织了许多地方游击队。在个别地区，我们创立的这些武装队伍，相当于一个团的规模。

我们提出，在目前所占领的地区内，努力实现创建百万红军的口号。这个口号我们一定能够实现。

应当怎样评价我们党的工作呢？在四中全会^①以后，我们党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党在苏区的威信很高。党保卫着苏区的成百上千万群众的利益。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②、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

① 四中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②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1930年6月至9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

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我想提一下那些同川西地区失去联系、三年来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他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及英勇无畏的气概是非常伟大的,他们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作出了榜样。

我们的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说我们没有前进,说我们在原地踏步,是毫无根据的。

根据《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刊印

(录自《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红军的作战活动^①

(1936年1月13日)

塔斯社上海1月11日电：《汉口先驱报》记者自安乡（湖南省）报道，贺龙领导的中国红军部队向湖南西部和贵州省推进，夺取了所有的粮食储备。

据记者说，南京政府军队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华南晨邮报》报道，湖南省主席何键又惩处了他部下的几名指挥官。12月31日，一名团长和一名营长因对红军作战不力而被枪决。

路透社驻汉口记者证实，贺龙部队占领了湖南、贵州两省边境的铜仁和玉屏。

上海出版的日本报纸对蒋介石和张学良清剿红军行动的毫无成效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上海日报》还报道了中国红军的成绩。该报写道：

“毛泽东和徐向前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甘肃和陕西两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张学良部队在前线却按兵不动。他们既不认为有斗争的必要，也不希望同红军作战。”

接着，该报对南京政府派出同贺龙和肖克部队（4万人）作战的30个师的行动不力极为不满。因为，按照报纸的说法，南京以30个师之众竟然让中国红军进入了湖南西部和贵州省。

报纸同时提出，中国红军这些部队的任务是继续向四川推进以便同朱德和徐向前的部队会合。

^① 这是《真理报》的一篇报道，原文未署名。——编译者注

该报讯,锦屏县(贵州境内 15 公里处)一战,南京政府军死伤 4000 人。贵州省当局认为,省会贵阳市正处于红军进犯的威胁之中。

塔斯社东京 1 月 11 日电,《日日新闻》驻天津记者报道说,中国红军在陕西省正积极加强行动。

记者写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红军于 1 月 1 日发动了新的进攻。毛泽东的先头部队目前已同南京军队在石湾镇地区(陕西省北部,靠近绥远省边境)作战。

(高和平译,章任贤校)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国红军的顺利推进^①

(1936年1月18日)

塔斯社上海1月16日电：外报认为，贺龙率领的中国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战略机动。

路透社报道：贺龙部队已完全进入贵州省，正兵分两路向西推进。一路沿广西省西北边境，一路在贵阳（贵州省会）以北。一些报纸指出，这两路纵队都直趋四川意在同朱德、毛泽东所部会合。同盟社肯定地说贺龙的中国红军有4万人。

路透社驻广州记者1月12日报道，贺龙部队已经到达镇雄关（贵州以东约150公里）。

其余各部向镇远（中国红军三个师数日前占领的一个据点，位于贵州至长沙的公路上）以西推进。为了阻击红军这些部队，从广西省调去的五个师已经到达都江和独山（邻近广西省的贵州边境）。桂军派飞机对红军进行了轰炸。

同盟社报道说，1月8日茨坪一战，政府军死亡达4000人。据路透社讯，玉屏一战，政府军损失300人。

据《香港工商日报》报道，贺龙各部以小分队渗入贵州省。自去年12月20日起，他们开始突破政府军在贺龙红军原所在地区外围设置的封锁线。中国红军第五、第六师突然从隆回折向新化和辰溪（湖南省）。第四师返回桥江和淑浦。第一、第二师仍然留在武冈地区担任阻击桂军的掩护部队。第十六、第十七师在洪江

^① 这是《真理报》的一篇报道，原文未署名。——编译者注

地区活动,伺机转入贵州。12月21日,这两个师占领了新化。

《上海时报》在社论中阐述了红军这一新的活动的“危险性”,同时指出,政府军针对红军这次活动所实施的战局已经遭到彻底的失败。

塔斯社上海1月17日电:据《新闻报》讯:贺龙领导的中国红军部队占领了印江和青溪(贵州省)。

据《字林西报》报道:南京政府在四川东南地区集结了四个师和一个旅以便阻止贺龙各部同毛泽东、徐向前所领导的红军会合。该报认为,朱德率红军向四川转移时留在当地担任掩护的一部已经在贵州与贺龙军队会合在一起。

路透社证实了中国红军占领镇远城(贵州省)的消息。

(高和平译,章任贤校)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对战略的意见书

(1936年1月27日)

李 德

党中央军委会：

我想简单的再提出几个关于军事战略的意见。我请考虑这些问题。我们的战略是由党的新政策出发的，不必再说。准备并进行反日反卖国贼及其头子蒋介石的民族革命战争国防政府，将抗日联军的口号和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所有这些以及由此产生的别的我们政治策略的改变无疑是对的。问题是在军事上怎样去实现这个政策。

我了解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在自己对战略方针决定是从两个基本点出发的。

(一)苏联——日本的战争在今年(1936年)一定发生的。发生战争的直接原因将是日本夺取外蒙古。

(二)我们反日反卖国贼胜利的基本条件是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及由苏联得到技术上的帮助。其结果是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汇合起来。因此我们的战略目的，就是与苏联打通联系。而我们的主要行动方向即内蒙古(绥远)。苏联——日本的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就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原因。我们记得在1932年初期的情况，那时好像战争成了直接的事实，可是战争没有起来。苏联达到了将战争延期，而日本方面也必须巩固满洲的阵地。因为有马占山、苏炳文等的暴动及主要的广大的义勇军的发展威吓着满洲，而现

在如何呢?

(一)我想苏联还是尽可能保持和平的政策,把战争尽可能的延期下去。伏罗希洛夫同志说:现在不是苏联胜利的问题,而是使这个胜利怎样能够少流一点血。这不是说苏联现在希望战争,而是说须要进一步加强,技术上还要提高自己,准备将来的不可避免的战争。至于国际上的情况,义亚(原文如此——原编者)战争扩大到世界战争,可使苏联在东方更放手些,这或许是的。但我们不能够预言1936年一定会发生世界战争,因为我们所有的材料太少。我们还不知道是否日本夺取外蒙古的战争就会成为苏联——日本战争,斯大林同志论日本这个狼总是要吃蒙古这个羊的,而为什么没有说这个老虎——苏联赶跑这个狼呢?

(二)日本现在觉得必须扩大巩固华北的阵地。占领中国,将中国变为殖民地,仅只是开始。民族革命的力量一天天的生长。日本应当克服这个障碍。应该的“平静”的中国如满洲一样。不然日本在中国的北部没有强固战略上的基础,来进行反苏联战争。

(三)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之下发生苏日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于我们。假若我们战略方针的目的,是在与苏联打通关系(我这里说的如毛同志和党中央说的一样是军事的战略的联系),若是我们的主力今年接近蒙古,特别是接近外蒙古,这样可以唤起日本对内蒙古、外蒙古积极性的加强并推动其直接反对苏联。我们供给日本口实来进行他的进攻,这个口实于日本非常需要的,即在世界帝国主义面前亦是一样。我们或许会反对自己的希望,自己的意见,做了日苏战争的挑拨者的作用;过早挑起苏日战争。我不说一定会这样。但我们应当非常的小心于一切关系到苏联外交政策的问题。应该避免这些有可能唤起过早期的冲突。

做三个注解:

(一)同国际的交通关系应当很快决定坚决的方法,为的是能够得到通信指示领导,但这个技术的和秘密的交通。战略上的

联系,应当表现于配合的军事行动,不论苏日战前或战时都一样。我们不应简单的延长苏联的蒙古的战线,这不适合于我们的政治任务,亦不适合于我们军队的性质。日本现在夺取中国,将来向蒙古、向苏联进攻。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而军事上呢?(1)创造领导和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在中国反对卖国贼和日本;(2)组织和领导抗日联军,依靠于发展的情形和力量如何来转成正规(大的)的战争反对日本;(3)参加到世界大战中如中国的一个独立的强有力的军队——和同苏联红军配合行动。

建立同其国际技术的秘密交通。我们可以解决国际性的问题,如战略上的打通苏联和技术上的帮助问题。

(二)技术上的帮助问题,当然我们不拒绝的。就像苏联方面在适当的情况之下不拒绝的一样,但我想不要把这个做成唯一的希望。就即如得到技术上的帮助,现在我们的力量很少可能利用。就是现有的技术(如机关枪)还没有完全应用,我们应当首先造出应用技术的预先条件,以后再提出技术的问题。此外不能够这样说,没有技术的帮助,不能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战胜卖国贼和日本。技术是我们的一个条件,但不是战争的中心问题,中心问题须要解决的就是政治任务。到了造成政治条件,大的军事力量和事情到了国际的冲突时,我想技术问题的解决是不那样复杂的。此外应当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技术问题,至少现在我们还没有别的方法解决。经过联军,我们有很大的可能解决技术问题。在解决技术问题上的消极,是表现在未与苏联军事上打通关系时,把自己的一切策略建筑于得到苏联的帮助上,而不利用现有的可能性,用自己力量来解决问题。

(三)斯大林同志所说:关于日本的狼和蒙古的羊我认为不能够了解为是直接请我们到蒙古去的。这里,我认为是说红军不得已时,而向中国西北行动,和万不得已向蒙古接近,那就没有大的不好,无论如何日本帝国主义总要企图夺取蒙古的。我想最好在

中国完成自己的革命任务。现在特别中国西北部,有着这些的先决条件,那时日本的狼亦不这样容易吃蒙古这只羊。

就在这个事情上(我继续讲这三个问题就苏、日战争的时间和条件问题,在最大的限度依靠于我们)我们可以帮助苏联的和平政策,可以吸引日本基本的注意放在中国。此外,我们可以开展和组织民族革命浪潮直到同日本帝国主义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个是我们的任务。这适合于我们的正确的政治口号。现在已经有许多先决条件(东北军高桂滋、学生运动和东北几省的游击战争的开始等),这些须要发展我们的军事行动去保证实现我们的政治任务。

(一)争取和领导民族运动开始是反卖国贼的战争。把红军扩大到最高度,同组织游击战争,组织联军。但所有这些不是在蒙古,而是在自己的中国。

(二)在保证巩固扩大自己的根据地,因为没有根据地,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政治的军事的任务,和不能够保证红军苏维埃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作用。

根据地的问题现在是修正了一些。但事实上根据地的问题仍未解决。我想在我们一年的长期行军中清楚的证明了,红军长期行动没有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在遵义以前我们的红军缩小到4.5万,在陕北时只有5000人(在路上扩大的新战士在外),这个证明必须有根据地。加深政治工作,谈判实现民族战争中的统一战线,在行军中差不多没有能做到满足的程度。没有根据地或者把苏维埃根据地变为游击区,将使苏维埃在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战线中的比重非常的降低。这种危险在面前:第一,陕甘苏区根据地扩大巩固没有保证,现在只能认为政治上有保证但在军事上是非常可疑的。第二个问题没有在山西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明显性。这个问题需要解决的:

(一)军事行动对陕甘敌人给一个打击是没有得到成绩,北路

军没有完成打击井岳秀的任务(在北方现在相反的在孙楚指挥下阎锡山部队加强了)。横山和石湾没有夺取,提出的任务如恢复绥德、吴堡及其他苏区,在现有的堡垒主义发展之下,在计划上把游击队调到黄河东岸及缺少“主动”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实现的。主力红军回渡的可能性很少,特别是从预计的在山西行动方法上来看。所有这些,在主力离开条件下,妨碍陕甘之扩大与发展(军事上)。虽然不能够说,现有苏区好像是丢了,这个苏区的发展(苏区群众很好,由游击战造的苏区,堡垒主义少,敌人亦不很大,同白区发生联系容易和在最后期内对敌人的政治影响的加强),所有这些特质都是说,虽然这区域不丰富、落后,但是他应该成为我们一切行动的支柱。是的,我并不说在可能与主力切断时没有保持这个根据地,但是主力被切断时,或到绥远去时,在主力方面即失掉了根据地。

(二)在黄河沿岸创造苏区是×预计的并可能的,以便保障同老区的联络和打成一片。但须预先注意到我们主力红军具体的行动条件。毛同志自己承认阎锡山有了准备,因此不能在沿岸区域长停(区域大概是吴堡、太原以南和汾水河以西,太原、潼关的铁路以西),可是我对这点是怀疑的,因为这个区域是相当大的(有 11 个县),连沿边的县算则有 17 个县,而且是山地。假若是那里还不能立足,那么在什么地方创造苏区呢?那只有两个办法行动:(1)向北走出吴堡、太原大路,这样阎锡山将向东的、向南的道路封起来,只有继续向绥远,在绥远能生存的只有在黄河沿岸和铁道周围,还不知是否我们能够在那里长期支持。其他地方是草地沙漠,走过去是可以的,长期行动不可能。结果就把我们赶到接近外蒙古。应当懂得阎锡山在绥远的影响并不弱,在德王的亲日阴谋差不多成功了。这样不仅地理上的经济上的而且政治上使我们困难。粮食上的困难将使我们不得已要吃群众的储粮。这便使他们政治上反对我们,因此,在这个方向虽然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打通苏

联),而在政治上反受到损失和军事上的削弱。(2)向东行动(即使暂时的),战役上的条件将对我们非常严重,将处于四周的铁路中间(太原、石家庄、郑州、潼关)互相交叉的许多汽车路。此外在西边汾水河和南边黄河对敌人军事条件上是有利的(调遣军队和修筑堡垒),假若不能依靠于积极的广大群众(而我们的政治准备很少),那么在那里就不能立足,向西已经困难,只有在山西、河北和黄河以北其他省份长征的前途。根据地问题就困难解决。那么扩大红军,创造和组织领导联军等问题都不能解决。当然在这种条件之下,也可以进行游击战争,但是这成绩不能够替代大的红军和抗日联军的任务及根据地的重要性。

所以在军事关系上保持老根据地和创造新根据地还是问题,既然这样来实现我们伟大的政治主张是没有保证的,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有相当的冒险性的。假若从我们战略计划的由进攻性质来分析,则这点更清楚。

至今,至少在中央苏区和陕甘苏区时我们的行动在战略上是防御的。现在我们提出自己的具体任务:

- 甲,渡过黄河坚决进到白区去;
- 乙,在半年内击破阎锡山和消灭其一部;
- 丙,向绥远出动。

我想这是战略的进攻。这样情形之下就应当着重的估量力量的对比。我们有 1.3 万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战士和 3000 新的俘虏兵。技术是低的。情绪是好的。但是地方观念很深(补充师事件)。这些须要而可以克服的。但是现在应认为注意现象领导是好的,特点是游击性的行动,战争的主要形式就是埋伏、袭击。这在苏区及游击区常常决定胜利的,而在白区则很少得到结果。因为条件的不同,这可于中央红军的行动中证明了。

就敌人阎锡山一个就有 8 万人,不错,很少战斗经验,战役战术的领导是差的。统治者政治制度假若相信现有的材料有相当聪

明,进步和吸引群众在他的周围,技术上总是比我们高。交通(铁路、汽车路)便利。可以看到,特别是阎锡山假若自己已经困难时,日本(因他是日本的走狗)或者其他派别(蒋介石)在日本暂时的让步条件之下,将帮助他,主要的是我们的战役战术的领导的特点,在白区困难实现。结论:转到战略进攻的我们还非常之弱。我们的转入进攻是过早的,且在将来行动区域中的政治准备不充足。应当注意这两点。不然会将进攻变为退却(因为有可能将回到老区可能阻碍起来,和创造新苏区还是个问题)和逃跑,这样危险性是有的,而且亦不能不看到这个。

假若问题是把主力的出发紧密的联系到新的或旧的根据地的的问题,以将两个根据地汇合起来,用一切方法解决根据地的问题,而使主力依靠根据地。那么,我们的战略方针的冒险性就很少了。

我做出几个结论来可以当作提议观察(虽然现在是晚了),我将由现在已经采纳的战略计划来作出发点。

(一)不应将自己的战略方针放在苏——日战争无条件的今年(1936年)会爆发之上。

(二)同苏联的联系不应当作为自己的主要战略目的。战略上的联系应当看作配合行动(在苏——日战争发生的前后一个样)。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

(三)我们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取消向绥远去和接近外蒙的条文。

(四)在目前应当提出自己主要的任务:

甲,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并将它联结起来。

乙,开始反卖国贼的战争,并反对阎锡山和消灭其一部。

(五)在自己的战术上的行动上应当趋向于:

甲,在汾水、黄河之间创造新根据地,在这些地方最高度的发展党的群众的组织,发展游击战争,和主力行动应依据于此。

乙,保持黄河的一段在我们手中。

(六)同日本的直接战争不应了解苏现在应该用我们主力的战略任务:

甲,反日战争现在应当发展成最广大的游击战争。

乙,一切注意都应集中在组织抗日联军,按其程度的发展团结它,如有可能将它转到大的战役行动反对日本。

须要再谈一谈关于我讲到以上的发生苏——日战争的问题,这样的语词好像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都没有讲。但是我愈多想则愈明白,战略计划主要任务之点即在此,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不然和在军事上与苏联发生联系。第二,因此我想这种情形,虽然还没有明显的表示,但我很正当的把它放在第一位。

我写的很快知道了说在1月31日在延长召集会议,请党中央及军委的同志们看。这个信请吸收讨论之内。

(录自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1-1937） 第十六卷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丛书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
书

页数=792

SS号=12054676

出版日期=2007.9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原书定价=298.00（共五卷）

主题词=共产国际 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 史料
1931—1937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关系 新民主
主义革命 中国 史料 1931—1937

参考文献格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共产
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
1937） 第16卷. 北京市：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09.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共产国际对于上海事变的指示（1932年2月）

共产国际执委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号召（
1932年5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
（1932年1月27日）

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1932年2月2日）

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1932年2月15日）

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得到胜利？（1932年2月
26日）

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及其结果（1932年2月12日）

上海事变的教训与中国共产党（1932年10月）&米夫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论中国（1932年9月）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
1932年9月2日晨）&王明

在讨论库西宁和台尔曼的报告时的发言（摘录）（
1932年9月5日）&（日本）阿木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发
言（1932年9月12日）&王明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的发
言（1932年9月13日）&洛甫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决议的
决定（1932年12月31日）

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和共产党的任务（摘录）（
1933年11月28日）&库西宁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论中国（1933年12月）

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1933年11月30日）&王明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第九次会议上的发言（摘录）（1933年12月2日）&皮亚特尼茨基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摘录）（1933年12月2日）&（日本）冈野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33年12月9日）&米夫

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运动底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底工作（1933年12月6日）&康生

中央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定（1934年4月12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摘录）（1933年3月）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

广州公社五周年（1932年12月）&米夫

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1933年4月）&米夫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1933年6月20日）

中国当前的政局（1933年6月）&米夫

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1933年）&王明

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国共产党五中全会通过）（1934年1月18日）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1934年4月）&米夫

为争取殖民地革命中的领导权而斗争（1934年10月）&米夫

中国争取建立苏维埃的经验（1935年2月）&米夫

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在反帝反国民党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中的作用（1935年8月11日）&王荣

七年来的中国苏维埃（1935年8月）&周和生

方志敏——中国人民的英雄（1935年9月12日）&Ar · 哈马丹

司令员朱德（1935年12月6日）&Ar · 哈马丹

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1935年12月13日）&Ar · 哈马丹

上海中央局转发共产国际、少共国际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1933年6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建立反对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告各国工人（1933年6月20日）

为建立统一战线而斗争（1934年11月7日）&季米特洛夫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1933年1月17日）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

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重申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共同抗日的主张（1933年4月15日）

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1934年2月22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1934年4月10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摘录）（1933年3月）

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1934年2月5日）&王明

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王明

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李德

敌人的山地战术&李德

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李德

反对曲解我们的战术&李德

再论战术原则&李德

短促突击的战例&李德
论防空几个新的问题&李德
某独立师袭击敌人未成堡垒的经过&李德
争夺四川的斗争（1934年11月14日）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
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1935年7月3日）&A · 哈马丹
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
论中国红军（1935年8月）&李光
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0日）&陈云
中国红军的作战活动（1936年1月13日）
中国红军的顺利推进（1936年1月18日）
对战略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李德